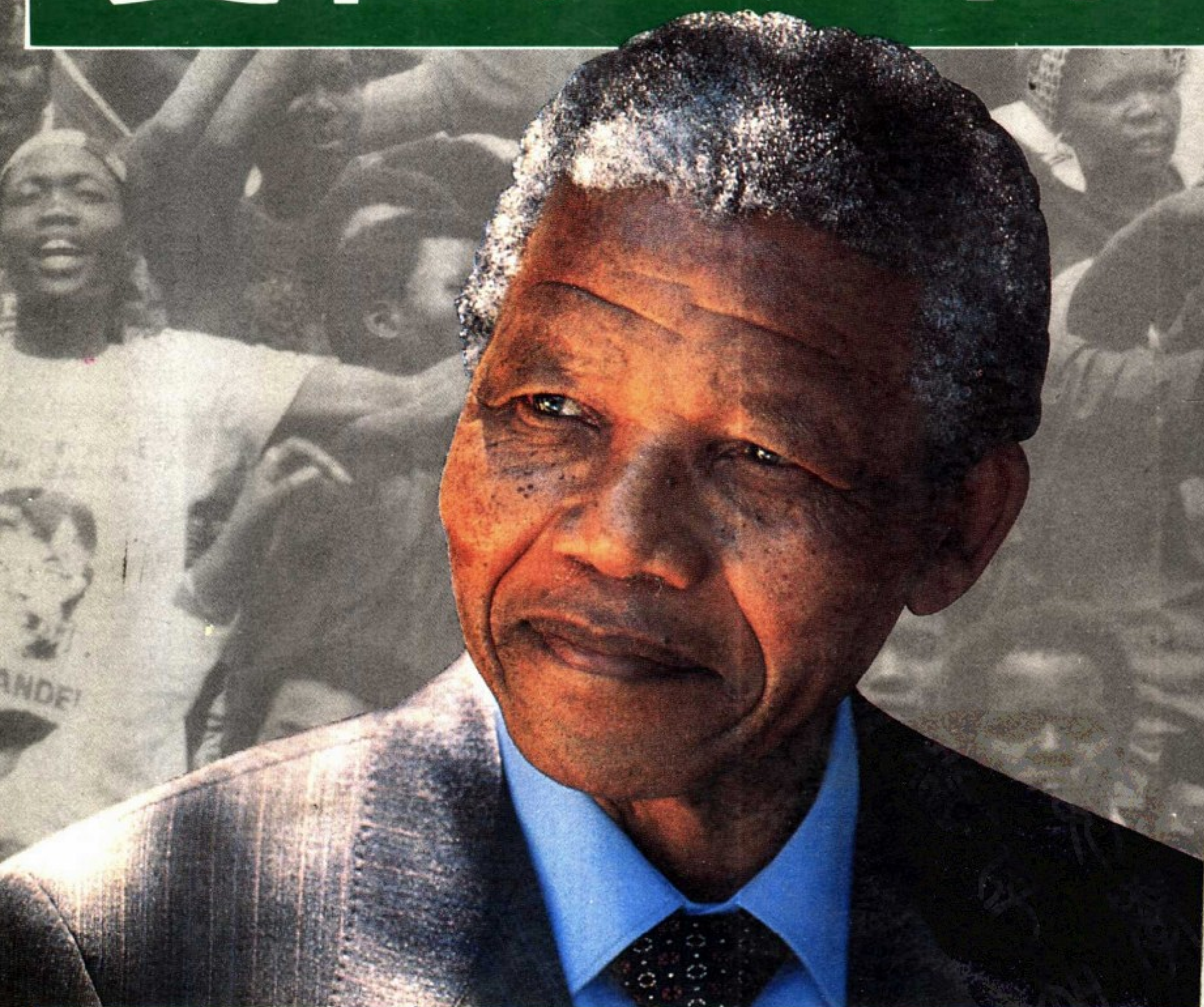
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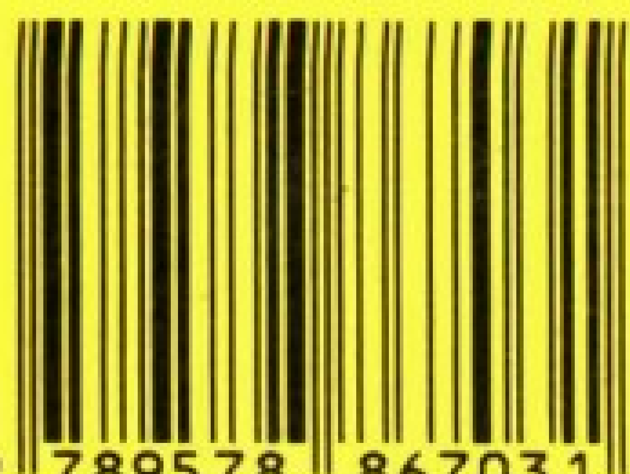
LONG WALK TO FREE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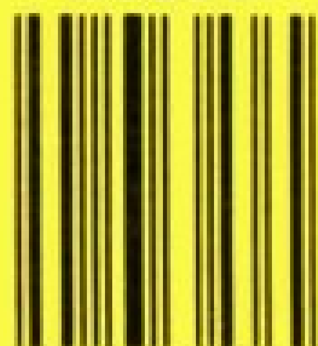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重訪羅本島。在他二十七年的監獄生涯中，有十八年被囚禁於此。

ISBN 957-8867-03-4





定價 **350**元

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自傳

納爾遜・曼德拉 著

何戟及奕丞小組 譯

天堃出版社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

書　　名 /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原 作 者 /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譯　　者 / 何戟及奕丞小組

編　　審 / 奕丞小組

發 行 人 / 賴燦賢

出 版 者 / 天堃出版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417巷219號

電　　話 / （02）7298787

傳　　真 / （02）7296221

劃撥帳號 / 17345950　天堃出版社

總 經 銷 / 農學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廠 / 京品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 /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邱彰博士 · 魏憶龍律師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5574號

版權代理 /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ISBN－957－8867－03－4（上冊）

定價 / 上冊350元　上、下冊一套600元

1995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



◀十九歲時攝於烏姆塔塔，
川斯凱(*P.K.A.Gaeshwe / Black Star*)。

▼一九五二年我與奧利佛在約翰尼斯堡的福克斯大街開辦第一個黑人律師執業的律師事務所(*Jurgen Schadeberg*)。



▶「抵抗運動」期間在法庭場外與莫羅卡博士（左）及優素福・達杜（右）(*Jurgen Schadeberg / Associated Press*)。



◀在鎮壓共產主義法令之下，拘捕成爲自由鬥士生命中的一部份（*Bailey's*）。

▶與派崔克・莫洛亞及羅伯特・里沙在川斯瓦的最高法院接到緩刑九個月的判決（*Jurgen Schadeberg*）。




Yusuf Dadoo, ex-president, SAIC.


Nelson Mandela, ex-president, Tvl. ANC.


James Phillips, ex-chairman, Tvl. CPAC.


Duma Nokwe, secretary, ANC Y.L.


Walter Sisulu, ex-secretary, ANC.


Albert Luthuli, president, ANC.


Yusuf Cachalia, secretary, SAIC.


John B. Marks, ex-president, Tvl. ANC.


Stephen Sello, ex-Tvl. acting secretary.


David Bopape, ex-secretary, Tvl. ANC.


Moses Kotane, ex-leader, ANC.


Dr. Z. Njongwe, ex-chairman, ANC.


Cassim Amra, ex-leader, Indian C.


Dr. Diliza Mji, ex-secretary, ANC.

The Effects of New Laws: 2

BANNED MEN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nearly all the non-White leaders in South Africa have been restricted in their movements and activities. Most of them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resign their positions in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r the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Many of them have been forbidden to attend any gatherings, or to enter certain magisterial districts in the Union.

Albert Luthuli, for instance, president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is forbidden to move away from his own district at Groutville, Natal. He cannot visit the shops in Durban, thirty miles away, or attend the cathedral there.

Most of the bans are in force for two years, after which time they may be renewed: some have already been renewed.

The bans take effect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of 1950. This allows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to prohibit from gatherings or organisations anyone suspected of furthering the aims of Communism. 'Communism' is defined under the act as aiming to bring about soci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country.

Many of those convicted or 'named'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are not 'Communists' 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 but 'Statutory Communists' who come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act.


Dr. Silas M. Molema, ex-treasurer, ANC.


Maulvi Cachalia, ex-secretary, Tvl. I.C.


J. Mavuso, ex-Transvaal ANC leader.


Nana Sitha, ex-president, Transvaal I.C.


Dan Tlhoome, ex-leader, ANC.


Flag Boshielo, ex-leader, Transvaal ANC.


N. Thandray, ex-Tvl. secretary, I.C.


Hosia Seperepere, ex-leader, ANC.


Frank Marquard, ex-president, Cape F.W.U.


Joseph Matthews, ex-president, ANC Y.L.


Robert Matji, ex-secretary, Cape ANC.


MacDon. Maseko, ex-leader, ANC.


Ismail Bhoola, ex-sec., Tvl. Indian YC.


Harrison Motlana, ex-secretary, Tvl. Y.L.

▶莫羅卡博士將非洲民族議會主席移交給盧圖利酋長（左）（*G.R.Naidoo / Bailey's*）。



▼在昆斯敦四十一屆非洲民族議會的年會上盧圖利酋長向與會者高舉象徵〝非洲〞的手勢（*Bob Gosani / Bailey's*）。



◀一九五五年與青年領袖彼得・恩賽特(*Peter Magubane*)。

▼在〝團體地區法〞下索非亞鎮的市中心被宣佈爲是一個髒點，規定於一九五五年開始遷往梅多蘭(*Jurgen Schalde berg*)。

▶從西區反遷移運動失敗的教訓中，我體認到被壓迫者對鬥爭的本質的定義，除了採取武裝抵抗之外別無選擇（*Jurgen Schade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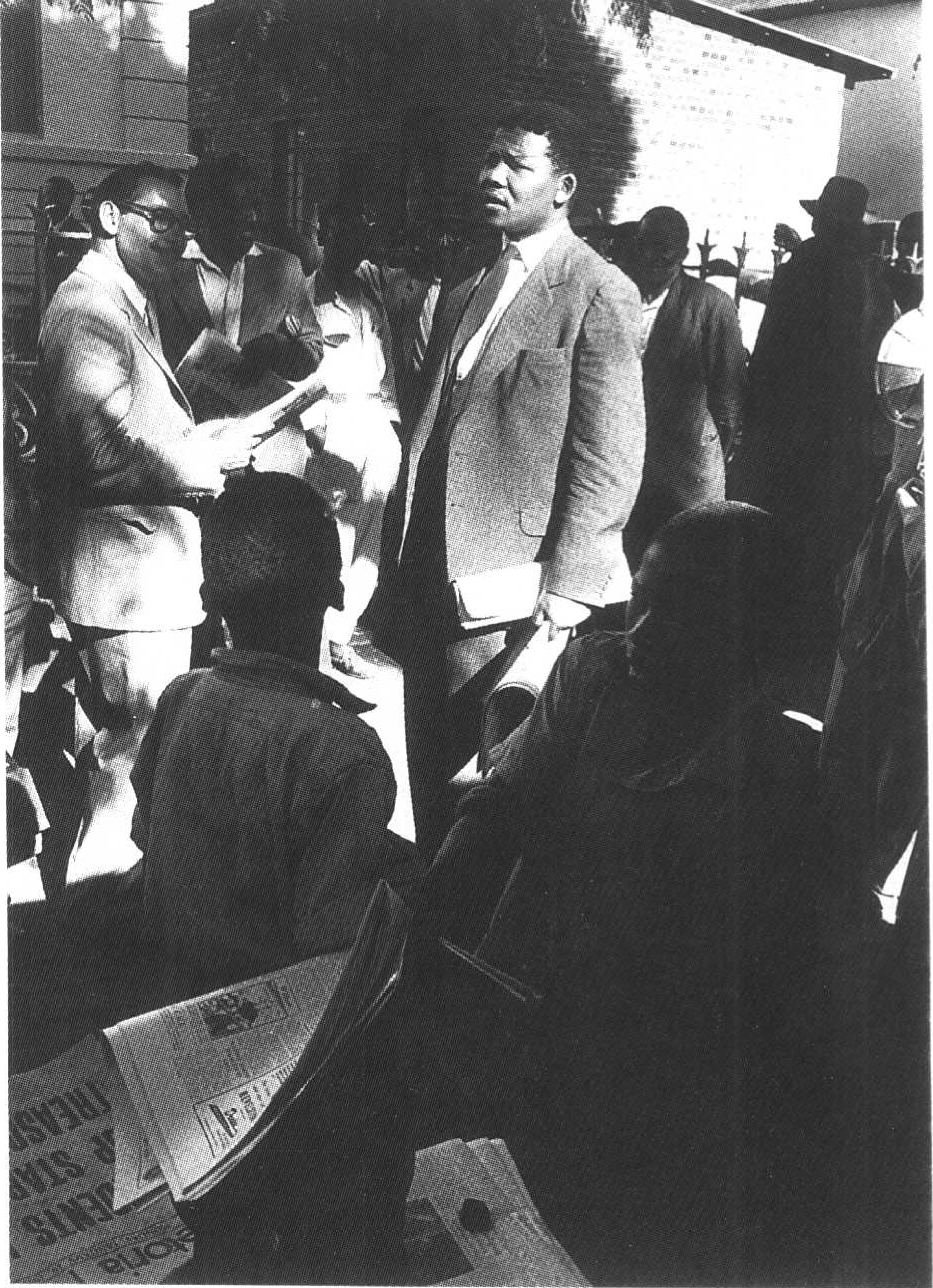


▼婦女們遊行至普利托利亞聯合大廈抗議婦女通行證的法令，我向他們講演（*Peter Magubane / Associated Press*）。



◀處於一九五六年的緊張時期（*Ian Berry / Magnum*）。

▼一九五六年叛國案審判期間，被告們每天奔波於約翰尼斯堡到普利托利亞之間（*Peter Magubane*）。



▶我們被禁止參與任何政治性集合，但大審判把我們領袖們集合在一起，下午休息時間我們聚在一起像在召開全國執行委員會（*Ian Berry / Magnum*）。

▼一九五八年我們的支持者在普利托利亞的法庭外場以歌唱加入支持行列（*Peter Magubane*）。



▲在奧蘭多傑瑞・莫洛伊的體育場與莫洛伊練拳（*Bob Gosani / Baile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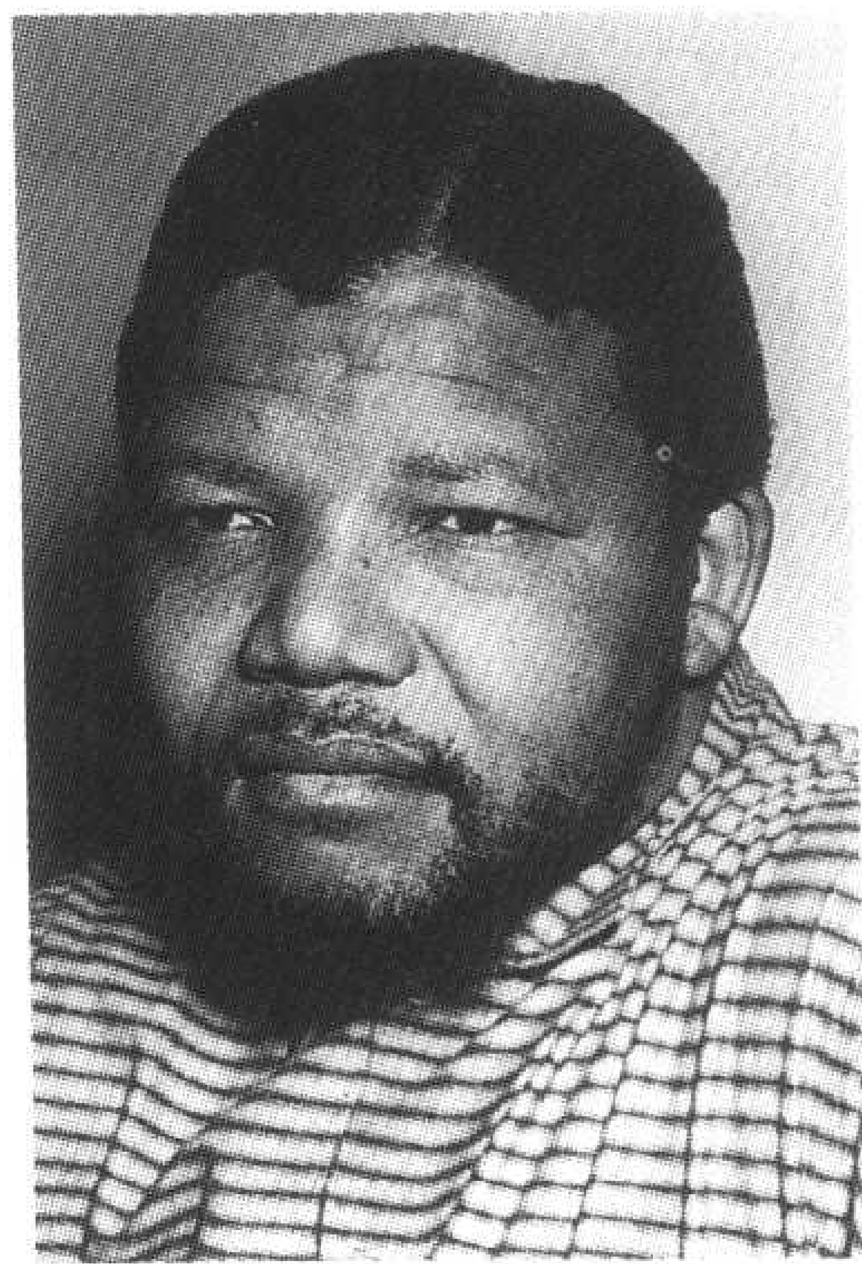
▶法庭外與魯斯・福斯特女士交談（*Peter Magubane*）。





◀與摩西・科坦尼在法庭外迎接勝利的時刻。我們剛得悉控訴被撤回。但勝利的時刻太短暫。三個月後，在一九五九年我們二十九個被告又再度被起訴（*Jurgen Schadebe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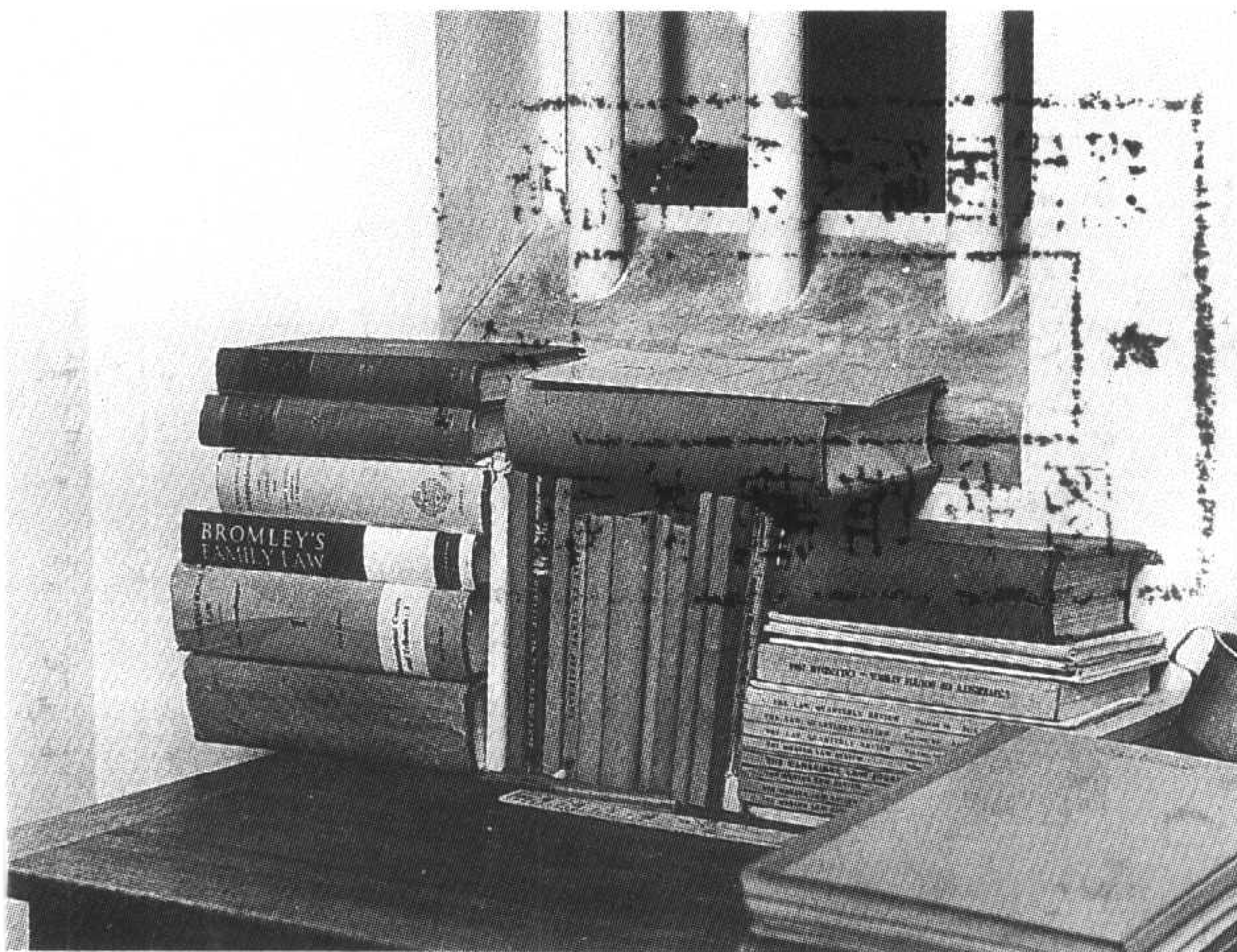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從國外回來藏匿期間所攝（*Eli Weinberg / Camera Press Ltd*）。

◀在第二次被起訴之後，我轉入地下工作，成爲當時有名的〝神出鬼沒的黑人英雄〞。（攝影者佚名）

▼一九六二年非洲民族議會被禁止之後，奧立佛・坦博和羅伯特・理沙（右）在達累斯薩拉姆機場（*Associated Press*）。



▶被送到羅本島之前，在普利托利亞的監獄內作縫補衣服的勞役（*Archive Photos*）。



◀在羅本島期間，我的小牢房的藏書（*Archive Photos*）。

獻辭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六位孩子：馬迪巴（Madiba）、馬克茲韋（Makaziwe，我的長女，現已故）、馬克加索（Makgatho）、馬克茲韋（Makaziwe）、澤娜妮（Zenani）和津齊（Zindzi），我永遠珍視他們的支持和愛；獻給我的二十一位孫子和孫女以及三位曾孫子和曾孫女，他們給我帶來了無窮的歡樂；獻給我所有的同志、朋友及我爲之服務的南非人民，他們的勇氣、決心和對祖國的愛永遠是我前進的源泉。

鳴謝

從開筆至殺青，其間斷斷續續，本書的寫作，歷時久矣！一九七四年，我囚居羅本島期間，開始秘密執筆。老友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艾哈邁德·卡特拉達（Ahmed Kathrada）不辭辛勞，同我一起開啓陳年的記憶，沒有他們不倦的努力，手稿的完成就會成爲一個疑問。我本人保存的手稿副本後來不幸被獄吏發現並沒收，但幸運的是，得助於難友麥克·馬哈拉傑（Mac Maharaj）和伊蘇·基巴（Isu Chiba）精湛的書法，我的原稿不僅得以保留，而且還平安地送出了監獄。一九九〇年我出獄後，又開始重新操筆，完成未竟的著作。

出獄後，我諸事繁忙，幾乎未得閑暇於筆墨之間。所幸我得到了衆多同事、朋友及有關專家的熱誠幫助，拙著才得以最後完成，在此，我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我深深地感謝理查德·斯滕格爾（Richard Stengel），他幫我編輯和修改本書的前半部，幫我寫作本書的後半部，本書的最後完成，凝結着他的心血。每每回憶起我們在川斯凱清晨的散步，在約翰尼斯堡貝殼山莊（Shell House）和我霍頓（Houghton）家中的傾心長談，我的心中

就充滿了溫馨的暖意。瑪麗·普法夫（Mary Pfaff）是理查德的助手，我應該對她致以特別的謝意。我還得益於法蒂瑪·米爾（Fatima Meer）、彼得·馬格班尼（Peter Magubane）、納丁·格迪默（Nadine Gordimer）和艾澤克爾·姆法列列（Ezekiel Mphahlele）的建議和支持。

我還想特別感謝我的同志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他花費了長時間的辛勞，對本書進行修改，更增加本書的準確性。非洲民族議會的辦公人員不懼煩冗，耐心地潤飾本書的各節，特別是巴巴拉·馬什克拉（Barbara Masekela），她的協調工作極有成效。另外，伊克巴爾·米爾（Iqbal Meer）爲本書的銷售作出了努力。我要感謝本書的編輯、小布朗公司的威廉·菲利浦（Willian Phillips），自一九九〇年初始，他便開始指導本書的工作，直至書稿編輯成書。他得益於兩名精幹的助手喬丹·巴夫琳（Jardan Pavlin）和斯蒂夫·施耐德（Steve Schneider）的幫助。我還應感謝蓋爾·格哈特（Gail Gerhart）教授，她對手稿的事實性細節進行了審閱。

出版者的話

賴燦賢

我常言「政治用的是智慧，而非聰明」。在歷史的洪流中能扭轉乾坤、改變人類命運的關鍵人物，都具有超人的智慧。而耍弄聰明者，雖能鼓動一時之風潮，但終究會被時代潮流所淹沒。

曼德拉——南非共和國第一位經全民直接選舉的總統，也是全世界黑種人排名第一的人物，將其一生的經歷詳實的娓娓道來，有血、有淚。他爲反對南非執政當局的種族隔離政策，爭取非洲黑人及有色人種的平等、自由，不惜身陷囹圄達二十七年之久，拋妻別子，對人性的刻劃，皆有詳實的描述。「能生存，才能發展。」爲潮流所趨，曼德拉最後不僅爭取到自己的自由，還取得所有非洲同胞的自由。這種轉變所謂的變天，可謂當代政權和平轉移的最佳典範。

「變天」將成爲未來一年台灣政治環境中最重要的話題，變天可能嗎？變天可怕嗎？能不能變天？誰有能力變天？變天之後會變好還是會變壞呢？您想不關心都不成。

曼德拉先生被選爲「一九九四年頭號風雲人物，他可算是諾貝爾級的變天冠軍。將純白人政權轉變爲黑人政權，應該說是多種族政權。這一成功案例的效應在同一年發生在中華民國

的首都台北市。綠色旗號的民進黨菁英陳水扁當選所謂「四百年來第一戰」的台北市市長，從藍色旗號李登輝的國民黨手中取走台北市政的主導權，要帶給台北市民希望、快樂。這兩起由白轉黑、由藍轉綠的變天事件皆發生在一九九四年。而所謂有閏八月的一九九五年是否會再帶給國民黨可怕的災難——今年年底立法委員選舉中失掉半數的席位，而引發日本在野諸黨一夕之間聯合執政的效應出現在中華民國政壇，這是朝野人士在今年最關注的首要課題。台灣變天與否，取決於民心向背。有人說變天也沒有什麼不好，那您認爲呢？

在一次很巧合的機緣中，取得「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全球中文版的版權。將近一年的時間，從等待手稿到安排北京的朋友們翻譯，最後再由我多次審稿補譯，總算可以差強人意的付梓上市。我很幸運能成爲全球第一位看完整本書的中國人，迄今已看過五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體認，新的啓發，感應良多。忍不住要告訴所有喜歡看書及熱愛人類歷史發展、關心台灣人的命運、關懷中國的前途、置身在民主洪流中的所有中國同胞，不管您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或者是社會賢達，甚或是海峽對岸的共產黨，都應該不計一切代價看完這本自傳，去瞭解一位偉人的命運、一個種族的命運、一個多種族國家的命運。

一個要迎向廿一世紀所謂「中國人的世紀」的多種族國家，所需要的即是智慧與包容。當今的中國領導階層誰能具有這種特質？爲了中國的和平統一，誰將是第一位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吾等且拭目以待。

曼德拉自傳——序文

同是天涯自由戰士

施明德

漫長的監獄歲月並沒有摧毀我們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囚禁的刑罰只有使我們更加堅強。在走出監獄之後，我們心中也都沒有仇恨。對被逮捕的政治犯，很多人只看到刑求，但是比起長期監禁的日子，刑求只是很短的時間，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刑期，刑求反而像流星，一閃即逝。二十多年單調沒有變化，也沒有希望的日子，肉體上的鞭韃，生理的痛苦，都比不上心靈上長期的壓迫和摧殘。單調的囚禁再加上絕望的折磨，那種痛苦，眞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曼德拉和我就是這樣地走了過來。

一九六四年四十六歲的曼德拉因爲對抗種族隔離政策，被南非的少數白人政權移送到一個專門囚禁重刑犯和政治犯的火燒島——羅本島，開始了二十七年囚禁的日子。同一年我才二十三歲，被控參與「台灣獨立聯盟」，判決無期徒刑，遞奪公權終身，被送到台東深山內的「泰源監獄」，開始了我兩次合計二十五年又五個月的黑牢苦難，長達四年又兩個月的絕食和灌食記錄。南非的羅本島和台灣的火燒島都是惡名昭彰囚禁犯人的不毛之地。我曾經在

一九九四年的八月間藉南非之旅中，特地搭船到羅本島上參觀囚禁曼德拉的囚房。從羅本島上可以清楚的看到美麗的繁華的開普敦市區，但是一年到頭風浪極大，從來沒有人能游水脱逃成功，自由幾乎是一蹴可及，這種特種的誘惑，對於獄中心靈的折磨更是難以形容。

一九六四年曼德拉冒著死刑的威脅，在法庭裡堅定地宣示他永不放棄追求黑人自由、推翻種族隔離制度的決心，結果被判處無期徒刑。一九八〇年我第二度因爲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和獨立，在「美麗島大審中」同樣地也面對死刑的威脅，我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我追求台灣獨立，解決「黨禁、報禁、戒嚴和萬年國會」的理念，結果我又被判處另一個無期徒刑，移送火燒島囚禁。這樣的政治經歷，讓我們在生命中體驗了許多的地方。但是在我們漫長的黑牢日子，不合理的統治制度，不但沒有擊垮我們追求自由的信心，而且不斷被正義和公義所解體。

在這本曼德拉的自傳中，曼德拉將其一生至今的人生過程娓娓道來，從孩提時代的部落生活和種種黑白文化交流的衝擊，到中、青年代個人政治抗爭的過程，以及羅本島上的種種事物、人際關係、和囚犯生活的細節無不詳實如在眼前。人與人之間的情義、高貴的理想、和人性的黑暗層面，同時交錯在這本自傳的文字之中。這些記載的內容也是我過去所熟習的經歷。這些善惡深植在我們的心中，不分國界和膚色。日夜和我們交戰其實不是少數的統治者，而是我們自己內心信仰和欲念的交戰。

我們戰勝了自己心中的黑暗和怯弱，所以我們走出監獄之後不必用仇恨來報復過去種種的不義。曼德拉願意領導他的黑人同胞，寬恕幾百年來白人血腥統治的歷史，一起和過去的敵人攜手重建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民主政治，的確令人感佩。但也不令我感到意外，因爲他在獄中長期的磨練，使他克服了仇恨，只有懦弱的人才會用屠殺和暴力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我們都走過一大段辛酸的血腥恐怖時期，曼德拉的自傳持平的記錄下一個種族隔離的時代，一個不凡的生平和一長段爲自由而奮鬥的歷史。

（本文作者／民主進步黨主席、立法委員）

曼德拉自傳——序文

非洲人的良知

楊西崑

數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與非洲諸國打交道，從派遣農耕隊到最後駐節南非共和國，對於非洲民情風俗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於非洲人邁向文明自由的歷程也有相當的體認。

在我出使南非共和國期間，曼德拉先生仍囚禁在羅本島，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才被釋放。在此之前，中華民國政府對南非的外交重心是放在如何加強和鞏固與執政的國民黨的關係，較少著力在曼德拉所領導的非洲民族議會的連繫。這些連繫北京政權和台灣的民進黨似乎較爲熱絡。在當時囿於客觀環境，不方便與在野的組織多所接觸。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多年來重美輕非，外交人才的培養與拔擢，也是以美、歐爲主，對非洲問題的研究專家更是少之又少，更遑論對非洲外交人才的重視，這是我們對非洲外交局勢的隱憂。即使有勞我們的總統先生領軍參與曼德拉總統的就職大典，行程的安排未達預期效果，即是明證。

南非黑人爲破除白種人當權者的種族隔離制度，多年來所做的努力，在曼德拉的自傳中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曼德拉爲堅持爭取自由的理念，不惜以身陷囹圄爲抗爭，不與當政者妥協，即使如此，也不鼓吹革命暴力去推翻當權者，而是讓時代的潮流去沖垮白種人的種族歧視藩籬。這種睿智，不是一般長期政治犯所能做到的。

曼德拉代表了非洲人的良知。漫漫自由路描述了一個非洲人成長的歷史，詳實又生動，可作爲研究非洲的歷史小說來看。曼德拉所領導的非洲民族議會，長期的與執政黨鬥爭，最終能以和平民主的方式主政南非，可作爲喜好並關心民主政治和政治改革者必讀的教材。曼德拉先生又是當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領袖，名人自傳更是彌足珍貴，身爲現代人不能成爲這本書的缺席讀者。研究法政的學子、專家們更應該先睹爲快。

曼德拉主政以來，南非政局一直在穩定中求進步，各政黨間能公平競爭，首先得歸功於曼德拉卓越的領袖氣質，當然與曼德拉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總統戴克拉克先生的寬容大度，亦功不可沒。南非政權能從白種人和平移轉到黑種人，不止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這能與不能的問題，更需要領袖人物的寬闊的胸襟與高瞻遠矚的眼光。

曼德拉說：「我並不是生來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時是自由的……。」希望國人能從曼德拉自傳中，對人性、人權、自由、民主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本文作者／中華民國前駐南非共和國大使）

曼德拉自傳——序文

變天有理

張俊宏

有人要變天，有人看天變。「變天論」將成爲在明年底立法委員改選前最重要的一個話題。現今執政的國民黨如果屆時不能贏得過半數的席次，日本在野諸政黨聯合執政的效應將會在台灣出現。對推動民主改革運動的人士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一年。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一直是處於一個非常不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發展，備極艱辛。電子媒體長期被執政的國民黨所掌控操縱，在野政黨幾乎無法分享到這種資源，因此亦滯礙了政治改革的進程，長遠來看，並非台灣人民之福。

南非總統曼德拉可以算是當今政治改革運動最成功的頂尖人物。他贏得的不僅是諾貝爾和平獎、南非共和國首位全民選舉總統，而是其畢生爲突破種族隔離制度、追求人權所獲得的成果。他以包容的胸懷，希望生活在南非土地上的各色人種，皆能享有完全一樣的人權。這對一位歷經長達二十七年又四個月監禁生涯的自由鬥士來說，沒有怨恨、報復，是極其不容易的一件事。

「漫漫自由路」橫跨歷史七十多年，是二十世紀南非近代史活生生的歷史見證。曼德拉不僅詳實記載了其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其心路歷程更是從事政治改革運動的「自由鬥士」們所必須心領體會的。從事政治改革運動只有群體，沒有私我。在他長期監禁期間，他的妻子兒女們必須要忍受承擔疏離等種種迫害，不禁令人懷疑包括他自己爲什麼還要從事抗爭運動。

他始終不承認爲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所作的抗爭是犯罪。即使面對極可能判處死刑亦無所畏懼。在各種惡劣環境下，他始終堅持反對白種人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統治的信念。巧合的是他所反對的執政黨也是叫國民黨。

我引用文中曼德拉所講的一段話，作爲我讀後心情的寫照。「在我的生命中，我已投身於南非人民的鬥爭之中。我反抗白人統治，也反對黑人專治。我崇尚民主、自由社會的理想。在這一社會中，人人和睦相處，個個機會平等。我希望能生活在這一理想社會中。新希望能實現這一理想。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將爲此而獻身。」

創造歷史就必須詳讀歷史。「曼德拉自傳」是所有具有政治改革理念的人必讀的一本好書。他是名人傳記，他是歷史見證，他是政治改革成功典範，您都不能錯過。

（本文作者／立法委員、民主進步黨前秘書長）

曼德拉自傳——序文

大家都來學法律

國父曾說，「年輕人應該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這句話在今天看來是有問題的。因爲年輕人不但要立志做大事，還要立志做大官；因爲只有做大官，才能做成眞正的大事。怎麼樣才能做大官呢？翻翻各國總統的簡歷，還有這本南非最偉大的人物——曼德拉的自傳，大概可以猜到，應該去學法律。

今天台灣正面臨社會、政治及法治的鉅變，把報紙一打開，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法條正接受民主的洗禮，沒有一點法律常識的人，可能連報紙都看不懂。曼德拉當初如果不學法律，他可能無法全力參與「自由憲章」的起草，或看穿白人統治者所玩的把戲，以及找到對抗暴政最有力的方式。

他說：「我認爲，在這個國家裡，所有有理智的非洲人，在其一生中都不斷地在良知與法律之間，有著矛盾的思想，……出身貴族的勃特蘭．羅素——也許是當今西方世界最傑出的哲學家被判刑入獄了。其「罪狀」正是由於從事了我今天所從事的——聽從於自己的理智

而蔑視了當地的法律。……我也一樣別無選擇，我們國家裡的衆多非洲人也別無選擇。現今沿襲下來的一些框框，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制訂和頒佈的法律，在我們看來，都是不公正、不道德、不能容忍的。我們的良知要求我們起來反抗。這些法律，並努力改變它們。」曼德拉有效的抗爭，使得今天的南非換上了文明的面貌。

曼德拉的一生就是個大審判，他個人追尋自由的心路歷程是漫長的，而且只是個開始。他說：「事實是我們還不自由，我們只是得到了自由自在的自由、不受壓迫的權力。我們還沒有完成旅途的最後一步，只是在一條更長更難走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因爲自由不僅僅是去掉身上的鎖鏈，而是生活在尊重和提高別人自由的社會裡……我回頭看一下走過的距離，但只能休息一會兒，因爲與自由俱來的是責任，我不敢逗留，漫長的旅途尚未結束。」

曼德拉給我們最重要的啓示是——只有自由人才能談判，囚徒談何簽約。做爲一個與曼德拉同行的律師，我眞是與有榮焉！

寄語所有對未來的選擇遲疑不決的年輕學子們，想積極參與台灣未來的改造嗎？何妨大家來學法律！

（本文作者／法學博士、天地通諮詢公司負責人）

曼德拉自傳——序文

民主巨人

柏楊

狄更斯在他的雙城記一開始就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才智的時代，這是愚昧的時代，這是可信任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充滿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

狄更斯所指的是十八世紀大革命的法國，而今，我們發現二十世紀的世界，更適合這項描繪。如果拿來對比，二十世紀的動盪，更驚心動魄，使很多人哀傷：不幸生在這個時代！也使很多人鼓舞：有幸生在這個時代。

二十世紀創造出來的奇蹟，達到人類進化史的高峰，而且是全方位的，不僅限於政治。但政治奇蹟的感受，卻是如此的普遍和直接，其威力無與倫比，不管高興和不高興，在二十世紀中，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專制獨裁政府，都被摧毀。問題在於，每一個專制獨裁政府，毫無例外的，在被摧毀之前，總有一陣垂死掙扎，所以，二十世紀的政治犯，數目百倍於往昔。然而，隨著人民的覺醒，和國際公理的伸張，二十世紀也是一個最多政治犯突破網

羅，登上國家領導人高位的時代。狄更斯所指的雙城領域，只有拿破崙一個人昇起，而他是一個軍官，與政治無關。二十世紀不然，迄目前爲止，就有波蘭總統華勒沙、捷克總統哈維爾、南非總統曼德拉，他們都是舊政府欲殺之而後快的叛徒。而曼德拉尤其傳奇，他在監獄中被囚禁的時間，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卻幾乎一出牢門，就直接走上總統寶座。

各國政府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往往選擇一個島嶼，國人對台東外海的火燒島的印象，一向深刻，而南非則有羅本島，爲的是容易防範獄內囚犯逃出，和獄外人士救援。但執政者對付政治犯的方法，則各有千秋，南非是英國系統的殖民地，政府對人民的迫害，都透過法治程序，他們用法律禁止黑人跟白人混合、用法律禁止黑人離開他的居所或村落，法律純粹成爲壓迫的工具，而不是伸張正義的工具。可是也因之養成朝野官民一種對法律的敬畏情操，當羅本島監獄一位軍官揮拳向曼德拉撲上來，曼德拉冷靜的警告他說：「如果你手指敢動我一下，我將把你帶到最高法庭，而當我與你在法庭上一決高低之日，你將會一貧如洗。」那軍官驚異的呆在那裡，這使我回憶火燒島上一位香港商人，他向調查局調查員要求律師在旁時，特務們對他竟懂得法律，大怒若狂，立刻施以暴打。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南非國家機構之能像過去一樣，正常運轉，正是法治已深入人們骨髓。

然而，政治冤獄之荒謬性和無恥程度，各國皆然。曼德拉敘述政府的主要證人——開普敦大學政治系主任安德魯·默里，指控「非洲民族議會」所有文章，包括著名的「自由憲

章」的在內，都是共產主義性質的。曼德拉對此有精彩的敘述：

「柏蘭格（曼德拉的辯護律師）說，他要給默里讀幾段來自不同地方的談話，請默里鑒別一下這些話是不是含有共產主義思想。那一段話大意是普通工人需要聯合起來，不要互相利用。默里說是共產主義式的，伯蘭格隨即指出上述講話是南非前總理馬蘭博士說的。接下來伯蘭格又續讀了兩段話，默里都斷言是共產主義式的語言。事實上這兩段話，分別出自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羅·威爾遜口中。下面出現了高潮，伯蘭格讀了一段話，默里毫不猶豫地把它歸爲『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伯蘭格又宣佈，這段話是默里教授本人在三十年代的傑作。」

台灣政治犯朋友和廣大的家屬群，對這種荒謬證詞和無恥判決，一定不會陌生。曾有人被控「爲匪宣傳」，在談話中談到中共興建了長江大橋，消息來自國民黨中央日報，軍法官判決說：「報紙是讓你看的，不是讓你說的。」又有人被控於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時，高唱國民黨政府頒佈的正式軍歌「義勇軍進行曲」，軍法官判決說：「經過調查，義勇軍進行曲是共匪國歌。」而義勇軍進行曲之成爲中共國歌，乃一九四九年，被告唱歌十二年之後的事。

反抗運動經常和共產黨結合，或被共產黨吸收，因爲共產黨是一個壓制性機器，最適合野心家的口味，曼德拉一直拒絕和共產黨合作，使得南非爭取自由運動，沒有變質，不至滑

到狄托之類之手。曼德拉對任何一種決定，即令在獄中，也堅持和高層幹部討論，如果有異議，他就說服，不能說服，他就放棄。台灣或大陸，我常聽到一些政治犯發飆時說的一句話：「我在牢房裡時，你在哪裡？」這是中國特有的「婆媳文化」產物，一定發展成一種新的暴君。法治民主不是一種形式、不是一種裝飾、不是一種展示，而是一種心靈狀態和生活方式。曼德拉偉大的地方，不在於他反抗成功，在於他始終掌穩了舵，和反抗過程中恪遵民主規則，這才是成功以後不致自我膨脹的原因。

在曼德拉這個巨人面前，我這個政治犯微不足道，他坐了二十七年四個月的牢，我只不過坐了九年二十六天，他只是沒有受到酷刑，我則右膝殘傷。雖然他當了總統，我依然如故，繼續當一個作家，但他追求的黑白平等，和我追求的創作自由，都獲得實現，我們同樣的充滿喜悅，對上蒼的賜福和全民的努力，心懷感激。環顧四週，有許多政治犯血染法場，壯志未遂，有許多政治犯被嚇破了膽，正在崩潰邊緣，有許多政治犯仍陷於原來的恐怖之中，朝不保夕，使我們更覺得自己的好運，目睹改革的實現。

締造民主，比締造專制獨裁更困難。希望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沒有政治犯的世紀，無論在中國或外國，政治犯永不再現。

一九九四・十二・十九

（本文作者／名作家）

曼德拉自傳——序文

台灣主人的尊嚴與權利

看完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親切中充滿辛酸與安慰。親切的原因是，南非走過的歷程台灣也幾乎一一走過；辛酸又安慰的是，被嚴重激化的族群對立，使得南非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暴力相向的事件，而台灣的民主運動卻能夠在和平中爭取到愈來愈傲人的成績。

相似於台灣以前一樣，南非人應沒有完整的權利來決定自己的未來，而南非特殊的歷史經歷是，南非的政治事務很長一段時間不是所有南非人都能參與的——只有佔總人口極少數的白人實際掌握了政權，而屬於人口比例上多數的黑人甚至連基本的投票權都沒有。

可是南非的黑人並沒有沈默地接受這種不平的待遇。多年來，許許多多的民主鬥士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從各種不同的管道，積極地替南非黑人同胞爭回他們的基本權利。面對這樣不公不義的環境，曼德拉的思考是，要以一個律師的身份，經由法律的途徑來改變現實世界。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年輕法律人都有過的熱情與理想。但曼德拉在替許多黑人同胞擔任辯護律師，以及自己被控「叛國罪」成爲被告之後，他深切的感受到法庭結構與審判程序對黑

人的不公。至此，曼德拉已能肯定，在南非，「種族歧視」的問題已不只是意識型態的層次，更是滲透到生活中的每個層面，他的黑人同胞是隨時隨地都受到非人性的待遇！

追求民主自由不打折扣的曼德拉，雖然導致他的一再被捕入獄，然而充滿理想的曼德拉，把握每次在法庭上答辯的機會，條理清晰地，向審視他或瞻仰敬畏他的人群，傳達他一貫堅持的人權理念。而習慣以「警察國家」的方式管理人民的政府當局，終於無法忍受，判了他終生監禁。雖然不能再對廣大群衆宣揚理念，然而曼德拉的影響卻能在人群中擴散出去，更進而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南非人權問題的關心。

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南非的黑人終於有權利走向投票站選出制憲會議的代表，南非人民終於可以制定一份屬於自己的憲法。這位人權鬥士，在歷經長達八十年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戰鬥之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次台北市長選舉過程中，多少也發生了族群或省籍對立的情形，我很想以曼德拉在南非所奮鬥的成果，以及南非全民在此過程中所學到的反省與寬容，與台灣各個族群的朋友們一起來思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要如何來瞭解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價值觀。能不能讓每位台灣的主人都享有充分的尊嚴與權利，能不能在生活中體現公平與正義，這不是台北市長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任務，需要的是全民的共識與切身實踐。這個課題，正在歷史的前方等待著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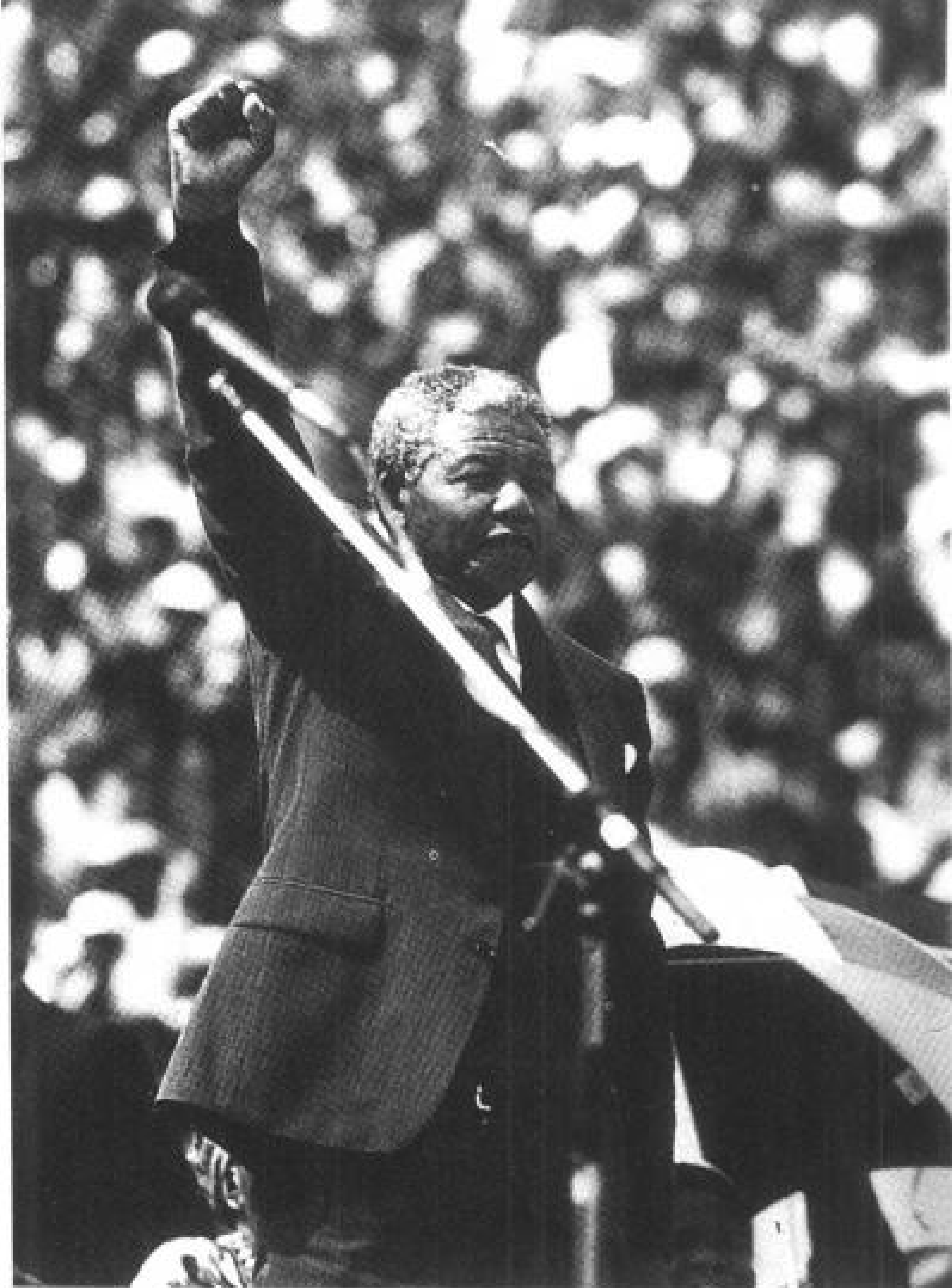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台北市首任民選市長）


Walvis Bay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Rivonia
Alexandra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The Fort
Sophiatown
Newclare
Boksburg
Soweto
Kliptown
Miles
0
5
0
5
Kilometers
BOTSWANA
(BECHUANALAND)
(SOUTHERN RHODESIA)
ZIMBABWE
Messina
MOZAMBIQUE
Limpopo River
Pietersburg
Nylstroom
TRANSVAAL
Lobatse
Zeerust
Sekhukhuneland
Rustenburg
Pretoria
Nelspruit
White River
Mmabatho
Johannesburg
Rivonia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Witwatersrand
Witbank
Bethal
Soweto
Evaton
Sharpeville
Mbabane
SWAZILAND
BOPHUTATSWANA
Vryburg
Klerksdorp
Villiers
Standerto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Kroonstad
Kuruman
ORANGE FREE STATE
Bethlehem
Vryheid
Upington
Kimberley
Brandfort
Dannhauser
Ladysmith
NATAL
Orange River
Bloemfontein
Excelsior
Maseru
SOUTH AFRICA
LESOTHO
(BASUTOLAND)
Drakensberg Mountains
ZULULAND
Howick
Pietermaritzburg
Durban
De Aar
CAPE PROVINCE
Port Shepstone
Victoria West
Middleburg
THEMBULAND
Umtata
TRANSKEI
Qunu
Vanrhynsdorp
Calvinia
Queenstown
Bashee River
Clarkebury
ATLANTIC OCEAN
Qamata
Kei River
Beaufort West
Fort Hare University College
Saldanha
Healdtown
Alice
Fort Beaufort
CISKEI
Martindale
East London
Gamtoos River
Robben I.
Table Bay
Matroosfontein
Paarl
Table Mt.
Cape Town
Simonstown
Oudtshoorn
Swellendam
Alexandria
Port Elizabeth
Humansdorp
Clarkson
INDIAN OCEAN
N
Miles
0
100
200
0
100
200
Kilometers
G. W. Ward

▲一九六六年與沃爾特在監獄的廣場上(*Archive Phot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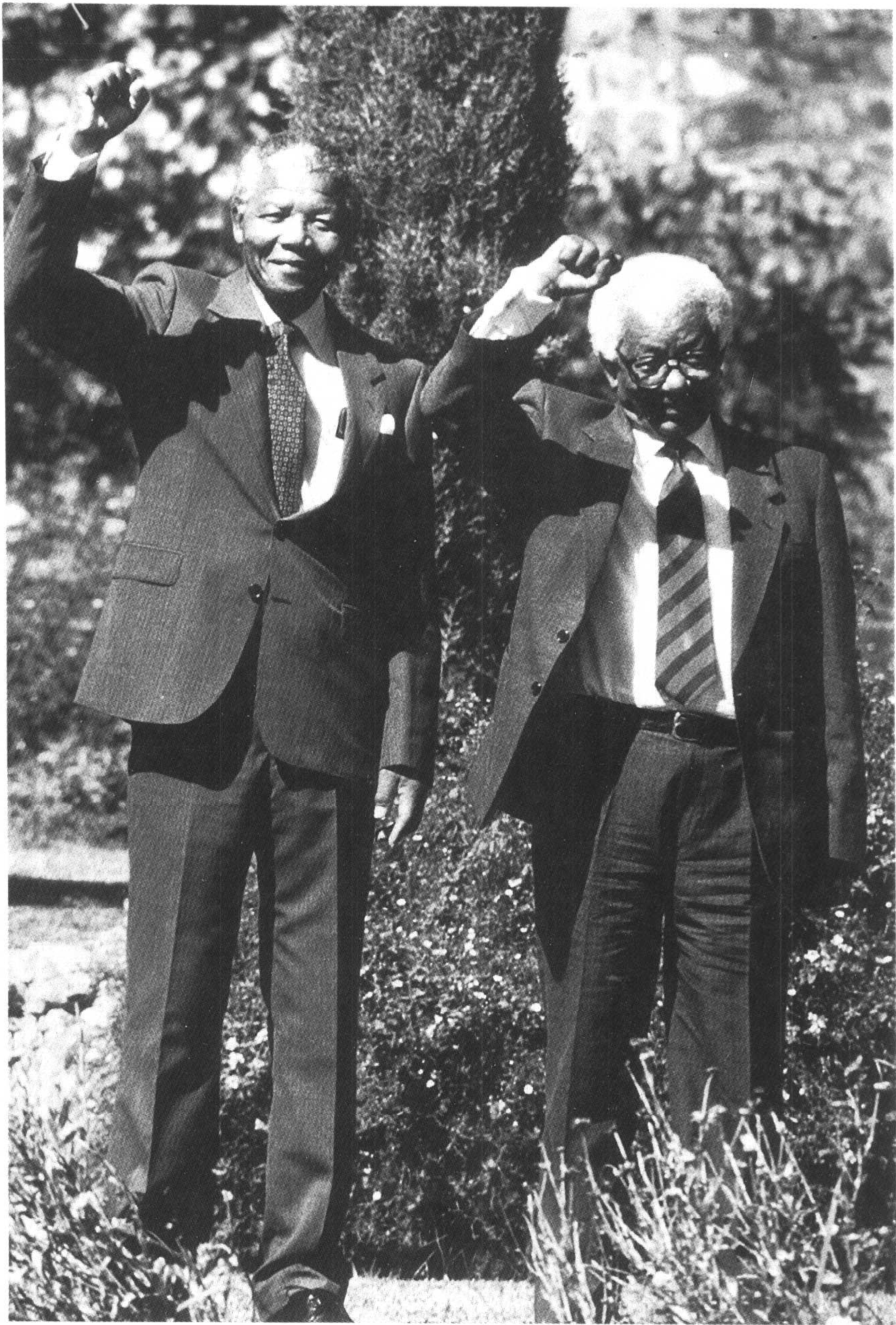
▼羅本島的監獄廣場(*Archive Photos*)。

◀沃爾特和我在羅本島的監獄中共渡過近二十年。在圖圖紅衣大主教寓所的花園我們舉手向〝非洲〞致敬，並準備再一次爲自由而戰。(*Gideon Mendel / Magnum*)。



▶一九九〇年二月高喊自由(*Gideon Mendel, Magnum*)。

▼在奧蘭多的家門口(*Peter Magubane*)。







▲▶與老戰友私下交換意見（*Peter Magubane*）。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奧利佛・坦博在被放逐國外三十多年之後重返南非（*Associate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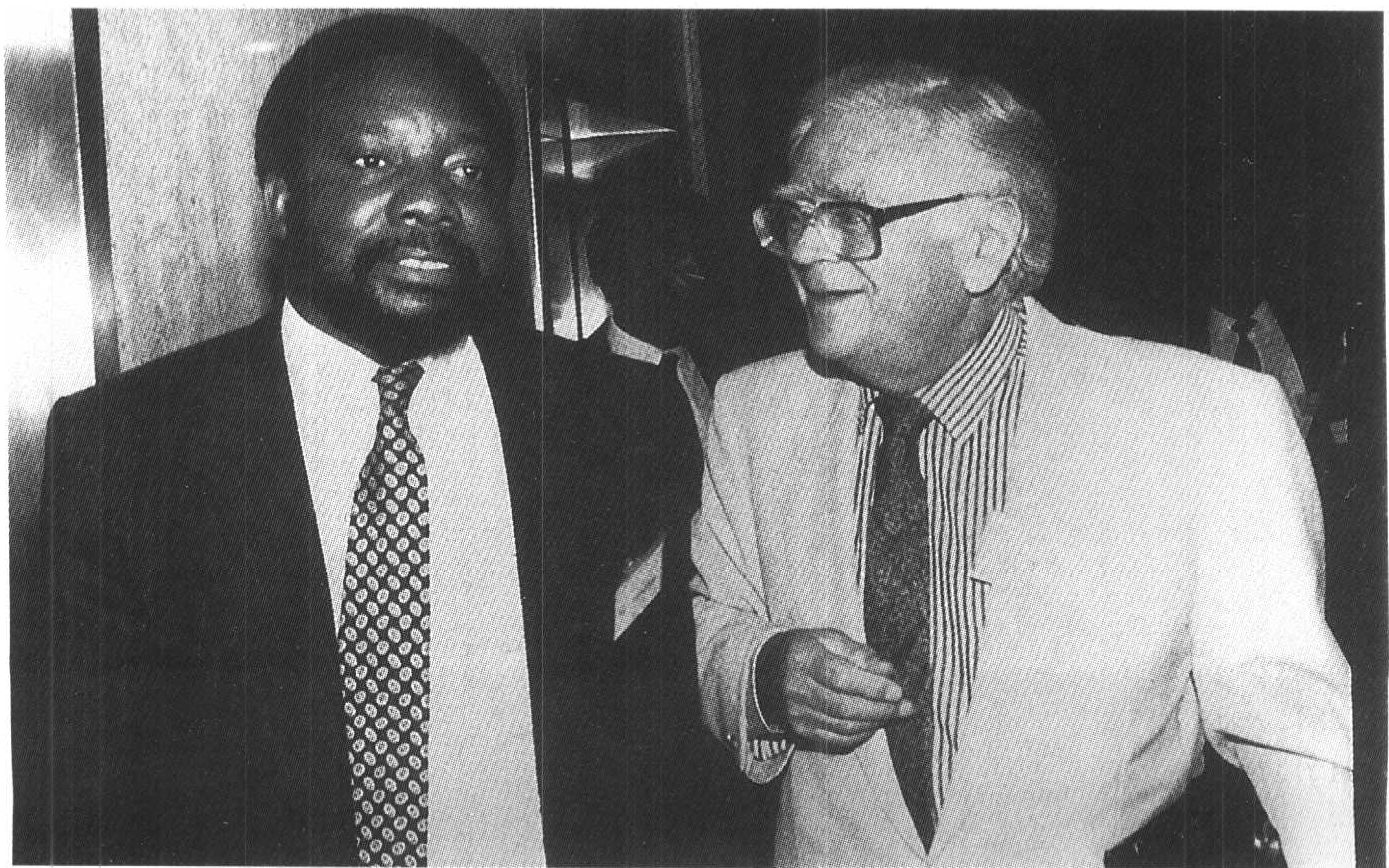


▶在約翰尼斯堡歡迎奧利佛返鄉的遊行場面（*Associated Press*）。



◀一九九〇年與沃爾特和溫妮(*Gideon Mendel / Magnum*)。

▼在約翰尼斯堡，西里爾、拉馬福薩(左)和喬・斯羅夫參加新憲法的預備會議（*Associated Press*)。



▶托克約・塞克斯威爾（右）和查爾斯・恩傑庫利在索威托奧蘭多體育場參加克里斯・哈尼的追悼會上（*Magnum*）。



▼一九九三年我重訪羅本島（*Copyright Island Pictures*）。

▲這間牢房在我二十七年的坐牢生涯中渡過了十八年(*Copyright Island Pi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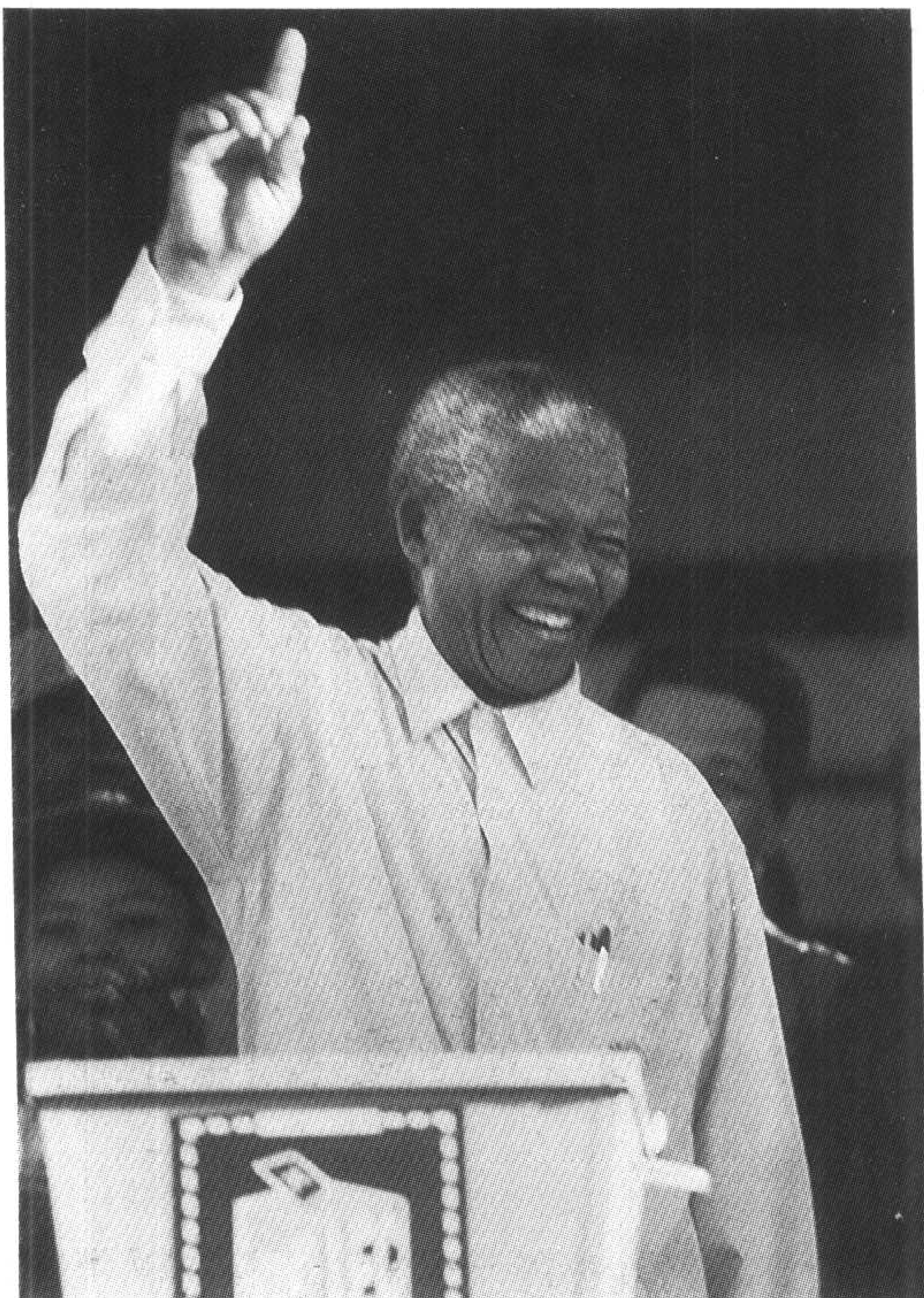
▼桌灣分隔了羅本島和開普敦，遠方是桌山(*Copyright Island Pictures*)。



▲與圖圖紅衣大主教
(*Peter Magubane*)。



▶與前總統戴克拉克
(*Peter Magubane*)。



◀在南非第一次全國大選中投下我的神聖一票(*Peter Magubane*)。

▼在我的總統就職大典唱國歌，左為薩博・姆貝基，右為我女兒澤娜妮(*Ian Berry / Magnum*)。

▶典禮結束後和紅衣大主教圖圖熱情地擁抱（*Ian Berry / Magnum*）。



▼我的兒女們左起：津齊、澤娜妮、馬克茲韋和馬克加索（*Peter Magubane*）。



◀一九九四年九月逗曾孫女(*Peter Magubane*)。

▼全家福(*Peter Magubane*)。



▲與孫子巴姆巴塔(*Peter Magubane*)。

出版者的話

賴燦賢

我常言「政治用的是智慧，而非聰明」。在歷史的洪流中能扭轉乾坤、改變人類命運的關鍵人物，都具有超人的智慧。而耍弄聰明者，雖能鼓動一時之風潮，但終究會被時代潮流所淹沒。

曼德拉——南非共和國第一位經全民直接選舉的總統，也是全世界黑種人排名第一的人物，將其一生的經歷詳實的娓娓道來，有血、有淚。他爲反對南非執政當局的種族隔離政策，爭取非洲黑人及有色人種的平等、自由，不惜身陷囹圄達二十七年之久，拋妻別子，對人性的刻劃，皆有詳實的描述。「能生存，才能發展。」爲潮流所趨，曼德拉最後不僅爭取到自己的自由，還取得所有非洲同胞的自由。這種轉變所謂的變天，可謂當代政權和平轉移的最佳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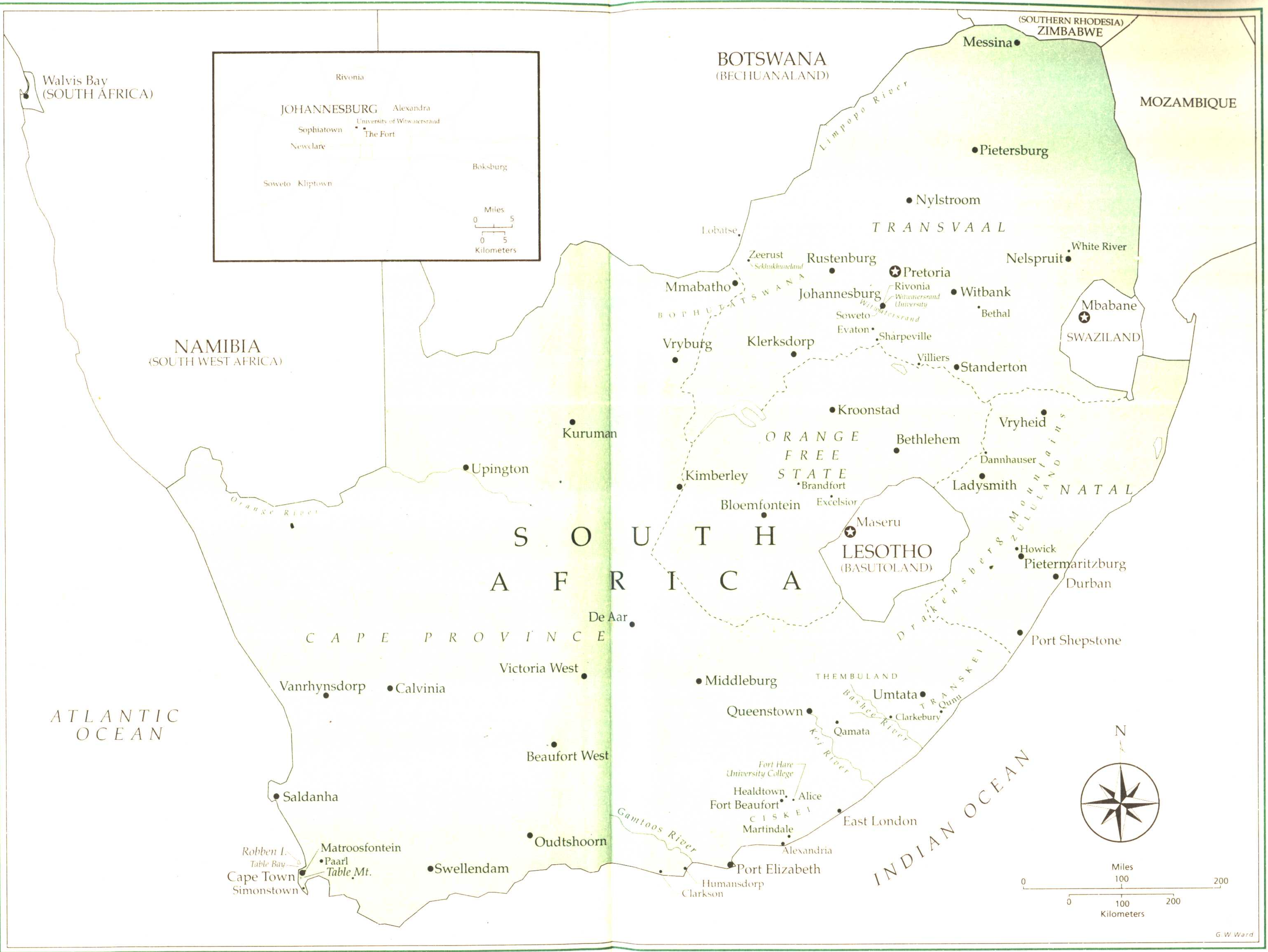
「變天」將成爲未來一年台灣政治環境中最重要的話題，變天可能嗎？變天可怕嗎？能不能變天？誰有能力變天？變天之後會變好還是會變壞呢？您想不關心都不成。

曼德拉先生被選爲一九九四年頭號風雲人物，他可算是諾貝爾級的變天冠軍。將純白人政權轉變爲黑人政權，應該説是多種族政權。這一成功案例的效應在同一年發生在中華民國

的首都台北市。綠色旗號的民進黨菁英陳水扁當選所謂「四百年來第一戰」的台北市市長，從藍色旗號李登輝的國民黨手中取走台北市政的主導權，要帶給台北市民希望、快樂。這兩起由白轉黑、由藍轉綠的變天事件皆發生在一九九四年。而所謂有閏八月的一九九五年是否會再帶給國民黨可怕的災難——今年年底立法委員選舉中失掉半數的席位，而引發日本在野諸黨一夕之間聯合執政的效應出現在中華民國政壇，這是朝野人士在今年最關注的首要課題。台灣變天與否，取決於民心向背。有人說變天也沒有什麼不好，那您認為呢？

在一次很巧合的機緣中，取得「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全球中文版的版權。將近一年的時間，從等待手稿到安排北京的朋友們翻譯，最後再由我多次審稿補譯，總算可以差強人意的付梓上市。我很幸運能成為全球第一位看完整本書的中國人，迄今已看過五遍。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體認，新的啓發，感應良多。忍不住要告訴所有喜歡看書及熱愛人類歷史發展、關心台灣人的命運、關懷中國的前途、置身在民主洪流中的所有中國同胞，不管您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或者是社會賢達，甚或是海峽對岸的共產黨，都應該不計一切代價看完這本自傳，去瞭解一位偉人的命運、一個種族的命運、一個多種族國家的命運。

一個要迎向廿一世紀所謂「中國人的世紀」的多種族國家，所需要的即是智慧與包容。當今的中國領導階層誰能具有這種特質？為了中國的和平統一，誰將是第一位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吾等且拭目以待。


Walvis Bay
(SOUTH AFRICA)
Rivonia
JOHANNESBURG
Alexandra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Sophiatown
The Fort
Newclare
Boksburg
Soweto
Kliptown
Miles
0
5
0
5
Kilometers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BOTSWANA
(BECHUANALAND)
(SOUTHERN RHODESIA)
ZIMBABWE
Messina
MOZAMBIQUE
Limpopo River
Pietersburg
Nylstroom
TRANSVAAL
Lobatse
Zeerust
Rustenburg
Pretoria
Nelspruit
White River
Mmabatho
Rivonia
Johannesburg
Witbank
Bethal
Mbabane
SWAZILAND
BOPHUTHATSWANA
Soweto
Evaton
Sharpeville
Vryburg
Klerksdorp
Villiers
Standerton
Kroonstad
Vryheid
ORANGE
FREE
STATE
Bethlehem
Kuruman
Upington
Kimberley
Brandfort
Dannhauser
Ladysmith
NATAL
Orange River
Bloemfontein
Excelsior
Maseru
SOUTH
AFRICA
LESOTHO
(BASUTOLAND)
Howick
Pietermaritzburg
Durban
Drakensberg & Zululand Mountains
De Aar
CAPE PROVINCE
Port Shepstone
Victoria West
Middleburg
THEMBULAND
Umtata
TRANSKEI
Qunu
Vanrhynsdorp
Calvinia
Queenstown
Bashee River
Clarkebury
ATLANTIC
OCEAN
Qamata
Kei River
Beaufort West
Fort Hare
University College
Healdtown
Alice
Saldanha
Fort Beaufort
CISKEI
Martindale
East London
INDIAN OCEAN
Gamtoos River
Oudtshoorn
Robben I.
Table Bay
Matroosfontein
Paarl
Cape Town
Table Mt.
Simonstown
Swellendam
Alexandria
Port Elizabeth
Humansdorp
Clarkson
N
Miles
0
100
200
0
100
200
Kilometers
G.W. Ward

第一章　鄉村少年

一

除了這具軀體、強健的體魄，以及與滕布（Thembu）皇族血肉相連的親情以外，我呱呱墜地之日父親賦予我的，就只有我的名字『羅利赫拉赫拉』（Rolihlahla）了。在科薩語中，羅利赫拉赫拉的字面意思是『拉動樹上的樹枝』，但口語中更爲準確的意思應是『搗蛋鬼』。我並不是一位命定論者，認爲人的名字自由天定，或者認爲父親有超人的預見力，能洞察我那遙遠的未來。但在以後的歲月中，親朋好友們確實在玩笑間，把我經歷的許多風風雨雨，歸於我的生名。人們熟悉的是我的英文名或教名，它是在我上學第一天起的，關於此事，我將在後面詳細叙述。

我生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生在川斯凱（Transkei）首府烏姆塔塔（Umtata）地區姆巴色（Mbashe）河畔的一個小村子姆韋索（Mveso），當時，那裡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出生時，正値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它猶如一場大瘟疫，屠戮了世界各地千千萬萬無辜

百姓；那時，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凡爾塞和平大會，表達了南非非洲人民對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的悲痛。然而，小小的姆韋索仍然猶如世外桃源，遠離世間的喧鬧和變化，沉浸在自己幾百年一成不變的生活中。

川斯凱在開普敦以東約八〇〇英里，約翰尼斯堡以南五五〇英里，處於凱伊（Kei）河和納塔爾（Natal）邊界之間，北面是崎嶇巍峨的德拉肯斯山脈（Drakensberg），東面是蔚藍的印度洋。這是一片美麗的土地，其間山嶺起伏，山谷豐美，河網密布，東流至海，優越的自然條件使這兒即使在冬天萬物蕭條之時也是一片葱綠。川斯凱是南非地域最廣的地區，面積與整個瑞士相當，人口中約有三五〇萬科薩人以及小部分巴索索（Basothos）人和白人。它也是滕布人的家園，滕布人屬於科薩民族，而我正是滕布族的一員。

我的父親加德拉·亨利·姆法卡尼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是一位酋長，這一職務是可以通過血緣和習俗世襲的。父親是滕布族國王任命的姆韋索村的酋長，但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這一任命也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於是，父親就被戴上了姆韋索村地方行政長官的頭銜。作爲一名政府任命的酋長，他可以領取薪俸，但也得支付政府諸如牲畜疫苗接種、使用公共牧場等的攤派費用。雖然酋長一直是令人尊重和尊敬的職位，但在白人政府的冷酷統治下，這一職位已蛻變了，即使在七十五年以前，情況也亦然。

滕布部落源於上溯二十世的玆懷德（Zwide）國王。據傳說，滕布人原先居住於德拉肯

斯山麓，十六世紀東移至印度洋沿岸，與科薩族人混居。科薩人則屬恩古尼（Nguni）族一支，遠至十一世紀以來，一直在北至內陸大高地，南至印度洋的南非東南地區漁獵、居住。恩古尼族可分成南北兩支，北支包括祖魯族（Zulu）和史瓦濟（Swazi）族，南支即科薩人，包括滕布族、姆豐古（Mfengu）族和姆蓬多（Mpondo）族，他們共同構成科薩民族。

科薩族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屬父系社會。科薩語優美動聽，富於表現力，科薩人守法重教，講究禮儀。整個科薩社會和諧、有序，人人安居樂業。每位科薩人所屬的群落都有自己的先祖。我是馬迪巴（Madiba）部族的一員：馬迪巴是十八世紀統治川斯凱地區的一位滕布酋長。我常常被尊稱爲我的部族名：馬迪巴。

統一了整個部落的恩古班庫卡（Ngubangcuka）是滕布族的最後一位專制君王，他卒於一八三〇年。按當時的風俗，除了原配妻子以外，他還可以爲自己的三個皇室娶妻妾，這三家皇室是大皇室、右皇室和伊克西巴（Ixhiba）即左皇室。皇位繼承人從大皇室的子嗣中挑選，左皇室的子嗣則負責解決皇室間的爭端。恩古班庫大皇室的長子姆錫克拉克拉（Mthikrakra）繼承了他的皇位。恩剛格利茲韋（Ngangelizwe）和馬桑澤馬（Mathanzima）是姆錫克拉克拉的兩個兒子。自一九五四年直至其一九八六年去世統治滕布族的薩巴塔（Sabata）是恩剛格利茲韋的兒子，川斯凱前任總理達利旺高（Daliwonga）（一般被人叫做K·D·馬桑澤馬）——按輩份排，他是我的侄子——則是馬桑澤馬的子孫。

恩古班庫卡左皇室的長子是西馬卡德（Simakade），他的弟弟，即我的祖父，叫曼德拉。

儘管幾十年來一直有人在傳言，說我是滕布族皇位的繼承人，但以上我描繪的我們家族的簡略族譜已經清楚地表明，有關此種傳言不過是天方夜譚。我確實是皇室家族的成員，但我不屬於有幸可被培養成統治者的少數人之列。相反，作爲左皇室的子嗣，我的使命是如我父親一樣，輔佐部落的統治者。

我的父親是個高個，臉色黝黑，身板筆直，充滿威嚴。我覺得自己身上也有這些影子，並常引以爲喜。父親的前額有一縷白髮，孩提時，我曾在自己的頭髮上撒上白灰，模仿父親的樣子。父親是個嚴厲的人，他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有時，他會表現得十分固執，很不幸，這一稟性通過血液也傳給了他兒子。

有人說我父親是達林德耶博（Dalindeyebo）（二十世紀早期在位）及其子容吉利茲韋（Jongilizwe）統治時期滕布族領地的總理，其實，這是不恰當的。因爲當時並無這一職務，但父親所起的作用，與這一職務確實也並無多大差別。兩位國王對父親都器重有加，因爲父親是他們非常珍視的顧問。父親伴他們巡遊，每當他們與政府官員進行重要會談時，也總要陪伴一側。父親還是一位著名的科薩歷史的闡述人，這也是他被尊爲顧問的原因之一。我對歷史的興趣由來已久，並深受父親的激勵。儘管父親目不識丁，但作爲一名出色的演講人，他享有盛譽，他的演講寓教於樂，深受聽衆歡迎。

後來我發現，父親不僅是國王的顧問，而且還是國王的創造者。一九二二年容吉利茲韋國王最後去世時，他大太太的兒子薩巴塔尚年幼，無法繼承皇位。對於由誰來繼承皇位就出現了爭論。容吉利茲韋其他三位太太的長子容京塔巴（Jongintaba）、德布拉曼茲（Dabulamanzi）和馬裡薩法（Malithafa）皆深得民心。父親被徵求發表意見。他推薦了容京塔巴，因爲容是諸子中所受教育最好的。父親認爲，容京塔巴不僅是一位好的王位繼承人，而且也可以成爲年輕王子出色的導師。這一建議頗有爭議，因爲容京塔巴的母親出自偏室。但父親的意見滕布人和英國政府最後都接受了。容京塔巴後來對父親知遇之恩的回報，可能當時父親也始料不及。

父親共有四位妻子，母親諾塞凱妮·範妮（Nosekeni Fanny）是他第三位妻子。她是科薩族阿曼潘孚人（Amampemvu）恩卡達馬（Nkedama）之女，屬右室。每位妻子，不論大太太、右室、左室還是伊卡地（Iqadi）即偏室，都有自己的克拉爾（Kraal）。克拉爾即人們的宅地，一般包括一塊用籬笆簡單地圈起的地，供牲畜居棲，一些莊稼地，一座或幾座泥屋。很像小農莊。父親妻子的克拉爾之間相距數英里，父親穿梭於其間。父親共生有十三個孩子，四男九女。我是右室的長子，也是父親最小的兒子。我有三位姐妹，鮑莉韋（Baliwe）是女兒中最大的，還有諾妲庫（No－tancu）和瑪庫特瓦娜（Makhutwana）。儘管姆拉赫瓦（Mlahlwa）是長子，父親酋長的職位卻由達利吉利（Daliggili）繼承。他係上

房所出，卒於三十年代初。除了我以外，以上這些人都已故去。他們無論年歲還是地位，每人都是我的長者。

當我還只是一位咿呀學語的孩童時，父親捲入了一場糾紛，並失去了姆韋索酋長的職位。這件事表現了他性格中某種內在的韌性，我想，這種稟性也遺傳給了我。我一直認爲人的性格由後天塑造，並非得之於天生。但我自認爲父親性格中的高傲、反叛和近乎刻板的公平意識卻『遺傳』給了我。我已提到過，父親是一位酋長（或者用白人話說，是頭人），他既得聽命於政府，還得服從於國王，也就是說，他不僅要受滕布攝政王的調遣，而且還要受政府地方長官的左右支使。一天，父親屬下一位村民對他提出了控告，事情的原委我已記不清楚，只記得好像是與一頭牛走失了有關。地方官發了一道指令，要父親去他那兒，以調查這件事情。父親收到指令後，答覆如下『Andizi，ndisaqula』（我不來，我正在磨劍）。這是科薩人的一種表達方式，他表示回答人無心思談，而正磨刀霍霍，準備戰鬥。在那時候，無人敢以此種態度駁地方官的面子；事實上，這也確實是少有的事。這種行爲被認爲是對地方官最大的不恭——父親闖下大禍了！

父親的回答表明了他一貫的準則，即地方官無權支使他。父親一直堅持，族內之事應不依英皇例律，而依滕布習俗爲準。這一反抗不只是一時的熱血衝動，而且還是一件有關原則之事。父親在強調他作爲酋長而應擁有的傳統特權，從而對地方長官的權威性提出了挑戰。

地方官收到父親的答覆後勃然大怒，立即給他安上了不忠的罪名，加上其他網羅的罪名，他便決心撤父親的職。沒有詢問，沒有調查（這些只對白人公務員適用），地方官一句話便撤了父親的職，也結束了曼德拉家族作爲酋長的歷史。

那時，少不更事的我對周圍的變故全然無知，但這些變故給父親境遇帶來的變化不能不影響我。在當時，父親是一位富有的貴族，但一夜之間，他失去了名位，失去了財富。被剝奪了大部分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大部分生計。由於家裡新出現的窘境，母親遷移到了庫奴村，這是一個姆韋索以西、靠近烏姆塔塔的稍大些的村子，那兒，母親可以得到親友的幫助。在庫奴，我們的生活簡樸多了，但就是在這兒，我渡過了童年中一些最美好的時光，也是在這兒，我記憶的長河開始流動。

二

庫奴村座落在一條綠草如茵的小山溝裡，村旁溪水環繞，青山作伴。村中僅有人口幾百許，住在現代人所稱的圓棚中，圓棚狀如蜂屋，泥巴築牆，茅草堆積爲棚頂，中間支以木柱，支撐棚頂。屋中鋪有搗碎的蟻泥，採於蟻穴，並時常敷以新鮮牛糞，使地面保持光滑平整。屋內唯一出口是一扇矮門，爐火之烟從棚頂排出。圓棚一般集中於居住區內，與玉米地有些許距離。村內和村邊田野上沒有大路，草地上只有婦人和孩童們赤足踏出的小徑。婦幼

們穿着赭石裡漿染過的圍裙，只有村裡少數幾個基督教徒才着西式服裝。村民們的牛、羊、馬都在村裡公有牧地上放牧。庫奴村周圍土地基本上沒有樹木，只有村旁的山坡上長着幾排楊樹。村中土地屬國有。在那時，除了極少例外情況，南非黑人不享有私人土地，每人都是政府佃農，按年繳租。在庫奴村地區，有兩所私立小學，一家雜貨鋪，還有一個盛殺蟲液的鐵罐，用以抗防牛身上的扁虱和其它疾病。

玉米（我們叫作苞谷）、高粱、大豆和南瓜是我們的主要食物，這不是因爲這兒的人對這些食物有什麼特殊的偏好，而是因爲他們吃不起別的好東西。村裡的富人會吃些牛奶、茶、咖啡和糖，來補充營養，但對於庫奴村的大部分家庭來說，它們都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得。灌溉、飲食和洗滌用水擔於溪流和池塘，擔水的都是婦女。其實，庫奴村大部分居民都是婦女和兒童，男人們一年到頭大部分時間裡都在礦上、遠處的城鎮或偏遠的農莊裡幹活。礦井位於約翰尼斯堡南界，是金礦岩和頁岩的分界區。男人們一年回家兩次，主要是爲了耕田播種。鋤草、培育和收割莊稼則由婦女和兒童操持。村裡極少有人識字，對大多數人來說，教育更是聞所未聞。

在庫奴，母親掌管三間棚屋，我的記憶中，三間棚屋裡總有小朋友濟濟一堂。事實上，兒時我基本上沒有孤獨一人的時候。家裡的小屋時常擠滿親朋好友。在非洲文化中，姨和叔伯的兒女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們不像歐洲人那樣，在親戚裡作詳細的區分。我們沒有所

謂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母親的姐妹就是我的母親；叔叔的兒子就是我的兄弟；兄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

母親的三間小屋，一間是廚房，一間是臥室，一間用來堆放食物和其它物品。臥室裡基本上沒有西方人所謂的傢俱。我們睡的是草席，沒有枕頭，在我去上學之前，還不知枕頭爲何物。母親做飯用的爐子其實不過是開在地上的一個洞，我們在上面放上爐格子也就成了。屋裡沒有烟囱，爐烟從小屋一側的一個小洞裡排出。母親自種自收苞谷。苞谷收上後，婦女們又用磨盤把谷粒磨碎。苞谷粉一部分被做成了麵包，另一部分則被曬乾後儲存在罈罐裡。苞谷的產量不是非常充足，有時會發生短缺，但自產的牛奶和羊奶則非常豐富。

很小時，我就喜歡溜出家門，與小朋友一起吃、一起玩、互相打架起鬨。一位男孩如果整天待在家裡、圍在母親的裙邊打轉，我們就會認爲他沒出息、太女人氣。到晚上，我就同白天的玩伴們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張床。大約五歲時，我成了一名牧童，第一次走進大草原，放牧牛羊。也是在這時候，我了解了科薩人與牛近乎神秘的關聯，牛不僅給人提供了牛肉和牛奶，甚至於財富，而且它也是上天的一種賜予，是幸福的源泉。正是在這兒，我學會了怎樣用彈弓射落飛鳥、怎樣採集野蜂蜜、野果和食用樹根、怎樣直接蹲伏在牛肚下吸食溫暖香甜的牛奶、怎樣在清冷的溪流和池塘裡游泳、怎樣用絞合在一起的尖銳的金屬絲捕魚。我還學會了怎樣打木棍杖，這是非洲農村男孩們必上的一課。我諳熟了其中的種種技巧，我

知道怎樣躲避別人的打擊、怎樣聲東擊西、怎樣手腳並用緩解困境。就是這段無憂無慮的時光，使我對大草原，對戶外曠野、對自然的簡樸之美產生了深深的眷戀。

那時候，我們小男孩大部分時間都沉溺於自己的小天地。我們玩着自製的玩具，我們用泥巴捏製了各色地物和鳥獸。我們用樹枝扎出了牛拉車。廣闊的大自然成了我們玩耍和馳騁的天地。庫奴村周圍有許多平滑的大岩石，我們找來表面平滑的小石頭放上，坐在上面，人便從大岩石上滑了下來。我們經常興致盎然地反覆玩耍，以致我的屁股都磨腫了，一坐下去就疼。我還學會了如何駕馭剛剛斷奶的小牛犢，雖然被摔了幾次，但不久就能隨心所欲地駕馭了。

有一次，我騎一匹難馴的驢子，着實吃了次大虧。我們一批伙伴，大家輪流騎上又下來，輪到我時，驢子突然竄進了近旁的荊棘叢裡。它低下頭，躬起背，把我從上面了摔下來，我身上被摔疼，臉也被刺扎傷了，在伙伴們面前羞得無地自容。與東方人一樣，非洲人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尊感，或如中國人所說的『面子』。我在伙伴們面前失了面子，我羞得滿臉通紅。士可死而不可辱，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便知道了，你可以擊敗你的對手，但不可污辱他。

男孩子通常自己玩耍，有時他們也讓姐姐妹妹們加入。男孩女孩們一起玩捉迷藏

（Ndize）、碰了跑（Icekwa）之類的遊戲。碰了跑是設法碰上別人腰以上的部位，然後在別人反身來拍你以前，設法躲避開。我最喜歡與女孩子們一起玩的遊戲是過家家（Khetha）。這種遊戲不需多少組織，大多是即興之作。遊戲的伙伴是一群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一但被她們誰選定，那位被選上的幸運男孩就要唯命是從，護送選他的女孩出行。女孩子們很機靈，比我們這些愣頭愣腦的毛小子聰明多了。她們常常串通一氣，大家都選同一個男孩，而且一般還是最不起眼或最笨的男孩，這樣，她們就可以一路無所顧忌地欺侮他了。

男孩子們最常玩的遊戲叫辛提（Thinti），與男孩子們玩的大多數遊戲一樣，它近乎一種模擬戰爭。兩根木棒是兩個目標，它們相距一〇〇英尺插進地裡。我們分成實力相當的兩組，每邊向對方的目標摔木棒，把它打倒。同時又要設法保護本方的目標，不讓對方撿到已扔出來的木棒。我們慢慢長大後，就組織起來同鄰村人鬥，在這種充滿男子漢氣慨的遊戲中表現突出的男孩，則受到很大的尊重，其禮遇不下於凱旋的將軍。

從外面玩回來，我回到母親的棚子裡，一邊聽她說話，一邊看她做晚飯。父親講的是一些歷史戰鬥故事和科薩武士的英勇事跡，母親則講一些世代流傳的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這些故事常常激發我童心的想像，而且故事中也常含有許多珍貴的道德寓意。記得母親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年輕的小伙子在一次旅行中遇上了一位老婦人，老婦人是個瞎子，眼中

蒙了一層厚厚的翳。老婦人向小伙子求助，小伙子起了同情心，給了她一些食物。老婦人又要小伙子擦乾淨她的眼睛，他雖然內心不樂意，但還是做了。於是，奇跡發生了，老婦人眼睛上的翳慢慢脫下來了，她變得又年輕又漂亮。最後，小伙子與她結了婚，過了幸福、富有的生活。故事再也簡單不過了，但是故事中的教誨卻是亘古不變的：美德和慷慨將得到無價的回報。

與所有科薩孩子一樣，我獲取知識的途徑首先主要是觀察。環境決定了我們只能通過模仿，而不是通過尋根究底來探尋學習。我第一次訪問歐洲人家庭時，常驚異於孩子們對父母的問題之多、問題之天眞以及父母們回答孩子問題之耐心。在我家裡，提問題會被認爲是幼稚；大人們只在自己，而不是小孩認爲有必要時，才與孩子們共享認識和事實。

與當時多數科薩人一樣，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打上了傳統、習俗和禁忌的深深的烙印。這些都是我們生存的基本事實，不容置疑。男人按他父親安排的人生道路走完一生，同時又爲兒子安排一生；女人則像母輩那樣盡其一生。通過對傳統習俗的觀察，傳統便融入了我的心中。不用人敎，我不久便熟悉了男女之間種種複雜的繁文縟節。我知道，男人不可擅入剛剛生了孩子的別人的家裡；新婚妻子不可在其丈夫之前跨入作爲新房的圓棚；妻子不可在家裡直呼其丈夫任何先人的名字；對家庭和祖宗不忠不孝會帶來噩運和失敗。如若你確對祖宗犯了不敬，彌補罪過的唯一途徑是求助於巫師或部落裡的長者，他們會與祖宗進行對話，傳達

你深深的悔恨。對這些事情我都非常習以爲常。

在庫奴村，我能遇到的白人寥寥無幾。當然，地方官是一名白人，他也是最近的雜貨店的店主。偶爾也有白人旅行者或警察路經此處。這些白人看起來都如天神般高大，在我只能敬而遠之。但是，他們在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年少的我也很少考慮白人的事，以及我周圍的人和這些奇怪而遙遠的關係。

庫奴村小小世界裡僅有的種族矛盾發生在科薩人和姆芬古（Mfengu）人之間，村裡的姆芬古人人數不多。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間，隨着薩卡（Shaka）和祖魯王國的興起，祖魯武士試圖用武力統一各部落，並置於其武力統治之下。由此發生了一系列戰爭，並隨之產生了移民潮，姆芬古人即是在這個所謂的迪發恰尼（Difaqane）時期，爲了逃避薩卡祖魯軍隊而來到東開普地區的。姆芬古人母語不講科薩語，起始他們被迫做別人不願做的工作。他們在白人的農莊裡勞動，在白人的工廠或公司裡工作，這些工作是生活稍好的科薩人不屑爲之的。但是姆芬格人勤勞肯幹，由於他們與歐洲人交往較多，他們接受了別的非洲人沒有受到的教育，也比其它非洲人更『西化』。

到我做孩子的時節，姆芬古人成了整個社區中的上等人，他們占據了牧師、警察、教師、職員和翻譯等職業。姆芬古人也是最早成爲基督徒的人，他們建的房子比別人的好，他們在農業上使用科學方法，經濟條件也比科薩人要好。他們牢記傳教士的教導：信教則趨向

文明，要文明則要信教。在庫奴村，人們對姆芬古人存有偏見和敵視，回想起來，我覺得這更多地應是妒忌而非種族仇視。孩童時代觀察到的這種地方性質的種族主義相對說來並無多大害處。在那時，我並沒見到甚至也沒想到任何形式的種族暴力行爲，這種暴力行爲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南非白人統治者的默許甚至大力支持。

父親並沒有沉浸於對姆芬古人的狹隘的偏見中，他與兩位姆芬古兄弟結爲朋友，他們是喬治和本·姆貝克拉（Ben Mbekela）。姆貝克拉兄弟在庫奴村卓立不群：他們受過教育，還是基督徒。哥哥喬治是一名退休教師，弟弟本是一名警官。儘管姆貝克拉兄弟皈依了基督教，父親卻仍然遠離基督教，並繼續保持對其祖宗們信仰的科薩人的神靈夸馬它（Quamata）的信仰。事實上，父親還是家庭祭師，他主持宰殺牛羊的儀式，主持種植、收割、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典禮的傳統儀式。這不用任命，科薩人傳統宗教講究的是天下同一，神職和世俗人之間、自然和超自然之間沒有多大差別。

姆貝克拉兄弟的信仰沒有撼動父親，卻影響了母親，她成了一名基督徒。事實上，母親的名字範妮（Fanny）正是她的教名，她這個名字是在教堂裡起的。也是在姆貝克拉兄弟的影響下，我才受洗成了一名美以美（那時叫衛理教派）教徒，並進了學校。姆貝克拉兄弟有一座房子，座落在庫奴村的山邊，他們時常看見我在附近玩耍或放羊。有時，他們之中的某人會過來，同我聊聊天，終於有一天，喬治·姆貝克拉專程拜訪了我母親。『您兒子是一位

聰明的孩子，』他說：『應該送他上學。』母親沉默着。家裡還沒有人上過學，母親對姆貝克拉的建議實在沒有準備。但她確實鄭重其事地向父親提起了此事，父親儘管沒有受過教育（也許正是因爲他沒有受過教育），但馬上決定送他的幼子去上學。

喬治·姆貝克拉的學校就一間房子，屬西式建築，在庫奴村山的的另一邊。我要去上學前一天，父親把七歲半的我叫到一邊，告訴我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地去上學。到那時爲止，我與庫奴村所有別的男孩一樣，穿的不過是一塊布，從肩的一頭裹下來，捆在腰間。父親拿來了自己的一條舊褲子，齊膝剪下褲腿。他要我穿上，我穿上了，長短還湊合，腰卻實在太肥了。父親拿了一條繩子，幾下就把褲子齊腰給我裹上了。那時我一定可笑極了，但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爲擁有一條褲子而這樣自豪過，父親的『改裝型』褲子是最令我自豪的。

上學第一天，我的老師姆丁格妮小姐給我們每人都起了一個英文名字，並告訴我們，從今往後，我們在學校裡就應該叫這個名字了。在那時，這種現象在非洲人中已蔚然成風，這無疑是由於英國人對我們教育的歧視所致。我受到的教育是英國式的教育，英國的思想、文化、制度自然被認爲是高出一等的。而且也根本不存在非洲文化這一回事。

我那輩非洲人——甚至是今天的非洲人——一般都有英文名和非洲名兩個名字。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那時候的白人不會或不願拼讀非洲名，而且，他們認爲只有一個非洲名的人缺乏教養。那天，姆丁格妮小姐告訴我我的新名字叫納爾遜。她爲什麼給我起這個名字的原

因我不得而知。也許同偉大的英國海軍上校納爾遜勛爵有關係吧！但這僅僅是猜測而已。

三

我九歲的一天晚上，突然覺得家裡要出什麼事了。那天，父親來到了母親的小屋，平時，他一月來一星期，非常有規律，這時並不是他要來的時間。他本不想在母親的小屋裡待多少日子，但病魔把他留下了。他躺在母親的小屋裡，一陣陣不停地咳嗽。透過我童稚的眼光，我知道他在這個世界彌留的時間不長了，他來母親的小屋，等待死神的降臨。父親肯定得了某種癆病，但他沒有作過診斷，因爲父親一生都不知道醫院的門開在哪個方向。他就這樣在母親的小屋裡待了幾天，不動也不言語，直到有一天，他似乎感受到了死神迫近的身影。那天晚上，母親和專程趕來的父親最年輕的妻子諾迪瑪妮（Nodayimani）在照顧他。後半夜時，父親叫諾迪瑪妮，她靠近父親，父親對她說：『給我拿烟來。』母親和諾迪瑪妮答應着，但她們覺得在這種狀況下給父親抽烟太有害了。可是父親一再要求，諾迪瑪妮最後終於給父親的烟斗裝上了烟絲，並點上遞給了他。父親猛吸了幾口，似乎平靜了一些。一個小時後，就這樣叼着烟斗，父親平靜地過世了。他的烟斗還仍然燃着。

記憶中，父親的離世並未給我帶來多大的悲痛，倒是驀然而至的孤苦無依境況確實給幼小的心靈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儘管生活中我與母親相依相伴，但父親是我生活的支柱，現

在，這根支柱倒下了。父親的離世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這在當時我還不能預見到。經過一段不長的服喪期，母親告訴我，我得離開庫奴村。我沒有追問原因，也沒有問我要去那裡。

我草草地打點了行裝，在一個朦朦朧朧的早晨，與母親開始了西行的跋涉，目的地是我的新居所。離開身後的這個世界，甚至比失去父親更令我悲傷。庫奴是我童年世界的全部，我與任何年少天眞的小朋友一樣，深深地愛着我的故鄉。當翻過村邊的山崗，庫奴的世界就要在我眼前消失時，我轉過頭，深深地回望了一眼這座養育了我的村莊。我心想，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看它了。我看到了簡陋的農舍，小屋外忙碌的鄉親；我和小伙伴們嬉水暢游的小溪；綠油油的苞谷地，青青的草地上，牲畜們在悠閑地吃草。一幕幕生動的情景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小伙伴們逮住了一隻隻活蹦亂跳的小鳥；用苞谷杆和苞谷葉烤熟苞谷；蹲在奶牛肚子底下吸牛奶；在小溪下游的池塘裡嬉水玩耍。最後，我的眼光落在了母親的三間小屋上，那裡，我享受了母親的愛和關懷。是這三間小屋伴我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多麼遺憾啊！我離開之前，竟沒來得及吻一吻這愛我的人們和熟悉的一草一木！我不敢想像，我正在慢慢走近的未來會與這逐漸離去的過去一樣給我幸福和快樂嗎？

我們默默地徒步而行。太陽慢慢地西沉了，身後的小村也越來越遠。母子相對，雖無言，卻不孤獨，因爲心的對話不需語言。母親和我言語不多，我們之間已不需太多的言語。我從未懷疑過她對我的愛和傾心的關懷。旅途非常累人；我們需要翻山越嶺，走過漫長而崎

嶇的山路，穿過許多村莊。傍晚時分，我們來到一個淺淺的山谷，谷地裡是一座村莊。村旁綠樹環繞，村子中央是一個豪華的大院子。我從未見過如此氣派的院子，驀見之下，猛地驚呆了。院子由兩間方形房子（即 iingxande）和七間大圓棚構成。每間房子都刷着白灰，即使在朦朦的夕陽下也熠熠生輝，讓我大開眼界。院子前是一座大花園和一大片苞谷地，旁邊是一片桃樹。院後是一座更大的花園，種着蘋果樹、蔬菜、各色花卉和一片合歡樹。旁邊是一座塗着白灰泥的教堂。

點綴着正房大門的兩棵橡皮樹下，坐着二十來位部落裡的長者。院子旁邊的草地上，大約有五十來頭牛和三〇〇多隻羊在悠閑地吃草。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那麼井井有條，那麼富足，那麼有秩序，我做夢都沒想過。這兒就是大皇宮，滕布族領地的首府姆克凱兹韋尼，現任滕布國王容京塔巴·達林德耶博的皇宮。

當我沉醉於眼前的壯觀景象時，太陽正在西斜，一輛汽車從院子的西門轟然開了進來，圍坐在樹下的老者們立即站了起來。他們脫掉頭上的帽子，肅然高呼：『吾王容京塔巴萬歲！』（Bayethea－a－a Jongintaba！）。這是科薩人對其國王的傳統歡呼之語。汽車（後來我知道，這輛豪華汽車是福特 V8）上走下一位矮壯的男人，穿着一套筆挺的西服。即使在年輕的我看來，他也充滿着自信、果斷和威嚴，一定是那種受人愛戴的人。容京塔巴的字

面意思是『仰望高山』，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他眞是名副其實。他身上充滿吸引力，所到之處總令萬衆矚目。他臉色黝黑，充滿智慧。走下車後，他一一同樹下的老者握手，他們是滕布族最高法院的成員。在今後的十年中，容京塔巴國王將成爲我的監護人，成爲我永生感激的恩人。

非洲人所稱的大酋長在英語裡一般叫做國王，從字面理解，意思也是最接近的。在我們的語言裡，大酋長、酋長、攝政王、國王爲同一稱號，除非在個別情況下，才作區分。例如對滕布族現任大酋長容京塔巴，我使用了國王、攝政王、大酋長幾個不同稱呼，它們其實都歸於一人，相互可以互換。

看到容京塔巴和最高法院衆法官的一剎那，我覺得自己如一棵離土的小苗，置身於溪流中，無力阻擋水流的冲擊，心裡充滿了畏懼和疑惑。來到姆克凱茲韋尼之前，天眞的我心無旁騖，天天自得其樂，除了飽食終日，力爭成爲木棍仗中的勝利者外，沒有任何企求。我不知道金錢、地位、名譽和權力爲何物，在我童稚的心靈中，它們還沒有任何影子。現在，一個新奇的世界在我面前突然打開了，我既驚奇，又迷惑。窮人家的孩子突然面臨自己原先連做夢都沒見過的繁華景象，心靈一定會受到新奇的誘惑和刺激。我也不例外。在那一時刻，我感到自己原先的信念和觀點正在消逝。父母親給我建立的脆弱的信念基礎動搖了。最初的一瞥我就明白了，除了成爲木棍仗的勝利者外，前面的生活也許還有更多更多的內容。

後來我知曉，父親死後，容京塔巴便提出想成為我的監護人。他將待我如親子，我也將受到他諸子的同樣待遇。母親沒有別的選擇，沒有人會拒絕國王這樣的要求，雖然她會思念我，但我在國王的監護下，比在她那兒能得到更多的優待，對此，她也可以自慰了。毫無疑問，國王心裡還記着，正是由於父親的干預，他才成了執行大酋長。

母親在姆克凱茲韋尼待了一兩天，即起身返回庫奴村。我們的分手非常平靜。母親沒有作祈禱、沒有作臨別贈言，也沒有親吻。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她不願讓我在她離開時有離別親人的孤苦感，所以，她裝做非常平靜地離去了。不用母親告訴，我知道父親想讓我受教育，去見識大世面。在小小的庫奴村，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母親溫柔的面容是我所需的一切愛和支持。母親離開時，對我說：『孩子，要高興點！』（Uqinisu－fokotho Kwedini!），然後轉身上路了。孩子是最容易忘情的，當他們被某種有趣的事吸引而專心致志的時候則更是如此。儘管我親愛的母親和最親密的朋友要離開了，我的思緒還沉浸在來到這個新地方的喜悅裡。我怎麼會不高興呢？現在，我已經穿上了新監護人給我買的漂亮的新衣了。

我不久便融入了姆克凱茲韋尼的日常生活中。孩子適應能力很強，因為他們胸無成規——我很快就適應了大皇宮的生活，就像我本來就一直在這兒生活一樣。姆克凱茲韋尼的一

切看起來都是那麼有趣。在庫奴村原本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在這兒都成了令人激動的冒險。不上學的時候，我下地把犁、駕駛牛車、放牧牛羊。我還學會了騎馬，用彈弓打鳥，並與伙伴們騎在馬上打鬥，有時，我還在滕布族姑娘優美的歌聲和喝采聲中，整晚整晚地跳舞。儘管我還時常想念庫奴村和母親，但不久我便完全融入姆克凱兹韋尼這個小社會中了。

我上的學校是一所只有一間房子的小學校，學校就在皇宮的邊上。我在學校時學英語、科薩語、歷史和地理。用的英語課本是《錢伯斯英語讀物》，功課做在小黑板上。我們的老師，起先是法達納（Fadana）先生，後來是吉科瓦（Giqwa）先生，都對我尤其好。我功課學得很好，但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聰明，功課好應該歸功於我的勤勉。我自己的自我約束，加上住在皇宮的法西瓦（Phathiwe）阿姨的勉力督促，便是我成績優異的原因。

姆克凱兹韋尼是美以美教派的一個佈道點，這兒遠比庫奴村現代和歐化。人們穿的是現代服裝。婦女的服裝受了傳教士們嚴格的清教徒風格的影響！她們穿着厚布製成的沉重的長裙，厚厚的上衣一直裹到脖子，外面還披一塊布單，頭上扎一塊頭巾，扎成非常漂亮的樣子。

如果說姆克凱兹韋尼的世界是圍着國王轉動的，那麼，我的小世界的中心則是他的兩個孩子。攝政王有兩個孩子，加斯蒂斯（Justice）是他唯一一個兒子，是大皇宮的當然繼承

人，女兒叫諾瑪芙（Nomafu），是加斯蒂斯的妹妹。我受到的待遇與加斯蒂斯和諾瑪芙完全一樣。我們在同一個鍋裡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服，做同樣的遊戲。後來，皇位繼承人薩巴托的哥哥恩科達（Nxedo）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我們四人組成了皇家四駕馬車。國王及其妻子諾—恩格蘭（No－engeland）待我如親子。他們出於愛和公正，爲我擔憂，對我關心指導，爲我的錯誤而懲罰我。容京塔巴是一個嚴厲的人，但我從未懷疑過他對我的愛。他們親熱地叫我塔滕枯盧（Tatomkulu），即老爺爺，因爲有時候我嚴肅時，看起來像一個小老頭。

比我年長四歲的加斯蒂斯是繼父親後，我心目中的第一位英雄。每天我幾乎都帶着崇敬的心情仰望他。我到姆克凱茲韋尼之前，他已到克拉克伯里（Clarkebury）上學去了，上的是一所寄宿學校，離這兒約六十英里。他長得高大、英俊，渾身肌肉發達，是一名不錯的運動員，長於田徑、板球、橄欖球和足球。他生性快活、外向，走到哪兒，就能把哪兒的人吸引住。他迷人的歌喉常常能使聽衆入迷，其間他還穿插表演他那優雅的舞廳舞姿。人們想像得到，他身邊聚集了一群女性崇拜者。但也有一些人對他不以爲然，認爲他像個花花公子一樣，太女人氣了。我們是好朋友，但在許多方面我們卻有天壤之別：他外向，我內向，他整天樂呵呵，而我卻嚴肅持重。他天生是個機靈鬼，辦任何事似乎都輕而易舉；而我卻要實踐再三，才能熟悉練達。在我看來，他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也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做他做的

每一件事，以求盡量與他相像。我知道，儘管我們所受的待遇一樣，但等待我們的命運是不同的；加斯蒂斯將繼任成爲滕布族最強而有力的酋長，而我所能繼承的只有國王的賜予，他給我什麼，我就繼承什麼。

每天我在國王的房子裡進進出出幹雜活。在我爲國王幹的所有雜活中，我最喜歡的是熨衣服。熨衣服時，我常常心存驕傲。他有五至六套西服，我會花上很多時間，仔細地熨這些衣服，並盡量在褲子上熨出褶子來。國王的皇宮裡有兩間大的歐式房子，蓋着錫皮頂。那時候，有西式房子的非洲人還很少，它們就成了巨富的象徵。除了這兩間主要的大房子以外，皇宮裡還有六間圓棚，呈半圓形分布在周圍。主房主要用來開會和娛樂，地上鋪着我從沒見過的地板。國王和皇后在右邊的圓棚裡就寢。中間圓棚是皇后姐姐的居所，左邊圓棚是食品室。皇后姐姐棚子的地下是蜂房，有時候，我們會偷偷地翻開一兩塊地板，偷食下面的蜂蜜。我去姆克凱兹韋尼後不久，國王和皇后搬進了左邊圓棚，那兒就自動變成了主房。左圓棚邊上有三座小圓棚，一座住着國王的母親，一座是加斯蒂斯和我的起居室，另一座作接待客人用。

在姆克凱兹韋尼，影響我生活和思想的兩大因素是酋長和教會。這兩種因素的和諧並存確實不易，但在那時，我看不出這兩者有任何衝突之處。那時，基督教在我心中引起的並不

是信仰什麼的聯想，而僅僅是一個人：馬蒂歐婁（Matyolo）牧師。對於我來說，他身上所具有的強有力的力量也就是基督教的迷人之處。在姆克凱茲韋尼，馬蒂歐婁與國王一樣深得人心，在精神世界裡，國王還得聽命於他，這更使我覺得他權力的巨大。不久，我就明白了，雖然教會的使命是來傳播上天的旨意，但現世中非洲人所取得的成就卻無不與傳教士的工作有關。教會學校培養神職人員、翻譯和警察，在當時，作一名警察幾乎是非洲人的最高願望了。

馬蒂歐婁牧師身材魁梧，年逾五十，聲音低沉有力，這使他的佈道和歌唱充滿魅力。後來，隨着我對基督教認識的增加，我知道他其實是非常膚淺的，當然，後來馬蒂歐婁牧師的基督教知識也增加了，只不過他入的是旁門左道。當他在姆克凱茲韋尼西頭的教堂裡佈道時，教堂裡常常人滿爲患。虔誠的信徒聚集在教堂裡，高聲讚頌着上帝，婦女們甚至跪在他的腳下，乞求他的拯救。到達姆克凱茲韋尼後，我聽到的第一件有關馬蒂歐婁牧師的事是他只用一本《聖經》和一個燈盞，單臂趕跑一個惡鬼的事，我聽起來津津有味，絲毫也沒有懷疑。馬蒂歐婁牧師宣講的衛理會教義不過是《聖經》中硫磺烈火式的有罪報應說與一丁點非洲泛神論思想的混合物。在他那裡，上帝是智慧而無所不能的，但他又是毫不寬容的，他要懲罰所有的罪行。

在庫奴，我去教堂的唯一日子是我的受洗日。對於我來說，這僅僅是一種儀式，我是爲

母親才去的，對我自己則毫無意義，但在姆克凱茲韋尼，宗教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每個禮拜日，我都得同國王和王后去教堂。國王對宗教之事極爲看重。事實上，他給予我的唯一一次體罰也是因爲宗教的原因。那個禮拜天，我趁大人不注意，偷偷跑開，去與鄰村小孩鬥毆了。後來，我再也沒犯過此類錯誤。

這不是我唯一一次因冒犯馬蒂歐婁牧師而受的懲罰。一天下午，我偷偷爬進牧師的園子，偷了一些苞谷，並立刻烤起來吃了。一位姑娘看到了我的舉動，並很快把此事告訴了牧師。消息馬上傳開了，傍晚時，王后也知道了此事。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禱時間——這是每天在上房必做的功課——才嚴肅地向我提出了白天之事。她嚴厲地指責我不該去搶奪一位上帝貧窮的僕人的糧食，說這是給整個家庭丟臉。她說，由於我犯了這個過錯，魔鬼一定會抓我去當差。養母責罵了我這頓以後，我心裡又害怕又羞辱，害怕的是有一天會突然受到魔鬼的懲罰，羞辱的是我辜負了收養我的這家人對我的信任。

國王受到人們——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的普遍尊敬，他的權力看來堅不可摧，由此，我把國王看作是整個生活環繞的中心。在姆克凱茲韋尼，酋長的權力和影響力遍及了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並讓我覺得，要使自己一言九鼎、身列高位的最主要途徑就是取得酋長資格。

我後來關於領導的諸觀念都強烈地受了我對大皇宮酋長制的觀察的影響。我觀察並熟悉了大皇宮經常召開的全部落大會的情況。大會不是預期召開的，而是在有特殊情況發生時才召開。大會召開的目的一般是爲討論有關全部落的事件，如旱災、瘟疫、選牛，以及政府高級代表或行政長官制訂的政策，或者政府制訂的新法律。滕布族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來參加——實際上，參加的人非常踴躍，許多人都騎馬或徒步前來參加。

等到這種時候，國王周圍就會聚起一批『amapakati』即『中間人』之意），他們是具有高級頭銜的顧問，組成了國王的議會和最高法庭。他們是部落中的智者，腦中裝滿有關部落歷史和風俗的知識，說話很有影響力。國王向這些酋長和頭人發出信函，告知他們將召開一次部落大會，不久，來自滕布各地的重要客人便會會聚於大皇宮，使大皇宮充滿生氣。客人們聚集在國王起居室的前面，國王致開幕詞，他感謝前來開會的每個人，並解釋召開此次大會的原因。致完開幕詞，他便一言不發，直到大會結束。

只要自己願意，每個人都可以發言。這是體現民主最純潔的方式。講話者身份可以有尊卑之分，但無論是酋長還是臣民，是武士還是鄉醫，是店主還是農民，是地主還是苦力，每個人的講話都有人聽，無論他講多長。可以想像得到，大會一開就要延續許多個小時。民治政治的基礎即是所有民眾都有發表言論的自由，公民一律平等（恐怕婦女要被作爲二等公民了）。

大會期間還有一次大宴會，我聽着發言人一個個接續地講話，經常吃得肚子滾圓。我看到講話人如何一邊不斷地講話，一邊不停地走路，說着走着，幾乎要把地球走穿。我看到人們如何激烈地辯論，辯論者如何鮮明地提出論點，又嚴密而細緻地論證。我看到有些講話人感情充沛，言詞懇切，做到了以情動人，而有些講話人神態僵硬，語詞枯燥，好像對於感情唯恐避之不及。

開始時，人們對國王批評的激烈和直率給我以很深的印象。國王雖然地位尊貴，但也不是批評不得的，事實上，他經常是衆矢之的。面對批評，無論批評者言詞如何激烈，國王都僅僅只是洗耳恭聽，並不作任何辯解，也沒有表現出什麼感情。

大會將一直繼續下去，直到與會者達成了某種一致的意見。這也是大會的目的。大會只能以人人點頭爲結局，要麼就根本不會結束。一致意見可以是大家一致不同意什麼，或者大家一致同意等到某個更成熟的時機再討論解決辦法。民主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權發表意見，民衆共同作出某個決議。多數意見決定論對非洲人是舶來品。多數意見並不能壓制少數意見。

只有當太陽西斜，大會行將結束時，國王才會再次講話，他會總結衆人的發言，並揉合各種不同意見，形成某種統一意見。如果統一意見形成不了（這種情況也經常發生），則將會舉行另外一次大會。對持反對意見的人不會採取任何強制措施。最終的結果都是一致同意或全體反對。會議的最後，一位歌手或詩人將會給衆先王獻上一首讚歌，另外還會爲現任的

國王獻上一曲，半諷半譽，每及於此，聽衆和國王都會開懷大笑。

在以後作爲領導者的實踐中，我總是遵循我最早在大皇宮裡看到的，國王表現出來的這些領導原則。在討論中，我總是儘量傾聽所有人說完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經常地，我的意見僅僅是我在討論中聽到的全體發言者的一致意見。我心中總是銘記最初聽國王說的一條領導原則，一位領導就像一位牧羊人，他待在羊群後邊，讓頭羊跨步向前，其它羊尾隨前進。牧羊人只是殿後，羊們也不知道一路上有人在後邊指揮它們前進。

在姆克凱茲韋尼時，我對非洲歷史的興趣增加了。在這之前，我只聽到過科薩英雄的故事，但是大皇宮裡，我聽到了科薩人以外的非洲英雄，像巴佩地（Bapedi）國王色庫庫尼（Sekhukhune）、巴索索（Basotho）國王莫什韋什韋（Moshweshwe）、祖魯（Zulus）國王丁加尼（Dingane）、班巴薩（Bhambatha）、欣查（Hin－tsa）、瑪卡那（Makana）、蒙溪瓦（Montshiwa）和卡馬（Kgama）。第一次讓我聽到這些人的故事的，是來自大皇宮解決各種爭端、審判各類案件的顧問們。他們是各個地區的酋長或頭人，雖然他們不是律師或法官，但他們能陳訴案件，然後作出判決。有時，他們很早就判完案件，於是就會坐下來給人講故事。我想，比起審那些地方案子，他們也許更樂於講故事。他們一講故事，我就纏在他們邊上，靜靜地聽他們講。他們故事裡的俗語警句，我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們的語言嚴肅而高貴，他們的動作優閒而從容，我們科薩語中的磨擦音在他們嘴中更爲悠長，更爲明

顯。

開始時，他們要轟我走，告訴我，我太小了，不讓我聽。後來，他們又找藉口把我支使開去，他們讓我去找火，讓我去告訴婦女們他們要喝茶，因此，開始幾個月，我被他們支使得忙前忙後，以致聽不着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最後，他們終於讓我待在邊上聽了。於是，我第一次聽到了非洲英雄和愛國者反抗西方侵略者的故事，我的心中燃起了對非洲武士的崇敬之情。

給我們講述歷史故事的最年長的酋長是兹韋利班吉利·焦尹（Zwelib - hangile Joyi），他是恩古班庫卡國王大皇室的子嗣。塔圖·焦尹（TatuJoyi）已很老了，起皺的黑皮膚鬆垂下來，像穿在他身上的一件鬆垮的衣服。他慢騰騰地講着故事，不時被駭人的咳嗽聲打斷，有時，他不得不停幾分鐘，喘口氣，再繼續講故事。焦尹酋長是騰布歷史的權威。他比別人知道的都多得多，因爲他活的年歲比誰都長、經的事比誰都多。

雖然如今塔圖·焦尹已垂垂老矣，但一說起他年輕時作爲武士，在恩剛格利兹韋國王軍隊裡與英國人戰鬥的情景，時光似乎倒退了幾十年，青春又回到了他的臉上。焦尹做着各種手勢，似乎又重新揮起了長矛，馳騁在遼闊的大草原上，重新沉浸在勝利和失敗的悲喜之中。他讚頌了恩剛格利兹韋國王的英勇、大度和謙遜，並說自己能爲這樣一位偉大的領袖作戰有多麼光榮！

塔圖·焦尹酋長的故事並不都是關於滕布族的。我第一次聽到非科薩族武士的故事時，心裡還感到納悶，老人們幹嗎講那些甚至連科薩人都不是的武士們的故事呢？這就像一位十分崇拜當地足球明星的男孩不會去關心國家隊裡的球星一樣，因爲後者與自己關係太遠了。那時候，我還是井底之蛙。實際上也只是到了後來，我才被悠久的非洲歷史打動，才爲所有非洲英雄們的行爲感到自信和驕傲。

塔圖·焦尹咒罵白人，認爲白人使科薩各族分裂，兄弟鬩牆。他說，白人曾告訴滕布人，說滕布人的眞正酋長應是那個遠在大洋彼岸的偉大的白人女皇，說滕布人實際上是英國人的臣民。但那個偉大的白人女皇給我們黑人帶來了什麼呢？只有苦難和欺騙，如果她眞是一位酋長，那她也是一位壞酋長。塔圖·焦尹的故事和他對英國人的責罵使我產生憤怒和受騙的感覺，好像自己被剝奪了所有賦之於出生之地的權利。

在這之前，我還不知道英國人編的標準教科書裡學不到我們國家的眞正歷史，不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並不是如西方歷史學家經常所稱的，始於一六五二年簡·範·里貝克（Jan Van-Riebeeck）登上開普敦。從這以後，我明白了，我們的歷史在白人到來以前千百年就開始了。

塔圖·焦尹說，以前，南非黑人一直過着和平的生活，直到白人（abe－lungu）帶着火槍，越過重洋來到這裡。他說，滕布人、潘多人、科薩人和祖魯人都有共同的祖先，過着兄

弟般和睦的生活。白人來後，把各族之間親密的關係（abantu）拆散了。白人很貪婪，一心想霸占土地，黑人卻慷慨地與白人分享土地，就像分享空氣和水，黑人們覺得，人不應該霸占土地。但白人卻像奪取別人的馬那樣侵占了土地。也是從焦尹酋長這裡，我知道了操班圖語各族的歷史始於更遠的北邊，那兒到處是湖泊，有着青青草原和山谷，經過幾千年的緩緩遷移，我們最終來到了這塊大陸的最頂端。

在姆克凱兹韋尼，我感覺自己有點像進了大城市的小鄉巴佬。姆克凱兹韋尼比庫奴先進得多，大皇宮的人也認爲庫奴村居民原始而落後。國王不願讓我去庫奴村訪問，他竭力阻止我回去。他認爲，我一回老家，就會與壞伙伴混在一起，因此他盡力讓我一直待在姆克凱兹韋尼。當我真想辦法回到庫奴村時，我從母親的言詞裡感到，國王已向他打過招呼了，因爲她每次都要一一向我詳細詢問與誰玩了。由於這一原因，國王會經常安排，讓母親和姐姐們去大皇宮探望我。

初到姆克凱兹韋尼，伙伴們都把我看作鄉巴佬，笨手笨腳，似乎在大皇宮高潔的空氣中就無法生活。像所有愛面子的年輕人一樣，我盡力使自己顯得優雅而精於世故。在教堂裡，我見到了一位非常可愛的姑娘，她剛好是馬蒂歐婁牧師的女兒。她名叫溫妮（Winnie），我邀她外出，她接受了。我明顯地感到，她對我有好印象。但她的姐姐娜曼班多（Nomanpon-

do）卻瞧不上我。她甚至告訴溫妮，像我這樣粗俗、落後的人怎能配上馬蒂歐婁牧師家的女兒呢！爲了證明年輕幼稚的妹妹有多單純，她把我請到她家去吃午飯。這時，我才來姆克凱兹韋尼不久，吃飯還是家裡的習慣，不用刀叉。坐到餐桌上後，這位惡作劇的姐姐給我端來了一個盤子，裡面裝着一只鷄翅。鷄翅還沒有完全煮透，不爛，還有點乾硬，所以，肉仍不易與骨頭脫離。

看着他們拿起刀叉，熟練地使用起來，看了一會，我也慢慢地拿起了我的刀叉，想要切開盤子裡的小鷄翅。一開始，我只是把那小玩意兒在盤子裡撥弄了幾下，希望肉能從骨頭上掉下來，但肉還是牢牢地沾在骨頭上。我就開始用刀切，起先想用叉子先按住它，再切它，但它一下滑開了，刀子噹地一聲切到了盤子上，把我窘死了。我作了再一次努力，又失敗了，此時，我看到孔寶佐的姐姐對我露出了幸災樂禍的笑容，同時又意味深長地看了孔寶佐一眼，似乎在說：『看吧！我說得沒錯吧！』我拼盡全力，一次一次地努力着，汗水浸透了我的後背，但我就是不願用雙手拿起這可惡的東西，我明白，一旦我那樣做，就意味着我失敗了。不用說，那頓中飯我吃不了幾口鷄肉。

事後姐姐告訴妹妹：『如果你愛上這樣一位鄉巴佬，你的一生就完了。』但我很幸運，妹妹並沒有聽姐姐的，她仍然愛我，不管我如何土得掉渣。當然，最後我們還是分道揚鑣，各奔東西了。我離家上學去時，她上了另一所學校，最後她成了一名教師。我們通了幾年

信，後又失去了聯繫。但在她家的那次經歷卻使我下定決心提高自己在餐桌上的禮儀和風度。

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十六歲了，國王決定讓我成爲男人。按科薩傳統，這要通過一條渠道，而且只能通過這條渠道：施割禮。據我所知，未受過割禮的男人不能繼承父親的財產，不能結婚，不能主持部落儀式。事實上，一個未受過割禮的男人是大逆不道的，他根本就不能被算作是男人，而只是一位老男孩。對於科薩人，割禮並不僅僅是一道外科手術；它是一種儀式，代表男人正式走入了社會。它也不僅僅是一種走過場式的匆匆的儀式，而且是一個長達三個月的成人的準備期。作爲一名科薩人，我只有在受了割禮後，才能開始我男人的生活。

實際上，這次複雜的傳統割禮儀式是國王主要爲加斯蒂斯安排的，我們其他二十六人也主要是去陪伴他。新年過後不久，我們就住進了姆巴色河（Mbashe River）邊一座封閉的山谷的兩間草屋裡，它們被稱作蒂哈拉哈（Tyhalarha），是滕布族國王施割禮的傳統之地。草房孤零無依，我們要遠離社會，在這兒住幾個月，接受這個古老的儀式。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刻，能夠參加本族古老的傳統儀式，我心裡感到高興而滿足，準備完成從少年向成年的轉

變。

在割禮正式開始前幾天，我們從河上來到草屋。少年時代的最後這些天裡，大部分時間我都同其它伙伴待在一起，過得非常快樂。草屋與巴那巴卡哈·布雷尹（Banabakahe Blayi）的家相近，他是我們當中最富有和最出名的。他豪爽、開朗，是木棍仗中的常勝將軍，他非常吸引人，他的衆多女友不斷給我們提供各種美味佳餚。雖然他目不識丁，但他是我們中間最聰明的人之一。他給我們講他去約翰尼斯堡旅行的故事，對於我們來說，那兒是一個新奇的地方，我們誰都沒去過。他還給我們講礦上的事，使我們都激動不已，那時我幾乎相信，當一名礦工比當一名國王還有意思。在我們眼中，礦工充滿着神秘；成爲礦工就意味着又強壯，又勇敢；這正是男子漢的形象。許久以後，我認識到，像布雷尹這樣的男孩的誇張故事，使許多年輕人離家出走，到約翰尼斯堡的礦井裡去幹活，而在礦井下，他們常常會失去健康甚至生命。礦工們的生命歷程是短暫的。然而，在那個時候，去礦上幹活幾乎與割禮一樣，成了男人們生活道路上的必經之道，這是一個廣爲流傳的人爲的神話，受益者是礦主，而非勞動人民。

割禮中有一個風俗是在舉行儀式前，受禮者必須做出某種勇敢的謀生之舉。舊時，它可能是殺牛，甚或一次搏鬥，但到我們那時，這一風俗就被搞得有點像惡作劇了。儀式前兩天，我們準備去偷一頭豬。離我們小屋大約一英里左右，有一個農莊，裡面有一座圓棚，養

着一頭粗壯的老豬。爲了不發出任何聲響，以免驚動農民，我們設計了一個圈套，引笨豬上鈎。我們拿了一些非洲人士製啤酒的酒糟，它們有一股濃烈的氣味，豬很喜歡吃。我們在稍離圓棚的地方放了點酒糟，然後再在相當距離的地方再放一點，然後再放一點，一直放到我們的小屋。果然，豬被酒糟的香味吸引了，它跳出圓棚，一路吃着酒糟，漸漸地，喘着粗氣吃到我們小屋前了。它一靠近，我們就馬上逮住了它，把它宰了，刮洗掉了毛，生起火，一邊烤着，一邊就在星光下吃起烤豬肉來了。應該說，這是我今生所吃的最美味的豬肉。

施行割禮的前夜，我們草屋附近要舉行一個載歌載舞的慶祝儀式。附近村子的婦女來到這裡，她們唱，我們舞。音樂慢慢變得快速激烈起來，我們也舞得更狂歡，忘情的舞蹈使我們暫時忘卻了那個即將到來的黎明。

第二天凌晨，星星還掛在天上，我們就開始了準備工作。我們被領到了河邊，在清冷的河水裡洗了個澡，這是一種儀式，表明在受禮前，大家都純潔無瑕。施禮在中午進行。在河邊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我們被要求站成一排。受禮者的父母和親戚遠遠地看着我們，他們中間有國王，還有一些酋長和顧問。除了塗着粘土，我們身上只圍一條布裙。鼓聲一陣緊似一陣地響着，儀式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們坐到了鋪在地上的一條毯子上，並撐開雙腿。我心裡既緊張又焦慮，不知道那個重要的時刻來臨之際，自己會作何反應。作爲科薩男人，我們不能退縮或喊叫；如果這樣做，則是軟弱的標誌，有辱自己男人的名聲。我暗暗下定決心，

不能給自己丟臉，給伙伴們丟臉，給國王丟臉。割禮是對男人勇氣和耐力的考驗；施禮時，不使用痲醉藥，不採取任何減輕痛苦的措施。你只能咬牙忍受，別無選擇。

在我右側稍稍偏遠的地方，我看到一位清瘦的老人，從小帳蓬裡走了出來，跪蹲在第一個受禮的男孩的前面。人群裡掀起一陣小小的騷動，我頓時感到：儀式開始了。老人是來自科卡雷卡蘭（Gcalekaland）的著名的『英格西比』（ingcibi），即割禮專家，他能用一把木柄小刀，一刀就把我們從男孩割成男人。

突然，我聽到第一位男孩高聲叫道：『恩迪英多達！』（Ndiyindoda）（『我是男人了！』）這是訓練時教過的，受過禮後就叫這句話。不久，我聽到加斯蒂斯用悶聲悶氣的聲音也喊出了這句話。我前面還有三位男孩，那時，我的腦子已一片空白，等我突然有了意識時，老人已跪蹲在我的前面了。我直愣愣地看着他的眼睛。他臉無血色，雖然天氣尚冷，臉上也掛着瑩瑩的汗珠。他一語不發，雙指捏住我生殖器的包皮，往前拉了拉，然後另一只手動了動，手裡就多了一柄木柄小刀。他的手動得很快，好像有什麼非人的力量控制着他。我只覺得好像血管裡有火在燃燒，痛得把頭埋在了胸前。也許就過了幾秒鐘，我突然想起自己要克制，猛然就醒悟了過來，喊道：『恩迪英多達！』

我低頭看看，刀口割得好極了，平整整的，像帶了一個小環，但我承認，那時，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因爲其他男孩看起來比我要堅強；他們喊出那句話時，比我更快速，更有

力。雖然很短暫，但疼痛確實使我一時失去了知覺，現在儘管疼痛仍然還在繼續，但我還是盡力掩蓋了自己的痛苦。男孩可以哭，但男人卻只能深藏自己的痛苦。

現在，我已邁出了科薩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我從少年陽光燦爛的綠洲，邁入了成年人陰暗的現實中。往後，我可以結婚，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耕種自己的土地，可以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聚斂財富。我可以加入本地的議事會；別人也會認眞考慮我的話；我也可以影響決策。這次儀式上，我又得了一個名字：達利亨加（Dalibhunga），意指本加（Bunga）的創始人，本加是川斯凱傳統的統治機構。對於傳統的科薩人來說，這個名字比我的前兩個名字：羅利赫拉赫拉和納爾遜更能接受。我也爲自己的新名字自豪，達利亨加，多麼響亮！

包皮割下後，『英格西比』身後的一名助手馬上撿起掉在地上的包皮，把它縫在我們布裙的一角上。我們的傷口敷了一層草藥，草藥的葉子外面多刺，裡面卻很軟。葉子直接貼在了我們的傷口上，它吸收了血和其它分泌物。

割禮結束後，我們又回到了小屋，小屋裡用濕木點燃了一堆火，濕木發出陣陣濃烟。人們認爲烟能加快傷口的癒合。我們仰面躺在烟霧濃濃的草屋裡，一腿平伸，一腿曲起。現在，我們已是『abakhwethu』，即開始邁入男人世界了。一位監護人（amakhantkatha）看護着我們，他向我們解釋邁入成年所應必須遵守的一些規矩。amakhantkatha 的第一件事便

是在我們已被剃淨毛髮的裸體上從頭到腳塗上白泥灰，讓我們變得像個鬼一樣。白泥灰表明我們在儀式中又獲得了新的純潔，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乾泥巴貼在身上那種硬梆梆的感覺。

割禮後的第一夜，半夜時分，『英格西比』的一位助手（或叫 khaukatha）悄悄走進草房，搖醒了每一位男孩。醒來後，他讓我們趁着夜色，找一個蟻穴，各自把我們的包皮埋掉。按傳統的說法，這是爲了能在魔鬼找到它以前，把它藏起來，但從象徵意義上說，我們埋掉的是自己的青春。深夜離開溫暖的小屋，在黑暗中毫無目的地摸索，並不是一件令人愜意的事。但我還是走進了樹林，過了幾分鐘，我把裙子上的包皮拆了下來，並埋在了地裡。此時，我感到自己好像埋葬了少年時期的最後一件遺物，邁過純潔之橋，走到了成年男人的領地。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我們住在兩間草屋裡，十三人一間，等傷口慢慢癒合。我們待在草房裡，積聚着力量，直到一切恢復正常，才又回到原來的社會。如果外出，我們全身要用毯子包住，因爲這段時間，我們的身體不能讓女人見到。這段寧靜的時間裡，我們可以靜靜地思考，爲以後即將到來的成人的種種磨難，作好精神上的準備。在我們重現之日，天一大早，我們就來到姆巴色（Mbashe）河邊，在河水裡洗掉身上的白泥灰。洗乾淨並晾乾後，我們又一次被敷上了泥灰，這一次不是白色的，而是紅色的。按照傳統的做法，敷了紅泥灰

的男孩應與女人睡覺，睡過的女人將來就成了他的妻子，女人要用自己的身體蹭掉男孩身上的泥灰。但是，我是用豬油除下自己身上的泥灰的。

結束獨居生活後，我們住過的草屋和屋裡的所有物件都要付之一炬，這是一種儀式，絕斷了我們與少年生活的最後一絲聯繫。村裡又爲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會，歡迎已經成了男人的我們的歸來。親人、朋友和酋長們都參加了。有人致歡迎詞，有人唱歌，我們每人都得到了禮物。我得到了兩頭小牝牛和四隻羊，我感到自己富裕極了。我以前從未有過什麼東西，現在突然有了自己的財產，這眞是一種醉人的感覺，儘管我的禮物同加斯蒂斯的比起來，眞是小巫見大巫。他作爲一位將來的酋長，整整得到了一大堆牛羊。我並不嫉妒加斯蒂斯，我知道自己不會得到那麼多禮物。他是國王的兒子，而我命裡註定只能作國王的顧問。我覺得自己強大而驕傲。我記得，那天我走路的樣子都是不同的，我昂首挺胸，似乎比以前長高了，腳步也比以前堅定有力了。我雄心勃勃，對將來信心十足，覺得自己一定會腰纏萬貫、身居高位。

然而，我們聽到了梅里吉利（Meliggili）酋長的一席話。他是達林德耶博的兒子，那天的主要講話人。他的話突然擊碎了我彩色的夢。他那神諭般的語言將近六十年來一直縈繞在我耳際。講話開頭，他講了幾句客套話，說今天是多麼光榮的一天，我們繼承了千百年來沿襲的傳統多麼讓人高興。他稱讚了受禮者的溫馴有禮，儀式的成功完美。然後，他話鋒一

轉，正色道：『這兒坐着我們的兒子，年輕、健康、漂亮，他們是科薩族的花朵，是整個民族的驕傲。我們剛剛給他們施行了割禮，並給他們許諾，從此他們將成爲男人，但是，我告訴你們，這是一個空洞、虛幻的許諾，一個永遠兌現不了的許諾。因爲我們科薩人，以及所有非洲黑人，都被人征服了。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做奴隸。我們在自己的土地做佃農。我們虛弱無力，身不由己，對於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命運竟然無力控制。在他們的後半生，在座的年輕人將在白人的礦井下染黑肺，整日不見太陽，最後毀壞健康，天天咳得死去活來，而白人們卻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年輕人將流浪到城裡去，住在窩棚裡，喝着廉價的酒，因爲我們已沒有土地可給他們，供他們生息繁衍。這些年輕人裡會產生酋長，但他卻無力統治，因爲我們沒有賦予他統治的權力；戰士們將偃旗息鼓，因爲他們已失去了戰鬥的目標，手中也沒有了武器；學者們也不育人子弟了，因爲他們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爲了謀生，年輕人不得不整日爲白人們做最簡單、最機械的工作，以此浪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無限前程。我們空空的雙手不能給他們任何東西。今天我們給他們的禮物微不足道，因爲我們不能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這就是：自由和獨立。我知道，卡馬它（Qama－ta）（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它從不睡覺，但我懷疑，從不睡覺的卡馬它也許正在打盹。如果果眞如此，我寧願早死，因爲這樣我可以上天，把他搖醒，告訴他，恩古班庫卡的孩子，科薩族的花朵，正面臨死亡的威脅！

隨着梅里吉利酋長的話語，聽衆變得越來越沉默，而且我想，也變得越來越憤怒。沒有人愛聽他那天講的話。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愛聽。我必須承認，酋長的話除了給我帶來刺激和驚愕以外，更多的是失望和痛苦。我承認，我對他的話不以爲然，認爲這是無知之人的妄言，他竟然認識不到教育的價值，看不到白人給我們國家帶來的種種好處。在那時，我認爲白人並不是壓迫者，而是我們的恩人，因此我覺得酋長太忘恩負義了。他講完話時，我只覺得這位新近上任的酋長毀了我的一天，他的錯誤言論毀壞了我那天驕傲的心情。

但是，不知怎麼地，他的話卻總是在我心底回響。他猶如在我心底種下了一顆種子，雖然在一個長長的冬季裡，我把它掩沒栽了泥土裡，最後，它終於開始發芽成長了。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開始認眞思考這席話，但最終我認識到了，無知的不是酋長，而是我自己。

歡迎會結束後，我走回河邊，凝視着河水，看它蜿蜒流向印度洋。我從未跨過那條河，河那邊的世界我一無所知，平時，它是那麼遙遠，今日，它卻似乎開始向我招喚。太陽快要下山了，我匆匆來到我們曾被隔離獨居的小屋。儘管還在燃燒時它們是被禁止回來看的，但我卻實在頂不住誘惑，要回去看上最後一眼。當我到達這兒時，兩座小屋已只剩下兩堆灰燼了。灰燼裡埋着一個逝去的快樂世界，一個我少年的世界，一個包含了庫奴和姆克凱玆韋尼所有甜蜜和無憂無慮的日子的世界。現在，我已長大成人了，我不會再玩辛提，不會再去偸苞谷，不會再從奶牛肚子底下吸牛奶喝了。我實在不願讓那些日子離我遠去，我感懷自己逝

去的青春。回想起來，那天，我確實還不是一位男人，在以後的幾年裡，也一直沒有成爲眞正的男人。

五

我知道，我與一起受割禮的其它伙伴不一樣，不會在里夫的金礦井下終其一生。國王經常告訴我：『你不能大字不識一個，卻到白人的礦井裡去挖金礦石。』我將來要成爲薩巴塔的顧問，我得受教育。割禮後，我回到了姆克凱兹韋尼，但不久後，我又得告辭了。我將首次渡過姆尼色河，到恩格佐博（Engcobo）地區的克拉克伯里學院上學。

我又要離家遠行，離開自己親人的庇護了，我並沒有恐懼，內心卻充滿了渴望，我想看看自己在姆克色河另一邊更廣闊的世界裡的表現。國王親自駕着自己豪華的福特V八車送我去上學。臨行前，他特意爲我安排了一次慶祝會，慶祝我通過標準六級考試，並被克拉克伯里學院錄取。慶祝會上宰了一隻羊，並舉行了舞會。這是以我名義舉行的第一次慶祝會，我高興極了。慶祝會上，國王贈給了第一雙靴子，它是成人的標誌，也標誌着我即將邁入廣闊的世界。那天晚上，我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儘管它早已光潔閃亮。

克拉克伯里座落在川斯凱地區最古老之一的衛理會教堂的所在地，學院建於一八二五年。我上學時，克拉克伯里是滕布領地非洲子弟的最高學府，國王本人就在這兒上過學，加

斯蒂斯也在這兒上學。它是一所中等學校，同時也是一所師範學院，但也提供更爲實用的課程，如木工、裁剪和製錫工藝。

去克拉克伯里的路上，國王對我的言行提了一些建議，並與我討論了我的前途問題。他要求我的一切言行只能爲薩巴塔和他帶來榮耀。我向他保證，我會的。然後，他向我簡略地提到了C·哈里斯牧師，學院的院長。他解釋說，哈里斯牧師是一名獨特的人；他是一位滕布白人。也就是說，他是白人，但他從內心裡喜愛並了解滕布族及其人民。國王說，等將來薩巴塔長大時，他將把薩巴塔委托給哈里斯牧師，牧師會把他培養成既是一位基督徒，又是一位傳統的統治者。他囑咐我，一定要虛心向哈里斯牧師學習，因爲我負有責任，指導哈里斯牧師即將塑造出來的領導者。

在姆克凱茲韋尼，我曾遇到過許多白人商人和政府官員，包括一些地方行政官和警察。這些人的身份都比較高，國王對他們都待之以禮，但僅僅是客氣，而沒有卑屈的成份；他平等地對待他們，他們也平等地待他。有時，我甚至看到他在訓斥他們。但國王從未教過我，他們在場時我應如何行動，我也僅僅觀察他，然後仿效他。然後，談到哈里斯牧師時，國王卻非常詳細地向我說明了牧師在場時我言行應注意的事項。這是國王首次向我說如此之類的話。他告訴我，我必須像尊敬他一樣尊敬牧師，像服從他一樣服從牧師。

初見克拉克伯里，我吃驚不小，因爲它比姆克凱茲韋尼還更宏偉。學校本身其實不大，

也就二十幾所房子，包括宿舍、圖書館、各類教室，還有私人住宅。建築都是殖民時期風格，優雅別緻。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進了歐式建築，我覺得自己好像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一點不明其中的規則。

國王和我被一起帶到了哈里斯牧師的書房。國王介紹了我，我站起來，與牧師握了手。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與白人握手。牧師熱情友善，對國王極爲尊敬。國王解釋說，我來克拉克伯里是要接受恰當的教育，因爲將來我要成爲國王的一位顧問。他希望牧師關照我一些。牧師點了點頭，並說，克拉克伯里的學生在課後規定要做一些體力工作。他將安排我在他家的花園裡幹活。

會見快結束時，國王向我道別，並給了我一磅零花錢。這是我從未有過的一筆大錢，我覺得自己太富有了。我也向他道別，並向他保證，一定不辜負他的期望。

克拉克伯里是一所滕布學校，建在先王恩古班庫卡所賜與的土地上，而我又是恩古班庫卡先王的子嗣。我確信，在克拉克伯里，自己會像在姆克凱茲韋尼一樣受到人們的尊重。但我悲哀而痛苦地發現，我錯了，在克拉克伯里，我並不被人看作什麼重要人物，而與普通人毫無區別。沒有人知道，甚至根本就無人關心，我是否是著名的恩古班庫卡的後代。我心裡如此引以爲榮的事，他們竟然如此毫不在意。膳宿指導老師迎接我時，竟然沒有吹喇叭歡迎，同學們也竟然沒有向我鞠躬致意。在克拉克伯里，許多男孩都有顯赫的血統，突然，我

不再是獨特的了。對我來說，這確實是重要一課。開始的日子裡，我有些不知所措，克拉克伯里對我的反應不啻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很快認識到，如果我想在克拉克伯里立住腳，那就得憑我的眞本事，而不是出身。我還很快發現了，同學們對我不僅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尊敬，而且，他們許多人都可以在操場上超過我，在課堂上比我聰明。我感到自己要努力了。

第二天便開始上課了，一大早，我與同學們一起爬上臺階，走進第一層的教室。教室裡鋪着打磨過的木板，非常漂亮，平時，我肯定會欣賞不已，但今天是上學的第一天，我穿着從未穿過的新皮靴，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那天，從未穿過任何皮靴的我，走起來像一匹新掌了蹄鐵的馬。走上臺階時，我的皮靴發出了很重的響聲，而且，我還幾次差點滑倒。當我呼呼頓着腳走進教堂時，我注意到，前排的兩位女同學正幸災樂禍地看着我出醜。其中那位漂亮些的女同學還伏在她同伴的耳邊，用我們大家都能淸晰可聞的聲音說道：『這鄉巴佬，鞋都不會穿。』她女伴聽了，噗地一聲笑了出來。我強壓着憤怒和窘迫，裝作沒聽見。

漂亮些的女孩叫瑪索娜（Mathona），她有點自以爲是。那天，我發誓永不與她說話。但是，當我習慣了我的靴子，我受辱的記憶也慢慢淡化以後，我也與她相認了，而且，她還成了我在克拉克伯里時最好的伙伴。她是我一生中第一個眞正的女性朋友，可以與我平等相處，相互信任，互相分享秘密。在許多方面，她是我以後與女性交朋友的典範，因爲只有在她們這類女性面前，我才能放鬆緊繃的神經，承認和暴露自己不願在男人面前暴露的弱點和

憂懼。

我不久就適應了克拉克伯里的生活。我經常參加各種體育活動，但在體育場上的表現卻一直只是中等。我參加體育活動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愛好，而不是爲了獲取榮譽，因爲我也沒任何強項。我使用手工製的木拍子打草地網球，我還在泥地上赤足玩足球。

在克拉克伯里，我第一次受教於受過正規教育的老師。老師中，有幾位受過大學教育的非洲人，這在當時實屬鳳毛麟角。一天，我與瑪索娜一起學習，我告訴她我正擔憂年底時通不過英語和歷史的考試。瑪索娜告訴我不用擔心，因爲我們的女老師格特魯德·恩特拉巴西（Gertrude Ntlabathi）是第一位取得文學學士學位的非洲女性。『她很聰明，不會讓我們不及格的。』瑪索娜說。那時，我還沒有學會不懂裝懂，因爲不明白文學學士究竟是什麼，於是，我就問瑪索娜。『噢，當然。』她鄭重其事地回答：『文學學士是一本很大、很難的書呢！』我信以爲眞地點點頭。

我們還有一位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的非洲老師，叫本·馬拉色拉（BenMahlasela）。我們對他非常敬仰，這不僅是因爲他取得的學術成就，而且還因爲他是一位獨立的人，連對哈里斯牧師也不懼怕。儘管白人教師對哈里斯牧師都低眉順眼，但馬拉色拉先生卻敢毫不懼怕地直闖院長的辦公室，有時連帽子也不脫！他可以平等地與牧師進行討論，還經常與其意見

相左，而其他老師無論對牧師說的什麼都只能唯唯諾諾。儘管我對哈里斯牧師非常敬愛，但看到馬拉色拉先生對他不亢不卑的態度，我心裡還是非常喜愛。在那時候，一位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的黑人看到一位初中畢業的白人時，還得向他致敬。無論你事業多麼成功，黑人的地位還是被認爲比最低等的白人還低。

哈里斯牧師治克拉克伯里以鐵腕著稱，並強調平等意識。從他的領導風格看，別人會以爲克拉克伯里是一所軍事院校，而非師範學校。對校規校紀哪怕是最輕微的觸犯，都會很快受到懲罰。在全校集會上，院長總是表情嚴峻，不苟言笑。當他走進教室或會議室時，學校的教職員工，包括培訓部、初中部和工科部的主任都要站立致敬。

學生們與其說是愛他，還不如說是怕他。然而，在花園裡，我看到了另外一位哈里斯牧師。在哈里斯牧師的花園裡幹活有兩個益處：它使我畢生喜愛園藝，喜愛種植蔬菜；它還使我了解了院長及其家庭。這是與我有親密關係的第一個白人家庭。通過與他們的密切接觸，我看到了哈里斯牧師兩張完全不同的臉；一張是在公開場合的，一張是在私下的。

在哈里斯牧師嚴肅的臉後面，我看到了一個溫柔、慈祥的人。他寬容大度，深信教育對於非洲年輕人的重要性。他常常會在花園裡陷入沉思，思緒似乎飛到非常遙遠的地方。我不願打擾他，因此很少與他交談，但作爲一位畢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事業的人，哈里

斯牧師是我一生中重要的榜樣。

與沉默寡言的哈里斯牧師相反，他的妻子卻是個愛說話的人。她是位可愛的女人，經常到花園來與我聊天。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已無法記起她談話的內容，但我仍然記得她在那些下午時光給我帶來的甜烙餅的滋味。

在克拉克伯里，我經過一個較長的開始階段，慢慢開始步入正常，並很快就加快了學習進度。初中一般要學三年，但我卻用兩年就學完了。別人都認爲我記憶力非凡，但實際上，我僅僅是勤奮而已。我離開克拉克伯里時，即與瑪索娜失去了聯繫。她住在本地，是工讀生。因爲父母親供不起她上學，她就輟學了。她是一個極其聰慧的人，僅僅因爲家境貧寒，就無法全部發揮自己的潛力。這是一個極爲典型的南非人的故事。限制我的同胞的是缺少機會，而不是能力。

我在克拉克伯里的日子裡，眼界拓寬了，儘管我仍不敢說，離開學校時，我已完全是一名思想開放、毫無偏見的年青人了。在那兒的時候，我遇到了來自川斯凱各地的學生，其中有些還來自約翰尼斯堡和巴蘇陀蘭（那時叫賴索托）。我發現，有些來自城市的同學老成而見多識廣，相比之下，自己則顯得有些小家子氣了。儘管在有些方面我會仿效他們，但我從不認爲，像我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男孩與這些見過大世面的人相比。然而，我並不羡慕他們。即使到我離開克拉克伯里之日，從內心裡我還是一名滕布人，我也以自己能像滕布人那

樣思想和行動而自豪。我的根也深深扎進了這片土地，我相信自己會如庇護人希望的那樣，成爲國王的顧問。到那時，我的眼界並沒有超出滕布領地。我覺得，作一名滕布人是全世界最讓人羨慕的事。

六

一九三七年，我十九歲時，與加斯蒂斯一起來到博福特堡一所衛理會學校希爾德敦學院，那兒位於烏姆塔塔西南大約一七五英里。十九世紀，博福斯特堡是所謂的邊境戰爭期間，英軍一系列駐地中的一個。在這次戰爭中，白人居民不斷滲入並有系統地侵奪了不同科薩部落的領地。在一個多世紀的戰鬥中，流傳下了許多英勇的科薩族武士的美名，像馬卡那（Makana）、恩德蘭比（Ndlambe）、山德爾（Sandile）和馬可馬（Maqoma），後者因爲策動反開普殖民當局的戰爭，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被拘禁在羅本島。我到達博福斯特堡時，上一世紀激烈戰鬥留下的痕跡已幾近無存了，我只看到了一個白人城鎮博福斯特堡，這兒，科薩人曾經生活和耕作過。

希爾德敦甚至比克拉克伯里還要氣派得多，當時，它是南半球最大的學校，有在校生一千多，男女同校。學校建在山腰，俯瞰一條碧綠的山谷，有曲徑通至山下，景色比克拉克伯里漂亮迷人多了。殖民式的建築綠藤纏繞，庭院綠樹成蔭，置身校園，一派學術聖地的景

象。與克拉克伯里一樣，希爾德敦是衛理會辦的一所教會學校，以英國學校爲模式，提供基督教和人文科學的教育。

希爾德敦學院的院長是亞瑟·威靈頓（Arthur Wellington）博士。他是一位肥胖且極爲古板的英國人，經常自詡是威靈頓公爵的後代。每次全校大會開始時，威靈頓博士就會走上主席臺，用低沉、沙啞的聲音對大家說：『我是貴族、政治家和將軍威靈頓大公爵的後代，公爵在滑鐵盧打敗了法國人拿破侖，從而爲整個歐洲，也爲你們土人，挽救了文明。』每到此時。我們就會狂熱地鼓掌。那時，對於威靈頓大公爵的後代能降低身份來教育我們這樣的土人，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感激的。那時候，受過教育的英國人是我們的典範；我們竭力使自己像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威靈頓博士這樣的人也在幫助我們向這個方向發展，所以，有人把我們戲稱作『黑色的英國人』。就觀念來說，英國觀念是最高級的，就政府來說，英國政府是最好的，就人來說，英國人是最好的，我們是這麼想的，我們也是被這麼教的。

學校生活非常枯燥。早上六點整起床，六點四十分我們開始吃早飯，早飯是乾麵包沾糖水。飯廳的木板壁上掛着英王喬治六世的畫像，他板着臉，看我們咽着麵包。想在麵包裡塗黃油的人可自己購買，存在廚房裡。可是我只是乾吃麵包。八點，我們在宿舍外面的院子裡集合，接受『檢閱』；我們在原地立正，等女同學從另外分開的宿舍裡來會合。然後去教室，一直到十二點四十五分，然後吃中飯，吃的是玉米粥或玉米豆粉烙成的餅。吃完飯後繼

續上課，直到下午五點，有一個小時的活動和晚飯時間，然後從七點開始晚自習，直到九點三十分熄燈睡覺。

希爾德敦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還有來自巴蘇陀蘭、史瓦濟蘭和博茲瓦那托管地的學子。雖然它主要是一所科薩人的學校，但另外部族的學生也來這兒上學。儘管希爾德敦有來自各地的學生，各地學生之間也有一些交流融合。課餘或周末，來自同一部族的學生一般聚在一起，因此，滕布族的學生就佔成一團，潘多和格利誇部族的學生也自成一體。我們同是科薩人，但我們卻要固守於自己的部族。大多數時候，我一般也照此行事，但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在希爾德敦，我交了我第一位講索薩語的朋友扎查利亞·莫萊提（Zachariah Molete）。在那時，我只覺得自己敢交一位非科薩族人的朋友非常大膽。

我們的動物學老師法蘭克·列本特里里（Frank Lebentlele）也講索薩語，他在學生中威信很高。列本特里里待人隨和，與學生經常打成一片。他比我們大不了多少，經常與我們一起玩，甚至還是學院第一支足球隊中的明 星球員。但列本特里里先生最令我們驚奇的還是他娶了一位烏姆塔塔的科薩女子。這在異族通婚極爲罕見的當時確實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在我認識列本特里里先生以前，我還沒遇到過一位與異族人通婚的人。我們所受的教育一直都是不允許異族通婚，因爲這是愚蠢而危險的行爲。然而，目睹列本特里里先生和她妻子結婚並相親相愛的事實，我那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想開始慢慢消除了，禁錮思想的部族主義的鎖

鏈也鬆懈了。在希爾德敦，我開始有了非洲人，而不僅僅是科薩人或滕布人的自我意識。

我們寢室裡有四十張床，中間有一條過道，兩邊各二十張床，每床之間有一個小衣櫃相隔。我們的生活指導是整天樂呵呵的莫吉蒂尼牧師（S·S·Mokitini），他後來成了第一位南非衛理會黑人主教。莫吉蒂尼牧師也講索薩語，他在同學中很受尊敬，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名現代而開明的人，能夠理解我們的苦楚。

莫吉蒂尼牧師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敢頂撞威靈頓博士。一天晚上，我們樓裡的兩位級長在學校的一條主要街上發生了爭吵。這種事非常少見，因為級長的責任是平息矛盾，而不是挑起矛盾。樓裡於是起了一陣小小的騷亂，莫吉蒂尼牧師聞訊而來以平息事態。然而，剛從鎮裡回來的威靈頓博士不知如何卻知道了此事，當莫吉蒂尼牧師正設法解決爭端時，他突然駕臨。威靈頓博士的出現使我們大為吃驚；他在我們宿舍裡出現極為不尋常，對我們來說，這就好像上帝降臨到了一個窮山村一樣。

威靈頓博士盛氣凌人，一到就要求別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莫吉蒂尼是一位矮小的人，站在威靈頓博士的身邊，頭還不到他肩。他非常尊敬地對院長說：『威靈頓博士，現在一切都處於控制之下，有關的事我明天向您匯報。』但是，威靈頓博士卻並不罷休，他惱怒地說：『不，我現在就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莫吉蒂斯牧師挺起胸膛，堅定地說：『威靈頓博士，我是這兒的生活指導，明天我會向您匯報所發生的事。這就是我想做的一切。』我

們都被眼前發生的事驚呆了。我們從來未見過有人，更不用說是黑人，敢如此頂撞威靈頓博士，我們膽顫心驚地等着威靈頓博士的反應，心想這回可有好瞧的了。可是，威靈頓博士卻好像突然洩氣了，他說了句：『那好。』轉身就走了。這事對我觸動很大，它使我認識到，威靈頓博士並不是像神一樣不可撼動的，莫吉蒂斯牧師也並不是可供人隨便驅使的，黑人也不一定要對白人卑躬屈膝，不管他是否比你地位高。

莫吉蒂斯牧師受到愛戴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把改革引進了學校。所有學生都支持他改善學生伙食和待遇的努力，包括他有關學生自我管理的建議。但他倡議的其中一項改革使一些人感到有些窘迫，特別是像我們這些來自鄉下的學生。這項改革即每周日晚，男女同學一起在食堂進餐。我本人竭力反對這項改革的原因極爲簡單：我還不能熟練使用刀叉。而女人把不能使用這些文明用具的男人看作粗俗的異教徒，我不想再次因爲自己在餐桌邊缺乏風度而紅臉。儘管有人反對，莫吉蒂斯牧師還是成功地組織了男女同學的晚餐聚會，而我則幾乎每個星期日晚上都搞得心情壓抑、半饑半飽。

然而我非常喜歡去運動場。希爾德敦的運動水平比克拉克伯里的要高出許多。到希爾德敦的第一年，我參加不了任何一支體育隊。但到第二年，我的朋友、希爾德敦跳欄跑冠軍洛克·恩扎梅拉（Locke Ndzamela）鼓勵我參加一項新的運動項目：長跑。我個頭偏高、四肢修長，洛克說，這是長跑運動員的理想體型。經他略爲指點，我即開始訓練。在訓練小組

裡，我並不算出色的隊員，但我喜歡長跑這個項目給運動員的磨練和運動員具有的獨立性。長跑時，我的思想可以脫離學校喧鬧的生活，四處飛揚。在訓練長跑的同時，我又參加了一項並不太適合自己的運動：拳擊。當時只不過瞎打一氣，只是在幾年以後，我塊頭長得更結實了一些以後，才開始認眞訓練。

到希爾德敦後第二年。我被莫吉蒂尼牧師和威靈頓院長任命爲級長。級長的責任大小有別，新任的級長級別最低。開始時，我只負責監督下午勞動時擦洗窗戶的同學的工作，每天，我得帶領他們去不同的樓房擦窗戶。

不久，我的級長級就又升了級，這次是負責晚上值勤。這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問題，因爲我可以整夜一眼不閉，但有一件事卻使我很爲難，以致我至今難以忘懷。我們宿舍樓裡沒有廁所，在樓後約一〇〇英尺處才有廁所供學生使用。雨天的晚上，學生半夜醒來想小便時，極易就站在陽臺上往草叢裡一拉了事。沒有人願意睡眼惺忪，走過污泥和草叢，冒雨去上廁所。但是，這一行爲是對校紀的嚴重違反，級長的任務之一便是記下站在陽臺上往下小便的同學的姓名。

一天晚上，正值我值勤，天下着傾盆大雨。值勤中間，我抓住了不少（大約有十五名吧）不想淋着雨而站在陽臺上小便的同學。快天亮時，我看到一個人影從房子裡晃出來，四

面看看無人，便在陽臺一側寬衣方便了。我突然走到他面前，告訴他被抓住了，這時，他轉過頭來，我看清他是另一名級長。從道理上，正如古語所云：『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誰來保護衛士?如果級長自己不遵守紀律，怎麼能指望同學們遵守呢?但是，另一方面，實際上存在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校紀奈何不得級長，因爲級長本人就代表校紀，級長之間互不匯報對方的違紀行爲。然而，我認爲只匯報另外十五人的違紀行爲而不匯報級長的違紀行爲，這不公平，因此，我把記着十五人名字的名單撕毀了。

我在希爾德敦的最後一年，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如夜空中劃過的一顆慧星，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年年底，我們被告知，科薩大詩人克倫·姆恰伊（Krune Mqayi）將來訪問學校。姆恰伊實際上是一位『英邦吉』（imbongi），即讚美詩人，一名口頭的歷史學家，傳誦當代事件和歷史，對其本族人民意義重大。

姆恰伊的來訪被學校當局認作一件大事，他來訪之日全校放假。那天下午，全校師生，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集中在食堂裡，這兒是我們平時舉行集會的場所。食堂一頭設有一個主席臺，主席臺一側有一扇門，通向院長的房子。門本身並無特別之處，但我們把它看作是院長之門，因爲我參加的所有全校集會中，除了院長，沒有人走過那扇門。

突然，那扇門打開了，出來的不是院長，而是一位黑人，身披豹皮披肩，頭戴豹皮帽，

雙手持一桿長矛。過一會，院長也出來了，但看到一位黑人，尤其是一位身着部落服裝的黑人，從那扇門裡出來，這對我們，眞不啻天空裡的一聲暴喝。很難解釋清楚這一幕景象對我們的影響。我們看到了平時自己從不敢想像的景況，眼前的這一幕似乎把世界倒轉了。當姆恰伊與院長並排坐到臺上時，我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了。

但是，當姆恰伊站起來講話時，我承認自己有些失望。他的大名對我早已如雷灌耳，我的腦海裡也早已描繪了無數幅他的圖像。憑我年輕人的想像力，像姆恰伊這樣的科薩英雄應該高大、嚴峻而智慧。但是，姆恰伊的長相並不十分出衆，除了那身裝束，他實在是非常普通。他開始用科薩語講話，語調緩慢，並不時停頓，以找到確切的詞，找到後，又結結巴巴地說過去。

講了一會，他爲了表明一個意思，舉了一下長矛，長矛剛好碰到了他頭頂拉幕布的鐵絲，發出一聲刺耳的聲音，幕布也動了一下。詩人於是上下看了看長矛和幕布鐵絲幾眼，然後開始在臺上踱步，陷入了沉思。就在一會前，姆恰伊顯得有些反應遲鈍，但現在他卻突然興奮了起來。大約過了一分鐘，他停止了踱步，面對我們，鄭重地說，剛才的事件（指長矛碰擊鐵絲）就代表了非洲和歐洲文化之間的衝突。他提高聲音，繼續說道：『長矛就代表了光榮而眞正的非洲歷史，它代表了作爲武士和作爲藝術家的非洲人。』然後，他抬頭一指幕布鐵絲：『這金屬絲就是西方商品的一個代表，精巧但冷酷，聰明但鐵石心腸。』

他繼續說：『我所談的並不是一件骨器與一件鐵器碰撞這件事，也並不是兩種不同文化碰撞這一事件，我這兒談的是一種根植於斯的、優秀的東西與一種來自域外的、劣質的東西的激烈撞擊。我們不能讓那些對我們文化不屑一顧的外國人占領我們的國家。我預言，將來某一天，團結的非洲人的力量定能挫敗外來的侵略者。我們侍奉那個西方異教的上帝的時間太久了。我們將奮起，掙脫外國人加在我們身上的鎖鏈。』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敢當着院長和其他白人的面，如此大膽地評說這麼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實在是絲毫不敢涉及的禁區），簡直是膽大包天。但是，他的話觸動了我們，我開始改變對威靈頓博士一類人的看法，原先我一直毫不懷疑地把他們看作自己的施恩者。

接着，姆恰伊改變話題，開始朗頌他著名的長詩。詩中，他把天上的星辰比喻爲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他在臺上來回走動，長矛不時揮動，指向天空，他說，對於歐洲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我把你們比作銀河中的衆星，你們構成了宇宙中最大的星系，你們高高在上，你們貪婪無足，你們互相嫉妒，你們富足奢華，你們卻還爭奪不止。』然後，他把一些星辰歸於亞洲各族，一些星辰歸於南北美各族。接着他開始說非洲，他把非洲大陸分成一些不同的國度。在給不同部族劃給了各自的星辰後，他突然頓了一頓。原來，他一直在臺上手持長矛，手舞足蹈，抑揚頓挫地朗頌他的詩篇，現在，他突然佇立原地，然後放低聲音。

『現在，輪到你了。哦，偉大的科薩族。』他說道，同時，慢慢彎下雙膝，跪在臺上：『我把她給你，我把這顆最明亮、最光輝的星星，這顆啓明星，給你，因爲你是一個驕傲而強大的民族。啓明星，歲月的星星，閱盡人類滄桑和繁華的星星。』朗頌至此，他把頭低埋進了胸膛。此時，會場上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歡呼。我記得當時自己根本就不想停止鼓掌。那時，驕傲之情灌滿了我的胸腔，當然，這種驕傲之情來自自己是一名科薩人，而不是因爲自己是一名非洲人。我記得，當時我就覺得自己像神的選民。

我在內心激動的同時，又感到了矛盾。姆恰伊在講演中，從一個包含了所有非洲人的更民族化的問題，轉到了一個只對科薩人（他本是一位科薩人）的更狹隘的問題。當時，我在希爾德敦的生活行將結束，腦子裡充滿了各種新奇而互相矛盾的觀念。我開始認識到，非洲各族在許多方面具有共同點，然而，偉大的姆恰伊最讚美的還是科薩族。我還認識到，非洲人可以與白人平起平坐，然而，我還不得不從白人那裡企求恩惠，仰承他們的鼻息。從某個角度說，姆恰伊話題的轉變也是我當時思想的反映，因爲我內心總是激蕩着兩股感情，爲自己是一名科薩人而驕傲，同時又與其他非洲人有血濃於水的親情。但是，直到年底我離開希爾德敦時，我還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科薩人，其次才是一名非洲人。

七

直到一九六〇年，位於希爾德敦約二十英里處艾麗斯市的黑爾堡大學一直是南非黑人唯一的高等教育中心。這兒也是全非洲大陸非洲學者們的學術聖地。對於一名年輕的非洲學生來說，黑爾堡猶如牛津或劍橋，哈佛或耶魯，是一個令人夢寐以求的地方。

國王非常希望我能上黑爾堡上學，很幸運，我被錄取了。就在我馬上要去黑爾堡上學前，國王給我買了我的第一套西服。這是一套雙排釦的灰西服。我穿上新衣服，不僅覺得自己頓時上下煥然一新，而且也覺得自己長大了。我二十一歲，在我的感覺裡，黑爾堡已沒有比我穿得更漂亮的人了。

我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成功。我很高興，國王的本部落的一位成員可以獲得大學學位了。加斯蒂斯沒有與我一起上黑爾堡，他還繼續待在希爾德敦，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加斯蒂斯貪玩，不愛學習，他是另外方面的專家。

黑爾堡一九一六年由蘇格蘭傳教士所建，這兒是十九世紀東開普地區最大的邊境城堡。城堡建在岩基上，城外秋邁河（Tyumie River）蜿蜒環繞，地勢極爲有利。英國人正是憑此打敗了英勇的科薩武士、拉拉比族最後一位大酋長山代爾。英國人在一八七八年的一次後期邊境戰中最終征服了山代爾。

黑爾堡僅有一五〇名學生，而且，我早已認識了十幾位來自克拉克伯里和希爾德敦的學生。其中一位就是K·D·馬坦齊馬。他身材修長，充滿自信。K·D·此時已上三年級了，他把新來的我置於他的保護之下。我就像曾經仰望加斯蒂斯一樣仰望他。

我們兩人都是衛理會教徒，因此，我被安排進了他的宿舍。這是一幢衛理會房子，是幢漂亮的二層樓，建在校園的邊沿。在他的監督指導下，我與他一起去附近拉夫戴（Loveday）的教堂，一起踢足球。他是一名優秀的足球運動員，我經常聽他的意見。國王不願意給在校讀書的孩子供應多少錢，因此，如果沒有K·D·的慷慨贈與，我經常會身無分文。像國王一樣，他認爲我將來應作薩巴塔的顧問，因此，他鼓勵我去學法律。

黑爾堡像克拉克伯里、希爾德敦一樣，都是教會學校。學校裡的老師一般都竭力規勸學生遵奉上帝和政府，感激教會和政府給他們提供的教育機會。學校因爲其態度和行爲中的殖民主義色彩而經常受抨擊。然而，儘管這些學校有濃重的殖民者的色彩，但我仍然相信，它們的功大於過。傳教士在政府尚無能力之時建起並主持這些學校。教會學校雖然道德上比較僵化，但與政府學校狹隘的種族論調一統天下的學術空氣相比，其學術空氣要開放得多。

黑爾堡也是許多非洲大陸最爲傑出的學者的搖籃和家園。Z·K·馬修斯（Mathews）教

授便是非洲知識分子的典範。他出身於礦工家庭，年輕時深受布克爾·華盛頓自傳的影響。在其名爲《出身於奴隸》的自傳中，華盛頓主張通過努力工作和忍讓達到成功。在黑爾堡時，Z·K教社會人類學和非洲法，他對政府社會政策的直率而猛烈的批評常使我們感到震驚。

D·D·T·賈巴夫教授則幾乎成了黑爾堡的代名詞。他是一九一六年黑爾堡大學創辦時的第一位教員。賈巴夫教授在倫敦大學獲得了英語學士學位，這在當時極爲罕見。在黑爾堡，賈巴夫教授教科薩語，有時，他也教拉丁語、歷史和人類學。他對科薩語和科薩歷史的了解無與倫比。科薩族譜和部族歷史在他如數家珍，他甚至能告訴我一些我也未聞的我父親的軼事。他爲爭取非洲人的權利四處奔走，後來擔任了一九三六年成立的全非洲人大會的第一任主席，反對國會擬於通過的結束東開普地區共同選舉人名冊制度的議案。

我記得，有一次我坐火車從黑爾堡去烏姆塔塔。當然坐在供非洲人坐的車廂。白人檢票員來查票時，看到我是從艾利斯（黑爾堡所在地）上的車，便打量了我一番，問我：『你來自賈巴夫的學校？』我不知所措地遲疑了一下，然後點頭稱是，檢票員臉上頓時掛滿了笑容，嘴裡說着賈巴夫是個好人之類的話，很愉快地給我剪了票。

第一學年，我學英語、人類學、政治學、土著人管理和羅馬荷蘭法。土著人管理學的是

與非洲人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是所有想在土著人事務部工作的人的必修課。儘管K·D·建議我讀法律，但我自己心裡卻想着要做一名翻譯或在土著人事務部謀個職。那時，在政府裡謀個公務員的職務對非洲人來說是件最爲光彩的事。在農村地區，地方行政長官的翻譯被認爲是僅次於長官的二號人物，舉足輕重。第二年，黑爾堡開設了門翻譯課，教師是一名資深的退休法庭翻譯，我便成了最早幾名報名上他的課的學生中的一員。

黑爾堡精英匯聚，但也免不了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老生欺侮新生的現象。高年級學生時常對低年級學生進行欺侮。我剛到學校時，有一次我在校園裡遠遠地看到了加馬利爾·沃巴扎（Gamaliel Vabaza）。在克拉克伯里時，我認識他，他比我年長幾歲，我熱情地向他打了聲招呼。但沃巴扎非常冷淡，一副高人一等的樣子，他頗爲不屑地向我提出，我應該待在新生宿舍裡。沃巴扎告訴我，雖然他已是高年級學生，不住在新生宿舍裡，但他還是新生宿舍樓委會的委員。我覺得這有些奇怪，簡直太不民主了，但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那之後不久的一天晚上，一群新生就在討論，樓委會裡沒有本樓一名學生，而且根本就沒有一名新生代表。我們決定，應拋棄傳統的做法，重新民主選舉一個樓委會，由新老學生的兩部分人組成。我們在私下秘密策劃，說服了樓裡的所有成員，在幾星期之內，選出了自己的樓委會，並擊敗了高年級同學。我自己也是此事的組織者之一，並被選入了新選出的樓委會。

但是，高年級學生並不是能夠如此輕易被征服的。他們不會允許一群膽大妄為的新生來支使他們。他們舉行了一次集會，會上，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雷克斯·邊戴恩（Rex Dedane）〔也叫雷克斯特·特納（Rexter Turner）〕站起來說：『這幫新生做得太過份了！我們高年級的學生怎麼能聽任像曼德拉那樣來自鄉下的土包子指使呢！那傢伙甚至連英語都說不好！』然後他開始裝出一口格卡雷卡口音，學我說英語，在場的人發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笑聲。他的惡意攻擊使我們更加堅定了決心。現在我們新生已占據了樓委會，我們給高年級學生安排最令人討厭的工作。這對於他們來說，確實是一件丟盡臉面的事。

樓長希林（Shilling）牧師獲知此事，把我們一起叫到了他辦公室。我們覺得自己有理，準備決不屈服。會見中，邊戴恩要求樓長制服我們，在講話中，他突然失去控制，哭出了聲。樓長要求我們妥協一下。但是我們再次表示不退讓。與多數欺人者一樣，邊戴恩其實非常脆弱。我們告訴樓長，如果他真對我們採取強制措施，那我們所有人將辭去樓委會委員的職務，從此，樓委會將失去它原先的公正和權威性。樓長認識到我們是正確的，最後他完全妥協了。我們經過艱苦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這是我第一次與當局作鬥爭，我感到了正義和權利賦予的力量。但是，在我以後反對黑爾堡當局的鬥爭中，卻沒有這麼幸運。

黑爾堡的學生並不是整天泡在書堆裡的。在黑爾堡時，我比在希爾德敦更積極地參加體

育活動。這有兩方面因素：作爲一名運動員，我身體發育成熟了，比以前更壯了。另外，也許更重要的是，黑爾堡比希爾德敦小得多，我的對手很少。在黑爾堡，我能參加校內的足球比賽和越野跑。我發現，長跑與我參加的其它項目比起來，訓練比天賦起的作用更大，我可以用勤奮和訓練來彌補我先天的不足。我把這一經驗推而廣之，運用到了別處。即使在做學生時，我就見到了許多天賦頗佳的年輕人，由於缺乏耐心和毅力，不願做必要而細緻的準備工作，因而總是湮於無聞。

在黑爾堡，我還參加了戲劇小組，有一次還在一齣有關亞伯拉罕·林肯的劇中扮演了角色，這個戲的劇本是由我的同學林肯·姆肯坦恩（LincolnMkentane）改編的。姆肯坦恩來自一個傑出的川斯凱家庭，家庭裡出過許多牧師和老師，他是我須仰望的一人。從身材上看，他是黑爾堡唯一高過我的學生。在這齣戲中，姆肯坦恩出演了主角林肯，我出演了行刺林肯的殺手約翰·威爾克斯·布思。姆肯坦恩對林肯的刻劃氣勢磅薄，非常成功，特別是當他演到林肯著名的蓋茲堡演說時，激動的觀衆全體起立，爲他鼓掌。我演的是一個小角色，記憶中已淡忘了，只記得我成了千人所指的對象，我演的那個角色冒天下之大不韙，受到了衆人的譴責。

我還加入了學生基督教聯盟，星期天到附近的村鎮教《聖經》。與我一起參加這一活動的同學中，有一位是我在足球場上認識的，他是一名嚴肅的青年自然科學學者，來自川斯凱

的蓬多蘭（Pondoland），名叫奧利佛·坦博（Oliver Tambo）。他才思敏捷，思想深刻，能言善辯，從不像我們一樣人云亦云。奧利佛住在貝達樓，這是一座英國聖公會的宿舍樓，雖然我們在黑爾堡時接觸並不多，但我明白他將來必負大任。

星期天，我們常常去艾利斯鎮玩，在鎮上唯一一家飯店阿馬托拉（Ama－tola）裡吃飯。阿馬托拉是一家白人飯店，那時，黑人不能直接從前門走進，更不用說在大堂裡吃飯了。於是，我們只能掏光腰包，從旁邊的廚房門裡進去，帶着自己的碗和盤，要上所要的食物，蹲在飯店後面的地上吃飯。

在黑爾堡，我不僅學會了多種運動，而且還學會了另一項運動科學：跳舞廳舞。我們就着一架破唱機發出的音樂聲，在食堂的地板上練起了狐步舞和華爾茲，每人輪流作男伴和女伴。我們心中的偶像是世界舞廳舞冠軍維克多·西爾維斯特（Victor Sylvester）。我們的指導老師斯莫利爾·休德拉（Smallie Siundla）是本校學生，頗具西爾維斯特之風，只不過比他年輕。

鎮上有一家舞廳，名叫恩澤拉曼茲（Ntselamanzi），當地上流社會的黑人就去那兒跳舞和喝飲料，但它對在校生是絕對禁止的。一天晚上，渴望與女性練習舞步的我們穿上了西服，悄悄溜出寢室，走進了舞廳。這是一個豪華的場所，我覺得非常新奇刺激。

在舞池中，我看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輕姑娘。我走到她跟前，很禮貌地邀請她共舞。

她答應了，並站了起來，與我跳起了優美的狐步舞。我們配合得很默契，我想像得出來，我們是舞池中很惹人注目的一對。幾分鐘後，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告訴我，她是『博克韋夫人』。我一聽，差點想扔了她的手馬上逃離舞廳。博克韋博士是黑爾堡的名教授之一。穿過舞池，我看到他正同他的小舅子Z·K·馬修斯教授聊天。我停下舞步，連聲向博克韋夫人道歉。然後，乖乖地把她帶回她丈夫及其大名鼎鼎的同伴那兒，在他們火辣辣的眼光下，倉惶退回我同學那兒。顯然，我已違反了黑爾堡的校規，但主管紀律的馬修斯教授從未對我說過什麼。他容忍了許多年輕人因興之所致而犯下的小小違紀行爲，只要他們勤奮學習。恩澤拉曼茲之夜後的幾星期內，我學習的用功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黑爾堡在學術和生活上都比較講究，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新奇的事。以西方標準衡量，黑爾堡的排場也許根本算不上什麼，但對我這樣的鄉下男孩來說，確實有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的新奇和尷尬。例如，在黑爾堡，我第一次穿上了睡衣睡褲。開始時，我覺得這玩意又難看又不舒服，但我不久就習慣了。在黑爾堡，我還第一次使用了牙刷和牙膏。在家裡時，我們使用一種植物灰漂白牙齒，用一種小牙簽剔牙。廁所裡的抽水馬桶和熱水淋浴也使我感到很新奇。我還第一次使用了香皂，在家裡那麼多年，我一直用藍肥皀。

也許是由於這些講究的緣故，我竟懷念起孩提時代那些純樸的樂趣了。有這種心情的人不止我一個，我們這些有着共同情趣的人聚在一起，重新玩起了童年時常玩的一種遊戲，我

們偷偷爬進大學裡的苞谷地，偷來苞谷，並把它們烤熟吃。晚上，我們偷偷溜進學校的玉米地，在裡面升一堆火。大家圍着火坐定，一邊吃着烤苞谷，一邊講故事，無邊無際地說笑打鬧。我們並不是肚子餓了才去這麼做的，而只是爲了體驗冒險、友愛的精神，重溫孩提時的種種樂趣。我們吹噓着以往自己取得了如何如何的豐功偉績，吹噓着自己體育項目如何如何了不起，還誇下海口，說畢業後自己將要如何如何掙大錢。儘管我感到自己是一名老成的年青人了，但我仍是一位鄉下的孩子，懷念在鄉下做孩子時的種種樂趣。

儘管黑爾堡如遠離塵世的世外桃源一般平靜，但我們還是極爲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展。我與大多數同班同學一樣，是英國的強烈支持者。我們非常地高興，我第一學年結束時來給我們學校畢業生作畢業演說的，是南非支持英國派的代表，前總理簡·斯馬茲（Jan Smutz），黑爾堡能接待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對我們是一種殊榮。斯馬茲當時正在全國各地四處奔走，鼓吹南非對德宣戰。而當時的總理J·B·赫爾佐格（Hertzog）則主張中立。我懷着極大的興趣，想看看斯馬茲這樣的世界性人物是什麼樣子。

儘管三年前斯馬茲力主取消了開普省共同投票人名單中最後一名非洲投票人，但我仍然覺得他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幫助建立了國聯，在國際上享有很高聲譽，在當時我的心中，這比他在國內粗暴壓制非洲人的權利顯得更重要。

斯馬茲在黑爾堡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支持英國，打擊德國的重要性並指明，英國代表了南非所持的相同的西方價値觀。那次講話的具體細節我已記不淸了，我只記得他的英語說得與我一樣糟！儘管如此，當時我和同學一起還是衷心地爲斯馬茲將軍鼓掌喝采。我在歡呼斯馬茲呼籲爲歐洲自由而戰的同時，卻忘了我們在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國度裡被剝奪了自由。

斯馬茲的講話正符合黑爾堡裡多數人的意見。每天晚上，衛理會教堂的看門人都會向我們分析歐洲的軍事形勢。深夜，我們圍着一臺舊收音機，收聽BBC播放的丘吉爾激動人心的講話。但是，儘管我們支持斯馬茲的觀點，他的訪問也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在一次討論中，我的一位同學、一直被認爲才智過人的恩雅西·孔吉薩（Nyathi Khongisa）卻譴責斯馬茲是一位種族主義者。他說，我們盡可以把自己看作『黑色的英國人』，但英國確實在使我們『文明』的同時壓迫了我們。他說，無論兩個白人集團之間如何對立，在面對黑人的挑戰時，他們都會站在一起。孔吉薩的觀點使我們大爲吃驚，在那時，我把這看作是危險的激進主義。一位同學在我耳旁悄悄說，恩雅西是一名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這一組織我隱隱約約有所耳聞，但了解得很少。

在黑爾堡第二年時，我邀請我的好友保羅·馬哈班（Paul Mahabane）一起在川斯凱度寒假。保羅來自布隆方丹（Bloamfontein），在黑爾堡，他是一位著名人物，這主要是由於他

曾兩任非洲民族議會總書記的父親扎會斯·馬哈班（Zaccheus Mahabane）牧師，保羅與該組織的關係（對於該組織，我仍然知之甚少），使他獲得了反叛者的稱號。

假期中有一天，我們一塊去川斯凱的首府烏姆塔塔玩。烏姆塔塔那時還只有幾條簡陋的街道和幾所政府的建築。當我倆站在郵局前面時，我們看到一位當地的行政長官、一位六十歲左右的白人男子朝我們走來，他走到保羅面前，要保羅進郵局爲他買幾張郵票。然後他又抽出一張鈔票遞給保羅，作爲他的報酬。保羅斷然拒絕了。地方官惱怒了。『你知道我是誰呀？』他滿臉怒色地問道。馬哈班平靜地答道：『沒有必要知道你是誰，況且我也知道你是誰。』地方官問保羅：『你知道我是誰呢？』保羅一字一句地答道：『我知道你是流氓！』地方官如屁股上被燙了一下，頓時勃然大怒，他威脅道：『你會嘗到苦頭的。』然後轉身走了。

我承認，對保羅的舉動我當時感到極不舒服。我欽佩他的勇氣，但我也感到很不安，因爲地方長官可能知道我們是誰。如果我倆的位置交換一下，地方官也向我提出了相同的要求，我承認，我會按他說的去做，然後忘掉一切。然而，儘管我會與他做得不一樣，我對保羅的所作所爲我仍然很敬佩。這件事在我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慢慢地，我開始明白，並不是所有的事都是一成不變的。我開始認識到，對於南非黑人們每天得遭到的受盡欺辱的事情，我不必硬着頭皮忍受下來。

那個假期後，我過了年就早早回到學校，心中充滿了新奇的力量。但是，雖然我心中已有了覺醒的意識，但我所傾力關心的並不是戰爭或政治。我正潛心復習功課，準備十月份的考試。我想像，一年後自己就可以像聰明的格特魯德·恩特拉巴西一樣，獲得學士學位了。我覺得，一個大學文憑不僅是一塊通向上流社會的敲門磚而且還是走向經濟成功的通行證。克爾博士、賈巴夫教授和馬修斯教授都一再告訴我們，作爲黑爾堡的畢業生，我們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整個世界都在我腳下。

作爲一名大學學士，我最終就能使母親重新獲得父親去世後失去的財富和特權。我會在庫奴爲她建一個像樣的家，家周圍有一個帶花園的院子，房子裡有現代的傢俱和各種用具。我會使母親和姐妹們過上舒服的日子，買得起她們想買而一直買不起的東西。這正是我的夢想，這一夢想眼看垂手可成了。

那年，我被提名爲學生代表委員會的代表，該委員會是黑爾堡的最高學生組織。我並不知道，圍繞一次學生選舉所發生的事件會改變我的人生道路。學生代表委員會的選舉在這一年學期末舉行，當時，我正在準備考試。按黑爾堡學校章程的規定，要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委員會的六名委員。選舉前不久，學生召開了一次全校學生大會，討論有關選舉問題，並讓學生提一些意見。全體學生一致認爲，學校的伙食質量太差，學生代表委員會的權力需要擴大，否則，它不過是學校當局的一個橡皮圖章而已。

我同意這兩項動議，當多數學生投票同意杯葛選舉，促使學校當局同意學生的要求時，我也投了贊成票。

這次會議後不久，原定的選舉在食堂裡舉行。大部分同學抵制了這次選舉，但有二十五名同學，約占學生總數的六分之一，參加了選舉。這二十五名學生投票選舉產生了由六人組成的學生代表委員會。我被選入代表委員會。同一天，缺席選舉產生的六名學生代表委員會委員開會討論這次事件。會上，我們一致決定向校方遞交辭職信，理由是：我們支持這次杯葛，而且，選舉沒有獲得多數學生的信任和支持。會後，我們起草了一封辭職信，並把它交給了校長克爾博士。

但克爾博士很聰明。他接受了我們的辭呈，但同時又宣布，第二天晚餐時間在食堂再次進行選舉。這就保證了所有學生都將在場，也就沒有理由說學生代表委員會沒有得到全體學生的支持了。那天晚上，所有學生都在場，選舉如校長事先安排的如期進行，但參加投票的仍是原來那二十五人，選出的學生代表委員會仍是原來的六人。看起來好像我們繞了一個彎，又回到了原處。

這次，我們六人開始坐下來認眞地討論，大家的觀點並不相同。我的五位同事認爲，從技術角度講，我們是在一次全體同學都出席的選舉中被選出的，因此，我們不能再認爲自己不代表全體學生了。他們主張，現在我們應該接受我們的職位了。我反對他們的觀點，認爲

實際上一切都沒有改變；雖然所有同學都在場，但大多數沒有投票，所以，說我們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從道德上是不正確的。我還主張，我們行動的立足點應是受到多數同學支持的杯葛決議。作爲學生，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證決議的實施，我認爲，我們最初的目標不應受校方所設置的騙局的破壞。但是，我說服不了我的同事，於是，我第二次提出辭職。我是六人中唯一提出辭職的。

第二天，校長克爾博士召見了我。克爾博士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實質上是黑爾堡的創始人，各方人士都對他極爲尊敬。克爾博士向我平靜地回顧了過去幾天事態的發展。然後，他要求我重新考慮一下我的辭職決定。我告訴他，我不會重新考慮。但克爾博士又耐心地告訴我不要急躁，晚上回去仔細想想，第二天才把我的最後決定告訴他。然後，他警告我，他不會讓他的學生做事不負責任，如果我堅持辭職，他將把我從黑爾堡開除出去。

與克爾博士的見面使我產生了動搖，整個晚上，我輾轉難眠。我從未作過如此關係重大的決定。睡覺前，我請教了我的朋友和導師K·D·，他的觀點非常明確，認爲這是一件有關原則的事，我辭職是對的，不能向克爾博士屈服。那時，我畏懼K·D·勝過克爾博士。我謝了謝K·D·，然後回到自己房間睡覺去了。

儘管我認爲自己的所作所爲在道義上是正確的；但我仍然不敢肯定怎樣做才合適。我在懷疑，我是不是在爲一個無關緊要的道德原則而犧牲自己呢？我覺得，讓我去爲了自己的利

益而犧牲我認爲自己應對同學負的責任，我實在做不出來。我已經選擇了一次自己的立場了，我不想在同學的眼裡成爲一名言行不一的騙子。但同時，我確實又不想葬送我在黑爾堡的前程。

第二天早晨，走進克爾博士辦公室時，我心裡還一直七上八下。但是他開口問我的決定時，我突然下定了決心。我告訴他，我不能待在學生代表委員會。克爾博士看來被我的回答驚嚇了，他沉思了一會，然後說：『很好。當然，這是你自己的決定。我也考慮了幾次，我建議你：如果你到時答應加入學生代表委員會，明年你可以回黑爾堡來。你有一個夏天的考慮時間，曼德拉先生！』

說實話，對克爾博士的答覆，我自己也有些感到驚奇。我曾想過，離開黑爾堡是愚蠢的，但當他要求我妥協時，我卻實在不能答應。我內心深處的固執此時顯露了出來。雖然我欣賞克爾博士的立場及其給我另外一次機會的決定，但他對我顯示的絕對權力讓我認識到，在把握自己的命運時，我是多麼無力啊！如果我自己願意，我應該有權力從學生代表委員會辭職。這種不公平的感覺一直在我心頭翻騰，我開始認識到，克爾博士並不是我們的恩人，而是一位鐵石心腸的獨裁者。年底，我心情抑鬱，心事重重地離開了黑爾堡。

八

以前，我每次回到姆克凱兹韋尼，都帶着輕鬆而愉快的心情。這次卻不同了。參加完考試後，我回到了姆克凱兹韋尼，並告知了國王黑爾堡發生的一切。國王聽後極爲憤怒，他不能理解我所作所爲的理由。他認爲這簡直是發瘋。沒有聽我的辯解，他就粗暴地告訴我，要我在秋季回黑爾堡，聽從校長的發落，不管校長說什麼。他的語氣不容我有商量的餘地。我不與國王辯解；與我的監護人爭吵是不尊敬也是無益的。我決定讓這事放在一邊再說吧！

加斯蒂斯也已回到了姆克凱兹韋尼，再次重逢使我們倆都極爲高興。不管我們倆分別時間多長，一見面，兒時的兄弟之情就會回到我們倆之間。一年前，他已離開學校，在皇家礦業公司謀了一個小職員的職。加斯蒂斯喜歡上班，不喜歡上學，見到我時，他就給我講他辦公室裡的各種趣事和這些年來他遇到的新鮮事。

不到幾天，我就恢復了在家時的舊生活。我幫助國王做一些事，如照顧畜群，幫他處理與其它酋長的關係，這些事我以前都做過。儘管表面上看，一切都已恢復了正常，但這種似乎平靜的生活時時在逼迫搖擺不定的我作出選擇。我心神不定，無法投入與我以前學習生活完全不同的舊生活中。

回家後幾周，國王召見了加斯蒂斯和我。走進國王的房子時，我們發現他滿臉嚴肅。他

單刀直入地說：『孩子們，我怕我在這個世界的日子已不長了，在我去見列祖列宗之前，我有義務安排好我兩個孩子的婚事。因此，我要給你們倆辦婚事。』

這席話使我們倆大吃一驚，我倆頓時陷入極度的沮喪。我們睜着驚恐的眼睛，焦灼、無助地對視着。國王繼續說，新娘子來自兩家體面的家庭。加斯蒂斯的新娘子是一位地方酋長卡利帕（Kalipa）的女兒，羅利赫拉赫拉（國王總是這麼叫我）的新娘則是一位滕布酋長的女兒。他還說，加斯蒂斯的婚禮將立即舉行，而我的則將等我明年年底獲得學位後馬上舉行。國王還告訴我們，『羅伯拉』（Lobola）即彩禮（一般爲牛）馬上要付給新娘子的父親。加斯蒂斯的『羅伯拉』將從部落的公有畜群裡出，我的『羅伯拉』則從國王本人的畜群裡出。對於國王來說，事情已這麼確定了。

加斯蒂斯和我一語不發。這兒並不是我們說話的地方。但在離開前，我問了一句，既然我將等到畢業後才結婚，爲什麼不到那時才選擇新娘呢？國王的回答不容我有商量的餘地：新娘已選下了，彩禮也付了，事情已定了。

走出國王的房子時，加斯蒂斯和我都低垂着頭，滿臉不高興。我們都知道，國王的做法順乎滕布的法律和風俗。他的本意是好的：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爲我們倆安排一個家。由他來安排我倆的婚事也名正言順，而且我們也一直覺得他總有一天會這麼做的。但是，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國王爲我們安排婚事突然從一種抽象的可能性成了現實。新娘也不是杜撰或想

像中的人，而是我們熟識的有血有肉的姑娘。

我非常尊重國王爲我選定的姑娘及其家庭，但是，如果說她是我夢中的新娘，那我則是不誠實的。她門庭顯赫，受人尊敬；而且身材高挑，舉止高雅；但是，她與加斯蒂斯相戀已久。國王不會知道此事的，因爲父母和老人很少會知道年輕人的浪漫故事。孩子們會一直隱瞞這些事，不讓他們知道。顯然，國王爲我相中的新娘對這件婚事，不會比我更情願。

我應該指出，那時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我的社會意識強。也就是說，政治上我仍然還沒有成熟，容易輕信，讓我去反抗某種制度似乎並不可能。但是，不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讓我去反抗傳統，我卻能做到。國王想不到，他給我提供的教育機會卻把我教育成去反對包辦婚姻之類的傳統習俗了。我已上了好多年的師範學院和大學，學校裡都有女生，我已戀愛過好多次，也有了不少女朋友。在戀愛上，教育使我打開了眼界。儘管我認爲有必要遵從國王和其它滕布習俗，但對於這點，我卻不能讓步。我想自己選擇新娘。

我去見了皇后，把這事告訴了她。我明白，我不能直接告訴她我不想讓國王給自己找新娘，這樣顯然會使她對我失去同情心。因此，我告訴她，事實上我希望與另一位姑娘結婚，她是皇后的親戚，我說我希望與她結婚。這位姑娘確實非常迷人，但我根本不知道她是否喜歡我。我說我希望一畢業就與她結婚。事後回想，我不知這是否僅是一個托詞，但比起國王爲我安排的婚事來，這確實不失爲一種好的選擇。皇后非常善解人意，在這件事情上，她實

際上站在了我一邊。但國王主意已定，他不容任何人商量，也不想改變主意。

此時，我感到自己沒有別的選擇了。看來，我已無法逃避這樁婚事，這樁在我看來不公平、不合適的婚事。與此同時，我感到如果自己反對國王爲我作的安排就再也不能繼續受國王的監護了。加斯蒂斯與我有同樣的感受。我們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後決定，留給我們的最後一條路只有出走，出走的唯一去處只能是黃金之城艾戈利（Egoli）即約翰尼斯堡。

事後回想，我認識到，我們並未窮盡所有可能的選擇。也許，我可以通過中間人向國王說項，在部族和家庭允許的範圍內，達成某種折衷的解決辦法。我可以向國王的侄子茲林德羅夫酋長求助，他是姆克凱茲韋尼法庭中最開明且富有影響力的酋長之一。但是我們畢竟還年輕，沒有耐心把事情仔細考慮周全，我們決定，最好的辦法就是出走。

加斯蒂斯和我一直在秘密商議行動的計劃。首先，我們需要尋找出逃的機會。國王知道，加斯蒂斯和我待在一起，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事，所以，他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我們待在一起。我想，他肯定認爲我們待在一起會互相激發各自的壞習慣，至少加斯蒂斯的傻大膽和調皮搗蛋會影響稍微文靜的我，而我的自制力又不能影響加斯蒂斯。因此，每當他外出時，他總要叫上我們之中的一個陪他，這樣，他不在姆克凱茲韋尼時，我們就沒有單獨待在一起的機會了。他一般帶加斯蒂斯出行，把我留在姆克凱茲韋尼代他照料一切。但我們知道國王最近要出去參加一星期的本加會議（即川斯凱立法會議），我們倆誰也不帶；我們認爲這是出

走的絕佳機會。加斯蒂斯和我決定，一等國王出去參加本加會議，我們就將緊跟國王之後去約翰尼斯堡。

準備行裝花不了多少時間。我只有很少幾件衣服，我們簡單的行裝就裝進了一只提箱。星期一早上一大早，國王就離開了，過了一會，我們也作好了出走的準備。但正當我們準備走出家門時，國王卻出人意料地回來了。看到他的汽車駛進大門，我們慌忙跑進園子，藏在苞谷地裡。國王一進房子，第一句話就是：『那兩個男孩去那裡了？』有人告訴他剛才還見我們在附近呢！滿腹疑慮的國王顯然不滿足於這一解釋。他左右巡視了一番，然後，臉上才似乎露出了滿意的神情。他說，他忘記帶鹽劑了，而待在外面時可能需要。我想，他肯定有了某種預感，知道我們將會離開，因爲他在鎮上很容易就能買到鹽劑。當他的汽車在群山之間消失時，我們馬上開始了行動。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錢不夠。但我們找到了一個補救辦法。那天一早，我們去找了一位商人，與他商談賣給他兩頭國王的獲獎牛。商人自以爲我們得到了國王的許諾，我們也不給他講明事情的眞相。他給我們付了一個好價錢，用這些錢，我們就能雇一輛車去火車站，並在那兒搭上去約翰尼斯堡的火車。

一切看來都非常順利，但不知什麼原因，國王驅車去了火車站，告訴車站站長，如果有兩個長得像我倆的男孩來買去約翰尼斯堡的車票，站長不能賣給我們票，因爲我們倆不允許

離開川斯凱。我們急匆匆趕到火車站，馬上過去買火車票，站長仔仔細細把我們打量了一番，然後說，他不賣票給我們。我們問他爲什麼，他說，『你們的父親來過這兒，他告訴我，你們想出走。』我們大吃一驚，馬上又匆忙走到外面，告訴司機，我們得去離這兒最近的另一個車站。最近的火車站有五十英里遠，我們花了一小時才趕到那兒。

在那兒，我們乘上了一輛火車，但這輛車只到昆斯敦（Queenstown）。四十年代（其實一直到前幾年）非洲人出門旅行困難重重。首先，所有十六歲以上的非洲人都得攜帶所謂的『土著人通行證』，該證由土著人事務部統一頒發。在被要求的情況下，必須向警察、公務員或雇主出示該證。不出示該證可以被逮捕、起訴、罰款或判刑。通行證上列具了持證人的居住地、所屬部落酋長名以及持證人是否交了人頭稅，這項稅只對非洲人。後來，通行證改成手冊型，有人委婉地稱其爲『參考書』，裡面內容包括持證人的一切詳細情況，每月記錄一次，由其雇傭人簽字作證。

很幸運，加斯蒂斯和我有現成的通行證，但是，一位非洲人要離開他所屬的行政區到另一個行政區去工作或生活，他還需要有關旅行文件、允許旅行證明和雇主的證明信（我們則需要監護人的證明信），這些我們一件都不具備。其實，有時即使你具備了上述所有文件，警察也會對你挑刺找碴，如說你某個文件少了什麼人的簽字了，什麼日期不對了。而一件都沒有就非常危險了。我們計劃先乘車到昆斯敦，然後找親戚幫忙，再在那兒辦好必要的文

件。事後回想，我覺得當時又過於樂觀和大意了，但在昆西堡火車站，我們確實碰上了運氣。在站臺上，我們碰巧遇上了姆龐多比尼（Mpondombini）酋長，他是國王的一名兄弟，對加斯蒂斯和我都很喜歡。

姆龐多比尼酋長見到我們顯然很高興，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需要從當地行政長官那兒得到必要的旅行文件。我們編造了一套理由，說我們是在給國王辦事。姆龐多比尼酋長是一名土著人事務部的退休翻譯，與大行政長官很熟。他相信了我們的話，並告訴我們他將直接帶我們去見大行政長官。實際上，酋長不僅親自帶我們見了行政長官，而且還向他解釋了我們所遇到困難。大行政長官聽了酋長的解釋後，迅速做好了必要的旅行的文件，並在上面加蓋了公章。加斯蒂斯和我互相對視着，露出了詭秘的笑容。但在行政長官把文件交給我們的一剎那，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事，他遲疑了一下，說道，爲了禮貌起見，他應將此事向烏姆塔塔的大行政長官通報一聲，因爲我們屬於他的管轄區。這使我們感到有點不安，但我們還是若無其事地坐在他的辦公室裡。行政長官往烏姆塔塔打一個電話，眞是無巧不成書，國王那時剛好去拜訪烏姆塔塔的行政長官，待在他的辦公室裡。

我們這邊的行政長官向烏姆塔塔的大行政長官交待事情的原委時，後者說，哎呀，他們的父親剛巧在這兒呢！然後，就把電話聽筒給了國王。國王一聽到我們在這兒辦旅行文件，馬上暴跳起來。『抓住這兩個孩子。』他大叫道，聲音很大，以致我們都能通過聽筒聽到。

『立即把他們帶到我這兒來。』大行政長官放下電話，滿臉怒色。『你們這兩個小偷和騙子。』他對我們說：『你們說的全是假話。你們竟然敢利用我的官員的好心，到這兒來欺騙我，我要逮捕你們。』

我立即站起來爲自己辯護。那時，通過在黑爾堡的學習，我已具備了一點法律知識，我馬上把它們搬來使用。我對他說，是的，我們是說了謊，這點我們並不否認。但是我們並沒有侵犯誰，也沒有犯什麼法，不能僅僅憑一位會長的一句話就把我們抓起來。大行政長官顯然有點被說動了，他答應不抓我們，但他要我們馬上離開他的辦公室，並永遠也不想讓我們再踏進他辦公室的門檻一步。

到這時，姆龐多比尼會長也不再幫助我們了，我們重新陷入了孤苦無依的境地。但是加斯蒂斯突然想起他在昆西敦還有一位朋友，叫西德尼·恩休（Sidney Nxu），在當地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我們就去拜見他，向他說明了我們的處境，他告訴我們很幸運，他老闆的母親剛巧要駕車去約翰尼斯堡，他答應替我們問問，看她願不願意載我們去。問了他的律師老闆後，他回答說，如果我們付十五鎊錢，她就載我們去約翰尼斯堡。那時候，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比火車車費高出許多。付完這些錢，我們的腰包也就差不多空了，但是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同意了。我們決定冒一冒險，等到了約翰尼斯堡後再去給通行證蓋印，辦理有關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動身起程了。加斯蒂斯和我擠在車的後部，律師的母親坐在車的前面，旁邊是司機。那時候，黑人只能坐在汽車的後排。即如果一位白人駕車，黑人就一般只能坐在後面。這次，加斯蒂斯坐在律師母親的後面，我則坐在司機的後面。加斯蒂斯是一位熱情洋溢、言語很多的人；車一開動，他就開始喋喋不休地與女人說話。這使女人顯得極爲不悅。顯然，她從未見過這樣的黑人，在白人面前毫無顧忌。只開出了幾里路，她便命令司機停下車，並告訴加斯蒂斯，讓他與我互換座位，這大概是想監視加斯蒂斯吧。於是，從這時起，這位太太就像老鷹一樣緊盯着加斯蒂斯。但是幾個小時後，加斯蒂斯的魅力和令人喜愛的性格看來對她產生了作用，她變得有些放鬆了，有幾次加斯蒂斯說笑話和故事時，她居然還笑出了聲。

大約晚上十點鐘，我們前方遙遠地平綫上突然出現了一片燈海。在那時電對我們還是一種奢侈物，但此時我面前突然湧現了一片燈海，一個燈光的城市。終於見到約翰尼斯堡了，我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從孩提時代起，我就聽說過有關這個城市的故事。這是一個夢幻般的城市，在這兒，貧窮的農民一夜之間可以變成腰纏萬貫的闊佬，這也是一座危險和機會之城。我記得施割禮前巴那巴卡哈說過的約翰尼斯堡的故事，這兒的高樓高得望不見頂，街上人講的話你從未聽過，豪華的汽車擦得光亮可鑒，婦女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歹徒們也凶猛異常。眼前就是它，艾戈利，黃金之城，我今後的家。

到城市的郊區時，車輛漸漸變得越來越多。我還從來沒有在路上一下子見過這麼多的車，就是在烏姆塔塔，也只能見到少數幾輛車在路上開，從來沒有像現在一下子見到幾千輛。我們坐在車上，繞城行走，我看到了成片高大的建築物的黑黝黝的影子矗立在空中，路旁高大的廣告牌上，香烟、糖果和啤酒霓虹燈廣告在熠熠發光。一切都是那麼充滿吸引力。

不久，我們到達了一片非常氣派的住宅區，裡面最小的房子都比國王的宮殿要大，每座院子前都有大草坪和高大的鐵門。這兒是約翰尼斯堡的郊區，那位老女人的女兒就住在這兒，我們的車開進了其中一所漂亮房子的長長的車道。加斯蒂斯和我在僕人的住房邊下了車，今晚，我們就睡在這兒。我們謝過了老婦人，就在地板上蜷起身子睡覺了。然而，約翰尼斯堡在我腦中展示的光耀前程太讓我激動了。那晚，我感覺自己就好像躺在羽絨床上一般。在我的前面，機會似乎很多很多。我好像到達了一次長途跋涉的終點，但實際上，漫長而勞累的征途才剛剛開始，各種我想像不到的考驗將接踵而來。

第二章 約翰尼斯堡之春

九

我們到達克朗（Crown）金礦辦公區時天剛亮。辦公區座落在一座大山的高地上，從山上可以俯瞰仍是灰濛濛的約翰尼斯堡市。約翰尼斯堡是隨着一八六六年在威特沃特斯蘭德發現金礦而興起的城市，克朗金礦則是這座『黃金之城』最大的金礦。我原以爲會看到像烏姆塔塔（Umtata）的政府大樓那樣的宏偉建築，但呈現在眼前的卻是金礦前面幾間銹跡斑斑的白鐵棚屋。

金礦一點兒神秘感都沒有。一片荒蕪、坑坑窪窪、塵土飛揚、一棵樹木也沒有，四周圍着柵欄，就像被戰爭摧毀過的戰場。刺耳的聲音無處不在：礦井裡升降機的嘎擦嘎擦聲、動力鑽床的刺啦刺啦聲、遠處炸藥的轟鳴聲，以及咆哮着發命令的聲音。到處看見黑人穿着髒不拉幾的工作服，疲憊不堪地佝僂着腰。他們住在四面透風的臨時工棚裡，每個工棚裡有幾百個相隔僅幾英寸的水泥地鋪。

在威特沃特斯蘭德開金礦成本很高，因爲礦石品位低而且深埋地下。只是由於有便宜勞動力才使得採礦企業有利可圖。成千上萬馴服的非洲人長時間地工作，報酬極低，毫無權利可言。而白人擁有的採礦公司卻通過掠奪非洲人得以暴富。以前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企業，這麼大的機器、這麼有序的組織、還有這麼累人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南非的資本主義，而我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是與此截然不同的。

我們逕直去找『總酋長』或稱首領。他叫皮利索（Piliso），是個健壯的老頭兒，一副冷酷無情的樣子。皮利索知道加斯蒂斯（Justice），因爲幾個月前國王（Regent）曾寫過一封信，讓他爲加斯蒂斯安排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辦公室工作在礦區是最讓人羨慕和受人尊重的工作。而我，他卻不知道。加斯蒂斯解釋我是他堂弟。

『我只知道加斯蒂斯要來，』皮利索說，『你爸爸在信中一點也沒提什麼堂弟。』他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但加斯蒂斯向他懇求說，這只是一時疏忽，國王已替我發過一封信。皮利索頑固的外表下也藏着憐憫之心，他收下我當金礦警察，並說如果我好好幹，三個月內將給我一份辦公室工作。

國王的話在克朗金礦擲地有聲。對於南非的所有酋長來說都是一樣的。礦上的官員迫切需要在鄉下招收勞動力，而酋長則管着他們所需要的人。他們想讓酋長們鼓勵其子民去金礦，因此對酋長都畢恭畢敬；每當酋長們到來時，礦上就爲他們提供專門的住處。國王的一

封信足以保證一個人得到一份好工作，而且由於我們的關係，加斯蒂斯和我都得到特別關照。我們吃飯免費，睡在單獨的宿舍裡，還有一點工資，第一天晚上就沒住工棚。頭幾天裡，出於對國王的客氣，皮利索請加斯蒂斯和我與他住在一起。

許多礦工，特別是來自滕布領地（Thembuland）的礦工，對待加斯蒂斯就像對酋長一樣，紛紛送他錢表示歡迎，這是酋長來礦上參觀時的習慣。這些人多數住在同一工棚，因爲礦上一般是根據部族安排礦工的住宿的。採礦公司喜歡這樣隔離，因爲這可以防止不同的種族集團由於同樣的不滿而團結起來，並可以鞏固酋長的權力。這樣分離常引起不同種族集團和部族之間的派別爭鬥，採礦公司對此則巧妙地加以鼓勵。

加斯蒂斯與我一起分享他的一些戰利品，並且還額外給了我幾鎊作禮物。開頭幾天裡，隨着口袋裡驟然增加的財富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我感覺像個百萬富翁似的。我開始認爲我眞是個富有的孩子，幸運之光正照耀着我，如果沒有浪費寶貴的時光在大學學習，此時我早已是個很富的人了。這一次我又沒看到命運之神正忙於在我周圍佈置圈套。

我立即開始了夜班看守的工作。領了一套制服，一雙新靴子，一副頭盔，一只手電筒，一只哨子和一根圓頭棍（一根長木棍，一端有一個重重的木頭圓球）。工作很簡單；我站在寫着『注意，土著人由此通過』標牌旁邊的礦工居住區出口處，檢查出入人員的證件。頭幾天夜裡，巡視礦工居住區時沒發生什麼事。有一天深夜我還眞的質問過一個喝得爛醉的礦

工，不過他溫順地出示了一下證件就回到工棚裡去了。

加斯蒂斯和我為我們的成功洋洋得意，我們向一個朋友吹噓我們如何如何聰明，我們在家時就認識這人，他也在礦上工作。我們告訴他我們是如何逃跑，如何在這件事上騙國王的。雖然我們要他發誓保守秘密，他卻逕直找到首領將我們的秘密全盤端出。一天之後，皮利索把我們叫過去，他問加斯蒂斯的第一個問題是，國王允許你堂弟來這兒工作的信在那裡？加斯蒂斯說他已解釋過，國王寄出來了。這句話沒能讓皮利索平息下來，我們預感到一定發生什麼事了。然後他從桌子裡拿出一封電報。『我已跟國王聯繫過。』他語氣嚴肅地說，並將電報交給我們。電報上只有一句話：『立即送加斯蒂斯回家。』

皮利索隨後朝我們發了一通火，說我們對他撒謊，並說我們利用了他的好客和國王的好名聲。他說他正在找幾個礦工把我們送上返回川斯凱（Transkei）的火車。加斯蒂斯反對回家，說我們只是想在礦上工作，我們可以自已做主。但皮利索一點也聽不進去。我們感到羞愧和屈辱，但離開他辦公室時我們下決心不返回川斯凱。

我們迅速擬定了另一個計劃，去見A·B·蘇馬（A·B· Xuma）博士。他是國王的一位老朋友，非洲民族議會的主席。蘇馬博士出生於川斯凱的恩格佐博（Engcobo），是一位非常知名和備受尊重的醫生。

蘇馬博士很高興見到我們，禮貌地問了一些姆克凱玆韋尼（Mqhekezweni）的家事。我們半眞半假地給他講了我們爲什麼在約翰尼斯堡，並說我們非常想在金礦找到工作。蘇馬博士說他很高興幫我們的忙，並馬上要通了礦業協會韋爾比拉夫德（Wellbeloved）先生的電話。礦業協會是一個非常有權力的組織，它代表着採礦公司，對礦上雇傭勞動力實行壟斷控制。蘇馬博士告訴韋爾比拉夫德先生我們是如何優秀的人，無論如何他應爲我們找個位置。我們謝了蘇馬博士去見韋爾比拉夫德先生。

韋爾比拉夫德先生是個白人，他的辦公室比我見過的任何辦公室都大，辦公桌似乎比足球場還大。我們見到他時他正與一位叫費斯泰爾（Festile）的金礦老板在一起，我們向他講了曾給蘇馬博士講過的同樣的故事。韋爾比拉夫德先生深爲我不完全眞實的解釋而感動，我說我來到約翰尼斯堡是爲了繼續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學習。『好吧，孩子們，』他說，『我會讓你們與克朗金礦的老板，一位叫皮利索的先生聯繫。告訴他給你們安排辦公室職員的工作。』他說他曾與皮利索先生共事三十年，在這麼長時間裡，皮利索從未對他說過謊。我們對此感到侷促不安，但什麼也沒說。儘管有些疑慮，但仍天眞地覺得與皮利索先生相比我們占着上風，因爲我們有他的上司韋爾比拉夫德先生做靠山。

回到克朗金礦時，由於拿出了韋爾比拉夫德先生的信，礦工居住區的白人經理對我們很禮遇。正在此時，皮利索先生由此經過，一看到我們，就咆哮起來，『你們在這兒幹什

麼？』

加斯蒂斯鎮定自若。『韋爾比拉夫德先生讓我們來的。』他答道，語氣裡透着挑釁。皮利索先生想了一下。『你告訴他你們是從你父親那兒逃來的嗎？』皮利索反擊道。加斯蒂斯沒吭聲。

『我手下的金礦永遠不會雇你們的！』他嚷道，『現在，別讓我看到你們！』加斯蒂斯揚了揚韋爾比拉夫德的信。『我才不管什麼信不信的！』皮利索說。我看着那位白人經理，希望他能讓皮利索改變主意。但他像座石雕一樣一動不動，好像跟我們一樣被嚇壞了。我們沒有再反駁皮利索，順從地走出了辦公室，感到比第一次受到了更大的屈辱。

現在，命運發生了逆轉。沒有工作，沒有希望，沒有棲身之地。加斯蒂斯在約翰尼斯堡認識很多人，他進城爲我們找住的地方去了。同時我去取衣箱，衣箱還放在皮利索辦公室。然後，當天晚些時候在約翰尼斯堡南部的一個小鎮喬治·高奇（George Goch）與加斯蒂斯會面。

我讓一個小伙子幫我把衣箱提到前門口。他叫比基茲撒（Bikitsha），我在老家時就認識他。到門口時，門衛讓我倆停下，說要搜查一下包裏。比基茲撒提出抗議，說衣箱裡沒有違禁品。門衛說是例行檢查，只粗略查一下包裏，甚至不會把衣服弄亂的。門衛正要合上衣箱時，自以爲是的比基茲撒卻說『你爲什麼給我們找麻煩？我告訴你說什麼也沒有。』這幾

句話讓門衛極其厭煩。他決定將箱子仔仔細細再查一遍，隨後他打開每一個夾層，翻開每一個口袋，我感到越來越緊張了。然後他摸到箱子底部，發現了我暗暗祈禱但願他發現不了的東西：一把裹在衣服裡已裝有子彈的手槍。

他轉向我的朋友說：『你被捕了。』然後吹起了哨子，一會兒功夫，一隊門衛來到了我們面前。當我的朋友被帶往當地的警察局時，他看着我，臉上既驚恐又疑惑。我隔着一段距離跟着他們，思考着做何選擇。這支手槍是一把老式左輪手槍，原是我爸爸的，他死後留給了我。我從未用過，來這座城市時為預防萬一我將它帶在身邊。

我不能讓朋友代我受過。他走進警察局不久，我也走了進去，說要見局長。到了局長面前，我盡量直接了當地說：『先生，在我朋友衣箱裡發現的那把手槍是我的。是我在川斯凱時從我父親那裡繼承的。帶來這兒是因為怕遇上匪徒。』我解釋說我是黑爾堡（Fort Hare）來的學生，只是暫時待在約翰尼斯堡。我這麼說時局長緩和了一些，他說他將馬上放了我的朋友。他說由於我擁有手槍，他不得不指控我。雖然不逮捕我，但我星期一上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法庭應訊。我很感謝，告訴他星期一，一定去法庭。星期一我眞的去了法庭，只被象徵性地罰了點兒款。

同時，我已安排好與在喬治·高奇鎮的堂兄加利克·姆貝基尼（Garilick Mbekeni）住在一起。加利克是個賣衣服的小販，有一個盒子樣的小房子。他友好、熱心。在那兒住沒多長

時間，我告訴他我眞正的野心是當律師。他稱讚我有雄心壯志，說要記住我說的話。

過了幾天，加利克說要帶我去見『約翰尼斯堡一個最好的人』。我們坐車來到了一家房地產代理商的辦公室，它位於市場（Market）大街。這條大街人口稠密，洋溢着歡愉的氣氛，電車在吱吱嘎嘎行駛，街道兩旁到處是行人和攤販，給人一種這兒富得流油的感覺。

當時約翰尼斯堡既是一個邊境城鎭，又是一座高樓大廈林立的現代城市。屠夫就在裝有高速電梯的辦公樓樓旁的街上切肉。帳篷搭在店舖旁邊，婦女們則把洗的衣物晾在高樓大廈的門外。由於努力爲戰爭服務，工業高速發展。一九三九年，作爲英聯邦成員的南非向納粹德國宣戰。它爲戰爭提供人力和物品。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很大，約翰尼斯堡成了吸引鄉下來找工作的非洲人的一塊磁鐵。在我到達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六年之間，該城市的非洲人增加了一倍。每天早上，都感到城鎭比前一天大了一些。人們在工廠找到工作，在『非歐洲人城鎭』住下，如紐克萊爾（Newclare）、馬丁代爾（Martindale）、喬治·高奇、亞歷山德拉（Alexandra）、索菲亞鎭和西部土著人鎭，西部土著人鎭是像監獄一樣的礦工居住區，在這兒，幾千座火柴盒一樣的房子座落在沒有一絲樹蔭的地面上。

我和加利克坐在房產代理商的候客廳裡，一位漂亮的非洲人接待小姐向屋裡的老板通報說我們來了。說完之後，只見她纖細的手指在鍵盤上跳來跳去，原來她在打一封信。我以前從未見過非洲人打字員，女的就更少了。在烏姆塔塔和黑爾堡我去過的幾個政府和商業辦公

室，打字員都是白種男人。我對這個年輕女郎印象特別深，因爲我以前見過的白種男性打字員只會使用兩隻笨拙的手，用緩慢移動的手指費力地打信。

過了不久，她把我們引到裡屋，我被介紹給一位男人。他看上去二十多歲，一張睿智和友善的臉，氣色不錯，穿一件雙排鈕釦衣服。他儘管年輕，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個閱歷豐富的人。他是川斯凱人，卻像城市人一樣快速地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從候客廳那麼多人和桌子上堆的那麼高的文件來判斷，他是位忙碌而成功的人。但他沒有倉促打發我們，看來對我們的事眞誠地感興趣。他的名字叫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

西蘇魯開一家專營非洲人房地產的房地產公司。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還有少數幾片非洲人可以買房地產的地方，這些小片土地位於亞歷山德拉和索菲亞鎮。在有些地區，非洲人擁有自己的家已好幾代了。另外一些非洲人區爲市區城鎮，居民住在火柴盒般的房子裡，向約翰尼斯堡市政委員會交房租。

西蘇魯的名字不管作爲一個生意人還是作爲一位當地領導者都是響噹噹的。他在社會上已經很有勢力了。我向他講述我在黑爾堡時的困難，我想當一個律師的夢想，以及如何想在南非大學註冊通過函授得到學位。他專心地聽着。我沒有告訴他我剛到約翰尼斯堡時的處境。我說完之後，他往椅子上靠了靠，思考着我說的話。然後，又將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說有一個叫拉澤爾·賽德爾斯基（Lazar Sidelsky）的白猶太人律師與他共過事，他認爲他是正

派、上進的人。他又說道，賽德爾斯基對非洲人教育很有興趣。他將跟賽德爾斯基談一下，讓我當一個合同制的職員。

我一直認爲，精通英語和事業有成是受高等教育的直接結果，我只簡單地斷定西蘇魯一定是大學畢業。離開這兒後從我侄兒口中得知，沃爾特·西蘇魯從未上過以前的標準六年級，這使我大吃一驚。這是我得到的又一個教訓：在約翰尼斯堡必須拋棄在黑爾堡時的成見。我受的教育一直是，取得文學士學位就意味着成爲一名領導人，而成爲一領導人則需要文學士學位。但我在約翰尼斯堡發現，許多最傑出的領導人從未進過大學校門。即使我學過文學士所要求的所有英語課程，比起我在約翰尼斯堡遇到的許多人，甚至沒有上過學的人，我說起英語既不流利又沒口才。

與堂兄住一起沒多長時間，我就搬到了信仰英國聖公會的J·馬布托（J·Mabutho）神父的家裡。他家住在亞歷山德拉鎮第八大道。J·馬布托神父是滕布人，他是我家的朋友，慷慨、虔誠。他妻子熱情、慈祥，我們叫她格格（意即活潑），她還是位極好的廚師，非常樂於助人。作爲這個城市一位與我家認識的滕布人，J·馬布托神父感到對我負有責任。『我們的祖先教會我們分享。』有一次他告訴我。

但我沒有從在克朗金礦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因爲我沒有告訴J·馬布托神父我離開川斯

凱的情況，我這一省略釀成了不幸的結果。我搬到他們家沒幾天，有一次正與他們一塊飲茶，這時有一位客人造訪。不幸的是，他們的朋友是金礦老板費斯泰爾先生，加斯蒂斯和我在礦業協會見韋爾比拉夫德時他在場。我們倆打招呼的方式說明我們相互認識。儘管一點沒提上次見面的情況，第二天，J·馬布托神父把我叫到一邊，向我說明我不能再在他家待下去了。

我詛咒自己沒有告訴他全部眞相。我已習慣於欺騙，甚至不需要撒謊時也撒謊。我相信如果我給他講了的話，J·馬布托神父一定不會介意的，但他從費斯泰爾那兒知道實情後感到受了騙。在約翰尼斯堡的短短一段時間，我曾擺脫了說謊的習慣，但這種習慣卻時常纏住我。此時，我感到別無選擇。我驚恐失措，知道我還沒有走上新生活的正確軌道。在這種情況下，J·馬布托神父先生可憐我，在鄰居遜馬（Xhoma）家裡給我找了個住處。

遜馬先生是亞歷山德拉鎮非洲人中少數幾個有房子的傑出人物之一。他家位於十七大街四十六號，地方不大，尤其是家裡有六個孩子。但有一個長廊和一個小花園，看起來很怡人。爲了收支平衡，遜馬先生像亞歷山德拉的許多居民一樣，將房子租給寄宿者。他在房子後面搭了間白鐵屋頂的房子，跟個小窩棚似的，地面髒兮兮的，沒有電、熱設施，沒有自來水。但這是我自己的一片天地，有了它我太高興了。

同時，由於沃爾特的推薦，拉熱爾·賽德爾斯基同意我一邊完成學士學位一邊給他打

工。威特金（Witkin）、賽德爾斯基和艾德爾曼（Eidelman）事務所，是該市最大的法律事務所之一，處理有關黑人以及白人的業務。在南非，要想當律師，除了學習法律通過一些考試之外，還必須當幾年牌律師的學徒，稱爲合同制的學徒。但對於我來說，爲了當合同制的學徒，就必須先取得學士學位。爲此，我晚上學習UNISA的課程。UNISA是南非大學的縮寫，這是一所受人尊重的教育機構，人們通過函授可以得到它所給予的名譽和學位。

除了受理平常的法律案件，威特金、賽德爾斯基和艾德爾曼還承接非洲客戶的房地產業務。沃爾特把需要抵押的客戶帶到那兒，事務所受理他們的貸款申請，然後收取一筆手續費，這筆手續費與房地產代理商分享。事實上，法律事務所要絕大部分，而只給非洲人房地產代理商留一小部分。人家只把殘羹冷汁扔給黑人，但黑人除了接受別無選擇。

即便如此，這個法律事務所也比絕大部分地方思想自由。這是個猶太人事務所，根據我的經歷，我發現在種族和政治問題上猶太人比大多數白人心胸開闊，也許是因爲他們自己在歷史上也曾是偏見的犧牲品。事務所的合夥人之一拉熱爾·賽德爾斯基將收我爲合同制的學徒，這件事——那時幾乎從來沒聽說過的事——就是這種自由思想的證據。

賽德爾斯基先生對我非常好，我漸漸也十分尊重他。他畢業於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我來到這個事務所時他有三十五歲左右。他熱心非洲人教育，常把時間和金錢用於非洲人學校。他身材瘦弱，留一撮小鬍子，彬彬有禮的樣子。他眞誠地關心我的生活和未來，給我講

教育對於我個人和對於所有非洲人的價值和重要性。他常說，只有群衆教育才能使我們的人民自由，並說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不能被壓迫的，因爲他能爲自己着想。他一遍又一遍地對我講，成爲一個律師從而爲我的人民樹立一個成功的典範是最值得我走的道路。

第一天到辦公室，我見到了事務所大多數職員，包括另一個非洲人職員高爾·拉德貝（Gaur Radebe）。我與他共用一個辦公室。高爾比我年長十歲，既是職員，又是翻譯和信使。他個子不高，又矮又胖，長一臉鬍子，英語、科薩語和祖魯語都很流利，能用這些語言準確、幽默、自信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很有見解，而且有更好的口才來證明這些觀點，在約翰尼斯堡的黑人中享有盛名。

到事務所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輕愉快的白人秘書利伯曼（Lieberman）小姐把我叫到旁邊說，『納爾遜，在我們法律事務所沒有膚色障礙。』她解釋說，中午送茶人會端着一個盤子來到前客廳，盤子上放着茶葉和幾個杯子。『我們爲你和高爾買了兩個新杯子，』她說，『秘書把茶送給頭兒們，但你和高爾必須自己來端，跟我們一樣。送來茶時我會叫你。你端新杯子。』她補充說讓我把這話轉告高爾。我對她的指點表示感謝，但我淸楚她小心翼翼提到的『兩個新杯子』正證明了她所說的不存在的膚色障礙。秘書可以與兩個非洲人共享茶水，但不能共享喝茶用的杯子。

當我把利伯曼小姐的話告訴高爾時，我注意到了他臉上的表情變化，好像看到小孩的腦

子裡閃過一個惡作劇的念頭。『納爾遜，』他說：『喝茶時什麼也別擔心，我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十一點，利伯曼小姐通知說茶送來了。高爾當着秘書和事務所其它成員的面，神氣地故意不看新杯子，而是選了個舊杯子，放入大量的糖、奶和茶葉，慢悠悠地攪着，然後站在那兒十分自得地品着。秘書盯着高爾，而高爾朝我點了點頭，似乎在說：『該你了，納爾遜。』

那一瞬間，我左右爲難。既不想冒犯秘書，又不想疏遠新同事，因此我採取了對我來說是最謹愼的行動：根本沒去喝茶。我說不渴。當時我剛二十二歲，正在努力成爲一個男人、一位約翰尼斯堡的居民和一家白人事務所的雇員，我要站住腳，我發現中間道路是最好、最合理的方法。情況不會永遠這樣的。此後，喝茶時間我都到辦公室的小廚房裡獨自飲茶。

秘書並不總是這麼考慮周到的。過了一段時間我對事務所的事兒有些經驗了。有一次，我正向一位白人秘書口述什麼事兒讓她筆錄下來，走來一個她認識的白人客戶。她很尷尬，爲了證明不是在爲一位非洲人作筆錄，她從錢包裡拿出六塊錢，生硬地說，『納爾遜，請去給我買瓶洗髮精。』我走了出去，不過沒有買洗髮精。

起初，我在事務所的工作都是些例行公事。既當辦事員又是信使。蒐集、安排和訂存資料及在約翰尼斯堡附近分發和遞送文件。後來，我爲事務所一些非洲人客戶起草合同。但是，無論事情如何瑣碎，賽德爾斯基都要給我解釋它有什麼意義及爲什麼要幹這件事。他是

個耐心和慷慨的老師，試圖不僅傳授法律的細節而且傳授法律後面的哲學。他的法律觀宏大而不狹隘，相信法律是可以用來改變事物的工具。

賽德爾斯基先生向我傳授他的法律觀的同時，還告誡我要遠離政治。他說，政治暴露出人性中最惡的東西。它是麻煩和腐敗之源，應不惜一切代價避開。他向我描繪了萬一陷入政治中會發生什麼事兒的可怕情景，勸我別跟他認爲是鬧事者和煽動者的人在一起，特別是高爾·拉德貝和沃爾特·西蘇魯。

高爾確實是個『鬧事者』，不過需要從最好的方面理解這個詞兒，他以賽德爾斯基先生不知道或未察覺的方式在非洲人中頗有影響力。他是西部土著人鎮顧問團的成員之一，這是一個選舉產生的團體，由四個當地人組成，處理與本鎮有關的事務。雖然該團體沒什麼權利，卻在人民中間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不久發現，高爾還是非洲民族議會和共產黨的一位傑出的成員。

高爾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並不對雇主誇張地禮貌，常責備他們對待非洲人的方式。『你們的人偷走我們的土地，』他老說，『然後奴役我們。現在又讓我們花很多錢買回一塊最壞的土地。』一天，我辦完事來到賽德爾斯基辦公室，高爾轉向他說道，『你看，你像個老爺似的坐在這兒，而我的酋長卻來回奔走爲你辦事。情況應該顛倒過來，而且總有一天會這樣的。我們將把你們全扔到大海裡。』高爾說完走出了房間，賽德爾斯基只是沮喪地搖了搖

頭。

高爾樹立了這樣一個榜樣，即沒有學士學位，卻比那些帶着光芒耀眼的學位離開黑爾堡的人明顯地更有教養。他不僅知識豐富，而且更勇敢、更自信。雖然我打算完成學位和進法律學校，我從高爾身上知道，學位本身並不是領導能力的證明，如果不走進社會證明自己，學位就什麼也不是。

我並不是威特金、賽德爾斯基和艾德爾曼事務所唯一合同制的學徒。我開始工作不久，一個與我年齡相當、叫納特·布萊格曼（Nat Bregman）的人也來了。他聰明伶俐、舉止文雅、樂於助人，似乎完全沒有種族歧視。他成了我的第一個白人朋友。他巧於模仿，能很好地模仿簡·斯馬茲（Jan Smuts）、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聲音。我常就法律和辦公程序與他商議，每次他都很樂於提供幫助。

一天中午，我們坐在辦公室，納特拿出一包三明治。他拿起一個，說：『納爾遜，拿住另一端。』我搞不清楚他爲什麼要我這樣，但由於餓了，我決定照辦。『現在，拉』他說。我拉了一下，三明治分爲大致兩半。『諾，吃吧。』他說。我一邊吃，納特說：『納爾遜，我們剛才做的象徵着共產黨的哲學：分享我們擁有的一切。』他告訴我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並向我解釋該黨代表什麼等入門知識。我知道高爾是個共產黨員，但他從未爲該黨吸收成

員。那天，以及隨後好多次，納特都向我宣揚共產主義，試圖勸我加入該黨，我都是聽着。聽完之後，提出問題，但沒有加入。我不願加入任何政治組織，而賽德爾斯基先生的建議還在我耳邊回響。我還很信教，而該黨對宗教的憎惡使我不願加入。但我欣賞分吃三明治的主意。

我樂意與納特在一起，我們常常一起去一些地方，包括幾次演講和共產黨的聚會。我去主要是出於好奇心。我才開始注意自己國家種族壓迫的歷史，把南非的問題看成純粹是種族鬥爭。但共產黨則通過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南非的問題。對於他們來說，是有錢人壓迫沒錢人。這種觀點對我來說很有趣，但似乎不太符合非洲的情況或與目前的南非無關。它可能適用於德國或英國，甚至俄羅斯，但對於我所了解的這個國家似乎不太適用。即使這樣，我還是認眞傾聽，從中學到了一些東西。

納特邀請我參加了幾次聚會，那兒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混血種人都有。聚會是由該黨組織的，因此大多數參加者都是黨員。我記得第一次去時心情惴惴不安，主要是由於我覺得沒有合適的服裝。在黑爾堡時我們被告誡：參加任何社交活動都要繫領帶、穿外套。儘管衣服特別少，我還是想辦法找了一條領帶參加聚會。

我發現了一群喜歡社交的活躍的人，他們好像對膚色一點也不在意。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人種混雜的聚會，我更多地是一個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參加者。我感到非常羞怯，小心翼翼地

唯恐犯錯誤，對參加這樣連珠炮似的高談闊論一點準備都沒有。與這些老練的對話相比，我的思想像尚未開發一樣。

有一天晚上，我被人介紹給邁克爾·阿梅爾（MIchael Harmel）。別人曾對我說過他有羅得斯（Rhodes）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當時對他的學位印象頗深。但我見到他時不禁暗暗想道，『這傢伙有碩士學位，但他甚至不繫領帶！』我無論如何不能把兩者統一起來。後來，米契爾和我成了朋友，我非常崇拜他，因爲他拒絕我曾經接受的許多愚蠢習慣。他不僅是個優秀的作家，而且如此醉心於共產主義，以致於與一般非洲人的生活方式沒什麼不同。

十

亞歷山德拉的生活既令人興奮又不太安定。這兒氣氛活躍，富於冒險精神，這兒的人民充滿機智。雖然也有幾座漂亮的建築，說它是個貧民窟卻非常恰當，這是當局不關心的活生生的證明。路沒鋪、骯髒不堪，饑餓的、營養不良的孩子衣不蔽體地滿街跑。空氣裡有厚厚一層白鐵火盆和爐子燒煤散發出來的烟氣。一個水龍頭供應五十家。路邊積聚了幾個池塘，裡邊的水惡臭、污濁，爬滿了蛆蟲。亞歷山德拉由於完全沒有電而稱爲『黑暗之城。』夜晚走回家很危險，因爲沒有燈；靜寂常被叫喊聲、笑聲和偶爾的槍聲打破。這兒與川斯凱的黑暗不同，川斯凱似乎是以一種歡迎的態度把你擁入黑暗中。

城鎮擁擠不堪，每一英尺上面都蓋着一座要麼是搖搖晃晃的房子要麼是白鐵房頂的棚屋。在特別窮的地方常常發生這種情況。前面所述是最壞的地方。生活很便宜；刀槍在夜晚肆虐。拿彈簧刀的歹徒——稱爲『阿飛』——多而顯眼；那時他們模仿美國電影明星，頭戴軟呢帽，身穿雙排鈕衣服，脖子上繫寬大艷麗的領帶。警察圍捕成爲亞歷山德拉生活中正常的事情。警察經常以違犯通行法、擁有酒和不交過境稅的理由大規模逮捕人。每個角落都有非法酒吧，一般都是棚屋，賣家釀的啤酒。

亞歷山德拉的生活儘管有地獄似的一面，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個天堂。這是全國爲數不多的地區，在這裡，非洲人可以獲得自由支配的財產和幹自己的事兒，不必向白人政府的暴君磕頭作揖。亞歷山德拉是一塊城市『福地』，證明我們的部分人民已割斷了與農村的紐帶，成爲永久的城市居住者。政府爲了讓黑人待在農村或在礦上工作，宣揚非洲人生來就是農村的人，不適合城市生活。亞歷山德拉儘管有它的問題和缺點，卻證明這種論點是謊言。亞歷山德拉的人來自各個非洲語言集團，他們非常適應城市生活，對政治很關心。城市生活逐漸磨去了部落和種族差別，我們不是科薩人或蘇托（Sothos）人或祖魯人或山干（Shangaan）人，而是亞歷山德拉人。這產生了一種休戚相關的感覺，從而使白人政府部門非常擔心。政府對付非洲人總是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依靠人民中間的種族分裂力量。但在亞歷山德拉這樣的地方，這些差異正在消除。

亞歷山德拉在我心目中佔據寶貴的位置。這是我離家後第一次住的地方。雖然後來我在索韋托（Soweto）的一個小地方奧蘭多（Orlando）住了更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把亞歷山德拉當成家，儘管在那兒沒有自己的房子，而在奧蘭多有個房子卻沒有家。

在第一年裡，我比在庫奴（Qunu）度過的整個少年時代更多地嘗到了貧窮的滋味。我似乎從未有過錢，我學會了用最少的資源活下來。法律事務所每月付我兩英鎊，而且慷慨地放棄了通常合同制的學徒付給事務所的學費。我每月從兩英鎊中拿出十三先令四便士付我在遜馬家的房租。來回亞歷山德拉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是『土著人』公共汽車——只有非洲人坐——每月一·一〇英鎊，這在我收入中占相當份量。為了取得函授學位，我還要向南非大學交學費。另一英鎊左右用於吃飯。部分工資還要用於買更重要的東西——蠟燭——因為沒有蠟燭就無法學習。我買不起煤油燈，有了蠟燭就能讀書到深夜。

每個月我都不可避免地有幾便士的虧空。為了把車費省下來，許多天我早晚各步行六英里上下班。常常只吃一口飯度過一天，好多天不換衣服。與我身高差不多的賽德爾斯基先生，曾給了我一件舊上衣。經過多次縫縫補補，五年裡我幾乎每天都穿這件衣服。最後，補丁比原來的衣服還多。

一天下午，我乘車回亞歷山德拉，坐在一位與我年齡相當的小伙子身旁。他是那種穿着模仿美國電影裡衣着漂亮歹徒的服裝風格的年輕人。我意識到我的外衣剛擦着他的外套邊。

他也注意到了，非常小心翼翼地挪了一下，使我的外套不致把他的弄髒。這是一樁小事例，回想起來很可笑，但當時卻很讓我痛苦。

貧窮一點兒也不討人喜歡，但卻可以培養友誼。富有時有許多人與你交朋友，但貧窮時與你交朋友的人卻相當少。如果說富有是一塊磁鐵，貧窮就是一種驅蟲劑了。然而，貧窮常常讓你發現別人眞正的慷慨大度。一天早上，我決定步行進城以節省些錢，發現一個在黑爾堡時曾與我在一起的年輕女士。她叫菲利斯·馬塞科（Phyllis Maseko），正在街道同一側朝我走過來。但我爲自己穿的破衣爛衫而羞愧，穿過去走到另一邊，希望她別把我認出來。但卻聽到她在叫『納爾遜！納爾遜！』我停下來，又走了過去，假裝剛剛注意到她。她見到我很高興，但我不知道她看到我多麼落魄。『納爾遜，』她說，『這是我的地址，東奧蘭多二三四號，來找我吧。』我決定不再去出醜。但有一天，我需要像樣地吃一頓飯，就去拜訪了。她管了我飯，而沒有提到的我貧困狀況，從那兒以後我就不斷地去找她。

我的房東遜馬先生家境並不富裕，但某種意義上他卻是個慈善家。在我住他家的那段時間，他和他妻子每星期天都給我供午餐，那些熱氣騰騰的豬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週裡唯一的熱飯。不管在那裡，也不管幹什麼，星期天我從不耽誤了去遜馬家。一週的其餘時間裡就靠麵包維持，有時事務所的秘書給我帶點吃的。

那時，我思想非常落後，人也貧窮，加上鄉土觀念，發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搬到遜馬

家不久的一天，在從約翰尼斯堡回家的路上，我感到非常餓。我身上帶着一點節省下來的錢，決定揮霍一次買點兒鮮肉，我已好長時間沒嘗過新鮮肉了。看看周圍沒有賣肉的，我就進了一家熟食店，我來約翰尼斯堡之前從沒見過這種店。透過玻璃，看到一大塊很刺激食慾的肉，就讓櫃裡面的人切下一塊。他包好以後，我夾着回家了，夢想着有一頓多麼好的午餐在等着我。

回到亞歷山德拉我的房間裡後，我叫來大房子裡的一位小姑娘，她才七歲，但是個聰明的女孩。我跟她說：『能不能請你把這塊肉拿給你姐姐讓她給我做一下？』我見她盡量忍住笑，由於尊重長者而沒笑出聲。帶着一絲惱怒，我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她輕輕地說，『這塊肉是做好了的。』我問她在說什麼，她解釋說我買了一塊烟熏火腿，就是這麼吃的。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新鮮事兒，我沒有承認對此一點兒不知道，而是對她說我知道這是烟熏火腿，可我想熱熱吃。她知道我在騙她，不過不管怎麼說還是跑了。那肉味道非常好。

在亞歷山德拉，我還重新開始了與愛倫·恩卡賓得（Ellen Nkabinde）的友誼，她性格活潑，總是很快活的樣子。我在希爾德敦（Healdtown）時認識她，她當時在鎮上一家學校教書。事實上，愛倫和我相愛了。在希爾德敦時我只是約略知道她，又在亞歷山德拉見到她時我們的友誼開花了。那些歲月裡我與愛倫待在一起的閒暇時間多麼少啊。求婚很不容易；我們周圍總是有人，沒什麼地方可去。可以單獨待的唯一地方是陽光或星光下。因此，愛倫和

我常在環繞城鎮的疏林草原或山間散步。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散散步，而如果兩人都時間充裕，就可能去野餐一次。

愛倫是個史瓦濟（Swazi）人，儘管部族文化在亞歷山德拉逐步消失，我的一位好朋友還是以純部族的理由譴責我倆的關係。我明確地加以拒絕，但我們不同的背景還是產生了某些問題。神父的妻子馬布托太太不滿意愛倫，主要是因爲她是個史瓦濟人。一天，我正在馬布托家時有人敲門，馬布托太太去開門。是愛倫，來找我的，而馬布托太太告訴她我不在。馬布托太太只是後來對我說，『噢，納爾遜，有個女孩來找過你。』然後問我，『那女孩是山干人嗎？』雖然山干是個驕傲和尊貴的部族，在當時山干被認爲是個貶義詞。我對此感到很生氣，說道，『不，她不是山干人，她是史瓦濟人。』馬布托太太強烈認爲我只應娶個科薩姑娘。

這種建議沒能阻止我。我愛愛倫，尊重她，在拒絕反對的建議時一點也不覺得是多麼崇高的行動。我對我們的關係感到新奇，而與一個不是科薩族的女子保持友誼我覺得很勇敢。我年輕，在這個城市有點失落，而愛倫不僅扮演談戀愛的伙伴，還扮演一個母親的角色，支持我，給我信心，給我力量和希望。但幾個月後愛倫走了，憂傷地走了，我們相互失去了聯繫。

遜馬有五個女兒，每個都很可愛，但最漂亮的是迪迪（Didi）。迪迪與我年齡差不多，

一週裡大部分時間都在約翰尼斯堡一個白人居住的郊區給人當傭人。我剛搬到她家時很少見到她，見到她時也是時間極短。但後來，與她非常熟識之後卻愛上了她。但迪迪卻一點也不在意，她注意的是我只有一件補丁又補丁的外套和一件襯衣，在她眼裡我與一個流浪漢沒什麼不同。

迪迪每周末回亞歷山德拉。由一個年輕人把她帶回家，我估計是她男朋友，一個華而不實但家境富裕的小伙子。他有一輛汽車，這在當時很少見。他身穿華貴的美國式雙排釦衣服，頭戴寬邊帽，十分注意外表。他一定是個歹徒之類的人，但我不能肯定。他站在院子裡，兩手插進口袋裡，表現出高人一等的樣子。他禮貌地給我打個招呼，但可以看出來他沒把我當成競爭對手。

我渴望告訴迪迪我愛她，又害怕我的求愛純屬多餘，我可不像唐璜（Don Juan）。我在女孩面前笨拙猶豫，別人似乎毫不費力玩的愛情遊戲我卻不知道也不明白。別的年輕人遇到求愛的事似乎都很順利。周末，迪迪的媽媽有時讓她給我送碟食物來。迪迪端着碟子來到我門前，我已感覺到她只想儘快完成任務，我卻盡力讓她多耽擱會兒。我問她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問她各種問題。『喂，你在學校念到哪一級？』我問。『標準五級。』『爲什麼離開學校呢？』我又問。『煩了。』她回答。『啊，你得再去上學。』我說。『你與我年齡差不多，』我繼續道，『這個年齡再回去上學沒問題，否則，到老了你會後悔的。你應該認眞考

慮一下你的將來。現在，你年輕、漂亮，有許多崇拜者，當然好，但你需要一份獨立的職業。』

我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年輕男子向他所愛的女子說過的最羅曼蒂克的話，但我不知道能再對她說別的什麼。她認眞地聽着，但我覺出她對我沒有興趣，事實上她覺得比我還強點兒。

我想向她求婚，但除非我肯定她會答應。否則我是不會這樣做的。雖然我愛她，卻不想讓她因拒絕我而自得。我繼續追求着，卻膽小猶豫。在愛情上，不像在政治上那樣，謹愼通常不是一種優點。我旣無足夠的信心認爲可以成功，又不敢肯定如果不成功的話我能否承受失敗的打擊。

我在那間房子住了約一年，最後，卻一點沒流露自己的感情。迪迪對她男朋友的興趣一點沒減少，對我的興趣一點沒增多。告別時，我對她的友好和她全家的好客表示感謝。好多年後我沒再見到迪迪。一天，我在約翰尼斯堡自己開業當律師時，一年輕女子與她媽媽走進我的辦公室。這個女子生了一個孩子，而她男友又不想與她結婚，她想起訴他男友。這個年輕女子就是迪迪，只是現在她面容憔悴，穿着褪了色的衣服。見她這樣我很痛心，想到世事眞是無常，如果事情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呢？最後，她一件衣服也沒帶走。從此，我再沒見過她。

儘管愛情上不如意，我還是漸漸適應了城鎭生活。我開始積聚內力，即一種在不是我長

大的地方也能幹好的信念。我漸漸發現，進步不是非依靠我與王室的聯繫或家庭的支持不可，我與不知道或不在意我與滕布（Thembu）王室有關係的人聯繫。我有自己的房子，雖然很簡陋，而我依靠自己站起來所必須的信心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在逐步增強。

一九四一年底，我得到信兒說國王來到了約翰尼斯堡，他想見我。我感到有些緊張，但知道必須見他，而且也確實想見他。他住在威特沃特斯蘭德人勞工協會總部，該協會是爲金礦招收礦工的機構。

國王看起來變化很大，或者說也許是我變了。他根本沒提我逃跑的事兒，也沒提替我安排的婚姻或黑爾堡。他對我很客氣，也很關心，像一位父親那樣問了我的學習及將來的計劃。他認識到我的生活眞正開始了，而且要走與他的設想和計劃不同的道路。他沒有勸阻我，而我對他含蓄地承認我不再屬他管理很感激。

我與國王的見面產生了雙重效果。我已恢復名譽，同時也恢復了對他和滕布王室的尊重。我曾經對這些老關係很冷淡，採取這種態度部份是爲了證明我逃跑是對的，某種程度上能減輕與我熱愛和珍視的環境分離的痛苦。重新回到國王溫暖的懷抱令人感到很安心。

在國王對我表示滿意的同時，卻對加斯蒂斯很苦惱。他說加斯蒂斯必須回姆克凱茲韋尼。加斯蒂斯與一年輕女子私通，我知道他沒有回家的打算。國王走後，他屬下的一個頭領

邦金達沃（Bangindawo）對加斯蒂斯提起訴訟，他被叫到土著人長官面前。此時，我決定幫他一把。在聽證會上，我指出加斯蒂斯是成年人，不能僅僅因爲他父親命令他回姆克凱茲韋尼就必須回去。輪到邦金達沃說話時他不答覆我的看法，卻利用我的忠誠之心。他稱我爲馬迪巴（Madiba），這是我的族名，這樣做是精心策劃過的，以喚醒我身上的滕布血液。『馬迪巴，』他說，『國王曾經關心你，教育你，對你像對自己的兒子那樣。現在，你卻想讓他的親生兒子離開他，這與曾是你忠實監護人的願望背道而馳，也與爲加斯蒂斯鋪好的道路背道而馳。』

邦金達沃的話對我觸動很大。加斯蒂斯確實有着與我不同的命運，他是酋長的兒子，生來就是當未來酋長的。聽證會後，我告訴加斯蒂斯我已改變主意，認爲他應回去。加斯蒂斯對我的反應莫名其妙，並拒絕聽我的。他已決定留下，而且還把我的建議告訴了他女友，因爲從此以後她沒再理過我。

一九四二年初，爲了省錢和離約翰尼斯堡市區近些，我從遜馬家後面的房間搬到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礦業協會的費思泰爾先生幫的忙，他又一次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關鍵作用。他主動決定在礦工居住區爲我提供免費住宿。

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的礦工居住區是一個現代城市的多種族、多種語言的社

會。有蘇托人、茲瓦納（Tswanos）人、文達（Vendas）人、祖魯人、佩迪（Pedis）人、山干人、西南非人、莫桑比克人、史瓦濟人和科薩人，很少有人講英語，講的是多種語言混合在一起的混合語，稱爲『法那加羅』（Fanagalo）。在那兒，我不僅看到了種族仇恨的爆發，也看到了不同種族的人之間可能演出的喜劇。但我在那兒是岸上之魚。我沒把時間花在激進活動上，而是在一個法律事務所學習或工作，在那兒唯一的體力活動是出去辦事兒或把文件放書櫥裡。

由於威特沃特斯蘭德土著勞工協會是來訪酋長停留的小站，我榮幸見到了來自整個南部非洲的部族領導人。我想起有一次見到巴蘇陀蘭（或現在的賴索托）的女王Mantsebo Moshoeshoe。她由兩個酋長陪同，這兩個酋長都認識薩巴塔（Sabato）的父親容吉利茲韋（Jongilizwe）。我向他們詢問容吉利茲韋的情況，他們講述他早年有聲有色的故事時，有整整一個小時我似乎又回到了滕布領地。

女王特別注意我，有一次還直接跟我講話，但她說的是西蘇托（Sesotho）語，這種語言我知之甚少。西蘇托語是蘇托族和茲瓦納族的語言，茲瓦納人大量聚居在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她帶着懷疑看着我，然後用英語說，『不能講自己人民的語言你能當什麼律師和領導人？』我無言以對。這個問題令我尷尬也讓我清醒；它使我認識到我的狹隘以及我對於服務於我的人民多麼沒準備。我已不知不覺地屈服於政府鼓勵的種族分離而不知道如何與自

己的親屬朋友講話。不懂語言，就不能與人民談話和理解他們，就不能分享他們的願望和抱負，不能了解他們的歷史，不能欣賞他們的詩歌或鑒賞他們的歌曲。我又一次認識到，我們不是講各自語言的不同民族，而是方言不同的同一民族。

國王來訪後不到六個月，加斯蒂斯和我在一九四二年冬得到他爸爸的死訊。上次見他時他看來就很疲勞，他的死沒有讓我太吃驚。我們是在報紙上讀到國王的死訊的，因爲發給加斯蒂斯的電報被耽擱了。我們匆匆趕往川斯凱，於國王葬禮的第二天才趕到。

雖然我很失望錯過了國王的葬禮，內心裡又爲在他死前已與他和解感到高興。但不是沒有內疚的刺痛。我一向知道，即使與國王疏遠的時候，所有的朋友都可能拋棄我，所有的計劃都可能失敗，所有的希望都可能破碎，但國王永遠不會拋棄我。但我卻拒絕了他，我不知道我拋棄他是否加速了他的死。

國王的去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開明和寬容的人，他取得了標誌所有偉大的領導人統治時期的目標：使人民保持團結。自由派和保守派，傳統派和改革派，白領官員和藍領礦工，全都對他忠心耿耿，不是因爲他們總同意他的意見，而是由於國王善於傾聽和尊重所有不同的意見。

葬禮舉行後我在姆克凱茲韋尼待了將近一星期。這是一段追思過去和重新發現的時期。

再沒有比回到一個永遠不變的地方更能發現自己的變化了。『大王宮（Great Place）』一切照常，與我在那兒長大時沒什麼不同。但我意識到自己的外表和世界觀都發生了變化。一個公務部門的職位或在土著人事務部當一名翻譯已吸引不了我。我不再認爲未來是與滕布領地和川斯凱連在一起的。甚至有人告訴我說我的科薩語已不純正，而是受到金礦講的最多的語言之一祖魯語的影響。我在約翰尼斯堡的生活，我與類似高爾·拉德貝這樣的人的接觸，我在法律事務所的經歷，形成和徹底改變了我的信仰。我回過頭來，看到離開姆克凱茲韋尼時那個天眞幼稚、觀念狹隘的年輕人，當時只是井底之蛙，現在相信已看到了事物的本質。當然，那也只是一種幻想。

我仍然感到頭腦和心靈之間的內在衝突。內心告訴我我是滕布人，我被撫養成人，送進學校，因此我能夠起特殊作用使王位永久保持。難道對死者一點義務沒有？對拜託國王照顧我的爸爸？對像父親一樣照顧我的國王本人？但大腦卻告訴我，按自己的意志設計未來和選擇在生活中的角色是每個人的權力。難道不允許作自己的選擇嗎？

加斯蒂斯的情況與我不同，國王死後他有強加於身的新的重要責任。他將繼承國王成爲姆克凱茲韋尼的首領，他已決定留下來接受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必須回約翰尼斯堡，甚至不能等到出席他的就職儀式。在我們的語言中有一句諺語：Ndiwelimilambo enamagama 。我已跨過了著名的河流。意指一個人走了很長一段路，他有廣泛的經驗並從中得到一些智慧。

我獨自一人回約翰尼斯堡時想到了這句話。自一九三四年以來，我已跨過了很多大河：自己家鄉的希爾德敦的路上過了姆巴色（Mbashe）河和大凱（Great Kei）河；去約翰尼斯堡的路上過了奧蘭治河和瓦爾（Vaal）河，但我還有好多河要過。

一九四二年底我通過了學士學位的最終考試。現在我已得到了曾經認爲是多麼高貴的地位。我爲取得學位而自豪，但我已知道學位本身既不是一張護身符也不是輕易走向成功的護照。

在事務所，我與高爾的關係越來越近了，這讓賽德爾斯基先生大爲惱火。教育，高爾爭論說，對我們的進步是必要的，但他指出還沒有一個民族或國家單單通過教育解放自己的。『教育是不錯，』高爾說，『但如果打算依靠教育，得等一千年才能獲得自由。我們貧窮，沒有教師，甚至沒有學校。我們甚至沒有權力受教育。』

高爾相信找到解決方法遠比夸夸其談強。對於非洲人來說，他斷言，變革的發動機是非洲民族議會；它的政策是在南非獲得政權的最好途徑。他強調非洲民族議會提倡變革的悠久歷史，說成立於一九一二年的非洲民族議會是南非最早的全國性非洲人組織。它的章程譴責種族主義，它的主席曾來自不同的部族，它宣揚非洲人作爲南非全權公民的目標。

儘管高爾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實際上他在每一領域都比我強。午餐間隙他常發表即興演

說，他借給我書讀，推薦我與人談話和參加聚會。我在黑爾堡進修過兩門現代史方面的課，我了解好多事實，而高爾卻能解釋特定行動的原因，解釋人們和民族如此行動的理由。我覺得就像重新學習一遍歷史一樣。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高爾對自由鬥爭的全心投入。他是爲追求解放而活着的。有時一天參加好幾個會議，在每次會議上都表現得像一位傑出的演說家。他腦子裡想的似乎只有革命二字。

高爾去參加城鎮顧問團會議和非洲民族議會會議時我都跟着去。我是作爲一個觀察者而不是一個參加者去的，因爲我不記得曾說過什麼。我想理解正在討論的問題，評價人們的辯論，看看這裡人們的才能。顧問團的會議都是例行人事和官僚主義，而非洲民族議會的會議很活躍，人們就議會、通行法、地租、車費——天底下任何影響非洲人的題目進行爭論和討論。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和高爾參加了萬人支持抵制亞歷山德拉公共汽車的遊行，以抗議把車費從四便士漲到五便士。高爾是領導人之一，我親眼目睹了行動中的高爾。這場鬥爭對我影響很大。我已慢慢地從一個觀察者變爲一個參與者了。我發現與自己的人民一起遊行是那麼令人興奮和鼓舞。對其效果我也印象頗深：公共汽車跑了九天空車之後，公司又把車費降到四便士。

高爾的觀點不是我在事務所唯一注意的。漢斯·穆勒（Hans Muller）是與賽德爾斯基有業務聯繫的一個白人房地產代理商，他常常與我一起討論。他是個典型的生意人，通過供求關係來看這個世界。一天，穆勒先生指着窗外說：『往那兒看，納爾遜，』他說，『你看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了嗎？他們在追求什麼？他們爲什麼那麼狂熱地工作呢？讓我告訴你：無一例外，全在追求財富和金錢。因爲財富和金錢等於幸福。你必須爲之奮鬥的是金錢，只有金錢。一旦有了足夠的錢，生活中就沒有什麼可想的了。』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是個做非洲人房地產生意的混血種人。他從工商業工人聯盟（ICU）退休，這是南非第一個黑人工會，由克來門斯·卡德里（Clements Kadalie）建立。但這些年來他的觀點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納爾遜』，他說，『我涉足政治多年，而對其中每一分鐘都感到後悔。我把生命中最好的年華用在爲了虛僞和自私的人服務上面，他們假裝爲人民服務，實際上卻把自己的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政治只是從窮人那兒偷錢的騙局。』

賽德爾斯基先生不參加討論。他似乎覺得討論政治像參與政治同樣是浪費時間。他一次又一次勸我遠離政治。他告誡我注意高爾和沃爾特·西蘇魯，『這些人會毒害你的思想。』他說。『納爾遜，』他問道『你不是想當律師嗎？』我說：『是的。』『而如果當律師，你

想當個成功的律師，對嗎？』我又一次說，『是的。』『而一旦你與政治沾邊，』他說：『你的業務就會受到影響。常常是你工作伙伴的政府部門就會找你的麻煩。你會失去所有客戶，你會破產，你會妻離子散，你會坐牢。如果涉足政治，這一切都會發生。』

我仔細傾聽他們的談話，認眞權衡着他們的觀點。所有這些觀點都有些道理。我已傾向於以某種形式參與政治，但卻不知道以什麼形式或如何參與，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提到我的職業，高爾不僅僅給我忠告。一九四三年初的一天，此時我已在事務所幹了快兩年了，高爾把我叫到旁邊說：『伙計，只要我在事務所，他們就永遠不會定合同把你收爲學徒，不管你有沒有學位。』我有些吃驚，告訴高爾說不可能，因爲他甚至沒有受過律師培訓。『這沒什麼關係，納爾遜，』他繼續道，『他們會說，我們有高爾，他可以向我們的人民解釋法律，爲什麼還需要別人？高爾已經在給事務所帶客戶了。不過，他們不會當着你的面說的，而只是拖了再拖。對於我們國家將來的鬥爭來說，你成爲律師非常重要，因此我打算離開事務所，自己開個房地產代理公司。我走之後，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收你當學徒。』

我請求他不要辭職，不過他決心已定。他在幾天之後向賽德爾斯基先生遞交了辭職書，而賽德爾斯基先生最終也踐約收我爲學徒。我不能說這是否與高爾不在有關係，但他辭職又一次證明了他的慷慨大度。

一九四三年初，通過南非大學的考試後，我爲畢業一事返回黑爾堡。我決定去大學之前給自己置備一套好衣服。爲此，我不得不向沃爾特·西蘇魯借錢。我去黑爾堡時曾穿過一套新衣服，是國王給我買的。現在回去時我還將穿一套新衣服。學位服又是從朋友和校友蘭德爾·費特尼（Randall Phetheni）那兒借的。

幾年前就畢業了的侄兒K·D·馬坦奇馬（Matanzima）開車把我母親和國王的遺孀諾·恩格蘭送來參加典禮。我母親在那兒我很高興，而諾·恩格蘭的到來使我感到國王本人也在爲此祝福一樣。

畢業之後，我與達利旺高（Daliwonga）（K·D的族名，我都這樣叫他）在他加馬塔（Qamata）的家待了幾天。達利旺高已選擇了走傳統領導的道路。他即將成爲艾米格蘭特（Emigrant）滕布領地的首領，艾米格蘭特滕布領地在川斯凱的最西部。我與他在一起時他極力勸說我取得律師資格後回烏姆塔塔，『爲什麼要待在約翰尼斯堡？』他說，『這更需要你。』

這話不錯，川斯瓦的職業非洲人當然比川斯凱多。我告訴達利旺高，他的建議不太成熟。但我內心裡知道我正承擔不同的義務。通過與高爾和沃爾特的友誼，我開始認識到我的責任是對於全部人民的，而不僅僅是對某一特別部分或分支。我感到生命的溪流正將我從川

斯凱帶走，帶到一個中心，在此對地區和種族的忠心讓位於一個共同目標。

黑爾堡的畢業典禮給我提供了一次反省和回顧的機會。看到原來的設想和現在實際的經歷這麼不一致我大吃一驚。我已放棄了原來不切實際的想法，即大學畢業自動成爲領導者，我與滕布王室的聯繫保證我受到尊重。有一份成功的職業和稱心的薪水已不再是我的最終目標。我發現自己已陷入政治的世界，因爲我已不滿足於原來的設計。

在約翰尼斯堡，在我的活動範圍裡，常識和實踐經驗比高等學府的文憑更重要。即使在取得學位時，我也認識到在大學裡學的東西與新環境幾乎一點關係都沒有。在大學裡，老師避開類似種族壓迫、黑人缺少機會和一套征服黑人的法規等話題。但在約翰尼斯堡的生活中，卻每天都遇到這些事情。誰也沒告訴我如何消除種族偏見的罪惡，我必須從試驗和錯誤中學習。

一九四三年初我回到約翰尼斯堡後，我考入威特沃特斯蘭德讀法學士學位，這是成爲律師的預備性知識訓練。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人稱『智慧大學』，坐落在約翰尼斯堡中北部的布拉姆芬坦（Braamfontein），被許多人認爲是南非第一流的講英語的大學。

在法律事務所的工作使我第一次與白人正式接觸，而大學使我認識了一幫與我年齡相當的白人。在黑爾堡曾經偶爾接觸了來自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羅得斯大學的白人

學生，但在『智慧大學』，我與白人學生一起去聽課。這對他們和對我一樣新鮮，因爲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人學生。

南非講英語的大學是培養自由價值觀的土壤。這些機構允許黑人學生入學，直到一九五九年所有講英語的私立大學被禁止這樣做，這是它們的一大貢獻，對於布爾語大學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

儘管大學裡有自由思想，我在那兒卻從沒感到過十分舒適。除了奴僕似的工人外，我一直是唯一的非洲人，從最好的意義上說被認爲是一種好奇，從最壞的意義上說是一個闖入者。這可不是什麼好事。我一直很謹慎，既遇到過慷慨好心又遇到過怨恨敵視。雖然我發現了一個有同情心的白人集團，我與他們成了朋友後來成了同事，但智慧大學的大多數白人都不是自由派或非種族歧視者。我想起有一次去聽講演晚了幾分鐘，在一個同學薩雷爾·泰吉（Sarel Tighy）旁邊的座位上坐了下來，他後來成爲聯合黨在議會中的議員。雖然講演已經開始，而且只有幾個空座位，只見他自負地收拾起自己的東西，挪到一個遠離我的座位。這類表現已成了慣例而絕非例外。沒有人說異教徒這個詞，他們的敵意是無聲的，但我知道這沒什麼不同。

我們的法律教授哈羅（Hahlo）先生是個嚴厲、理智的人，他不能容忍他的學生有獨立性。講到女人和非洲人時，他對法律持古怪的觀點：這兩種人都不是當律師的料。他說，他

的觀點是，法律是一門社會科學，女人和非洲人沒有紀律性，不能掌握如此錯綜複雜的事物。一次他曾告訴我說我不應在智慧大學學習，而應在南非大學取得學位。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我卻沒有反駁。我作爲一個法律學生的表現非常沈穩。

在智慧大學，我見到了許多人，與我在政治鬥爭中共沉浮，沒有他們我將一無所成，許多白人一反常人的態度，盡力使我感到受歡迎。在第一學期我認識了喬·斯羅夫（Joe Slovo）和他未來的妻子魯斯·福斯特（Ruth First）。那時像現在一樣，喬有一個我所遇見過的最尖銳、最深刻的頭腦。他是一位熱情的共產主義者，以勇敢聞名。魯斯個性開朗，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兩人都是南非猶太移民的孩子。我還開始了與喬治·比佐斯（George Bizos）和布拉姆·菲希爾（Bram Fischer）一生的友誼。喬治，一位希臘移民的孩子，既有同情心又思想銳利。布拉姆，一位兼職講師，是一個顯赫的在南非長大的白人家庭後裔：他祖父曾是奧蘭治河殖民地的總理，父親是奧蘭治自由邦的首席法官（Judge－president）。雖然他本來能成爲南非的一位總理，他卻成了我所認識的爲自由鬥爭的最勇敢、最忠實的朋友。我還結交了托尼·奧多德（Tony O'Dowd）和哈羅德·沃爾普（Harold Wolpe），他們倆都是政治激進主義者，都是共產黨員。

我還與幾個印度人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雖然在黑爾堡時有幾個印度學生，但他們住單獨的旅館，我很少與他們交往。在智慧大學，我認識和結交了伊斯梅爾·米爾（Ismail

Meer）、J·N·辛格（J·N·Singh）、艾哈邁德·布拉（Ahmed Bhoola）、拉姆拉爾·布里亞（Ramlal Bhoolia）。這個緊湊團體的活動中心是伊斯梅爾的公寓，霍爾瓦德大廈（Kholvad House）一三層，市中心一座居民樓裡的四間房。我們在那兒學習、談論、甚至跳舞到凌晨。這兒成了年輕的自由戰士的總部。有時太遲了趕不上回奧蘭多的末班火車我就睡在那兒。

伊斯梅爾·米爾頭腦聰明、辦事認眞，他誕生在納塔爾，在智慧大學法學院時就成了川斯瓦印度人大會的重要支持者。J·N·辛格是個受人歡迎的、瀟灑的小伙子，他與所有膚色種的人都和平相處，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天，伊斯梅爾、J·N·辛格和我匆匆趕往霍爾瓦德大廈，我們一起上了電車，這車雖然允許印度人坐卻不允許非洲人坐。我們剛上不久，售票員轉向伊斯梅爾和J·N·辛格，用布爾語說道：『異教徒朋友』不能坐。伊斯梅爾和J·N·辛格對售票員大發雷霆，說他甚至不懂『異教徒』是什麼意思，這個名字冒犯了我。售票員馬上停下車，叫來一個警察，警察逮捕了我們，把我們帶到車站，並罰了我們款。我們被命令第二天到法院。當天晚上，伊斯梅爾和辛格讓布拉姆·菲希爾爲我們辯護。第二天，法官似乎害怕布拉姆，因爲布拉姆的父親是奧蘭治自由邦的首席法官。我們立即被宣判無罪，我親眼看到正義並不是完全盲目的。

智慧大學向我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理想、政治信仰和辯論的世界，一個熱心於政

治的世界。我置身於同一代白人和印度人知識分子中間，這一代年輕人將成爲今後幾年政治運動最重要的先鋒。我第一次發現堅定地參加解放鬥爭的同齡人。他們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特權，但他們都準備着爲被壓迫者的事業而犧牲自己。

第三章　自由戰士的誕生

十一

我不能明確地指出我是何時開始投身政治的，我是何時意識到將投身於自由鬥爭的。無論承認與否，身爲一名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他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離不開政治。一個南非人的孩子是生在黑人專用醫院裡，坐黑人專用公共汽車回家，住在黑人區，並用黑人商店買來的嬰兒食品餵養，如果他要上學的話，只能去黑人學校。

當他長大起來，他只可以找個黑人的工作維持生活，在黑人城鎮租房子住，乘黑人專用火車，並且會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時候被攔截住，命令出示通行證，沒有的話就會被捕並關進監獄。他的生活被種族主義的法律和法規所限制，這些阻止了他的成長，使其潛力難以發揮，並阻礙了他的生活。這就是現實，一個人可以有許多種方法來對付它。

我沒有頓悟，沒有得到特殊的啓示，也沒有取得瞬間的眞理，而只有一種成千次的蔑視、成千次的侮辱、成千次不能忘記的時刻的積累，促成了我的憤怒和反抗，渴望同囚禁我

的人民的制度進行鬥爭。我並沒有在哪一天宣布從今以後我將把自己貢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相反，我只是發現了自己正在這麼做，而且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情。

我已提到了許多影響過我的人，但我更多地是受到了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的智慧指引。沃爾特強壯，理智，經驗豐富而且富於獻身精神。他從不會在危機面前茫然失措。當其他人都在大聲疾呼時，他常常默默地聽着。他相信非洲民族議會會給南非帶來變化，是黑人的希望和動力的源泉。人們有時能夠根據組織的成員來判斷一個組織的情況，我知道我會爲與沃爾特加入同一個組織而感到自豪。那時沒有多少可選擇的。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歡迎所有人參加的組織，它把自己看作是一把能向所有黑人提供庇護的巨傘。

變化在四十年代顯現出來。一九四一年，羅斯福和邱吉爾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它重申了對個人尊嚴保證，並傳播了一系列民主的原則。西方有些人把憲章視爲空頭許諾，但我們這些非洲人則不這樣看。受到《大西洋憲章》以及盟軍反專制和壓迫鬥爭的鼓舞，非洲民族議會建立起了自己的憲章，稱爲《非洲人聲明》，要求給予所有的非洲人以完整的公民權，購買土地的權利，以及取消所有歧視性法規。我們希望政府和普通南非人會看到我們在自己家園爲之奮鬥的原則與他們在歐洲爲之鬥爭的目標是一致的。

沃爾特在奧蘭多的家是活動家們和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們的聖地。那是一個溫暖、令人愉

快的地方，我也常去那兒，或是討論政治，或是品嚐馬西蘇魯（MaSisulu）的烹飪手藝。一九四三年的一個晚上，我見到了安東・倫貝德（Anton Lembede）和A・P姆達（A・P・Mda）。從我聽到倫貝德講話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看到的是一個像磁鐵般吸引人的人，他見解獨到，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那時是南非少數的黑人律師之一，也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創建者之一——可敬的皮克斯利・塞姆（Pixley Seme）博士的法律伙伴。

倫貝德說，非洲是黑人的大陸，再次聲明並追索討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的時機到了。他痛恨那種認爲黑人劣等的情結，批評那些他認爲是嚮往或崇拜歐洲人及其思想的看法。他反覆地講到，認爲黑人劣等的情結是解放的最大障礙。他指出一旦黑人得到了機會，就有能力達到與白人同等的發展水平，他還舉出了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W・E・B杜波依斯（W・E・B・Dubois）及黑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這些黑人英雄爲例。他說：『我們皮膚的顏色很美，就像是非洲母親的黑色土地。』他認爲黑人在能成功地發起群衆運動之前，必須先改善他們自身的形象。他宣揚自立和自我決斷，並稱他的哲學爲黑人主義。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爲，有一天他會來領導非洲民族議會。

倫貝德宣布，一種新思想正萌芽於人民之中，種族區別正在消失，年輕人首先要把他們自己看作是非洲人，而不區分爲像科薩人，恩德貝勒（Ndebele）人或茲瓦納（Tswana）人。倫貝德的父親是納塔爾的一個祖魯族文盲農民，倫貝德在亞當斯學院學習當教師。他在

奧蘭治自由邦執教了多年，在那兒學會了南非荷蘭語，並開始視荷蘭藉南非人的民族主義爲黑人民族主義的榜樣。

正如倫貝德後來在一份納塔爾的黑人報紙《Inkundla ya Bantu》上所寫的：『當代史是一部民族主義的歷史。民族主義已在人民的鬥爭和戰火中得到檢驗，並證明了它是反對外國統治和現代帝國主義的唯一武器。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瘋狂地企圖盡一切可能在國外阻止和消除一切民族主義傾向。爲了這一目的，他們毫不吝惜地花費巨額的金錢進行反民族主義的宣傳，民族主義被污蔑爲『狹隘』、『不開化』、『沒修養』、『殘忍』等等。有些他們的異已成爲這一陰險宣傳的受騙者，並隨之成爲帝國主義的工具，爲它出了大力，而這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高度稱讚，冠以如下的褒揚之辭：『有教養』、『自由』、『進步』、『大度』等等。

倫貝德的觀點觸動了我。家長式的英國殖民主義和讓白人視爲『有教養』、『進步』和『開化』的人的口號也曾吸引過我。我當時正在被拉進英國人要在非洲建立的黑人菁英的行列。這也是從國王到賽德爾斯基（Sidelsky）先生和其他所有人對我的希望。但這是夢想。我也像倫貝德一樣，開始認識到鬥志昂揚的黑人民族主義才是武器。

彼得·姆達是倫貝德的朋友和伙伴。倫貝德看問題不太明確，傾向於長篇大論，而姆達則有節制，一針見血。倫貝德表現得模糊而神秘，姆達則表現得具體而有科學性。姆達的務

實性同倫貝德的理想主義完美地呼應。

其他一些年輕人的想法也一致，我們集在一起討論這些思想。這些人除了倫貝德和姆達外，還有沃爾特·奧利佛·坦博、來昂內爾·馬喬伯茲（Lionel Majombozi）博士，我過去在希爾德敦的教師維克多·姆鮑（Victor Mbobo），共產黨員、醫學學生威廉·恩科莫（William Nkomo），來自納塔爾的記者喬丹·恩古巴納（Jordan Ngubane），他在銷售量最大的黑人報紙《班圖世界》及《INKUNDLA》報社工作；還有其他許多人。許多人感到不平的是，非洲民族議會整體上已成了一個保護那些疲憊、無鬥志和有特權的黑人菁英的地方，這些人關心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利甚於群衆的權力。我們一致認爲必須採取某種行動。馬喬伯茲博士和他的學生威廉·恩科莫，提議組織一個青年團，在非洲民族議會領導者的身上點上一把火。

一九四三年，由倫貝德、姆達、西蘇魯，恩科莫和我組成的代表團去拜訪了蘇馬博士，他當時是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在索菲亞鎮有個相當大的家。蘇馬博士除了有個小農場外，家裡還有一個診所。他曾爲非洲民族議會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非洲民族議會的規模和重要性都減小的情況下，正是他從塞姆博士手中接過了領導權並使之脫離了休眠的狀態。當他接管主席位置時，非洲民族議會只有十七先令六便士的財產，而他則把總數增加到了四〇〇〇英鎊。他受到傳統領導人的崇敬，與內閣官員們有關係，並且漸漸地滋生了安全和自

信的感覺。但他身上總帶有一種不適於存在於一個組織領導人身上的優越感。他在給人看病上投入的精力要比對非洲民族議會還多。蘇馬當時管理代表團，信件及電報方面的工作。他將一切都以英國的方式來進行，儘管我們都反對，但他仍認爲大家都是君子。他喜愛與白人部門所建立起的關係，不想由於政治行動而使它們陷入困境。

在開會時，我們告訴他，我們打算組織一個青年團，發起一場動員群衆支持的運動。我們隨身帶去了一份章程草案和聲明的影印本。我們認爲並告訴他，非洲民族議會處於被同化的危險中，除非它能行動起來，採取新的措施。蘇馬醫生被我們的代表團嚇壞了，強烈反對青年團章程。他認爲青年團應是一種更爲鬆散的團體，主要作爲非洲民族議會的後備隊。蘇馬博士以一種家長式的方式告訴我們，黑人團體無組織無紀律，不能參加群衆運動，並說進行這樣的運動是草率和危險的。

在見過蘇馬博士後不久，青年團的臨時委員會成立了，由威廉姆·恩科莫領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委員會成員來到布隆方丹參加非洲民族議會年會，在那裡他們提議成立青年團來幫助吸收新成員加入組織。提議被接受了。

青年團是於一九四四年復活節的星期天在埃洛夫（Eloff）大街的班圖社會中心正式成立的。當時那裡約有一〇〇人，有些人從遙遠的普利托利亞趕來。這是一個精選的團體，菁英的團體，我們中的很多人是黑爾堡的畢業生。因而我們還說不上是進行一場運動。倫貝德

作了關於民族歷史的報告，他從古希臘講到中世紀的歐洲，再講到了殖民者時代。他強調了非洲和黑人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並指出白人把自己當作特殊的人種及天生的優越種族是多麼地愚蠢。

喬丹·恩古巴納、A·P姆達和威廉·恩科莫都發了言，強調了黑人民族主義精神的出現。在會議上，倫貝德被選爲主席，奧利佛·坦博爲秘書長，沃爾特·西蘇魯爲財務主管。A·P姆達、喬丹·恩古巴納、來昂內爾·馬喬伯茲、康格來斯·姆巴塔（Congress Mbata）、大衛·波帕普（David Bopape）及我當選爲執行委員會成員。後來又有很多傑出的青年參加到我們當中，比如由教師轉爲律師的戈弗雷·皮提（Godfrey Pitje）、阿瑟·雷特勒（Arthur Letele）、威爾遜·康科（Wilson Conco）、迪利扎·姆吉（Diliza Mji）和恩塔托·莫特拉納（Ntatho Motlana），他們都是醫生。工會會員丹·特魯米，律師喬·馬修斯（Joe Matthews）和杜馬·諾克威（Duma Nokwe）。在會後不長的一段時間裡所有的省都建立起了基層組織。

青年團的基本政策與一九一二年非洲民族議會的第一個章程沒有區別，但我們重申和強調了那些基本事實，它們中的許多已被拋開。黑人民族主義是我們的戰鬥口號，我們主張建立起一個包括多種族的國家，推翻白人政權，建立起眞正民主政府。我們發表了鬥志昂揚的民族主義宣言，宣稱：『我們相信黑人的民族解放將由黑人自己來實現……青年團組織必須

作黑人民族主義的智囊團和發電站。』

宣言徹底否定了受托管理概念，即認爲白人政府或多或少還將黑人的利益放在心上。我們列舉了過去四十年中損害和反對黑人的法規：首先是一九一三年的《土地法》，它最終剝奪了黑人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所有權，而他們就出生於這片土地上；一九二三年的《城市法》，製造出大量的黑人貧民窟，被虛僞地稱爲『民族居住地』，實際上是爲了給白人的工業提供廉價勞動力。一九二六年的《種族隔離法》限制了黑人從事技術性工作；一九二七年的《土人管理法》使得英國王室高於最有權威的酋長而成爲整個黑人地區的至上統治者；最後在一九三六年，《土人代表法》取消了黑人在開普的投票權。凡此種種，粉碎了一切認爲白人會允許黑人掌握自己命運的幻想。

我們對共產主義特別謹愼。文件聲明：『我們可以從外國意識形態中借鏡某些東西，但我們反對把外國思想體系全盤引進非洲。』這是對共產黨的一種含蓄的指責，倫貝德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爲共產主義是一種『外國的』意識形態，並不適合非洲的情況。倫貝德覺得共產黨是被暗中破壞黑人的自信和主動精神的白人把持着。

那一天成立了幾個委員會，但青年團的首要目標是爲非洲民族議會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指出方向。儘管我也同意這一點，但我仍對加入青年團感到緊張，擔心我政治責任的範圍。那時我整天一面工作一面忙於學業，幾乎沒什麼時間來參加這兩項活動。我心裡也有些

不安的情緒，覺得比起像沃爾特，倫貝德，姆達這些人，我在政治上很落後。他們有自己的想法，而我的思想體系則尚未形成。我仍缺乏作為一名演說者應具有的信心，青年團裡許多人的雄辯口才也讓我感到怯場。

倫貝德的非洲人主義沒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因為他的思想中帶有種族排他性的特點，這使其他一些青年團員感到不安。一部分青年團員覺得將有同情心的白人包括在內的民族主義更為理想。我對此不以為然。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反對這一想法，認為如果黑人接受一種多種族形式的鬥爭，他們就仍會仰慕白人文化，並繼續懷有自卑感。那時我強烈地反對允許共產黨人或白人加入青年團。

沃爾特的房子是我的第二個家。四十年代初的好幾個月裡，我沒有其他地方可待，它確實成了我的家。沃爾特的家中總是賓客盈門，關於政治的討論好像是永遠都在進行着。沃爾特的妻子阿爾貝蒂娜（Albertina），是個聰明而出色的列席者，她是沃爾特政治工作的堅定支持者。（在他們的婚禮上，安東·倫貝德曾說：『阿爾貝蒂娜，你嫁了一個已婚者：沃爾特早在遇到你之前就跟政治結婚了。』）

我是在西蘇魯的家中的休息室中遇到的我的第一個妻子伊夫琳·梅斯（Evelyn Mase）。她是個從農村來的文靜、漂亮的女孩，看來西蘇魯家中的來往客人並未讓她感到

慌張。她當時跟阿爾貝蒂娜和彼得·姆達（Peter Mda）的妻子羅斯（Rose）一起，正在約翰尼斯堡的『非歐洲人總醫院』中接受護士訓練。

伊夫琳來自距烏姆塔塔西部約二十五英里的川斯凱的恩格佐博。她的父親是一名礦工，她還是個嬰兒時父親就去世了。十二歲時，她母親也死了。伊夫琳結束初中學習時，被送往約翰尼斯堡上高中。她被送去同她的哥哥山姆·梅斯（Sam Mase）住在一起，梅斯當時住在西蘇魯的家裡。沃爾特的母親馬西蘇魯是埃維林父親的第一個妻子的姐姐。西蘇魯一家把伊夫琳當成自已的女兒，非常愛她。我們第一次見面後不久我就約伊夫琳出去。幾乎是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們就墜入了情網。幾個月後她接受了我的求婚。我們在約翰尼斯堡的『土人委員法庭』舉行了只需簽名和一名證婚人的簡單的結婚儀式，因爲我們沒有錢舉行傳統的婚禮和宴會。我們最緊迫的問題是找個地方住。我們先是到了東奧蘭多她哥哥家住，後來又到了深礦市（City Deep Mines）伊夫琳的姐姐家住，她姐夫是那兒的一名職員。

十二

一九四六年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決定了我政治發展的方向和鬥爭的方式，一九四六年，瑞福（Reef）的七萬名黑人礦工進行罷工。四十年代初期，在J·B·馬科斯、丹·特魯米、高爾·拉德貝以及一些非洲民族議會的勞工活動家的號召下，『黑人礦工工會』（AMWU）

建立了起來。在瑞福工作的黑人礦工多達四十萬人，其中絕大部分人一天的工錢不到二先令。工會領導不斷敦促礦業協會把最低工資水平提爲每天十先令，並向工人提供住房和兩周的帶薪假期。但礦業協會拒絕了工會的要求。

在這次南非歷史上最大的罷工中，礦工們團結一致，堅持了一周。政府的報復是殘酷無情的：罷工領袖遭到了逮捕；礦區被警察包圍；『黑人礦工工會』辦公室也遭到洗劫。警察凶狠地鎮壓了一次遊行，導致了十二名礦工的死亡。土人代表委員會被迫中止了抗議活動。我有幾個當礦工的親戚，在罷工的那一周裡我走訪了他們，同他們討論了問題並表示了我的支持。

J·B·馬科斯是一名非洲民族議會的老成員，他也是共產黨員，那時擔任着黑人礦工工會的主席。馬科斯生於川斯瓦，是個混血兒。他有獨特幽默感和領袖的氣質，淺色皮膚，高個子，有個像長頸鹿般的脖子。罷工期間我常常與他一同從一個煤礦到另一個煤礦，與工人們交談，制訂策略。他從早到晚都表現出冷靜和理智的領導風格，即使在最危急之時他的幽默也深深地感染和激勵着別人。工會即使在受到殘暴壓制之下仍表現出了很強的組織能力和對它的成員的制約力，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終政府佔了上風：罷工被鎮壓，工會也被摧毀。這次罷工是我與馬科斯的親密關係的開始。那時我經常到他的住處拜訪，我們詳盡地討論了我對共產主義的反對意見。馬科斯是

一名堅定的共產黨成員，但他從不把我的反對態度歸結爲我個人的原因，他認爲一名年輕人擁護民族主義是很自然的，只要我年紀再大一些，經歷更多一些，我的視野也就會開闊起來。我也曾同摩西·科坦尼及優素福·達杜進行過同樣的討論。他們兩人也像馬科斯一樣，認爲共產主義必須適應非洲的現狀。非洲民族議會的其他共產主義者都譴責我和其他的青年團員，但馬科斯、科坦尼和達杜從不這樣做。

罷工之後，包括科坦尼和馬科斯及許多共產黨人在內的五十二人被逮捕並受到起訴，他們被控煽動的罪名而不僅僅是暴動。這是一場政治審判，政府想以此來顯示它對『赤色威脅』絕不手軟。

就在這一年，另一事件迫使我改變了我整個政治工作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斯馬茲政府通過了《亞洲籍人土地使用權法》，該法剝奪了印度人的行動自由，劃定印度人居住和貿易的地區，並嚴格地限制他們購買土地的權力。作爲回報，他們得到了通過白人代理的在議會中的代表資格。川斯瓦印度人大會主席達杜嚴厲批評這些限制，並將議會代表權斥爲『虛僞權利的欺騙性代表權』而加以拒絕。這一法律也被稱爲《種族隔離法》，它給印度社團帶來嚴重的打擊。在它之後，《集團居住法》出爐了，該法最終將限制南非所有有色人種的自由。

印度社團憤怒了。他們協同一致，發起了一場爲時兩年的消極抵抗運動來反對這些措

施。在達杜和納塔爾印度人大會主席G·M·奈克爾的帶領下，印度社團發起了一場群衆運動，其嚴密的組織和參加者的獻身精神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主婦、牧師、醫生、律師、商人、學生和工人都站到了抗議活動的前列。在兩年的時間裡，人們中止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而積極投入到了鬥爭之中。他們舉行了群衆集會，占領並監管了爲白人保留的土地。在鬥爭中，兩千多名自發的示威者被關進了監獄，達杜和奈克爾博士也被判六個月的苦役。

這一運動僅限於印度社團參加，他們沒有鼓勵其他團體來參與。儘管這樣，蘇馬博士和其他黑人領袖仍在多次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們與青年團一起，對印度族人民的鬥爭表示了毫無保留的道義上的支持。政府利用嚴厲的法律和恐嚇分化了這次運動，印度人民進行了一場異乎尋常的反對種族壓迫的抗議運動，而這正是非洲民族議會和黑人從未做到的。但我們青年團和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目睹了這一過程。伊斯梅爾·米爾與J·N·辛格中止了他們的學業，告別家人進了監獄。還只是一名高中生的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也這樣做了。我曾常常同伊斯梅爾·米爾到阿米那·帕哈德（Amina Pahad）家吃午飯，但在突然間，這位迷人的婦女放下圍裙，爲了信仰而進了監獄。如果說我過去曾對印度社團反對壓迫的意願有疑問的話，那麼現在我再也不會這麼想了。

印度人的運動成爲我們一直在青年團中提倡的抗議運動的模式。它給人們心中灌輸了一

種反抗及激進主義的精神，粉碎了對監獄的恐懼，並增強了川斯瓦印度人大會和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聲望和影響。他們提醒了我們，自由鬥爭不僅僅是發表演講、舉行會議、通過決議和派遣代表的問題，而是表現爲嚴密的組織和鬥志昂揚的群衆運動，而最重要的則是願意遭受苦難和犧牲的思想。這次印度人的運動讓人回想到發生在一九一三年的消極抵抗運動，當時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i）（後來更名爲莫漢達瑪 Mahatma）帶領一群混亂的印度族人的隊伍非法地穿過納塔爾到川斯瓦。那是歷史事件了，但這次的運動卻發生在我的眼前。

早在一九四六年初，伊夫琳和我就搬到了我們自己在奧蘭多東區的一所兩間的住宅，隨後又到了奧蘭多西區八一一五號的一間稍大一些的房子裡。奧蘭多西區是一個骯髒而簡陋的地區，在這兒建有一些火柴盒式的市政住宅，後來該區成爲大索韋托（Greater Suweto）的一部分。索韋托是『西南城鎮』一詞的縮寫。我們的房子位於被當地居民稱爲『西崖』的地區，它同北部由白人居住的豪華郊區相連。

我們新居的租金是每月十七先令六便士。它同其他幾百間房子一樣，建在骯髒的路上的一塊郵票大小的土地上。同別的屋子一樣，它也是同樣的鐵皮屋頂，同樣的水泥地，同樣狹窄的廚房和後部帶馬桶的廁所。儘管外面有路燈，但由於不通電，我們在屋裡還得使用煤油

燈。卧室很小，一張雙人床幾乎占據了所有的地面。這些房子是市政當局爲需要住在鎮子附近的工人建造的。有些人爲了減少單調感，開闢了小花園或把門塗上明亮的色彩。房子簡直說不上大，但它是第一個眞正的屬於我自己的家，我仍感到非常自豪。一個男人只有當他擁有了自己的房子才能稱爲男人。不過那時我並不知道在很多很多年後，它仍是唯一完全屬於我的家。

政府把房子分配給伊夫琳和我，因爲我們當時新添了一口人。那一年我們的第一個兒子馬迪巴·坦伯凱Madiba Thembekile 出生了。他取了我的馬迪巴宗族的姓氏，小名叫坦比（Thembi）。他是個結實、活潑的小男孩，多數人說他更像他的母親。我現在有繼嗣了，儘管我幾乎不能留給他什麼，但我已使曼德拉這一名字和馬迪巴家族續上了香火，而這是一名科薩族男人的最基本的責任之一。

我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窩，我也由別人家的客人變成了招待客人的主人。我的妹妹莉比（Leabie）和我們住到了一起，我將她送到鐵路對面的奧蘭多高中去讀書。在我的觀念中，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有權要求其他任何的成員款待他們。我人口衆多的家庭同我新居相結合，也意味着我有了大量的客人。

我喜愛家庭生活，儘管我沒多少時間來享受它。我喜歡跟坦比嬉鬧，給他洗澡，餵他吃飯，送他上床並給他講小故事。事實上我喜愛同孩子玩，同他們聊天；它一直是最讓我能感

到平靜安詳的事情之一。我喜愛輕鬆地待在家中，靜靜地讀書，吮吸廚房中沸騰着的鍋子中散發出來的香甜滋味。但從一開始，我就很少能有機會待在家中享受這一切。

那一年的後半年，邁克爾·斯考特（Michael Scott）神父來跟我們住在一起。斯考特是一名聖公會教士，同時也是一名為黑人權力而鬥爭的偉大鬥士。曾有一個名為科莫（Komo）的人同斯考特進行過聯繫，此人是位於約翰尼斯堡外一個居民區的代表，政府正打算將這個居民區遷走。他希望斯考特能對搬遷提出抗議。斯考特說：『如果我打算幫助你，我必須成為你們中的一員』。於是他搬到了這個居民區居住，開始了在那裡的傳教活動。斯考特住的這個由棚屋組成的小鎮是無家可歸者建的，它位於一個岩石墩上，建立於北非戰爭之後，居民們叫它『托布魯克』（Tobruk）。我時常在星期天早上帶坦比去那兒玩，他愛在岩石中玩捉迷藏。斯考特在該地建立組織後，發現科莫挪用了人們為反對遷移而捐贈的錢財。當斯考特阻止科莫的行為時，科莫把斯考特趕出該地並威脅要殺死他。

斯考特到奧蘭多我們的住處來避難，並帶來一個叫德拉米尼（Dlamini）的黑人牧師，這人也帶着妻子和孩子。我們的房子很小，斯考特睡在起居室，德拉米尼和他妻子睡在另一間房，我們讓所有的孩子睡在廚房中。斯考特神父是個謙虛而不擺架子的人，但德拉米尼卻有點不好相處。吃飯時他總是抱怨食物。『瞧這個』，他總是說，『你們做的這肉，又沒油水又硬，做得根本不對。我不習慣吃這樣的飯。』斯考特對此很驚慌，他告誡了德拉米尼，

但德拉米尼從不注意。第二天晚上他又可能說，『這次比昨天稍好一點了，但還說不上做得好。曼德拉，你知道你的妻子就是不會做飯。』

德拉米尼間接地引起了狀況的改變，因爲我太想把他從家中弄走了，我自己去了那個居民區，告訴他們斯考特是他們眞正的朋友，不像科莫，他們應該在這兩人中作出選擇。他們於是進行了選擧，斯考特取得了勝利，於是他帶着德拉米尼搬回了那個地方。

一九四七年初，我結束了三年合同制學徒生活，我在威特金（Witkin）、賽德爾斯基和埃德爾曼律師事務所的日子宣告結束。爲獲得我的法學士學位，我決定成爲一名全日制學生，這樣我就可以到外面自立並成爲一名辯護律師。失去我在賽德爾斯基每月八英鎊十先令一便士的收入對我來說是場災難。我向約翰尼斯堡『南非種族關係研究院』所設的『班圖福利基金會』申請一筆二五〇英鎊整的貸款以資助我學習法律。其中包括大學學費，教科書以及每月的開支。他們給了我一筆一五〇英鎊的貸款。

三個月以後，我再次寫信給他們，提出我的妻子要休產假，我們將失去她的顯然對我們的生活極爲必需的十七英鎊的月薪。我確實收到了追加的錢，我對此很感激，但爲了這筆貸款的遭遇卻很不幸。我們的女兒瑪卡茲韋（Makaziwe）出生時沒有什麼麻煩，然而她卻脆弱而多病。從一開始我們就擔心這最壞的結果。許多個夜晚，我和伊夫琳輪流看護她。我們

不知道是什麼在折磨着這個弱小的女孩，醫生們也解釋不出原因所在。伊夫琳結合了母親的不知疲倦的精神和護士的職業能力，悉心地照顧着這個嬰兒。瑪卡茲韋在九個月時死去了。伊夫琳幾乎瘋了，而唯一能讓我減輕痛苦的方法就是努力去安撫她。

在政治上，人算不如天算。一九四七年七月，我正跟倫貝德進行有關青年團工作的非正式討論，他忽然向我訴苦說感到胃痛並伴有發冷。當疼痛加劇時，我們送他去了科羅內中（Coronation）醫院，當晚他就去世了，年僅三十三歲。他的死深深地影響了很多人。沃爾特看起來幾乎被悲痛擊倒。他的死也使運動受到影響。因爲倫貝德有很多辦法，並能吸引其他人加入組織。

彼得·姆達接替了倫貝德的職務，彼得具有很強的分析能力和簡潔明瞭的表達能力以及豐富的策略經驗，這使他成爲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青年團的傑出領袖。姆達身材清瘦，沒有多餘的體重，正如他不說多餘的話一樣。他有容忍不同觀點的氣度，他的想法比倫貝德還要成熟和高明。這就使姆達的領導地位超過了倫貝德。

姆達認爲青年團應作爲一種內部勢力集團和非洲民族議會的一支鬥志昂揚的民族主義的羽翼，推動該組織一個新紀元。那時非洲民族議會沒有一個專職的雇員，組織普遍薄弱，工作有很大的隨意性。（後來沃爾特成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專職的非洲民族議會工作人員。

他只拿一份極少的薪水。）

在Z·K·馬修斯和人類學講師戈弗雷·皮提的指導下，姆達很快在黑爾堡建立了一個青年團的分部。他們招募傑出的學生加入，帶來了新鮮血液和新思想。在最傑出的學生當中有馬修斯教授聰明的兒子喬（Joe），還有羅伯特·索布克威（Robert Sobukwe），他是一名傑出的演說家和深謀的思想家。

姆達的民族主義思想比倫貝德要溫和一些，而且他的思想中也沒有倫貝德式的種族色彩。他痛恨白人壓迫和白人統治，但並不是恨白人本身。在反對共產黨方面他也不像倫貝德或我那麼激烈，我是青年團中對白人左派人士持懷疑態度的人之一。雖然我已跟許多白人共產黨人做了朋友，但我對非洲民族議會中白人的影響很謹慎，也反對與共產黨一起聯合行動。我擔心共產黨人想打着聯合行動的幌子來接管我們的運動。我認爲解放我們的將是一種純粹的黑人民族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或多種族主義。我甚至同青年團裡的一些同事做出了破壞共產黨會議的舉動：襲擊會場，撕掉海報，搶走麥克風。十二月份的非洲民族議會全國會議上，青年團提出了一個要求排斥所有共產黨份子的動議，但我們悲慘地失敗了。儘管一九四六年印度族舉行的消極抵抗運動對我產生了影響，但我對印度族人的看法同對共產黨的看法一樣，他們想要操縱非洲民族議會，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受教育程度高，有經驗和受過訓練。

一九四七年，我被選入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的執行委員會，在川斯瓦地區主席C·S拉莫哈諾（Ramohanoe）手下工作。這是我在非洲民族議會的第一個職位，也成爲我獻身於該組織的一個里程碑。在此之前，我所爲它作出的犧牲無外乎在周末時離開妻子和家庭或者晚上很晚回家。我從未直接參與過非洲民族議會的任何一次重大的運動，也還不理解一名自由鬥士在生活中所要面對的危險和永遠不會窮盡的困難。我並未被迫對自己的責任付出代價，我只是隨波逐流，我被選入川斯瓦地區的執行委員會後，我自己同大會便融爲了一體，同它一道抱有希望和感受失望，取得成功和遭受失敗。我可是全心全意地同它連成一體了。

拉莫哈諾是又一個使我受益非淺的人。他是一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和一位熟練的組織者，他能夠在不同意見中搞平衡，提出一個適中的妥協方案。儘管拉莫哈諾不同情共產黨，他仍跟他們合作得很好。他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民族組織，應當歡迎所有支持我們事業的人。

一九四七年，在印度消極抵抗運動的前夕，非洲民族議會、川斯瓦印度人大會和納塔爾印度人大會三方主席蘇馬博士、達杜和奈克爾在博士提出的盟約上簽了字，同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是黑人和印度人運動走向團結所邁出的重大一步。他們沒有建立一個中央

政治機構來領導各類所有的運動，而是同意在有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其後，有色人種組織『非洲人民組織』（APO）也加入了這個盟約。

但這一協議充其量也是暫時的，因爲每個民族團體都有自己認爲特別重要的問題。比如，印度人或有色人種幾乎不受通行證制度的約束。區域法遭到印度人的抗議，卻幾乎沒有影響到黑人。那時有色人種團體更爲關心的是種族劃分和保留工作，這些問題同樣也幾乎不關黑人和印度人的事。

『博士盟約』爲將來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種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因爲它尊重各個團體的獨立性，同時承認要靠協同行動才能取得成果。誠然，自一九五〇年成立至今的由非洲民族議會、南非印度人大會、共產黨及其它團體組成的聯盟便是源於一九四七年的『博士盟約』。

『博士盟約』促成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一系列不分種族、反對政府的運動，這些運動力求將黑人和印度人團結在一起投入爭取自由的鬥爭。首先爆發的是第一屆川斯瓦及奧蘭治自由邦『人人享有選舉權』人民大會運動，這場運動旨在爭取讓南非所有黑人都能享有選舉權。蘇馬博士在我主持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宣布非洲民族議會將參加這次運動。那時我們認爲運動應由非洲民族議會組織進行，當得知非洲民族議會不能擔任領導時，全國執行委員會決定非洲民族議會退出這次運動。那時我的觀點是非洲民族議會應當只參加自己領導的運

動。我更關心的是誰能通過運動提高聲望而非運動的成功與否。

非洲民族議會退出了這次運動後，川斯瓦地區非洲民族議會主席拉莫哈諾仍發佈了一個聲明，號召該省的黑人參加爭取『人人享有選舉權』的運動，這顯然違背了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的。這是全國執行委員會所不能容忍的。在爲解決糾紛而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被要求對拉莫哈諾的違紀行爲提出不信任的動議。我感到了我的職務和個人忠誠、對組織的責任和對朋友的責任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我很清楚我將要對一個人的行爲進行譴責，而我從未懷疑過這個人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他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作出的貢獻遠比我的要多。我知道他的號召實際上是很高尚的，他認爲黑人應當幫助他們的印度兄弟。

但拉莫哈諾的違紀程度太嚴重了，像非洲民族議會這樣的一個組織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的，它比其中任何一個個人都更重大，對組織的忠誠比對某個個人的忠誠更重要。我同意帶頭對他進行批評，提出譴責他的動議。奧利佛·坦博附和了我。這引起了會場中一陣騷亂，那些支持他們地區主席的人和站在執委會一邊的人激烈爭吵起來，會議在混亂中破裂了。

十三

非洲人不能參加選舉，並不意味着我們就不關心選舉結果。在一九四八年的白人大選中，斯馬茲（Smuts）將軍領導的執政的聯合黨與復興的國民黨針鋒相對，在對國際問題的

立場上尤其如此。斯馬茲將軍使南非在二戰中站在盟軍一邊，而國民黨卻拒絕支持大英帝國並公開同情納粹德國。國民黨的競選活動以『黑色威脅』（swart gevaar）爲中心，以兩個並列的口號爲基礎，『黑人待在自己的位置上』（Die Kaffer op sy plek）和『印度人滾出去』（Die Koelies uit die land）——Coolies是阿非利卡人對印度人的蔑稱。

丹尼爾·馬蘭（Daniel Malan），這位荷蘭改良教會的前首腦和報紙編輯，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是一個爲仇恨所激發的黨——他們仇恨長期視他們爲下等人的英國人，也仇恨他們認爲威脅其文化的繁榮和純潔的非洲土著人。非洲土著人對斯馬茲將軍無忠誠可言，對國民黨就更談不上了。

馬蘭的主張即所謂的種族隔離。這是一個新名詞、老思想。它的字面意思是『分離』。它是對一個壓迫性的法律法規體系的總結，這個體系確保白人優越於非洲人。

過去三百年來的每一個瞬間都只是使這個極其殘忍、範圍廣闊而無可逃遁、力量占絕對優勢的獨石般的制度更加牢固。種族隔離的前提是白人優越於黑人，目的是使白人優越性永遠存在。即國民黨所說的，『白人必須永遠是主人』，簡言之就是『baasskap』，字面意思是治權，一個字道出了白人優越權的殘暴和可怕。這一政策得到荷蘭改良教派的支持，他們爲了給種族隔離政策奠定宗教基礎，大肆鼓吹阿非利卡人是上帝的選民，而黑人是卑賤的人種。

國民黨的勝利宣告了英國人對阿非利卡人的統治時期進入了尾聲，這是盎格魯對荷屬南非戰爭的最後一戰。英語將退居阿非利卡語之後成爲第二官方語言。國民黨的口號表明了他們的使命：『Eie volk eie taal，eie land』——『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國家。』在歪曲了的阿非利卡人的宇宙起源說中，國民黨的勝利簡直就像上帝的選民旅行到了迦南地（上帝賜給的土地）一樣。這是神的旨意的實現，是對他們所說的南非將永遠是白人家園的證明。

這次勝利令人大吃一驚。聯合黨和斯馬茲將軍已經打敗了納粹，相信也一定能擊敗國民黨。大選那天，我和奧利佛（Oliver）等人參加了約翰尼斯堡的一個會。我們幾乎沒有討論一個關於國民黨政府的問題，因爲我們不希望它出現。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夜，黎明時我們走出來，發現一個報童正在賣的《蘭德每日郵報》（Rand Daily Mail）：國民黨勝利了。我驚呆了，感到一絲不安，但是奧利佛想得更深。『我很高興，』他說，『我很願意這樣。』我不明白爲什麼。他解釋道，『現在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的敵人是誰和我們該採取什麼立場了。』

甚至連斯馬茲將軍都意識到了這種野蠻的思想的威脅性，譴責種族隔離是一個『根源於偏見和恐懼的瘋狂的說法』。從國民黨當選的那一刻起，我們知道南非將從此成爲充滿壓迫和鬥爭的地方。在南非歷史上，一個單一的阿非利卡人的政黨首次把持了政府。『南非又一

次屬於我們了。』馬蘭在勝利後的演說中宣稱。

同年，青年團在一份由姆達（Mda）起草、聯盟執行委員會通過的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它熱情洋溢地呼籲所有愛國青年推翻白人統治。我們刪去了認爲非洲人首先是作爲一個經濟上的階級而不是作爲種族被壓迫的共產主義理論，加上的是我們需要在非洲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在非洲人自己的領導下，掀起一場強有力的民族解放運動。

我們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分配土地；廢除禁止非洲人從事技術工作的膚色壁壘；以及自由和義務教育的必要。此文件亦彌合了非洲民族主義中兩個相互對立的理論的一些分歧，一方面是較激進的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所提倡的『非洲人的非洲』，另一方面是青年團認爲的南非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的非洲人主義。

我是非洲民族主義的超革命潮流的支持者。我對白人不滿，而不是對種族主義。在我做好準備把白人掀到海裡去之前，如果他們能登上自己的蒸汽船自願地離開這塊大陸，我會非常高興。

相對來說青年對印度人和混血人種要友好一些，認爲印度人和非洲人一樣是受壓迫的，但是印度人還有祖國印度可以指望。混血人種也是被壓迫的，但是他們不像印度人，除了非洲他們沒有別的祖國。我甚至準備接納印度人和混血人種，如果他們接受我們的主張的話；

但是他們的利益和我們不一樣，我懷疑他們是否能眞正接受我們的想法。

不久，馬蘭開始實行他的邪惡計劃。上臺幾周之內，國民黨政府就赦免了羅比·萊布蘭特（Robey Leibbrandt），他是組織起義支持納粹德國的戰爭罪犯。政府聲稱他們將阻止貿易聯盟運動，取消印度人、混血人種和非洲人有限的投票權。《分別選舉代表法》最終剝奪了混血人種在國會中的代表席。《禁止混合通婚法》於一九四九年實施，緊接着是認爲白人和非白人的同居關係非法的《不道德行爲修正法》。《人口登記法》給所有南非人貼上了種族的標簽，使膚色成了衡量一切人唯一的和最重要的標尺。馬蘭又推出了《集團住區法》——這是他所說的『種族隔離的精髓』——要求在城區把各個種族分隔開來。總之，白人以強力奪取了土地，現在又通過法律擁有了它。

作爲對來自政府的新而更加有力的威脅的回答，非洲民族議會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歷史性的路。一九四九年是非洲民族議會的里程碑，由此開始了把自己變成一個眞正民衆組織的努力。青年團草擬了行動方案，其核心是發動一場動員民衆的戰役。

在非洲民族議會布隆方丹舉行的年會上，非洲民族議會採納了青年團的行動方案，即抵制、罷工、罷市、消極抵抗、示威抗議以及其他群衆運動形式。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非洲民族議會過去總是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合法的範圍內。青年團看到了合法的罷工形式在反抗

種族壓迫中的失敗；現在整個組織準備進入一個更爲積極的時期。

這些轉變並非沒有來自內部的壓力。大會前幾周，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奧利佛·坦博（Oliver Tambo）和我在蘇馬（Xuma）博士的索菲亞鎮的寓所裡秘密集會。我們認爲，繼甘地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一九四六年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之後，群衆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了。在壓迫面前，非洲民族議會已經變得十分溫順。我們說，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必須準備違背法律，並在必要的時候像甘地一樣爲了自己的信念坐牢。

蘇馬博士堅決反對，認爲這種策略是不成熟的，只會給當局以鎮壓非洲民族議會的藉口。他說，這些抗議形式最終將在南非出現，但此時此刻走這一步將是致命的。他明確告訴我們，他是一個有廣泛而豐富經驗的醫生，不會去冒進監獄的危險。

我們給蘇馬博士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他支持我們提出的行動計劃，我們就答應支持他再次競選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如果他不支持我們，我們也不支持他。蘇馬博士發火了，指責我們敲詐，竟然在支持他的問題上提條件。他說我們年輕，驕傲自大，一點也不尊重他。我們企圖說服他，但沒有用，他不同意我們的方案。

他毫不客氣地於晚上十一點把我們趕出了他家，關上了他身後的門。索菲亞鎮沒有街燈，這一天也沒有月亮；我們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早已停止運行了。而我們住在數英里外的奧蘭多（Orlando）。姆達傷心地說，蘇馬至少應該給我們提供點交通

工具。沃爾特和附近一家人關係不錯，於是我們投奔他們而去，希望能收留我們一晚上。

在十二月份的大會上，我們青年團決定不投蘇馬博士的票。我們提名J·S·莫羅卡（J·S·Moroka）作另一位候選人。他並不是我們的第一選擇。Z·K·馬修斯（Z·K·Matthews）教授才是我們希望的領導者，但是馬修斯認爲我們太激進，行動計劃太不切實際。他稱我們爲幼稚的煽動者，並補充說我們將隨年齡的增長而成熟。

莫羅卡博士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選擇。當我們第一次接近他時，他一直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是非洲人國民『理事會』。他既不了解非洲民族議會也不是一個有經驗的實行家，但他是值得尊敬的，願意接受我們的方案。和蘇馬一樣，他也是個醫生，是南非最富有的黑人之一。他曾在愛丁堡和維也納學習。他的曾祖父曾是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一個首領，十九世紀曾以張開的雙臂和土地作爲禮物歡迎過阿非利卡人，後來被出賣了。蘇馬博士失敗了，莫羅卡博士成爲非洲民族議會主席。沃爾特·西蘇魯被選爲新的秘書長，奧利佛·坦博被選進了執委會。

行動方案在大會上通過了，它號召通過新的鬥爭形式來爭取政治權利，承認抵制、罷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等的作用。另外還號召舉行全國罷工以抗議政府的種族主義和反動政策。

這是和過去文雅的反抗的決裂，許多非洲民族議會的忠實追隨者在這個相對來說較爲激烈和積極的新階段將悄然退出。青年團的成員，包括我在內，已經成長得較爲成熟。我們現在將引導非洲民族議會走上一條更爲激進和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遠處慶祝青年團的勝利，因爲我自己不能參加會議。我當時在一家法律機構供職，他們不允許我花兩天時間到布隆方丹去參加會議。這家機構是比較自由的，但要求我專心本職工作而忘掉政治。如果我參加會議就會丟掉工作，我還不能夠承擔這一後果。

大規模群衆運動的洪流掀起了，但是我一直不相信和共產黨人及印度人一起能有什麼作爲。一九五○年三月，川斯瓦（Transvaal）非洲民族議會，川斯瓦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組織和共產黨區委組織了『保護言論自由大會』，約翰尼斯堡的馬基特廣場（Market Square）上聚集了一萬多人。莫羅卡博士沒有和執委會商量，就同意主持大會。大會是成功的，但我仍保持警惕，因爲這次行動的組織者是共產黨。

在共產黨和南非印度人大會的鼓動下，大會通過一個被稱爲自由日的五月一日總罷工的決議，號召廢除《通行證法》及所有歧視性立法。儘管我支持這些建議，但我相信，共產黨人試圖從非洲民族議會的全國抗議日中獲取漁翁之利。我反對五月抗議日，因爲非洲民族議會沒有發起這次運動，要知道我們應該致力於我們自己的運動。

艾哈邁德·卡特拉達（Ahmed Kathrada）那時還不到二十一歲，和所有年輕人一樣，渴望施展拳腳。他是川斯瓦印度人青年大會的關鍵人物，曾經聽說我反對五月的罷工。一天，我走在街上，遇上了卡特拉達，他怒氣冲冲地看着我，指責我和青年團不想與印度人和混血人進行合作。他以一種挑戰的語氣說，『你是非洲人的領導而我是印度青年。但是我有把握得到非洲民衆對罷工的支持，我和你打賭，如果我們倆在隨便一個非洲城鎮的會議上候選，我敢肯定人們會支持我。』這是空洞的威脅，但同樣使我惱怒。我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向南非印度人大會抱怨，但是伊斯梅爾·米爾（Ismail Meer）使人平靜下來，他說：『納爾遜，他年輕頭腦發熱，你不要和他一樣。』於是我有點不好意思，收回了說過的話。儘管我不贊成凱西（Kathy），但我佩服他的勇氣，這件事成爲我們的笑料。

五月一日罷工在沒有非洲民族議會公開支持的情況下舉行了。不出所料，政府禁止了五月一日所有的聚會。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工人在這一天待在家裡。晚上，沃爾特和我在西奧蘭多，儘管政府有限制，人們還是爲自由日聚會，我們在人群邊上。月色很好，當我們觀看示威者秩序井然的遊行隊伍時，我們看到一隊警察部署在約五〇〇英尺外的小溪旁。他們一定也看到了我們，因爲突然間他們就向我們這邊開火了。我們趴到地上，看到騎警衝向人群，用警棍亂抽。我們在附近修道院躲避時，可以聽見子彈射到外面牆上的聲音。在這次不分青紅皀白的突然襲擊中，有十八名非洲人死亡，許多人受傷。

不顧抗議和譴責，國民黨的回答是加緊鎮壓。幾周後當局實施了臭名昭著的《鎮壓共產主義法》，非洲民族議會在約翰尼斯堡召開了緊急會議。該法取締了南非共產黨並宣佈其爲非法。共產黨員或以共產主義爲行動目標將被判處十年監禁。但是，這個法的範圍是如此之廣，以致把除了最溫和的反政府抗議之外的一切都宣佈爲非法，把任何主張『以騷亂和不安定的方式，推動聯邦內部的政治、工業、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宣傳都視爲犯罪。實質上，這個法使當局可以宣佈任何組織爲非法，限制任何反對其政策的人士。

非洲民族議會、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大會再次聚會討論這些新情況。他們中的達杜（Dadoo）博士說，再容許過去的分歧妨礙反對政府的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愚蠢的。我發言重申了他的觀點：顯然，對任何一個自由組織的鎮壓就是對所有自由組織的鎮壓。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奧利佛預言：『今天是共產黨，明天就輪到我們的貿易聯盟、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大會、非洲民族議會。』

在南非印度人大會和非洲人民大會的支持下，非洲民族議會決定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全國性抗議，抗議政府五月一日屠殺十八名非洲人和《鎮壓共產主義法》的通過。這個建議被批准了，在準備示威的過程中，我們加強了和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人民大會以及任何反對政府及其壓制政策的黨的聯繫。這時，我堅信，有足夠的威脅促使我們與我們的印度人和共產主義同事們攜起手來。

這一年早些時候，我被增選進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取代了因連選主席失利而辭職的蘇馬博士。我十年前來到約翰尼斯堡時，是蘇馬博士幫助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當時一點也沒想過會介入政治。我沒有忘記這些事。現在，作爲執委會成員，我將和非洲民族議會大多數高層人物一塊共事了。我從一個組織中牛虻式的角色變成了另一個我曾反對過的組織的領導人之一。這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在特定的問題上，成爲持不同意見者是很自然的事，因爲你不用負責任。而作爲執委會成員，我必須判斷和作決定，並且準備着接受像我一樣的持不同意見者的批評。

根據我的經驗，政治罷工總是比經濟罷工更危險。一次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簡單的如增加工資削減工時的罷工更危險，需要尤其有效的組織。抗議日與其說是經濟的不如說是政治的罷工。在南非這樣一個罷工爲犯罪、言論和行動自由的權利被殘忍地扼殺的地方，如此大規模的群衆運動是很危險的。一名非洲人罷工，不僅要冒失業的危險，而且可能喪失整個在他居住的這塊土地上生活和生存的權利。

爲給六月二十六日的行動作準備，沃爾特在全國旅行，與當地領導人磋商。他不在時，我負責繁忙的非洲民族議會辦公室——一次複雜的全國性行動的中樞——的工作。每天，各類領導人都要檢查一切是否按計劃進行了。他們是：摩西·科坦尼（Moses Kotane）、達杜

博士、迪利扎·姆吉（Diliza Mji）、J·B·馬克斯（J·B·Marks）——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優素福·卡查利亞（Yusuf Cachalia）和他的兄弟毛爾維（Maulvi）、高爾·拉德貝（Gaur Radebe）——行動委員會秘書長、邁克爾·阿梅爾（Michael Harmel）、彼得·拉博羅科（Peter Raboroko）和恩塔托·莫特拉納（Ntatho Motlana）。我負責協調全國各分部的行動，通過電話和地方領導交談。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準備工作很緊湊。

抗議日是非洲民族議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政治罷工的第一次嘗試，取得了溫和的勝利。在城市，大多數工人待在家裡，黑人商人關上了他們的商店。在貝瑟爾（Bethal），格特·西班德（Gert Sibande）——後來成爲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主席——領導了五〇〇〇人的示威，上了全國所有報紙的頭條。抗議日鼓舞了我們的士氣，使我們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給了馬蘭政府一個警告：我們在種族隔離面前不會屈服。六月二十六日從此被視爲自由鬥爭中的一個里程碑，在自由運動中被稱作自由日。這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感到非常振奮，這種興奮來自於計劃周密的對敵鬥爭的成功和與難以克服的罪惡作鬥爭時產生的同志情誼。

我認識到，鬥爭是完全消耗型的。投身於其中的人是不能有家庭生活的。在抗議日期間，我的第二個兒子馬克加索（Makgatho）降生了。他來到這個世界上時，我和妻子伊夫琳（Evelyn）一起在醫院裡，但這只是我活動中一個短暫的休息。取這個名字是爲了紀念

塞法科·馬波哥·馬克加索（Sefako Mapogo Makgatho），他曾於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四年任非洲民族議會的第二任主席。馬克加索是佩迪（Pedi）酋長的兒子，領導了志願者們對禁止非洲人在普利托利亞人行道上行走的膚色壁壘的抗議。他的名字對我來說是不屈服和勇氣的象徵。

同時期的一天，妻子告訴我，我的大兒子，五歲的泰默比（Thembi），問她：『爸爸住在哪？』我總是在深夜才回到家，在他入睡之後很久，早晨又在他醒來之前很早就離開家。我很遺憾不能和孩子們待在一起。這些日子我非常想念他們，這之前我並不知道我將和他們分開幾十年。

這時，我更清楚地知道了什麼是我反對的，比我追求的更加明確。我長期以來的反共立場坍塌了。摩西·科坦尼（共產黨的總書記兼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成員），常常到我家和我暢談一夜。科坦尼是川斯瓦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子，他頭腦清醒，自學成才。『納爾遜，』他總是說，『你反對我們什麼?我們與共同的敵人作戰。我們並不想掌握非洲民族議會；我們都是在非洲民族主義的範圍內工作。』最後，我無言以對。

因爲我和科坦尼、伊斯梅爾·米爾以及魯斯·福斯特（Ruth First）的友誼，加上我親眼目睹的他們的犧牲，我越來越認爲我對這個黨的偏見是不正確的。非洲民族議會內的共產黨

員，如J·B·馬克斯、埃德溫·摩福桑亞納（Edwin Mofutsanyana）、丹·特魯米（Dan Tloome）、大衛·波帕普（David Bopape），和其他人一樣是勤勉而富有獻身精神的。自由戰士達杜博士，一九四六年抵制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就更沒說的了，他是一個以爭取人權爲己任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民族英雄。我不能也不會再懷疑這些人的誠意了。

儘管我不再懷疑他們的忠誠，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實踐基礎仍知之甚少。由於我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在和共產黨朋友進行政治討論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無知常成爲障礙。我決心補上這一課。

我找來了馬恩列斯毛的全部著作，開始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只有很少的時間來系統學習。當我爲《共產黨宣言》所激勵時，又被《資本論》給困住了。但我發現自己深深地被無階級社會的觀念吸引了，在我的心目中，它和共有共享的傳統非洲社會並無二致。我贊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那言簡意賅的黃金定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辯證唯物主義似乎既提供了研究種族壓迫的綫索又提供終結它的工具。它使我超越了僅僅從白人和黑人的關係上分析形勢的局限性，如果我們的鬥爭要取得勝利，我們必須站在更高的高度。尤其吸引我的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因爲我總是傾向於相信我能夠論證的東西。它對經濟的唯物主義分析對我來說尤其令人信服。商品的價值由投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理論特別適合存在實際奴隸勞動的南非現實。統治階級付給勞動人民僅夠生存的工資，

卻把他們擁有的商品加價出售。

對自由鬥士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號召眞是美妙無比。鬥爭、革命和變革推動歷史前進的觀點多麼吸引人啊。在我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時候，我了解到許多世界上的政治實踐家面臨同類問題時的情況。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解放運動十分重視，蘇聯尤其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鬥爭。這就是我爲什麼修正對共產黨人的看法並歡迎他們和非洲民族議會並肩戰鬥的另一原因。

一個朋友曾問我是如何把非洲民族的宗旨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信仰結合起來的。對我而言，這二者並不矛盾。我首先是致力於把我們從少數人統治下解放出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的非洲民族主義者。但與此同時，南非和非洲大陸還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問題，儘管獨特而典型，但並不是徹底與衆不同的。一種把所有問題置於更大範圍內國際性的和歷史性的背景下、放在歷史進程中考慮的哲學是很有價值的。我準備用一切辦法消除人類偏見，消滅沙文主義和殘暴的民族主義。我不必變成一個共產黨人以便和他們共事，我發現非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許多相同點而不是分歧。世俗的人總是說共產黨人在利用我們。但是誰能說我們不是在利用他們呢？

十四

如果說在國民黨上臺之前，我們還多少對其存有幻想和希望的話，這種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們所說的黑人待在自己的地方並不是一句空話。繼《鎮壓共產主義法》之後，一九五〇年通過的《人口登記法》和《集團住區法》成了種族隔離政策的堅固柱石。如前所述，《人口登記法》使政府有權正式地以種族來給所有南非人劃分等級。種族成了南非社會的試金石。各種武斷和無聊的鑑別使同一個家庭的成員被分成不同的等級，導致了無數悲劇事件。是黑人還是混血人，是混血人還是白人，一切取決於其膚色的深淺。一個人應該住在那裡，在那裡工作荒唐地取決於其頭髮的卷曲和嘴唇的厚度之類的特徵。

《集團住區法》是居住隔離的基礎。法律規定，每一個種族都有各自專屬的土地、房屋，並且在各自獨立的區域內進行貿易。從而，印度人只能在印度的地方，非洲人在非洲人的地方，混血人在混血人的地方。如果白人想要其他族的土地，他們只須宣佈這裡是白人區就可以得到。過去，白人靠武力奪取土地，現在靠立法。《集團住區法》宣告強制遷移時代的開始。規劃中的『白人區』附近的非洲人社區、城鎮和村莊都被野蠻地遷走，因爲附近的白人土地所有者不想和非洲人住得太近，或者就是爲了要黑人的土地。

強制遷移的最大受害者是索菲亞鎮——一個擁有五萬居民的約翰尼斯堡最大最古老的黑

人居住區。儘管貧窮，索菲亞鎮的生活卻豐富多彩，孕育着新的有價值的非洲人文化生活的雛形。在政府下令遷移以前，它有着與其人口不相稱的重要的象徵意義。

接下來的一年政府通過了另外兩個法案，直接損害混血人和非洲人的權利。《分別選舉代表法》蓄意把混血人中限制在開普（Cape）一個單獨的選區內，進而削弱他們一百多年來享有的選舉權。《班圖權力法令》它廢除了『土著人代表理事會』這個間接的非洲人的代表機構，代之以政府任命的部落、地方和地區三級會議的體制。其目的是把權利移交給傳統的多爲保守的部落首領，以強化正在淡化的種族差別。這兩部法令是國民黨一慣作法的典型體現，他們想毀滅什麼卻裝作要保持它。束縛人民權利的法令無一例外地被描述爲保護這些權利。

有色人種爲反對《分別選舉代表法》而聯合起來了，一九五一年三月在開普敦組織了大型集會，四月組織罷工、罷市和罷課。這就是由沃爾特在一次小型集會上對我們提出的全國範圍內不服從運動。行動在得到印度人、非洲人和有色人贊同的背景之下和運動主義精神鼓舞下進行。他們的計劃是在全國範圍內征集志願者向某些法令挑戰，甚至準備坐牢。

和所有人一樣，這個計劃立刻吸引了我。但我與沃爾特的分歧在於由誰來參加這次運動。我最近當上了青年團的主席，從我的角度我主張這次運動應是單一的非洲人。我認爲，

普通的非洲人，對與印度人和混血人聯合行動還心存不安。在我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不斷進步的同時，我仍然對印度人的影響心有餘悸。許多土生土長的非洲人視作爲店主和商人的印度人爲黑人勞動的剝削者。

沃爾特強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他說印度人、混血人和非洲人已經難分難解了。這種觀點得到執委會中甚至被認爲最頑固的民族主義者的支持，我的看法被否決了。但我仍堅持己見，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全國大會上，我又一次提出這種看法，然而代表和執委會成員一樣堅決地反對。既定的意見被非洲民族議會的最高決策層否決了，我也就全盤接受了既定的方針。我的宣傳『單獨行動』政策的演說反應冷淡的同時，作爲青年團主席所作的支持新聯合政策的報告則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受命成立的聯合行動委員會由莫羅卡博士、沃爾特、J·B·馬克斯、優素福·達杜和優素福·卡查利亞組成，非洲民族議會通過了呼籲政府廢除《鎮壓共產主義法》、《集團住區法》、《通行證法》、《分別選舉代表法》、《班圖權力法》和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通過的《家畜限制法》。這一法令表面上是要控制耕牛過度呑噬牧場，實質上也是爲了剝奪非洲人的土地。委員會決定，由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舉行一次示威，作爲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的開始。同一天南非人將慶祝簡·範里貝克（Jan Van Riebeeck）到達開普三〇〇周年；四月六日是南非白人紀念建國的日子——也是非洲人三百年奴隸生涯開始的日

子。

非洲民族議會致函政府總理，告知他這些行動計劃以及取消歧視性法令的最後期限。由於這封信是以莫羅卡博士的名義起草的，他本人卻沒有參加，於是我奉命駕車到他位於奧蘭治自由邦布隆方丹附近的塔巴恩丘鎮的寓所把信送給他，這是全國最保守的一個地區。但是我差一點沒能見到他。

幾星期以前，我剛參加了駕駛考試。那時，只有少數黑人擁有汽車，駕駛執照對非洲人來說很稀罕。考試那天，我是借了一輛車去參加的。多少有點得意，於是我決定自己駕車去。因爲走得晚，所以開得比正常要快。當我順着街邊駕車來到一條大路時，沒有看兩邊就和對面一輛車相撞了。損失不大，但我無疑要遲到了。那位司機相當通情達理，我們約定各自負責自己的費用。

當我到考試地點時，看到我前面一位白人婦女正在考試。她開得十分小心翼翼。考試結束後，主考官說：『謝謝，請把車停在那。』他指了指旁邊一塊空地。這位婦女考得不錯，足以通過了，但停車的時候她沒有處理好，後輪跳了起來。主考官跑過來說：『很抱歉，夫人，你沒有通過，請下次再來。』我的自信心減弱了。這傢伙連白人婦女都不讓通過，我就更沒希望了。但是我考得非常好，考完他讓我停車時，我是如此的小心以致於我都怕他責備

我動作太慢。

一旦取得了執照，我便成了專職的出租車司機。車那麼少又幾天才有一趟，因此運送同志和朋友便成爲義不容辭的責任。就這樣我被派去給莫羅卡博士送信。對我來說這沒什麼困難的，我一向認爲開車的時候看窗外新鮮有趣的景色是一種享受。駕車穿過鄉村，清風拂面之時，是我思維最活躍的時刻。

在去塔巴恩丘（Thaba 'Nchu）的路上，我路過克龍斯塔德（Kroonstad）——在約翰尼斯堡南一二〇英里的一個保守的自由邦城鎮。我爬上一座山，看到兩個白人男孩在前面騎着自行車。我的車開得還不是太穩，離他們又太近，所以當其中之一不經示意突然轉彎時，我們相撞了。他被撞倒在地，呻吟着，我下車準備幫他的忙。他示意我拉他起來，正當我打算這樣做時，一個白人卡車司機大叫我不要碰這個男孩。卡車司機也衝着男孩喊，於是他把手放下似乎不願我拉他起來了。男孩傷得不重，卡車司機把他帶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當地警察不一會就來了，這個白人警官看了我一眼，說：『黑鬼，大便（喻笨蛋）！』我被這場事故和他的話驚呆了，但是我仍以肯定的語氣回答，如果我想大便自然就大便，用不着你告訴我。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氣勢洶洶地向我逼近。等他走得很近了，我說：『我是個律師，如果你敢動我一下，我就上法庭告你，你要後悔一輩子的。』這是我唯一的武器，我用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看到他遲疑了，似乎一時找不到話說，於是我進一步說：

『事實上，如果你不公平地行使職權，我也要控告你。』這時他才掏出本子記錄現場。阿非利卡警察最驚奇的還不是一個黑人竟然威脅要送他上法庭，而是他能講英語。

我說明身份後，他開始轉向車內進行搜索。從後座墊底下，他搜出了我在出事後藏在那裡的一些左翼周刊（信我已經藏在襯衣裡了）。他看了一眼標題，然後就像更一個海盜拿戰利品一樣把它舉在空中：『我抓到一個共產黨！』他揮舞着報紙跑了，留下一個下級非洲警察看着我。

我試圖和我的同類說話，但他看上去很不友好。他效忠於他的上司而不是我。那個警官一個多鐘頭後和另一名長官一塊回來了。這個阿非利卡人警官企圖盡職盡責。他說他必須對事故現場進行勘查，進行警察局例行的記錄。我依然陶醉在先前的成功裡，對他說，事故發生在白天，晚上進行測量是不合法的。我還說我想在塔巴恩丘過夜而不是克龍斯塔德。警察不耐煩地看着我，說：『你叫什麼？』

『曼德拉。』我說。

『不，我問的是前一個名字，』他說。我告訴了他。

『納爾遜，』警官就像對小孩一樣說，『我很願意幫你繼續旅行。但是如果你不合作的話，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不客氣地關你一夜了。』一句話使我清醒了，我同意測量。

這天夜裡很晚我才開始繼續旅行，次日清晨我經過埃克塞爾西奧（Excelsior）區的時

候，我的車走不動了：汽油用完了。我走到附近一間農舍，用英語向一個白人老婦說明希望能借點汽油。她邊關門邊說：『沒有油借給你這樣的人。』我跑了兩英里到了下一間農舍，吸取上一次的教訓，我採取了不同的方式。我要求見主人。他出來後我採取了很謙恭的態度，我說：『我的主人沒汽油了。』這位熱情而樂於助人的農場主是斯特里多姆（Strydom）總理的親戚。不過，我相信如果我不用可恨的『主人』這個字眼而是告訴他眞相的話，他是不會給我汽油的。

和莫羅卡博士的會晤就沒那麼多麻煩了。他對信沒意見，我也就一路順風地回到了約翰尼斯堡。給總理的信宣稱，非洲民族議會對於通過合法的方式實現我們的法律目標已經厭煩了，我們要求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廢除六個『不平等法令』，否則我們就要採取法制以外的行動。馬蘭的回覆由他的私人秘書簽字，他說白人有與生俱來的權利採取措施使他們成爲一個獨立的群體，最後他威脅說，如果我們採取行動，政府將毫不猶豫地盡全力來撲滅任何叛亂。

我們把馬蘭的斷然拒絕視爲下戰書。別無選擇只能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了。我們開始認眞地爲群眾運動做準備。吸收和訓練志願者是這次行動的基本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勝負。四月六日，首次示威在約翰尼斯堡、普利托利亞、伊利莎白港、德班和開普敦舉行。

當莫羅卡博士在約翰尼斯堡的自由廣場上給群衆講話時，我正在服裝工人協會裡和一群後備志願者談話。我對這幾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人說，志願行動是艱苦而危險的，因爲當局將迫害、監禁甚至襲擊志願者。無論當局做什麼，志願者都不能還擊，否則就削弱了這次行動的意義。他們必須以非暴力對暴力，要不惜一切代價堅守原則。

五月三十一日，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在伊利莎白港開會，宣佈蔑視運動將於六月二十六日開始，也就是全國抗議日一周年那天。他們還成立了全國行動委員會指揮這次行動，全國志願者委員會負責吸收和培訓志願者。我被任命爲全國志願者的領導——行動委員會和志願者委員會主席。我的任務是組織這次行動，和分支機構配合，爲志願者奔走，提供資金。

我們也討論了這次行動是否應該沿着甘地的非暴力道路前進的問題。非暴力運動希望在感化中征服。許多人從單純精神的角度爲它辯護，認爲非暴力在精神上優越於其他一切形式。這種想法得到莫漢達瑪（Mahatma）的兒子、《印度輿論》的主編馬尼拉爾·甘地（Manilal）的肯定，他是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實權人物，由於他優雅的方式，甘地似乎已成爲非暴力運動的化身，他堅持這次運動應該沿着和他父親在印度同樣的路綫前進。

其他人認爲我們應該從策略而不是從原則出發討論這個問題，應該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我們的方針。如果某個方法和策略能使我們戰勝敵人，就應當採用。目前情況下，政府的力量

和我們對比懸殊，如果我們試圖使用暴力就會被擊得粉碎。這時候非暴力的方式對我們比任何空想更實用。這是我的觀點，我視甘地的非暴力方式爲一種形勢所要求的策略而不是不能違背的原則。原則並沒有那麼重要以致於像甘地所認爲的那樣，即便自我毀滅也要堅持。我支持非暴力抗議，只要它能起作用。這種觀點佔了上風，儘管遭到馬尼拉爾·甘地的強烈反對。

聯合行動委員會同意了無限期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計劃。蔑視行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一小部分訓練有素的志願者將在城區有選擇地觸犯法律。他們將不經允許進入被排斥的地區，使用白人的設施如洗手間、專供白人用的火車車廂、候車室和郵局入口。他們將在宵禁後仍秘密留在市區，每一批示威者都有一個隊長負責在行動前通知警察局，以便將逮捕引起的騷亂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個階段的構想是大規模抗議，伴之以全國範圍內的罷工。

蔑視運動爆發前，一次被稱爲志願者日的集會於六月二十二日在德班舉行。納塔爾（Natal）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基耶夫·盧圖利（Lutuli）、奈克爾博士（Naicker）（納塔爾印度人大會主席）都講了話並親自參加行動。我提前一天趕到，是主講人。大約有一萬人參加了集會，我對大家說，蔑視運動將是南非被壓迫群衆所採取的最強有力的行動。我還從來沒對那麼多人演說過，這眞是一次激動人心的經歷。給那麼多人講話當然不能像給一二十人說話那樣，但我還是竭力像給少數人講話一樣把事情講清楚。我告訴他們，你們正在創造歷

史，正在引起全世界對南非種族問題的注意。我強調所有南非非歐洲人的團結將最終變爲現實。

全國所有參加六月二十六日示威的人，無不充滿了熱情、勇氣和歷史使命感。行動於凌晨在伊麗莎白港拉開序幕。三十三名抗議者，在雷蒙德·姆漢拉巴（Raymond Mhlaba）的領導下從只供白人出入的通道進入火車站，隨即被逮捕。他們排着隊唱着自由的歌向跟隨的朋友和親戚走來。作爲回答，示威者和群衆高呼：『回歸非洲！』

二十六日清晨我在非洲民族議會辦公室裡觀察着示威的情況。川斯瓦志願者訂於中午在博克斯堡、約翰尼斯堡之外最主要的黑人聚居區採取行動。他們將在神父N·B·坦契（N·B·Tantsi）的帶領下不經允許進入市區而被捕。坦契神父年紀稍長，是非洲衛理公主教派教堂的主持，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執行主席。

早晨過後，我正在辦公室等待坦契神父從普利托利亞過來，他給我來電話了。他很抱歉地告訴我說，他的醫生建議他不要去示威和坐牢。我向他保證我們將爲他提供禦寒衣物，並且只須在牢裡待一晚上，但沒有用。這眞令人失望，因爲坦契神父是個很出色的人，之所以選擇他也是爲了向公衆顯示我們不是一群暴徒。

我們找了另一位同樣可敬的人來替代坦契神父：那那·西塔（Nana Sita），川斯瓦印度

人大會主席，在一九四六年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中曾坐過一個月的牢。儘管他年事已高，又有嚴重的關節炎，西塔仍不虧為一個戰士，他同意領導我們的示威者。

下午，當我們正準備動身去博克斯堡（Boksburg）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怎麼也找不着當地的非洲民族議會執行秘書，他本應和那那·西塔一起到博克斯堡的。這又是一樁麻煩事。我對沃爾特說：『你必須去。』這是我們在川斯瓦的第一次行動，必須有一個權威人物來領導示威者，否則就好像群衆在受苦的時候領導者卻躲起來了，儘管沃爾特是組織者之一，原定在以後參加抗議，他還是同意了。我最擔心的是他只穿了一件外套，對監禁生活毫不實用，但後來我們設法找了一些舊衣服給他。

優素福和我一起動身到博克斯堡去，我們打算交給那裡的地方官一封信，告訴他有五十二名我們的志願者那天將不經允許進入市區。我們到達官邸後，發現了大批的新聞和攝影記者。我把信封交給地方官時，記者拍下了這個鏡頭。當地官員躲開了鏡頭，邀請我和優素福到他的辦公室私下談談。他較通情理，說他的辦公室永遠對我們敞開，但是過度的宣傳只會把事情弄糟。

從辦公室出來，我們直奔市區，示威已經開始了。還在半英里以外就聽見了我們趕來支持的志願者和支持者宏亮的歌聲。在現場，我們看到通往市區的大鐵門緊鎖着，志願者耐心地等在外面，要求從白人衛兵處通過。一共有五十二名志願者，有黑人也有印度人，是全副

武裝的警察的兩倍。還有數百名熱情的圍觀者和記者。沃爾特站在隊伍的前頭，他的出現表明我們是認眞的。但是眞正起靈魂作用的是那那·西塔，他不顧關節炎，以高度的熱情在示威者中走動，拍拍他們的背，鼓勵他們和自己一樣充滿信心。

第一個小時局勢陷入了僵局。警察不可思議地克制着。這種態度使我們很困惑。難道這只是爲了拖垮志願者？抑或是要等記者們離開後在夜幕下演出大屠殺？還是在逮捕我們的問題上進退兩難——是按老規矩辦呢？——還是照我們說的去做？然而就在我們思考的時候，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一名警官吹了聲口哨，幾秒鐘後警察包圍了志願者，開始逮捕。行動流產了。示威者被拉到當地警署關了起來。

當天晚上，行動委員會的領導們，包括奧利佛·坦博、優素福·卡查利亞和我，參加了本城的一個會，討論日間的情況並爲下星期作準備。這裡離非洲民族議會中央機關主席弗拉格·博謝爾（Flag Boshielo）領導的第二批示威者很近，他們已做好了被捕的準備。十一點剛過，我們就看到他們一起走到街上，十一點開始宵禁，非洲人未經允許不得外出。

半夜我們散會出來。我疲乏極了，這時想的不是不服從，而是大吃一頓，好好地睡一覺。這時，一個警察走近我和優素福。很顯然我們是往家走而不是示威。『不，曼德拉，』警察喊道，『你跑不了。』他冲着停在附近的警車一指，說，『上車。』我想向他解釋，我負責推動行動一天天開展，但是要過幾天才打算示威和被捕。當然，那太荒唐了。我看到當

他抓優素福的時候，優素福爆發了一陣諷刺的笑聲。看他在被警察帶走時仍在笑，眞是愉快。

不一會，優素福和我就置身於弗拉格·博謝爾領導的五十多名示威者中了。他們被卡車帶到了被稱爲馬歇爾廣場的紅磚警署。作爲行動委員會的領導者，我們擔心別人因我們的失踪而着急，我更關心誰來領導運動。但是情緒仍很高。甚至在去監獄的路上，在搖晃的馬車中抗議者都在高唱『上帝保佑非洲』，這是首曲折優美的非洲民歌。

第一天夜裡在操場上，我們中的一位被一個白人衛兵狠狠地推了一下，他跌倒在地扭傷了腳踝。我對這個衛兵的行爲提出抗議。他氣得踢我的小腿。我堅持傷者應得到治療，我們進行了一次小型的有聲抗議。但我們很快得知，如果傷者願意明天可以請醫生。當晚我們被他的呻吟和喊叫弄得整夜不能入睡。

在此之前我零星地坐過幾次牢，這是我第一次集中的體驗。馬歇爾廣場空曠、黑暗、潮濕，但我們大家在一起是那麼興高采烈以致於我很少留意我的環境。監獄裡的同志情誼使兩天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不服從運動的第一天，有二五〇多名志願者在全國觸犯了各種不公正法律而被抓進監獄，這是個輝煌的開端。我們的隊伍井然有序而充滿信心。

緊接着的五個多月，八五〇〇多人參加了這次行動。醫生、工人、律師、教師、學生和官員一起抗議，坐牢。他們唱道，『嗨，馬蘭！快打開牢門，讓我們進去！』這次行動遍及全國，從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到伊麗莎白港、東倫敦（East London）和開普敦，以及開普東西部的小鎮。抵制運動開始向農村滲透。在大多數地方，罪名都很輕，處罰不超過幾天到幾周的監禁，罰款也很少超過十英鎊。這次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從二萬增加到十萬。在東開普，圍觀者增加最快，佔非洲民族議會的新成員的二分之一。

在長達六個月的抗議中，我走遍了全國大部分地方。基本上是乘汽車，晚上或早晨很早出發。我到了開普、納塔爾和川斯瓦，向人們解釋這場運動，有時就在城裡一家一家地走訪。我的任務通常是在那些將要起事或已經起事的地區盡量消除人們的誤解，彌合分歧。那時，非洲人的大眾傳播媒介還相當原始甚至根本沒有，政治生活十分狹窄。我們必須一個一個地爭取群衆。

有一次我到東開普去解決一個由奧爾科特·格溫切（Alcott Gwentshe）引起的爭議，他正在東倫敦領導工作。格溫切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兩年前在組織東倫敦六月二十六日的罷市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他在不服從運動之初就短暫地被捕過。他堅強而能幹，但是個聽不進別人意見、獨斷專行的個人主義者。現在他和自己的多數是知識分子的同事們產生了矛盾。

格溫切很懂得如何利用某些事實打擊他的對立面。他會對當地的工人成員而不是知識分子們說，(用科薩語，而不是英語，因爲英語是知識分子的語言)，『同志們，我想你們都知道我在爲鬥爭奔波。我有很好的職業，可是在不服從運動中因坐牢而失業了。現在我出獄了，那些知識分子卻跑來說，格溫切，我們比你的文化水平高，我們比你能幹，讓我們來領導這次運動。』

待我了解了情況，發現格溫切確實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但是群衆聽他的，他組織了一支紀律嚴明的志願者隊伍，甚至當他在獄中的時候，他們也以一種古老的方式抗議。儘管我認爲格溫切聽不進同事的意見是不對的，但他的工作不錯，基礎扎實，不那麼容易被趕下臺。會見其他執行人員時，我說，目前情況下做什麼都是不現實的，但是如果他們想改變這種情形，下次選舉就必須戰勝他。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和大多數人的意願背道而馳是愚蠢的。想做一件大多數人反對的事是沒有用的，因爲它根本不可能成功。

當局把這次運動視爲對其安全和種族隔離政策的威脅。他們認爲非暴力不合作不是抗議的一種形式而是犯罪，並且深爲不斷增進的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友誼所困擾。種族隔離的目的是把不同的各族分開，而我們卻證明不同的種族可以一起工作。將要形成的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間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聯合戰線使他們大爲不安。國民黨堅持認爲這次運動是共產黨搗

亂分子煽動和領導的。司法部長宣佈他將很快通過方法來制裁我們的抵制。在一九五三年的國民議會上，通過的《公共安全法令》使這一威脅變爲現實，此法令使政府有權制訂戒嚴令，可以不經審訊拘留人民，《刑法修正案》使體罰合法化，並且很快運用到抗議者身上。

當局採取了一系列秘密措施試圖瓦解這次運動。政府的宣傳機器不斷地宣稱，當群衆在監獄裡受難時，運動的領導者們卻過得舒舒服服。這種說法與事實相去甚遠，但仍產生了一定的效果。當局派出間諜和秘探滲透到組織裡。非洲民族議會確實歡迎每一個願意加入的人。儘管我們的志願者在被選中參加抗議以前都是經過仔細考察的，警方還是試圖不僅打入我們的地方組織，而且滲透到抗議者的隊伍中來。當我被捕並送往馬歇爾廣場時，我發現示威者中有兩個人我沒見過。一個穿着不一樣的獄衣：西服、領帶、馬夾和一塊絲巾。誰到監獄裡來穿這種衣服？他的名字叫拉邁洛（Ramaila）。第三天我們如期獲釋時，他悄悄地消失了。

第二個叫馬漢達（Makhanda）的傢伙因其軍人作風而露底。我們興高采烈地站在院子裡，抗議者們列隊經過我和優素福並向我們敬禮。又高又瘦的馬漢達踩着軍人的步伐敬了一個簡潔優美的禮。有幾個人跟他開玩笑，說他敬禮那麼標準八成是個警察。

馬漢達曾在非洲民族議會總部做過門衛。他非常勤快，很受大家歡迎。每當有人餓了他總能出去弄到魚和薯條。但在後來的一次審訊中我們發現馬漢達和拉邁洛都是警方的奸細。

拉邁洛供認他曾混入示威者的隊伍，誠信的馬漢達則是莫特龍（Motloung）警官。

到自己人中作秘探的非洲人多半是爲了錢。南非大多數黑人都認爲，黑人所作的向白人挑戰的努力都是蠻幹，註定要失敗。白人又聰明又強大。這些奸細認爲我們不是威脅白人政權而是威脅着黑人的利益。因爲白人會被少數叛亂分子的行爲激怒而懲罰全體黑人。

然而，也有許多黑人警察秘密地幫助我們。他們都是體面的人，面臨良心的困惑。他們忠實於雇主，需要掙錢養家，但又同情我們的事業。我們和一些治安警察中的非洲人警官有了默契，他們經常告知我們何時有警察的突然襲擊。這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險支持鬥爭的愛國者。

政府並不是我們的唯一障礙。一些想幫助我們的人反而妨礙了我們。不服從運動達到高潮時，聯合黨送信來勸說我們停止活動。他們說如果我們響應聯合黨領導（J·G·N·施特勞斯（J·G·N·Strauss）的號召放棄抵制的話，會有助於他們在下次大選中擊敗國民黨。遭拒絕後，施特勞斯也開始像國民黨人一樣攻擊、污蔑我們。

我們亦受到來自非洲民族議會一脫離出去的組織『民族精神』的攻擊。前全國執委塞洛佩·泰馬（Selope Thema）領導的這個團體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J·B·馬克斯當選爲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主席時脫離出去。《班圖世界》的編輯泰馬在他的報紙上猛烈地批評這次運動，宣稱共產黨人已經控制了非洲民族議會，印度人正在剝削非洲人。他說，在共產黨人的

組織被禁，活動轉入地下之後，危險更大了。印度人的經濟利益和非洲人不可調和。儘管他在非洲民族議會中是少數派，但他的觀點還是得到一些激進的青年團員的贊同。

五月，正當不服從運動進行中，根據一九五〇年《鎮壓共產主義法令》中的『追求共產主義目標』一條，J·B·馬克斯遭禁了。禁止是政府的一項法律程序，通常是勒令退出指定的組織，限制參加各種群衆集會。這就是一種移動的監禁。要禁止一個人，政府不需任何證據，也不必起訴，司法部長宣佈一下就行了。這是一種爲使某人退出鬥爭而設的計，讓他遠離政治，生活在狹小的特定的圈子裡。違反或忽視禁令都是要坐牢的。

這一年十月的川斯瓦大會上，遭禁的J·B·馬克斯推薦我接他的班。我是青年團的全國主席，很適合馬克斯的位置。但我的候選卻遭到川斯瓦非洲民族議會內的一些自稱爲『死於跳舞』的人的反對。這些人主要是由前共產黨人轉變來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試圖切斷和印度活動家的所有聯繫，把非洲民族議會引向更加敵對的道路。他們的領導者是麥克唐納·馬塞科（MacDonald Maseko）（在不服從運動中曾擔任過非洲民族議會奧蘭多分部主席的前共產黨人），還有斯佩雷皮爾·馬魯彭（Sperepere Marupeng）（威特沃特斯蘭德不服從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他倆都想當川斯瓦主席。

馬魯彭是一個老謀深算的鼓動家。他常常穿一件滿是肩章和金釦子的黃卡其布軍服，拿

一根因蒙哥馬利將軍而著名的指揮棒。他站在會場前，手裡拿着指揮棒，說：『我已經不能忍受等待自由了。我現在就要自由！我要到十字路口會見馬蘭，告訴他我要什麼。我現在就要自由。』他一邊說，一邊用指揮棒敲講臺。

諸如此類的演說使馬魯彭在不服從運動中名聲大振，但是知名度只是當選的因素之一。他卻認爲他新近建立的威信足以當選主席。選舉之前，在確知我成爲主席候選人之後，我對他說，我希望你能競選執委，以便在我當選主席後協助我工作。他認爲我實際上是在貶低他，把我的話當做一種侮辱。於是他拒絕了，選擇了競選主席。然而他失算了，因爲最後我以壓倒多數當選了主席。

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日，正値不服從運動的高潮。警察帶着逮捕證來抓我的時候，我還在H·M·巴斯納的律師事務所裡工作。罪名是違反《鎭壓共產主義法》。政府在約翰尼斯堡、伊麗莎白港和金伯利（Kimberley）大肆逮捕運動領導人。這個月早些時候，警方突襲了全國的非洲民族議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官員的寓所和辦公室，沒收了文件和資料。這種突襲形式還比較新鮮，是普遍性的非法搜查的一個典型。以後就成爲政府行爲中司空見慣的事了。我和其他的人被捕在九月約翰尼斯堡的審判中達到高潮。二十個被指控的人包括非洲民族議會、南非印度人大會、非洲民族議會青年團和川斯瓦印度人大會的主席和秘書長。二十

個人中在約翰尼斯堡審訊的有莫羅卡、沃爾特、優素福和J·B·馬克斯，包括達杜博士、優素福·卡查利亞和艾哈邁德·卡特拉達在內的一些印度族領導人也被捕了。

我們在法庭上的出現彷彿是政治聯合生機勃勃的一個證明。大批示威者在約翰尼斯堡的街道上遊行，最後聚集在市政法院。有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白人學生，亞歷山德拉的老非洲民族議會戰士，印度學校的初高中學生，各種年齡和膚色的都有。法庭過去從來沒有容納過那麼多人。法庭裡擠滿了人，『回歸非洲』的喊聲此起彼伏。

審訊本來應該是團結和堅定的體現。然而這一切被莫羅卡博士的背信棄義給毀了。莫羅卡博士，非洲民族議會的主席，運動的首腦人物，竟然請了自己的律師，令我們大吃一驚。本來打算大家一起鬥爭的。我的『同案犯』委派我去和莫羅卡博士談談，試圖勸說他不要離開我們。我到他在塔巴恩丘的寓所去看望了他。

一見面，我就建議他改變主意，但他絲毫不感興趣，而且十分感傷。他覺得他被排除在行動的策劃之外。其實，莫羅卡一向對非洲民族議會的事務不感興趣並且安於現狀。但是他說，他現在最煩惱的是和我們一起被指控，他將和共產黨人有牽連。莫羅卡博士也染上了當局對共產主義的敵意。我和他辯論，告訴他和任何反種族壓迫的人一塊戰鬥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傳統。但他聽不進去。

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面。莫羅卡博士向倫普夫（Rumpff）法官屈辱地請求寬恕，為放棄

非洲民族議會成立的宗旨而辯解。當問到他是否認爲在南非白人和黑人應當平等的時候，莫羅卡博士回答永遠不會有這回事。我們在自己的座位上，簡直被絕望和恥辱擊昏了。當法官問他被告中是否有共產黨人時，他竟然用手指出了連達杜博士和沃爾特在內的一些人。連法官都示意他大可不必。

他的表現給了組織沉重的打擊。我們都立即意識到莫羅卡博士作爲非洲民族議會主席的日子實在不長了。他犯了把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罪。他不願爲了政治信仰而犧牲自己的醫生職業和財富，所以將他三年來在爲非洲民族議會和不服從運動中勇敢鬥爭建立起來的形象毀於一旦。我認爲這是莫羅卡博士的悲劇，他在法庭上的怯懦抵消了運動中的光榮。這個曾經周遊全國四處宣傳運動重要性的人，如今輕易就拋棄了它。

十二月二日，我們都被定了倫普夫法官所說的『法定共產主義』罪，這是相對於他所說的『通常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而言的。根據《鎭壓共產主義法》的規定，任何一個實際上反政府的人（無論以何種方式），都會被認爲是——而且被判處——『法定』共產黨人罪，即使從來沒有入過黨。公正而通情達理的法官說，儘管我們策劃的行動範圍從『公開的不服從法令到叛國罪不等』，他仍相信我們一直告誡我們的群衆『採取和平的方式，避免任何暴力的形式和方法』。我們被判處九個月的監禁和苦役，但是緩期兩年執行。

我們犯了許多錯誤，但至少不服從運動寫下了鬥爭史上新的一頁。我們挑出的六個法令沒有被取消，但我們從不懷疑這一點。我們選擇了這幾個法令，因爲它們是人們生活中壓得最重的負擔，這是鼓勵大多數人投入戰鬥的最好方法。

運動之前，非洲民族議會的言論勝於行動。我們沒有職業領導人，沒有工作人員，每一個成員都是說得多、做得少。這次運動的成果是我們的成員壯大到了十萬人。非洲民族議會眞正成爲一個群衆性的組織，擁有一個由有經驗的活動家組成的領導核心，他們在警察局、法庭和監獄勇敢戰鬥。總是和監禁聯繫在一起的恥辱已經抹去了。這是一個重大的成果，因爲對坐牢的恐懼是解放鬥爭的巨大障礙。從不服從運動起，坐牢已經成爲非洲人心目中的榮譽勳章。

我們尤爲自豪的是，在六個月的運動中，沒有一件出自我方的暴力事件。我們的抵制者的紀律性堪稱典範。運動期間，伊麗莎白港和東倫敦爆發的騷亂中共有四十多人被殺。儘管這些事件和運動沒有任何關係，當局卻企圖把它們和我們聯繫起來。在這一點上，政府是成功了，因爲騷亂使原本同情我們的一些白人改變了看法。

非洲民族議會中的一些人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相信運動將推翻政府。我們提醒他們，運動的主旨是使我們的苦難引起注意，而不是根除它。但是他們說，在我們需要政權的地方已經得到了，我們應該把運動無限制地進行下去。我插一句，這個政府是如此的強大而

殘忍，是無法以這種方式推翻的。我們可以使他們難堪，但要靠蔑視運動推翻它是不可能的。

確實，我們的運動進行得很久了。應該聽聽蘇馬博士的意見。在運動的尾聲，行動委員會和蘇馬博士會談時，他告訴我們，運動很快就會失去動力。在它全部失敗之前結束是明智的。在運動尙屬非法時中止是顧全大局的精明舉措。蘇馬博士是對的：運動很快蕭條了。由於熱情和驕傲，我們聽不進他的意見。我的理智告訴我運動將停止了，感情卻希望它繼續。我提出了終止，但還是服從了多數。這年年底，運動失敗了。

運動始終沒能超出多爲小規模城市抗議的最初階段。尤其是在農村，大規模的不服從一直沒有成功。東開普是我們成功地達到第二階段的唯一地區，在那裡，一個強大的抵制潮流已經在農村出現。總之，我們沒有滲透到農村，這是非洲民族議會一個歷史性的缺陷。運動沒有專職的組織者是一個失敗的原因。我一直試圖既組織運動又當律師，沒辦法給群衆運動籌資。我們還都只是業餘的。

然而我仍有一種巨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我投身於一個正義的事業，有決心爲之奮鬥並取得勝利。運動使我從懷疑或者說可能有的自卑情緒中解脫出來，從白人及其制度不可戰勝、力量不可一世的錯覺中解放出來。現在，白人已經嘗到了我的厲害，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樣昂首闊步，以不向壓迫和恐嚇低頭的尊嚴傲視所有的人。我將終我一生做一個自由戰士。

第四章　戰鬥是我生命

十五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非洲民族議會的年會上，其領導層發生了變化。爲適應更加活躍的新時期的需要，非洲民族議會指定了一名更加精力充沛的新主席，他就是阿爾伯特·盧圖利酋長。我被選爲四位副主席之一，同時仍擔任着川斯瓦省的主席。盧圖利是熱衷於非洲民族議會事業的爲數不多的幾個酋長之一，他堅定地反對政府的政策。

盧圖利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友的兒子，生於當時還被稱爲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的地區，在納塔爾（Natal）接受了教育。他在靠近德班（Durban）的亞當斯學院學習做一名教師。他個子很高，體格健壯，皮膚黝黑，臉上帶着寬宏的微笑，一副謙卑而又滿懷信心的神情。他富有耐心而又堅韌不拔，講話和緩而清晰，每個字都斬釘截鐵。

我是在四十年代後期第一次見到他，他當時是民族代表委員會的成員。一九五二年九月，也就是在非洲民族議會年會召開前的僅幾個月，盧圖利被傳喚到普利托利亞並被發出了

最後通牒：他必須退出非洲民族議會，不再支持抵抗運動（Defiance Campaign），否則他將被解除作爲一名經選舉而產生的由政府支付薪金的部落酋長的職務。盧圖利是一名教師、一位基督教虔誠的信徒和一名自豪的祖魯族酋長，但他更加忠實於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鬥爭。盧圖利拒絕從非洲民族議會辭職，政府於是解除了他的職務。爲對他被解職一事作出反應，他發表了一個名爲『通過十字架走上自由道路』的原則性聲明，他在其中重申了他對非暴力消極抵抗的支持，並爲他的選擇進行了辯護，聲明中的一些話時至今日仍在哀怨地回盪：『三十年來我一直在徒勞、耐心、適度和有節制地叩擊着一扇關閉和上了門的門，這一點誰能否認？』

我支持盧圖利酋長，但我卻無法參加全國會議。在會議召開的前幾天，全國各地的五十二名領導人被禁止參加任何會議和集會六個月。我也在這些領導人之列，在這六個月中我的行動被限制在約翰尼斯堡地區。我是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爲非洲民族議會副主席的。

對我的禁止延伸到了所有類型的會議而不僅只限於政治性會議。比如說，我不能參加我兒子的生日集會。我被禁止在同一時間裡同一個以上的人說話。這是政府作出的壓制、迫害和限制反種族隔離領導人的系統行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對我實施的一系列禁止措施的開始，這些措施在往後的日子裡斷斷續續，直至在數年後我被剝奪了所有的自由。

禁令不僅僅限制了個人的身體，它還將人的思想送入了牢籠。它誘發了某種精神上的幽

閉恐怖症，使人渴望行動自由和精神逃避。禁令對沒有帶着鎖鏈站在鐵欄後的人來說是一場危險的遊戲，鐵欄就是那些時時存在且極易違反的法律和規定。一個人將在短時間內從人們的視綫中消失並出現暫時得到自由的假像。禁令的陰險結果是讓人在某一刻開始認爲壓迫者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內部。

儘管我被禁止參加了一九五二年的年會，但我還是很快地被告知了會議的內容。會議作出的最重大的決定之一就是將當時非洲民族議會的行爲轉爲地下。

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已確信政府妄圖將非洲民族議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宣佈爲非法的組織，像它已對共產黨所做的一樣。看起來政府將不可避免地盡快讓我們成爲非法組織而無法開展工作。正因爲如此，我向民族執行委員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我們必須制定一個針對這一結果的應急計劃。我表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是推諉了我們作爲人民的領導人的責任。他們通知我讓我起草一份計劃，使組織能夠在地下開展工作。這一策略就是『曼德拉計劃』或簡稱『曼計劃』。

我的想法是建立讓非洲民族議會能在最高層進行決策的組織機構，將決策在不用召開會議的情況下迅速傳遞給整個組織。換句話說，它能讓非法組織繼續工作，使受到禁令限制的領導人繼續進行領導。『曼計劃』規定允許組織招收新成員，對地區和國家出現的問題作出

反應並讓成員和地下領導人保持定期的聯繫。

我召集了幾個秘密會議討論計劃的細節，與會者有非洲民族議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受到和未受到禁令限制的領導人。爲制定該計劃我已工作了好幾個月，我提出了一個制度，其內容適應地方的各個特點，同時並沒有壓制個人的主動性，它很詳細，能保證正常的行動秩序。最小的單位是由城鎮一條街上大約十間房子組成的單元，由一位單元的負責人進行管理。如果某條街上有多於十間屋的情況，那麼工作將由一名街道負責人主持，單元負責人將向他匯報。一組街道組成了一個區，由一名總負責人管理，他對非洲民族議會地區分支機構的秘書處負責。秘書處是分支執行機構的準委員會，向省級秘書匯報工作。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單元和街道負責人應當認識他管轄區域內的每個人和家庭，這樣他將得到人民的信任並知道誰值得信任。單元負責人將安排會議、組織政治課和收黨費。他是計劃的關鍵。儘管這個戰略最初是爲城市地區而提出的，但它也適用於農村地區。

這個計劃被接受並馬上付諸實行。各個分支機構已得到了通知，要它們開始爲這一轉變作好準備。計劃在許多分支機構得到了接受，但一些地處邊遠地區的基層組織卻認爲這個計劃是約翰尼斯堡方面想要加強對它們地區控制的努力。

作爲『曼計劃』的一部分，非洲民族議會爲它在全國的成員開了政治教育的基本課程。

這些演講不僅只是想開展教育，而且還要加強組織的團結。課程由各分支機構的領導人秘密地教授。來聽課的人則將聽到的內容向他們家鄉和社區的人傳授。開始時，授課並未制度化，但在幾個月之內便產生了一張課程表。

課程分成三個部分：『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是怎樣被統治的』和『進行變化的需要』。在第一課中我們討論了世界上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的類型及南非的政治經濟制度，它全面介紹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情況。例如，我們討論了作爲一個種族和經濟階級的南非黑人是怎樣受到剝削的。作演講的人大多數都是受到禁令限制的人，我自己也時常在晚上去講課。這種安排既能使受限制的人保持活躍，又能讓各成員能同這些領導人保持聯繫。

在這段時期，受到禁令限制的領導層常自己單獨會晤，然後再安排同當時未受限制的領導人會見。新舊領導人配合得非常好，決策是集體進行的，就像過去的情況一樣。有時一切彷彿都沒有變化，只是說我們不得不在秘密狀態中舉行會議。

『曼計劃』包含了最良好的打算，但它取得的成功極其有限，它並沒有得到廣泛地實施。它帶來的令人印象最深的結果再次產生於東開普和伊麗莎白港。

對抗運動的精神在其他地方已消失了很久之後仍在東開普延續，他們採取了『曼計劃』作爲同政府進行對抗的策略。

這個計劃面臨着很多問題：它並未總是被適當地向成員們進行解釋；缺乏有償的組織者來幫助履行；在各分支機構中常發生分歧，這樣無法就計劃的履行達成一致。一些省級的領導人抵制這個計劃，他們擔心這個計劃會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對一些人來說，政府倒臺並不是能馬上出現的事，因此他們並沒有預先採取措施來從計劃中吸取東西。當政府的鐵拳眞地落下來時，他們猝不及防。

十六

在對抗運動時期我的生活沿兩條軌道發展：一方面我爲政治鬥爭而工作，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我的職業是一名辯護律師。我從未成爲非洲民族議會的全職組織者，這樣的人在非洲民族議會中僅有一位，那就是沃爾特（Walter）。我在非洲民族議會的工作不得不圍繞着律師職業的時間轉。一九五一年，在威特金（Whitkin）、賽德爾斯基（Sidelsky）和艾德爾曼（Eidelman）寫完論文後，我便到了『赫爾曼∖邁克爾法律事務所』工作。在我完成論文後，我還只是一名未完全獨立的辯護律師。但我已做了起草辯護詞、發傳票和會見證人等工作。這一切都是在案子上法庭前一名辯護律師必須做的。

離開賽德爾斯基後，我對一些白人開的事務所進行了調查，當然，當時還沒有黑人開的法律事務所。我對這些事務所的收費額度尤感興趣，經過調查我憤怒地發現很多最好的法律

事務所在刑事和離婚案上對黑人的收費比對遠比黑人要富的白人顧客的收費要高。

『赫爾曼＼邁克爾事務所』是一個自由派的事務所，它是少數對黑人收費還算合理的事務所之一。另外，該事務所以自己獻身於黑人的教育事業而自豪，它爲此捐獻了大量的錢財。事務所的合伙人之一赫爾曼先生在黑人運動事業成爲時尚之前很久就投身其中了。事務所的另一個合伙人羅德尼·邁克爾（Rodney Michel）是一名參加過二戰的老兵，他也是一位極力主張自由觀點的人。他曾是空軍飛行員，多年以後在鎭壓活動最猖獗的時期，他幫助非洲民族議會的人員飛離了南非。邁克爾唯一不良嗜好就是抽烟太凶，他整天在辦公室裡一支接一支地吞雲吐霧。

我在『赫爾曼＼邁克爾事務所』工作了幾個月，在此同時爲通過律師資格考試而學習。通過考試我便可成爲一名獨立的律師。我在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大學未通過考試後我就已放棄了取得法學士學位的學習。我參加這次考試是爲了得到工作以掙到足夠的錢來養家餬口。當時我妹妹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母親還常過來住，艾伕琳當護士掙的錢加上我微薄的薪水無法解決我們的溫飽問題。

我通過資格考試後，我去『H·M貝斯納事務所』擔當了一名獨立辯護律師。貝斯納（Basner）曾是議會中的一名參議員，他早期是一名共產黨員，是黑人權力的熱心支持者。他是普通黑人、黑人領導人和工會主義者的支持者。我在這個事務所工作的幾個月裡，

我常在法庭代表事務所爲很多黑人客戶打官司。貝斯納先生是一位好老板，一旦我完成了我在事務所的工作，他就鼓勵我進行政治工作。在那兒取得經驗後，我覺得自己能獨立執業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開辦了我自己法律辦公室。在我早期的成功中也凝集着我的秘書祖貝塔·帕特爾（Zubeida Patel）的心血。我是在她去『H·M貝斯納事務所』接替一位拒絕記錄我口授的講布爾語的秘書工作時與她認識的。祖貝塔是我朋友卡西姆·帕特爾（Cassim Patel）的妻子，他是『印度人大會』的黨員。她也對人的膚色一點也不在意。她的朋友圈子很廣，認識法律界的很多人。在我開始獨立執業時，她同意來幫我。祖貝塔爲我的事務所帶來了大量的客戶。

在我的事務所開辦了幾個月後，奧利佛·坦博（Oliver Tambo）到我這兒來了。他當時爲一個名爲『科瓦爾斯基╲塔奇』的事務所工作。我常在他午飯時去拜訪他，執意要在白人專用等候室裡的白人專座上坐坐。奧利佛和我是好朋友，在午飯時間的談話中我們主要談論的是國大黨的事情。他的機智和辯才讓我在黑爾堡（Fort Hare）第一次見到他時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冷靜、邏輯嚴密的辯論常讓對手敗下陣去。而這種能力在法庭上是極有用的。在去黑爾堡之前，他曾是約翰尼斯堡聖彼得學校的一名出色的學生，他由於參加罷課而同其他幾個人一道被開除了學籍。他對問題冷靜和客觀的態度減緩了我的意氣用事。奧利佛

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在考慮成爲一名牧師。他還是一位近鄰：他來自蓬多蘭（Pondoland）的比扎那（Bizana），那裡是川斯凱（Transkei）的一部分。他臉上深刻着他的部族的典型特徵。看起來我們進行合作是順理成章的事。奧利佛能從他共事的事務所撤出後，我倆在約翰尼斯堡城中開了我們的辦公室。

在我們辦公室最外面的門上釘着一塊銅牌，上寫『曼德拉和坦博』。辦公室位於約城中心治安法院前代表法律的大理石像對面街上的一所小建築物裡。房主是個印度族人，這裡是黑人能在城中租用辦公室的很少幾個地方之一。我們並不是南非唯一的黑人律師，但我們開的卻是唯一的一家由黑人開的事務所。對很多黑人來說，我們的事務所是他們的第一個選擇和最後求援的地方，。每天早上我們要擠過大廳裡樓梯上和小等候室的擁擠的人堆才能進入我們的辦公室。

黑人急需法律的幫助：對他們而言，穿過白人專用的門、坐白人專用的公共汽車、在白人專用飲水處飲水、在白人專用的海灘上行走、晚上過了十一點還留在街上、不帶通行證或在上面的簽名出錯、失業、被雇工作地不當、居住在某些地方和無家可歸等等，都構成了犯罪。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見來自農村的老人，他們向我們訴說他們從祖祖輩輩耕耘的一小塊土地上被趕走；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見了那些以釀點黑人喝的啤酒作爲她們微薄收入補充的老婦

人，她們現在要被送進監獄和要交納她們無法支付的罰款；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見了那些由於被劃爲白人地區，他們被迫無償從居住了幾十年的的房子裡離開的人。每天我們都能聽到和見到上千起普通黑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受到的侮辱。

奧利佛的工作能量很大，他在每個客戶身上花了大量的時間，但這並非是職業的原因，而是因爲他懷有無盡的同情和耐心。他投入了客戶的案子裡，融入了他們的生活之中。全體人民和單獨個人所處的悲慘境遇深深打動了他。

我很快意識到了『曼德拉／坦博事務所』對普通黑人的意義。他們能到這兒、找到同情聆聽他們訴說並有能力和願意幫助他們的人。這兒是他們不會被趕走和欺騙的地方，這兒是他們爲能找到同他們膚色相同的代理而自豪的地方。而這正是我一開始便成爲一名律師的原因，我的工作常使我感到我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我們常在早上接觸六個案子，整天從法庭進進出出。在一些法庭上我們受到了禮貌的對待，但在一些法庭上卻受到了輕視。儘管我們努力工作、進行抗爭和取得勝利，但我們知道無論我們在律師的職業上怎麼進取，我們永遠也不會成爲檢察官、法官和大法官。雖然我們接觸的官員在能力上並不比我們強，但他們的權威卻得到了他們膚色的維持和保護。

我們時常在法庭上受到蔑視，白人證人常拒絕回答黑人辯護律師的問題。法官不是判他

們蔑視法庭而是再次向他們提出他們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常讓警察站到旁邊來審問他們，儘管我也會得到他們矛盾和撒謊的回答，但他們除了將我視爲一名『卡菲爾律師』外沒有別的想法。

我記得在一次開庭時，按習慣我被要求證明自己的身份，我說：『我是納爾遜·曼德拉，被告的辯護律師。』法官竟說：『我不認識你，你的資格證書在哪兒？』資格證書就是那張裝在框子裡掛在牆上的花花綠綠的紙，它並不是要辯護律師帶在身上的。法官這樣做像是問一個人要他的大學文憑。我要求法官審理案子，我會在適當之時帶上我的證書。但他拒絕聽案子，他竟然讓法庭官員將我趕出法庭。

這顯然違反了法庭的規則。我聘了我的朋友高級律師喬治·比佐斯（George Bizos）來處理案子。在司法審議時，喬治問法官爲什麼要看我的證書，這位法官竟說他不喜歡我進入法庭時的走路姿勢。參加審議的首席法官作出了決斷，懲戒了這名法官並讓另一名法官替換了他。

在同一年，奧利佛和我發覺，根據《城市法》，如果沒有部級單位的批准我們無法在城市裡擁有營業性的房產。我們的申請受到了拒絕，但我們根據《團體地區法》得到了一個暫時性的留駐批准，但該法不久作廢了，當局拒絕延長給我們的批准，堅持要求我們將辦公室移至數英里外的黑人地區，而我們的客戶無法到達那兒。我們認爲這是政府想通過把不斷的

威脅懸於我們的頭上而達到不讓我們開業和合法霸占我們房產的行動。

在南非當律師意味着在一個墮落地法律制度和一套未顯示平等反而走向不平等的法律下進行工作。在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制定了不平等的《人口登記法》。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名屬有色人種的男子的案子。由於疏忽他被劃爲了黑人，在二戰期間他爲南非在北美和意大利進行戰鬥。但他回國後，一位白人官僚卻將他劃成了黑人。這就是在南非極爲普遍的情況，它將人劃分成插板遊戲中一塊塊的板。我反對且不承認《人口登記法》中的原則。但我的客戶需要申訴，他被劃分爲他自己並不屬於的人種範圍。在實踐中被劃分爲有色人種比被劃分爲黑人有好處，比如說，有色人種就不被要求攜帶通行證。

我代表他向人口分類委員會提交了申訴，該委員會負責重新審理與《人口登記法》不符的案件的工作。它由一名法官和兩名其他官員組成，他們都是白人。我手頭有確鑿的證據來支持我的客戶的這件案子，檢察官正式表示不反對我們的申訴。但法官看起來對我的證據和檢察官的抗辯毫不在意。他盯住我的客戶，口氣生硬地讓他轉過身去，背對着椅子。在審視了我的客戶下削的肩膀後，他朝其他官員點了點頭，判定上訴成立。下削的肩膀是有色人種身體上的典型特徵。結果是，一個人生命的道路就因爲法官對這個人肩膀結構的意見而得到了決定。

我們還接了一些包括警察殘暴行爲的案子，但成功率很低。警察傷害總是很難得到證

明。警察很聰明，他們將受到傷害的犯人關押，等傷好之後再讓他們露面，而這正是一名警察在反對我們起訴時的證辭。法官自然站在警方一邊。警方關押期間死者的驗屍結果常寫到：『由於多種原因而死亡』或其他含混的解釋，讓警方逃脫法網。

只要我有發生於城外的案子，我就會申請暫時取消對我的禁令。這一請求常得到批准。比如說，我去了東川斯瓦，爲卡羅來納（Carolina）鎮的一名客戶辯護。我的到來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爲很多人從未見到過黑人律師。我在法官和檢察官的眼前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他們問了我無數的關於我的職業和怎樣成爲律師的問題，審理案子過了很長時間才得以開始，法庭裡也擠滿了鎮上的好奇的人。

在鄰近的一個村子裡我爲一名被控搞巫術的郎中進行辯護。這件案子也吸引了大批的聽衆。但他們不是來看我的，他們想看看白人的法律是否能對一名『Sangoma』起作用。我的這名客戶在這個地區有巨大的影響力，很多人都敬畏他。開庭時我的客戶猛烈地打着噴嚏，引起了法庭中的一陣驚恐，大多數的聽衆都相信他在念咒語。最後他被判無罪。但我懷疑大多數的當地人並不認爲這歸功於我這個律師的本事，而應當是這位郎中的草藥的力量。

作爲一名辯護律師，我在法庭上可能表現得極其顯露。我不會將自己扮成白人法庭上的一名黑人，而是將其他任何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當作自己法庭上的客人。在我辦案時，我的動作和語言都很誇張，我對法庭的所有規定都謹愼小心，但有時卻用非常規的策略來同證

人打交道。我喜歡用交叉審問的方法，時常利用種族間的緊張關係來爲自己服務。聽衆席上常擠滿了人，城裡的人來到這裡以聽審判爲樂事。

我記得一次我爲一名在城裡當傭人的黑人婦女作辯護的情況。她被指控偷了她『太太』的衣服。據稱被偷的衣服放在法庭裡的桌上展示。『太太』陳詞後，我走向擺證物的桌子開始了交叉提問。我仔細地看看衣物，然後用我手中的鉛筆挑起一付俗氣的帶式緊身內褲。我慢慢地走到證人席，揮舞着被鉛筆挑着的內褲簡單地問：『太太，這是……你的嗎？』『不。』她很快地回答，她太害羞，不敢承認東西是她的。法官於是撤消了這個案子。

十七

約翰尼斯堡城中心以西四英里處，有一個隨處可見岩石的城市，這就是黑人城鎮索菲亞鎮。該城最偉大的朋友之一特雷弗·赫德爾斯頓（Trevor Huddleston）神父曾將這兒比作意大利的一個山城，從遠處看它確實能發現迷人之處。索菲亞鎮紅頂的房子緊緊相依，炊烟裊裊升入天空，頎長的橡膠樹擁着城市。但當你走近時你卻會看到人口衆多的小鎮上的貧窮和骯髒。這裡街道狹窄，道路未經裝舖，每個居民區都擠滿了許多擠成一團的棚屋。

索菲亞鎮同馬丁代爾（Martindale）和紐克萊爾（Newclare）一道是所謂的西區城鎮一部分。這個地區最早是爲白人建的，某個房地產開發商確實在此建立了一些房子供白人購

買，但由於某個市政部門拒絕在這兒收拾垃圾，白人們於是選擇了其他地區去居住。房地產開發商不情願地將房子賣給了黑人。索菲亞鎮是川斯瓦少數幾個在一九二三年《城市法》之前黑人能購買房產的地區之一。很多帶鐵皮頂陽臺的舊磚石房子至今仍聳立在鎮中，它給這個鎮增添了一種舊世界雅緻的氣氛。隨着約翰尼斯堡工業的發展，索菲亞鎮成了黑人勞動力迅速增長的家園，它離約城近，進城很方便。工人們居住在建於老住宅房前屋後的棚屋裡。近四十個人才享有一個水龍頭，很多家庭都擠在一間棚屋裡。儘管被貧困困擾，但索菲亞鎮有其特殊之處，對黑人來說，它是巴黎的左岸地區、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是作家、藝術家、醫生和律師的家園。它既狂放而又不失循規蹈距，既活潑而又安詳，它是休馬醫生的家（他在這兒工作），又是各類像冠以約翰·韋恩（John Wayne）和韓福瑞·博嘉（Humphrey Bogart）等頭銜的柏林人和美國人一樣的各類『tsotsis』黑幫）的棲息地。索菲亞鎮還因有供約城黑人孩子們使用的唯一游泳池而自豪。

約翰尼斯堡的『西區遷移計劃』將把索菲亞鎮、馬丁代爾和紐克萊爾的人遷走。涉及這幾個地方六萬到十萬人的居住地。一九五三年，國民黨政府購買了一片離約城十三英里遠的名爲梅多蘭（Meadowland）的土地。被遷移的人將分成七個『種族集團』而安置在那裡。政府這樣做的藉口是清除貧民區。這是籠罩着政府政策的烟霧。政府實際上認爲城區的所有

地方都應是白人區，黑人只是暫時逗留的人。

政府受到了其在韋斯特登（Westdene）和紐蘭（Newland）地區的支持者們施加的壓力。這些地區居住的是相對來說較為貧窮的白人。這些工人階級的白人對一些在索菲亞鎮擁有好房子的黑人充滿了妒忌。政府要控制所有黑人的行動，而對在個人擁有房地產的城市來說則很難做到這點。在這些地方黑人擁有財產，可隨意來往。儘管通行證制度仍在實行，但同市政府所在地不一樣的是，一個人並不需要經過特別許可便可以進入一個他本人擁有房地產權的城鎮。黑人已在索菲亞鎮居住和擁有財產五十多年了，現在政府卻無情地計劃將該鎮的所有黑人居民趕到另一個黑人城鎮。政府竟計劃在接納被遷移的居民的房子建成前就開始移人，眞是可笑。索菲亞鎮的遷移使非洲民族議會及其同盟在『抵抗運動』之後開始了第一次重大的力量檢驗。

儘管政府的索菲亞鎮遷移計劃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已着手進行，但非洲民族議會反對遷移的努力直到一九五三年才積極地開始。這一年年中，非洲民族議會在當地的基層組織、川斯瓦印度人大會和納稅人聯盟一齊號召人民進行抵制。一九五三年六月，非洲民族議會和川斯瓦印度人大會的省級執委會在索菲亞鎮的奧丁（Odin）電影院舉行了一次公開集會，反對遷移。有一二〇〇多人參加了該會，集會進行得很活躍，與會者看起來對會場上大量的全副武裝的警察毫無懼色。

就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的幾天，對我和沃爾特的禁令到期了。這表示我們不再被禁止參加集會和在會議上發表演講。我到電影院中發表演說的安排很快便確定下來了。

就在會議開始前，一位警官看見我和沃爾特在電影院外同赫德爾斯頓（Huddleston）神父交談，神父是反對索菲亞鎮遷移的領導人之一。這位警官上前告誡我們：作爲被禁止的人沒有權力在這兒，隨後他命令他的部下來逮捕我們。赫德爾斯頓神父大聲對朝我們走來的警察說：『不，你要逮捕的是我，親愛的。』（神父稱每一個人都是『親愛的』，甚至對警察。）。警官讓神父走開，但他拒絕了。在警察將神父推向一邊時，我對警官說：『你要搞清楚我們是否還在受禁令的約束，小心點，如果對我們的禁令已到期，你們會抓錯人的。你想想如果對我們的禁令沒有到期，我們今晚會在這兒同你講話嗎？』

警察向來以健忘而出名，他們常常記不清何時結束禁令。這位警官同我一樣對這種情況很了解。他仔細想了想我講的話，然後告訴他的部下退回原處，站在一旁看着我們走進了大廳。

電影院內，警察們極富挑釁性，傲慢自大。他們帶着手槍和步槍，在大廳裡趾高氣揚地遊蕩，將人群推向一邊，留下侮辱的印記。我同其他一些領導人坐在臺上，就在會議即將開始時，我看到普林斯洛少校（Major Prinsloo）神氣活現地從臺子邊的門外闖進來，一群全副武裝的軍官跟着他。我的目光同他的目光相遇，我作了一個姿勢像是在問：『是我嗎？』

他搖了搖頭否定了，他逕直走過臺子和聽衆之間的過道。這時優素福·卡查利亞已開始了講話，少校命令軍官逮捕他，軍官們拖着他的胳膊將他拉走了。在電影院外，警察已逮捕了羅伯特·里沙（Robert resha）和艾哈邁德·卡特拉達。

人群開始發出驚恐的尖叫。我看到如果人群得不到控制的話情況將會變得非常糟。我跳到過道裡開始唱一首非常出名的抗議歌曲，在我唱出最初幾句後人群跟着唱了起來。我眞害怕如果人群發生騷亂警察就會開槍。

後來非洲民族議會便在每個周日晚上在索菲亞鎮中心的自由廣場上舉行集會，討論反對搬遷的事。這些集會充滿了熱情洋溢的情緒，時常被多次『ASHIAMBI』（我們不搬！）的口號聲和『Sophiatown likaya lam asihambi』（索菲亞鎮是我的家，我們不搬！）的歌聲打斷。國會議員、房客、城市議員的代表紛紛在會議上講話。赫德爾斯頓神父也時常不顧警察讓他不會參與非教會事務的警告而在集會上發表演講。

在上一次事件發生不久後的一個周日的晚上，我計劃在自由廣場上講話。那天晚上人群非常活躍，他們的情緒無疑感染了我。有大批的年輕人參加了會議，他們極其憤怒並急切地希望採取行動。同往常一樣，會場的四周佈滿了警察。他們同過去一樣帶着槍，手裡拿着鉛筆，記下誰講了話，說了些什麼。我們想盡可能地將一切都呈現在他們的面前，讓他們知道

我們並沒有什麼可隱藏的，甚至是對他們的厭惡之情。

我首先講到了在『抵抗運動』前夕政府進行的與日俱增的壓迫，我說政府現在對黑人運動充滿了恐懼。我越講越憤慨。在這些日子裡，我有點像個煽風點火的演講者，我更關心的是這火有多旺，而不是火有多亮。我喜歡激發聽衆的熱情，那個晚上我做到了這一點。

在我譴責政府心狠手辣和無法無天時，我的講話越過了界綫：我說進行消極抵抗的時間已結束，非暴力毫無用處，它不能推翻一個不惜一切代價要保住權力的少數白人政權。最後我說，只有暴力是摧毀種族隔離的唯一武器，我們必須爲此作準備，並在不遠的將來拿起這一武器。

人群沸騰了，年輕人的反應尤爲熱烈，他們又鼓掌又叫好，他們準備立即照我說的去做。這時我唱起了一首自由歌曲，歌詞是：『敵人來人，讓我們拿起武器打擊他們。』人群跟着我唱了起來。歌唱完後，我指着警察說：『那兒，就是我們的敵人！』人群於是開始叫喊，朝着警察所在的方向作出咄咄逼人的姿勢。警察看來有些緊張，他們一些人指着我好像在說：『曼德拉，我們將拿你是問。』我不在乎，此刻我心中並末考慮過後果。

然而我在那天晚上的講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在此之前曾考慮過鬥爭的前途，但發現這一前途非常黯淡。政府正在加緊採取措施防止『抵抗運動』之類的事再次發生。我已開始分析採取不同方式進行鬥爭的事。非洲民族議會雄心勃勃地想要發起有南非工人和農民參加

的大規模的群衆運動以推翻白人壓迫的現狀，但是國民黨政府使任何通過合法的方式表達不滿和抗議變成了不可能。我看到，他們將無情地鎮壓大多數黑人進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議活動。一個警察國家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開始懷疑合法和超越憲法的抗議活動不久將變成不可能的事。在印度，甘地在進行抗議活動時一直同外部的力量相聯繫，最終證明這是非常現實和有遠見的作法。但南非黑人所處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只有在對方也遵守你所遵循的規則的情況下，非暴力的消極抵抗運動才有作用。一旦和平的抗議面對的是暴力，其作用也就完結了。對我而言，非暴力不是道德準則，而是一個策略。在使用一件武器時並沒有道德的美醜之分。然而當時我關於這一問題的思想並沒有形成，而我過早地將它說了出來。

那確實是全國執委會的觀點。當他們得知了我的講話後，他們對我發表如此同已被接受的原則脫離的激進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儘管執委會中的一些人對我的講話持同情的態度，但沒有一個人支持我所提出的過於激烈的行動。執行委員會告誡了我，指出我所提出的激進政策不僅是不成熟的，而且是危險的。在敵人強大而我們仍很弱小的情況下，這樣的言論會激發敵人來徹底摧毀我們的組織。我接受了對我的批評，從此以後在公衆場合都忠實地維護着非暴力的政策。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非暴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這些日子裡，我常與執委會發生爭執。一九五三年初，盧圖利會長、Z·K·馬修斯和

其他一些非洲民族議會的高級領導人應邀會見了一些白人，這些白人正在組建『自由黨』。在此後舉行的一次非洲民族議會的執委會上，我們幾個人要求他們匯報他們同白人自由主義者們會議的情況。他們拒絕了，說他們是以私人的而不是以非洲民族議會成員的身份被邀請會見的。在我們的一再追問下，馬修斯教授（職業是一名律師）才說他們進行了一次不受限制的談話。我懷着一股怨氣說：『你可以同一群白人討論問題而不願向你們在非洲民族議會的同事通報情況，你們是什麼樣的領導人？這是你們的問題，你們對白人充滿了害怕和敬畏。你們把他們看得比你們的黑人同志還重。』

這一通發洩惹火了馬修斯教授和盧圖利酋長。馬修斯教授首先對我進行了反擊，他說：『曼德拉，你對白人知道些什麼？我告訴你，不論你知道白人些什麼，你還是非常的無知。甚至到現在，你幾乎都還沒有脫掉你的學生制服。』盧圖利酋長憋着一肚子火說：『好吧，如果你們指責我害怕白人，我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辭職。如果你們要這樣說，我就這樣做。』我不知道盧圖利是不是一時衝動，但是他的威脅嚇住了我。我將話說得太激烈了，沒有想一想，也沒有考慮到責任，我現在感到非常的後悔。我當時立即收回了我的指責並作了道歉。我還只是一個想用好鬥來彌補無知的年輕人。

我在索菲亞鎮進行演講的同時，沃爾特告訴我說他以貴賓的身份被邀請參加在布加勒斯

特舉行的世界青年節。邀請的時間很緊，沃爾特沒有時間同全國執行委員會進行商量。我急切地認爲不論他向執委會匯報與否他都應當去，並鼓勵他去參加。沃爾特下決心去布加勒斯特，我幫助他辦理了一本代用護照，這是一個證明他的身份和國籍的宣誓書。（政府永遠也不會給他頒發一本正式的護照。）參加青年節的代表團由杜馬·諾克威（Duma Nokwe）帶隊，他們乘座的是唯一接受這樣的代用護照的航空公司『厄拉爾航空公司』的飛機。

儘管我受到了全國執委會的譴責，但我確信國民黨的政策不久將使非暴力變成更加受到限制和不管用的策略。沃爾特暗中支持我的想法，在他啓程前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出了建議，要求他安排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國人討論向我們提供武器進行武裝鬥爭的可能性。沃爾特同意了，他答應去試一試。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行動，我的方法是極其離經叛道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名頭腦發熱的革命者的行爲，他沒有進行仔細的思考就毫無紀律地採取了行動；這也是一個深受不道德的種族隔離政策和保衛這種政策的無情國家之苦的人的行爲。

沃爾特的訪問讓執委會感到極其意外。我親自向執委會轉達了他的道歉。但我沒有提到我的秘密要求。盧圖利對這一對非洲民族議會領導制度的藐視行爲提出了反對，馬修斯教授則表示對沃爾特訪問社會主義國家感到非常震驚。執委會對沃爾特的動機表示懷疑，他們對我作出的解釋的細節提出了質疑。有的人還要求對沃爾特和我作出正式譴責，但最後執委會

沒有這樣做。

沃爾特設法到了中國，中國領導人熱情地歡迎了他。他們表達了對我們鬥爭的支持，但當他提出武裝鬥爭的想法時，中國領導人則表現得謹慎小心。他們警告他說武裝鬥爭是一個極其重大的行動，他們問解放運動是否已成熟到能夠邁出這一步了。沃爾特帶着鼓勵回了國，但是沒有拿到武器。

十八

在約翰尼斯堡，我已變成了一個城裡人。我穿着時髦的衣服，開着仿老式汽車，對城裡的每條僻街小巷都瞭如指掌，每天帶着秘書開車到城中心的辦公室上班。但事實上，在心中我仍是一個鄉下的孩子，最能讓我精神振奮的莫過於碧藍的天空、空曠的草原和青青的草地。九月份，對我的禁令結束了，我決定利用自由的機會離開城市去休息一下。我因此接了奧蘭治自由邦的一個名爲菲利斯（Villiers）的小村子的案子。

從約翰尼斯堡驅車到奧蘭治自由邦要花幾個小時的時間，我在早上三點鐘從奧蘭多開始了我的旅行。我時常喜歡在這個時候啓程外出。我是個愛起早的人，早上三點鐘時路上空曠安靜，能讓人靜靜地思考東西。我喜歡觀看黎明的到來，晝夜的交替總是那樣的神奇。在這個時候動身還會少一些麻煩，因爲這時常常見不到警察的影子。

奧蘭治自由邦一直對我有神奇的影響力，儘管白人中大多數種族主義者稱自由邦是他們的家園。在這裡極目眺望，你能看到碧藍的天宇下塵霧濛濛的曠野和無窮無盡延伸的黃色矮樹和灌木林。無論我的情緒如何，自由邦的景色都能給我的心帶來歡暢。當我在那裡時，我彷彿感覺到沒有什麼能將我關住，我的思緒能自由馳騁。

這片土地還由於深深地烙下了C·R德·韋特（De Wet）將軍的印記而時時在我的腦中浮現。德·維特將軍是布爾人天賜的軍事指揮官，在英國—布爾人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進行的多次戰鬥中他挫敗了英國人。他有着無畏、自豪的精神和機敏的頭腦，已成爲了我心中英雄之一，他不僅僅是爲南非的荷蘭人而戰，而是爲所有的南非人的權力而戰。他表現出了弱者的勇氣和機智，表現出了落後但愛國的軍隊在反抗老練的戰爭機器時的力量。我一面開車，一面想像着德·維特將軍的軍隊隱蔽之處和他們是怎樣對裝備良好的英國軍隊發起突襲的。

駛向菲利斯讓我感到非常興奮，我在九月三日早晨進入小法庭時我還沉於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之中。我發現一組警察正在等待着我。他們一言不發遞給我一個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而簽署的命令，要求我從非洲民族議會辭去職務，不能離開約翰尼斯堡，在兩年之內禁止參加任何集會。我早已料到這一切會降臨的，但沒有想到會是在菲利斯這樣偏僻的小鎮上接到對我的禁令。

我當時三十五歲，這些新的和更加嚴厲的禁令結束了我參與非洲民族議會近十年的歷史，這是我政治覺醒和發展的十年，是我逐漸投入已成爲我生命的鬥爭的十年。從此以後，我代表非洲民族議會和解放鬥爭而作出的行動和計劃都變成非法的，必須轉入地下。一旦完成任務，我必須立即回到約翰尼斯堡。

對我的禁令把我從鬥爭的中心趕到了外圍，把我從主角變成了配角。儘管我時常也能參與協商，能對運動的方向產生影響，但只有在特別要求下我才能站在遠遠的地方做這些事情。我感到我再也不是身體上的一個重要的器官了——心臟、肺或者脊柱——而是一個嚴重的瘸子。至少在那個時候，自由的鬥士也得遵守法律，在這點上，違反對我的禁令而遭囚禁對非洲民族議會和我自己都沒有好處。我們當時還未處於竭盡全力不惜一切代價同制度進行鬥爭的公開革命者的地位上。我們相信搞好地下的組織工作要比進監獄好。一旦我被迫從非洲民族議會辭去職務，非洲民族議會不得不對我進行替換，不論我過去的情況如何，我再也無法行使我曾擁有的權利了。在駕車回約翰尼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省的景色再也不像來的時候那樣讓我感到寧靜和振奮了。

十九

在我接到對我的禁令時，非洲民族議會的川斯瓦大會正定於在下一個月舉行，我已起草

了我的主席發言稿。它將由執委會成員安德魯·庫努努（Andrew Kunene）向大會宣讀。我在這個後來被尼赫魯稱爲『通向自由無坦途』的講話中說，群衆現在必須準備好進行新形式的政治鬥爭。政府新的法律和策略已使舊形式的群衆抗議運動——公開集會、發佈新聞、抵制活動——變得極其危險和有自我毀滅性。報紙不會發表我們的聲明；印刷廠不會給我們印傳單，它們都害怕受到《鎮壓共產主義法》的迫害。我寫到：『這些變化要求發展政治鬥爭的新的形式。舊的方法是自取滅亡和愚蠢的。』

『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是對立的。自由力量與反動勢力之間的清算之日不會太遠了。我絲毫不懷疑當這一天到來時，眞理和公正將會取勝……被壓迫者的感情從不這麼痛苦。人民的深重苦難迫使他們爲反對那些由暴徒們制定的臭名昭彰的統治我們國家的政策而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推翻壓迫是天賦的人權，是每一個自由的人最高的願望。』

一九五四年四月，『川斯瓦法律學會』要求最高法院從任命的辯護律師的名單中除去我的名字，理由是我在『抵抗運動』中的政治活動已構成了與職業無關和不光彩的行動。這個時候，『曼德拉＼坦博法律事務所』經營得正熱門，我一周要去法庭好幾十次。

文件送到了我的辦公室，上述申請一經作出和得到公開，我就開始得到了支持和幫助。許多著名的白人律師甚至都向我提供了幫助。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但他們

相信申請是帶有偏見和不公正的。他們的反應讓我感到了即使在種族主義的南非，行業內的團結有時也能超越膚色的界綫，仍有拒絕成爲不道德政權的橡皮圖章的律師和法官。

在審理我的案子時，『約翰尼斯堡法律理事會』的主席沃爾特·波拉克（Walter Pollack）爲我進行了積極的辯護。在我聘用沃爾特·波拉克時，有人建議我還應當聘用一位與鬥爭沒有關聯的律師，這樣能對川斯瓦法律學會施加積極的影響。最後我們又聘了威廉·阿龍松（William Aaronsohn）爲我的委派律師，他開辦着約翰尼斯堡歷史最長的法律事務所之一。這倆人都無償地爲我服務。我們爭辯說上述申請公然冒犯了公平的思想，我有爲我的政治信仰進行鬥爭的天賦權利，這是法治國家中每一個人都有的權利。

但是辯護詞中最有份量的部分是波拉克引用了前總理J·G·斯特里多姆（Strijdom）案件的例子。斯特里多姆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支持納粹而被投進了監獄。他兩次從獄中逃走但兩次都被抓了回去。後來在他獲得釋放後，他向法律理事會申請成爲一名律師。儘管他犯過罪，理事會還是決定承認他爲一名律師，理由是他所犯的重罪是政治性的，一個人不能因爲其政治信仰而被排除在律師隊伍之外。波拉克說：『當然斯特里多姆和曼德拉之間也有所區別，曼德拉不是國民黨員，也不是一個白人。』

聽取案情的是拉姆斯博頓（Ramsbottom）法官，他是法官的榜樣。他拒絕成爲國民黨政府的代言人，立志捍衛司法的獨立性。他的判決完全站在了我們的主張一邊，即：我有權

為我的政治信仰而活動，即使這些活動是反對政府的。

二十

索菲亞鎮的反遷移運動歷時漫長。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政府也毫不讓步。經歷了一九五四年又轉入一九五五年，每周星期三和星期日晚上都舉行兩次集會。人們繼續不斷登臺控訴政府的遷移計劃。在蘇馬博士的領導下，非洲民族議會和納稅人協會通過信件和訴狀向政府提出抗議。我們在領導反遷移運動中提出的口號是『踏過我們的屍體』，這個口號便常發自演說者口中，回響在聽衆席上。一天晚上，蘇馬博士甚至把它和很久以前召集黑人勇士作戰的那個激揚的口號聯繫起來，他高呼：『你們這些膽小鬼，敵人已經把牛搶走了！』

政府規定遷移的最後期限是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隨着時間的迫近，我和奧利佛天天待在鎭裡，會見當地領導人，討論鬥爭計劃，依靠我們的專業才能為那些被趕出家園和被送上法庭的人工作。我們想向法庭證明政府的文件在很多時候是錯誤的，許多因此做出的命令是非法的。但這只是權宜之計，政府不會因為一點點不合法就中止它的行動。

在政府規定的期限到來前不久，在自由廣場擬議召開一次特別的群衆集會。有一萬人聚集在這裡準備聽盧圖利酋長的演講。但是當他到達約翰尼斯堡時，有禁令強迫他返回納塔爾。

在遷移前夜，當地非洲民族議會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喬·莫德塞（Joe Modise）召集了一次由五〇〇多名年輕人參加的緊急會議。這些年青人躍躍欲試，等待非洲民族議會的命令。他們希望非洲民族議會給他們下達一項命令，要他們同警察和軍隊進行戰鬥。他們準備在夜裡設置路障，並準備同第二天來到的全副武裝的警察進行較量。

他們把我們的口號理解為：索菲亞鎮要遷移，就先踏過我們的屍體吧。但是喬在同包括我在內的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進行商議之後，讓年輕人離開。他們感到憤怒，覺得被出賣了。但是我們相信暴力將是一場災難。我們認為，除非起義是經過必要的精心策劃，否則無異於自殺行為。我們不想以敵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二月九日霧氣濛濛的黎明，四千名警察和軍人封鎖了市鎮，工人推倒空房，政府的卡車開始把居民從索菲亞鎮運往梅多蘭。在此前夜，非洲民族議會已經把幾家居民和索菲亞鎮城內一些親非洲民族議會的人家遷到事先安排好的住處。但是我們的努力不僅微不足道，也來得太遲，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軍隊和警察太強大了。幾個星期之後，我們的抵制失敗。大多數當時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或被剝奪自由或被囚禁。最後，索菲亞鎮不是在槍炮聲中，而是在卡車和氣錘下消失了。

在某一政治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一個人在閱讀報紙時看到有關它的消息時，他對這一

事件的看法總是正確的，但當你正處在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舞臺的中心時，你幾乎沒有時間靜靜地想想。在西部地區反遷移運動中，我們犯了一系列錯誤，也得到許多教訓。

「踏過我們的屍體」是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但是事實證明它的作用正反相抵。一個口號是聯繫組織和它試圖加以領導的群衆之間的重要紐帶。它應該把一種特殊的不滿情緒揉合在一句簡捷有力的話裡面，還要發動群衆爲之而鬥爭。我們的口號切中了人們的想像力，但它誤導他們相信我們將爲抵制遷移戰鬥到死。而實際上非洲民族議會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從來沒有向人民提出第二種方案。非洲民族議會只是告訴人們要抵制遷移，卻沒有給他們另一種選擇。當索菲亞鎮的居民意識到我們既不能阻止政府的行動，也不能在別的地方向他們提供住處時，他們的抵制活動減弱了，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梅多蘭。當許多農民發現他們在梅多蘭會有更多的空間和乾淨的住房時，他們自願搬到那兒去。我們沒有考慮地主和農民的不同境遇。地主有理由留下來，許多農民卻情願離開。非洲民族議會遭到許多泛非主義者的批評，他們指責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爲保護地主的利益，而犧牲農民的利益。

我從這場鬥爭中吸取的教訓是：最後，我們沒有選擇武裝和暴力抵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非暴力武器——言論、代表團、威脅、遊行、罷工、遷移，自願入獄等等，所有這些都徒勞無功，因爲無論我們使用什麼，遇到的總是嚴厲鎮壓。一個自由戰士懂得鬥爭之艱難：正是壓迫者規定了鬥爭的性質，他們通常只借用他們得心應手的手

段。在某個特定的時候，人們只能以暴抗暴。

教育是促進個人發展的巨大動力。通過教育，一個農民的女兒能夠成爲一個醫生，礦工的兒子能夠成爲礦上的領導者，農夫的孩子能夠成爲大國總統。使我們各不相同的是來自於我們自身而非他人所賜。

本世紀初，黑人受教育的機會主要來自於外國教堂和傳教團，它們建立和資助學校。由這些聯合團體領導的黑人中學和白人中學的課程安排基本上是相同的。教會學校提供給黑人的是西方式的英語教育，我本人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使我們相形見絀的不是閱讀、思考或幻想能力的缺乏，而是比較可憐的設備。

但是，就是在國民黨掌管政權以前，資金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出種族主義教育的特點。總的說來，政府花在白人學生身上的錢是黑人學生的六倍。黑人教育不是義務的，只有在小學他們才有免費接受教育的機會。在所有黑人學齡兒童中，有不到一半的人算是進過某種學校，只有很少數的黑人中學畢業。

就連這樣的教育比例也不合國民黨的胃口。阿非利卡極端主義者總是對黑人教育不感興趣。他們認爲這簡直是一種浪費，因爲黑人天性懶惰無知，多少教育也改變不了。他們一貫反對黑人學英語，因爲對他們來說英語是一種外語，而對我們來說它是解放的語言。

一九五三年，受國民黨控制的議會通過《班圖教育法》，企圖對黑人教育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法案把對黑人教育的管理權從教育部移交給非常令人厭惡的土著人事務部。根據法案，由教堂和傳教團管理的黑人小學和中學要麼移交給政府，要麼接受不斷削減的財政資助；要麼是政府接管黑人教育，要麼黑人什麼教育也受不到。法案禁止黑人教師參加所有政治活動，禁止他們批評政府和任何學校當局。這是從制度上貶低黑人的措施。

班圖教育部長亨德裡克·維沃爾德（Hendrik Verwoerd）博士解釋說，教育必須根據每個人的機遇來培養和教育人民。其意思是，黑人沒有也不會有任何機會，所以爲什麼要教育他們呢。他說：『在歐羅巴人的社區，在某些勞動層次以上沒有班圖人的一席之地。』簡言之，黑人應該被培養成奴隸，完全從屬於白人。

在非洲民族議會看來，這項法案是一種極其陰險的手段，其目的在於阻礙整個黑非洲文化的進步，而且此法案一經制定，就會完全遏止南非人民的爭取自由的鬥爭。將來所有的黑人後代會失去思想上的洞察力。正如當時馬修斯博士指出的那樣：『維沃爾德學校的無知和歧視的教育比根本不受教育更危險。』

教育法案以及維沃爾德對它赤裸裸的說明引起了黑人和白人普遍的憤怒。除了支持種族隔離制度的荷蘭新教和路德教傳教團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堂都反對這項新政策。但是這些持反對立場的宗教團體也只是攻擊這項政策，而不是抵制它。對新政策一直大膽進行批評的

英國聖公會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約翰尼斯堡安布羅斯·瑞弗斯（Ambrose Reeves）主教採取激烈的步驟，關閉了他的學校，在這裡註冊上學的孩子有一萬人。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擔心孩子們流落街頭，把其餘的學校交給了政府。儘管抗議新政策，除羅馬天主教、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以及猶太新教聯合會之外，其他教堂採取了相同的辦法，上述三派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繼續辦學。就連我自己參加的美以美教堂也把他們的二十萬黑人學生交給政府。如果其他所有教堂能仿效那些抵制新政策的教堂的做法的話，政府就會面臨一種僵持的局面，也許會被迫讓步。相反，政府走在了我們前面。

土著人事務部接管學校的日期訂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非洲民族議會開始討論屆時進行學校聯合抵制的計劃。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秘密討論的焦點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召開人們起來抗議限定接管時間，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在《班圖教育法》實施之前號召進行一次全面的學校聯合抵制運動，廢除這項法案。討論充滿了火藥味，雙方都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主張無限期抵制者稱《班圖教育法》是連因饑餓而行將喪命的人都不能飲的毒酒。以任何形式接受這一法案都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他們認為全國都處於一種火爆的情緒之中，人民渴望的不僅僅是抗議，而是更加波瀾壯闊的事情。

儘管我曾被盛譽為「火炬」，但我總認為我們的組織所承諾的應是其能力所及，否則人民將對它失去信任。我堅持認為我們的行動應該建立在現實而不是理想的基礎之上。一項無

限期抵制的計劃需要大量的機械和資源，這些是我們不具備的，而且我們過去的經驗也證明我們無法進行這樣的行動。迅速地建立起我們自己的能夠容納成千上萬中小學生的學校，對我們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我們不給我們的人民一種選擇方案的話，就等於給他們一點微不足道的東西。我和其他人一起建議實行一個星期的抵制運動。

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決定從四月一日起開展爲期一周的抵制運動。這項建議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德班召開的年會上提出，但是代表們拒絕接受這項建議，他們投票決定開展無限期的抵制運動。年會是最高權力機構，其權力甚至高於執委會，我們被迫承擔起領導一場幾乎不可能成功的抵制運動的責任。維沃爾德博士宣布政府將永久關閉參與抵制新政策的學校，失學的孩子將不被重新接納。

因爲開展抵制運動，父母和社區將不得不參與進來，代替學校發揮作用。我對家長們和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說，每家每戶，每一座木屋草棚，每一幢公共建築都必須變成孩子們學習的場所。

聯合抵制運動開始於四月一日，它產生複雜的後果。運動經常是分散、無組織的，產生不了什麼效果。在約翰尼斯堡產金高地的東部地區，運動影響到大約七千名上學的孩子。拂曉前，遊行隊伍號召家長讓孩子待在家裡。婦女守在學校周圍，把走進學校的孩子拉出來。

在位於傑米斯頓（Germiston）東南城郊的居民區，我們在當地支部的主席喬舒亞·馬庫（Joshua Makue）管理一所由八百名參與抵制運動的兒童組成的學校達三年之久。在伊麗莎白港，巴蕾特·泰西（Barrett Tyesi）放棄政府的教育職務，爲放棄政府學校的孩子辦一所學校。一九五六年，他送七十個孩子參加六級考試，除三名外全部通過。在許多地區，臨時性的學校承擔起對參加抵制運動的孩子進行教育的任務，這些學校對外稱爲『文化俱樂部』，以避免引起當局的注意。政府後來通過一項法令，視其爲非法，從來未經官方批准的教育活動者將被處以罰款或判刑。警察對這些學校進行騷擾，但許多學校在地下狀態中存在下來。最後這些社會學校終於走向了消亡，家長們面對的是二種選擇：要麼讓孩子接受歧視性的教育，要麼乾脆讓他們不受任何教育。我的孩子上了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學校，這所學校是私立的，不靠政府資助。

評價這場運動應從兩點出發：一點是它的直接目的是不是達到了，第二點是它是否使更多的人具有了政治覺悟並使他們參加了鬥爭。就第一點而言，很明顯運動失敗了。我們既沒有關閉全國的黑人學校，也沒有廢除《班圖教育法》。但我們要求修改這個法案的抗議足以使政府手忙腳亂，一次，維沃爾德被迫宣布教育應該對所有人平等。政府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草的教學大綱與其最初在部落基礎上建立模範學校體系的想法相比較是一種退步。最後，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在兩種弊端中選擇一個稍好一點的，我們選擇了少受教育。但是，

《班圖教育法》結果給政府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因爲正是這種班圖式的教育創造了一九七○年那一代異常憤怒、最具有反抗意識的黑人青年。當這些受班圖式教育的孩子成年的時候，他們帶着一種強烈的感情揭竿而起。

在盧圖利酋長當選爲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後幾個月，Z·K·馬修斯教授在作爲訪問學者赴美一年後，帶着重新制定爭取自由鬥爭的新方針的願望回到南非，在開普年會上，他指出：『我奇怪爲什麼非洲民族議會還沒有着手考慮召集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一次南非所有不分種族和膚色的人民的代表參加的會議，來起草一份未來民主南非的自由憲章。』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非洲民族議會全國會議採納了這項建議，成立由盧圖利酋長任主席，沃爾特·西蘇魯和優素福·卡查利亞任書記的人民會議委員會。人民會議將制定一系列原則，作爲新南非的基礎。人民呼籲制訂一部新憲法，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各地領導人受命在本地區徵集所有人的意見。憲章將是一部由人民制訂的文件。

人民會議代表了非洲民族議會內部兩種主要的思想之一。毫無疑義，政府將宣布非洲民族議會爲非法，許多人提出必須做好地下和非法活動的準備。同時，我們也不想放棄這項公開的政策和活動，它使非洲民族議會投入了精力，也得到了群衆的支持。人民會議將公開顯示我們的力量。

我們夢想人民會議會成爲爭取自由鬥爭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次匯集所有被壓迫人民

和進步力量的會議。吹響變革的號角。我們希望有朝一日它會同非洲民族議會一九一二年成立大會一樣受到人們的崇敬。

我們尋求得到最廣泛的支持。邀請了大約二〇〇個組織，有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種，請他們派代表參加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德班附近的通加特（Tongaat）召開的籌備會議。這次會議產生了全國行動委員會，包括八名成員，這些成員來自於四個發起組織。主席是盧圖利酋長，書記處由沃爾特·西蘇魯（後來由於被軟禁而由奧利佛代替），來自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優素福·卡查利亞、來自南非有色人組織（SACPO）的斯坦利·洛龍（Stanley Lollan）和來自於民主主義者大會（COD）的萊昂內爾·伯恩斯坦（Lionel Bernstein）組成。

南非有色人組織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於開普敦，其創建者是自由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它形成於開普保護有色人選舉權鬥爭的後期。爲保護有色人種的利益而鬥爭。民主主義者大會是對抗運動的成果，其發起人是奧利佛和優素福·卡查利亞，它成立於一九五二年，是一個激進、左翼、反政府的白人組織。這個組織雖然規模不大，其活動也僅限於約翰尼斯堡和開普敦，但其影響超出了它的成員。民主主義者大會的一些成員，如邁克爾·阿梅爾（Michael Harmel），布拉姆·菲希爾（Bram Fischer），拉斯第·伯恩斯坦（Rusty Bernstein），都是我們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它和非洲民族議會、南非印度人大會保持着密切的

關係，主張普及選舉權和白人黑人完全平等。我們把民主主義者大會看作是直接向白人社會宣傳我們主張的傳聲筒。對黑人來說，民主主義者大會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那些因爲仇視白人而參加鬥爭的黑人看到在白人中確實有平等對待黑人的熱心腸者。

全國行動委員會邀請所有參與組織及其支持者爲自由憲章出謀劃策。通告遍佈全國城鎮農村。『如果你制定法律……，你怎麼做？』『爲了把南非建設成全體人民的美好家園，你準備做什麼？』一些傳單的措辭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詩情畫意，它們這樣宣傳我們的計劃：

我們向全體南非人民，無論黑人還是白人呼籲：讓我們一起暢談自由！……讓全體人民的聲音響徹南非。讓全體人民追求自由的願望永載史册。讓我們的願望匯集在偉大的《自由憲章》中。

這些呼籲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各種建議從體育和文化俱樂部、教會組織、納稅人協會、婦女組織、學校、工會紛至沓來。它們有的被寫在衛生紙上，有的寫在練習本的草紙上、大頁書寫紙上，還有的乾脆寫在我們傳單的背面。看到普通人民的建議往往走在領導人前面是多麼令人慚愧啊。最普遍的要求是人人擁有選舉權。我們認識到南非屬於所有生活在這裡的人。

非洲民族議會在各地的分支機構爲起草憲章做出了巨大貢獻，實際上，兩份最出色的草案分別來自於德班和彼得馬里茲堡（Pietermaritzburg）。這些草案被綜合在一起發往各地和各委員會徵求意見和問題。憲章由全國行動委員會的一個小型委員會起草，由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委會審議。

憲章將被提交給人民會議和由會議代表組成的各組織批准通過。六月，在會議即將召開的前幾天，我們幾個人審議了憲章草案。沒有做什麼改動，因爲時間有限，而且草案已經相當不錯了。

人民會議在克勒普敦（Kliptown）召開，這是位於約翰尼斯堡東南約十五英里的一片草原上的一個多種族的村子，會議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兩天舉行，這兩天晴空萬里，風和日麗。三千多名代表不顧警察的恐嚇參加了會議，並批准了最後的草案。他們有的乘坐轎車，有的坐公共汽車，有的坐卡車，有的乾脆步行前來。顯然代表中的絕大多數是黑人，但也有三〇〇多名印度人，二〇〇多名有色人種和一百多名白人。

我和沃爾特一起到了克勒普敦。我們都收到了禁令，因此我們在人群外找了個地方，這樣我們既能看到會場的情況，也免得摻雜進去或者被發現。會場無論從規模還是從其紀律性講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由勇士』戴着黑色、綠色和黃色的袖章，與代表見面，爲他

們安排座位。婦女們穿着會裙、會褲、戴着會巾；男人們則戴着會標和會帽。到處張貼着標語：『生爲自由，鬥爭萬歲。』主席臺上坐着各種膚色的人，有來自民主主義者大會的白人代表，有來自南非印度人大會的印度人，有來自南非有色人組織的有色人，他們坐在代表着大會聯盟四個成員組織的四個仿製輪子的前面。白人和黑人警察、以及特務機關的成員在會場周圍轉來轉去，拍照，在小本子上記着什麼，白費力氣地對代表進行恐嚇。

會場充滿了歌聲和演講聲。會議準備了膳食。氣氛既緊張又熱烈。會議第一天下午，有人一節一節地用英文、蘇托語和科薩語大聲誦讀憲章。每一節之後，人們呼喊：『非洲！』和『馬伊布耶（Mayibuye）』（非洲，我的祖國）以示通過。會議第一天圓滿結束。

第二天跟第一天差不多。憲章的各節都在歡呼聲中通過，三點三十分，憲章最後投票通過，這時，揮舞着手槍的警察和特務機關的密探們衝上主席臺，一個警察奪過話筒，用粗啞的南非普通語宣佈因涉嫌謀反，會場上的所有人未經警察允許不得離開。警察開始把人們推下主席臺，抄走文件和照片，就連像『渾湯』、『素湯』這樣的招牌也不能倖免。另一伙手持步槍的警察包圍了人群。人們高唱《上帝賜福非洲》以示抗議。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離開，離開前要接受審查和登記姓名。警察採取行動時我正在會場邊上，我本想留下來幫助代表們，但考慮到我可能會立即被捕並被投入監獄，謹慎還是很有必要的。約翰尼斯堡要召開一次緊急會議，我趕回去參加。當我回到約翰尼斯堡時，我了解到這次鎮壓是政府採取新的

嚴厲措施的開始。

儘管人民會議被解散了，但《自由憲章》成爲爭取自由鬥爭的指路明燈。像《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等不朽的政治篇章一樣，自由憲章用熱情洋溢的語言規定了現實的政治目標。它表達了人民的希望和夢想，描繪了爭取自由鬥爭和未來國家的前景。憲章的序言寫道：

我們，南非人民，向全國和世界宣告：

南非屬於生活在這裡的全體人民，無論白人還是黑人，只有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礎上的政府才擁有管理人民的權力；我們被一個不公正不平等的政府剝奪了與生俱來的對土地、自由與和平的所有權；

只有當我們的人民親如兄弟，享受平等的權力和機會時，我們的國家才能走向繁榮和自由。

只有一個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礎之上的民主國家，才能保證人民享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和信仰。

因此，我們，南非人民，不分黑人和白人，平等、親密、兄弟般地聚集在一起，通過了

《自由憲章》。我們宣誓共同奮鬥，用我們全部的力量和勇氣，直到從此開始的民主進程取得最後的勝利。

《自由憲章》提出了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新南非的要求。

政權將屬於人民！

每一個男性和女性公民擁有所有立法機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所有人有權參與國家的管理。

不同種族、膚色和性別的人擁有同等權力。

所有由少數人管理的團體、諮詢機構、委員會和權力機構由自治的民主組織代替。

所有民族團體擁有同等權力！

在國家機關、法院和學校中，所有民族團體和種族擁有同等地位。

法律保護所有民族團體的種族和民族榮譽感不受侵害；
所有人有權使用自己的語言和發展延續自己的民間文化和風俗習慣；
所有對民族、種族和膚色進行歧視和蔑視的宣傳和行爲均爲非法；
廢除所有種族隔離的法律和措施。

人民是國家財產的主人！

我國的民族財產、南非世世代代遺留下來的財富均屬於全體人民；
埋藏在土地下的礦產、銀行和壟斷工業全部交給人民所有；
其他所有工業和貿易應用於改善人民生活；
全體人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願平等地進行貿易、從事和參與所有貿易、行業和專業活動；

土地屬於全體勞動者！

廢除對土地所有權的種族限制，所有土地在勞動者中進行重新分配，消滅饑荒，實行耕

者有其田……

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特別是泛非主義團體中，一些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白人，他們不同意非洲民族議會一貫的主張，批評憲章提出對南非根本性的變革。他們宣稱憲章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秩序，認爲民主主義者大會和白人共產主義者對憲章思想的影響超乎尋常。一九五六年六月，在《解放》月刊上，我指出，憲章第一次承認私人企業，並允許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憲章承諾在爭取自由鬥爭勝利之後，黑人能夠以自己的名義擁有自己的企業、房屋和財產，簡言之，像資本家和企業家一樣富有。憲章沒有談到消滅階級和私有財產，或者勞動工具歸社會所有，也沒有宣傳任何社會主義信條。憲章主張對礦產、銀行和壟斷工業實行盡可能的國有化，這是爲避免國民經濟爲白人企業主獨占或把持的必要措施。

毫無疑義，《自由憲章》事實上是一個革命性的宣言，因爲如果不對南非的經濟和政治結構進行根本的變革，它所倡導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它沒有倡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把人民消滅各種壓迫的願望融合在一起。爲了在南非實行公正，必須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因爲它恰恰代表了一種不公正。

二十一

一九五五年九月初，對我的禁令解除了。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我在非洲民族議會中還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除了參加川斯瓦執委會會議和偶而在公衆集會上講講話以外，沒有太多的職責。而現在，在我三十八歲的時候，身體開始發胖，在非洲民族議會也承擔了更多的責任。我被困在約翰尼斯堡兩年，忙於政治和法律事務，無暇去顧及川斯凱的曼德拉家族的事務。我渴望故地重遊，漫步在童年時一望無際的草原和連綿的山谷中。我非常希望能回家看看，和達利旺高以及薩巴塔（Sabata）一起商量一下川斯凱的事，而非洲民族議會也非常需要我參加政治事務的討論。我打算去度一個工作假期。這是唯一一種我會應付自如的假日。

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晚上，一群朋友聚集在我家裡爲我送行。其中有年輕而善良的律師杜馬·諾克威（Duma Nokwe），他是全國青年聯盟的書記。杜馬曾和沃爾特一起到布加勒斯特參加青年聯盟會議，那天晚上，他給我們表演了他在路上學到的蘇聯和中國歌曲。午夜的時候，朋友們準備離開，我的兩歲的女兒馬克茲韋（Makaziwe）突然從睡夢中醒來，鬧着到我這裡來。我一直沒有太多的時間陪家人，馬克茲韋的吵鬧使我內心十分不安。一瞬間，我旅行的熱情消失了。但是我還是把她抱回床上，吻她，祝她晚安，當她重新入夢時，我打

點行裝，裝備出發。

我開始了探索眞理的旅程，將享受重返故里、朋友相聚的快樂。很久以來，我與世隔絕，看不到國內其他地方的發展，現在，我渴望親自體驗內地的變化。雖然我讀過全國各地的報紙，但報紙只是事實的一個簡陋的縮寫；其內容對於一個自由戰士的重要性不在於報導事實，而在於糾正作者和讀者的偏見。旅行中我想親自和這裡的人民交談。

午夜過後不久我出發了，不到一個小時後，我已經在去德班的公路上了。路上空曠無人，只有星星和川斯瓦輕拂的風陪伴着我。雖然沒有入睡，但我感到心怡氣爽。破曉時我穿過福爾克斯勒斯特（Volksrust）到了塞茲瓦那（Cetshwayo）統治的納塔爾。塞茲瓦那是祖魯族最後一個獨立王國的國王，一八七九年他的軍隊在伊桑德爾瓦納（Isandhlwana）打敗了一支英軍。但是這位國王抵擋不了英軍的槍炮，最後終於帶領他的王國投降了。過了納塔爾國家的邊界河不久，瑪祖巴（Majuba）山出現在我眼前，在塞茲瓦那投降後不到兩年，荷蘭人後裔布爾人在這裡的懸崖峭壁間設伏打敗了一支英國駐軍。就是在瑪祖巴山，荷蘭人爲捍衛獨立而反對英帝國主義，爲民族利益奮勇出擊。如今，正是這些自由戰士的後代殘酷迫害我們的人民，而後者的奮鬥目標與當年荷蘭人爲之戰鬥和犧牲的目標完全相同。我駛過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山峰，偶而想到被壓迫者成爲壓迫者這一歷史的嘲弄，但想得更多的是殘酷的歐洲人後裔正在我們人民的腳下建造他們自己的瑪祖巴山。

我車上的收音機裡傳出的班圖電臺的歡愉音樂聲打斷了我的冥思遐想。班圖電臺由政府所有的南非傳播公司管轄。我討厭這個電臺保守的政治說教，喜歡它的音樂節目。（在南非，黑人藝術家創作音樂，白人音樂公司從中漁利。）我收聽的是一個很有影響的節目叫『轉播服務』，這個節目介紹大多數出名的黑人歌手：米裡亞姆·瑪克巴（Miriam Makeba），多利·拉斯貝（Dolly Rathebe），多羅西·瑪蘇庫（Dorothy Masuku）以及瑪哈坦（Mahattan）兄弟圓潤的歌聲。我喜歡各種音樂，但是我的音樂如波濤洶湧，令我熱血沸騰。黑人音樂的眞正獨到之處在於它即使是在講述一段悲傷的故事時，節奏仍然是高昂的。你可能窮困潦倒，身居陋室，無處謀生，但歌聲給你希望。黑人音樂經常表達黑人的願望，它能點燃那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的政治熱情。人們只有在黑人集會時才能親耳聽到那富有感染力的歌聲。音樂使政治更強大有力，同時具有蔑視政治的力量。

我在納塔爾停留很久，秘密會見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然後去格勞特維爾（Groutville）見盧圖利酋長。儘管被軟禁一年多，酋長仍然對非洲民族議會的活動瞭如指掌。他對非洲民族議會中央權力的集中而地區組織力量的削弱感到不安。我向他說明我們也希望地區組織保持強有力的力量。我的下一站是去德班會見奈克爾博士和南非印度人大會領導人，我向奈克爾博士說明，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認爲南非印度人大會近來有些無所作爲，但由於他是我的長輩，而且他所受的迫害遠遠超過我，我很難在這個敏感問題上說服他。但

是，我們研究了對付政府限制的措施。

從德班出發，我沿海岸綫向南行駛，途經謝普斯通（Shepstone）港、聖約翰斯（St·Johns）港和星羅棋布地分布在印度洋沿岸的可愛的小鎮。當我沉浸在這裡的美麗景色的時候，沿途以白人帝國主義者命名的建築物和街道卻不斷給我當頭棒喝，正是這些帝國主義者壓迫着這裡的人民。

當我駛進烏姆塔塔的主要街道約克街的時候，內心深處那種經過長期流浪後回到家鄉的親切感和愉快的回憶被喚醒了。我離家十三年了，儘管沒有旗幟和肥牛歡迎浪子的歸來，我仍然懷着十分激動的心情急於見到母親和我簡陋的家，以及年輕時的朋友們。但我川斯凱之行還有其他目標：趕來參加一個特別委員會會議，任命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監督川斯凱本加（Bunga）機構過渡到班圖當局。

本加由一〇八名成員組成，其中白人占四分之一，黑人占四分之三，其作用是對政府有關本地區黑人的立法提供諮詢，管理本地諸如稅收和道路方面的事務。本加是川斯凱最有影響的政治團體，其決議具有建議性，其決定需交由白人地方長官審查。本加權力的大小蒙白人所賜。但是，《班圖當局法》規定它將由一個更具有約束力的機構所代替：一種由國家制定的建立在世襲和種族歧視基礎上的封建秩序。政府提出班圖當局應該使人民從白人地方長官統治下獲得自由，但這只是政府破壞民主和激化種族對立的一個烟幕彈。非洲民族議會認

為：任何接受班圖當局的企圖都是向政府投降。

在我抵達的第一天夜裡，我簡單地會見了一些川斯凱地方議員和我的侄子K·D·瑪坦茲瑪（K·D·Matanzima），他是勸說本加接受政府班圖當局建議的主要鼓吹者，因為新秩序可以保證甚至加強他在遷移的滕布領地中的地位。我們之間產生了分歧，他追求一種傳統的領導地位，與新機構合作。這時天已經很晚了，我們決定不做長談，第二天再說。

我下榻在城裡的旅店裡，早晨很早起來，和兩位地方官員邊喝咖啡邊討論他們在新的班圖當局中的地位。我們正在進行談話的時候，女招待緊張地帶一個白人走進我的房間。『你是納爾遜·曼德拉嗎？』這人問。

『你是誰？』我說。

他報了他的名字，並自我介紹說是治安警察的警官。

『能給我看看你的證件嗎？』我問道。顯然這位警官對我的傲慢感到憤怒，但還是不情願地拿出一份官方證件。我告訴他我是納爾遜·曼德拉。他通知我他的長官想見我。我回答說如果他想見我，就自己來找我。這位警官命令我和他一起去警察局。我問他我是不是被捕了，他說沒有。

『這麼說，我不去。』我說。他對我的拒絕感到吃驚，但也知道我的法律依據很充足。

他繼續問我一大堆問題：我什麼時候離開的約翰尼斯堡，到過哪些地方，與誰談過話，我有

沒有到川斯凱的許可證以及我準備待多長時間？我告訴他川斯凱是我的家鄉，回來不需要有人批准。警官氣呼呼地走了。

兩個地方官員對我的表現感到吃驚，指責我太粗魯。我解釋說我只是以牙還牙。兩個官員不相信我的話，顯然認爲我是一個頭腦發燒、給自己找麻煩的年輕人。本來我是要說服他們抵制班圖當局的，顯然我沒有給他們留下什麼好印象。這件事使我認識到我畢竟與十三年前離家的時候不同了。

川斯凱的警察頭腦簡單，我一離開旅館，他們就隨後跟着我。我隨便和某個人談話以後，他們就走到那人眼前，說：『如果你和曼德拉談話，我們會過來逮捕你。』

我會見了一位當地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當我了解到他們的組織缺乏資金時，我感到震驚，但此時此地，我眞關心的是我的下一個目的地：庫努。我是在那裡長大的，而且我的母親依然生活在那裡。夜裡，當我滿懷熱情回到故鄉時，我用手按車上的喇叭。我沒有意識到喇叭聲對人們來說可能意味着什麼，人們膽戰心驚地從他們的小屋裡跑出來，以爲是警察來了。但是當他們認出是我時，村民們驚喜交加。

母親被我的聲音驚醒，乍一見我，她好像遇見了鬼魂。她異常興奮，我在去姆克凱茲韋尼前住過的屋子裡待了整整一夜。我帶回一些食物——水果、肉、糖、鹽和一隻鷄，母親點着爐子燒茶。我們沒有擁抱和親吻，這不符合我們的習慣。當我沉浸在回家的幸福中時，看

到一直在如此貧窮的環境中孤苦伶仃地生活着的母親，我感到內疚。我勸說她到約翰尼斯堡和我一起生活，她卻說她決不會離開她依戀的這片土地。不止一次感到困惑的是，一個人拋棄自己家庭的幸福，而爲他人的幸奮鬥是不是公正的。還有比照顧自己年邁的母親、爲她建造一個理想的家園、使她的生活舒適美滿更重要的事情嗎？難道政治就是一個人逃避自己的責任，或不能承擔起應有的責任的藉口嗎？那一夜躺在兒時的床上，卻無法像兒時一樣鼾然入睡，我輾轉反側，想我是不是走對了生活的道路。但我並不懷疑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鬥爭的意義上，我已經給我母親帶來了安寧。我並不是說爭取自由的鬥爭比照顧自己的家庭更有道德意義。它們是截然不同的。

在庫努的第二天，我和人們一起懷念往事，漫步在村莊四周。這天下午我離開家到姆克凱茲韋尼去。這一次我也是晚上到達，用響亮的喇叭聲通知人們我來了，人們從家裡跑出來，以爲是他們的酋長加斯蒂斯回來了。加斯蒂斯被政府剝奪了職務，現在住在德班。雖然政府派別人代替了他的位置，但酋長就是酋長，他的血統決定了他生就的品質和自然的權威。人們高興地歡迎我，但如果回來的是加斯蒂斯他們也許會更高興。

我來時，我的第二母親（諾－恩格蘭），國王的遺孀已經睡下了，但當她穿着睡衣來見我時，非常高興，要我立刻和她一起到附近的親戚家去慶祝一番。她跳進我的車裡，我們開足馬力狂奔，穿過空曠的草原，穿過樹林和灌木叢，到達她那偏僻的親戚家裡。我們把另一

家人也吵醒了，後來我疲憊而又愉快地睡了，那時已接近黎明了。

以後的兩個星期我奔忙於庫努和姆克凱茲韋尼之間，輪流與母親和妻妹在一起，拜訪和接待朋友和親戚。吃着童年時吃的食物，漫步在童年走過的土地上，白天看着同一片藍天，晚上看着相同的星星。一個自由戰士與自己的根保持聯繫是很重要的，繁忙的城市生活會使人忘記過去。重返故里使我找到了原來的我，使我恢復了對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的感情。在家裡我又成了母親的兒子；在大王宮裡我又成了國王的義子。

重歸故里也使我反醒自己走過的路。我看到家鄉的人民怎樣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而我則離鄉背井接觸新世界，增長新見解。如果說以前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想我沒有在黑爾堡大學畢業後回到川斯凱是正確的。如果當時我回來了，我政治變革的理想也許已經磨滅了。

當討論班圖當局建議的特別委員會暫時休會時，我和達利旺高拜訪了正在烏姆塔塔醫院的薩巴塔。我本來希望能和薩巴塔討論關於班圖當局的事，但他的健康狀況不允許。我希望薩巴塔一旦病情好轉，就開始和他的堂兄弟討論此事，予以澄清。值得驕傲的是我召集恩古本哥庫巴（Ngubengcuka）的後代們舉行了一次會議，有一陣我陷入沉思，想到命運開的玩笑：許多年前我本來被推選爲薩巴塔的顧問，而今天我終於行使了這一權力。

我和達利旺高從烏姆塔塔出發去卡馬它（Qamata），在那兒見到了他的弟弟喬治，那

時他是一個開業律師。他的兩個秘書我久聞大名，我很高興見到這兩個人：A·P·姆達和釆波·萊特拉卡（Tsepo Letlaka）。這兩個人都是非洲民族議會堅定的支持者，他們放棄了教師的職業，決心當律師。在卡馬它，我們坐在一起討論接受政府班圖當局建議的事宜。

我的任務是敦促達利旺高反對政府強制接受關於班圖當局的建議，達利旺高註定在川斯凱的政治生活中擔任領導角色。我不想把會議搞成一次攤牌，或者甚至是一番爭吵。我也不想有任何嘩衆取寵、吹毛求疵、推銷觀點的做法，我只想在最能眞心代表人民和民族利益的人之間進行一次嚴肅的討論。

在許多方面，達利旺高仍然把我當作他的晚輩，因爲我在滕布王族等級中的地位和政治經歷都不如他。當然從前我是他晚輩，但我相信如今在政治信仰上我已經超過我這位從前的導師。他的思想還局限在本部落範圍內，而我已經能夠從整個民族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了。我不想用一些的華麗的政治理論使問題複雜化；我只想從共同的認識和歷史的事實出發。在我們開始討論以前，達利旺高邀請姆達和萊特拉卡參加，但他們拒絕了，他們說只想聽聽我們兩人的看法。『讓侄子和叔叔討論吧。』姆達說，這是爲了表示尊敬。禮節要求我先發表自己的觀點，他洗耳恭聽；然後他說我聽。

首先，我說，當越來越多的黑人從原始居住區湧向城市的時候，建立班圖當局是不現實的。政府的政策用意在於使黑人陷入種族紛爭，因爲他們害怕黑人團結的力量。我說，人民

需要民主，政治領導權應依據政績而不是血統。建立班圖當局的建議是民主的倒退。

達利旺高的回答是，他想恢復被英國人剝奪的王室成員的形象。他強調部落體系和傳統領導制的重要性，也不想拒絕沿襲這些傳統的制度。他也希望有一個自由的南非，但是認為他能夠更迅速更和平地通過政府的區域變革實現這一目標。他說，非洲民族議會會帶來血腥和苦難。最後他說他對我竟然不顧滕布王室的立場反對傳統的領導制度感到震驚和困惑。

達利旺高說完後，我回答說，我非常理解他作為酋長的個人地位，我認為他自己的利益是與社會的利益相矛盾的。我說如果我處在他的位置上，我會讓我自己的利益服從於人民的利益。說完最後一句話，我馬上感到後悔，因為我發現在爭論的時候這種話絲毫無助於一個人在道義上壓倒對手。我注意到達利旺高在我說這句話時一下子僵住了，我趕忙把話題轉向一般的問題上。

我們徹夜長談，但彼此立場仍相距甚遠。天亮後我們結束了會談。我們走在彼此對立的不同道路上。回首往事，我感到痛苦，因為過去很少有人像達利旺高一樣教導我，也沒有什麼比與他並肩戰鬥更令人興奮。但是往事不再。在家族裡，我們是朋友；在政治上，我們站在敵對的陣營中。

這天早晨我回到庫努住了幾天。我穿過草原去看望朋友和親戚，但童年時的美妙世界已不復存在。一天晚上我告別了母親和妻妹，看望了在醫院的薩巴塔，祝他早日康復。凌晨三

點，我驅車前往開普敦。通過凱伊（KAI）河時，皎潔的月光和清爽的晨風令我心曠神怡。路蜿蜒於崎嶇的德拉肯斯（Drakensburg）山，當太陽冉冉升起時，我的興緻越來越高。記得十八歲那年我和容京塔巴去希爾德敦走的就是這條路。

我正慢慢行駛，突然看見路邊有一個一瘸一拐的男人在招手。我本能地停下來載他一程。他年紀和我相仿，身材矮小，非常邋遢；看來很長時間沒洗澡了。他告訴我他的車在烏姆塔塔那一邊拋錨了，他不得不走上幾天到伊麗莎白港。我發現他的話自相矛盾，就問他的車牌，他回答，BUICK。我又問他登記號，他告訴我一個數字。過了一會兒，我突然問：『你說你的登記號是多少？』他又告訴我另外一個數字。我懷疑他是警察，心想少說爲妙。

我的沉默沒有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整個去伊麗莎白港的路上他一直侃侃而談。他能說出各種古跡，對這一地區的歷史瞭如指掌。他一直沒有問我的名字，我也沒有告訴他。但是他自得其樂，我覺得他的談話風趣而且對人很有幫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警察也不例外。

我在東倫敦稍事停留，和幾個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聊了聊。臨走我又和鎮上的其他一些人談了談，我感覺其中一個人好像是便衣警察。我的旅伴知道了我的身份，回到車上不久他對我說：『嘿，曼德拉，我懷疑最後那個傢伙是個警察。』這引起了我的懷疑，我對他說：

『喂，我怎麼知道你不是警察呢。你跟我說實話，不然我把你扔在過來的路上。』

他申辯道：『我不是，我告訴你眞相。』他說他是一個走私者，當他從蓬多蘭（Pondoland）出發運送走私品時，碰到了警察的公路哨卡。一發現哨卡，他就從車上跳下來，想逃跑。警察開槍打中了他的腿。這就是爲什麼他一瘸一拐而且步行。他攔我的車是因爲他認爲警察正在搜捕他。

我問他爲什麼選擇這麼一種危險的行當。他說他最初想當一名老師，但他的父母手頭拮据，供不起他上大學。中學畢業後，他在工廠工作，但工資低廉難以維持生計，爲了生活他開始走私，後來發現走私很賺錢，就乾脆離開了工廠。他說在其他任何國家像他這樣的人不會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工作。『我看見那些能力和腦子都不如我的白人賺的錢是我的五十倍。』過了很長時間，他鄭重地說：『我也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他告訴我他參加了一九五二年的抵制運動，曾經在伊麗莎白港的各種地方委員會工作過。我說出一些人考問他，他都一一說出這些人的情況，等到了伊麗莎白港，我進一步弄清他說的都是眞話。實際上，他是抵制運動期間被捕者中最可靠的人之一。自由鬥爭的門向所有願意爲之獻身的人敞開。

作爲一個接觸過許多案件的律師，我對這類事情很熟悉。我曾經不只一次地看見有人爲了謀生鋌而走險，他們和我這位旅伴一樣聰明能幹。儘管我認爲某些人喜歡犯罪是因爲他們的天性和後天不良的教育，但我也相信，正是種族隔離制度使許多守法的公民走向犯罪的深

淵。這是因爲不道德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導致人們對法律制度的蔑視。

日出時我們到了伊麗莎白港。Z·K·馬修斯的兒子喬·馬修斯爲我安排了住處。第二天早晨我會見了姆拉巴（Mhlaba），弗朗西斯·巴爾德（Frances Barrd），戈萬·姆貝基（Govan Mbeki）。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戈萬·姆貝基，但我了解他的活動，因爲當我還是個學生時，就讀過他的小冊子，《建設中的川斯凱》。他和別人合伙在川斯凱開過一家商店，不久他放棄了這份工作，擔任了《新世紀》周刊的編輯。哥文（Govan）爲人嚴肅，善於思考，說話慢聲細語，他在學術上和政治活動上擁有同等的能力。他爲人民大會的計劃做出了重大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爲該組織的『最高領袖』之一。

次日早晨我出發去開普敦，一路上只有收音機陪伴我。以前我從沒有在伊麗莎白港和開普敦之間的公路上行駛過，因此希望能一覽途中宜人的景色。天氣炎熱，路旁佈滿了繁茂的植物。在路上我輾死了一條正在爬行的蛇，因此差一點取消旅行計劃。我並不迷信，也不相信惡兆之類的說法，但死蛇使我興緻全無。我不喜歡傷害任何生命，甚至包括能致人死命的東西。

當我經過許曼斯多普（Humansdorp）的時候，森林更加繁密，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了野象和狒狒。一隻大狒狒擋在路上，我把車停下。它站在那兒，緊張地盯着我，好像我是特務機關的密探。令人難過的是，我作爲一個非洲人，平生第一次親眼目睹故事書和小說裡描寫

的生動的非洲。我想，如此美麗的國土卻那樣遙遠，它遭受白人的統治，而黑人只能望洋興嘆。我決不願繼續生活在一個由白人政府統治的美麗的南非。

對一個自由戰士來說，反抗壓迫的思想無處不在。在距伊麗莎白港西一〇〇英里的克拉克森（Clarkson）村，我把車停下，俯瞰周圍的景色。站在村莊旁邊的公路上，四周的風景一覽無遺。周圍到處是綿延的、茂密的森林，此時此地，我想到的不是滿眼綠色世界，而是這裡很適合一支游擊隊秘密生活和訓練。

午夜，我到達了開普敦，計劃在這裡住兩周。我住在沃爾特·德卡（Watter Teka）牧師的家裡，他是衛理公會的主教，大部分時間我與約翰森·恩哥維沃拉（Johnson Ngweuela）和格林伍德·恩果泰阿那（Greenwood Ngotyana）在一起。恩哥維沃拉是非洲民族議會在開普敦西區的主席。恩果泰阿那是執委會成員。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也是美以美會的主教。我每天去拜會一些地區，如伍斯特（Worcester）、帕爾（Paarl），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西蒙斯敦（Simonstown），赫曼努斯（Hermanus）的非洲民族議會官員。我計劃利用在開普敦的每一天開展工作，當我詢問星期天有何安排時——在川斯瓦這是我的工作日，他們告訴我安息日只能去教堂。我提出不同意見但無濟於事。至少在南非，共產主義和基督教不是互相排斥的。

當我準備離開開普敦時，我拜會了《新世紀》周刊編輯部，見到了一些老朋友，和他們討論了周刊的出版政策。《新世紀》繼承了從前被取締的左翼刊物的傳統，是非洲民族議會的親密戰友。九月二十七日清晨，當我來到編輯部時，我聽到裡面傳來憤怒的叫喊聲和搬運傢俱的聲音。我聽出喊叫的是弗雷德·卡尼森（Fred Carneson），他是刊物的經理人及其靈魂。我聽到治安警察粗暴的聲音，他們正在搜查編輯部。我悄然離開，後來我發現這次搜查並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歷史上大規模全國範圍內鎮壓的一部分。持有政府許可證的警察隨意以叛國、騷亂和違反《鎮壓共產主義法》的罪名進行搜查。警察搜查了五〇〇多戶居民家庭和辦公室。我在約翰尼斯堡的辦公室也遭到搜查，其他還有莫羅卡（Moroka）博士、赫德爾斯頓（Huddleston）神父和馬修斯教授的家。

政府的鎮壓給我在開普敦最後幾天投下了陰影，因爲這只是政府新的更加嚴厲的政策的第一步。在最低限度內，政府將頒布新一輪禁令，我自然難以倖免。那天晚上，德卡牧師和妻子接待了一大批爲我送行的人，在牧師主持下，我們跪着爲那些遭洗劫的人祈禱。我還是在我比較喜歡的凌晨三點出發，花了不到一個半小時到金伯利。金伯利是一個粗糙而未開發的礦業城市，但在上個世紀南非的鑽石買賣就已在此起步了。

我在亞瑟·萊特爾（Arthus Letele）博士家裡住了一夜。亞瑟不僅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司庫，也是一個一絲不苟的藥物專家。他接待我時我有點感冒，他要我上床休息。他是個勇敢

而傑出的人，在抵制運動中，曾帶領幾個人自願到監獄受囚禁之苦。對一個生活在黑人政治運動薄弱的保守城市裡的醫生來說，此舉要冒一定的危險。在約翰尼斯堡，一個從事同樣危險事業的人會有成百上千的支持者，而在金伯利這樣保守的地方，根本沒有自由的輿論或司法機構牽制警察的行動，如此大膽的舉動確實需要勇氣。在抵制運動期間，在金伯利，一位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被地方法官判處受鞭打。

儘管我身體不適，亞瑟還是允許我出席次日晚上在他家裡舉行的非洲民族議會會議。我計劃第三天凌晨三點離開，但亞瑟和他的夫人堅持要我吃過早飯再走，我聽從了他們的建議。返回約翰尼斯堡時我一路順風，晚飯前我回到家裡。見到我，孩子們又驚又喜，他們知道我一定給他們帶了禮物。我一邊把從開普敦買回來的禮物逐一發給他們，一邊耐心地回答孩子們關於我一路所聞所見的提問。儘管這算不上一次真正的渡假，但它一樣使我精力充沛，我準備重新投入鬥爭中去。

二十二

一回到約翰尼斯堡，我就向非洲民族議會工作委員會報告了我一路上的活動情況。他們最擔心的是人民大會聯盟各派別是否具有阻止政府計劃的能力。我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好消

息。我說，川斯凱地區的非洲民族議會組織不完善，而且警察不久就會摧毀非洲民族議會僅有的一點影響。

我提出一種方案，但也知道多數人不會接受。爲什麼非洲民族議會不可以參加新的班圖當局的機構呢？我們可以以此作爲聯繫廣大人民群衆的橋樑。一旦參加進去，我們就會擁有宣傳我們的觀點和政策的講臺。

以任何形式參加種族隔離機構的建議自然而然地會遭來憤怒的反對。以前，我也會對此聲色俱厲地予以駁斥。但是，從整個國家的角度出發，我感覺能不怕犧牲參加鬥爭的人畢竟是少數。我們應該考慮廣大人民的利益，儘管這樣甚至可能意味着妥協。我認爲我們的運動應該成爲一個大本營，我們要吸收盡可能多的人。

但是，由於另一份報告引起了更大爭議，我的報告被暫時放在一邊。湯姆林森（Tomlinson）委員會關於班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報告引起了全國範圍的爭論。政府任命的這個委員會提出了一項發展所謂班圖地區社會經濟的計劃。其宗旨事實上是實行『區域發展』或者說是更加廣泛的種族隔離。

班圖地區計劃是由土著人事務部部長H·K·維沃爾德（H·K·Verwoerd）提出的，其目的是在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同時，轉移國際社會對南非種族政策的批評。按照他的計

劃，班圖地區，或者根據有時人們的說法叫保留地，將根據種族或出生地劃分爲若干地區。維沃爾德聲稱，非洲人『應該立足於保留地』，『在自己的地區內發展經濟文化』。這樣，三百萬白人就擁有南非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而八〇〇萬非白人只擁有百分之十三的土地。

這份報告的主旨是以黑人白人各自爲政的政策抵制各種族融合的思想。最後，報告提出在非洲人地區實行工業化，指出，任何發展計劃，如果其目的不在於爲非洲人在其自己的地區內提供生存機會，其結果都註定要失敗。該委員會聲稱目前非洲人地區的地理結構太鬆散了，與主張非洲人地區實行聯合相反，它建議把非洲人地區分成以種族爲基礎的七個『有歷史淵源』的獨立單位。

但是，建立各自爲政、自我封閉的非洲人地區的計劃只是一場鬧劇。最典型的是，川斯凱地區要被分成三個獨立區域。史瓦濟（Swazi）非洲人區、萊博瓦（Lebowa）和文達（Venda）；嘎贊庫萊（Gazankule）四塊，西斯凱（Ciskei）十七塊，博普塔茲瓦納（Bophuthatswana）十九塊，而夸祖魯（Kwazulu）要被分成二十九塊。國民黨在人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玩弄着拼板遊戲。

政府對川斯凱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區進行切割的目的是使這些地區永遠作爲白人工業的廉價勞動力倉庫。其暗含的目的是製造一個非洲中產階級，以對付非洲民族議會和解放運動。

非洲民族議會譴責了湯姆林森委員會的報告，儘管報告中含有一些使非洲人得到更多自

由的措施。正如我向達利旺高指出的那樣，區域發展是在白人沒有更好的統治辦法的時候採取的虛僞的政策。結果，政府批准了這份報告，但刪除了其中的不少建議，原因是它們太激進了。

我暫時不去考慮不斷惡劣的局勢和對政府政策的悲觀看法，開始考慮將來的事。一九五六年二月，我回到了川斯凱，在烏姆塔塔買了一小塊地皮。很久以來我一直在想，一個人應該在他的家鄉擁有一個住處，在他逃避外界的時候能有一個安身之處。

我和沃爾特一起抵達川斯凱。我們首先去了烏姆塔塔和德班，會見了各種各樣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我們又一次受到了特務機關的警察的騷擾。在德班，我們拜訪了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同志，目的是促進在這一地區的活動。

在烏姆塔塔，我在沃爾特的幫助下用現金從C·K·薩克威（C·K·Sakwe）手中買下了一塊地皮。薩克威是本加的成員，曾在土著人代表會議中任職。在薩克威那裡，我們聽他講述了上周六發生在薩巴塔的大王宮裡的一件事，政府官員和酋長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在於討論實行非洲居住區的計劃。許多酋長反對政府的政策，並當場攻擊地方當局。會議在憤怒中不歡而散，這使我們感到《班圖當局法》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一九五六年三月，度過了比較自由的幾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三次禁令，在五年之內不

許我離開約翰尼斯堡，不許我參加任何會議。以後的六十個月我將被囚禁在同一個地區，每天看同一個街道，看遠處同樣的垃圾堆和同一塊天空。只有從報導和別人那裡了解約翰尼斯堡以外發生的事情，這是對我來說如同爵巤。

但是這次我對禁令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第一次接到禁令時我嚴守當局的規定。如今我已經學會了蔑視這些限制。我將不再讓我與之戰鬥的敵人限制我參加鬥爭和進行政治活動的範圍。允許我的敵人限制我活動就意味着失敗，我決定不再自我約束。

不久，我捲入了約翰尼斯堡一次激烈的分歧爭論。分歧的雙方互不相讓，都尋求我的支持。發生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的這次分歧的雙方都有各自合理的意見，對對方的立場都毫不妥協。如果聽任分歧發展下去，就有可能爆發嚴重的內鬥，我爲阻止事態的發展盡我所能。當然，我所指的是發生在我每天晚上都去鍛鍊的唐納森－奧蘭多社區中心的拳擊和舉重俱樂部的鬥爭。

我於一九五〇年加入這個俱樂部，每天晚上只要有空我就去社區中心。最近我帶兒子滕比（Thembi）一塊去，他很快着了迷，算得上是一個瘦長的超輕量級的業餘拳擊手。俱樂部的經理是約翰尼斯·莫羅西（Johannes Molosi），成員包括職業和業餘拳擊手、各級別的優秀舉重選手。我們的拳擊明星是傑瑞·莫洛伊（Jeery Moloi），他後來成了川斯瓦輕量級冠軍和全國冠軍的有力競爭者。

我們缺少設備。沒有場地，拳擊手在水泥地上訓練，如果被擊倒就可能造成致命的創傷。唯一令我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有一個吊袋和幾副拳擊手套。我們沒有藥或止痛劑。沒有像樣的拳擊褲和鞋。沒有護齒。幾乎沒人有頭盔。雖然設備奇缺，俱樂部還是造就了一些冠軍，如艾瑞克·恩特賽勒（Eric Ntsele），南非最輕量級冠軍，弗雷迪·恩吉迪（Freddie Ngidi），川斯瓦一百二十磅以下級冠軍，恩吉德在曼德拉和坦博事務所工作，是我的助手。

儘管在黑爾堡大學我練過一陣子拳擊，但在約翰尼斯堡住了好多年後，我才急於重新加入這項運動。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出色的拳擊手。我屬於重量級，但我既沒有速度，也沒有力量。我不喜歡拳擊的血腥味，而樂於捉摸其中蘊含的哲理。我喜歡看拳擊手怎樣移動以保護自己，怎樣運用攻守的策略，怎樣前進和後退。拳擊是平等的比賽。在拳擊場上，地位、年齡、膚色和財富都是次要的。當你面對你的對手，估計他的力量和弱點時你根本不用考慮他的膚色和社會地位。進入政界後我沒有進行過任何眞正的比賽，我主要的興趣在於鍛鍊，我認爲高強度的鍛鍊可以發洩緊張感和壓力感。經過緊張的訓練後，心理和體力都得到放鬆。這是我暫時遠離政治鬥爭的辦法。經過一晚上的鍛鍊，第二天早晨醒來我感到精力充沛，準備投入新的戰鬥。

從周一到周四每晚我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參加俱樂部的活動。下班後我直接回家，帶著

滕比，開車到社區中心。我們進行一個小時的鍛鍊，包括跑步、跳繩、健美體操和模擬拳擊，然後是十五分鐘的身體訓練，一般是舉重，然後是拳擊。如果我們準備參加一場拳擊或者比賽，就得把訓練時間延長到兩個半小時。

爲了培養領導能力、創造性和自信心，我們每個人輪流主持訓練。滕比樂此不疲。聽起來有點殘酷，有時當我兒子帶隊訓練時，他點名批評我。他信心十足，對我偷懶嚴懲不貸。俱樂部人人都叫我『會長』，但滕比故意不這麼叫，而叫我『曼德拉先生』，偶而，他覺得對他的老頭子挺同情，就用當地人俗語，叫我『我的兄弟』。如果他看見我無動於衷，就嚴肅地說：『曼德拉先生，你在浪費我們的時間。如果你跟不上，爲什麼不回家陪老太太呢？』滕比想給別的孩子看看，他不怕他爲自由而戰的爸爸。大家都喜歡這種玩笑，我也爲兒子的高興和自信感到快樂。

這一年，經理斯基波·莫羅西和傑瑞·莫羅伊之間的分歧造成了俱樂部的分裂。傑瑞和其他拳擊手認爲斯基波對俱樂部不太關心。斯基波是出色的教練，但很少到場傳授他的知識。他擁有豐富的拳擊知識，對拳擊歷史知之甚多，他能如數家珍地道出一九一五年傑克·約翰遜在哈瓦那全部二十六回合比賽的情況。傑克·約翰遜是第一位黑人重量級冠軍，在哈瓦那的比賽中他失去了冠軍寶座。但斯基波一般只在比賽前露面，召集他負責的小拳擊迷們。我本人同情傑瑞的觀點，但是仍然盡力平息紛爭，以維護俱樂部的和諧。最後，連我的兒子也

站在傑瑞一邊，我再也無能爲力了。

在傑瑞的領導下，拳擊手們威脅要退出俱樂部，重新組建自己的俱樂部。我召集俱樂部全體會員開會，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會議，與會者操着各種語言——西蘇托語、祖魯語、科薩語和英語。斯基波還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來批評造反的拳擊手們，他指責傑瑞像布魯圖（Brutus）出賣凱撒一樣出賣他。我兒子問：『誰是凱撒和布魯圖呢？』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就聽見有人說：『他們不是早死了嗎？』斯基波回答：『他們是死了，但出賣別人的事確實還存在！』

會議不歡而散，拳擊手們離開俱樂部另尋門路，舉重運動員們還留在社區中心。我和拳擊手一起訓練，散伙後頭幾個星期我們在警察健身房進行自由比賽，對於一個自由戰士來說，這個地方很不合適。後來英國聖公會在奧蘭多東區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地方，收費很合理，由西蒙·查巴拉拉（Simon Tshabalala）主持我們訓練，他後來成爲非洲民族議會地下自由鬥爭的領導人。

我們的新設施不如從前，俱樂部也一直沒有重新組建。和所有的黑人運動員和藝術家一樣，非洲拳擊手飽受貧窮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困擾。他們掙的錢要用於衣食住行，其餘的用於拳擊設備及訓練上。我們無法與擁有造就第一流、世界級拳擊手的設備和教練的白人俱樂部競爭。與白人職業拳擊手不同，黑人職業拳擊手從事全日制工作。陪練員收入少得可憐，沒

有人示範如何救助傷病。但是有許多黑人選手克服這些困難，取得巨大的勝利。像埃里加·莫科恩（Elijah Mokone），埃諾奇·恩拉博（Enoch Nhlapo），拉維·馬德（Levi Madi），恩科薩那·姆哥薩基（Nkosana Mgxaji），馬基德·莫佛肯（Macheed Mofokeng），諾曼·謝克加帕恩（Novman Sekgapane），這些拳擊手都曾取得輝煌的成績，而我們最偉大的英雄是扎克·圖利（Jake Tuli），他獲得了英聯邦一百二十磅以下輕量級冠軍。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只要給黑人拳擊手機會，他們就能夠成功。

56.12.5

第五章　叛國案

二十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早晨天剛亮，我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鄰居和朋友不會這麼粗野地敲門，我馬上意識到警察來了。我迅速穿好衣服打開門，來的是羅修（Rousseau）警長，他是我們這個地區的治安長官，大家都熟悉他。他拿出一張搜查證，他的兩個部下立即開始滿屋子亂翻，尋找可疑的印刷品和文件。這時孩子們醒了，我趕忙哄他們安靜，伊夫琳不在，孩子們只好依靠我。警察翻箱倒櫃，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地方。搜查足足進行四十五分鐘，羅修凶巴巴地說：『曼德拉，這是你的逮捕令，跟我走。』我看了一下逮捕令，那上面寫着：『罪名：嚴重叛亂罪。』

我跟着他們上了警車。在孩子們眼皮底下被捕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儘管我問心無愧。但孩子們不了解事態的複雜性；他們只是看見父親被白人官員帶走了。

羅修開車，我坐在他旁邊的前座位上，沒帶手銬。他還持有我辦公室的搜查證，路上他

停下車，讓附近地區的兩個警察下去，然後帶我去我的辦公室。去約翰尼斯堡商業區要通過一條空曠的公路，這條公路穿過一個人烟稀少的地區。我們上了這條公路後，我對羅修說他一定很自信，因爲只有他一個人帶着我，還沒有給我戴手銬。他一言不發。

我問：『如果我抓你而且制住了你，會怎麼樣呢？』

羅修不自在地動了動，說：『曼德拉，你在玩火。』

『玩火我在行。』我回答。

羅修威脅說：『如果你再說這些，我就給你戴上手銬。』

『如果我不幹呢？』

這樣的緊張對話又持續了一會。當我們駛進朗拉格特（Langlaagte）警察局附近的鬧市區時，羅修對我說：『曼德拉，我對你不錯，也希望你對我禮貌點。我一點也不喜歡你開的玩笑。』

在警察局稍事停留後，另一個警官跟我們一起到我的辦公室，他們搜查了四十五分鐘。最後我被帶到馬歇爾廣場（Marshall Square），這是約翰尼斯堡一座雜亂無章的、用紅磚砌成的監獄。一九五二年抵制運動中我在這裡被關過幾天。我的許多戰友比我先到了，大清早，他們就被捕並在監獄的入獄名冊上登記了。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更多的朋友和同志來到獄中。這是政府早有預謀的行動。有人偷偷帶來一張《星辰》報下午版，從其開列的受禁名

單中我們得知這是全國範圍的鎮壓，人民大會聯盟的主要領導人都以嚴重叛亂罪和密謀推翻政府罪被捕。在其他地區被捕的人，包括盧圖利酋長、蒙蒂·奈克爾（Monty Naicher）、里吉·謝普坦博（Reggie September），利蓮·恩戈伊（Lilian Ngoyi）、皮特·比勒沃爾德（Piet Beyleveld），被軍用飛機運到約翰尼斯堡，在這兒他們將受到審訊。有一四四人被捕。第二天，我們被帶到法庭，正式受到指控。一個星期後，沃爾特和其他十一人被捕，使總數達了一五六人。全部被捕者中有一〇五名黑人，二十一個印度人，二十三個白人，七個有色人，非洲民族議會的全部領導人，包括收到禁令和沒收到禁令的，全部被捕。政府終於採取行動了。

不久，我們被移送約翰尼斯堡監獄，這座監獄以堡壘著稱，是一座灰暗城堡式的建築，位於市中心的一座山上。在當局授意下，我們被帶到牢房外的一個方形院子裡，脫光衣服按順序靠牆站着。我們被迫站了一個多小時，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對我們這些神父、教授、醫生、律師、商人來說，這是令人尷尬的，我們都到了中年或者老年，平時受到人們的尊重。雖然我感到憤怒，但看到其他的人的窘態時，我忍不住想笑。我第一次理解了『人靠衣裝』這句俗語。如果只有身體魁梧健壯的人才能成爲領袖的話，我們中間幾乎沒有人能勝任。

最後，來了一個白人醫生，問有沒有人不舒服。沒有人說自己有病。他們命令我們穿好

衣服，我們被帶進兩間大房子，地板是水泥的，沒有傢俱。屋子裡剛粉刷過，有一股粉刷完後的怪味。發給我們每人一條薄毯子和一個波羅蔴蓆子。房子裡只有一個跟地面水平的廁所，沒遮沒擋。有人說沒進過監獄，不會眞正了解一個國家。判斷一個國家不能從它怎樣對待上層民衆出發，而應看它怎樣對待最下層的人。南非政府把監獄的黑人當成了動物。

我們被關在堡壘裡兩個星期，儘管條件惡劣，我們仍精神飽滿。我們能看到報紙，知道由於我們 的被捕引起了不斷蔓延的抗議浪潮。全國到處舉行抗議大會和示威；人們舉着標語，上面寫着『我們支持我們的領袖。』我們看到來自全世界的對南非當局鎭壓行徑的抗議。

我們的公共牢房成了遠隔千里的自由戰士們的聚議廳。我們中的許多人曾經受到嚴格的人身限制，彼此會面和交談都是非法的。如今，敵人把我們聚在一起，使我們能不受限制地召開幾年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全國大會聯盟會議。年輕人第一次見到以前只能從報紙上看到的年長者。來自納塔爾的人會見了川斯瓦的領袖們。在等待法庭傳訊的兩個星期裡，我們爲能有機會交流思想和情況而感到高興。

每天我們制定一份活動計劃。派崔克·莫勞阿（Patrick Molaoa）和皮特·恩賽特（Peter Nthite）主持體育鍛鍊，他們都是傑出的青年聯盟領導人。我們討論預先擬好的各種問題，聽馬修斯教授講非洲民族議會和美國黑人的歷史，德比·辛格（Debi Singh）描述南非

印度人大會的歷史，亞瑟·萊特爾談論黑人藥劑師，詹姆士·卡拉塔（James Calata）演講非洲音樂，並用優美的男高音演唱。每天，伍伊席勒·米尼（Vuyisile Mini）帶領大家唱自由歌曲，幾年後，米尼被政府以政治罪名絞死。我們盡可能大聲地唱，它使我們鬥志昂揚。

一次，馬薩巴拉拉·英瓦（Masabalala Yengwa）給大家講音樂，他出生於祖魯勞動者家庭，是非洲民族議會地方省書記。在演講中他背誦了一首讚美傳統的祖魯勇士和國王薩卡（Shaka）的歌曲，英瓦身上裹着毯子，捲起一張報紙當劍，一邊身體前後移動，一邊背誦歌詞。所有人，包括不了解祖魯族的人，都被深深打動了。突然，英瓦戲劇般地停頓了一下，然後大聲朗誦歌詞：『那人殺死了其他人，殺死了一些，又殺死了一些！』氣氛一下子被鼓動起來。一直沉默不語的盧圖利酋長站起來，吼道：『這就是薩卡！』然後邊舞邊唱。人們在他的感染下一起跳起來。對傳統和西方舞蹈都一竅不通的懶漢們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一起跳祖魯族傳統的戰爭舞蹈『Indlamu』。一瞬間，分不清科薩人還是祖魯人，印度人還是非洲人，右翼還是左翼，宗教領袖還是政治領導人；出於對我們共同的歷史、文化、祖國和人民的熱愛，我們都成了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在那一時刻，有種東西激蕩在我們內心深處，強壯而又親切，把我們彼此連在一起。在那一時刻，我們感到我們偉大的歷史造就了我們，而偉大事業使我們緊緊相連。

兩周以後的十二月十九日，在約翰尼斯堡的操練廳對我們進行了預審，這是一座軍事建

築，一般不用作法庭。大廳裡空空蕩蕩，屋頂是波浪鐵皮做的，看來也是唯一一座能容納這麼多被告的公共建築。

我們被裝在封閉的大篷警車裡面，由六輛滿載武裝士兵的軍車押送。看到這麼緊張的場面，人們一定以為全面內戰爆發了。特威斯特（Twist）街擠滿了我們的支持者；不斷傳來他們歡呼聲和歌聲，我們在警車裡向人們問候。這不像是押送犯人，倒像是一次勝利大遊行，警車在人群的簇擁下緩慢地行駛着，整個大廳周圍佈滿了荷槍實彈的警察和士兵。警車停在大廳後面，這樣我們可以直接下車進入法庭。

在大廳裡我們看到另一些支持者，大廳看起來像一間吵吵嚷嚷的抗議大會會場，而不像一個莊嚴的法庭。我們邊走邊用拇指表示非洲民族議會的禮節，並點頭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致意。我們內心深處更多的是興奮而不是沮喪，因為我們與支持者和朋友在一起。

政府為一五六名被告羅列的罪名都是嚴重叛亂罪和在全國密謀使用暴力推翻現政府並代之以共產主義政府。罪名成立期限是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包括蔑視運動，索菲亞鎮反遷移運動和人民大會運動。南非關於嚴重叛亂罪的法律不是來自於英國，而是來自於羅馬的荷蘭人祖先，其含義是企圖擾亂、損害、威脅國家的獨立或安全。對嚴重叛亂罪的判決是死刑。

預審的目的是審查政府的指控是否充足，是否應把被告移交最高法院。這樣，取證分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地方法官的法庭上。如果地方法官認爲有充足的證據指控被告，案件將移送最高法院，由一名法官審理，如果他認爲證據不足，被告將被免予起訴。

負責審理此案的是來自於布隆方丹的大法官F・C・A・威賽爾斯（F・C・A・Wessels）先生。第一天，當韋賽爾斯開始講話的時候，由於聲音太低，根本無法聽到。當局忘了準備麥克風和揚聲器，找揚聲器的時候，法庭不得不暫時休庭兩個小時。我們在法庭上，吃着外面送來的食物，好像一次野餐。氣氛顯得有點滑稽。兩個小時後，還沒有找到像樣的擴音器，法庭只好休庭。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我們又被帶回監獄。

第二天，法庭外人聲更加嘈雜，警察如臨大敵。五百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圍在大廳四周。我們進入法庭時，看到政府在裡面架起一個巨大的籠子，當作被告席。籠子由方格綫網製成的，綫網繞在柱子和橫架上，籠子前面和頂部安裝着鐵柵欄。我們被帶進裡面的座位上，周圍站着十六個武裝警察。

除了達到震懾效果外，籠子還使我們和律師之間無法聯繫，他們不能進去。我的一個同志在一張紙上亂寫了一氣，然後貼在籠子邊上，上面寫着：「危險，不要走近餵食。」

我們的支持者和非洲民族議會組織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辯護團，其中的諾曼・羅森堡（Norman Rosenberg），伊斯雷爾・梅塞爾斯（Israell Maisels），莫里斯・佛蘭克斯（Maurice Franks）和弗農・伯蘭格（Vemon Berrange）。他們以前誰也沒在法庭上見過這種東

西。佛蘭克斯在法庭發表公開聲明，抗議政府用『異想天開』的方式侮辱他的當事人，他說，政府對待他們『像對待野獸一樣』。他聲明，如果不立即把籠子拿走，全體辯護律師將離開法庭。經過短暫的休庭，法官宣佈把籠子拉倒，同時打開前面的鐵柵欄。

這樣法庭才宣佈開庭。主要起訴人範尼柯克（Van Niekerk）先生開始宣讀長達一萬八千字的政府起訴書。在他讀起訴書時外面不斷傳來喊聲和歌聲，有一陣警察衝了出去。我們只聽到左輪手槍的槍聲，然後是叫喊聲和更多的槍聲。法官和律師商量了一下，法庭暫時休會。有二十個人受傷了。

此後兩天繼續宣讀起訴書。範尼柯克聲稱他將向法庭證明，被告在外國的幫助下，密謀用暴力推翻現政府，在南非建立共產主義政府。這是嚴重叛亂罪政府引用《自由憲章》，以此證明我們的共產主義目標，並作爲我們密謀推翻現政府的證據。到了第三天，籠子大部分被拆除了。最後在第四天，我們獲得保釋。保釋金的數額也反映了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白人二五〇英鎊，印度人一〇〇英鎊，黑人和有色人種二十五英鎊。連叛亂罪也看膚色。來自各階層的好心人爲全體被告籌集保釋金，後來由里弗茲（Reeves）主教、阿倫·佩頓（Alan Paton）和阿裡克斯·赫普爾（Alex Hepple）發起建立了『叛亂罪法庭辯護基金』。我們暫時獲釋，但需要一個星期向警察局報告一次，並禁止參加公共集會。法庭將在一月初重新開庭。

第二天，我很早就精神抖擻地到辦公室去。我和奧利佛都被捕過，因此這一段時間積壓了許多案子。這天一早我正想工作，一個老朋友扎巴佛（Jabavu）來看我，他是專業翻譯，我們有好幾個月沒見面了。被捕前我曾刻意減肥，爲入獄做準備，因爲在獄中應該而且也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在獄中，我堅持鍛鍊，而且果眞如我所願苗條了不少。但扎巴佛用疑慮的眼光看着我，『曼德拉，』他說，『你怎麼看起來這麼瘦？』在非洲人眼裡，身體肥胖經常和財富聯繫在一起。他緊跟着迸出一句：『小子，你害怕監獄，這是全部答案。你給我科薩人丟臉！』

二十四

早在開庭前，我和伊夫琳的婚姻就開始破裂。一九五三年，伊夫琳開始學習助產，希望在普通護理的四年證書基礎上進一步深造。她參加了德班愛德華六世國王醫院的助產課，這樣她就要離家幾個月。由於我母親和妹妹跟我們住在一起照顧孩子們，她有足夠的條件到德班去。她在德班期間，我至少偶而去看看她。

伊夫琳回來時，已經通過了考試。這年底，她又懷孕了，生了馬卡基韋（Makaziwe），新出世的孩子用了六年前我們去世的女兒的名字。按我們的習慣，剛出世的嬰兒用夭折的孩子的名字，一方面是爲了懷念去世的孩子，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與過早離世

的孩子保持一種心靈上的聯繫。

第二年，伊夫琳加入了『瞭望塔』組織，這是耶和華先知教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她之所以這樣做是不是因爲她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不適應。耶和華先知派把聖經作爲唯一信條，相信善與惡的最後決戰。伊夫琳全身心地投入他們的出版物《瞭望塔》的工作，還動員我參加，她希望我放棄參加政治鬥爭轉而改信上帝。雖然我覺得《瞭望塔》組織的某些方面很有趣，也值得在這上面花時間，但我不能也沒有改信她的宗教。它的信徒如痴如狂的態度使我望而卻步。我發覺這種信仰要人們面對壓迫採取消極和容忍的態度，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對非洲民族議會和政治鬥爭的熱情不減，這使伊夫琳感到困惑。她總認爲政治是年青人的玩意，我應該回到川斯凱做一名律師。當這種可能性越來越遙遠時，她仍然不能面對現實，承認約翰尼斯堡是我們的家，或者放棄回烏姆塔塔的念頭。她認爲我一旦回到川斯凱，在家人中間，做起薩巴塔的顧問，我就會不再懷念政治。她鼓勵達利旺高勸說我回到烏姆塔塔。爲此我們吵過許多次。我耐心地向她解釋告訴她對我來說政治不是一種消遣，而是我實實在在的工作，是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她不能接受這種觀點，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對他們各自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看法如此迥異時，他們不可能繼續生活在一起。

我想向她說明政治鬥爭的必要性，而她卻想向我灌輸宗教信仰的價值。我要告訴她我爲民族利益工作，而她卻回答說爲上帝工作比爲民族利益工作更重要。我們幾乎沒有共同的立

場，我越來越相信我們的婚姻不再牢固了。

關於孩子們的信仰問題，我們之間也發生了爭吵。她想讓他們信奉宗教，而我想讓他們投身政治。一有機會她就帶孩子們去教堂，給他們讀《瞭望塔》的文章。她還把《瞭望塔》小冊子交給孩子們到街上散發。我常常向孩子們談論政治。滕比是先鋒隊的成員，這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兒童組織，所以可以說他已經是個政治的信仰者了。我還要用最簡單的語言向馬克加索說明白人是怎樣壓迫黑人的。我屋子的牆上掛着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甘地，還有一九一七年聖彼得堡革命風暴的照片。我向孩子們解釋他們是誰，他們代表什麼。他們知道南非的白人統治者代表着根本不同的東西。一天，馬克加索跑進我的屋子，說：『爸爸，馬蘭在山上呢！』馬蘭是國民黨第一任總理，孩子經常把他和班圖教育部長威利·馬利（Willie Maree）搞混，馬利說他那天要在鎮上開一個公衆大會。我走出屋子，想看看馬克加索說的是誰。因爲非洲民族議會組織了一次示威，想讓會議開不成。我看見兩輛警車爲馬利開道，直奔預定的會議地點，但是從一開始就碰到了麻煩，這位教育部長還沒來得及講話就灰頭土臉地走了。我告訴馬克加索，他不是馬蘭，但跟馬蘭也差不多。

那些日子我的工作安排絲毫沒有鬆懈。我每天早起晚歸。經過一天緊張工作後通常還要開另一種會。伊夫琳不理解我晚上的會議，懷疑我晚回家是去看別的女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解釋我開的是什麼會，爲什麼我要去開會，我們討論了什麼問題，但她根本不相信。一

九五五年她給我下了最後通牒：我必須在她和非洲民族議會之間做出選擇。

沃爾特和阿爾貝蒂娜與伊夫琳關係很好，他們希望我們能繼續生活在一起。伊夫琳信任阿爾貝蒂娜。一天，沃爾特也捲進了這件事，我和他談了一小會兒，告訴他不要干涉這件事。我很後悔對他說這種話，因爲沃爾特一直待我親如兄弟，他對我的友誼和支持從沒動搖過。

沃爾特告訴我他要帶個人到辦公室來見我。他沒有說是我的妻弟，見到他，我很吃驚，但沒有感到不愉快。我對婚姻感到悲觀，我想唯一公平的是告訴他我的感覺。

我們三個人平心靜氣地討論這件事。我和沃爾特有時說『像我們這樣的男人』或諸如此類的話。伊夫琳的兄弟是一個商人，他反對政治，也反對政治家。聽到這類話，他很生氣，叫道：『如果你們這些傢伙覺得我和你們一樣，那是瞎扯。不要拿你們跟我相比。』他走後，我和沃爾特互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

在十二月我被捕和被關進監獄兩個星期以後，伊夫琳來看過我一次。但當我被保釋出來時，我發現她已經搬走了，還帶走了孩子。我非常苦惱。她連窗簾都扯下來了，因爲某種原因，我注意到這些瑣碎的細節。她搬去和她的弟弟一起住，她弟弟對我說：『也許這是最好的辦法，等事情平靜了下來，你們也許又坐在一起了。』這是一個合理建議，但我不會接受。

我和伊夫琳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分歧。我不能放棄我的鬥爭生活，她不能容忍我把某種東西看成比她和家庭更重要。她是一個好女人，健康、忠誠而富有魅力，她也是個好母親。我從來沒有放棄對她的尊重，但是最後我們不得不分道揚鑣。

任何婚姻破裂都會給人帶來痛苦，尤其是孩子們。我們的家庭也不例外，孩子們都受到了父母離異的打擊。馬克加索和我睡在一起。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的孩子，一個天生的調停人，他希望我和他母親達成某種妥協。馬克加索還很小，我記得在我離開監獄和法庭以後，有一天悄悄去幼兒園看她。她一直是一個溫柔的孩子，但那一天她看見我時呆住了。她不知道應該跑過來還是應該逃走，應該微笑還是應該皺眉。在她幼小的心靈深處充滿了矛盾，她不知如何才好。這是令人傷心的。

十歲的滕比受傷害最深。他放棄了學業，開始逃學。他曾經熱衷於英語和莎士比亞，但在父母離異後對學習不感興趣了。學校的校長把他的情況告訴了我，但我無能爲力。我盡可能地抽出時間帶他去俱樂部，他偶而露出一點笑臉。有很多次當我進行秘密工作時，我不能回家或者很晚才回去，沃爾特把他帶回家，讓他和自己的兒子在一起。一次，他和沃爾特遇到了點麻煩，後來，沃爾特對我說：『喂，小傢伙平靜下來了。』離婚後，滕比經常穿我的衣服，儘管這些衣服太大，他穿着不合適，但這能使他想起他常不在家的父親。

二十五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我們再次出庭。律師團開始反駁政府的控告。首席律師弗農·伯蘭格在簡要覆述政府的起訴書之後，闡述了我們的立場。他說：『被告方將有力地反駁關於《自由憲章》違法或煽動叛亂的指控。與原告的指控恰恰相反，被告方將說明憲章所表述的觀點雖然與現政府的政策對立，但它表達了各種族、各膚色的多數人的願望。也表達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經過和律師協商，我們決定我們不能光證明我們無罪，這是一場政治審判，政府因正義的行動指控我們。

接下來的公開辯論出現了戲劇性的場面，來自法庭外的指控證據冗長乏味。第一個月，政府出示它能找到的所有證據。報紙、小冊子、文件、書、筆記本、信件、雜誌、剪報，一件一件被拿出來，這是三年來警察搜查得來的，累計起來共有一二〇〇〇件。出示的證據從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到蘇聯的烹調手冊。連人民會議的兩塊招牌也被當作證據。這兩聲招牌是『葷湯』和『素湯』。

預審持續了幾個月，我們每天都要聽黑人和白人警察宣讀非洲民族議會會議或者某人講話的記錄。這些記錄斷章取義，常常是要麼極其荒謬，要麼根本就是胡編亂造。最後，伯蘭格在熟練地對證人進行盤問之後聲明，演講都是用英文作的，而黑人警察不懂也不會寫英

文。

開普敦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安德魯·默瑞 Andrew Murry 作爲政府的證人出庭作證，指控我們企圖以蘇聯式的政府取代南非現政府。默瑞聲稱許多從我們那裡搜出的文件，包括《自由憲章》在內，都是共產主義性質的。

一開始，默瑞教授看起來比其他證人要學識淵博一些，但當伯蘭格開始盤問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伯蘭格說他要給默瑞讀幾段來自不同地方的話，請默瑞鑒別一下這些話是不是含有共產主義思想。第一段話大意是普通工人需要聯合起來，不要互相利用。默瑞說，是共產主義式的。伯蘭格隨即指出上述講話是南非前總理馬蘭博士說的。接下來伯蘭格又讀了兩段話，默瑞都斷言是共產主義式的語言。事實上這兩段話分別出自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羅·威爾遜口中。下面出現了高潮，伯蘭格讀了一段話，默瑞毫不猶豫地把它歸爲『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伯蘭格宣布，這段話是默瑞教授本人在三十年代的傑作。

在第七個審判月裡，政府聲稱它將出示蔑視運動期間被告密謀使用暴力的證據。政府的第一個主要證人是所羅門·姆古巴斯（Solomon Mgubase）。他提供了似乎對非洲民族議會不利的聳人聽聞的證據。姆古巴斯是一個慢聲細語的傢伙，將近四十歲，說一口顫顫巍巍的英語，他剛剛以詐騙罪被起訴。姆古巴塞告訴法庭他在黑爾堡大學獲得過藝術碩士學位，現爲開業律師。他說他是非洲民族議會伊麗莎白港支部的書記，也是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委會

成員。他聲稱他主持過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委會的一次會議，會議決定派沃爾特·西蘇魯和戴維·博帕皮David Bopape去蘇聯尋求武器援助，以便在南非發動暴力革命。他說會議計劃於一九五二年在伊麗莎白港舉行暴動，他親眼見到非洲民族議會的一項決定，該決定提出要像肯亞的毛毛（Mau Mau）那樣消滅川斯凱的所有白人。姆古巴斯駭人聽聞的證詞在法庭內外引起一陣騷動。這些最終作爲謀反的證據。

但是當伯蘭格開始盤問的時候，人們發現這個姆古巴斯是個瘋子，也是個騙子。伯蘭格也因其出色的辯護技巧獲得了『驅病法師』的稱號。伯蘭格很快證明姆古巴斯既不是什麼大學畢業生，也不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談不上是全國執委會成員了。伯蘭格出示了姆古巴斯僞造大學學歷證明的證據，還出示了他非法從事多年法律工作和涉嫌行騙的證據。在他所謂的參加非洲民族議會策劃伊麗莎白港暴動的會議期間，他正因涉嫌行騙被關在德班監獄裡。姆古巴斯所有證詞都離事實甚遠。在盤問結束時，伯蘭格問證人：『你知道什麼是無賴嗎？』姆古巴斯回答不知道。『先生，你就是個無賴！』伯蘭格說。

被告之一、優秀律師喬·斯洛沃開始自我辯護。他的辯護使政府感到惱怒，因爲他提出許多尖銳的問題，並試圖證明是政府在踐踏法律，而不是人民大會。斯洛沃的盤問常常和伯蘭格一樣有力。特務機關爲數不多的黑人警察之一傑瑞米亞·莫爾森（Jeremiah Mollson）聲稱他要一句不漏地覆述他聽過的非洲民族議會講話的內容。但他所謂的覆述經常讓人莫名

其妙或者乾脆是胡說八道。

斯洛沃：『你懂英語嗎？』

莫爾森：『懂得不多。』

斯洛沃：『你說過這些講話用的是英語，而你不懂英語，是嗎？』

莫爾森：『是的，先生。』

斯洛沃：『你承認你的話是一堆垃圾嗎？』

莫爾森：『我不知道。』

最後的一問一答引起了被告和律師的哄堂大笑。記得法官出面制止，說：『這沒有什麼好笑的。』

有一段時間，斯洛沃對法官和起訴人態度生硬，威賽爾斯告訴他，他在指責法庭的公正，因爲藐視法庭將被處以罰款。這引起了大多數被告的憤怒，只是因爲盧圖利酋長加以制止，許多被告才沒有同樣因藐視法庭而被傳訊。

辯論繼續進行，許多法律程序枯燥無味，我們開始做別的事。我經常拿本書看或寫訴狀。別的人看報紙，做縱橫填字游戲、玩象棋或亂寫亂畫。有時候法庭提醒我們集中精力，書和填字板之類就收起來了。但是，過了一陣子，冗長的取證又開始了，我們又開始各做各的。

隨着預審的進行，政府仍在收集證據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而政府越是處心積慮，出示的證據越不準確。政府開始挖空心思，常常在對自己不利的情況下編造證據。

最後，在開庭十個月後的九月十一日，政府宣布預審階段的舉證告一段落。法官給辯護律師四個月的時間，在八〇〇〇份書面證據和一〇〇〇〇份文件中進行篩選，準備辯護程序。

預審經歷了一九五七年全年。九月法庭休庭，辯護律師開始審查證據。三個月後，未經事先聲明和解釋，政府突然宣布取消對六十一名被告的起訴。其中絕大多數人在非洲民族議會中的地位較低，但其中有盧圖利酋長和奧利佛·坦博。政府這一舉措使我們高興之餘感到迷惑。

一月份，輪到政府作總結發言了，一個新的起訴人出現在法庭上，他是奧斯瓦德·皮羅（Oswald Pirow），他是南非前司法部長和國防部長，國民黨的臺柱子。多年來，他奉行白人民族主義，公開支持納粹；有一次，他稱希特勒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他對共產主義極端仇視。皮羅的出現表明政府擔心審理結果對自己不利，投入了更大的代價以爭取贏得此案的勝利。

在皮羅作總結發言之前，伯蘭格（berrange）聲明法庭宣布我們無罪，因此政府證據不足。皮羅反對，並列舉被告幾份措辭激烈的講話，他通知法庭，警察發現了更多的極其危險

的陰謀叛國罪的證據。他危言聳聽地說，國家正處在火山口上。皮羅改變了法庭的氣氛。我們曾經過於自信，如今大夢初醒，發現我們正面對着嚴峻的形勢。律師告訴我們，別愚弄自己，你們可能要坐牢。他們的警告給了我們一付清醒劑。

歷時十三個月的預審結束後，法官宣布他有『足夠的證據』以嚴重叛亂罪把我們送交川斯瓦最高法院。一月，法庭休庭，九十五人被收審。真正的審判何時開始，我們不知道。

二十六

在預審期間，一天下午，我開車拉我的一位朋友從奧蘭多到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醫學院，途經巴拉瓜尼（Bragwanath）醫院，這是約翰尼斯堡最早的一所黑人醫院。當我路過附近的一個公共汽車站時，我從眼角裡看到一個可愛的姑娘正在等公共汽車。我被她的美麗所吸引，轉過頭來想看個究竟，但我的車飛速駛過，姑娘的容顏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我甚至想把車開回去帶上她，但我沒有這樣做。

第二天，我在辦公室裡，偶然去找奧利佛，發現那位姑娘和她兄弟正坐在奧利佛桌前。我吃了一驚，盡量掩蓋住我的驚訝。或意外相遇的興奮。奧利佛把我介紹給他們，解釋說他們爲些法律事務來拜訪他。

她的名字叫諾姆扎莫·溫妮弗雷德·馬迪基澤拉（Nomzamo Winnifred Madikizela），但

人們都叫她溫妮。她最近剛剛在約翰尼斯堡的簡·霍夫梅爾（Jan Hofmeyr）福利救濟工作學院完成學業，成爲巴拉瓜尼醫院的第一位黑人婦女福利救濟工作者。此時此地，我對她的身世和法律問題不感興趣，因爲她的出現弄得我心神不定。我在想怎麼同她約會，而不是我們事務所怎麼處理她的法律事務。我不敢說有沒有一見鐘情的愛情，但我知道我第一眼看見她時就已認定，我要她作我的妻子。

溫妮是C·K·馬迪基澤拉（C·K·Madikizela）十一個孩子中的第六個，馬迪基澤拉當過學校校長，後來從事商業。她的名字諾姆扎莫和我的名字一樣，預示着這個人註定要努力鬥爭，或者身陷囹圄。她來自蓬多蘭的比扎那，這個地區從屬於我生長的川斯凱。她的家庭屬於恩古太阿納（Ngutyana）的科薩部落，她的曾祖父是十九世紀姆菲卡米（Mfecame）時代川斯凱土著居民的首領。

次日，我打電話給在醫院的溫妮，請她幫助到簡·霍夫梅爾學院爲『叛亂罪法庭辯護基金會』籌集資金。這只是我約她吃午飯的藉口。我到她奧蘭多的住處接她，帶她到我辦公室附近的印度餐館，這是有限的幾家爲黑人服務的餐館之一，我經常來這裡。溫妮有些緊張，在品嚐咖喱食品前，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以穩定情緒，這使她更加迷人。

午飯後我帶她到約翰尼斯堡和伊瓦頓（Evaton）之間的一片開闊的草原上，這個地方叫多拉多（Dorado）公園。我們漫步地在綿長的草地上，我給她講我的夢想，法庭上我的遭

遇。這時我內心深處的願望是：我要娶她，我如實地告訴了她。她的氣質、熱情、年輕、勇氣、任性，所有這些在我第一次看見她時就感覺到了。

以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我們經常見面。她到法庭和辦公室來看我，跟我在俱樂部訓練，看望滕比、馬克加索、馬克茲韋，參加會議和政治討論。我迷戀她，也給她政治熱情。還是一個學生時，溫妮就積極投身於非歐洲聯合運動，因爲她的一個同父異母兄弟參加了這個運動的黨派。後來，我拿這段過去的經歷開玩笑，說如果她不是遇見我，也許早就嫁給非歐洲聯合運動的某個領導人了。

在我和伊夫琳正式離婚後不久，我告訴溫妮，她應該去拜訪一個邁克爾·阿梅爾的妻子蕾·阿梅爾，準備一套合適的婚禮服。蕾不僅是一個政治活躍分子，還是一個出色的裁縫。我問溫妮她打算找幾個女儐相，建議她回一趟比扎那，把我們要結婚的事告訴她父母。溫妮大笑着告訴人們，我從來未向她說起結婚的事，但是我常對她說從認識她的第一天起我就需要她，從那以後我一直認爲這是情理中的事。

審判進入了第二年，我的法律業務面臨十分困難的處境。因爲我和奧利佛都無法工作，曼德拉和坦博事務所被迫停業，我和奧利佛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在奧利佛的起訴被撤銷以後，他做了一些補救工作，但是災難已經來臨了。我們曾經一度輝煌，業務繁忙，不得不讓人們到急需業務的地方。而今，我連支付烏姆塔塔那塊地的五十英鎊欠款的錢都沒有，最

後不得不忍痛割愛。

我把這一切都告訴溫妮。我告訴她我們很可能不得不靠她工作所得的一點薪水生活。溫妮理解這一切，她說她準備承受風險，和我同甘共苦。我從來沒有許諾給她買金銀首飾，我也不能給她這些。

婚禮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舉行。我申請暫時取消對我的禁令，獲得離開約翰尼斯堡六天的自由。我也根據婚嫁的傳統，準備一點聘金給溫妮的父親。

六月十二日一大早，婚禮隊伍離開約翰尼斯堡前往比扎那，接近傍晚我們到達了目的地。按慣例，我的第一站是到當地警察局報到。黃昏時，根據傳統，我們去新娘居住的地方姆邦維尼（Mbongweni）。在那兒，一群婦女邊笑邊哭，我和溫妮分手了，她住進了專爲新娘準備的房子，而我和迎親的隊伍住到溫妮的一個親戚的家裡。

婚禮在當地的一個教堂舉行，然後我們在溫妮大哥家裡聚會，這是馬迪基澤拉部落祖傳的房子。迎新車塗上了非洲民族議會傳統的顏色。人們載歌載舞，溫妮精力充沛的奶奶爲我們表演了一種特殊的舞蹈。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全體成員都受到邀請，但禁令不允許他們參加。來的人有杜馬·諾克威、麗蓮·恩戈依（Lilian Ngoyi）、詹姆斯·恩瓊威（James Njongwe）博士、康科（Conco）博士和維克多·泰阿姆扎謝（Victor Tyamzashe）。

最後的儀式在比扎那城大廳舉行。記得最精彩的發言是溫妮的父親說的。他和所有人一

樣注意到許多保安警察成了婚禮的不速之客。他表達了對女兒的愛，說到我對國家的忠誠，談到我作爲政治家從事的危險事業。當溫妮第一次告訴他我們要結婚時，他曾驚訝地說：『你可要嫁給一個囚徒啊！』在婚禮上，他說他對未來並不樂觀，他說在此時此地舉行這樣的婚禮，無疑要經受考驗。他告訴溫妮她嫁給了一個把自己奉獻給鬥爭的人。他祝女兒好運，最後說：『你只能嫁鷄隨鷄，嫁狗隨狗。』

儀式後，有人包起一大塊蛋糕，留給新娘帶到新郎祖傳的房子裡，然後舉行第二段儀式。但情況不允許了，因爲我獲准離開約翰尼斯堡的期限到了。在我奧蘭多西八一一五號的家裡，一群朋友和家人歡迎我歸來。殺了一隻羊，舉行了慶祝宴會。

沒有錢也沒時間渡蜜月，生活很快轉入正軌。我們不得不面對對我的審判。早晨我們醒得很早，常四點左右。溫妮在我走之前準備早餐。我開車去新法庭所在地普利托利亞，或者起早去辦公室。下午和晚上我盡可能留在辦公室裡，努力維持我們的正常業務，也爲了賺些錢。晚上經常參加政治活動和會議。自由戰士的妻子常常像寡婦一樣，既便她丈夫不在監獄的時候也是如此。儘管我身陷法庭，但溫妮給我希望。我覺得生活給了我新的、第二次的機會。我對她的愛增添了我參加未來鬥爭的力量。

二十七

一九五八年，南非面臨的一件大事就是全民選舉。所謂『全民』選舉其實是一個漂亮的幌子，三百萬白人可以參加投票，而一千三百萬黑人卻無一人能參加。我們就是否舉行一次抗議活動展開了爭論。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一次只有白人參加的選舉與黑人有關係嗎？非洲民族議會的答案是，當我們被排斥在自己國家的事務之外時，我們不能再繼續無動於衷了。我們被排斥了，我們並不是未受影響：國民黨的失敗於我們、對全部非洲人都有益。

非洲民族議會和南非工會聯盟及其它組織一起，號召在四月的選舉期間舉行一次爲期三天的總罷工。到處都在發送傳單，從工廠到商店，從火車站到汽車站，從小酒館到商店，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國民黨滾蛋！』是其中的主要口號。我們的準備活動使政府驚慌了；選舉前四天，政府頒佈了一道法令，規定超過十人以上的黑人在城區聚會即爲非法。

預定進行罷工的前夜，抗議活動的領導人即轉入了地下，以防警察隨時會來的搜捕。警察沒有整天監視我們，我們躲上一兩天還是容易的。罷工的前夜，沃爾特、奧利佛、摩西·科坦尼、J·B·馬克斯、丹·特魯米、杜馬·諾克威和我待在奧蘭多一位非洲民族議會同情者的房子裡，通過電話，與城裡其他領導人保持聯繫。那時候，通訊還不是很發達，特別是在電話仍還不多的城鎮裡。這樣，掌握整個罷工情況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第二天一大早，我

們就派人到城鎮的各個重要地點，看火車、汽車和出租車上乘客的情況，以決定人們要否上工。回來的消息很糟糕：汽車和火車上的乘客滿當當的；人們沒有響應罷工的號召。那時我們才注意到，我們所待房子的男主人已不在房裡，他不知何時已溜出去上班了。看來，罷工失敗了。

我們決定取消罷工。未成功的三天的罷工在第一天就取消還只是一天的失敗；如果三天一直錯下去則就是一次慘敗了。退卻是羞辱的，但我們感到，如果不退卻，我們會受到更大的羞辱。不到一小時，我們就發出了一個取消罷工的聲明，政府辦的南非廣播公司全文播送了我們的聲明。平時，南非廣播公司對非洲民族議會從來不屑一顧，它只廣播我們的失敗。這次，它居然來幫我們。這大大地激怒了摩西·科坦尼。『竟然讓南非廣播公司來稱讚我們，這太過分了。』他邊說，邊搖頭。科坦尼懷疑，我們的行動是否太倉促了，以致落入了政府的圈套。懷疑是有道理的，但決定並不可因自傲或疑惑而作出，作出的決定應完全基於戰略的考慮，這次我們取消罷工的決定就是完全從戰略角度出發的。敵人利用了我們的退卻並不意味着我們的退卻就是錯誤的。

然而，一些地區並沒有聽到我們取消罷工的聲明，另一些人則對我們的聲明置之不理。在非洲民族議會發展較強的伊麗莎白港和開普省的其它地區，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反應比第一天的要好些。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們無法掩蓋這一事實；罷工是一次失敗。這還不夠，國

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增加了百分之十以上的選票。

我們曾非常激烈地爭論過，是否採取強制措施。我們應該派糾察隊員，阻止人們去上班嗎？強硬派認爲，如果我們佈置了糾察隊員，罷工就會成功。但我一直反對採取這些措施。我認爲最好依靠人們發自內心的支持，否則，這種支持便是虛弱和不穩定的。一個組織應是一座天堂，而不是一座地獄。然而，如果大部分組織或成員支持一個決定，在某些情況下就可以對少數持不同意見的人採取強制措施，以保持大多數人的意見。少數人，無論他們怎樣叫嚷，都不能妨礙大多數人的意願。

在家裡，我試圖使用另一種強制措施，但失敗了。那時，我們家的幫工叫伊達·姆茜姆庫奴（IdaMthimkhulu），是一位講蘇托語的婦女，年齡與我相仿。伊達不僅僅是一名雇員，她幾乎成了我們家的一員，我叫她『克蓋車迪』（Kgaitsedi），意思是大姐，是一種尊稱。伊達辦事利索，理家有方，溫妮和我都很樂意聽從她的指派；我常常在她的命令下，東跑西顛地幹家務事。

罷工的前一天，我開車送伊達和她十二歲的兒子回家，車上，我讓她第二天給我燙洗幾件襯衫。伊達很反常地沉默了一會。然後轉過來，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告訴我：『您很清楚，我不能這麼做。』

『爲什麼？』我問道。她反應的激烈程度使我感到很吃驚。

『難道您忘了，我也是一名工人！』她頗爲得意地回答：『明天，我將同我的工人同事們一起罷工！』

她的兒子看出了我的窘態，他想緩和一下緊張氣氛，便說了些如『納爾遜叔叔』總是待她如姐妹而不是雇工。她惱怒地轉向她的兒子，說道：『小子，我在他家裡爲自己的權利鬥爭時，你在哪兒？如果我當初不向你的「納爾遜叔叔」鬥爭，今天我怎麼會被當作姐妹看待呢？』伊達第二天沒來工作，我的襯衫也沒人燙洗。

二十八

婦女通行證的問題激起了巨大的反抗。政府一意孤行，堅持婦女一定要持通行證，婦女則對此持堅定不移的反對態度。雖然政府現在把通行證改稱爲『個人參考手冊』了，婦女們並沒有受這種權宜之計的欺騙；她們仍然會因不能出示『個人參考手冊』而受罰款十鎊或被監禁一個月。

一九五七年，在非洲民族議會婦女聯盟的推動下，全國城鄉各地婦女開始對政府一意要婦女持通行證的決定進行憤怒的反抗。婦女們目標堅定、勇敢頑強，鬥爭中熱情高昂、不屈不撓，她們反對通行證的鬥爭爲我們以後的反政府活動樹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榜樣。正像盧圖利酋長所說的：『當婦女們開始積極加入我們的戰鬥後，世界上就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我

們在今生實現自由了。』

在整個川斯瓦地區，在斯坦德頓（Standerton）、海德堡（Heidelberg）、巴爾弗（Balfour）和其它一些地區，成千上萬的婦女都參加了抗議活動。在叛國案審判休庭期間，法蘭西絲·巴爾德（FrancesBaurd）和弗洛倫斯·馬托梅拉（FlorenceMatomela）在她們的家鄉伊麗莎白港組織了抗議通行證的活動。十月份，在約翰尼斯堡，一大群婦女聚集到中央通行證辦公室，趕走了在那兒辦公的工作人員及去那兒辦通行證的婦女，使這個辦公室一時陷入了癱瘓，警察逮捕了幾百名婦女。

逮捕活動後不久，一天晚飯後，溫妮和我正在休息，她突然平靜地告訴我，第二天她要與別的奧蘭多婦女一起，到通行證辦公室去參加抗議活動。我略略感到有點吃驚。對於她的獻身精神和勇氣，我甚感欽佩，但同時我也有點爲她擔心。溫妮與我結婚後，變得越來越關心政治問題了，她加入了非洲民族議會婦女聯盟的奧蘭多西支部，這些都得到了我的鼓勵。

我告訴她我支持她的決定，但我必須向她指出這一行動的嚴肅性。也許僅僅因爲這一行動，她的一生將會因此而改變。從非洲人的觀點看，溫妮來自富有的家庭，南非一些不合理的現實離她的距離較遠。至少她可以不用爲溫飽問題擔憂。我們結婚前，她生活在富有舒適的環境中，這與自由戰士們朝不保夕的生存條件截然不同。

我告訴她，如果她被捕了，她的雇主——省行政院——就會解雇她。我們兩人都明白，

就是她的微薄收入支撐了我們這個家，一旦她被捕，也許她將永遠失去行政部門的工作，因爲公衆部門不會願意雇傭一名有入獄記錄的人。還有，她已有身孕，我向她講述了獄中所受的體膚之苦和凌辱。也許，我的言詞聽起來有些刺耳，但作爲丈夫及作爲整個抗議活動的領導人，我都負有責任，向她仔細分析參加抗議活動會帶來的各種後果。作爲我本人，內心的感情也是很複雜的，丈夫及領導人所關心的重點常常不會一致。

但是溫妮是一位堅定的人，而且我懷疑，我比較悲觀的態度也許反而增強了她的決心。她聽完了我的話之後告訴我，她已下定了決心。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來爲她做了早飯，然後我們駕車到西蘇魯家裡，與沃爾特的妻子阿爾貝蒂娜會面，她是這次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然後，我們又駕車去奧蘭多的菲飛尼（Phefeni）火車站，婦女們將在那兒乘火車進城。溫妮上車前，我擁抱了她。在火車上，溫妮向我揮手，她堅毅的神情後面，略略透出了些許緊張，我覺得，她好像邁入了一條艱難而漫長的征途，誰也不知道等在終點的是什麼。

在約翰尼斯堡市中心，成百名婦女聚集在土著人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裡。這些婦女中，有年老的、也有年少的，有些人背上背着孩子，有些人身着部落服裝，其它人也身着鮮艷的服裝。她們又唱又跳又呼口號。不到幾分鐘，數十名武裝警察便包圍了她們，並把她們全部逮捕，裝進囚車，運往馬歇爾廣場監獄。婦女們群情激昂，當她們被推上車離開時，一些人

對記者高喊：『告訴我們的女主人，明天我們不去工作了！』整個抗議活動中，總共有上千名婦女被捕。

我知曉這些情況，並不是因爲我是被捕者之一的丈夫，而是因爲曼德拉和坦博被要求去作大部分被捕婦女的代表。我很快去了馬歇爾廣場，會見被捕者，並開始安排保釋事宜。我見到了溫妮，見到我時，她向我露出了笑容，待在四壁空空的監獄牢房裡，她感到很幸福。她的表情像是告訴我，她已給了我一份我一定會感到滿意的禮物。我告訴她，我爲她感到驕傲，但我不能繼續留下來跟她多談了，因爲我有許多法律上的事要做。

第二天傍晚時，被捕人數繼續增加，在押婦女已增至約二〇〇〇名，其中許多被押往堡壘監獄，等待開庭審判。這就不僅使奧利佛和我，而且也使警察和監獄當局產生了難以克服的問題。監獄中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地方來關押她們。被褥、食物都太少，廁所也不夠使用。堡壘監獄擁擠骯髒不堪。非洲民族議會中的許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都希望保釋出這些婦女。但是，全國婦女聯盟主席麗蓮·恩戈依和南非婦女同盟書記海倫·約瑟夫（HelenJoseph）都認爲，爲了使這次抗議活動眞實和有效，婦女們應隨時聽從行政長官的命令。我向她們提出了我的意見，但她們明確地告訴我，這是婦女們自己的事，非洲民族議會及焦心的丈夫都不要攪亂。我向麗蓮強調，在作出決定前，應與婦女們本人進行討論，並護送她去監獄，在那裡，她可以與被捕者進行討論表決。許多被捕者都非常希望被保釋出

來，她們對獄中的一切還沒有做好適當的準備。作爲一種妥協結果，我向麗蓮建議，被捕婦女在獄中待兩個星期，然後我們再保釋她們出來，她同意了。

之後的兩個星期，我在法庭上花費了大量時間，安排保釋被捕婦女。一些婦女感到不耐煩了，她們把怒氣發洩到了我的身上。『曼德拉，你怎麼有那麼多困難哪！』一位婦女對我說：『如果這一切不在今天結束，我就再也不去法庭了。』在親屬和籌資機構的幫助下，我們設法在兩周內把她們保釋了出來。

溫妮看來並沒有被監獄生活搞得疲憊不堪。既使她受了什麼苦，她也不會告訴我的。在獄中時，溫妮結識了兩名白人女獄吏，年齡也就十幾歲。她們對被捕婦女充滿同情，又心懷好奇。溫妮保釋出來後，我們邀請她們來我們家作客。她們接受了邀請，並乘火車來奧蘭多。我們在家裡同她們共進了午餐，然後溫妮帶她們去城裡玩。溫妮與這兩名獄吏年齡相仿，她們相處得很好。她們像姐妹一樣一起歡笑。兩位女孩高高興興地玩了一天，她們謝了溫妮，說以後還要來。但事實上，她們沒能再來，因爲要來奧蘭多，她們必須坐在非白人車廂裡。（開往奧蘭多的火車沒有供白人專用的車廂，因爲沒有白人來奧蘭多。）因而她們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不久就有傳言傳開了，說有兩名白人獄吏來看了溫妮和我。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什麼問題，但對她們確實是一個問題：監獄當局解雇了她們。我們再也沒有見過她們，也沒聽到過有關她們的消息。

二十九

一月份的預備聽證會結束已六個月了，我們一直在等待一九五八年八月即將開始的正式審判。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高等法庭，法庭由F·L·倫普夫法官先生、肯尼迪法官先生和魯道夫法官先生三人組成，倫普夫法官先生任主審判官。陪審團的成員情況對我們很不利；它由三名白人男子組成，三人都與執政黨有關係。倫普夫法官是一位能人，名氣比一般的白種南非人大，人們在傳說他是布雷德邦（Broederbond），這是一個由南非白人組成的秘密組織，目標是加強南非白人的權力。魯道夫法官是國民黨中頗為出名的成員，肯尼迪法官也是。肯尼迪法官還有一個絞刑法官的惡名，他曾判決二十三名非洲黑人絞刑，原因是他們謀殺了兩名白人警察。

案子重新開庭前不久，政府向我們玩了另一個令人不愉快的花招。他們宣佈，審判地點從約翰尼斯堡移到三十六英里以外的普利托利亞。案子將在一個裝飾華麗、由猶太教堂改裝而成的法庭裡進行。所有被告和辯護團的律師都住在約翰尼斯堡，因此，我們被迫每天往返於普利托利亞和約翰尼斯堡。這樣一來，案子將花去我們更多的寶貴時間和金錢。那些想保住工作的人就無法出庭了，因為審判地點和工作地點距離太遠了。改變審判地點後，我們與支持者的距離也加大了，這是企圖從精神上壓垮我們。普利托利亞是國民黨的老巢，非洲民

族議會在那兒幾乎還沒有發展。

九十二名被告每天都乘坐破舊、笨重的公共汽車去普利托利亞，早上六點便要出發，在硬木板凳上，要坐兩個小時才能到達舊猶太教堂。每天來回，我們在路上要花將近五個小時，這些時間，我們本來是可以用來爲孩子們掙吃、穿、住的費用的。

這一次，我們又非常幸運地擁有了一個優秀而積極的辯護團，他們由精明強幹的伊斯雷爾·梅塞爾斯律師領導，成員還有布拉姆·菲希爾、雷克斯·韋爾什（RexWelsh）、弗農·伯蘭格、悉尼·肯特裡奇（SydneyKentridge）、托尼·奧多德和G·尼古拉斯。審判開審之日，他們即展示了自己的戰鬥才能，他們走了一步法律上冒險的棋，這個問題是經我們許多人事先向有關律師諮詢後決定的。伊西·梅塞爾斯站了起來，強烈要求對魯道夫法官和倫普夫法官進行質詢，理由是他們在立場上與被告存在對立，因而妨礙了他們在本案中作爲仲裁人的公正性。法庭頓時響起了一陣嗡嗡聲。辯護團提出，倫普夫作爲一名法官，早已在一九五二年的有關案件中對目前起訴案中的某些方面作出判決，因此，由他來擔任本案的主審法官，於法律無益。我們還認爲，魯道夫的立場有偏見，因爲他在一九五四年的一案中代表政府爲警察作過辯護律師，這個案件是有關哈羅德·沃爾普請求法院頒佈禁令，以從人民大會的一次會議中把警察清除出去。

這是一種危險的策略，因爲我們很容易會在這個小問題上獲勝，而在全盤上失敗。儘管

我們認為魯道夫和倫普夫都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但在國內還有更壞的法官可能來替代他們。實際上，我們一方面堅定地要求撤換魯道夫，另一方面內心也希望倫普夫留下來，我們還是尊他為一位誠實的執法者的。倫普夫總是站在法律的一方，無論自己的政治立場如何，我們相信，以法律尺度衡量，我們肯定是無辜的。

那個星期一，當三名身穿紅袍的法官走進法庭時，人們的心頭充滿了渴望。魯道夫法官宣布，他將退出審判團，並說，他已完全忘記了以前的案件。但是，倫普夫法官拒絕退出，並保證，他一九五二年案件中的判決對本案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政府安排貝克爾法官來替代魯道夫，我們一開始就喜歡貝克爾來參加本案，他與國民黨無任何瓜葛。

第一步行動取得成功後，我們即着手第二步行動，這與第一步行動也同樣冒險。我們開始對案件本身作漫長而詳盡的辯護。我們認為，拋開其它不論，指控本身是模糊不清、缺乏具體性的。我們還認為，要證明我們犯了嚴重叛國罪，必須要拿出有計劃暴力行動的證據，因此，檢察官需要找出我們企圖使用暴力的事例。越辯論到後來越明顯，三名法官顯然也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八月份，法院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取消了兩項指控。十月十三日，經過兩個多月的法律大戰，高等法院突然宣布，撤回所有的指控。這太出人意料了，好在我們對政府的各種出爾反爾的行徑太習以為常了，因此，我們也並沒有多少歡欣鼓舞。果不其然，一個月後，檢察部門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措詞更仔細的指控，宣布目前只對其中三十名

被告提出指控，其他人將在以後進行指控。我在前三十人之列，這三十人全部都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

按照新的指控，檢察官就應拿出被告想進行暴力活動的證據。正如皮羅（Pirow）所指出的，被告知道，要實現《自由憲章》中的自由，『必須以武力推翻國家』。但在一九五九年年中，有關法律問題一直爭論不止，此時，法庭撤消了對其餘六十一名被告的指控。一連幾個月，法庭中的所有活動都只是難以想像的枯躁的法律爭論。儘管辯護人已成功地揭露了政府在這個案件中的虛僞，但政府還是頑固不化、毫不後退，正如司法部長所說的：『案件將不惜一切代價地進行下去，不管它花了多少錢，也不管它要延續多長時間。這些都沒有關係！』

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午夜剛過，我參加完一次會議後回家，發現溫妮一個人在家，正處於在產前的陣痛中：她快要分娩了。我連忙驅車送她去巴拉瓦那斯（Baragwanath）醫院，但醫生告訴我，她分娩還要些時候。我一直待在溫妮的身邊，直到不得不乘車去普利托利亞參加法庭的審判。法庭休庭後，我馬上同杜馬·諾克威一起往回趕，到醫院時，我看到溫妮安然地躺在產床上，小女兒已經生出來了。我把新生的女兒抱在手上，宣布她爲曼德拉家庭的正式一員。我的親戚姆定基曾長給她起名叫『澤娜妮』（Zenani），意思是『你給世間帶

來什麼？』，這是一個詩意的名字，含有挑戰的意味，告訴人要對社會作出貢獻。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名字，有這個名字還不夠，還要做到名符其實。

我母親從川斯凱趕來幫溫妮的忙，她請來了一位部落醫士——我們叫『伊尼安加』（Inyanga），準備給澤娜妮作一次科薩洗禮，即用草藥給她進行傳統的藥浴。但溫妮對此堅決反對，認爲這種做法落後迷信，而且對健康無益，相反，她給澤娜妮塗橄欖油，用強生的嬰兒粉敷她的小身體，並給她餵鯊魚油吃。

溫妮的身體剛恢復過來，我就擔負起給這位新母親教開車的任務。那時候，開車還是男人的事，婦女，特別是非洲婦女很少有人開車。但溫妮是一位獨立性很強的人，她很想學，而且這也確實很有好處，我太忙了，經常沒有時間開車送他。也許是我太沒有耐心，或者也許我的學生的腦袋太僵化了，當我在奧蘭多一條比較平坦和幽靜的路上教溫妮開車時，我們幾乎每做一個動作都要爭論一番。最後，因爲她一再不聽我的建議，我一怒之下走下車回家去了。沒有了我的指導，溫妮好像反而做得好些了，因爲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她一個人開着車，在鎮上兜了一圈。她回來後，我們就慢慢和解了。以後想起此事，我們都覺得好笑。

爲人妻和爲人母對溫妮都是一件新事。她那時才二十五歲，個性還沒有完全形成。我的性格則早已形成，而且還相當固執。我知道別人經常把她看作『曼德拉的妻子』。在我的陰

影之下，她無疑很難確立自己的身份。我盡力幫她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久，沒用我的幫助，她很快就做到了。

三十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在簡·範·里貝克登陸開普敦紀念日這一天，誕生了一個新的組織。它意在向南非首要的非洲人政治組織——非洲民族議會提出挑戰，並拒絕接受三個世紀前就已形成的白人統治。這便是匯集全國各地幾百名代表，在奧蘭多公共會議廳成立的泛非主義者大會。它以非洲主義者組織的名義發起運動，公開拒絕非洲民族議會的多種族主義的主張。這個新組織的建立者們像十五年前我們中間一些組建青年聯盟的人們一樣，他們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攻擊性不足，與民衆脫離，而且被非洲人之外的人物控制。

羅伯特·索布克威當選爲主席，波特拉科·勒巴洛（Potlako Leballo）爲全國書記，他們先前都是非洲民族議會青年聯盟成員。泛非大會發佈了宣言和章程。索布克威也做了開幕式講話，在講話中他呼籲成立『非洲人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泛非大會宣佈要推翻白人專制，並成立具有非洲主義根源、社會主義內容和民主形式的政府。他們排斥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把白人和印度人一律看作是在南非沒有當然位置的『外國少數民族』和『外來者』。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其餘人一概無份。

泛非大會的誕生對於我們而言並不出乎意外。三年多來，非洲民族議會內部的非洲主義者就從未停止過不平的怨訴。一九五七年，非洲主義者們在全國會議上就曾要求通過對川斯瓦執行委員會的不信任案，不過以失敗而告終。一九五八年，這些人還反對在選舉日罷工。他們的領袖勒巴洛也從此被逐出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非洲民族議會會議上，一伙非洲主義者也宣布反對《自由憲章》，揚言憲章違反了非洲民族主義的原則。泛非大會聲稱是從一九一二年非洲民族議會初建時期的原則中汲取了精神。但一九四四年青年聯盟建立時安東·倫貝德和A·P·姆達所推崇的情緒化的非洲民族主義才是其根源所在。泛非大會與當時盛行的格言口號一唱一和：『非洲人的非洲』以及『阿非利加合衆國』的主張。而造成他們決裂的直接原因，卻是由於他們反對《自由憲章》，並反對在非洲民族議會聯盟領導中白人和印度人的存在。他們反對種族間合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確信白人共產主義者和印度人一心想要統治非洲民族議會。

我熟知泛非大會的所有組建者。羅伯特·索布克威是我的老朋友，是位衆所周知的紳士和學者（他被同事們稱爲『教授』）。他那種爲了原則不屈不撓、無所畏懼的精神贏得了我對他持久的尊敬。波特拉科·勒巴洛、彼得·拉博羅科、澤法尼亞·莫索彭（Zephania Mothopeng）也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當得知我政治上的導師高爾·拉德貝已經加入泛非大會時，我着實感到驚詫和沮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位前任成員也做出決定，要與在當時明

確拒絕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聯合，這同樣使我大惑不解。

許多人用泛非大會來下賭注是出於個人的恩怨或失落。他們並未考慮到推進鬥爭，而是爲了自已嫉妒心和報復心的滿足。我一向確信，作爲一名自由鬥士，必須要抑制許多的個人情感，因爲它們會使人寧願做個獨立的個人，也不願成爲群衆運動的一份子。一個人是爲千百萬人的解放而戰鬥，而不是個人的榮耀。我無意提倡把人變成機器人，並剔除所有的個人情感和動機。自由鬥士往往要使自已的家庭利益從屬於民衆大家庭的利益，同樣的道理，他也必須使自已的個人情感從屬於他的運動事業。

我看得出來，泛非大會的主張和行爲都還不成熟。一位哲人曾指出，如果一個人在年青時不是個自由主義者，到老年又不是個保守主義者，其中定有蹊蹺。我並不是個保守者，但是一個人會隨着自已的成熟而認爲年輕時的一些主張不盡完善和稚氣十足。在我同情並且一度贊同非洲主義者的某些主張的同時，我也相信爭取自由的鬥爭需要人做出妥協，而且還要接受在較爲年輕和衝動的時期容易拒絕的一些原則。

泛非大會推行一種戲劇化而且好高騖遠的方案，並許諾要提供即刻見效的解決辦法。他們最爲戲劇化和幼稚的行爲便是允諾在一九六五年底獲得解放，並因此敦促非洲人爲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做好準備。他們保證：『在一九六〇年我們要採取第一個步驟』，『到一九六三年，將採取實現自由和獨立的最後行動。』儘管這一預言爲疲於等待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和

熱情，但一個組織作出這種自身難以實現的承諾，卻永遠是種危險的行爲。

泛非大會的反共特色，使之成爲西方新聞界和美國國務院的寵兒。它的產生被這些人盛譽爲插入非洲左翼力量心臟的一把匕首。連國民黨也看好泛非大會是個潛在的盟友；他們認爲泛非大會反映了自己的反共主張，而且會支持自己有關分別發展的觀點。國民黨人同樣也拒絕種族間合作，而且國民黨和美國國務院都看出來了，爲了自身的目的，這個新組織的規模和重要性是合適之舉。

我們歡迎泛非大會攜入鬥爭行列的每一個人，但這個組織卻差不多一直在扮演着破壞者的角色。他們在關鍵時刻造成人們之間的分裂，這一點讓人無法不耿耿於懷。當我們號召總罷工時，他們會請大家去上班，而且還製造一些導向錯誤的言論來對抗我們所發佈的任何東西。然而，儘管這一組織的締造者們是非洲民族議會的背離者，泛非大會仍在我心中燃起希望，使我相信我們這兩個組織間存在着聯合的可能。我想一旦激烈的爭辯得以降溫，鬥爭實質的共同性將使我們走到一起。受到這一信念的啓發，對他們政策上的闡述及行動，我總是特別關注。我的用意倒並不在於找出差距，而是要發現相親相近之處。

在索布科威參加泛非大會就職典禮的第二天，我就向他索要一份主席發言的副本，大會憲章，以及其他的政策資料。我想索布克威顯然樂於看到我對此產生的興趣。他說可以保證我拿到所需材料。不久以後我再次遇見他，並又一次向他提起這一要求，他說材料已經發出

去了。最後我終於見到波特拉科·勒巴洛，並對他說：『老兄，你的伙計們好久前就答應要給我材料，但到現在誰也沒給我。』他說：『曼德拉，我們已決定不把資料給你了，因爲我們知道你只不過要用它來攻擊我們。』我向他說明了這種觀點的錯誤所在，他稍作遲疑，還是把我所需要的東西給了我。

三十一

一九五九年，議會通過了《班圖自治政府創建法案》，由此產生了八個單獨的班圖族黑人家邦。這就是國家稱之爲『格魯特』或大隔離的建立。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政府又出籠了一項具有欺騙性名稱的《大學教育推廣法案》。這是大隔離政策的另一分支。這一法案把非白種人排斥在種族『開放』的大學之外。在推行《班圖自治政府法案》的過程中，班圖行政和發展部長德·韋特·內爾說道，對於每個單獨的民族群體的利益而言，只有在本民族聚居區內發展才可以得到最好的保證。他還說非洲人永遠也不會被融入白人社會。

根據黑人家邦政策，百分之七十的人將要被劃分到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土地上，這一政策的不道德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一新政策下，即使三分之二的非洲人住在所謂的白人地區，他們也只有在自己的『部落家邦』中才有公民權。這一方案既沒有給予我們在『白人地區』的自由，也沒有使我們獲得在他們認爲是『我們的地區』的獨立。維沃爾德說，黑人家邦的建

立極大地維護了人們良好的願望，致使在這片土地上永遠也不會產生反抗。

事實卻大相迥異。郊區陷入一片混亂。從未見過有哪些地區像澤勒斯特（Zeerust）那樣在首領艾布拉姆·莫沃洛阿（Abram Moiloa）領導下，人民爲反抗所謂的班圖政府而頑強戰鬥。這樣的地區通常也不會見諸報章。政府使得人們難以接近事情眞相，並藉此來掩蓋國家採取的一些殘酷行動。一批批無辜的人民被逮捕、壓迫、監禁、放逐、毆打、折磨乃至殺害。色庫庫尼蘭（Sehukhuneland）的人民也奮起反抗，其傑出的領袖和謀士都橫遭放逐或逮捕。色庫庫尼蘭一位被視爲政府走狗的首領被刺殺。到一九六〇年，色庫庫尼蘭的抵抗已達到公開對抗的地步，人們甚至拒絕交納稅款。

在澤勒斯特和色庫庫尼蘭，非洲民族議會分支機構在抗議行動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儘管迫害嚴重，在澤勒斯特地區相繼出現了一系列非洲民族議會的新機構。其中的一個分支機構招收了近兩千名成員。色庫庫尼蘭和澤勒斯特是非洲民族議會在南非首先遭禁止的地區。這表明我們的影響力已達到這些邊遠地區。

在蓬多蘭東部也爆發了抗議浪潮，在那裡政府的幫凶們遭到襲擊，並被打死。滕布領地和祖魯蘭進行了頑強抵抗，是最後屈服的地區之一。人們被毆打、逮捕、流放、監禁。在滕布領地，抵抗運動從一九五五年就已開始，其間薩巴塔也成爲抵抗力量的一分子。

使我萬分痛苦的是，在川斯凱，人們的憤怒指向既是我的侄子，又一度是我導師的K·

D·馬坦奇馬。毫無疑問，達利旺高一直在與政府合作。多年來我一向所作的請求都歸於徒勞。有消息說馬坦奇馬總部的『因庇士』（即傳統中的武士）把反對他的村莊付之一炬。有好幾起刺殺行動是針對他的。同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溫妮的父親也在馬坦奇馬的委員會之中，而且是位不折不扣的支持者。這對於溫妮來說也是個可怕的難題：她的父親和丈夫在同一個問題上站在相互反對的立場上。她愛自己的父親，但是卻反對他的政治主張。

在許多場合裡，從川斯凱來的族人和親屬到奧蘭多來找我，抱怨首領們與政府勾結。薩巴塔反對班圖政府，而且不願屈服。可是來看我的人們卻都擔心馬坦奇馬會罷免他，後來事實果然如此。有一次，達利旺高在我出席叛國案審判中來看望我，我帶他到普利托利亞。在法庭上，伊西·梅塞爾斯把他介紹給法官們，他們給予他一個榮譽席。可是除了不屬於被控人員之外，他並未受到特殊待遇。他開始咄咄逼人地追問每位認爲他是個背叛者的被告，問他們爲什麼要反對分別發展運動。莉蓮·恩戈依說道：『天哪！這個人脾氣眞暴躁。』

三十二

據說上帝的風磨旋轉得尤爲緩慢，可就是上帝的機械系統也難以與南非的司法機構相媲美。一九五九年八月三日，我們被捕兩年八個月之後，經過一整年法律行爲過程，眞正意義上的審判才在普利托利亞的舊猶太教堂舉行。我們最終被正式傳訊，所有的三十人上訴申請

無罪。

我們的辯護小組再次由伊西·梅塞爾斯爲首。他的助手有西德尼·肯特里奇，布拉爾·菲希爾和弗農·布蘭格。歷時經久，這一次審判總算認眞進行了。在這一案件的頭兩個月中間，公訴部門在記錄中整理差不多兩千份文件，傳喚了二百一十名證人，其中兩百人是特務機關的成員。這些偵探承認，爲了能獲得有關我們組織的情報，他們不惜匿身在壁櫥裡、床底下，裝扮成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實施了幾乎所有的欺詐手段。儘管如此，政府提交的文件及其錄用的講話有許多都是我們公開發表過的，誰都可以獲取這樣的東西。和從前一樣，公訴部門的證據中大部分都是些書籍、文件和檔案。這些都是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間多次突襲中從被告那裡搜取來的。同時還有在這一階段內在非洲民族議會會議上警察所做的筆記。特務機關的官長們所做的有關我們講演的報告也和以往一樣糊裡糊塗。我們以前常開玩笑說，會議聽音響條件是如此之差，特務機關偵探們的報告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一來一往，我們倒要爲了自己沒說過的話而遭罰，爲沒聽清的事而遭監禁，爲了自己沒做的事而橫遭殺身之禍。

每天吃午飯時，我們獲許坐在鄰近的牧師住宅中寬大的花園裡。令人生畏的薩亞那吉·皮雷（Thayanagee Pillay）和她的伙計們爲我們提供膳食。他們幾乎每天都做辣乎乎的印度式午飯。在早晨和午休時提供茶、咖啡和三明治。這些短暫的休息時間好似法庭審判後小小

的渡假。也為我們彼此間提供了討論政治的機會。在牧師草坪黃檀樹蔭下的這一段段時間是審判過程中最令人愉快的時刻。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次案件與其說是有關正義的審判，倒不如說是對我們承受能力的考驗。

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們正準備去法庭，卻聽到收音機裡宣佈了檢察官奧斯瓦德·皮羅中風猝死的消息。他的死亡對於當局是個沉重的打擊。公訴部門的效率和攻擊性也從此一蹶不振。當天在法庭上，倫普夫法官為皮羅作了篇聲情哀惋的悼詞，讚揚他執法的敏銳和徹底。雖然我們會因他的去世得到好處，實際上我們並不對他的死訊感到欣喜。我們已對這位對手產生了某種感情。因為即便皮羅的政治觀點實屬可憎，他還是個較為人道的人物。他為之效力的政府中那種惡毒的、純屬一已偏見的種族主義精神，他也並不具備。他習慣上彬彬有禮地將我們稱為『非洲人』（就連我們自己的律師也時常說漏嘴而把我們稱作『土著人』），這一點和他奉為至上的政治傾向形成了反差。我們在舊猶太教堂內的小世界似乎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得以平衡；每天早上，我們看着皮羅在自己桌前閱讀右翼的報紙，而布拉姆·菲希爾向我們宣讀左翼的《新世紀》。他向我們免費贈與了預備核查的一百多份卷宗，為被告節省了一大筆錢。德·沃斯（De Vos）律師成為公訴部門的新領導，卻比不上其前任的雄辯能力和敏銳才智。

皮羅死後不久，檢察當局結束了證據的提交過程；也就是從此時開始，檢察當局開始以默瑞（Murray）打頭陣的專家驗證階段。默瑞被他們認爲是有關共產主義的專家，可是在預備核查中卻顯得極爲無能。在梅塞爾斯毫不放鬆的盤問下，默瑞承認《憲章》實際上是份人道主義文件，可以很好代表非白種人在南非艱苦條件下自然生發的反應和期望。

默瑞並不是公訴部門證人中唯一一名對推進這一政府案件毫無裨益的人。公訴部門雖然有着捲帙浩繁的證據和專家們據以佐證的材料，檢察當局也難以設法出具有關非洲民族議會構成暴力的有效證據，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接着在三月份，檢察當局突如其來地出示一批秘密材料。他們準備發佈那些最該死的證據。一方面是新聞界的大肆炫耀和緊鑼密鼓，一方面是政府爲法庭出示了偷錄下來的羅伯特·里沙的講話。這篇講話是他於一九五六年在川斯瓦志願者主席任上對滿屋的志願者說的。這是我們統統被捕前幾個星期的事。法庭內很安靜，除了錄音的靜電聲和背景的嘈雜聲以外，可以很清楚地聽到羅伯特的話語。

『當你們受到紀律的約束，而且組織告訴你們不要採取暴力時，你們一定不能採取暴力……可是如果你們是個眞正的志願者而且被召喚起來採取暴力行動時，你們必須絕對帶有暴力性。你們必須要去殺人！去殺人！就得這樣。』

檢察當局確信可以結案了。各種報紙也把里沙的話刊登在顯著的專欄上，與神經脆弱、

情緒敏感的政府一唱一和。對於公訴部門來說，這一講話披露了非洲民族議會見不得人的眞實用意，揭穿了非洲民族議會在公共場合所作的非暴力的僞裝。但事實上里沙的話是異常情況下說的。就算是易於激動，羅伯特也是位優秀的公衆演說家。但不幸的是他選擇了不恰當的類比。但就如辯護方所說的那樣，他只是爲了強調紀律的重要，爲了說明無論個人好惡，志願者們都要按所接受的命令辦事。我們的證人們一遍又一遍地表明，里沙的講話不僅是斷章取義，而且並不代表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

檢察當局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十日結案。我們要在四天後第一次傳喚我方證人。這幾個月裡我們都在沉鬱中度過，但是當我們爲自己作證而準備時，卻又急切地要發動進攻。對於敵人挑戰，我們已迴避得太久。

新聞界曾有不少猜測，認爲我們首位證人將是盧圖利酋長。檢察當局肯定也如是認爲，因爲三月十四日，當我們首位證人不是盧圖利而是威爾遜·康科博士時，曾引起不小的驚愕。

康科是位來自納塔爾美麗的伊克索坡（Ixopo）地區的祖魯族農民。他不僅是一位開業醫生，還是青年聯盟的締造者之一，是『反抗運動』中一名積極分子，也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副司庫。在作證前的準備中，他被問及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優秀在校記錄。他以第一名

的成績畢業於醫學學校，排名領先於白人特權階級的子女們。在康科出示他的證明時，我的直覺印象是，同是來自納塔爾的肯尼迪法官看上去十分為之驕傲。納塔爾人以對本地區的忠誠而出名，這一特殊的聯繫紐帶有時甚至可以超越於膚色之上。確實，許多納塔爾人把自己看作是白種祖魯人。肯尼迪法官看上去總是顯得具有公平思想，而且我也從威爾遜·康科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他開始不把我們看成是不顧一切的暴民煽動者，而是具備雄心勃勃的理想，只要國家需要，就可以為自己的國家提供幫助。在康科作證的終了時刻，當他舉出某些醫學上的成就時，肯尼迪用他可以流暢使用的祖魯語說道：『我們祖魯人就是這樣。』康科表明了自己是位冷靜而且善於表達的證人，他證實非洲民族議會恪守了非暴力的準則。

下一位證人是盧圖利酋長。他以其尊嚴和眞誠給法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正患有高血壓，法庭便同意他在上午作證時可以坐着。他那統領全局的作證持續了數日，而後又被盤問了將近三個星期。他仔細地列出了非洲民族議會政策的演化過程，簡要清晰地叙述事宜。他過去做教師和主席的經歷為他的發言增添了額外的份量和權威。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是討論非洲民族議會如何為種族間和睦而奮鬥的最合適人選。

盧圖利酋長在證實，他確信人內心的善；而道義上的勸慰，加上經濟上壓力，會在白種南非人方面引起內在的變化。在討論非洲民族議會非暴力政策時，他強調在非暴力和和平主義之間存在着差別。和平主義者們甚至在受到殘暴攻擊時也拒絕保衛自己，但這對於接受非

暴力主張的人來就不是一回事了。有些時候，人或國家，即便在非暴力過程中，也不得不在受攻擊時保衛自己。

當我聆聽康科和盧圖利講話時，我想此時此地，這些法官們也許是有生以來頭一次不在聽取他們的國家公僕爲討主子歡心所說的一套，而是在聆聽獨立和雄辯的非洲人表達的政治信念及其希望實現的方式。

特倫格羅夫（Trengrove）律師對盧圖利酋長進行了盤問，固執己見地想要讓他說非洲民族議會被共產黨控制，而且奉行兩面政策，對公衆顯出非暴力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秘密實施暴力革命的計劃。盧圖利酋長堅決否認了特倫格羅夫所作的任何引申。尤其是當特倫格羅夫似乎抑制不住情緒的時候，盧圖利酋長本身簡直就是謙遜的化身。有一次，特倫格羅夫指責盧圖利酋長虛僞。而盧圖利酋長無視特倫格羅夫的中傷，轉而冷靜地對法官說：『閣下，我想檢察當局有些失態了。』

可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盧圖利酋長的作證被法庭以外一個破壞性事件打斷。那一天，國家被如此嚴重的事件所震撼，致使盧圖利酋長在一個月後回庭作證時，法庭和整個南非都不復原貌。

三十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非洲民族議會年度會議是在德班召開的。此時這個城市正掀起反通行證的抗議高潮。大會一致投票通過，從三月三十一起發起全國大規模的反通行證運動，並在六月二十六日以焚毀通行證把運動推向高潮。

計劃馬上得以進行。三月三十一日，代表團被派往地方政府。非洲民族議會領導們巡行了全國，同分部成員談論這場運動。非洲民族議會基層工作人員將消息傳遍村鎮和工廠。傳單、標語和佈告得以印刷、流行，並在火車和汽車上張貼起來。

國家的氣氛透出緊張。政府威脅要禁止非洲民族議會的活動，而內閣部長們也警告說非洲民族議會將要嘗到鐵拳的無情打擊。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鬥爭也在繼續；獨立的迦納共和國在一九五七年建立，迦納的泛非主義者、反種族隔離領袖克瓦默·恩克魯瑪已足以令國民黨震驚，這使得他們更加決意要壓製國內的反對情緒。一九六〇年，非洲十七個舊殖民地準備成爲獨立國家。二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訪問南非，並在國會發表演說，其間談到席捲非洲的『變革之風』。

泛非大會在那時顯得茫然若失，他們是尋找追隨者的領導，而且不得不發動任何一個行動以便在政治版圖上占領一席之地。他們了解到了非洲民族議會的反通行證運動，並被邀請

加入。可是他們不僅沒有和非洲民族議會運動聯手合作，反而設法給我們拆臺。泛非大會宣布要在我們運動發起前十天，於三月二十一日開始自己的反通行證運動。他們既沒有召開會議討論日期，也沒有採取具備任何意義的組織工作。這實屬機會主義的炫耀行爲。激發他們這一行爲的動機只是爲了損毀非洲民族議會的作用，而不是爲了打敗敵人。

在計劃示威四天前，索布克威邀請我們與泛非大會聯合。索布克威這一邀請不是團結的表示，而是一種戰術舉措，意在避免泛非大會因爲不吸收我們而遭受批評。他在最後時刻提出邀請，我們拒絕加入。三月二十一日早晨，索布克威和他的執行人員步行到奧蘭多警察局，任由自己被逮捕。千百萬上班工作的人對泛非大會的人不予理睬。在地方行政長官的法廳上，索布克威宣布泛非大會不會去爲自己辯護，以便與自己的口號一致：『不保釋、不辯護、不罰款。』他們認定蔑視當局的人只會受到幾個星期的判決。可是索布克威不是被判三個星期，而是三年的監禁。沒有罰款這一項。

約翰尼斯堡對泛非大會的召喚應聲廖廖。在德班、伊利莎白港或東倫敦，根本就沒有抗議活動。但在伊瓦頓，Z·B·莫萊特（Z B Molete）得到了喬·莫勒菲的有力支持，聚集了全城的人，數百人不帶通行證，任由逮捕。開普敦也有一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通行證示威活動。在開普敦以外的郎加（Langa）鎮，近一萬人聚集起來，而且由於警察用警棍襲擊而被激發成騷亂。兩人被殺。可是示威最後爆發的地區卻也是最爲災難性的地區。它至今仍

是那些回響着悲劇音色的名字之一：沙佩維爾。

沙佩維爾是約翰尼斯堡南部約三十五英里的一個小城鎮，在弗瑞尼京周圍條件惡劣的工業區內。泛非大會活動分子爲組織這一地區作了絕好的工作。下午較早時候，數千人包圍了警察局。抗議者們顯示出控制力，而且未帶武器。七十五人的警察隊伍在人數上被大大超過，顯得尤爲驚恐。沒有人聽到有開槍的警告或開槍的命令，可是突然間，警察向人群開槍，並在抗議者驚惶地轉身逃去時繼續射擊。人群退去時，已倒下了六十九具非洲人的屍體，其中大多數是在逃跑時背部中彈致死。人們一致認爲，警察共向人群射擊了七百多發子彈，打傷一百五十多人，包括數十名婦女兒童。這是一場大屠殺，次日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在頭版展示了這一野蠻行徑的照片。

沙佩維爾的槍擊事件引發了全國上下的混亂和一場政府危機。包括美國國務院在內的憤怒抗議從全球襲來。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干涉了南非事務，抨擊政府射殺無辜百姓的行徑，並敦促它採取步驟，促成種族間平等。約翰尼斯堡股票交易額猛跌，資金也紛紛開始從國內抽出。南非的白人開始計劃移民國外。自由黨人開始催促維沃爾德向非洲人做出讓步。政府卻堅持說沙佩維爾事件是共產黨人陰謀的產物。

沙佩維爾的大屠殺使國家產生了一種新的局面。儘管泛非大會的領導們經驗不足，機會主義思想嚴重，但這個組織卻全面動員，在沙佩維爾和郎加的示威過程中顯示了巨大勇氣和

決心。一夜之間，他們便站到了戰鬥的前沿。羅伯特·索布克威被國內外一致譽爲解放運動的救星。我們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也不得不針對這一形勢作出迅速調整，事實上我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我們中間一小部分人：沃爾特、杜馬·諾克威、喬·斯羅夫和我開了一個通宵的會議商量對策。我們認爲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承認這些事件，並讓人民的憤怒和悲痛有所發洩。我們將計劃送交盧圖利酋長。他在上面簽了字。三月二十六日，盧圖利酋長在普利托利亞公開焚毀自己的通行證，並呼籲他人仿效。他宣布在三月二十八日舉行全國範圍的罷工，以作爲國喪日來抗議沙佩維爾的暴行。在奧蘭多，杜馬·諾克威和我也於此時當着千百人和幾十名新聞攝影師的面燒毀了自己的通行證。

兩天之後的二十八日，數十萬非洲人響應了盧圖利酋長的號召，全國人民作出了極好的響應。只有一個眞正的大衆組織才可以協調這樣的行動，而非洲民族議會正是做到了這一點。在開普敦，三萬群衆在朗加城鎮集會抗議槍殺事件，暴動在各地風起雲湧。政府宣布了緊急狀態，暫時取消人身保護令，並決定要集中力量對任何顚覆活動採取徹底行動。南非此時處於軍事管制之下。

三十四

三月三十日淩晨一點半，我被一陣嘈雜、粗魯的敲門聲吵醒。無疑這是警察到來的標誌。我邊去開門邊對自己說：『總算來了。』門口站着六名武裝安全警察。他們把屋子弄得天翻地覆，把能發現的任何片紙寸言都帶走，其中還包括我最近正爲我母親回憶有關家史和部族寓言所做的記錄。此後我再也沒見過這些東西。他們沒逮捕證就把我抓了起來，也不讓我有機會找律師，甚至拒絕告訴我妻子我要被帶到那裡去。我只是朝溫妮點了點頭，這不是說些安慰話語的時候。

三十分鐘後我們到達紐蘭警察局。我過去有許多次就在這裡會見當事人，對這地方非常熟悉。它位於索菲亞鎮，或可以說是在它的東邊，因爲這裡曾是人群熙攘的城鎮，現在處處是被推倒的樓房和空曠之地，成了滿目瘡夷的廢墟。我在警察局裡還發現了一批剛從床上被拖起來的同事們。整個晚上，陸續又來了更多的人。到早晨共達四十多人。我們被趕進了一個狹小的院落，頭頂上只有夜幕，一盞昏暗的燈光照明。這地方又小又潮濕，我們只得站在那裡過了一夜。七點一刻，我們被帶入一個小監牢。牢裡地板上只有一個排水口，而且只有從外面才可以衝洗。沒有人給我們發毯子、食物、墊子，連手紙都沒有。排水口時不時地被堵住。屋內一股惡臭，着實讓人難以忍受。我們多次抗議，其中一條是要求有食物，這卻遭

到了粗魯的反對。這個問題直到下一次牢門打開時才被我們解決。我們打算衝進旁邊的院子裡，他們不給食物就拒絕回牢房。當我們衝出牢門時，值勤的年輕警員嚇得倉惶逃竄。幾分鐘後，一位表面上一本正經、身材魁梧的警長來到院子裡，命令我們回牢房。『回裡面去！』他吼叫道：『你們要是不回去，我馬上就叫五十個人來用警棍敲碎你們的腦殼！』沙佩維爾的恐怖事件後，這種威脅可不是憑空之語。

警察局長也來到院子門前看着我們，然後走過來斥責我，因爲我手插在衣兜裡站在那兒。『這就是你在長官面前的樣子嗎？』他咆哮道：『把你的臭手從衣袋裡拿出來！』我手放在衣兜裡，紋絲不動，好像是在大冷天裡出外散步一樣。我告訴他：如果我們獲得食物，我倒是願意把手拿出來。

到了下午三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在牢裡待了十二個小時。這時才有人送來一桶清湯寡水的玉米糊，連盛湯的碗具也沒有。在正常情況下，我會認爲這樣的東西根本就不適於食用，可是那時候，我們手也沒洗就伸進去撈着吃，好是得到了天底下最美味的珍饈。吃完飯後，我們選舉了一個委員會作爲代表，其中包括杜馬·諾克威，泛非大會公共事務秘書Z·B·莫萊特，我也當選爲發言人。我們很快進行了申訴，抗議惡劣條件，要求在宣布監禁我們純屬非法的前提下即刻釋放我們。

六點鐘我們收到睡覺用的墊子和毯子。我想這些臥具的惡臭和骯髒程度着實難以言述。

毯子上佈滿了血塊和嘔吐物的硬殼。爬遍了虱子、臭蟲和蟑螂。還透着一股薰人的臭氣，簡直能比得上下水道的味道。

午夜時分，有人告知我們待會兒要接受傳喚，其他情況則一無所知。有些人因對被釋的憧憬而會心微笑。其他人心裡要清楚些。我第一個被叫去帶到監獄的前門。當着一群警察的面，我很快就被釋放了。可就在我剛要抬腳的時候，一位警官高叫一聲：

『姓名？』

『曼德拉。』我答道。

『納爾遜·曼德拉，』這位警官說道，『我以緊急狀態規定賦予我的權力逮捕你。』到了這時候，我們才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被釋放，而是在緊急狀態的名義下被重新逮捕。我們一個接一個地被釋放，幾秒鐘內又一個接一個地被重新逮捕。我們是在緊急狀態下被非法逮捕的，現在又在這午夜時生效的緊急狀態下被重新逮捕。我們向警察局長起草了一份備忘錄，要求了解自己的權利。

第二天早晨，我被叫進局長辦公室。在那裡我見到了同事羅伯特·里沙，他也已被抓了起來，正在接受警察局長的審問。我走進屋子時，里沙問局長他爲什麼在頭天晚上向我發脾氣。局長以典型的白人的尖聲怪叫道：『曼德拉他厚顏無恥。』我反駁道：『不管是那時候還是現在，我都不會爲你這種人而把手從衣袋裡拿出來。』局長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卻被其

警官們拉住了。這時，特務機關的偵探黑爾貝格（Helberg）警長走了進來，樂呵呵地對我說：『哈羅，納爾遜。』我反唇相譏道：『你別叫我納爾遜，我是曼德拉先生。』當我們被告知必須要動身去出席普利托利亞的叛國案審判時，屋子裡的氣氛緊張得好像面臨一場全面戰爭。我不知道是該高興還該沮喪。可是歷經了這三十六個小時的虐待，還宣佈了什麼緊急狀態，政府終究認爲合適的辦法還是把我們送回普利托利亞，以期繼續他們毫無指望、而此刻更顯得過時的審判。

三十五

法庭於三月三十一日重新開庭。但證人席上卻空無一人。盧圖利酋長一直是證人之一，所以倫普夫法官要求爲他的缺席做出解釋。當得知盧圖利酋長在頭一天晚上被看管起來時，倫普夫法官對這一解釋表示憤慨，並且說自己不明白爲什麼緊急狀態法要來干涉他的審判。他命令警察把盧圖利酋長帶到法庭，以便繼續作證，於是就此休庭。

後來我們才知道，盧圖利酋長在被捕後還受到了毆打。正當他下樓梯時，一位看守推了他一下，把他的帽子弄掉在地上。當他彎腰去拾時，卻被劈頭蓋臉地摑了幾個耳光。我們實在難以忍受這件事。一位德高望重，畢生虔誠的基督教徒，心臟又處於危險狀態下，卻被一幫連替他繫鞋帶都不配的人像牛欄裡的牲口一樣對待。

我們被召回法庭，倫普夫法官獲悉警察拒絕把盧圖利酋長送回法庭。法官宣佈當天休庭。我們還想這下可以回家了。但剛要離開法庭去找車時，我們又再一次被逮捕。

但這些警察們，由於他們慣常所有的那種無目的的過度熱忱，卻犯了個可笑的錯誤。威爾頓·姆克瓦依是被告之一，而且長期以來都是工會領袖和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他從伊利莎白港來普利托利亞參加審判。不知怎麼地，他和同事們走散了。當他走到大門時，看見被控告的伙伴們被重新逮捕的混亂局面時，他問警察是怎麼回事。警察叫他離開。威爾頓站着沒動。警察又叫他走，這會兒威爾頓告訴他說自己也是被告之一。警察說他是個騙子，先是威脅他要以妨害公務罪逮捕他。然後又一次氣呼呼地叫他離開這個地方。威爾頓聳聳肩，走出大門。這是人們最後一次在法庭上見到他。其後的兩個月內，他從事地下活動，成功地躲避了逮捕，之後被偷送到國外，很快成了工會聯盟的國外代表，隨後又在中國參加了軍事訓練。

那天晚上，川斯瓦其他地方的被捕者加入了我們的行列。這場全國範圍的警察行動導致兩千多人未經審判便被拘留。這些男男女女分屬不同種族，而且全都是反種族隔離的政黨成員。軍隊被召集動員起來駐紮在全國戰略要地。四月八日，非洲民族議會和泛非大會都在《鎮壓共產主義法案》之下被宣佈爲非法組織。兩周後，成爲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已是要被處以監禁和罰款的重罪。對推動非洲民族議會目標的行爲的懲罰是處以十年以下的監禁。這時

就連非洲民族議會支持下的非暴力守法抗議活動也成爲非法。鬥爭進入新階段。我們都已成了不法分子。

在緊急狀態期間，我們是在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那裡的條件和紐蘭一樣糟糕。案犯五人一組地被塞進九英尺長、七英尺寬的牢房。牢裡一片髒亂，照明極差，通風條件更不成樣子。我們有一個便桶，上面的蓋子鬆鬆垮垮地。毯子上也是爬蟲密佈。我們每天只允許在外面待上一個小時。

在剛到普利托利亞的第二天，我們便委派了一位代表去找監獄當局的頭頭斯奈曼（Snyman）上校，抗議監獄的惡劣條件。上校的回答蠻不講理，他要求我們出示證據，大喊我們的申訴純屬謊言，嘲笑我們說：『你們把寄生蟲從你們骯髒的家裡帶到了我的監獄。』

我說我們需要一間安靜、而又光綫好的房間好準備我們的案子。上校再一次冷嘲熱諷，說什麼：『就算你還有點閱讀能力，但政府法規並沒有要求犯人讀書。』儘管斯奈曼上校的態度傲慢，但還是很快對單間牢房進行了油漆及烟熏消毒。獄方爲我們提供了新的毛毯和衛生桶，允許我們大部分時間待在院子裡，還給了一間大號牢房，允許我們這些因蒙受『叛國案』而受審的犯人在這裡商討我們的案子，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讀一些法律書籍。

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是我們的家，清晨我們將離家受審，下午再回到監獄。該監獄是按照種族隔離的政令以膚色來劃分政治犯的。我們當然已與我們的白人同僚

們分開了，但是在一些非白人居住的監牢裡也要把我們同印度人及那些有色人種同胞分開，獄方眞是瘋了。我們要求在一起用餐，但他們的回答卻是用各種各樣莫明其妙的理由來解釋爲什麼這樣不行。衆所周知的死板的公事程序加上狹隘的種族歧視觀念，其結果必然造成思維混亂。但當局最後終於做了讓步，同意把我們這些『叛國案』犯關在一起。

儘管我們被關在一起，但我們的伙食標準卻是按種族制定的。早餐，非洲人、印度人和其它有色人種配給的食品數量相同，但除此之外，印度人和其它有色人種還能分到半匙糖，而我們沒有。晚餐配給的食物都一樣，但印度人和其它有色人種可得到四盎司麵包，而我們非洲人卻一盎司都沒有。造成後一種差別的荒謬的前提就是非洲人天生不喜歡吃這種非自然口味的或『西方』口味的麵包。膚色就是一切。甚至爲白人配給的糖和麵包的顏色與給黑人的都大不一樣。白人囚犯吃白糖、白麵包，而有色人種，印度人則吃紅糖、黑麵包。

對於伙食質量的如此低劣，大家怨聲載道。爲此，我們的律師悉尼·肯德里奇（Sydney Kentridge）便向法院提起正式訴訟。我陳述了獄方提供的食物不適合給人來吃，倫普夫法官同意親自來嘗嘗監獄的食物，那天一份玉米粥和豆類午餐擺在了他面前的法官席上。監獄裡最好吃的飯就是玉米粥和豆類食品。在做這種飯時，獄方在粥裡添放的豆子和肉汁比平時要多。倫普夫法官嘗了幾口飯後表示飯做得不錯，味道很香。他認爲送來的飯菜應當更熱呼一些。我們大伙經常暗自拿監獄裡的『熱菜熱飯』大開玩笑。陰森森的監獄和熱呼呼的飯菜

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最後，獄方爲被拘押的犯人提供了所謂經過改善了的伙食，也就是說，非洲人吃麵包，印度人和其它有色人種與白人的伙食相同。

在我們被拘押期間，我享受了一種特殊的待遇，就是可以去約翰尼斯堡度過周末。但這絕非是去享受一種監外的度假，而是要在假期內加班工作。在實行全國緊急狀態前不久，奧利佛遵照非洲民族議會的指示離開了南非。我們早就預感到要開始一場取締行動。由於預見到會被全面取締，非洲民族議會決定讓某些人員離開南非去發展和鞏固國外的組織。

讓奧利佛離開南非是非洲民族議會最具先見之明的舉措之一。當時，我們幾乎無法斷定國外的組織到底能發揮多大作用。奧利佛這個人睿智鎮定，堅韌不拔，具有出類拔萃的組織才能，他能鎮定自如地擔負起領導責任並鼓舞人心，他所擔任的職務對他來說是再合適不過了。

海米·達維多夫（Hymie Davidoff）是當地一位律師，我們大家彼此之間都是朋友。奧利佛在離開南非前留下他來做善後工作。達維多夫向獄方提出了一項特殊請求，要求奧雷爾·普林斯洛上校批准我在周末去約翰尼斯堡幫他料理公務。那想到到奧雷爾竟開恩應允了，答應每周末派車送我去約翰尼斯堡，讓我整個周末在那裡辦理公務，而後於周一上午再用車送我回監獄。每周末下午一點，在法庭休庭後，克魯格中士便陪我出發去約翰尼斯堡。到辦

公室後，我就與達維多夫以及我們的會計師內森·馬庫斯（Nathan Marcus）一起辦公。我晚上在馬歇爾廣場監獄過夜，白天在辦公室裡工作。

克魯格（Kruger）中士身材高大，儀表堂堂，對我們還不錯。在從普利托利亞到約翰尼斯堡的途中，他經常停下車來，把我一個人留在車內，去商店買些肉脯、柑桔和巧克力什麼的由我倆共同分享。我也曾打算跳車逃跑，尤其是在星期五街道上一片繁忙，最容易逃逸於人海中時，我的這一念頭就更爲強烈。

辦公時，我可以下到一樓的酒吧去買些小吃。當溫妮來看望我時，克魯格也會暫時迴避一下。我們兩人之間有一項君子協定，我不會逃跑給他帶來麻煩，而他也給予我一定的自由。

三十六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恢復審判的前一天，伊西·梅塞爾斯把我們召集到一起，開會討論了全國緊急狀態會對進行審判產生的嚴重影響。由於緊急狀態的各種限制，被告人與辯護律師之間根本不可能相互磋商。我們的律師都住在約翰尼斯堡，難以與我們見面，也就無法爲我們的案子做準備。他們常常驅車遠道而來，卻不能與我們見面。有時即便能見上一面，我們的磋商也常常受到干擾，而被迫草草收場。梅塞爾斯向我們解釋說，更爲要緊的是在實

行全國緊急狀態的情況下，如果僅僅是出庭作證，只能使已被拘禁的人延長禁期，因爲他們所作的陳述必然會被認爲是『破壞穩定』，從而給人以口實，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同時，那些尚行動自由的辯護證人如果出庭作證，也有被拘禁的危險。

辯護團建議退出這件案子以表示抗議。梅塞爾斯向我們說明了退出本案會產生的嚴重影響，同時也闡明了在這生死攸關的審判案中進行自我辯護會帶來的後果。他認爲在當時敵意甚濃的情況下，法官也會認爲延長我們的刑期更爲妥當。我們二十九個被告人（威爾頓·穆克維現在已不在世）一起研究討論了這一建議，大家都暢所欲言，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同意杜馬·諾克威和我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協助辦理此案。這種鮮明的舉動將使全國緊急狀態的邪惡本質廣昭於天下，我舉雙手贊成。

四月二十六日，杜馬·諾克威，這個川斯瓦省的第一位黑人律師在法庭上挺身而起，語驚四座地宣告被告將通知辯護律師退出本案。隨後梅塞爾斯說，『我們將不再委托他人辦理此案，當然也不會再打擾你們這些達官貴人。』他的話音一落，辯護團便默無聲息地起身走出了猶太教堂。三人審判團爲此而大爲震怒，他們直言警告說，如果我們進行自我辯護就不會有好下場。然而，我們也已忍無可忍，執意要爲自己討還公道。在此以後的五個月中，直到緊急狀態結束前，我們一直在進行自我辯護。

我們所採取的策略實際上簡單明確而又富於彈性，即拖着本案直到全國緊急狀態解除，

直到我們再請律師回來辦理此案。反正這個案子已經拖了很長時間，再拖下去也沒什麼關係。實際上，我們所採取的這一策略導演了一齣熱鬧的滑稽劇。根據法律，我們每個人都有權爲自己辯護，也能夠作爲其它被告的證人出庭。每個被告人都有權盤問各自的證人。在備審案件的目錄中，我們被按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第一號被告是法里德·亞當斯（Farid Adams），他來自川斯瓦省印度人青年大會。法里德在開庭時將傳喚第二號被告海倫·約瑟夫作爲他的第一證人。經法里德盤問後，海倫·約瑟夫將受到其它二十七名被告人的盤問。她隨後將受到法庭的盤問並由第一號被告再次盤問。接着，由亞當斯傳喚第三號被告人，然後重覆前面的程序。整個過程反反覆覆，沒完沒了，直到每個被告人都被以這種方式傳到。照此下去，要審判我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了。

在獄中辦理案子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遇到了傳統的種族隔離的障礙。所有的被告人都必需能夠碰面，但監獄裡的規定則禁止男女犯人會面，也不允許黑人和白人犯人相見。因此，我們不能與海倫·約瑟夫和莉蓮·恩戈依這兩位女犯進行磋商。

杜馬、我本人和法里德·亞當斯會當庭盤問海倫，而她作爲被傳的第一證人則需要爲此準備證詞。經過同獄方的長期交涉，我們終於獲准可以在極爲嚴格的情況下相互磋商。海倫和莉蓮被帶到了男監。監規的第一條就是黑人犯人和白人犯人以及男女犯人之間不得有身體

接觸。獄方豎起了一道鐵柵把海倫與我們隔開，而同時準備證詞的莉蓮則被另一道鐵柵與海倫隔離。把海倫與莉蓮隔開是由於種族不同，把海倫與我們分開則是性別和種族的原因兼而有之。這種精心設計製作的鐵柵堪稱一項發明，就連傑出的建築設計大師也只能望其項背。在監獄中，我們被這種精心製作的金屬牢籠相互隔離，只有在法庭上我們才能自由相聚。

首先，我們要訓練法里德按審判室的成規行事，並演練海倫的證詞。爲了幫助海倫，我便扮演了法里德將在法庭上扮演的角色。於是我就假模假式地以法庭的方式開始了對海倫的詢問。

我問道：『姓名？』

『海倫·約瑟夫。』她回答道。

『年齡？』

一陣沉默後，我又問了一遍。

海倫噘着嘴，一聲不吭。過了一會兒，她怒視着我大喊起來，『納爾遜，我的年齡與本案有何相幹？』

海倫美麗動人而又無所畏懼，但有時也不太近情禮。她年紀不小了，因而對年齡這個問題十分敏感。我對她解釋說，在法庭上，要詢問並記下證人的姓名、年齡、住址和出生地等有關詳細情況，這只是在例行公事。證人的年齡將有助於法庭權衡證人所作的證詞，並將影

響着法庭判決的結果。

我接着又問：『年齡？』

海倫仍固執己見，不肯作答，她說：『納爾遜，上了法庭，我會回答這個問題的，但決不是現在。咱們接着往下吧。』

接下來，我又問了一大堆法庭可能問到的問題。也許我過於投入了，有些假戲眞作的味道，海倫在我詢問她的過程中不時地扭頭問我：『你到底是什麼人？是曼德拉？還是檢察官？』

當然，監獄中的氣氛也不總是這麼沉悶壓抑，一些輕鬆愉快的場合也使我們感到興奮無比。在監獄中，白人和黑人之間並非鷄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我們每天都要乘坐一輛車從監獄去法庭，我們把這輛車叫作『叛逆出租車』，還把它稱爲『歌唱的卡車』。

每當我們置身於監獄的大牆之外時，就會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解脫。一旦跨出監獄的大門，我們便恢復了生機和活力。爲我們開車的是一位南非白人普通警員。他經常自作主張，擅自驅車帶我們兜風，並爲我們導遊。他同我們建立了一種和睦的關係，甚至對每個人的生日都瞭如指掌。一天早晨，出發前的檢查準備工作尙未料理完畢，他就開車接上我們把車開到了拘押白人犯人的牢房，然後扭過頭來悄悄地對我們說：『伙計們，今天是喬·斯羅夫的生日，咱們爲他唱支歌怎麼樣？』當喬跳進車裡時，我們便齊聲爲他吟唱了一首『生日快

樂』。在往返監獄和法院的途中，這位司機一再慫恿我們唱個不停。我們所唱的歌主要是一些歌唱自由的歌曲，但他卻似乎對此毫不介意，聽之任之。他一邊開車帶着我們圍着教堂廣場兜風，一邊大聲地說：『唱起來，伙計們，大聲地唱啊。』

當然，富有同情心的監獄看守還不只他一人。我被允許在周末去與海倫·約瑟夫見面，把法庭的審判記錄交給她。我每次去時都要與其它的女犯人碰面，與她們商量有朝一日作爲我的證人出庭作證時應採取的對策。我始終眞誠地對待那些女看守員，同時也注意到我的來訪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興趣。白人女看守員從未聽說過還有從事律師和醫生職業的非洲人，因而視我爲一個天外來客，感到非常新奇。但當我們彼此混熟了以後，他們對我也變得友善隨和多了。我曾打趣地對他們說，如果需要，我會作他們的律師，幫助他們打官司。這些傑出高尙、教養有素的女白人以一種絕對平等、毫無歧視的心態同一位黑人共同探討嚴肅的主題，這一事實本身就極大地動搖了那些傲慢自負的女看守人所持有的種族偏見。

有一次，我與海倫談話的時間很長。在此期間，一名白人女看守一直奉命坐在一旁監視着我們的談話。我對她說：『我們沒完沒了的談話使你感到枯燥無味，眞是對不起。』但她卻說：『不，正相反，我一直在饒有興趣地聽着你們的談話。』我看得出她一直在聽着我們的交談，還時不時地插上幾句，爲我們出點主意。我認爲這是審判所帶來的意外收獲。起初，這些女看守人中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明白我們爲什麼被監禁。逐漸地，他們揭開了這個

謎，領悟了我們奮鬥的目的所在，也懂得了我們為什麼甘心情願冒着風險，根本不在乎坐牢。

國民黨旗幟鮮明地強烈反對以任何形式取消種族隔離，其眞正的原因也就在於此。由白人組成的選舉團，滿腦子充斥着偏見，認定黑人是搗亂威脅的根源，他們無視非洲人提出的觀點和方針。就是這些衛道士，他們使國民黨荒謬的種族歧視原則得以維持。在此情況下，親善和睦所蘊育的絕不是輕蔑與傲慢，而是雙方相互間的理解和支持，從而最終達成和諧的統一。

監獄中的短暫歡愉掩蓋不住它的沉悶壓抑。有幾次，當我在普利托利亞的時候，溫妮獲准來監獄探望我。她每次都把澤尼（Zanani）帶來，這個小傢伙當時才剛開始呀呀學語，蹣跚學步。如果看守人員允許，我就抱起她親吻，直到會面結束時才把她遞給溫妮。當溫妮與我揮手告別並被看守人員帶走時，澤尼總是揚着小手示意我同他們母女倆一塊兒走。從她那疑惑不解的面部表情上，我看得出她不明白我們為什麼不能一起走。

在法庭上，在法里德·亞當斯巧妙靈活的引導下，海倫提供了她的主要證詞。亞當斯經常與法官們展開爭論，有時還遠勝他們一籌。我們當時鬥志昂揚，沒人再去玩那些文字遊戲來消磨時光。當我們這些被告輪流盤問證人時，法庭和公訴團從一開始就領教了我們這些站在被告席上的男女犯人們的厲害。

根據南非的法律，由於我們是在最高法庭受審，只有作爲辯護人的杜馬才有權同法官直接對話。我作爲一名律師，可以指導他怎麼去做，但根據法律，我卻無權在法庭上發言。當然，任何其它被告人也都不能這麼做。由於我們已經辭退了我們的辯護律師，我們便以此爲依據要求在無人代理的情況下，應當允許被告在法庭上發言。這個請求終於得到了批准，但並不是輕而易舉地得到的。在確定新的法庭規則之前，我在法庭上的一次發言被倫普夫法官打斷。他當時說：『曼德拉先生，請尊重事實，諾克威先生作爲辯護人是唯一有權在法庭上發言的律師。』我針鋒相對地反擊道：『一點不錯，法官先生，如果你打算付給諾克威先生辯護費，那麼，我們大家都會毫無異議地遵守這一規則。』從那以後，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發言便暢通無阻了。

當法里德從海倫開始對證人一一詢問時，我和杜馬便分別坐在他的兩邊，爲他準備要提的問題，協助他應付隨時會出現的法律爭論。總的來講，他能應付自如，無需太多的提醒和幫助。但也有那麼一天，我們被法庭咄咄逼人的提問壓得透不過氣來，我倆不停地在法里德耳邊悄悄地爲他出主意。法里德似乎也沉不住氣，多少有點厭煩了，而我和杜馬也感到快沒什麼好招了。後來，法里德也沒有與我們商量，突然說他已經精疲力盡了，要求法官休庭。審判團駁回了他的請求，認爲要求休庭的理由不充分，並再次重覆了我們的律師退出本案時他們給予的那些警告。

那天下午，在返回監獄的途中，我們失去了往日的歡笑，沒有了歌聲，大家都沉着臉坐在車裡。被告人中間正蘊釀着一場危機。當我們到達監獄時，一小伙被告人要求舉行一次會議。我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接着，有一個來自伊麗沙白港的商人，他名叫J·恩坎佩尼（J. Nkampeni），曾經在反抗運動中幫助過反抗運動成員的家人，他跳出來領頭鬧事，最後釀成了一場非難。

『馬迪巴。』他用我的氏族名字來稱呼我以表示尊敬，然後說道：『我希望你能向我們大家解釋清楚爲什麼要辭退我們的律師。』我提醒他不要忘記辭退律師不是哪個個人的決定，而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其中也包括他本人。他又說：『可是，馬迪巴，難道說我們清楚在法庭上該怎麼辦嗎？我們全靠你們這些律師了。』

恩坎佩尼的憂慮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我告誡他們不要灰心喪氣，並堅持認爲我們幹得很漂亮。我說，今天的事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挫折，還有更加困難的情況等着我們去應付。我們這件案子的意義已不僅僅是法律與被指控違法的那些人之間的法律爭論，更是一種力量的考驗，是一種正義與邪惡之間的較量。我告訴他們說，我們必要注意那些細節，而不是僅僅關注我們的律師這一法律技巧問題，還要考慮得更深更遠。抗議行動便隨之平息了。

當海倫·約瑟夫在法庭上的盤問和重新盤問結束後，法庭便開始審理第三號被告，也就是艾哈邁德·卡特拉達的案子。凱西的第二個證人是第四號被告，斯坦利·羅蘭（Stanley

Lollan）。他是有色人種大會執行團的成員之一。正當他爲凱西作證時，維沃爾德總理宣布了不久將解除全國緊急狀態。一方面，政府原本也不打算長期實行緊急狀態，另一方面，他們認爲實行全國緊急狀態已經卓有成效地鎭壓了爭取解放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律師也將回到本案。儘管我們還要在監獄中度過幾個星期，但聽到這個消息使我們感到如釋重負和一種徹底的解脫。我們被繼續拘禁了五個多月，在此期間，我們一直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堅持鬥爭。

我自己的法庭聽證會於八月三日舉行。通過幫助他人準備證詞，我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感到很有把握。在經過了三年的沉默、限制和國內流放之後，我一直期待着這一時刻，面對那些想要審判我的人，我將慷慨陳辭，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主張溫良恭儉讓的抗爭方式是我所作證詞的主要核心，我還強調了非洲民族議會堅持非暴力鬥爭的一貫主張。當時有這麼一個問題，即循序漸進的改良能否實現民主。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認爲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要求獲得普遍的成人選舉權，並準備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施加壓力來實現我們的要求。我們將以個人和組織的形式發起一系列的抗議運動和待在家裡的罷工，直到當局妥協。

並說：『先生們，法律必須得到尊重，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不願再看到待在家裡的罷工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咱們談判吧。』以我個人的看法，我會說：『對，我們談判吧！』當局又會說：『歐洲人目前還沒有作好準備接受一個由非歐洲人組成的政府來治理的國家。我們認爲應當給你們六十個席位，在非洲人中間選出這六十個人作爲非洲人在議會中的代表。我們準備把這事留待五年後解決，到那時再重新考慮這個問題。』法官先生們，我個人認爲這將意味着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場勝利。如果眞是如此，那我們就將爲非洲人獲得普遍的成人選舉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們將等待五年，到那時，我們還將取得更大的勝利。在這五年內，我們同意暫停一切不利於安定的行動。

當局決心已下，一定要證明我是一個大肆宣揚暴力的，危險極大的共產主義分子。儘管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分子，也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我決不願給人留下一種印象，認爲我在疏遠同共產黨的聯盟。儘管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的觀點會使我被重新投入大獄，但我仍毫不猶豫地強調了南非共產黨所給予我們的巨大支持。有一次，法庭向我提問，問我是否認爲一黨制的政府能保證在南非實行民主。

『問題不在於採取什麼形式，關鍵在於能否保證民主的實施。如果一黨制政府不能充分

保證民主的實行，那麼，我將認眞考慮是否採用這種形式。同樣，如果一個多黨制的政府能夠充分保民主的實行，那麼，我也將認眞考慮實行這種形式。比如說，我們這個國家目前所實行的多黨制，它對於所有的非歐洲人來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極端統治和殘酷無情的專制。』

在實行普遍的選舉權這個問題上，許多南非白人頗爲偏激，倫普夫法官也毫不例外地、頑固地持有這種偏見。每當他鼓吹這種偏見時，我便肝火上升，怒氣衝天。他們認爲擁有普遍選舉權的選民必須『教養有素』。而我認爲『教養有素』不僅僅意味着能寫會算，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會遠比那些學識淵博的人道德更高尙，更有教養。但要讓這些思維偏激而又固執己見的人明白這一點，簡直是對牛彈琴。

倫普夫法官：『在一個人民愚昧無知的國家裡，參與治理國家的價值何在？』

納爾遜·曼德拉：『其價值就在於人民爲自己的目的而投票。』

倫普夫法官：『他們是否毫無主見，會像聽話的孩子一樣對競選領導人言聽計從？』

納爾遜·曼德拉：『法官先生，是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在競選中，某個人大膽地站出來競爭某一方面的席位；他會爲此起草一份聲明並公開宣布：『這就是我的競選主

張。』；如果這是一個農業方面的席位，他就會提出自己的主張說：『我反對限制畜牧業的發展。』；聽了這個人的競選方針後，人們便自行決定如果選這個人進議會，他能否代表他們的利益；在此基礎上，人們投票選舉產生自己的候選人。文化水平的高低根本與此無關。』

倫普夫法官：『那個人只關心他個人的利益嗎？』

納爾遜·曼德拉：『人們關注的是那個人能否仗義直言並投他的票。』

我在法庭說，我堅信我們不用採取暴力行動，只要依靠人數上的優勢就能實現自己的要求。

『我們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我們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我們堅信，儘管歐洲人在我們面前設置了偏見與敵視的巨大障礙，但由於我們在經濟上施壓的策略擊中了他們的要害，他們決不可能永遠對我們提出的要求無動於衷。他們將對此作出反應。法官先生，他們正在對此作出反應。』

全國緊急狀態在八月的最後一天解除了。五個多月來，我們將第一次返回家鄉。當約翰

尼斯堡的人們聞知取消緊急狀態的消息後，紛紛湧上街頭要求釋放我們。當我們被解除監禁回到家鄉時，我們受到了親朋好友和家人們的熱烈歡迎。溫妮乘車遠道趕往普利托利亞，我們終於又歡愉地相聚了。五個多月來，我沒有擁抱過我的妻子，也從未看見過她的笑臉。五個多月以來，這是我睡在自己的床上度過的第一個夜晚。

能夠隨意地散散步，逛逛街，買份報紙看看，想說話就說，懶得張嘴就不用開口，所有這些對常人看似微不足道的自由自在，對我們這些倍受大牢煎熬的人來說，卻是一種極大的享受。

儘管緊急狀態已經解除，但審判仍然延續了九個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方告結束。在相當程度上，這段時間成了我們這些被告揚眉吐氣的日子。證人席變成了我們大膽宣傳非洲民族議會方針和政策的講臺。政府十分荒唐地堅持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想誘使當局採取暴力手段，從而使我們有理由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報復。羅伯特·里沙對此給予了強有力的駁斥。格特·西班德（Gert Sibande）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向法庭陳述了非洲農民所經受的深重苦難。德高望重的伊薩克·貝哈蒂（Isaac Behndy）已經是八十一歲高齡，他來自萊蒂史密斯，是非洲土著人傳教會的一名兼職傳道士。他當庭闡明了我們爲什麼要舉行待在家裡的罷工而不以武力相抗。

十月，令人敬畏的馬休斯教授被傳到庭作爲我們的最後一位證人。他站在證人席上，鎮定自若，像對待犯了錯誤的小學生一樣，教訓那些法官。他經常以這麼一種方式和口氣回敬那些已被征服了的法官。『你們的眞實目的不外乎想從我口中抓點把柄，並以此來認定我們的組織是主張暴力的。首先，你們所持的觀點大錯特錯了，其次，我也不會給你們留下口實。』

他以精妙絕倫、引人入勝的發言闡明了事實。他說，非洲人民深知溫良的抗爭將承受磨難，但還是選擇了這種方式，因爲他們珍視至高無上的自由，別無它求。他說，爲了掙脫剝削和壓迫，人民甘願經受最殘酷的磨難。馬休斯教授站在證人席上，以激昂的發言結束了辯護。當他結束法庭聽證後，肯尼迪法官同他握手致意，並表示希望今後局勢好轉的時候倆人再見面。

三十七

解除緊急狀態後，全國執行委員會於九月召開了秘密會議，研究討論我們未來的政策。我們也曾在審判期間召開過幾次會議，但這次會議卻是我們的首次正式會議。當局如臨大敵，慌忙調遣兵力，但他們對付的不是外患，而是內憂。在此嚴峻的形勢下，我們不會解散，我們將轉入地下鬥爭。我們將被迫停止非洲民族議會憲章所規定的一系列民主行動，不

能召開大會，不能召集各分部會議，也不能舉行公開集會。我們被迫建立了新的組織與各合法的機構保持聯繫。但是所有這些新建立的組織都是不合法的，這些組織的成員也會因此受到逮捕與監禁。執行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必須大大精簡以適應在不合乎法律的形勢下運作。根據形勢的需要，我們解散了非洲民族議會所屬的青年聯盟和婦女聯盟。所有這一系列的變化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對。但無論如何，我們是一個非法組織，這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對那些繼續參與運動的人來說，從事政治活動已不僅僅是要受點皮肉之苦，而是要冒被砍頭之危了。

儘管曼德拉－坦博律師事務所已經關門停業，餘下的帳目也已結清，我仍然盡我所能繼續從事法律工作。許多同行朋友都主動爲我提供辦公室、助手和電話。但在大多數的時間裡，我都是在艾哈邁德·卡特拉達的公寓裡辦公。儘管我不再受理案件，但我作爲律師的聲望卻並未降低。不久，公寓的起居室及室外的走廊裡都擠滿了委托辦案的當事人。凱西每次回到家中都會大失所望，他唯一能獨自靜靜地待上一會兒的地方就是廚房了。

在這段時間裡，我幾乎無暇吃飯，很少見到家人，一方面要在普利托利亞辦理我們自己的案子，另一方面還要火急火燎地處理其它案件。當我能踏踏實實地坐下來與家人共進晚餐時，電話鈴又會響個不停，我只好擱下飯碗，繼續奔忙。當時，溫妮又懷孕了，但她毫無怨言，表現出了極大的忍耐力。她多麼希望在她分娩時，丈夫能實實在在地陪伴在她身旁，可

是她並未如願以償。

在一九六〇年的聖誕節假期裡，我得知馬克加索（Makgatho）在川斯凱生病了。他當時正在那裡上學。於是，我不顧禁令的限制，馬上前去看望他。除了在途中加油稍作停留外，我馬不停蹄地開了整整一夜車。馬克加索需要手術治療，我決定帶他回約翰尼斯堡。於是，我又開了一整夜車，把馬克加索送到他母親的住處，然後我去安排他的手術。當回到家時，我發現溫妮已去醫院分娩了。我連忙趕到紀念醫院的非歐洲人就醫的側樓，發現他們母女二人早已安頓停當。剛剛出生的小女兒平安無事，但溫妮卻顯得極爲虛弱。

我給新生的女兒起名爲津齊斯維，與科薩族人民的桂冠詩人塞繆．穆哈伊（Samuel Maqhayi）的女兒同名。多年前，這位詩人曾給我以支持和激勵。這位詩人長期在外，四處奔波，回到家時發現妻子爲他生下了一個女兒。他根本就不知道妻子已經懷孕，因此，認爲孩子的父親不是他而是別的男人。按照我們的文化習俗，在女人分娩時，丈夫不能進入妻子所住的房間，妻子要被關在房內，十天內足不出戶。然而，此時此刻，這位詩人已經憤怒至極，早把這一習俗忘到了九霄雲外。於是，他氣衝衝地闖入房間。但當他仔細端詳這個女嬰時，發現她簡直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他連忙一邊退出屋子，一邊嘴裡說着：『你這個津齊斯勒。』意思就是『你是我的親骨肉』。於是，他就給女孩起名叫津齊斯維，這個詞也就是他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在指女性時的用詞。

三十八

公訴部門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陳述，其間經常被法官席上的高聲插話所打斷，指出其中的錯誤。到了三月份，輪到我們了。梅塞爾斯斷然駁斥了對我們的暴力指控。他說：『我們承認有不合作和不順從的問題，我們將十分坦率地說，如果不合作和不順從也構成嚴重叛國案的話，那我們是有罪的。但是，叛國法中根本沒有這麼一說。』

梅塞爾斯的申辯結束後，布拉姆·菲希爾接着也進行了申辯。但在三月二十三日，法官中止了布拉姆的最後申辯。我們尙有好幾個星期的申辯時間，然而法官們卻要求休庭一周。這是不合常規的，但我們卻認爲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跡象，因爲這表明法官們已經形成了他們的看法，六天後就將重新開庭進行裁決了。在此期間我還有不少的事。

休庭兩天後，對我的拘禁就該滿期了。但我可以幾乎肯定地說，警察是不會知道此事的，因爲他們很少關心拘禁何時到期。近十年來，我將第一次自由地離開約翰尼斯堡，自由地參加會議。準備了很長時間的全體代表大會將於周末在彼得馬里茲堡舉行。會議的目的是要爲召開南非的全國制憲大會製造輿論。我被秘密地安排爲會議的主要發言人，並要在發言的頭天夜裡驅車三百英里前往彼得馬里茲堡。

在我啓程的前一天，全國工作委員會秘密開會討論了我們的策略。在獄中和獄外召開了

多次會議之後，我們決定採用『曼德拉計劃』的策略，開展地下活動，我們的組織將以一種秘密的形式生存下去。會議決定，如果我們沒有被定罪的話，我將秘密地周遊全國，去籌備我們所設想的全國制憲大會，因爲當時只有完全從事地下活動的人才能擺脫敵人的限制，自由地活動。會議還決定我要在某些活動中公開露面，並希望能得到最廣泛的宣傳以此表明非洲民族議會仍然在戰鬥。對於這項建議，我既不感到意外，也不太情願，但是我知道我必須這樣去做。今後的生活會十分的危險，我將與家人分離。但是，當一個男人連過自己所信奉的生活的權利都沒了的時候，他就別無選擇地變成了一個亡命之徒。

當我開完會回到家的時候，溫妮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看我的表情她心裡就明白了，我將要開始一種我們都不願意的生活。我向她解釋了所發生的一切，並告訴她第二天我就要走了。但她聽後卻不以爲然，好像早已料到了一樣。對我要去做的事她是非常理解的，但還是很爲我擔心。我讓她收拾一下衣箱，給我裝上些衣服。我跟她講，我走後朋友和親戚們會來照顧她的，但我沒有告訴她我要去多長時間，她也沒問。也只能是這樣，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多久。星期一我將返回普利托利亞聽候對我們的裁決，但不管結果如何，我都回不了家了。如果我們被判有罪，我將直接進監獄；如果我們能被釋放，那我將要立即轉入地下活動。

我的大兒子泰默比在川斯凱上學，所以我沒能向他道別。但那天下午，我去奧蘭多東區

把馬克加索和我女兒馬克茲韋從她媽媽那兒接了回來。我們漫步在郊外的草原上，邊談邊玩，一起待了好幾個小時。我向她們一一道別，眞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見到她們。一個自由戰士的孩子也學會了不問父親過多的問題，但從她們的眼裡我可以看出，她們知道出大事了。

在家裡，我吻別了兩個女孩。當我和威爾遜·康科一起鑽進汽車時，還看見她們一直在向我揮手告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納塔爾之行。

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四百名代表雲集彼得馬里茲堡出席全體代表大會。他們分別代表着一百五十個不同的宗教、社會、文化和政治團體。三月二十五日是星期六。晚上，當我在前臺走出，出現在這些忠誠熱情的觀衆面前時，我已經有近十年的時間沒有在公開的講臺上自由地發言了。我受到了他們熱烈的歡迎，幾乎忘記了在這麼多人面前發表演講時的強烈感受。

在我的發言中，我呼籲召開一次全國大會，所有的南非人，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不論是印度人還是其它的有色種人，都將兄弟般地坐在一起，共同制定一部在總體上能反映出這個國家抱負的憲法來。我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我說，如果我們能用一個聲音講話的話，那我們將是戰無不勝的。

全體代表大會呼籲召開一個由全體成年男女在平等基礎上選舉產生出來的代表參加的全國大會，來制定一部嶄新的、不帶種族歧視的南非民主憲法。會議選出了一個由我任主席的全國行動委員會，負責將此要求轉達給政府。如果政府拒絕召開這樣一個大會的話，我們將從五月二十九日開始在全國舉行一次爲期三天的總罷工。五月二十九日正好是宣布成立南非共和國的日子。我對政府會同意我們的建議一事並不抱任何的幻想。

早在一九六〇年十月，政府就南非是否應成爲一個共和制的國家舉行過一次全部由白人參加的公民投票。擺脫在英布戰爭中同他們交戰的那個國家的束縛，是南非歐洲民主主義者長期以來的一個渴望成眞的夢想。結果，贊成共和制的觀點以百分之五十二的選票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勝利，並定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布共和國成立。我們準備在宣布共和國成立的那天舉行一次待在家裡的罷工，以表示這樣的一個變化對於我們來說只不過是裝裝門面而已。

會議結束後，我給維沃爾德總理發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正式地要求他召開一次全國制憲大會。我警告他，如果他拒絕召開這樣一個會議的話，我們將從五月二十九日開始舉行一次全國最大規模的爲期三天的總罷工。『我們對於你的政府可能採取的對策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在信中寫道，『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我們經歷了一個殘忍的獨裁時期。』我還發表了公開聲明，明確表示罷工將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待在家裡的罷工。維沃爾德沒有回

信，只是在議會中把我的信描述成是『傲慢的』。與之相反，政府正開始佈署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嚇人的一次武力炫耀。

三十九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期待已久的對叛國案的最後裁決的日子到了。一大早，法院還沒開門就有一大群支持者和新聞記者在門前擠着要進來。有好幾百人被趕走了，但是，當法官開庭時，旁聽席和記者席上仍然是座無虛席。在法官倫普夫敲過木槌後不久，公訴部門提出了一項特別請求，要求更改起訴書。然而，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一切都太晚了，都兩年了。法庭斷然駁回了這一要求，旁聽席上一片讚許之聲。『請安靜！』一個侍從高聲叫道。倫普夫法官接着宣布：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審判團已做出最後裁決。這時，法庭內鴉雀無聲，倫普夫法官用他那深沉而又平緩的語調宣讀了法庭結論。據查，非洲民族議會一直試圖以一種激進的完全不同的國家形式來取代現政府；非洲民族議會在抵抗運動期間使用了非法的抗議手段；某些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還進行了鼓吹暴力的演說，另外，從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西方和親蘇的態度上表明，在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中，有一種嚴重的左翼傾向。以上情況均屬實。

但是，根據向法庭提交的證據，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法庭不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非洲民族議會已經有了或已經採取了一個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策，即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訓練民衆，創造條件，採取直接的暴力行動來反對政府。

法庭宣布，起訴沒能證明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共產黨組織，或者證明自由憲章設想的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在長達四十分鐘的發言之後，倫普夫法官當庭宣布：『所有被告無罪，當庭釋放。』

旁聽席上暴發出了一片歡呼聲。我們都站了起來，互相擁抱，並向充滿了歡樂氣氛的審判庭揮手致意。我們一行人都走出法庭來到了院子裡，笑啊！樂啊！高興地流下了眼淚。看見我們出來了，人群中一片歡呼，大家放聲高唱。我們幾個把辯護律師抬到了我們的肩上，但這並非易事，因爲梅塞爾斯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照像機的閃光燈此起彼伏，把我們圍在了中間。我們四下環顧，在人群中尋找着妻子、朋友和親戚。溫妮過來了，我高興地緊緊擁抱着她。儘管我知道此時此刻我可能是自由的，但我卻品嘗不到那種自由的滋味。我們這些叛國案的案犯們都出來後，便和歡樂的人群一起唱起了歌。

經過四年多的法庭審理，先後有十多名起訴人，數千份的文件，數萬頁的證詞，但這次當局到底是失敗了。最後的裁決使政府在國內外都陷入了窘迫的境地。然而，這種結果只能

更加堅強當局反對我們的決心。在這件事上他們所記取的教訓不是冤枉了我們，而是對我們太仁慈了。

我並不認爲這個裁決就能證明這個制度是正當合法的，也不認爲這個裁決能證明一個黑人可以在白人法庭上得到公正的審判。這是一個正確而公正的裁決，但主要是由於我們有許多優秀的辯護律師和由這幾位法官組成的審判團明察秋毫的結果。

然而，法庭系統也許是一個非洲人能在南非得到公正審訊的唯一的地方，在那裡，法律準則還可能適用，特別是在由聯合黨任命的那些講英語的法官主持的法庭上尤其是這樣，不少法官還是以法律爲準繩的。

我上學的時候，老師就這樣教過我：南非是一個法律至上的國家，不論社會地位有多高，不論官職有多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時我對這種說法是深信不疑的，並在此基礎上設計過我的生活。然而，律師和社會活動家的經歷擦亮了我的眼睛。我看到在課堂上學的和在法庭上了解到的有很大的差距。過去，我用理想主義的眼光把法律看成是一支正義之劍，而現在我才認識到，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來按照他們的意志塑造社會的一種工具。我從不指望在法庭上會有公正，儘管我得到了它，也不論我是多麼努力地爲此而戰鬥，我始終是這樣地認爲。

在叛國案的審理中，那三名法官的所做所爲完全擺脫了他們的種族偏見、所受的教育和經歷的束縛。在這幾個人的身上有着良好的美德，他們先是藏而不露，然後又出人意料地顯示了出來。法官倫普夫表情冷漠，在整個審理過程中給人的印象是他與少數白人統治者的觀點是一致的。可是到了最後的關頭，正義的本質支配了他的判決。肯尼迪不像他的同事那麼保守，看上去似乎接受了種族平等的思想。例如有一次他和杜馬·諾克威同乘一架飛機從德班前往約翰尼斯堡，當航空公司的進城班車拒載杜馬時，他也拒絕上車。法官貝克總是給我一種坦率的印象，看上去似乎知道他面前的被告在當局手中吃過不少的苦頭。我讚許這三個人，並把他們看作是獨立的個人而不是法庭或政府的代表，更不是他們種族的代表。但是，他們是逆境中人類正派的典範。

然而這次使政府丟臉的失敗所產生的後果是，當局決定再不允許此類事情重演了。從那天起，他們將不再依靠那些不是由他們自己任命的法官了，不再理睬那些會保護恐怖分子的合法細節或是在監獄裡給罪犯某些權利了。雖然在叛國案的審理過程中沒有爲了套取情況而對當事人進行隔離、毆打和用刑，但是，所有那些不久之後便成爲了過去。

第六章　神出鬼沒的黑人英雄

四十

判決以後，我沒有回家，儘管其他人都懷着節日般喜悅的心情希望好好慶祝一下，但我知道當局隨時都會找我們的麻煩，我不能給他們任何可乘之機。我急於在被軟禁或被捕之前離開此地。那天晚上我在約翰尼斯堡的一間密室裡睡了一夜。那眞是一個在陌生床上的不眠之夜啊！我一聽到汽車聲就膽戰心驚，心想或許是警察來抓我的吧！

沃爾特和杜馬送我啓程，這次旅行的第一站是伊麗莎白港，在那兒我會見了戈萬·姆貝基（Govan Mbeki）和雷蒙德·姆漢拉巴（Raymand Mhlaba），討論了非洲民族議會新的地下組織的構成。我們是在馬斯拉·普拉瑟（Masla Pather）博士的家裡見的面。後來馬斯拉·普拉瑟博士因爲允許我們在他家裡見面而被判處兩年監禁。在地下組織爲我安排的密室裡，我會見了『自由伊麗莎白晨報』和『開普時報』的編輯，討論了要求召開全國制憲大會的運動，並與這兩家報紙取得了共識。接着我又與派崔克·鄧肯（Patrick Duncan）進行了交談。

他是『自由觀察家報』的主編和發行人，自由黨的創始人，也是反抗運動期間最先站出來詆毀運動的白人之一。他的報紙一直連篇累牘地在攻擊非洲民族議會所奉行的政策是共產主義政策。而當他見到我時告訴我的第一件事卻是，他讀了一份有關該叛國案的審訊記錄，這已經改變了他過去所持的成見，這種偏見將在他的報紙上得以澄清。

那天晚上，我舉行了一個演講會，與會的都是在開普敦非洲黑人區居住的牧師。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爲他們中間有一位牧師開場前的祈禱情景這幾年來時刻在我的眼前閃現，成爲激勵我與困難作鬥爭的力量源泉。他感謝上帝，感謝他的恩賜、他的仁慈、他的寬厚以及對全人類的關懷。他還冒昧地提醒上帝，他的某些臣民所受的蹂躪要比其它人多，但他有時候似乎顯得心不在焉。他說如果上帝不顯靈讓黑人擺脫苦難，黑人就只能靠自己的雙手去開創新的生活。阿門！

在開普敦的最後一個早晨，我在喬治·比克（George Peake）的陪伴下離開我居住的那家旅店。喬治·比克是南非有色人種組織的創始人。我專門去向該店的有色人種經理道謝，感謝他對我照顧得如此周到。他非常感激，但也很好奇，他已知道了我的眞實身份，還告訴我有色人種的群衆團體擔心在非洲人政權的領導下會同在白人政權的領導下一樣受壓迫。他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商人，可能與非洲人少有交往，因此他也像白人一樣害怕非洲人。這種擔憂在有色人種的社會團體中相當普遍，特別是在開普。儘管我已有些遲了，我還是向他解釋

了我們的自由憲章，並着重強調了我們決不搞種族歧視的承諾。一個自由戰士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向人民宣傳他的理想。

第二天，我在德班參加了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和大會運動聯合執行委員會的秘密會議，旨在討論是按計劃採取『待在家裡』的罷工行動還是採取正式的罷工行動，即組織工人糾察隊，上街遊行示威。那些贊同罷工的人說，『待在家裡』是我們一九五〇年以來就在使用的鬥爭策略，現在已不適用了。在一定的時候，泛非主義者大會要號召群衆，使用更多的武裝鬥爭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贊同另外一種觀點，即『待在家裡』的罷工，這既達到了同敵人鬥爭的目的，又防止了他們借題發揮還擊我們。我認爲人民對我們運動的信心確實增強，因爲他們意識到我們不會拿他們的生命當兒戲。我說，在沙佩維爾事件中，示威群衆表現得非常勇敢，但這也促使當局開槍對我們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屠殺。我提高嗓門又說，一切要搞遊行示威的英雄主義行爲就是讓敵人去屠殺我們的人民。儘管我明白全國人民對這種消極的鬥爭方式越來越不能容忍，但我還是贊成「待在家裡」。而且我不認爲沒有全面的計劃我們就可以偏離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策略，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那樣做。決定就是「待在家裡」。

做地下工作的人需要具備像地震一樣的應變心理，事無巨細都要精心準備，沒有什麼事

是一目了然的，凡事都要問個爲什麼。你不能就是你自己，你必須完全進入你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南非黑人在某些方面所不太適應的。在種族隔離政策的統治下，南非黑人的生活在合法與非法、公開與隱蔽之間蒙上了一層陰影。作爲南非黑人就是要懷疑一切，就像一個人終身都在從事地下工作。

我都變成夜貓子了，整個白天都待在窩裡，天黑了便竄出來工作。我的主要活動範圍是在約翰尼斯堡，但如果需要，我也出去旅行。我待在無人居住的公寓裡或群衆的家裡，只要那裡能一人獨處而又不被人懷疑我就住在哪兒。我是喜歡熱鬧的人，但更喜歡隱居，我陶醉於一人獨處去設計、思考、規劃。但人不能過於孤獨，我非常思念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幹地下工作的關鍵就是隱蔽。你想在房子裡顯得與衆不同，你就會有一定的姿式，舉手投足之間贏得別人對你的關注。同樣，你要使別人不懷疑你，你也要有一定的姿式。作爲一名領袖，他總是力圖追求鶴立鷄群，而作爲逃亡者卻得反其道而行之。在地下鬥爭期間，我走路不抬頭，站立不直腰，講話總是慢聲細語，很少慷慨陳詞。我變得越來越馴服，越來越謙虛。我不主動要求什麼而是設法讓別人告訴我做什麼。我不刮臉，不理髮，我經常化裝，經常把自己扮成一名汽車司機或一名花匠。我通常都穿藍色的工裝褲，這是農民的服飾，我經常戴着一副圓的無框架的眼鏡。我有輛小車，我頭戴司機帽，身穿工裝褲，僞裝成司機比較方便，我可以以替主人開車爲由外出旅行。

當逮捕我的通輯令發出，在我遭到警察追捕的最初幾個月裡，我這個在逃犯的存在激發了新聞界的想像力，許多報紙的頭版都登有發現我行踪的文章。全國各地都設了路障，但追捕我的警察卻屢屢無功而還。我被稱爲黑平珀奈爾（Black Pinpernel）。斯卡利特·平珀奈爾（Scarlet Pinpernel）是巴羅尼斯·奧齊（Baroness Orczy）筆下一個虛構的人物，平珀奈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勇敢地逃脫了追捕。

我秘密地遊遍全國。在開普我拜訪回教徒；在納塔爾我走訪製糖工人；在伊麗莎白港看望了工廠工人。我趁着黑夜在全國各地到處活動，出席秘密會議。我也曾帶上一些約值三個便士的硬幣到電話亭分別給各報社記者打電話，向他們通報我們正在準備幹什麼，或者嘲笑警方的無能，這更增加了黑平珀奈爾的神秘色彩。我一會兒在這兒冒出來，一會兒又在那兒冒出來，對此警方煩惱不已，而人民卻歡欣鼓舞。

有關我地下鬥爭經歷的故事，大都是演義而不準確的，人們對那些大膽行爲的傳說都愛添枝加葉。然而的確有很多次我都差點兒被捕（不過人們卻很少知道這些）。有一次，我正在城裡驅車而行時遇到了紅燈，我停下來向左邊一瞧，在旁邊的小車裡看到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安全局局長斯彭格勒上校。要是能抓到黑平珀奈爾對他來說那是天大的好事。我頭戴鴨舌帽，身着藍色工裝褲，架着那副眼鏡，他連我走的車道都沒瞧一眼，但綠燈閃亮前幾秒鐘的等待對我好像是幾個小時一樣難熬。

一天下午，我站在約翰尼斯堡街頭，一身汽車司機的打扮，穿着一件長風衣，戴着帽子，在一個街角裡等搭便車，這時我看到一個黑人警察有意識地大步朝我走來。我看看周圍，想抽身逃跑，但我還沒邁步，他卻對我笑了笑，並神秘地豎起大拇指向我行了個非洲民族議會禮，回身走開。像這樣的小事常有發生。看到我們擁有這麼多黑人警察的忠心，我頓時信心倍增。有位黑人警官經常向溫妮洩露警察們行動的秘密。他會悄悄地對她耳語道：星期三晚上馬迪巴千萬別待在亞歷山德拉，因爲這天警察要突襲這個地方。在鬥爭中黑人警察多次受到嚴厲的批評，但許多黑人警察仍然在暗地裡給我們以極其珍貴的幫助。

在我做地下工作期間，我盡可能不修邊幅，我穿的那些工裝褲看起來就像穿了一輩子似的。警察手中有我一張蓄着鬍鬚的照片，他們將那張照片印發到全國各地。同事們都建議我刮了它，而我對這一臉鬍鬚更加留戀了。我固執己見，對那些鼓動我刮鬍子的建議充耳不聞。

鬍子不僅沒有使別人認出我來，反而有時使我受到冷遇。一次，我按計劃去遠離約翰尼斯堡的某個地方參加會議，當地一位知名的牧師安排我在他的朋友那兒過夜。我來到門前還沒有來得及介紹我的身份，那位來開門的老夫人卻大聲喊道：『不，我們這兒不要你這樣的人。』接着就關上了門。

四十一

在地下工作期間，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策劃五月二十九日的『待在家裡』的罷工。政府與解放運動之間的實際戰爭正在迫近。五月下旬，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對反對派領導人進行突然襲擊，會議被禁止，印刷品被查封。議會很快通過了一個法規，允許警方隨便扣押被指控有罪的犯人達十二天之久並不准保釋。

維沃爾德宣稱：這些支持罷工的，包括那些同情罷工的新聞報紙都是在『玩火』。這一不祥的宣布暴露了當局的殘酷。政府敦促工廠爲工人們提供住宿，以便在罷工期間工人們可以不回家。罷工開始的前兩天，當局籌劃了南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一次武力炫耀，軍隊進行了自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征兵活動，警察取消了休假，武裝部隊控制了城鎮的交通要道，撒拉遜人的坦克在城鎮泥濘的街道上隆隆地碾過，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向人群俯衝驅散他們的聚會。晚上，直升機的探照燈向房屋照射。

在罷工開始的前幾天，英文版的報紙一直都在大量報導這次罷工活動。但是，就在『待在家裡』的罷工即將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所有的英文報紙都來了個急轉彎，勸人們去上班。泛非主義者大會充當了破壞者的角色，他散發了數以千計的傳單，告訴人們抵制『待在家裡』的罷工，並指責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是膽小鬼。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所做所爲使我們感

到震驚。就『待在家裡』的罷工提出批評我們可以接受，但企圖用呼籲人們去上班來破壞這種罷工只是正中敵人的下懷。

在罷工就要開始的前一天晚上，我計劃到索韋托一間密室裡會見非洲民族議會在約翰尼斯堡的領導人。爲了避開警察設置的路障，我們繞道未設巡邏隊的克利普頓（Klipton）進入索韋托。當我拐過一個急轉彎時，逕直撞在了我一直在力圖想避開的路障上，一個白人警察示意我停車，我穿着平時穿的那身工裝褲，戴着汽車司機的帽子。他通過車窗斜我一眼便朝前走去。仔細查看了我的車子。一般情況下，這是由黑人警察做的工作。查完車子他沒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便要看我的通行證，我對他說我錯把通行證丟在家裡了，就隨機背誦了一張根本不存在的通行證號碼，這似乎使他很滿意，他示意我把車開過去。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也就是待在家裡罷工的第一天，成千上萬的人們冒着失去職業和生計的風險不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工廠；在開普，數千名有色人種的工人待在家裡；在約翰尼斯堡，一半以上的雇員都足不出戶；伊麗莎白港的比率更高。我在對各新聞媒體稱讚人們對罷工的響應時用了『壯觀』這個詞，歌頌我們的人民對政府當局空前的威脅無所畏懼，白人對共和日的慶祝被我們的抗議聲所淹沒。

儘管『待在家裡』的罷工第一天的報導使人感到在全國各地的反映強烈，但就整個反映

而言比我們希望的要少。通訊不暢，壞消息似乎總比好消息來的快。當越來越多的報告傳來時，我對人們的反應感到失望，那天傍晚我感到情緒低落，脾氣暴躁。我與《蘭德每日郵報》的班哲明·波格倫德（Benjamin Pogrund）進行了交談，談話中我暗示非暴力鬥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待在家裡』罷工的第二天，在與同事們商量後，我宣佈『待在家裡』的罷工結束了。那天早上，我在白人居住區一個安全的寓所召見了國內外記者，再次稱『待在家裡』的罷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並沒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堅信新的時代正在出現。我說如果政府的反應就是赤裸裸地用武力來粉碎我們的非暴力鬥爭，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策略。在我的頭腦中，採取非暴力政策的時代即將結束。我知道這是一個鄭重的宣佈，我很清楚這一點。我受到了執委會的批評，他們批評我未經組織討論就擅自發表言論。但有些時候個人必須公佈自己的觀點以推動那個不太情願的組織走向你所希望的目標。

有關使用暴力的辯論從一九六〇年初就一直在我們中間進行，我首次討論武裝鬥爭可追溯到一九五〇年與沃爾特的那次談話。現在我再次同他交換了意見，我們同意非洲民族議會必須開始走一條新的道路。共產黨曾秘密建立地下組織，現在正考慮建立它自己的軍隊。我們決定由我在工作委員會上提出武裝鬥爭這件事。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一次會議上我提了這事。

我剛剛提出我的建議，共產黨總書記摩西·科坦尼，這位非洲民族議會組織中最具實力的人物便開始進行反擊，指責我的建議缺乏足夠認眞的思考，說我由於被政府的行動所挫敗而灰心喪氣，在絕望中求助於革命的辭藻。他強調說：『只要我們有豐富的想像力、足夠的決心，老方法仍然可行。但如果我們按曼德拉的建議那就是把無辜的人民推到了敵人的槍口之下。』

摩西苦口婆心地勸我。我看得出他已推翻了我的建議。連沃爾特也沒幫我說話。我只好做了讓步。後來在同沃爾特交談時，我訴說了我的受挫，責怪他沒有幫助我，他笑着說那如同和一個妄自尊大的獅子鬥一樣愚蠢。沃爾特是一個外交家，特別善於隨機應變。他說：『讓我安排摩西私下來見你，你可以向他說明你爲什麼要放棄非暴力政策。』我是搞地下鬥爭的，但沃爾特設法把我們倆人弄到一起。在那個鎭子上的一所房子裡我們長談了一整天。

我直言不諱，並闡明了我爲什麼相信除了轉向武裝鬥爭，我們別無選擇。我用了句非洲成語，空手與豺狼搏鬥，必定會大難臨頭。摩西是一位老牌共產主義者，我對他說他的反對意見就像在巴蒂斯塔領導下的古巴共產黨一樣，該黨堅持條件還未成熟，並等待它自己成熟，他們只是簡單的照搬列寧、史達林的書本上的定義。卡斯楚沒有等而是付諸於行動，所以他勝利了。如果你照本宣科，成熟的條件決不會出現。我直率地告訴摩西，他的思維還深陷在非洲民族議會作爲一個合法組織的舊的模式裡。人民已經自發地在組建自己的軍隊，有

能力領導他們的唯一組織是非洲民族議會。我們始終堅持認爲，群衆走在了我們的前面，現在他們確實走在了我們的前面。

我們談了整整一天，最後摩西對我說：『納爾遜，我不對你許什麼願，但你可以在行動委員會會議上再次提出這一問題，這樣我們就會見分曉。』會議安排在一個星期後舉行，我在會上再次提出了這一問題。這回摩西保持了沉默，會議一致認爲，我應當向德班的全國執行委員會提出這個建議。沃爾特只是笑了笑。

在德班舉行的執行委員會會議，像當時所有的非洲民族議會會議一樣，爲了避開警察都是秘密地在晚上舉行。我懷疑我會遇到難題，因爲盧圖利酋長將出席這次會議。我知道他道義上的承諾就是非暴力活動。在審訊『叛國案』時，我們曾爭辯說：非洲民族議會的非暴力行爲是一個不受侵犯的原則，不是一個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就可改變的策略，儘管我自己並不同意這種觀點。現在在『叛國案』事件剛剛結束不久就提出暴力鬥爭的問題時機不恰當，這也使得我在會議上小心翼翼。在我看來，非暴力鬥爭是種策略，在它不起作用時應主動放棄。

在會上，我爭辯道除了暴力活動外，當局並沒有給我們留下其它的選擇餘地。我說，讓人民受到當局的武裝攻擊而不允許他們選擇鬥爭方式是錯誤的，是不道德的。我再次提到人民已經自覺地拿起了武器，暴力活動將會開始，這並不取決於我們是否去發動它。難道我們

自己按照原則，向壓迫者進攻、拯救人民並引導這種暴力活動不是更好嗎？如果我們現在不走在鬥爭的前頭，我們很快就會成爲這場我們無法控制的運動的落伍者。

盧圖利酋長一開始就不同意我的辯解。對他來說，非暴力鬥爭不單單是一種策略。但是我們對他做了整整一個晚上的工作，我察覺出他心裡已經意識到我們是正確的。他終於贊同軍事活動是不可避免的。後來當有些人譏諷說也許是主席沒準備走這條路時，他反駁道：『如果有人認爲我是不抵抗主義者，就讓他試試看，那樣他就會知道他大錯特錯了。』

全國執行委員會正式贊同了工作委員會的最初決定。盧圖利酋長和其它人建議我們應該這樣對待這個新的決定，就權當非洲民族議會沒有討論過。他並不想損害我們那些未被禁止的聯盟的合法性。他的意見是，這個軍事組織是一個與非洲民族議會有聯繫的並完全受它控制的、單獨的獨立機構，鬥爭將會有兩條不同的方式。我們很快地接受了盧圖利酋長的建議。盧圖利酋長和其他人還告誡我們要防止使這一新階段成爲我們忽略非洲民族議會的基本任務和傳統的鬥爭方式的藉口。那樣做就是在拆自己的臺，因爲武裝鬥爭，至少在它的開始階段並不是整個運動的中心點。

聯合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計劃第二天晚上在德班舉行。其中包括印度人聯盟、有色人聯盟、南非工會聯盟、民主主義者聯盟。儘管其它的組織都習慣於執行非洲民族議會的決定，但我知道一些印度同事會極力反對走向暴力活動。

會議一開始就有一種不祥的預兆。盧圖利酋長主持大會。他宣佈：儘管非洲民族議會已認可了進行非暴力活動的決定，『但這畢竟事關重大，我傾向於今天晚上與會的同事們重新考慮這個問題。』顯而易見，盧圖利酋長並沒有完全順從於我們新的行動方向。

我們晚上八點開會。整個會議爭執不休，我始終按我一直堅持的觀點進行爭辯。許多人持保留意見。優素福·卡查利亞和奈克爾博士請求我們不要實施這一行動路綫，辯稱政府會因此屠殺整個解放運動。J·N·辛格是一位辯才出衆的辯論家，那天晚上的話一直在我耳邊回響。他說：『非暴力鬥爭並沒有拋棄我們，而我們卻已經拋棄了非暴力鬥爭。』我反駁道，事實上，非暴力鬥爭已使我們陷於失敗，這種鬥爭方式既不能阻止當局的殘暴，也不能改變壓迫者的心。

我們辯論了整整一個晚上，天亮前的幾個小時，我開始覺得，我們正在取得進展。許多印度人聯盟領導人都以一種低沉的語調談論非暴力鬥爭的結束。隨後M·D·那杜（M·D·Naidoo），一位南非印度人聯盟的成員突然冒出一句話，對他的印度人聯盟同事說：『噢，是你們怕去坐牢，僅此而已。』他的評論使整個會場大亂。當你對某個人的誠實表示出懷疑時，你肯定會遇到一場爭吵。整個辯論又陷入混亂，但到黎明時分做出了決定，所有聯盟都授權我着手組建一個新的獨立於非洲民族議會的軍事組織。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仍然是非暴力行動。我被授權由我選擇那些我想要的或工作需要的人和我一起共同創建這一組織，該組

織將不受非洲民族議會的直接控制。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五十年來，非洲民族議會一直將非暴力活動當成核心的原則，從未引起質疑和辯論。從此以後，非洲民族議會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非洲民族議會了，我們將開始走上一條新的、更加危險的道路，一條有組織的暴力活動的道路。對其結果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

四十二

我，一個從未當過兵、從未打過仗、從未向敵人開過槍的人，被委以創建軍隊的重任，這即使對一位老將軍來說也是一件困難的任務，更何況我是一位缺乏軍事素養的新手。這個新組織的名字就叫『民族之矛』，簡稱MK，我們之所以選擇矛這個名字，是因爲幾個世紀以來非洲人曾用這種簡單的武器抵抗了白人的入侵。

儘管非洲民族議會執行委員會不允許有白人成員加入，但民族之矛不受這種約束。我立即吸收了喬·斯羅夫和沃爾特·西蘇魯爲我們的成員，組成最高司令部，我擔任總司令。通過喬我們得到了白人共產黨員的支持，他們決心堅持暴力鬥爭，並且早就實施了破壞活動，諸如切斷政府電話和通信綫路。我們吸收了傑克·霍傑森（Jack Hodgson）爲成員。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斯普林布克·萊格恩（Springbok Legion）和拉斯提·伯恩斯坦（Rusty

Bernstein）這倆位共產黨員一同作戰。傑克成了我們的第一位爆破專家。我們的任務是開展反政府的暴力活動，至於這些活動究竟採取什麼形式尙未決定。我們的意圖是從對人民傷害最小而對政府破壞最大的行動入手。

我從我知道的唯一辦法開始，即向書本和專家請教。我想尋求的是開展一場革命戰爭應遵循什麼樣的根本原則。我發現就這個題目有大量的著作。我閱讀了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有關戰爭的文學作品，特別是有關游擊戰的作品。我想搞淸楚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適合游擊戰，如何建立、訓練、保存一支游擊隊，應該怎樣裝備，從哪兒得到給養以及所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

凡是有關這方面的知識我都很感興趣。我閱讀了古巴共產黨總書記布拉斯·羅卡（Blas Roca）的報告，該報告講述了在巴蒂斯塔統治時期他們作爲非法組織的歲月。在由德尼斯·賴茲（Deneys Reitz）所著的《突擊隊》一書中，我讀到了盎格魯——布爾之戰中布爾族將軍們的非常規游擊戰術；我讀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毛澤東、菲德爾·卡斯楚的著作及有關他們的著作。在埃德加·斯諾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我看到了正是毛澤東的決心和他非傳統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了勝利。我還閱讀了梅納查姆·比金（Menachem Begin）寫的《起義》一書，我爲以色列領導人比金在那既沒有山也沒有叢林地帶的國家帶領了一支游擊隊的事實所鼓舞，他們的情況與我們相同。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有關衣索比亞人

民抗擊墨索里尼及肯亞、阿爾及利亞、喀麥隆游擊隊的武裝鬥爭的情況。

我認眞回顧了南非的過去，研究了白人統治前後我們國家的歷史；探索了非洲人與非洲人、非洲人與白人、白人與白人之間的戰爭；調查了南非的主要工業區、國有運輸系統、通訊網；積累了詳細的地圖並系統地分析了這個國家不同地區的地貌特徵。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是我們的自由紀念日。這天，我在藏身處寫了一封信並投給了南非各大報紙，稱讚人民在最近這次『待在家裡』的罷工期間的英勇，再次要求召開全國制憲大會，並聲明如果當局不召開全國大會，我們將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不與政府合作的運動。我在信中寫到：

『我已獲悉，當局已對我發出了逮捕令，警察正在搜捕我。全國行動委員會非常認眞地斟酌了這一問題，建議我不要去投案自首。我已接受了這一忠告，我決不會向我不承認的政府去自首。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家都會意識到在我們國家目前這種狀況下，向警察自首過於天眞，只能是無謂的犧牲，這種做法是不足取的。

我寧願選擇這條更加艱難、危險的道路，也不願去坐牢。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妻子、兒女；不得不離開我的母親、姐妹，在我自己的國家裡像逃亡者一樣的生活；我不得不放棄我

的職業，就像我的許多同胞一樣過貧窮的生活。我將與你們一起並肩戰鬥，直到取得最後勝利。你打算怎麼做呢？是與我們站在一起還是與政府合作共同壓制你自己人民的要求與願望？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民族面臨着生與死時，你會繼續保持沉默和中立嗎？就我本人而言，我已做出了選擇，我不會離開南非，也絕不會投降。要贏得自由唯有經過艱難困苦、流血犧牲和戰鬥。我將以鬥爭爲己任，為了自由而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四十二

在轉入地下活動的最初幾個月裡，我先與住在市場大街的一家人一起生活了幾個星期。之後，我便搬到伯里亞（Berea），伯里亞是位於開普鬧市區以北幾英里外的一個寧靜的白人居住區。我與沃爾夫·科迪什（Wolfie Kodesh）同住在僅有一個房間的底層單身公寓裡。沃爾夫是《新世紀》周刊記者，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大會的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參加了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戰鬥。他的戰爭知識以及親身的戰鬥經歷對我非常有幫助。在他的建議下，我閱讀了普魯士卡爾·馮·克勞塞維茲（Karl von Clausewitz）將軍的經典著作《戰爭論》。克勞塞維茲將軍的中心論點是戰爭是另一種形式上的外交，這與我潛意識的思維相吻合。我閱讀的書籍要靠沃爾夫來提供。我總擔心我的到來約束了他的生活，影響了他的工作與娛樂休閑。但是，他是一個謙恭和藹的人，他從未抱怨過。

我在沃爾夫的公寓裡住了將近兩個月，床就是一張軍用擔架。白天拉上窗簾，待在屋裡看書或爲某項行動制定行動計劃。只有晚上爲了參加或召集某個會議時才離開這所公寓。每天早晨我都要攪擾沃爾夫，我通常五點起床，換上運動衣，在原地跑一個多小時的步。最終，沃爾夫順從了我的這種生活方式，也開始每天早晨與我一起鍛鍊身體，然後才離家到城裡去上班。

那時『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正在試驗如何引爆炸藥。一天夜裡，我和沃爾夫一起來到了郊外的一座舊磚廠去觀看引爆炸藥的示範表演。雖然這樣做很不安全，但我想參加『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第一次引爆試驗。通常引爆炸藥都是在磚廠進行，因爲許多工廠常常在挖土製磚前用甘油炸藥將土炸鬆。傑克·霍奇森帶來了一個裝滿硝化甘油的石蠟罐，並做了一個定時器。他將定時器放在了圓珠筆殼裡。那天天很黑，我們只有一盞很小的燈。傑克操作時我們站在一旁。當一切都準備停當後，我們向後靠了靠便進行三十秒的倒計數。只聽轟的一聲，泥土被炸掉了很多。爆炸成功了，我們都迅速地鑽進各自的車裡，驅車散開。

在伯里亞我感到很安全。那是白人居住區，如果我不到外面走動，警察大概也不會到想去那兒抓我。白天，在公寓裡看書時，我喜歡在窗臺上放一品脫奶讓它發酵。我特別愛喝這

種酸奶，科薩族人管它叫『阿瑪西』（amasi），並認爲這是一種有益於健康的營養食品。這種酸奶製作非常簡便，只要將它放在露天讓它自然凝固，它會變稠、變酸，有點兒像酸乳酪。在我的影響下，沃爾夫也躍躍欲試，不過他只嘗了一口，就酸得呲牙裂嘴。

一天晚上，沃爾夫回到家後，我們正在公寓裡聊天，我無意中聽到窗子附近有兩個人在說話。聽得出這是兩個年輕黑人在用祖魯語交談，但因爲窗簾是拉着的，我看不到他們的臉。我示意沃爾夫別出聲。

『爲什麼那個窗臺上放着我們愛喝的那種「酸奶」呢？』只聽其中一個人說。

『你說什麼？』另外一個回答道。

他說：『窗臺上放着「阿瑪西酸奶」，這種東西怎麼會放在那兒呢？』然後就沒有動靜了。我聽出了那個眼尖的年輕人所說的弦外之音是，只有黑人才會像那樣把奶放在窗臺上，但黑人爲什麼會住在白人區呢？那時我才意識到我必須搬走了。第二天夜裡，我離開了沃爾夫的公寓，搬進了另外一個藏身之處。

我暫時住在約翰尼斯堡的一個醫生家裡。白天在醫生的書房裡工作，夜裡則睡在爲僕人準備的房間裡。每當白天有人來到這所住宅，我就飛快地跑到後院，裝作花匠。隨後，我又在納塔爾的一個甘庶種植園待了大約兩個星期，那個種植園就在德班海岸上游。我與一群非

洲工人和他們的家人一起住在一個叫通加特（Tongaat）的小社區。我住在該社區的一家旅店裡，扮作一個農業示範員，遵從政府的命令來這裡對土地進行評估。非洲民族議會已爲我配備了示範員應有的工具，每天我都用一部分時間來測試土壤或做試驗。儘管我對於做這些事情一竅不通，但也並不認爲我這是在胡弄通加特人。不過，這些大部分都是種植園工人，不管男女生性拘謹，甚至當他們看到晚上有人坐着車來找我，其中有些人還是當地有名的政治家的時候，也從不過問我的身份。我常常整夜開會，白天便睡覺。一般來講，農業示範員可不是這樣的。儘管我正在忙於其它事情，對這個社區我仍感到有一種親切感。星期天我常常去做禮拜，我醉心於這些猶太基督教牧師那種敲擊聖經的古老風格。在我即將離開這裡的時候，我去感謝一位老人對我的關照。他說：『當然你在這裡是受歡迎的，不過，奎德尼（Quede ni）（這是我從事地下活動時的化名），請你告訴我們盧圖利酋長想要幹什麼？』我嚇了一跳，但是我還是敏捷地答道：『嗯，最好去問他自己，我無法替他回答。不過我覺得他是想幫助我們收回自己的土地，讓我們的酋長們擁有他們曾擁有過的權力，使我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過上我們渴望得到的生活。』

『如果沒有軍隊，他打算怎樣做到這些呢？』老人說。

我眞想告訴他我們正爲組建一支軍隊而奔忙，但是我不能說。我爲老人的情緒所鼓舞，同時也爲我來這兒的眞實目的已被別人覺察而感到緊張。因爲我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又太久

了。第二天我便像來時一樣悄悄地離開了這個地方。

四十四

我的下一個住處更像是一個避難所，那就是瑞沃尼亞（Rivonia）的百合花農莊（Liliesleaf），它位於約翰尼斯堡具有鄉土氣息的北郊。我是十月份搬到那兒去的。當時瑞沃尼亞只有一些農莊和出租的農田。非洲民族議會已買下了農莊的住房及田產，以便讓那些從事地下活動的人能有一個安全的棲身之處。那是一幢無人居住、需要修繕的舊房子。

我以看房子爲由搬了進去，說要在主人搬進來之前替他看管這幢房子。我化名爲大衛·莫特薩瑪依（David Motsamayi），這是以前我一個當事人的名字。我穿着黑人男僕常穿的簡樸的藍色工裝褲制服。白天，房子裡到處都是人，有建築工人也有油漆匠，他們正忙着維修農莊的正房，同時還要擴建偏房。我們想再修建幾間小住房，以便能住下更多的人。這些工人都是亞歷山德拉黑人區來的非洲人。他們稱我爲僕人或伙計（他們從未有人勞神打聽一下我叫什麼名字）。每天我爲他們準備早飯和上、下午的茶點，他們也派我去爲農莊做些跑腿的差事，要麼就指使我掃地或清除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訴他們茶點準備好了，放在廚房裡。工人們進來後，我端着裝滿杯子、茶、奶和糖的托盤，依次爲他們送過去。他們每個人拿了一個杯子，自己取糖、茶或奶。我

端着盤子走到了其中一個人的身邊，當時他正在給同伴講故事。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講故事而不是喝茶上，因此他邊講故事邊拿着匙子比比劃劃，忘記了取糖。我在那裡站了足足有好幾分鐘。最後，我惱怒地走開了。這時他才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他氣勢洶洶地說：『小子，回來。我還沒允許你走呢。』

曾有人把非洲社會描繪成這樣一幅美妙的圖畫，即在非洲社會人人平等。總的來講，我同意這種說法，但事實上並非所有非洲人都能彼此平等相待。隨着城市的工業化，對於白人社會來講毫無新奇可言的『地位』這兩個字眼已經進入了城裡非洲人的頭腦。對於那些工人來講，我便是一個卑賤的僕人，一個根本沒有職業的人。因此，他們很看不起我，對我不屑一顧。我把僕人的角色演得微妙微肖很成功，沒有人懷疑我根本就不是什麼僕人。

每天日落時分，工人們便收工回家，從傍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整個農莊裡只有我一個人。我很珍惜這段寧靜的光陰。但是，大部分晚上我得離開農莊去其它地方開會，一直到半夜才能回來。在夜深人靜時回到這樣一個我並不熟悉而且是以化名非法藏身的地方，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安。我記得有一天夜裡把我嚇了一跳，我以爲有人藏在灌木叢裡。儘管我去查看了，但什麼也沒發現。從事地下活動的自由戰士很少能睡個安穩覺。

幾個星期後，雷蒙德·姆漢拉巴從伊麗莎白港搬到了農莊。雷是一個堅定的工會主義者，是開普執行委員會委員，南非共產黨黨員。他是反抗運動中第一個被逮捕的非洲民族議

會領導人，也是由非洲民族議會選定的第一批參加『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成員。他是和另外三個人爲啓程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軍事訓練到這裡來做些準備工作的。我們又接上了沃爾特一九五二年建立的聯繫。雷和我在一起待了兩個星期，他使我更加掌握並了解了非洲民族議會在開普東部地區所面臨的問題。我寫『軍事之矛』軍事組織章程時也得到了他的幫助。喬·斯羅夫和拉斯提·伯恩斯坦也來到了農莊，他們也幫助起草了章程。

雷蒙德離開後，邁克爾·阿梅爾又來這裡住了幾天。邁克爾是地下共產黨的關鍵人物，民主主義者大會的創始人，《解放》雜誌編輯。他是一位出色的理論家，正在製訂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他需要一個既安靜又安全的地方以便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

白天，我和邁克爾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爲一個有職業的白人與一名非洲家奴正正規規的在一起談話似乎是一件很令人費解的事。但是到了晚上，在工人們離開後，我們常常就共產黨與非洲民族議會間的關係進行長談。我一個人待在農場的時候，我總是把所有的門都鎖上，燈關掉。我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因爲一名黑人半夜開車在瑞沃尼亞出租的田地裡行駛會招致令人討厭的盤問。一天晚上，我開完會後很晚才回到農場。我看到屋子裡的燈都開着，我走近房子時，聽見屋裡的收音機開着，聲音放的很大，前門大開着，我走進去看見邁克爾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我對這種不顧安全的行爲大發雷霆。我叫醒他說：『老兄，你怎麼能開着燈、開着收音機睡覺！』他喝得醉熏熏的，對我叫醒他很生氣，說：『你一定要攪擾

我的好覺嗎？有什麼事難道不能等到明天再說？』我說，不行，這是事關安全的大事。我批評他不該粗心大意。

此後不久，亞瑟·戈德里奇（Arthur Goldreich）和他的家人搬進了農場的正房，我則住在新蓋的客房裡。這個農場歸在亞瑟的名下，他的存在成了我們活動的保護傘。亞瑟是一位藝術家，從事設計工作，也是民主主義者大會成員，民族之矛軍事組織創始人之一。警察還沒有掌握他在從事政治活動，他以前也從未被審訊或遭到突然搜查過。五十年代，他曾與巴勒斯坦猶太人民族運動組織的軍隊一起戰鬥過。他懂得游擊戰，這填補了我的許多有關戰爭知識的空白。亞瑟是一個活躍分子，他的出現給農莊帶來了歡樂的氣氛。

對於農莊裡的人，在這兒我還想提一筆的是傑利曼（Jelliman）先生。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白人，是非洲民族議會的老朋友。他退休後來農場當了工頭。傑利曼先生從色庫庫尼帶來幾個年輕的工人，這個地方很快便與南非其它地方的農莊沒有什麼兩樣了。傑利曼不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但他忠誠、謹慎、工作努力。我常常爲他準備早餐、晚餐，他對我一直彬彬有禮。傑利曼曾冒着生命危險，冒着失去生計的危險義無反顧地幫助過我，這是後話。

在農場裡我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我妻子與家人來看望我的時刻。自從戈德里奇一家搬進農場後，溫妮總是周末來看我。我們對她的行動非常謹慎，總是先由一個司機開車把她送到

別的地方，然後再換一個司機，最後她自己開車帶着孩子盡可能繞路到農場。那時警察還沒對她盯梢。

每逢這樣的周末，時間似乎凝固了。對於這種小心翼翼的片刻團聚，我們都心照不宣，就把這當成是我們正常的生活而不是例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百合花農莊我們比在家單獨相依相伴的時間還要多。在這兒孩子們可以到處跑着去玩，儘管光陰短暫，我們也能靜靜地領略這世外桃源的景色。

溫妮把我在奧蘭多的舊氣槍帶了來，我和亞瑟常常用它練習射擊或在農場裡打野鴿。一天，我在農場前院的草坪上瞄準了高高棲在樹上的一隻麻雀。亞瑟的妻子黑茲爾·戈德里奇（Hazel Goldreich）望着我開玩笑地說我永遠都不會打中目標。但是她的話音未落，被我打中的麻雀就掉在了地上。我剛要轉身向她炫耀自己，只見戈德里奇大約五歲的兒子保羅兩眼含淚地轉向我說：『大衛，你爲什麼要打死那隻鳥，它的媽媽會傷心的。』此刻我爲剛才的洋洋自得而感到羞愧難當。我覺得這個孩子遠比我更懂得人情味。對於一個正在組建游擊隊的領導人來說，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感覺。

四十五

在製訂民族之矛的鬥爭方向及要採取的相應鬥爭形式時，我們考慮到了四種暴力活動，

即破壞活動、游擊戰、恐怖主義和公開的革命。對於一支缺乏經驗的小軍隊來說，公開革命是不可想像的。恐怖主義又不可避免的會對那些使用這種手段的組織產生副作用，即削弱它本來可能會得到的公衆支持。游擊戰倒是切實可行，不過，鑒於非洲民族議會一直不願意與任何武力活動沾邊，我們選定了那種給人以最小傷害的暴力活動，即破壞活動。

破壞活動不會造成人員傷亡，這爲以後種族間的和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我們不想引發白人與黑人種族間的仇殺。英布戰爭距今已有五十年了，但南非荷蘭人對英國人仍懷有很深的敵意。如果我們挑起內戰，白人黑人間的種族關係又該是一種什麼狀況？破壞活動的另一個好處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們的戰略是有選擇地襲擊軍事設施、電站、電話綫、運輸綫以及那些不僅能妨礙當局軍隊戰鬥力而且能嚇唬國民黨的支持者、嚇走外國投資者、削弱經濟的目標。我們希望借此使政府回到談判桌上來。我們嚴令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成員行動時不得傷害無辜。但是，如果破壞活動的效應達不到我們預期的結果，我們就準備採取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即游擊戰和恐怖主義。

民族之矛的組織結構體現了非洲民族議會的編制。上設全國最高司令部，各省設地區司令部，省以下設地方司令部和基層組織。我們在全國各省都建立了地區司令部，像開普東部這樣一個工區就有五十多個基層組織。最高司令部決定戰術和總的目標，掌管訓練和財政。

在最高司令部製訂的大框架下，地區司令部有權選定本地區準備進攻的目標，嚴禁所有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成員執行任務時攜帶武器，並決不允許傷害無辜者的性命。

我們最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使組織成員既要忠於民族之矛也要忠於非洲民族議會。我們民族之矛吸收的成員大部分都是非洲民族議會各支部的活躍分子，但是我們發現這些人一旦爲民族之矛軍事組織工作，他們就不再做非洲民族議會分部分配給他們的工作了。分部書記常常發現一些人不再來參加會議，有時他走到一個人身邊問：『老兄，昨晚你爲什麼沒來開會啊？』那個就說：『啊，我去開另外一個會了。』

『開的什麼會？』書記說。

『噢，我不能說。』

『難道你不能告訴我嗎？我是你的書記。』書記常常會很快發現他支部的人員的忠心又分給了另一個組織。經歷了最初的這些誤解，我們決定如果要吸收非洲民族議會當地支部的成員，一定要讓該支部的書記知道他手下的某某現在在爲民族之矛工作。

十二月份一個暖融融的下午，我正坐在百合花農莊的廚房裡，突然聽到收音機裡播送盧圖利酋長在奧斯陸的頒獎儀式上被授予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南非政府已給他簽發了十天的簽證允許他離開南非去奧斯陸領獎。我和大家都非常高興。畢竟，這是對我們的鬥爭的承

認，是對作爲這場鬥爭的領導者、作爲一個男子漢的盧圖利酋長所取得的成就的承認。它表明西方國家已承認我們所進行的鬥爭是正義的事業。很久很久以來，那些大國一直忽略了這一點。諾貝爾和平獎是對種族主義政黨及成員的冒犯，他們的宣傳機構曾把盧圖利勾畫成共產主義集團最危險的鼓動家。南非荷蘭人啞口無言，對於他們來說，授予盧圖利和平獎是西方自由主義分子反覆無常的又一次表現，是對南非白人存有偏見的又一次表現。宣佈授予盧圖利和平獎的那一年正恰好是當局嚴禁他五年內不得離開納塔爾地區的第三年。那時他身體虛弱，心臟不好，記憶力也很差，但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使他感到很高興，我們大家也都很高興。

這項榮譽來的時機不對。因爲我們即將做出一項聲明，這似乎是對獲獎本身的懷疑。盧圖利從奧斯陸領獎回來的當天，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戲劇性地宣告成立。按照民族之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在十二月十六日丁加尼節這一天的早晨，自造的炸彈在約翰尼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的政府辦公室、電站爆炸了。由於疏忽大意，我們的一名成員在爆炸中獻身了。那是民族之矛犧牲的第一位戰士。在戰爭中犧牲是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個加入民族之矛的人都清楚他被派去執行任務就可能會犧牲自己的生命。

爆炸的同時，我們在全國散發了幾千份傳單宣告了民族之矛的成立。

現今的民族之矛部隊執行對政府設施的襲擊，特別是對與種族隔離政策和種族歧視相關設施的襲擊。民族之矛是一個由非洲人組成的新的獨立組織。它的軍隊裡有各個種族的南非人。它將採用新的方式爲自由、民主而戰。爲了完成民族解放運動，這些方法是必要的。

每個國家歷史上都會有這樣一個時刻，現在南非就面臨着這樣一個時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屈服要麼戰鬥。我們不會屈服，我們別無選擇。爲了保衛人民，保衛未來，保衛自由，我們將力所能及地用一切手段予以反擊。

如同解放運動一樣，我們民族之矛軍事組織一直在尋求一種能避免流血、避免國內衝突的方式獲得解放。即使現在，我們仍然希望我們最初的行動能使所有人都意識到民族主義政策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局面。我們希望我們能敦促政府及其支持者在局面不可收拾之前恢復理智，促使政府及其政策得以改變，以致於避免內戰。

我們選定十二月十六日丁加尼節這天行動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將這一天定爲丁加尼節，慶祝在一八三八年的血河之戰中打敗了偉大的祖魯族首領丁加尼。那時薩卡的同父異母兄弟丁加尼統治着非洲林波波河以南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那天布爾人的槍彈齊發，祖魯人的標槍無法抵禦，他們的鮮血染紅了附近的河水。南非荷蘭人在十二月十六日這天慶祝他們打敗非洲人的勝利，顯示上帝是在他們一邊。我們選定十二月十六日行動，表示非洲人只是

剛剛開始戰鬥，顯示我們不僅擁有正義，我們還擁有炸藥。

爆炸事件使政府大吃一驚。他們一方面指責我們的破壞活動是犯了滔天大罪，一方面又嘲笑我們的破壞活動只不過是愚蠢的兒戲。爆炸也震動了南非白人，他們意識到他們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則認識到，非洲民族議會不再是一個消極的抵抗組織，而是將要刺入白人政權心臟的一柄利劍。兩個星期後，在除夕那天我們又策劃並執行了一系列爆炸活動。鐘鳴聲、警笛聲交織在一起，這聲音聽起來似乎是在宣染新年的和諧，也像徵着為自由而鬥爭的新時代的到來。

民族之矛激起了政府凶惡、殘忍的反擊，其規模之大是我們前所未見的。現在警察局特務機關的首要任務就是追捕民族之矛成員，為此他們將不遺餘力。我們已向他們表明：我們將不能再不採取行動；他們則向我們表明：他們將鏟除威脅他們生存的一切事物，沒有什麼能阻擋他們這樣做。

四十六

當溫妮來看我時，我總覺得不管這是多麼短暫，這個家總還是完整的。但是由於警察提高了警惕，溫妮來看我的次數比以前少了。溫妮常常帶津齊（Zinzi）和澤尼（Zenani）來瑞沃尼亞，不過那時他們太小，不知道我是在躲藏。馬克加索（Makgatho）那時十一歲，

已經夠大了。我們告訴他千萬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洩露我的眞實姓名。我能看出來他決心以他自己的方式把我的身份當做一個秘密來保守。可是，快到十二月底的一天，他在農莊裡與亞瑟十一歲的兒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奇一起玩耍。溫妮給我帶了一本《鼓聲》雜誌來。馬克加索和尼古拉斯玩耍時，那本書絆了他們一下。他們開始翻看那本書，突然馬克加索翻到我從事地下活動前拍攝的一張照片那兒停住了。他高聲叫道：『那是我爸爸。』尼古拉斯不相信他的話。他的懷疑使得馬克加索更想證實這是千眞萬確的。馬克加索告訴他的朋友，我的眞名叫納爾遜·曼德拉。『不，你爸爸叫大衛，』尼古拉斯回答道。隨後，孩子跑到他媽媽身邊問我是不是叫大衛。她回答說：『是的，他是叫大衛。』尼古拉斯向他媽媽解釋說，馬克加索告訴他他的爸爸眞名叫納爾遜。這番話把黑茲爾嚇了一跳。我很快也知道了這一疏忽。我又一次覺得我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太久了。不過這一次我沒有馬上離開，因為再過一個多星期，我即將奉命去我嚮往的一些國家完成一項任務。這將是我第一次因為鬥爭的需要而出國。

十二月份，非洲民族議會收到了東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的邀請，出席一九六二年二月在阿迪斯阿貝巴召開的會議。東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以後又改稱非洲統一組織。該組織的目標是把非洲獨立國家聯合在一起，促進非洲大陸的解放運動。這次會議是非

洲民族議會與其它國家交往的重要機會，是爲民族之矛爭取道義、資金、訓練方面援助的第一次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

地下的執委會要我帶領非洲民族議會代表團去出席這次會議。儘管我想去看看其它非洲國家是個什麼樣子，也想拜見非洲大陸的自由戰士，但我擔心這樣會違反我的諾言，我曾發誓不離開這個國家，要堅持地下鬥爭。我的同事，包括盧圖利酋長堅持要我去，並堅持要我開完會後立即返回。我決定成行。

我這次非洲之行的使命不僅僅是出席這次會議，我也要爲新成立的軍事組織籌措政治、經濟援助，而更重要的是爲該組織的成員在盡可能多的非洲國家安排軍事訓練，還要提高我們在非洲國家中的知名度。在這些國家，人們對民族之矛軍事組織還很陌生。泛非主義者大會已經發動了宣傳攻勢，我也被授權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開展我們的宣傳。

啓程前，我秘密驅車前往格勞特維爾（Groutville）與盧圖利酋長交換意見。我們是在城裡一所密室裡會面的，這次會面使我很困窘。正如我以前所述，民族之矛軍事組織創立時，盧圖利酋長是在場的，我也向他及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各位委員通報了該組織的進展情況。但他身體不好，記憶力也大不如從前。他斥責我不曾與他商量組建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我試圖使他回想起我們曾在德班討論過使用暴力的問題，但無濟於事，他想不起來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傳這樣一種說法的根源，即不曾有人通知盧圖利酋長說要建立民族之矛軍事

組織，盧圖利酋長非常反對非洲民族議會使用暴力。但事實終歸是事實。

出發前一天晚上，我和溫妮住在開普北郊一個白人朋友家裡。她爲我拿來了一個裝好衣物的新手提箱。溫妮爲我就要離開南非而感到焦慮不安，但她表面上仍然若無其事，她表現得像一個妻子，但更像一名戰士。

非洲民族議會以該組織一個白人朋友的名義包租了一架飛機，我將乘此包機自約翰尼斯堡飛往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然後再從達累斯薩拉姆乘班機到阿迪斯阿貝巴。原計劃是讓沃爾特、卡特拉達以及杜馬·諾克威與我在索韋托的一個秘密集合點會合，並把我此次旅行需要的證件帶來。這也是我離開南非前最後一次磋商的時刻。

艾哈邁德·卡特拉達按時抵達了集合地點，但沃爾特和杜馬卻遲遲未到。最後，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凱西設法找到了一名司機，由他開車把我送到貝專納蘭，我在那兒搭乘班機。後來我才聽說沃爾特和杜馬在來與我會合的路上被捕了。

去貝專納蘭的一路上心裡很難受。由於怕被警察抓住，加上又是第一次越過自己國家的邊境，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們的目的地是靠近南非邊境的洛巴策（Lobatse）。我們順利地通過了邊境，傍晚時分到達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有一封自達累斯薩拉姆發來的電報，通知我行程延期兩周。

那天下午我拜見了貝專納蘭人民黨主席莫特斯特。該黨主要是由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組成的。現在我意想不到地有了空閒時間，我把這些時間用來讀書，準備大會發言或在城外美麗的荒山上狩獵。儘管我住的地方離我自己國家的邊境不遠，但我覺得好像置身於一片奇異的國土上。馬克斯·姆勞耶尼（Max Mloyeni）是在川斯凱的一個朋友的兒子，他是一名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他常常來陪伴我。我們碰到了各種各樣的動物，好像是在狩獵遠征，其中包括大群的狒狒，我追趕了一段，很欣賞他們那種像軍隊一樣的組織和行動。

很快喬·馬修斯也從巴蘇陀蘭趕來了。我堅決主張我們應該迅速趕往達累斯薩拉姆。最近南非警察在洛巴策綁架了一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我覺得越早離開這兒越好，他們爲我們安排了一架飛機。第一站是貝專納蘭北部一個叫卡薩恩（Kasane）的小城，它位於四國邊境交匯點的附近，這四個殖民地國家當時叫貝專納蘭、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西南非洲。卡薩恩的簡易機場上到處都是水，我們只好在幾英里外灌木叢中一個較乾燥的簡易機場上降落。當地一家旅館的經理背着槍來接我們，他說他被一群凶猛的大象耽擱了。他開着一輛敞篷車，我和喬坐在後面，我看見一頭獅子懶洋洋地從灌木叢中走了出來，我頓時覺得家鄉約翰尼斯堡的街區彷彿遠在天邊。我第一次置身於只存在於神話傳說中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啓程前往位於北羅德西亞邊境附近的一座坦桑尼亞小城——姆貝亞（Mbeya）。我們在接近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的地方飛行，然後朝北穿過山

脈。飛越山脈時，飛行員試圖與姆貝亞取得聯繫，但是無人回答。飛行員不停地對着麥克風喊：『姆貝亞，姆貝亞！』天氣變了，山上到處都是氣團，我們飛過雲霧時，飛機就像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浮漂一樣上下顛簸。在絕望中，飛行員降低了高度，沿着一條彎曲的小道飛越山脈。這時，霧太大了，我們已無法看到那條路。飛行員將飛機突然一轉，我意識到我們差點就撞到一座山上，這座山好像是從哪兒蹦出來似的。緊急警報消失了。我記得我自言自語道：『我們完了。』、甚至連一向健談的喬也一言不發。正當我們在雲層裡無法看得再遠，我想我們就要與山相撞時，我們從壞天氣裡飛了出來，進入了陽光明媚的天空。我從來就不太喜歡飛行，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飛行經歷，但有時我善於表現得很勇敢，假裝毫不在乎。我們在當地一家旅館裡登記住宿時，看見一群白人、黑人坐在走廊上溫和地交談。以前我還從未碰到過不對有色人種歧視、隔離的公共場所或旅館。我們正在等候坦桑尼亞非洲國家聯盟的姆瓦康格爾（Mwakangale）議員，他曾打電話找過我們，但我們不知道這個情況。一個非洲客人走到一名白人接待員面前指着我們問道：『小姐，姆瓦康格爾先生問起過這兩位先生的情況嗎？』『對不起，先生。』她回答道：『他問起過，不過我忘了轉達他的問話。』『請細心點，小姐。』他用禮貌但堅決的口吻說。『這兩位是我們的客人，我們希望他們得到良好的服務。』此時我這才眞正意識到，我是置身在一個由非洲人統治的國度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爲一個自由人。儘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我仍是一個逃亡者、通緝

犯，但在這裡我如釋重負。不管我走到那裡，我的膚色自然而然地爲人們所認可，而不是立即受到辱罵。第一次人們不是以膚色而是以智能和品質評判我。儘管我旅行期間常常想家，但我覺得在這兒才好像是第一次眞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們抵達了達累斯薩拉姆。我拜見了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Nyerere），他是這個新獨立國家的第一任總統。我們的談話是在他那一點都不豪華的住宅裡進行的。我記得他自己駕駛一輛樸素的奧斯汀小車，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爲這表明他是人民的一員，與住在宮殿裡、擁有勞斯萊斯轎車的南非班圖斯坦領導人大不相同。尼雷爾一直認爲，社會等級不適合於非洲，社會主義才是土生土長的。

我向尼雷爾講述了我們國內的形勢，最後請求他們的援助。他是一個精明、說話中聽的人，對我們代表團懷有好意。但是，他對形勢的理解使我吃驚，令我沮喪。他建議我們等到索布克威（Sobukwe）出獄後再進行武裝鬥爭。在以後的許多場合我都聽說了泛非主義者大會向非洲其它國家的這種呼籲，但這是第一次。我向他描述了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弱點，爭辯說從總體上看推遲武裝鬥爭就是倒退。他建議我去求助於海爾·塞拉西皇帝，並答應給我引見。

我本打算在達累斯薩拉姆與奧利弗會面，但是，由於我來遲了，他未能等到我。他給我留下一張字條，要我到拉哥斯去找他，他要在那裡出席獨立國家拉哥斯會議。在飛往阿克拉

（Accra）的途中，我遇見了海米·巴斯納和他的妻子。巴斯納曾是我的雇員。有人爲他在阿克拉提供了一個職位。他的自由主義活動使他在南非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正在迦納尋求政治避難。

飛機停在了喀土穆，我們排隊等候海關檢查。喬·馬修斯是第一個，然後是我，再往後就是巴斯納夫婦。我沒有護照，只有坦桑尼亞政府出具的一份簡單證件，上邊僅僅寫着：『這是納爾遜·曼德拉，南非共和國的公民，坦桑尼亞政府允許其離開並返回坦桑尼亞。』我將這張證件遞給移民櫃臺後一位上了年紀的蘇丹人。他微笑着抬起頭來看着我說：『我的孩子，歡迎到蘇丹來。』他隨後與我握手並在我的證書上蓋了章。巴斯納在我身後，他將與我那份相類似的證件遞給了老者。老人盯着證件看了一會兒不耐煩地說：『這是什麼？這張紙是什麼？這可不是官方證書！』

巴斯納心平氣和地解釋說，他沒有護照，這是坦桑尼亞政府給他出具的證件。『你沒有護照？』移民官輕蔑地說：『你是一個白人，你怎麼會沒有護照！』巴斯納回答說：他在南非受到了政府的迫害，只因他參加了爲黑人爭取權利的鬥爭。蘇丹人懷疑地看着他說：『但你是個白人！』喬看着我，知道我在想什麼。他小聲告訴我不要插話，因爲我們是來蘇丹作客的，不要觸犯主人的殷勤好客。但是，巴斯納不僅僅曾是我的雇員，而且曾是一位爲了黑人的解放眞正冒過險的白人，我不能丟下他不管。我沒有與喬一起離開，而是留下來，緊靠

着移民官站着。每當巴斯納說些什麼時，我就對着那位蘇丹官員彎腰點頭，好像是在證實他說的是眞的。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圖，態度緩和下來，終於給巴斯納蓋了章，並輕聲說：

『歡迎到蘇丹來。』

我差不多有兩年沒見奧利弗了。當他到阿克拉機場接我時，我幾乎認不出來了。從前奧利弗總是把臉刮得乾乾淨淨，穿戴得既整潔又保守，而現在他蓄着鬍鬚、留着長髮，穿一身代表非洲大陸自由戰士的軍裝。（他對我可能也有類似的感覺。）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對他在國外所做的工作，我向他表示了敬意。他已爲非洲民族議會在迦納、英國、開羅和坦桑尼亞設立了辦事處，也爲我們與許多其它國家建立了寶貴的聯繫。在此後的旅行中，我不管走到哪兒，都能看到奧利弗對當地外交家和政治家產生的積極影響。他是非洲民族議會所能派出的最好使節。

拉哥斯獨立國家會議的目標是聯合所有非洲國家，但這次會議最終卻開成了一次各與會代表就接納或拒絕接納哪些國家爭論不休的大會。我迴避了這次會議，盡量不引人注目。在我出現在阿迪斯阿貝巴的中非、東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會議上之前，我們不想讓南非政府知道我已經在國外了。

在從阿克拉到阿迪斯阿貝巴的飛機上，我們遇見了高爾·拉德貝、彼得·莫羅西和其它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他們也是去參加東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會議的。見到我後，他們都很吃驚。我們立即投入了一場有關南非的討論，氣氛愉快熱烈、無拘無束。儘管我聽說高爾離開非洲民族議會後感到震驚，但這並沒有沖淡我們相逢的喜悅。在遠離家鄉的高空，使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東西要比使我們分開的東西更多。

我們在喀土穆做了短暫的停留，然後換乘衣索比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阿迪斯阿貝巴。在這兒我經歷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當我登上飛機的時候，我看見飛行員是黑人。我以前從未見過黑人飛行員。我一看到是黑人飛行員，我有些緊張。黑人怎麼能駕駛飛機呢？過了一會兒，我才發覺自己錯了，我又陷入了種族隔離政策的思維方式，以爲黑人低人一等，駕駛飛機是屬於白人的工作。我靠在座位上，責怪自己不該有這種想法。升空後，我就不緊張了。我開始察看衣索比亞的地形，思考游擊隊是怎樣藏在這些叢林裡與意大利帝國主義者戰鬥的。

四十七

在聖經裡，衣索比亞被稱爲阿比西尼亞。傳說早在基督誕生前，所羅門和謝巴（Sheba）女王的兒子就建立了衣索比亞。儘管衣索比亞在歷史上曾被多次征服，但它仍是

非洲民族主義的誕生地。與許多其它非洲國家不同，衣索比亞在每個世紀都曾與殖民主義做過鬥爭。上個世紀，梅尼里克（Menelik）打敗了意大利人；在一九三〇年，所羅門的後代海爾·塞拉西當上了衣索比亞的皇帝，開創了衣索比亞當代歷史。墨索里尼進攻衣索比亞時，我才十七歲。這種侵略行爲不僅激起了我對這位暴君的憎恨，而且也激起了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一九三九年，意大利人征服了衣索比亞，塞拉西被迫逃離。一九四一年，盟軍將意大利人趕出了衣索比亞，塞拉西才又返回了祖國。

衣索比亞在我的心中總是占有特殊的位置。訪問衣索比亞比到法國、英國、美國去旅行更有吸引力。我彷彿是要去拜訪我自己祖先的發祥地，探究是什麼原因使我成爲一個非洲人。拜見皇帝本人就如同觸摸歷史。

我們此行的第一站是皇城阿迪斯阿貝巴，這座城市與『皇城』的稱號很不相符，一點兒也算不上豪華、壯觀，僅有的幾條柏油馬路上，山羊、綿羊比汽車還多。除了皇宮、大學和我們下榻的拉斯旅館外，甚至幾乎沒有什麼建築物能與約翰尼斯堡那些給人印象最不深刻的建築物相媲美。當代的衣索比亞已經不再是民主的典範，它沒有政黨，沒有人民的政府機構，沒有實行分權制，只有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會議正式開始前，代表們聚集在德卜勒扎德（Debra Zaid）小城。中心廣場搭起了主席臺，我和奧利弗坐在主席臺靠邊的位置。突然，我們聽到遠處傳來了長號吹奏的樂曲，繼而

是由不停敲打着的非洲鼓伴奏的銅管樂隊的旋律。當樂隊走近時，我能聽到、感到成百雙腳行走的隆隆聲。從廣場邊一座建築物的後面走出來一名上尉，他揮舞着閃閃發光的劍，緊跟在他後面的是五百名黑人士兵，排成四行，每人肩上扛着一桿擦得鋥亮的步槍。當部隊走到主席臺前時，隨着上尉用阿姆哈拉語發出的命令，五百名士兵就像一個人似的立定。上尉轉過身來向一名身穿令人眼花繚亂的制服的老年人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他就是所羅門王和謝巴女王的第二百五十五代孫，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陛下。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了由黑人將領統率的黑人士兵，該國黑人首腦的客人——一些國家的黑人領導人爲他們熱烈鼓掌歡呼。那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場面，我眞希望這樣的場面將來在我的國家也能出現。

遊行後的第二天早晨，我和奧利弗出席了一個會議，每個要加入東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機構的組織都要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申請。我們驚詫地發現我們的申請受到了烏干達代表的阻撓，他抱怨我們是科薩族的一個部落組織。我當時很衝動，眞想輕蔑地駁回他的言論。但是，奧利弗認爲我們只要向他解釋一下就行了，就說我們非洲民族議會的建立是爲了聯合非洲人，組織成員是從各個地區的人民中吸收的。我按照他說的做了，另外我又加上了一句，說我們非洲民族議會的盧圖利會長就是祖魯族人。他們接受了我們的申請。我意識到，在非洲大陸，許多人對非洲民族議會的了解僅限於泛非主義者大會對我們的介紹。

大會由我們的東道國主持正式召開。皇帝陛下穿着精心製作的錦緞式軍裝，他看起來是那樣的矮小，但他的尊貴、自信卻使得他就像一個非洲巨人，他的這種氣質使我感到很吃驚。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國家首腦履行職責的正規儀式，這一切使我着迷。塞拉西皇帝陛下站得筆直，尊嚴是他一切行動的標誌。

按計劃我要在皇帝講話後發言，那天上午除皇帝外，我是唯一一個要發言的人。這是我許多個月來第一次丟開大衛·莫特薩馬依的化名，恢復了納爾遜·曼德拉這一眞實姓名。在發言中，我回顧了南非爭取自由鬥爭的歷史，我講到一九二一年軍警在布爾霍克（Bhuhoek）殘殺了一百八十三名手無寸鐵的農民。四十年後的今天又在沙佩維爾對人民進行了屠殺。我感謝聚集在這兒的這些國家對南非當局施加了壓力，我特別提到了迦納、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這些國家率先發起了一場運動，成功地將南非驅逐出了英聯邦。我回顧了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組建，解釋說我們已經沒有和平鬥爭的可能。『如果一個組織對已經不太起作用的政治武器仍還在考慮是否使它變得更加鋒利，那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在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猛烈打擊下，整個南非都在震顫。』我剛剛說完，烏干達總理就喊道：『給他們再來一次！』

然後，我述說了我的經歷。

我剛剛從南非出來，近十個月來我一直像逃亡者一樣生活在自己的國家，遠離我的家人，遠離我的朋友。當我被迫過這樣一種生活時，我曾公開聲明我不會離開南非，我會繼續在南非從事地下活動。我這樣說了，我也會這樣去做。

我將返回南非的聲明受到了人們的高聲喝彩。開會前人們曾鼓勵我們第一個發言，這樣東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運動才能對我們從事的事業做出評價。許多非洲國家天生不願意支持別處的暴力鬥爭，但是我的發言使得人們相信南非自由戰士沒有其它選擇，只有拿起武器。

我和奧利弗與肯尼思·卡翁達進行了私下交談。卡翁達是北羅德西亞聯合民族獨立黨主席，後來獨立的尚比亞國的總統。與朱利葉斯·尼雷爾一樣，卡翁達很擔心南非自由戰士缺乏團結，建議在索布克威出獄後，將我們兩個組織的勢力合併在一起。泛非主義者大會在沙佩維爾的非洲人中得到的公衆注意遠遠超過了他們作爲一個組織的影響力。卡翁達曾經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他告訴我們說，他很爲我們與白人共產黨聯盟擔憂，並表示這件事在非洲給我們帶來了很不好的影響。不僅僅是在西方人們不信任共產主義，在非洲也如此。我意識到這將是我以後的旅行中會多次聽到的一種觀點。

我試圖向卡翁達說明聯合民族獨立黨對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支持是受到了錯誤的導向。他

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納爾遜，你跟我講這事是白費功夫。我是你的支持者，盧圖利酋長的追隨者，但聯合民族獨立黨並非我一個人說了算，這事你得和西蒙·卡普維普（Simon Kapwepwe）談，如果你能說服他，那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卡普維普是聯合民族獨立黨的第二號人物。我安排好了第二天去見他。我請奧利弗和我一起去，他說：『納爾遜，你必須自己單獨去見他，這樣你的談話才能完全放開。』

我和卡普維普在一起談了整整一天，我從他嘴裡聽到了最令人驚訝的傳言。他說：『你的講話及你們整個非洲民族議會代表團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們僅憑這兩件事情來判斷你們的組織的情況，我們肯定會站在你們一邊。但我們從泛非主義者大會那兒聽到了令人不安的報告，大概意思是說民族之矛是共產黨和自由黨用心良苦的產物，建立這樣一個軍事組織只不過是把非洲人當炮灰。』

我不知所措，我脫口說我感到很震驚，卡普維普居然自己沒能看出這種傳說毫無眞實性可言。我說：『首先，衆所周知自由黨和共產黨是主要對手，他們不會走到一起共事的。其次，我不謙虛地跟你講，我自己就是民族之矛組織的主要發起人。』最後，我說我對泛非主義者大會散佈這樣的謊言感到很失望。

就在這一天要過去的時候，我使卡普維普改變了對我們的看法。他說他將召開一個會議，把我們的情況做些介紹。他確實這樣做了。這件事再次說明非洲其它國家對南非仍缺乏

了解，泛非主義者大會在竭盡全力糟蹋非洲民族議會的名聲。大會結束了，卡普維普祝我好運。大會開得很成功，我們也十分忙碌。

學生時代，我曾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去遊覽埃及這個有諸多藝術和建築傑作的非洲文明的發祥地；幻想着穿過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羅河；幻想着參觀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我、奧利弗和羅伯特·里沙一起自阿迪斯阿貝巴飛往開羅，他們將在以後的旅行中陪伴我。抵達開羅後的第一天上午，我去參觀了博物館。在那兒，我欣賞了藝術品及手工製品，做了筆記。了解了建立尼羅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人物。這並不是因爲我有考古的業餘愛好，更重要的是非洲民族主義者要有足夠的證據對歐洲人那種不切實際的斷言提出質疑。他們認爲與歐洲相比非洲人沒有文明歷史。僅僅在一個上午，我就發現當歐洲人還生活在洞穴裡時，埃及已經在創造偉大的藝術和建築作品了。

對我們來說，埃及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在那裡，我們可以親眼目睹由納瑟總統發起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他縮減了土地的私有制，把某些經濟部門收歸國有，倡導快速工業化，促使教育民主化並建立了一支新式軍隊。有許多改革正是我們非洲民族議會希望在將來的某一天能進行的。然而，對我們來說更爲重要的是埃及是當時唯一一個擁有能與南非相比的陸、海、空三軍的國家。

一天後，奧利弗啓程飛往倫敦，答應在迦納同我和羅比會合。在我和羅比踏上旅程之前，我們就即將在每個國家做的情況介紹進行了討論。我傾向於盡可能眞實、客觀地闡明政治形勢，不要對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就避而不談。每新到一個國家，我總是先把自己關在旅館裡去熟悉該國的政策、歷史及領導人。羅比則相反，他是一個性格外向的人，他總是在我們一到就離開旅館到街上去通過觀光或與人交談來學習有關知識。我們倆個走在一起顯得很不相稱，我喜歡穿着隨便。從事地下活動時，我就習慣了這種穿着，常穿卡其布勞動服。而羅比則總是穿着筆挺的西服。

在我們的第一站突尼斯，我們拜見了突尼斯國防部部長。他長得很像盧圖利主席，但恐怕僅此而已。當我向他述說國內形勢及泛非主義者大會領導人索布克威仍被關在監獄中時，他打斷我的話說：『一旦那傢伙出獄，他會把你幹掉的。』羅比聽到這話抬了抬眉毛。（後來他說：『老兄，你的宣傳攻勢比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宣傳可是厲害多了！』）但我堅持將南非的情況向國防部長做了全面的介紹。第二天，我們去拜訪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總統。他回答得非常肯定直接了當。他答應爲我們的士兵提供訓練，並願意出資五千英鎊用於購置武器。

我們的第二站是摩洛哥的拉巴特。拉巴特擁有古老、神秘的城牆、時髦的店鋪和中世紀

的清眞寺。它是非洲、歐洲、中東建築風格的混合體，非常迷人。很顯然，自由戰士們也認爲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因爲拉巴特曾是非洲大陸歷次解放運動的中心。在拉巴特逗留期間，我們拜會了莫桑比克、安哥拉、阿爾及利亞以及佛得角的自由戰士。拉巴特也是阿爾及利亞革命軍的所在地，我們和穆斯塔費（Mustafai）博士一起度過了幾天。穆斯塔費博士是阿爾及利亞駐摩洛哥使節團團長，他向我們簡要介紹了阿爾及利亞人抵抗法國入侵的歷史。

阿爾及利亞的情況與我們最爲相似，反抗者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白人殖民者社會，他們統治着占多數的當地非洲人。穆斯塔費博士介紹了民族解放陣綫是怎樣受越南人在奠邊府打敗法國人的鼓舞，在一九五四年僅靠幾次游擊隊的進攻開始戰鬥的。他說，起初民族解放陣綫相信他們能在軍事上打敗法國人，之後才意識到純粹的軍事勝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們採取了游擊戰。他解釋說，游擊戰的目的並不在於軍事上的勝利，而在於發動一場足以戰勝敵人的政治和經濟戰爭。穆斯塔費博士勸我們在做軍事努力的同時不要忽略了戰爭的政治性。他說，有時國際輿論比一群噴氣式戰鬥機更爲寶貴。

在第三天快要結束時，他把我們送到了一個滿是灰塵的小城烏季達（Oujda），它位於阿爾及利亞邊境對面，是駐紮在摩洛哥的阿爾及利亞軍隊司令部所在地。我們參觀了前綫部隊。在一個地方，我拿起雙筒望遠鏡，能清楚地看到邊境對面的法國軍隊。在我的想像中，我覺得我所看到的這些法國軍隊就是南非國防軍。

一、二天後，我應邀出席了爲向艾哈邁德·本·貝拉表示敬意而舉行的閱兵活動。貝拉最近剛被從法國監獄裡放出來，他將就任新獨立國家阿爾及利亞的第一任總理。這次閱兵與我在阿迪斯阿貝巴親眼目睹的閱兵式相去甚遠，這不是那些生氣勃勃、訓練有素、穿着漂亮軍服的衣索比亞部隊，而是阿爾及利亞游擊運動活生生的展示。

走在前面的是頭戴圍巾、身穿長束腰外衣、腳穿橡膠套鞋的自豪的經過戰爭千錘百鍊的老兵，他們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這場鬥爭。他們身佩他們曾使用的武器，如：軍刀、老式燧發步槍、戰斧和標槍。緊隨他們身後的是同樣自豪的攜帶現代化武器的年輕士兵，他們扛着防坦克炮和高射炮。即便是這些士兵走起步來也不像衣索比亞士兵那樣整齊、準確。這是一支游擊力量，他們在戰火中贏得了榮譽。他們對戰鬥及兵法的關注遠遠勝過對服飾和閱兵的關注。就像在阿迪斯阿貝巴一樣，這些部隊使我受到了很大鼓舞。我知道今後我們自己的軍隊會更類似於烏季達這兒的部隊。我只能寄望於我們的軍隊也像他們一樣勇敢的戰鬥。

走在後面的是一支由一個叫蘇達尼（Sudani）的人引導的軍樂隊。蘇達尼長得膚色漆黑、高大結實，充滿自信。他揮動着一根禮杖。當我們這伙人看到他時，我們頓時站起來鼓掌、歡呼。我環顧四周，看到別人都在盯着我們，我意識到我們這伙人之所以歡呼只是因爲那位老兄是黑人，在摩洛哥是很少能見到黑面孔的。

我再一次被民族主義和種族關係的巨大力量所打動。我們見到蘇達尼後立即做出了反

應，只因我們覺得見到他就像是見到了非洲兄弟。後來，主人告訴我們：蘇達尼是一個傳奇式的軍人，據稱他曾一個人單槍匹馬地俘獲了一小隊法國兵。但我們爲他歡呼是因爲他的膚色，而不是因爲他的功績。

我從摩洛哥乘飛機越過撒哈拉沙漠抵達馬利首都巴馬科，然後飛往幾內亞。從馬利到幾內亞的飛行更像是乘坐當地的公共汽車，而不像是乘坐飛機。我們能看到鷄在走廊上漫步，女人們來來往往，有頭上頂着包裹的，有賣袋裝花生和乾菜的。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飛行，我很喜歡。

我的下一站是塞拉利昂。當我抵達時，我發現議會正在開會，便決定參加他們的會議。我像一個普通觀光者一樣走了進去並被引導到離議長很近的一個座位坐下。議會書記員走到我跟前問我是誰。我小聲對他說：『我是南非盧圖利酋長的代表。』他熱情地與我握手並走上前去向議長報告。隨後，書記員解釋道，只因工作人員的疏忽，我才被允許坐在這兒。一般情況下觀光者是不讓進來的。不過，他們很榮幸有這樣一次例外。

一個小時後，議會休會，我站在議員和一些達官貴人中間喝茶，這時在我面前排起了長隊。我驚奇地發現整個議會的人都排成一行等着與我握手，我非常感激，直到隊列中第三或第四個人咕噥了一句，大意是說：『能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尊敬的盧圖利酋長握手是莫大的榮幸。』我成了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書記員搞錯了。這時有人把總理密爾頓·馬蓋

（Milton Margai）爵士帶過來見我，書記員介紹說我是盧圖利酋長。我試圖向書記員說明我不是盧圖利酋長，但這傢伙不聽我的。爲了他們的殷勤好客，我決定繼續這場『遊戲』。後來，我拜見了總統，我把我在議會被錯當成盧圖利酋長的事向他做了解釋，他慷慨地爲我們提供了物質援助。

在利比亞，我拜會了杜伯曼總統。他不僅給了我五千美元用來夠置武器和訓練，而且溫和地問我：『你還有零用錢嗎？』我承認我缺錢，立即有一位助手拿來了一個信封，裡面裝着四百美元現金。離開利比亞後，我們到了迦納。奧利弗在那兒迎接我，並受到了幾內亞常駐公使阿卜杜拉·戴洛（Abdoullaye Diallo）的款待。當我告訴他我在幾內亞沒有見到塞古·杜爾時，他立即安排我們回到那片乾旱的土地。杜爾給我和奧利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住在一間樸素的平房裡，身着一件褪色但乾淨的毛料外衣。我向他談了我們的情況，介紹了非洲民族議會和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歷史，要求五千美元支持民族之矛軍事組織。他聽得分外認眞，並用相當正式的方式答覆我，有點像在發表講話，他說：『幾內亞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南非兄弟的鬥爭。我們在聯合國也已經發表了上述聲明。』他走到書架前取下兩本他寫的書並親自簽名送給我和奧利弗，接着他說了聲謝謝，我們便離開了。

我和奧利弗有點生氣，我們從別的國家被召到這兒，他給予我們的只是他簽名的兩本書，眞是浪費時間。我們剛剛到旅館房間後不久，幾內亞外交部一名官員輕輕地敲響了門並

交給我們一個手提箱。一打開，只見裡面裝滿了鈔票，我和奧利弗高興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一會兒奧利弗表情突變，說：『納爾遜，這是幾內亞貨幣，在別的國家只是一堆廢紙，分文不值。』他出了一個主意，我們把這些幾內亞貨幣拿到捷克大使館，那兒有他的一位朋友，由他爲我們兌換成可轉換通貨。

在城裡遊動的一個個婀娜多姿的塞內加爾婦女身着飄逸的長袍，頭圍美麗的頭巾婉如滑入達卡港的造形纖細而優美的魚船。我漫步於附近的集貿市場，爲奇異芬芳的香料所陶醉。塞內加爾是一個慷慨大方的民族，我留戀與奧利弗在這個國家所度過的短暫的時光。他們的社會展示出一種由法國、伊斯蘭及非洲這幾種根本不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而形成的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

在拜見列奧波爾德·桑戈爾總統的路上，奧利弗犯了嚴重的氣喘病。他拒絕回到旅館，我背他上樓到了總統辦公室。桑戈爾總統非常關心奧利弗的病情，堅持讓他的私人醫生護理他。

我們曾經被告知要提防桑戈爾，據報導塞內加爾的士兵正在爲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幹活。桑戈爾總統有點過於迷戀法國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風俗習慣及其魅力。殖民者的風俗習慣對新獨立的國家有持久的吸引力。我對此也不具免疫力。桑戈爾總統

是一位學者、詩人。他告訴我們他正在蒐集有關薩卡的研究材料，詢問了很多有關偉大的南非勇士薩卡的情況以示對我們恭維。我概述了南非的情況並請求他在軍事訓練及經費方面提供幫助。桑戈爾回答說：在議會開會前，他無權就此做出決定。

與此同時，他讓我們同一位名叫達布西爾（Daboussier）的司法部長談談軍事訓練的問題。總統爲我介紹了一位漂亮的白人法國姑娘。他解釋說，她將擔任我與司法部長會談的翻譯。我沒有吭聲，但心裡感到不安，在一位我既不了解也不信任的年輕女人面前談論如此敏感的問題不太合適。桑戈爾覺察到了我的這種擔憂。所以他說：『別擔心，曼德拉，這兒的法國人認爲他們的心願同我們非洲人是完全一致的。』

當我們到達部長辦公室的時候，看到在接待室裡有一些黑人秘書。其中一位黑人秘書問這位法國女人她到這兒幹什麼。她說她受總統的派遣來擔任翻譯，接着便發生了一場爭執，爭執中一位黑人秘書轉向我說：『先生，你會講英語嗎？』我說會，她說：『部長講英語，你可直接同他談，用不着翻譯。』此刻法國姑娘非常生氣，她站在一邊，我便走進去與部長會談。他承諾將滿足我們的要求。儘管桑戈爾後來沒有提供給我們所要求的東西，他還是給我辦理了外交護照，並支付了我們從達卡到下一個目的地倫敦的機票費用。

四十八

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有點親英派的人。每當我想到西方的民主與自由就會聯想到英國的議會制。對我來說，在如此衆多的方面最具紳士派頭的是英國人。英國是議會民主的發祥地，但就是這種民主使我們的人民承受了災難深重的不公正制度。我厭惡英帝國主義的某些觀念，但從不反對英國風格的服飾和舉止。

我有好幾條理由想去英國，除了想去看看這個我早就讀到過和聽說過的國家外，還因爲我擔心奧利弗的健康，想勸他去接受治療，也非常想去看看阿德萊德（Adelaides）和他的妻子及他們的孩子，以及議會運動駐倫敦的代表優素福·達杜。我知道在倫敦我還可以獲得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有關游擊戰的文學作品。

爲了不讓我在倫敦的消息傳回南非，我又恢復了原來做地下工作的方式，因爲南非安全機關的觸角一直伸向倫敦。但我不是一個隱士，我在這兒待了十天，有幾天忙於非洲民族議會的公務，用幾天去探望了老朋友，也偶爾以普通觀光者的身份去短途遊覽。在瑪麗·本森（Mary Benson），一位曾寫了有關我們鬥爭的英國朋友的陪同下，我和奧利弗看了這個曾一度統治了幾乎占全球三分之二國家的城市的名勝：西敏寺、英國議院塔上的大鐘、上議院、下議院。儘管我爲這些精美的建築所陶醉，但一想到他們所代表的內涵，心裡又很矛

盾。當我們看到立在西敏寺旁邊的斯馬茲（Smuts）將軍的雕像時，我和奧利弗開玩笑說也許有一天在這兒立的將是我們倆人的雕像。

許多人告訴我說，由大衛·阿斯特（David Aster）主辦的『觀察家報』的新聞報導傾向於泛非主義者大會。他們在事實報導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稱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過時了的黨。奧利弗安排我與阿斯特在他家會面，我們就非洲民族議會的各種方面進行了交談。我不知道我的談話是否影響了他，但新聞報導的調子確實改變了。他還建議我去同一些顯赫的政治家談談。在工黨成員丹尼斯·希利（Dennis Healey）的陪同下，我會見了工黨領袖休·蓋茲克爾（Hugh Gaitskell）及自由黨領導人喬·格里蒙德（Joe Grimond）。

只是在我即將離開的時刻我才見到優素福，但這是一次不愉快的聚會。我與奧利弗又一次遇到了我們在旅途中多次遇到的難題。非洲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曾問起過我們與白人及印度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還暗示他們已控制了非洲民族議會。如果不是因為單一種族的和反對白人的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立，我們的非種族主義本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在其它的非洲國家，多數非洲領導人對泛非主義者大會所持觀點的理解比對非洲民族議會所持觀點的理解要好。奧利弗曾與優素福探討過這些問題，優素福對奧利弗的結論大為不滿。奧利弗決定，非洲民族議會必須表現得更加獨立，單方面開展某些活動而不讓其它聯盟的成員捲入。我與他的意見一致。

我用我在倫敦最後一個晚上同優素福磋商了上述問題。我向他說明，現在我們正在開始進行武裝鬥爭，需要依靠其它非洲國家獲得經費、訓練和支持。因此，我們不得不比從前更重視他們的意見。優素福認爲我和奧利弗正在改變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說我們正在偏離自由憲章的核心——非種族主義。我告訴他他弄錯了。我們並沒有反對非種族主義，只是說非洲民族議會必須更具獨立性，在只影響到非洲的問題上所做的聲明沒有必要非得是大會聯盟的聲明。通常由非洲民族議會、南非印度人大會、有色人大會做出集體聲明的做法必須改變。優素福對這一點很不高興。他不停地追問：『政策是什麼？』我對他講，我不是在談論政治只是在談論形象。我們仍將在一起工作，只是非洲民族議會在這些平等的組織中必須顯示出是第一位的。

儘管我爲離開在倫敦的朋友們感到悲傷，但現在還得開始做我這次旅行中最陌生的事——軍事訓練。我已安排了在阿迪斯阿貝巴接受六個月的軍訓。在那兒我受到了外交部長耶夫（Yefu）的接見，他熱情地招待了我並把我帶到一個叫科菲（Kolfe）的郊區。這兒是衣索比亞防暴營司令部的所在地。我要在這兒學習當兵的藝術和科學。儘管我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業餘拳擊手，但有關戰鬥的最基本知識都少得可憐。我的教官是一個中尉，名叫旺德尼·貝菲卡杜（Wondoni Befikadu），一個經驗豐富的戰士。他曾與地下工作者一道參加過反對

意大利人的戰鬥。我們的時間排得很滿，從早上八點開始訓練一直到下午一點，中間只洗個澡、吃頓午餐。接着從下午兩點練到下午四點。從下午四點到晚上這段時間則學習軍事技術，教師是塔德西（Tadesse）上校，也是一名警長助手，在最近一次挫敗陰謀推翻皇帝的政變中起了作用。

我學習了如何使用自動步槍和手槍，不僅在科菲和宮庭衛隊的訓練基地打靶，還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射擊場同全體防暴營一起打靶。我學習了爆破和發射迫擊炮，並學會了如何造小型炸彈和地雷及怎樣避免被地雷炸傷。我感到正在被塑造成一名戰士，並開始像士兵那樣思考問題，這種思維方式同一個政治家的思維方式是有很大差別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疲勞行軍』，這種行軍你只能帶一枝槍、子彈和一些水，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達指定的地點，在這種行軍中我飽覽了如畫的風景，那眞是美極了，有茂密的森林和光禿禿的高原。這個國家確實落後，人們用的是木犁，吃的是非常簡單的食物，喝的是自家釀製的啤酒，他們的生活條件與南非的農村相似。任何地方的窮人相同之處總比不同之處多。

上課的時候，上校教官論述了怎樣建立一支游擊力量，怎樣指揮軍隊，怎樣執行紀律。一天晚上正在吃晚飯時，上校教官對我說：『曼德拉，你正在組建一支解放軍而不是常規的資本主義軍隊。解放軍是一支平等的軍隊。你必須完全不同於在資本主義軍隊中那樣對待士

兵。執行任務時你必須自信地行使權力並且必須能支配他們，這一點與資本主義軍隊的指揮官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在平時，你必須把自己置於非常平等的位置，即便是對最低級的士兵。他們吃什麼你吃什麼，你不能在辦公室吃飯，要同他們一起吃，一起喝，同他們打成一片。』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令人欽佩而且富於理智，但正當他對我侃侃而談時，飯廳裡進來了一位軍士，他問上校在哪兒能找到某某上尉。上校用一種掩飾得不太好的輕蔑的目光看着他說：『你沒有看到我正在這兒同一位重要的人物談話嗎？難道你不知道在我吃飯時別打擾我嗎？馬上走開。』接着便用教導的口氣繼續他的話題。

原打算訓練課程安排六個月，但八周後我便接到了非洲民族議會發來的緊急電報，要我回國。國內的武裝鬥爭正在升級，他們希望民族之矛軍事組織的司令官能在指揮現場。

塔德西上校很快安排我搭乘一架衣索比亞班機到喀土穆。臨行前，他送我一支自動手槍和二百發子彈作爲禮物。我感激之至，感激他送我的槍，感激他的教誨。儘管我訓練過疲勞行軍，我發現帶上所有的子彈是很累的。一粒子彈就夠重的了，揹上二百發就像背着個小孩子。

在喀土穆，一位英國航空公司的官員告訴我，到達累斯薩拉姆的飛機第二天才能起飛。他們已自作主張爲我訂了一個豪華旅館的房間，我感到吃驚，因爲我本來寧願住在一個不引

人注目的三流旅館裡。

下車後，我必須穿過飯店雅緻的長走廊。數十名的白人坐在那兒喝酒。那時還沒有金屬探測器和安全檢查，我攜帶的帶槍套的手槍就藏在夾克衫裡，二百發子彈就圍在腰上用褲子蓋着，另外還帶着數千英磅現金。我覺得所有這些穿着講究的白人都有X光般的眼力，我隨時都可能被捕。但我卻被安全地護送到我的房間裡，我訂的是送酒等到房間的旅館服務，連服務員的腳步聲也使得我提心吊膽。

我從喀土穆直接飛到了達累斯薩拉姆。在那兒，我迎接了第一批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派往衣索比亞接受軍事訓練的二十一名戰士。那是一個令人自豪的時刻，這些戰士自願參加了我正在着手組建的軍隊，他們要冒生命危險的鬥爭剛剛開始，這場鬥爭對於第一批參戰的戰士是最危險的。他們是年輕人，主要來自城市。他們感到自豪並渴望戰鬥，我們在阿迪斯阿貝巴聚了一次餐，人們宰了一頭山羊以示對我的敬意。我給他們講了這次旅行的情況，告訴他們在國外必須要有良好的舉止和紀律，因爲他們是南非爲自由而鬥爭的代表。我說：軍事訓練必須同政治鍛鍊同時進行，因爲革命不僅是一個扣扣扳機的事，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自己的戰士的敬禮。

尼雷爾總統給我派了一架私人飛機到姆貝亞，接着飛往洛巴策。飛行員通知我飛機將在卡內（Kanye）着陸。這引起了我的擔心，爲什麼改變了計劃。在卡內，迎接我的是地方行

政官和安全人員，這兩位都是白人。那位官員走到我跟前問我的名字。我回答他，『大衛·莫特薩瑪依。』他說：『不對，請告訴我你的眞實姓名。』我又說了一次，『大衛·莫特薩瑪依。』官員說，『請告訴我你的眞名，因爲我是奉命來這兒接曼德拉先生的，爲他提供幫助和交通工具。如果你不是納爾遜·曼德拉先生，恐怕我們不得不逮捕你，因爲你未經允許就進入了我們國家。你是納爾遜·曼德拉嗎？』

這眞讓我左右爲難，講不講眞名都會被捕。我說，『如果您認定我就是納爾遜·曼德拉，而不是大衛·莫特薩瑪依，我對此沒有異議。』他笑了笑說：『我們以爲你昨天到呢。』他隨後把我送往我的同事正在等着我的地方。我們驅車來到了洛巴策。在那兒，我見到了喬·莫迪斯（Joe Modise）和一個當時居住在洛巴策的名叫喬納斯·麥特羅（Jonas Matlou）的非洲民族議會支持者。當地行政官告訴我說，南非警察知道我要回國，並建議我明天就離開此地。我對他的幫助和忠告表示感謝。當我來到麥特羅的家時，我說我今晚就走。我要與一名白人戲劇導演、民族之矛軍事組織成員塞西爾·威廉斯（Cecil Williams）一起開車回南非。我坐在方向盤後，扮成威廉斯的司機。那天晚上我們驅車離開了洛巴策駛向約翰尼斯堡。

第七章　瑞沃尼亞大審判

四十九

越過國境綫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於久別故土的遊子來說，自己家園的空氣總是清醇甘美的。那是一個晴朗的冬夜，繁星閃爍，看起來好像比非洲大陸其它任何地方的星星都更令人賞心悅目。儘管此時時刻，我離開了有生以來第一次享有人生自由的國度，返回到了視我如在逃犯的家鄉，我還是感到由衷的寬慰。因爲我終於回到了生我養我的故土，回到了我肩負重任的家鄉。

在貝專納蘭和川斯瓦省東北部地區之間，分布着許許多多沒有路標的崎嶇山路。塞西爾知道驅車時該走哪一條。在行駛途中，他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了許多我不曾聽說過的事件。我們是在午夜之後靜悄悄地越過國境的，到達百合花農場時已是黎明時分，驅車行駛了整整一個晚上。我一直穿着那件破舊的卡其布訓練服。

到達農場後，顧不上休息和恢復。因爲這天晚上，我們還要召開一次秘密會議。會上，

我還得向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們介紹我的行程情況。沃爾特、摩西·科坦尼、戈萬·姆貝基、丹·特魯米、J·B·馬克斯以及杜馬·諾克威等都來到了農場。這眞是一次難得的團聚。首先，我簡要介紹了旅途的總體情況，講述了我們募集到的資金以及接受訓練的情況等。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還詳細匯報了我所了解的有關非洲民族議會與南非白人、印度人、以及共產黨人合作的一些意見。在我的耳邊，仍然回響着尙比亞領導人最後一次會見我時的講話。他告訴我說，儘管他們知道非洲民族議會與泛非主義者大會相比，實力更強大，影響更深遠，但是他們對泛非主義者大會的純粹非洲民族主義思想深表理解，而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種族平等觀點以及其與共產黨組織的親密關係感到迷惑不解。我告知我的同事們，我和奧利佛兩人深信，非洲民族議會必須得更加獨立，以便於贏得非洲大陸上我們同盟者的信任。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資助我們，訓練民族之矛成員。我建議重新選擇改組大會聯盟，以便非洲民族議會在直接關係到非洲的事務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這是一個嚴肅的提議。全體領導人都需進行磋商。工作委員會要求我南下到德班，向主要領導人闡明此觀點。除了戈萬·姆貝基外，所有人都同意這一建議。當時，戈萬·姆貝基沒有居住在百合花農場，他是作爲民族之矛最高指揮部的成員與會的。他建議我派其的人去德班，他說，讓我親自去那裡太危險了，尤其是在我剛剛返回，正待與民族之矛成員一道共圖大業的關鍵時刻，他的這一善良的忠告沒被大家採納。我自己也表示反對。

第二天晚上，我在塞西爾的陪伴下離開了瑞沃尼亞，再次扮成塞西爾的私人司機。在德班，我事先安排了許多秘密會議。首先，我要見蒙蒂·奈克爾和伊斯梅爾·米爾，向他們匯報我一路的所見所聞，並與他們探討我的新建議。蒙蒂和伊斯梅爾兩人十分接近最高層領導，深受領導人的信任。我還指望能告訴盧圖利，我與他的朋友們協商過，並向他轉達他們的反應。對於我所講述的非洲民族議會需在大會聯盟中扮演領導角色，並需就影響非洲的事務發表自己的主張等觀點，伊斯梅爾和蒙蒂深感不安。他們兩人對任何可能拆散大會聯盟的主張均表示反對。

到了盧圖利酋長居住的格勞特維爾後，我們在城鎮中一印度婦女的家中見了面。我反覆向盧圖利酋長解釋所面臨的形勢。他默默地聽着，一言不發。當我講完後，他說，他不願俯首聽命於一些國外政治家的觀點，不願聽從他們講述的有關非洲民族議會應採取什麼政策措施。他說，由於許多理所當然的原因，我們已經深化了我們的非種族主義的有關政策，他認爲，我們目前不應該因這些政策不適合某些外國領導人的口味而改變它。

我告訴盧圖利酋長說，這些國外政治家們並不是在支配我們的政策，只是說他們不理解我們的政策。我告訴他，我的計劃只是求得一些必要的變化，從而使非洲民族議會更加適應潮流。我認爲這是一種防範性措施。否則，如果非洲國家決定支持泛非主義者大會的話，那

麼，目前看來還軟弱無力的泛非主義者大會將一夜之間變得強大起來。

盧圖利酋長沒有對此做出決定。我看得出，他願意就我所講的問題作一番思考，並與他的一些朋友們交流看法。我起身告辭時，他提醒我要小心從事。我那天晚上還在小鎮裡召集了多次會議。其中最後一個拜訪的是民族之矛駐德班的地區司令部。

德班司令部由一位名叫布魯諾·莫托洛的破壞活動專家領導。我以前從未與他見過面。但自此以後，在風雲變幻的環境中，我倆卻多次相遇。我向他們講述我的非洲之行的情況、接受援助以及提供訓練的情況。我解釋說，目前，民族之矛只限於搞一些破壞活動，而一旦破壞活動不能產生預期的目的的話，我們將很可能轉而進行游擊戰。

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在我留宿的攝影記者G·R·奈都家裡，伊斯梅爾、法蒂馬·米爾、蒙蒂·奈克爾以及J·N·辛格等和我歡聚一堂，慶賀我順利歸來，並預祝我今後順利，因爲第二天，我將離開這裡前往約翰尼斯堡。那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夜晚，是很長時期以來我第一次感到輕鬆愉快的夜晚。之後，我進入了甜甜的夢鄉。星期天下午，即八月五日，我找到了塞西爾，我們驅車直奔約翰尼斯堡。

我身穿司機用白色罩衣，坐在塞西爾身旁，我們輪流駕駛。當天，天氣晴朗，冷風習習。我深深地陶醉於納塔爾的美麗的田園風光之中。即使是冬季，納塔爾仍然是綠茵叢叢。我終於開始返回約翰尼斯堡了，我將有機會看到溫妮和孩子們了。我常希望溫妮能與我共享

非洲的奇風異景。但是，眼下，我所能做到的，便只是向她講述我的所見所聞。

車子離開德班的工業區後，便穿行於山路之中。只見深谷幽幽，景像萬千。印度洋泛着深綠色的顏色。德班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工業區，也是個港口城市。通往約翰尼斯堡的公路與鐵路綫平行延伸。看到此，我的注意力開始從美麗的自然風光轉而專注地琢磨起這條路來。這兩條路相隔無幾，眞是搞破壞活動的絕好場所。於是，我在隨身攜帶的記事本上記下了這個地點。

當我們驅車經過彼得馬里茲堡西北二十英里的豪伊克（Howick）時，我和塞西爾具興致勃勃地談論起有關破壞活動的計劃。過了豪伊克不久便是一個叫塞達拉（Cedala）的小鎮。這時，我看到一輛福特V－8型車滿載着白人呼嘯而過。我下意識地轉過頭，又看到另外兩輛滿載白人的汽車。突然間，超在我們前面的那輛福特車示意我們停車。此時此刻，我意識到我的流亡生涯結束了。十七個月的『自由』生活完結了。

當塞西爾放慢車速時，他轉而問道，『這些人是誰？』我沒有回答，誰都知道這些人的眞實身份。他們精心選擇了停車地點，在我們右邊，是陡峭的堆滿木材的斜坡。如果我們試圖逃跑的話，他們便可以把我們驅趕到萬丈深淵中去。我坐在靠右手的位子上，一時間，我曾想到跳窗而逃。但是，如果這樣做，必然在須臾之間死於非命。

車停下來後，一個人向我們走來。此人個子很高但很瘦弱，帶着嚴肅的表情，他鬍鬚很

長，看樣子有很長時間沒有修理了。我想，他們等待我們恐怕有好幾天了。他用平靜的語調自我介紹說，他是彼得馬里茲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然後拿出了逮捕證。他要求我做自我介紹，我說我的名字叫大衛·莫特薩馬依。他點點頭，繼而用十分自然的口氣問我幾個問題，諸如我去過那裡，將向何方等，我避開這些敏感問題，故意作着無用的解釋。他似乎有點生氣了，說『呸，你是納爾遜·曼得拉，這位是塞西爾·威廉斯，你們被捕了。』

他告訴我們，另一輛車上的一名少校警官將把我們帶回彼得馬里茲堡。在那個時期，警察還不太惡劣，沃斯特警官甚至沒有搜我的身。我身上帶着已上膛的手槍，我再一次浮現逃脫的念頭。但是我太勢單力薄了，我偷偷地把手槍和記事本放到塞西爾和我座位之間的裝璜墊中。由於種種原因，警察自始至終沒有發現這支槍和記事本，太幸運了！如果不幸被發現的話，許多人將會因此而被捕入獄的。

在警察局，我被帶到沃斯特中士的辦公室裡。這裡有許多警官，其中一人是二級准尉特魯特（Truter）。在『叛國案』中，特魯特曾作過證。當時，他給被告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爲他向當局詳細介紹了非洲民族議會的有關政策等。在證詞中沒有誇張和誣告之辭。我們以友好的方式互致了問候。

除了承認我叫大衛·莫特薩馬依之外，我一直沒有承認任何事情。特魯特問我，『納爾遜，你爲何冒充他人呢？你知道，我是認識你的，我們誰都了解對方。』我簡單地告訴

他，我曾有這個教名，這是我常用的名字。我想請一名律師，但被禮貌地拒絕了。於是，我決定發表聲明。

塞西爾和我被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牢房中。現在，我終於有時間審視我的處境了。我早就知道，被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自由戰士總是臨危不懼的。那天晚上，我認識到，我還沒有作好被捕入獄的心理準備，我感到不安和焦慮。一定有人把我的行程事先通報給了警察當局，警察因此知道我已回到了德班，並將去約翰尼斯堡。在我回來之前幾星期，警察就認爲我已回到了南非。六月份，一家報紙新聞標題就是『曼德拉回到了南非』，而當時，我仍在阿迪斯阿貝巴。也許這是當局故意製造的假象。

當局曾監視過溫妮的行動，想以此弄清我是否返回國內。我知道當局曾跟踪溫妮，並以各種借口搜索溫妮的住所。我想，他們猜到我將在回國之後造訪盧圖利酋長，他們想對了。另外，我還懷疑他們得到了情報，了解到我在德班的日期。奸細們常滲透到非洲民族議會內部，甚至一些善良的人們有時也難於一如繼往地守口如瓶。我自己辦事也欠精細，有很多人得知我在德班，在離開那裡時，甚至還舉行了晚會。我放鬆了警惕，咎由自取。我的思緒裡充滿了種種猜測，是德班地區出了奸細？或者是約翰尼斯堡有人通風報信？但歸根到底，憑空猜測是枉費心機的。鑒於體力疲憊，腦力不濟，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至少在今晚——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我不用擔心被警察發現了。因爲他們已經如願以償了。

早晨醒來，我感到元氣大增，振作精神，準備迎接各種考驗。在任何條件下，我都不會絕望，也不會讓監管人員看出我有失望的表現。八點三十分，我見到了當地行政長官，並被押往到約翰尼斯堡。一切都低調處理，這裡的行政官們並不太關心此事，就像是在處理一次交通堵塞事故一樣。在返回約翰尼斯堡的路上，警察當局沒有採取特別的防範措施。我坐在警車的後排座位上，沒帶手銬，兩位警察坐在前排。我的一些朋友獲知我被捕了，法蒂馬·米爾前來送一些食品給我，我把這些食品與車上的兩位警察分享了。經過福爾克斯勒特（Volksrust）鎮時，我們停了一會兒，並允許我下車舒展一下肢體。我不想在別人善待我的時候設法逃脫，我不想在他們信任我的情況下趁機跑掉。

但是當臨近約翰尼斯堡時，氣氛變了。我聽見警察用無綫電報告我已被捕，並命令清理納塔爾附近地區的路障。太陽落山時，我們在約翰尼斯堡郊區遇到了大批的巡警，他們給我帶上了手銬，然後把我推進另一個密封的警車中。警車四周緊閉，只有一個昏暗的小窗口，窗口外面還蒙上一層鐵絲網。一行車輛繞道而行，沿着一條不太熟悉的綫路直奔馬歇爾廣場。這樣做，似乎是擔心有人進行伏擊。

我一個人被關在牢中。在寂靜的牢獄中，我盤算着第二天的計劃，突然我聽到鄰近牢房中發出咳嗽聲。我起初認爲附近不會有囚犯，恰恰相反，咳嗽聲意味着有人。對我來說，咳

嗽是一種驚奇而又熟悉的暗示，我恍然大悟，脫口喊到：『你是沃爾特嗎？』

『納爾遜，是你嗎？』他說。我們兩人不自覺地笑了起來，笑聲中充滿了寬慰、驚喜、失望等等無以銘狀的複雜心情。我了解到，沃爾特在我被捕後也被抓了起來，但沒想到這兩起案件被認爲是互相獨立的。儘管這兒不是召集全國工作委員會會議的理想場所，但畢竟很方便。那天夜晚，我詳細講述我被捕的經過，以及在德班召開的會議情況。就這樣，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

第二天，我被帶到法庭上，見到了一位高級地方法官。這算是正式的還押手續。獲知我被捕的消息後，哈羅德·沃爾普（Harold Wolpe）和喬·斯羅夫也來到了法庭。在我的職業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出現在這位地方法官的面前，我們彼此變得互相尊重。許多律師也前往列席，其中一些我十分熟悉。令人奇怪的是，在某些情況下，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件往往能使人輕易而舉地贏得人們的好評。我也不能例外。但此時此刻，我是一名在逃犯，是國家通緝的首要犯人，是一個從事地下活動一年有餘、手銬鎖身的不法分子。儘管如此，法官、律師以及旁聽觀衆都極其敬重而有節制地向我表示了問候，他們認識的是納爾遜·曼德拉律師，而不是罪犯納爾遜·曼德拉。於是，我的精神爲之一振。

在審理過程中，法官缺乏自信，極不自然，從來不直接目視我，另外一名律師看起來也很窘迫。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了新的發現，這些人之所以不自在，不僅僅是因爲我是他們的

同行，而是因爲我是一個爲追求自己的信仰而被懲罰的人。我頓時領悟到我能在法庭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作爲被告的行動方法了。在統治者管轄的法庭中，我是正義的象徵，是自由正義以及民主等偉大信仰的代表。我認識到，我還能一如繼往地進行我的戰鬥，即便是在敵人的魔掌之上。

當問及我的辯護人的名字時，我聲明說我可以代表我自己進行辯護，喬·斯羅夫任法律顧問。通過自己爲自己辯解，我將能進一步提高我的角色的象徵意義。利用審判的機會，我將展示非洲民族議會反對種族主義的正義事業。我不想爲自己辯解，只是想把政府拉到法庭上。那天，我回答了一些程序性問題，諸如我的名字、辯護人等。我心平氣和地聽了起訴狀：煽動南非工人罷工，在沒有有效證件的情況下私自出國等。在種族主義盛行的南非，這些所謂的『罪狀』的判刑期可能長達十年監禁。可是指控內容有點令人寬慰：顯然，當局沒有足夠的證據把我與『民族之矛』牽扯到一起。否則的話，我將被指控犯有更加嚴重的罪行，即陰謀破壞罪或叛國罪。

當我就要離開審判庭時，我看到溫妮在旁觀席中。看起來她痛苦、憂傷，她無疑正在考慮她以後將要面臨的艱難歲月——孤身一人，要養活兩個孩子，而自己又處於白色恐怖之中，眞可謂前程彌艱，困難重重。當時，我所能做到的，便是送給他一個寬心的微笑。然後，我走下臺階，回到了囚犯室。這樣做似乎是告知她，我並不擔心，也希望她不要焦慮。

我不知這樣做到底是否有效。

從法庭下來後，我被帶到約翰尼斯堡的『堡壘』裡。當我從法庭走出來坐進囚車時，一大群民衆在呼喊、在狂叫着『曼德拉』，『NGAWETHU』等。『NGAWETHU』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句十分流行的口號，意思是『權力』或『權力屬於我們』。當車子緩慢地開出法院的大門時，民衆們有的喊，有的唱，一邊還用拳頭揮打着車子。我被捕及審判等都在報紙上列爲標題新聞，『警察突然襲擊，通緝兩年的犯人被捕』，還有一則標題是『納爾遜·曼德拉終於被捕』。

幾天後，當局允許溫妮來探視我。她特意打扮了一下，至少在臉部是這樣的。與前幾天相比，她的臉上稍有喜色。她帶給我一件新的昂貴的睡衣，以及一件令人喜歡的絲質長袍，這是一件適應於參加沙龍討論會時穿用的長袍。我不能講心裡話，說這些根本不適合我在獄中穿用。我知道，不管怎樣，這是她的愛心的表達，是生死與共的信物，我向她表示了謝意。儘管時間不多，但我們還是快速地商談了有關家庭事務，尤其是有關她以及兩個孩子的生計問題。我向她談及一些我的朋友中能幫助她的人的名字，還有一些欠我錢的客戶的名字。我吩咐她給孩子們講述我被捕的事實眞相，以及我將離別他們很長時間等。我說，我們並不是遭遇此難的唯一一家人，還有許多同樣境遇的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變得更加堅強了。我讓她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有力量的，我們的朋友是矢志不渝的。我說能看到我渡過艱難

萬險，便是她對我的愛情執着的表現。監視我們的警察在閉目養神，趁此機會，我們用力的擁抱了一下，好像傾注了我們的全部的感情，好像這是一次訣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這樣的，因爲我們將從此分別比所想像的還要多的時間。那位准尉警官允許我陪溫妮到門口話別。於是帶着孤獨，帶着骨氣，她消失在我的視綫中。

五十

在『堡壘』裡，我由一位叫米納爾（Minnaar）的上校看管。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白人，他的強硬派同事甚至認爲他有點像是自由派。他解釋說，他將帶我到監獄醫院，因爲那兒最舒服。在那裡，我將會擁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以便用來書寫我的各種交待材料。醫院果然不錯，我在那裡能躺在舒適的床上睡覺，以前在獄中是從沒有這種待遇的。其實這樣做的眞實原因是這地方最安全。到這裡來要越過兩道堅不可摧的院牆，每堵牆都配有警衛把守。要想入內，必須打開四扇巨大的鐵門。報紙宣揚說，非洲民族議會想設法營救我，當局自然想盡辦法避免此類事情發生。

在新聞界，以及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一直有這樣的猜測，說我是因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人的出賣而被捕的。我了解到，有人懷疑G·R·奈都，即我在德班時留宿的戶主。我認爲這是不成立的。新聞媒體大肆宣傳，企圖形成一種認識，即我是被白人和印度人中的共產黨分

子出賣的。他們出賣我的理由是對我提出的關於非洲民族議會必須更加非洲化這一建議感到不滿，但我認為，所有這些故事均是當局杜撰的，意在大會聯盟，其用心十分險惡。此後，我就此事與沃爾特、杜馬、喬·斯洛夫、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以及溫妮等人交換了看法。令我高興的是，他們都贊同我的想法。溫妮曾被邀請去主持每年一度的川斯瓦印度人青年大會，在我的鼓動下，她一一駁斥了這些傳聞。新聞報紙刊登了她的精采的話語：『我們不應浪費時間去尋找是誰背叛了曼德拉，如此這般地大肆宣揚勢必導致我們互相殘殺，從而不能聯合起來共同與國民黨壓迫者進行鬥爭。』

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一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的美國領事官員把此事洩漏給了警察當局。這種說法從沒得到過證實，我也再沒發現任何有關事實真相的證據。儘管美國中央情報局為美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幹了許多卑鄙的勾當，但我不能把我的被捕嫁禍於他們。事實上，我自己有些粗心，沒能嚴格保密。回首往事，我認為，當局曾有許多方法確定我前往德班的行蹤。令人奇怪的是，我並沒有立即被逮捕。

我在『堡壘』醫院只住了幾天時間，後來被轉移到普利托利亞。在約翰尼斯堡時，對探視者沒有限制，經常有許多人川流不息地前來看望我。來訪者的到來令我情緒高昂。而離別時則撕心裂肺般地難受。到了普利托利亞後，當局想把我從家鄉的地盤中趕出，以便到一個

朋友不便來探視的地方。

我和另外一名囚犯一起，帶着手銬，乘一輛舊蓬車來到了普利托利亞。車內污穢不堪，我們只好坐在一個油膩的備用輪胎上。在囚車隆隆地駛向普利托利亞的途中，輪胎不停地滑來滑去。令我感到奇怪，同伴叫恩卡地蒙（Nkadimeng），是索韋托的一個黑邦成員。正常情況下，當局不會讓一個政治犯與一個刑事犯人同乘一輛車。我懷疑當局想讓恩卡地蒙恫嚇我，而他也可能是一個警察局派來的奸細。到達監獄時，我渾身是土，憤懣至極，令我更為不滿的是，我與這位同伴被安排到同一牢房中。我提出抗議後，終於得到一間單獨的牢房。這樣我就可以安靜地準備我的應訊資料了。

在這裡，只允許每星期有兩批探視者來訪。儘管路途遙遠，溫妮還是經常看我。經常帶一些乾淨的衣物和可口的食物。這是她支持我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每當我穿上一件新洗的襯衫時，我就倍感她的愛情與眞誠。我認識到，對她來說，拋下兩個孩子，每星期的一個炎熱的中午，長途跋涉到普利托利亞來看我，這是何等的辛苦啊。另外還有許多人前來看我，他們帶來了食物，其中包括一向忠心耿耿的皮雷夫人，她每次都爲我準備了可口的午餐。

由於探視者的慷慨大方，我常有富足的食物，由此也感到很不安。想與同一樓層的其它同伴們共享，但這是被嚴格禁止的。爲了繞開這些限制，我常送食物給看守，這樣他們就會仁慈許多。帶着這種動機，我送給一個黑人看守一個晶瑩閃光的紅蘋果。他端詳了一會，然

後斷然拒絕，並說『我不要。』黑人看守總是比白人看守更富有同情心，同時也更嚴肅認眞，這一點甚至可以超過其白人主子。可是，過了一會兒，當這位黑人看守看到一位白人看守收下了他曾拒絕過的蘋果時，他改變了主意。不久，我便能與所有的囚犯們共享我的食物了。

通過小道消息，我了解到沃爾特也被帶到了普利托利亞。儘管我們不在一個牢房，但還是設法取得了聯繫。沃爾特已請求保釋——我對此完全支持。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保釋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一些人認爲，我們應永遠拒絕保釋，因爲如果接受保釋，那將被解釋爲，我們是地道的反叛者，並說明我們接受了種族主義法律體系的非難。我認爲，這種觀點未必通用，我們應該區別對待，靈活處理。由於沃爾特是非洲民族議會的總書記，我認爲應該千方百計地保釋他出獄。讓他待在獄中消磨時光，對組織來說是極大的浪費。在這種情況下，保釋是務實的，而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我自己則另當別論，我曾從事地下活動，沃爾特則沒有；我已是公認的反叛與鬥爭的代表，而沃爾特則是個幕後人。沃爾特也同意不對我進行保釋。一方面，當局可能不會允許我保釋；另一方面，我從來不願做一些讓別人看來好像我沒有爲我所從事的事業而獻身的事情。

沃爾特與我做出這一決定之後不久，我再一次被轉移到『堡壘』的醫院裡。十月將舉行一次聽證會。監獄情況無需多言，但與世隔絕的環境卻使我奮發學習。我開始通過函授的方

式攻讀法學士學位，這樣才可能在南非作開業律師。到達普利托利亞的第一件事便是呈給當局一封信，請求他們允許我學習，並要購買一套民法教材（LAW OF TORTS）。

幾天後，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的司令官奧肯普（Aucamp）少校及另外一名臭名遠揚的監獄官員來到我所在的牢房，用幸災樂禍的口吻對我說，『曼德拉，你已束手就擒了，幹嗎還想要『火炬法典』這本書呢？莫非你是想用它來搞該死的陰謀破壞活動？』我對他的話不知所云，直到他拿出我索要書籍的那封信。他把我要的書的名字稱爲『火炬法典』（LAW OF TORCHS）。我冷笑一聲，他此時十分氣憤，認爲我對他表示輕蔑。南非荷蘭人把 TORCH 念成 TOORT，近似於 TORT 的發音。我向他解釋說，在英文中，『TORT』指的是法律的一個分支體系，而不是『火炬』，不是用來引爆炸藥的火炬。他沒趣而又惱怒地揚揚長而去。

一天，當我在監獄的院子裡活動身體時，一位高大英俊的印度人小伙子走了過來。他叫穆薩·迪納斯（MOOSA DINATH）。我和他有過交往，知道他是一位富有的、聲名顯赫的商人。他因詐騙罪被判處二年徒刑。在獄外時，我們只是認識而已，但監獄是友誼的孵化器。迪納斯常陪我在院中鍛鍊身體。一天，他問我，如果監獄司令官允許他住在醫院裡，我是否同意。我說，我十分樂意。但私下想，當局是不會允許的。但我想錯了。

像迪納斯這樣被判刑入獄的犯人居然獲准與我這樣一個等待審訊的政治犯關押到一起，眞令人不可思議。他來時，我沒有說什麼。迪納斯很富有，私下裡給監獄官員們不少好處。爲報答他的金錢，他就擁有了許多特權：他身穿白人囚犯的衣服，吃與白人囚犯一樣的食物，在獄中不參加任何勞動。

一天夜裡，我十分驚訝地看到了米納爾少校來領迪納斯出獄。他是監獄的獄長，是一個名聲遠揚的白人律師。迪納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來。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我是不會相信這一幕的。

迪納斯毫不顧忌地向我講述他在商海中的把戲，以及政府內閣部長們之間的一些腐敗的事宜。我對此頗感興趣，它進一步使我確信，種族隔離是造成道德淪喪的溫床。我小心謹愼與他談話，避免與他談及任何政治話題或敏感的事。因爲我尙不淸楚他是否是奸細。有一次，他請我講述非洲之行的情況，我簡單地搪塞了過去。迪納斯經過多方打通關節，從而加快了獲釋的進程。在判刑二年之後的第四個月便離開了監獄。

越獄有雙重意義：其一，可以使自由戰士從獄中解脫，重新投入戰鬥。其二，對身心是一種激勵，並給敵人以明顯的威懾。作爲囚犯，我常試圖越獄，在無數次押送途中，以及往返司令官辦公室的途中，我認眞查看了院牆的形勢、警衛的佈署、鑰匙的類型以及門鎖的形

狀等。我詳細地繪製了一幅監獄平面圖，特別醒目地標出了監獄醫院的位置以及出入醫院的大門。此草圖被偷偷地帶回交給非洲民族議會，並要求他們看過後立即銷毀。

有兩個越獄的計劃：一是由迪納斯謀劃的，對他的計劃我給予了否定。另一個計劃由非洲民族議會醞釀，通過喬·斯洛夫通報給我。這個計劃包括行賄、配製鑰匙、甚至在我所穿的夾克裡給我送來一個假鬍鬚，以便在越獄後使用。我認眞研究了計劃，認爲不太成熟，失敗的可能太大。如果失敗，對我們的組織來說則貽害無窮，即使有一支精銳的、久經沙場的軍隊也很難完成此項使命。我建議推遲這一行動，等到我被判刑後，當局放鬆警惕時再說。最後，我寫道，『閱後銷毀。』喬以及其它人員接受了我的建議。但決定保留我寫的便條，以便作爲歷史性文獻。可不幸的是，此後便條被發現了。

五十一

第一次審訊定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舉行，這天星期一。非洲民族議會組織成立了『釋放曼德拉委員會』，並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高呼『釋放曼德拉』的口號。抗議者遍及全國，大型標語出現在大街小巷。當局施以高壓，禁止一切有關釋放曼德拉問題的集會，但自由運動組織則無視這些。

爲了準備星期一的審訊，『釋放曼德拉委員會』在法院前發動了一場有組織的遊行活

動。組織者計劃把遊行人群分列在我乘車所經過的道路兩旁，通過報紙、談話以及與看守們聊天，我了解到有成千上萬的遊行人群將參與此活動。

星期六，正當我爲下星期一的審訊作準備時，突然被告知立刻收拾行李。審判改在普利托利亞進行。當局沒有就此發表任何聲明，如果不是我從一個富有同情心的監獄看守那裡得到了消息的話，沒有人會知道我已離開了約翰尼斯堡。

非洲民族議會迅速作出反應，當星期一上午開庭時，猶太教堂裡聚集了大批的支持者。在長達四年的所謂叛國罪的審判過程中，舊猶太教堂猶如我的第二故鄉。我的法律顧問喬·斯洛夫不能到場，他被限制只能在約翰尼斯堡地區。於是就由鮑勃·赫普爾（Bob Hepple）頂替。

星期一上午，我走進了法庭，身穿傳統的科薩族豹皮鬥篷，沒有穿西服，也沒繫領帶。聲援者們都站立着，手握拳頭，高呼『曼德拉！』和『政權屬於我們！』鬥篷令觀眾耳目一新，觀眾中有朋友，也有其家人，有些甚至是一直從川斯凱地區跟隨而來的。溫妮也戴着傳統的有串珠的頭巾，身穿一件齊膝的科薩族短裙。

我特意穿傳統裝束，以強調我是黑非洲人並走進了白人的法庭。我集我們民族的歷史、文化及傳統於一身。那天，我覺得我是黑人民族主義者的代表，代表了黑人的艱難與尊貴的

過去，以及無法預測的未來。門篷是一種蔑視審判的標誌。我知道，當局看到門篷時會被震懾的，因爲許多白人認爲非洲的傳統文化構成了對他們的威脅。

當人群平靜下來時，審判開始。我正式地向起訴人博斯（Bosch）表示了問候。此人自我成爲律師之日起便認識。我還向，馮·希爾頓（VON HEERDEN）法官表達了問候。此人我也十分熟悉。之後，我要求給予兩星期的還押時間，理由是我是在事先未通知我的律師的情況下被轉移到普利托利亞的。他們給予我一星期的時間。

當我被押回監獄時，一個十分不安的白人看守說，司令官雅各布斯上校要人把門篷脫下來。我說：『你告訴他，他不會如願的。』這位看守很瘦弱，聽完我的話後渾身發抖。他乞求我把門篷給他，並說如果帶不回這東西的話，他將被槍斃。我同情他，說，『這樣吧，你就告知你的司令官，說這是曼德說的，不是你說的。』一會兒，雅各布斯上校走了過來。他命令我把他稱之爲『毯子』的門篷交給他。我告訴他說，他沒有權力對我在法庭上的穿着說長道短。如果他想沒收我的門篷的話，我將把這事告到最高法院。聽了這話，這位上校再沒索要我的『毛毯』。但當局只允許我在法庭上穿，不能在來往法庭的路上穿。他們怕這會『煽動』其它的囚犯。

審判再次轉移到約翰尼斯堡舉行。當一星期後審判重新開始時，允許我在答辯之前先向

法庭陳述情況。我解釋說，『我希望這次審判能被證明是對非洲人民的一次陰謀審判。因此，我想爲自己辯護。』我想對在座的律師、聽衆及新聞界聲明，我想把政府拉到審判臺上來。然後，我要求更換地方法官。理由是，我認爲，我沒有遵守當地法律的道德義務，因爲這裡的議會並不能作爲我的代表。更不能指望從白人法官那裡得到公正的判決結果。

爲什麼在法庭上我面對的是白人法官和白人檢察官？爲什麼我的身邊是白人士兵？有誰能公正、嚴肅地指出在這種環境中審判團的組成是平等的呢？爲什麼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沒有黑人能親自審理骨肉同胞的案件呢？我將告知你們這些貴人這是爲什麼：種族隔離的眞實目的是想以此來確保法庭所詮釋的『正義』與國家的政策相一致，不管這種國家政策與文明社會普遍接受的準則有多大的衝突。尊貴的先生們，我強烈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其它各種手腕，我將爲此而奮鬥終生。我現在就在戰鬥，一直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我憎惡我周圍的這種現象，它使我感到，我是一個處在一個白人統治的法庭上的黑人。這種情況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在審判過程中，起訴人召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個證人，其中有來自川斯凱和西南非地區的證人。從職業上講，有警察、記者、城鎮負責人、印刷工等。許多人列舉出一些技

術性證據，以證明我離開祖國是非法的，並煽動非洲工人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份進行了爲期三天的罷工。這些事實無可置疑，我也沒有對此進行爭辯。嚴格地根據法律意義來講，我是有這兩方面的罪行的。

檢察官召喚巴納德先生——總理的私人秘書——來證實我曾向總理遞交過一封信，信中要求首相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並說，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我們將組織一次爲期三天的大罷工。在對巴納德進行盤問時，我首先宣讀了那封信。信中要求總理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以便給南非制訂一部新的非種族歧視的憲法。

曼德拉：你曾把這封信面交總理嗎？

證　人：是的。

曼德拉：總理看後回信了嗎？

證　人：他沒答覆寫信人。

曼德拉：他沒有答覆。那麼你認爲是這封信引起了全國大多數公民的高度重視嗎？

證　人：我不這樣認爲。

曼德拉：你不這樣認爲，是嗎？難道你認爲人權、公民自由等問題不是對非洲人民至關重大問題嗎？

證　人：是的，是重大問題。確實是的。

曼德拉：信中提到這些問題了嗎？

證　人：是的，我想是的。

曼德拉：你已承認這封信中提到了諸如自由、解放等問題，是嗎？

證　人：是的，信件提及了這些問題。

曼德拉：那麼，你當然知道非洲人沒能享受信中所要求的權力，是嗎？政府拒絕給予他們這些權利。

證　人：拒絕一些權利。

曼德拉：議會中沒有一位黑人議員，是嗎？

證　人：是的。

曼德拉：省議會、市議會中也沒有一個黑人議員，是嗎？

證　人：是的。

曼德拉：黑人在這個國家沒有選舉權，是嗎？

證　人：如議會所說，他們沒有選舉權。

曼德拉：是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我想等一會將討論議會和其它政府部門的問題。黑人在省議會、市議會中沒有選舉權，是嗎？

證　人：是的。

曼德拉：你是否同意我的如下觀點：在世界任何一個文明國度裡，如果總理對一事關大多數人民的重大權利的來信拒絕答覆的話，不是一件醜聞嗎？你同意我的觀點嗎？

證　人：我不同意這一點。

曼德拉：難道你不認爲，如果一個國家的總理對事關民衆生死的重大事宜的來信拒絕答覆是不正常的嗎？

證　人：總理沒有忽略這一信件。

曼德拉：請正面回答我的問題。難道你認爲一國總理對事關全國大多數公民、爲國家的重大利益而作出請請願活動不作回答是合理的嗎？你說這是錯誤的，是嗎？

證　人：總理對來信做了答覆。

曼德拉：巴納德先生，我不願對你粗魯行事。你願意屈尊一下，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嗎？我所問的問題是，在事關全國大多數公民的重大問題的來信，總理不作答覆，你認爲這是最合適的，是嗎？

巴納德先生和我自始至終沒有達成共識。最後，他輕描淡寫地說，來信的語調咄咄逼人，極不禮貌。由於這一原因，總理拒絕答覆。

在整個審理過程中，起訴人、法官頻頻詢問我想傳喚的證人數量。我答道：『我想傳喚像政府一樣多證人。』起訴人發言結束時，法庭裡死一樣的沉靜。人們都期望我開始我的反辯。可是，我站起來，不但沒有傳喚任何證人，反而自然而然的宣佈，我根本就不傳喚任何證人。就這樣，我果斷地結束了對我的辯護。法庭上響起了人們的議論聲。起訴人情不自禁地叫了一聲：『天哪！』

一開始，我就打亂了法庭的安排。因爲我知道，指控是準確的，政府的證據是確鑿的。我認爲傳喚證人和自我辯護是沒有意義的。經過我的盤問和努力，我想讓法官自己反口。我已就法庭的不公正這一點發表了聲明。我認爲，沒有必要傳喚證人來抹掉一些不須爭辯的事實。

法官對我的行爲大感意外，用懷疑的口吻問道，『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大人，我認爲我是無罪過的。』

『你就想說這些嗎？』

『尊敬的法官大人，如果我有話講，我早就說過了。』

起訴人閱翻着他的手稿，想爲他不曾預料到的結果尋找話題。他簡單地向法庭作了發言，並要求法官爲我定罪。法庭宣佈休庭。第二天一開庭，正當我尋找機會請求減刑時，法

庭已先宣判了我的刑期。

第二天上午，在開庭之前，我在法庭外的一間辦公室裡與鮑勃·赫普爾談了一會，他是我這次受審的法律顧問。我倆高度讚賞了聯合國大會所作出的首次對南非進行制裁的決議。鮑勃還我告訴我說，伊利莎白港和德班兩地的破壞活動已經進行，這既是祝賀聯合國的投票行動，也是抗議對我的審判。正說話間，檢查官博斯走了進來，他請求鮑勃暫時離開一下。

『曼德拉，』他說，『我今天不願意出庭，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有這種心情。我厭惡我的所作所爲，請求法庭把你送進監獄，使我內心裡感到十分痛苦。』然後，他伸出手和我握了握，並祝福我一切順利。我感激他的同情心，並安慰他說，我不會忘記他所說的話。

那天，當局高度警惕，法庭裡的人群比開庭的那天還要多。所有的一百五十個非歐洲人座位都座無虛席，溫妮也來了，仍穿那件科薩族裙子，我的衆多親屬也從川斯凱地區趕來了，數百名示威者將法庭團團圍着。警察看起來也和觀衆一樣的多。

當我走進法庭時，我舉起右拳，喊道『曼德拉』，接着響起了『政權屬於我們！』的巨大的呼應聲。法官擊了擊小木槌，示意安靜。當法庭平靜下來時，他總結了對我的指控，然後允許我講話，我請求減刑的發言持續了一個小時。這不是一個司法性申訴，而是一個政治聲明。我想向法庭解釋我爲什麼成爲這樣的人，爲什麼我做了那些事情。如果有機會，我還

會這樣做下去。

許多年前，當我在家鄉川斯凱小村中渡過少年時光時，我聆聽過一位部落長者向我講述白人到來之前的美好歲月。那時，我們和平相處，由國王及其親屬實行統治。他們可以在這個國度裡自由自在的、信心十足地來回視察。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國家，無論名義上或是權力上都如此。我們擁有土地、森林、河流，我們開採地下的礦藏、以及這個國家裡所有豐富的資源。我們建立自己的政府，統治我們的國家。我們控制著我們自己的武器，自我進行貿易和商業活動。老人還向我講述了前輩們抗擊外來入侵者、保衛祖國的故事、以及全部族人民在艱難歲月中的英勇事跡。

早期非洲社會的結構和組織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並大大影響了我的政治視野。這塊土地當時是主要的生產資源，屬於這裡的整個部落，任何人不能據爲己有。這裡沒有階級，沒有貧富差別，沒有剝削和被剝削。人人平等，個個自由。這就是政府的基礎。這一原則在憲法中也有所反應，不過叫法不同罷了。憲法左右部落的事宜，且非常民主，部落的所有成員均可以參與管理。主人和僕人、勇士和醫生，都可以參與決策。這是一個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任何事情不經這一機構討論都不能付諸實施。

這一社會當然有許多原始、不安全的地方。它自然也不能滿足當代人的各種標準。但

是，在這一社會中，蘊含着民主的種子。沒有人是奴隸，或低人一等。在這樣的社會中，貧窮、威脅等無從談起。直到今天，這樣的社會還令我神往。它激勵我和同事們去進行政治鬥爭。

我告知法庭，我加入了非洲民族議會，非洲民族議會的民主政策和非種族主義是我最崇高的信仰。作爲一名律師，我經常被迫在良知與法律之間進行選擇。

我認爲，在這個國家裡，所有有理智的非洲人在其一生中都接連不斷地在良知與法律之間產生着矛盾思想，這不足爲怪。在任何國家，只要是有理智、有思維、有良知的人，都會產生這種矛盾。近來在英國，，出身貴族的勃特蘭·羅素——也許是當今西方世界最傑出的哲學家——被判刑入獄了。其『罪狀』正是由於從事了我今天所從事的事業，因爲聽從於自己的理智從而蔑視當地的法律，強烈反對本國政府大力宣揚的核武器政策。他別無選擇，只有奮力反抗，因此遭到了厄運。我也一樣別無選擇，我們國家的衆多非洲人也別無選擇，現今沿襲下來的一些框框，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制訂和頒佈的法律等，在我們看來，都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不能容忍的。我們的良知要求我們起來反抗。我們必須反對這些法律，並努力改變這些法律。善良的人們對不公正的現象是不會無所做爲、沉默忍受的。人們會奮起反

抗壓迫、努力創造新社會、追求美好的新生活。

我淋灕盡致地陳述了當局無數次利用法律來禁止、限制和審訊我，從而干擾我的正常生活、職業以及政治工作等。

根據法律，我是一名犯人。這並不是因爲我的所做所爲，而是因爲我所代表的階級，因爲我的思想意識，因爲我的良知。根據這些條件來剝奪一個公民的社會權力是不是人間奇觀呢？那些被政府剝奪了權力的人還能過流亡生活嗎？而根據法庭的證詞，我過這種生活已達數月之久了。

在過去的歲月中，與妻兒生離死別令我痛心疾首，夕陽西下時，我在一天的繁忙工作之餘，常指望能與家人共進晚餐，然而，我是一個通緝犯，無法與親人團聚，面臨着被捕和被發現的種種危險。這種生活比起囚犯的生活更加艱辛。沒有人在理智的情況下自願地拋棄任何文明社會中都共有的正常的家庭及社會生活，而選擇這種危險的生活的。

當今這種生活卻姍然而至，來到了我的身旁。因爲我拒絕過正常的生活，我只能過被剝奪了生活權力的生活。這是因爲，這裡的政府醉心於利用現行的法律來置他人於非法的地位。我被迫如此，我對我的既定決心毫無愧意。任何人如果從事我所從事的事業，他也肯定

會像我這樣受到驅逐、鎮壓、迫害，我確信這一點。

我們曾經無數次向政府伸訴我們的不滿，可每一次都遭到怠慢或輕視。我詳細描述了一九六一年大罷工的情況。這是最後的選擇，因爲政府既無與我們面談的跡象，也不準備滿足我們的要求。正是政府利用暴力去鎮壓我們的非暴力的請願，才最終導致了暴力。我說，正是由於政府的所作所爲，我們才採取了較強硬的姿態。我還說，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有義務與我的同伴們共同戰鬥。與我相比，他們可以說是勞苦功高。許多人爲了他們的信仰而先我作出了犧牲，而繼我之後，將會有更多的繼承者。

在宣判之前，我告訴法庭，不管處以什麼刑期，都將無法阻止我獻身鬥爭事業的決心。

法官大人，我認爲，法律能給我施以懲罰，但卻不會因此而使被懲罰者拋棄自己所要爲之獻身的事業。實踐證明，懲罰不能改變理智的人們，更不能改變與我並肩戰鬥的人民和和同志。

儘管知道一個非洲人在這個國家監獄中將要遭受何等的折磨和痛苦，我還是做好了入獄的準備。我已入過獄，知道既便是高牆之內，種族主義者對非洲人的歧視政策是多麼地流行。儘管如此，卻不會改變我的人生之路，也不會對其它和我類似的人產生任何影響。對人

來說，在自己的國度享有自由是他們的執着追求，任何事情都不能改變這一信念。我對監獄內恐怖狀況儘管有承受能力，但是，一想到我的同胞在監獄外所受的非人的待遇，我的憤怒之情遠大於我的恐懼。

法官大人，不管你們就我的罪行定下什麼罪狀，請你們相信，一旦刑期居滿，我將繼續行動，就像人類在神志的引導下不停地運動一樣。我將繼續憎惡種族隔離制度並盡我所能去爭取鏟除這不公平的社會頑疾，直到永遠廢除這一制度。

我對我的人民和南非盡了義務。我相信，子孫後代們將會證明我是無辜的，應該被帶來審判臺上的罪犯不是我，而是那些政府成員們。

當我講完後，法官要求休庭十分種，以便協商判決。我在離開法庭之際，掃視了下人群，我對判決不抱任何幻想。十分鐘後，在氣氛緊張的法庭上，法官宣讀審決結果：煽動人民罷工罪三年，無護照私自出國罪二年，兩者合一，一共五年。不得假釋。這是嚴厲的判決，觀衆席上一陣騷動。當法庭喧鬧之際，我轉向走廊，手握拳頭，高喊『曼德拉』。然後，人群中便自發地唱起了悅耳的歌曲。人們又唱又跳，婦女們則嗚嗚地悲泣。此情此景，使我一時間竟忘記了我將入獄，並要渡過漫長的、所有以前的南非政治犯都不曾有過的艱難的歲月。

走下臺階，他們允許我與溫妮告別。在這個場合，她心情並不憂傷。她神情高昂，沒有流淚，她似乎充滿信心，眞是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一位忠貞不二的妻子。她用力擁抱了我。當我被警車帶走時，我仍能聽到車外的呼喊聲。

五十二

監獄裡不僅限制人的自由，而且企圖使你失去個性。每人穿同樣的服裝，吃同樣的食物，遵守同樣的作息制度。這是一個典型的專權場所，不允許有任何的獨立意識和個性發揮。作爲一名自由戰士、一個男人，我必須爲人的平等而抗爭。

離開法庭後，我被逕直帶到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這是一座陰森可怕的紅色建築，這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現在我是一名已判刑的罪人了，而先前卻是待罪的囚犯，受到與上次無法相比的待遇。我被剝光衣服，雅各布斯上校終於沒收了我的鬥篷，並發給了非洲囚犯穿的粗帆布上衣、襪子、涼鞋和布帽子。短褲子只發給非洲人，因爲對當局來說，非洲人注定是長不大的孩子。

我告知當局，我在任何場所都不穿短褲，並說我準備上法庭控告他們。此後，當給我送來晚飯時，我發現是涼粥，我又拒絕吃。雅各布斯上校思慮再三，最後決定，我可以穿長褲，吃單獨的食物，條件是我必須被單獨隔離。他說：『我們原打算把你和其他政治犯關在

一起，但現在你必須單獨關在一個地方，希望你能接受。』我說只要我能隨意地穿着，那麼，單獨禁閉也無妨。

以後的幾星期，我被完全隔離了。從沒能看見過其它的囚犯。也沒聽見過他們的聲音。一天裡，我被關押二十三個小時，另外有早晚各三十分鐘的活動時間。我以前從沒被隔離過，現在體會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牢中沒有自然光可進入，一個燈泡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我頭頂散發着凄殘的光。我沒有手錶，常把傍晚當成子夜。我無書可讀，無報紙和筆等去寫東西。沒有人可以交談，終日裡腦子空蕩蕩的。十分渴望外界的什麼東西來吸引我的注意力。我想，人們往往寧願受幾十次的鞭打也不願被孤獨地禁閉起來。在寂寞難耐的時光裡，我甚至開始津津有味地欣賞房中的昆蟲之類的伙伴了，發現自己也想跟蟑螂對話了。

我偶而能看見一個中年非洲人看守。一天，我拿一個蘋果賄賂他，想讓他與我交談。『爸爸，』我說，這是極其尊敬的用詞。『你想要這只蘋果嗎？』他轉過臉去，對我的任何言詞都沉默不答。最後，他說，『小伙子，你想穿長褲子，吃好飯食，現在你得到了滿足，但你仍不高興。』他說對了。沒有任何事情會比遠隔於人類群體之外更令人感到殘忍。幾星期之後，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於是告訴雅各布斯上校說，我願意用不穿長褲的代價換得到有同伴相聚。

在那幾個星期裡，我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我的前程。一個自由戰士的歸宿應該是人民群衆之間而不應該是監獄。如果這樣關閉下去的話，最近我在非洲的所見所聞及親身體驗將耗費於鐵窗之內，而不能用之於戰鬥。我詛咒自己不能用自己的特長去創建一支自由之師。

不久，我開始極力反對給我布置的生活環境，要求與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的其它的政治犯們關押在一起，其中一個政治犯叫羅伯特·索布克威，我的請求最終得到了批准，但附有一條十分嚴厲的警告，警告是雅各布斯宣佈的。他說，如果我轉而進行無禮的活動，將產生嚴重的後果。我認爲在我的一生中，我不希望過多的接受諸如此類的冷酷的訓斥。

除了想找人作伴外，我也樂意與索布克威和其它的政治犯人談話。他們中有許多人是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我想，在獄中，我們可以結成在獄外所不能結成的聯盟。監獄使人渴望進行爭論，並使大家看到更多的共同點，而不是分歧點。

當與其它人一道被帶到院中放風時，我們相互致以親切的問候。除索布克威外，還有一個人叫約翰·蓋茲威（John Gaetsewe），他是南非工會的一位領導人；另一個人叫阿倫·莫利特，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在『新世紀』雜誌社工作；還有一人叫斯蒂芬·特夫。他是一名英明的共產黨員和工會盟主義者。羅伯特讓我給他們講述非洲之行的情況。我很高興地做了。我公正地分析了非洲民族議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兩組織在其它非洲人眼中的形象等。在

講話最後，我說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共同研究。但是，在給予我和索布克威幾次接近的機會後，當局便把我們痛苦地拆開了。我們住在單獨的牢房中，各自位於走廊的一頭。

偶而，我們可以坐在院子的地上進行交談，一邊還縫補着衣服。我一直十分尊重索布克威，發現他是一個全面而有理智的人。但是在一些現實的問題上，我們存在重大的分歧：即在監獄生活條件方面。索布克威認爲，爲爭取較好的囚犯生活而鬥爭，首先等於承認政府有權把他關進監獄。我認爲，居住在難堪的環境中是不能接受的。歷史上，所有的政治犯都把爭取改善監獄生活條件作爲其義不容辭的責任。索布克威說，監獄條件只有等國家變化後方能改變。我完全同意這一點，但我不明白爲什麼在我們可以起來鬥爭時不去抗爭。我們始終沒有結束這一爭論。但我們也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我們給當地司令官呈遞了一封信，列舉出我們不滿囚禁生活的重重理由。

索布克威在獄中從不越軌。但在普利托利亞時，他有點敏感和暴躁，這是從斯蒂芬·特夫那裡了解到的。特夫幾乎是索布克威的小剋星，經常與他取樂逗笑，與他做對。既使高興的時候，特夫也是一個難纏的家伙：陰鬱、愛爭辯，並且專橫。他也是一個口才清晰、知識淵博的人，一位俄羅斯歷史方面的專家。總之，他是一名鬥士，但他與每個人都鬥，即使是他的朋友也不放過。特夫和索布克威天天吵鬧不休。

我最樂意與索布克威談論的是政治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有關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標語『自

由在一九六三』。現在已是一九六三年了，而自由還遙遙無期。『我的兄弟，』我說，『一個領導人如果作出一項連他自己都知道無法實現的決定時，是非常危險的。這將在群衆中產生消極的影響。』。

我說這話時，用一種最爲敬重的方式，但特夫跳了進來，開始數落索布克威。『鮑勃，』他說，『你終於遇到了曼德拉這位對手了。你知道，他說的是正確的。』特夫一直不斷地這樣說，索布克威終於不能忍受了。於是他告訴特夫，『走開。』但特夫仍不會停嘴。『鮑勃，人們在等待你。他們將殺了你，因爲你欺騙了他們。你只是一位業餘的活動家。鮑勃，你不是一位眞正的政治家。』

特夫也盡他所能地與我爭鬥。每天上午，當看守來察看時，他總會向他們抱怨什麼諸如說食物太差、條件不好、太冷或太熱等。一天，一位官員對特夫說：『喂，年輕人，你爲什麼每天上午總是嚷嚷不休呢？』

『我抱怨了，我有這方面的義務。』斯蒂芬說。

『可是，你瞧瞧曼德拉，』那位官員說，『他可沒有天天都抱怨。』

『哈，』特夫用不屑一顧的口吻說，『曼德拉是一個小孩子，他害怕白人。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誰。一天上午，我一覺醒來，發現各家報紙都在談論曼德拉。我自忖道，曼德拉是何許人也？我告訴你曼德拉是誰吧，他不知何故被你們塑造成的一個混小子。這就是曼德

拉。」

沃爾特與我們聚到了一起，並渡過了兩個星期的時光。當我們在普利托利亞受審時，他已因煽動罷工罪而在約翰尼斯堡被判處六年的監禁。我倆在獄中有許多時間交談，我們談到他請求保釋的事情，我完全支持這一決定。兩星期後，他保釋出獄。非洲民族議會指示他進行地下活動，從那時開始，他繼續執着地戰鬥着。

沃爾特離開後不久，當我與索布克威去監獄的醫院時，在距離我們二十五碼遠的地方，我看到了那那·西塔（NANA SITA）。西塔是一位傑出的印度活動家，他也被普利托利亞法官判刑，原因是他拒絕搬出他的住所。他已在那所房中居住了四十多年，現今，根據集團住區法，那裡被劃定為白人區。他背部彎曲，赤着雙腳，且患有嚴重的關節炎症，這使我這位腳穿便鞋的人感到很不安。我想過去打個招呼，但有衆多看守監視着，我走動不得。

突然間，我感到眩暈，倒在了混凝土地上。右眼角被深深地劃破了。為此縫了三針。在堡壘裡，我曾被診斷患有高血壓，服用了一些藥。眩暈的原因明顯是由於藥量過大造成的。我被帶到一邊，每日吃些少鹽的食物，這樣可以減緩疾病。

那天下午，溫妮第一次來探望我。不管臉上是否有縫綫，我都不願意錯過這個機會。但她看到我時，十分擔心。我寬慰她說，我很好，並解釋了事情的原委。既使如此，關於我身

體每況愈下的流言還是散佈開了。

五十三

一九六二年十月，在我受審期間，非洲民族議會召開了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的第一次年會。由於這個組織被認爲是非法的組織，大會只能在貝專納蘭邊境的洛巴策（LOBATSE）舉行。此次大會是一個里程碑，因爲此次大會把非洲民族議會與民族之矛組織明確地聯繫到了一起。儘管全國執行委員會聲明說，『我們的重點仍是群衆性的政治鬥爭，』但民族之矛被稱爲我們鬥爭中的軍事力量。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想平息一些無關緊要的由『獨立』組織發起的恐怖活動。該組織與泛非主義者大會有鬆散的聯繫。他們的恐怖活動針對白人和與白人勾結者。非洲民族議會想讓人民了解它的新戰鬥精神。另外還想讓人民知道，軍事行動是有節制的、負責任的。

當局決定加快推行分別發展計劃，以便讓世界看到種族主義是允許有個人『自由』的。川斯凱被選作示範點。一九六二年一月，維沃爾德宣佈，南非政府有意給川斯凱授與『自治』權。一九六三年，川斯凱成爲第一個『自治』的家邦。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川斯凱地區進行立法大會選舉。

但是，班圖體制（BANTUSAN SYSTEM）從來不成體系。投票人反對這一作法，參

與投票只是例行公事。儘管我憎惡班圖體制，但我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應該利用這種體制及其內部的各個環節，以便把它作爲宣傳我們政策的講臺。尤其是在當前我們許多領導人都被捕入獄，或囚禁、或流放而無法擁有發言權的特殊情況下。

反對班圖當局的恐怖活動日益增加。由於破壞活動劇增，當局也更加變本加厲了。新任的司法部長約翰·沃斯特，在二戰時期曾因反對政府支持同盟國而被捕。他是一個慘無仁道的人物，在他看來，對於搞顚覆活動的人，只能報之以鐵拳頭。

一九六三年五月，當局頒佈了立法。按沃斯特所言，此立法旨在『摧毀』『民族之矛』這一最棘手的組織。這一立法修正案又稱爲九十天拘捕法案。該法放棄考慮人身保護法，給予警察更大的權力，可以在無逮捕證的情況下以懷疑搞政治犯罪的名義拘捕任何人。被捕者可無需審判而被囚禁。九十天拘捕法還可以要求延長拘捕期，沃爾特解釋說，『直到永遠。』此法案有助於國家實施警察管制狀態。沒有任何獨裁者會像南非當局那樣賦與九十天拘捕法那麼大的權力。其結果是，警察更加殘忍：囚犯們慘遭毒打，甚至還被實行電擊、窒息以及其它種類的刑罰。在議會中，只有進步黨議員海倫·蘇斯曼投票反對這一法案。

對於非法組織的成員加重了懲罰程度；對一些嚴禁的組織或共產主義者的『進一步的活動』可判處五年以上直至死刑。先前關押的政治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被重新囚禁。當索布克威的三年期滿時，不但沒有釋放他，政府竟無故再次囚禁他，並把他押送到羅本島。

沃斯特還開創性地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制訂了破壞法案，此法案允許官方進行軟禁，可以不經法庭審理而禁止有關人員更多的活動空間，並極其獨裁地禁止公民的多種自由。搞破壞活動的最低刑期爲五年，不得假釋，最高刑爲死刑。由於這項法令涉及面很寬，甚至諸如運送或非法擁有槍支等都被認定爲搞陰謀破壞。議會的另一法令是嚴禁播發散佈一些敏感性人物的言論。我說的話以及所有過去的言論都不得在報紙中出現。『新世紀』雜誌在一九六二年年底被查封。擁有被禁書刊的人被認爲是觸犯法律，處於長達兩年的監禁。另外還制訂了軟禁法的具體條例，最典型的一例便實施在著名白人政治活動家海倫·約瑟夫頭上。

五十四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一名看守來到我的牢房，命令我收拾行李。我問他原委，他不做答。十分鐘後，我被押解到登記處。只見這裡還有其它三位政治犯：特夫、約翰·蓋茲威和阿倫·莫利特。奧肯普上校有分寸地通知我們說，將把我們轉移到別處。到那裡呢?特夫問道。奧肯普說，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特夫再次追問是什麼地方。奧肯普說：『死亡島。』島嶼只有一個，那就是羅本島。

我們四人被綁在一起，一輛無窗的警車載着我們上路了，警車中只有一個垃圾桶。我們坐了整整一晚上，逕直開往開普敦方向。在第二天下午，到達了開普敦港。在行進的警車

中，對於綁在一起的人來說，使用衛生馬桶是十分困難的，十分令人不愉快。

開普敦港布滿了警察和神情不安的便衣。我們站成一串，乘上一只木船。木船在洶湧的海水中行走，我們很艱難地緊握船幫。頭頂有一小孔，是唯一通空氣和陽光的地方。小孔還有另外一個用途『看守們也可以從上面向我們頭上灑尿。當我們上岸時，天還亮着。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羅本島。只見綠樹葱鬱，景色宜人。看起來不像監獄，更像是一個渡假別墅。

這是一座狹小、多風的島嶼，它距開普敦十八海里。人人都知道這座島。我小時候就聽說過這座島嶼。一八一九年，身高六點五英尺的科薩族指揮官瑪卡納在第四次科薩族戰爭中率領一萬勇士守衛GRAHAMSTOWN，失敗後被英國人流放到羅本島。因此科薩族人都知道羅本島這個名字。瑪卡納後來試圖從島上逃脫，但快要抵達岸邊時，被淹死了。人們對一悲劇記憶猶新，被潛移默化於人民的語言中。

瑪卡納並不是第一個被囚禁於此的非洲英雄。一六五八年，在荷蘭與科伊科伊人的戰爭中，奧茲胡毛（AUTSHUMAO）被簡·範·里貝克放逐到這裡。想到奧茲胡毛，我心中感到寬慰。因爲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從羅本島上逃脫的人。由此而出名。他是乘一個小木筏劃過水面到大陸的。

羅本島的名字來源於荷蘭語，意思是海豹。成百的海豹曾跳躍在岸邊的本哥拉寒流中。之後羅本島被劃爲流放地，、精神病院，還曾是一個海軍基地，只是在最近幾年，當局才把

它變成了監獄。

我們遇見一群白人看守，他們高喊：『這是一個島，來者必死亡。』我們前面是一座建築群，建築群周圍有許多哨所，全副武裝的警衛佈滿通往建築群的道路兩旁，氣氛十分森嚴。一個高大的紅臉龐看守向我們叫道：『我是你們的頭兒！』，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恩漢斯（KLEYNHANS）兄弟中的一員，以對囚犯殘暴而著稱。看守們經常說南非荷蘭語，如果你以英文回答他們，他們經常會說『我不懂你這種語言！』

當我們向監獄走去時，警衛們高喊『兩排，兩排，』意思是讓我們站成兩排行進。兩個在前，兩個在後。我與特夫站成一排。這時警衛又吼道『快走。』但這個詞經常用在使喚羊牛之類的動物。

看守讓我們向前走。我轉向特夫，壓低聲音說，我們必須做個好榜樣。如果我們在這時屈從，將來就要任由他們擺佈了。特夫點頭表示同意。我們要向他們表明，我們不是平平常常的罪犯，我們是政治囚犯，因信仰而遭受懲罰的人。

我示意特夫，我們兩個走在前面。一走到前頭，我們就實際上減慢了腳步，故意慢慢地行走。警衛對我們的行爲感到不解。『聽着，』克雷恩漢斯說，『這兒不是約翰尼斯堡，不是普利托利亞，這是羅本島。我們不能容許任何的違抗命令的行爲。快走。』可我們仍不緊

不慢地走着，克雷恩漢斯命令我們停下，他來到我們面前：『聽着，你們這些傢伙，我們將殺了你們。我們不開玩笑的。你們的父母妻兒將永遠不知你們發生了什麼事。這是最終的警告。走。』

針對他的叫囂，我說：『你有你的義務，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我們決定不屈服。我們終於沒有屈從，因爲這時監獄就在面前了。我們被帶到一間長方形的石砌的房屋中，走進一個寬敞的大房間。『脫衣，脫衣。』當我們每脫一件衣物，警衛就搶奪而去，進行仔細地搜索，然後扔到水中。上衣也脫掉，經搜查後扔入水中。然後，警衛命令我們穿衣，也就是說，他們要我們穿上完全浸透的衣服。

進來兩位官員。年輕的一個叫格里克（GERICKE）上尉。從一開始，我們就看出，他打算馴服我們。這位上尉手指我們中間最年輕、最和善的阿倫·莫利特說，『你的頭髮爲什麼這麼長？』阿倫沒說話。上尉道：『我在跟你話說。你的頭髮爲什麼這樣長？這不符合規定。早該剪掉了，爲什麼這麼長？』然後，他停下來，轉向我說，『就像這位的頭髮就好。』我開口說：『我說，我們的頭髮是規定所決定……』

沒等我說完，他大叫道：『不要對我如此講話，小子。』並開始衝上前來，我害怕了。在這種只能人犯我，而我不能犯人的場合，這是令人不快的情況。

當他離我還有幾步遠時，我盡量以緊定的口吻說：『如果你的手指敢動我一下，我將把

你帶到最高法庭，而當我與你在法庭上一決高低之日，你將會一貧如洗。』當我說話時，他停了下來。我說完後，他驚異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我想，我說這話與其說是出於勇敢，倒不如說是虛張聲勢。在這種場合，一個人必須有種氣勢，不管內心是何等的懦弱。

『你的證件？』他問道。我遞過去。我看得出他有點不安。『你叫什麼名字？』我衝着證件點點頭。說，『那上面明寫着呢。』他說『你要在這兒待多長時間？』我又向着證件擺下頭說，『上面寫着呢，』他看看證件說，『五年你要服刑五年，而你還這樣這氣盛。你是否知道五年意味着什麼？』『這無關你的事。我已做好了五年的服刑準備，但沒有學會受污辱，你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

沒人告知我們的身份，他也不知我們是政治犯，更不知我還是個律師，我也沒亮出這一職務。旁邊那位高個的，言語不多的警官在我們爭論的時候悄然離去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羅本島的指揮官斯泰恩（STEYN）上校，上尉終於離開了我們，比來時安分了許多。

這時，只剩下我們幾個人。斯蒂夫嚇得渾身發抖，禁不住說三道四。他說，『我們觸怒了頭們，我們的苦日子馬上就來來了。』正說話間，一個名叫普雷托利亞斯（PRETORIUS）的中尉走了進來。這位中尉說科薩族語。這令我們十分的驚詫。他看起來很熟悉科薩族語言。『我們閱覽了你們的檔案，不是太壞。但這次除外。』他說，然後面向

斯蒂夫說『你的表現很差。』

斯蒂夫發火了。『誰讓你們如此這般地對待我呢?你說我表現很差，你已閱覽了我的檔案?那好，你從中會發現，我有的罪狀都是因爲我爲爭取我們民族的權益而鬥爭的結果。我不是罪犯。你才是罪犯。。』中尉警告斯蒂夫說，如果斯蒂夫再以這種方式跟他講話，他將起訴他。離開之前，中尉說，我們將被安置到一間大房子中，有通向戶外的窗口。最後他十分惡毒地說，『我可不想讓你們通過這個窗戶向別人交談，尤其是你，曼德拉。』

之後，我們被帶到了房間中。這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牢房，窗戶寬大明亮，並能用手觸到窗戶。透過窗口，可以看到外面晃動的看守們以及其它的囚犯。房間很寬敞，對我們四人來說綽綽有餘，房裡還有淋浴及衛生間等。

這一天歷盡顛波，於是晚上吃了一點冷稀飯之後，他們都困乏地睡着了。我裹着毛毯躺在地板上，突然我聽到敲窗子的聲音，我抬頭望去，只見一白人示意讓我到窗前去。我想起中尉說的忠告，沒有理睬他。

然後，我聽見那位白人輕聲說:『納爾遜，過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這令我好奇，於是決定過去碰碰運氣。我走到窗口，看了看他的面容。他一定也覺察到我把他當成了白人，於是他小心地開口向我說:『我是來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看守。』然後，他告訴我關於我妻子的消息。他說約翰尼斯堡當地的報紙上有報導說我的妻子曾到約翰尼斯堡去探望

我，但當局沒告訴她我已被轉到了羅本島。我十分感謝這位看守給我的消息。

『你吸烟嗎？』他說。我告訴他我不吸，他似乎有點失望。我突然靈機一動，說：『對啦，我的同伴們吸烟。』他頓時興奮起興，說他回去取香烟和麵包，一會兒就回來。說話間，同室的人都醒了，特夫和約翰·蓋茲威會吸烟。於是我把香烟分給他們，麵包則由大家共同分享。

以後的幾星期，那位有色看守經常每晚都送香烟和麵包來。每晚，我都把香烟均分給特夫和蓋茲威。這位看守冒的風險很大，他告誡我說，他只準備與我一個人打交道。

當我們抵達羅本島時，不知道這兒到底關押着多少囚犯。過後不久，我就了解到大約有一千多人，都是近期押送來的非洲人。其中大部分是一般的罪犯，但也有一部分政治犯。我試圖與他們取得聯繫，但我們與他們是完全隔離的。開始幾天，我們一直關閉在牢房中，不允許外出。我們要求和其它犯人一樣出去參加勞動。這一要求不久獲得了批准。但必須單獨在另一個地方。由克雷恩漢斯當監工。我們幹的第一件事是掩埋一條新鋪設的管道。站在山丘上，我們可以看到島上的一隅，風光十分美麗。

我們第一天幹得很賣勁，但第二天，克雷恩漢斯卻更變本加厲地催逼我們。他十分殘忍，就像使喚牲口似的。『不行，過來，過來。』有一回，我們之中最年長的斯蒂夫放下鐵

鍬想休息一會兒，克雷恩漢斯馬上就吼了起來。斯蒂夫用南非荷蘭語回答道：『你這蠢貨，連你自己的母語都不會講，你不可以對我指手劃腳的。我以我自己的速度幹活，我計劃這樣做。我只能這樣。』說完，十分高傲地，他揮起了鐵鍬。斯蒂夫曾是一名南非荷蘭語教師，不僅會講一口流利的南非荷蘭語，而且還會講純正的荷語。斯蒂夫對看守說話時，經常使用華麗高雅的詞藻，以至於看守們都無法理解。但看守們卻知道怎樣避開他的口才。

克雷恩漢斯兄弟中有兩人在羅本島，兩人都因殘殺囚犯而出名，看管我們的是是年長的哥哥。也許得到過上司的訓令，不讓得罪我們吧，他從來沒敢觸犯我們。年輕的弟弟則不然。一天，我們收工回來的路上，經過一工作區時，看見有幾百囚犯在用手推車運送沙子。他們不是政治犯。兩個兄弟此時在聊天。我們也停止幹活。年輕的弟弟命令我們給他擦鞋。這時，我認出在運送沙子的一群人中有一些人曾參加了一九五八年爆發的塞克哈克胡蘭（SEKHUKHUNELAND）農民起義，後來被捕入獄並被判爲死刑。我轉過臉，想仔細辯認下。這時，年輕的弟弟粗暴地命令我轉到另一邊看。如果不是站在全體囚犯的面前，不知我會如何反應。現在我只覺得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拒絕服從。克雷恩漢斯弟弟向我走來，想毒打我。可是，正在這時，還沒等他走到我面前，他的哥哥跑了過來，抓着他，在他耳邊說了幾句。於是，事情便平息了。

一天監獄的獄長來到了牢房，此人負責羅本島的日常事務。此次來訪，是想聽從我們對

監獄生活的意見。西倫（THERON）是一個乖戾的傢伙，他並不眞心樂意與囚犯們面對面地談論事情。我既不想對他漠然不理，也不想卑躬曲膝。『我們對你的造訪十分感激，』我代表大家說，『我們目前有許多難處，相信你能予以解決。』我歷數了存在的問題，當我說完後。他說，『我將盡力解決。』

也許他想他剛才的行爲太輕率了些，當他離開時，他轉向特夫，瞧着特夫的大肚子說，『你的大肚皮將消失於監獄中。』

斯蒂夫對這位獄長的所作所爲本來就不以爲然，此時面對污辱更不會無動於衷。『你知道，頭兒，』他說，『你無論如何對待我，都不會眞正妨礙我，因爲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組織——共產黨——的一員。共產黨對全世界的勞苦大衆恩重如山。當我們走上世界舞臺之時，你以及你們可惡的國民黨將成爲垃圾堆。我對國際形勢的了解程度比你們無能的總統要徹底地多。你是什麼東西？一個小卒子，不值得我一提。即便到我離開監獄的時候，我恐也不會記着你的名子。』西倫急忙轉身走了

有色人看守每天夜晚的來訪大大緩解了我們的痛苦生活。但是，即使享有這種待遇，斯蒂夫仍不滿意。特夫是大烟鬼，有時，他能一晚上不停地吞雲吐霧，以至於第二天一天沒烟可吸。蓋茲威則不然，他有所保留，並不把烟吸光。一天晚上，特夫氣衝衝地來到我面前，

『納爾遜，』他說，『你故意少給我烟，你給蓋茲威的烟比給我的多。』

這不符合實際，可我又想我得戲弄他們一下。『好吧，』我說，『每天晚上，一旦我拿到香烟，我首先分成兩份，然後讓你們兩個挑選。』自此以後，我總是把香烟分成同等的兩份，然後對斯蒂夫說，『挑吧。』

特夫此時此刻往往先是猶豫不決。他總是兩堆都瞧瞧，腦袋在兩堆上搖來晃去。最後，他總會帶着複雜的心理，抓起其中的一堆，然後就躲到一邊吸去了。儘管這樣分烟似乎很公平，和諧，但特夫還是不高興。於是，每當看守來到窗口時，他總是逗留在窗口，想看看究竟我是不是隱藏了香烟。這使看守感到很不安。『瞧，』他對我說，『我只爲你辦事，這是個安全問題。』我說，我明白。轉而告訴特夫，在我與看守在一起時，不得在旁邊轉溜。

然而，第二天晚上，當看守來到窗口時，特夫邁步到窗口對看守說，『從今天起，我要我那份香烟，直接給我好了。』看守十分驚慌。『曼德拉，』他說，『你沒履行諾言。我不再帶東西給你了。』我把特夫哄開，對看守說，『小伙子，他是一個老朋友。』我指的是特夫。『他不太正常。』我一邊說，一邊指指腦袋。『例外一次吧，』這樣說後，他態度緩和下來，把東西給我我，但警告說，如再發生此類事件，一切都結束了。

這天晚上，我想有必要懲罰一下特夫。我說，『你瞧，你自己斷絕了供應綫。你今晚得不到任何東西了。你差點葬送了我們這點特殊的待遇。現今，我要斷絕你的供應，直到你改

正爲止。」特夫沉默不語。

我們坐在牢房的一角，吃着三明治麵包，讀着看守拿來的報紙。特夫則坐在旁間的另一角。不知不覺中，我們就睡着了，大約午夜十分，我覺着肩上有手在動，我醒了過來。『納爾遜，納爾遜。』原來是特夫。

『納爾遜，』特夫語調平緩地說，『你終於擊中了我的要害，你剝奪了我吸烟的權力。我上了年紀，我已爲了我的人民而受盡了折磨。你是我們獄中的領導，你也這樣懲罰我，這不公平，納爾遜。』

他說這話也擊中了我的要害，我覺得好像是我濫用了權力。他確實飽受折磨，痛苦遠比我大。我立即把還沒吃完的三明治送給了他。我叫醒蓋茲威——我把全部的烤烟都給了他——求他把烟與特夫平分。特夫總是不聽話，但自那以後，他就順從了許多。

我們開始幹活後，我才終於對島上的囚犯的生活有了些認識。除我們之外，當局還押來一批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年輕的政治犯，住在我們對面。晚上，我們通過鐵欄可以相互交談。我發現其中一個人叫恩卡貝尼·門耶（NQABENI MENYE），他來自姆克凱茲韋尼，是我的侄子。我上一次見到他時，是一九四一年，那時他還是一個孩子。

我們聊了川斯凱的情況以及家族史等。一天晚上，當他的朋友圍在他身旁時，他說：

『叔叔，你屬於哪一個組織？』『非洲民族議會。』我說。我的回答在這些青年中產生了驚愕。於是他們很快從窗口走開了。過了一段時間，我侄子又見到我，問我是不是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我說不是。他說，他知道我在非洲之行的途中加入了泛非主義者大會。我告訴他沒有這事。我一直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我永遠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這使他們很不高興，於是又離開了。

不久，我了解到，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宣傳材料稱，我在非洲之行的途中加入了該組織。我儘管不願聽到這些謠傳，但並不感到吃驚。在政治上，人們永遠不可以低估少數人對某事的了解。過了一段，我侄子又見到我，問我是不是曾在普利托利亞見過索布克威，並與他交談過。我說是的，我們交談的很好。這話他聽後很高興，他向我道了晚安。自此以後，我從來再沒有見到過他。

就在同一晚上的幾小時後，一名上尉來到牢房，讓我們四人收拾行李。幾分鐘後，我的室友們就被帶走了，牢房裡只剩下了我一個人。能與室友們揮手告別是一種幸運，在獄中，有時會與某人親密相處數月，然後，便再也不能謀面了。人們能學會自我控制、自我欺騙，這雖然痛苦，但也不得已而爲之。

這時，我獨自一人待在室內，焦燥不安。人多勢衆有時能給人以安全感。可當你一人獨

處時，沒有證人爲你伸怨。我認識到沒有人給送飯了，於是就敲房門，『看守，我還沒吃晚飯呢。』

『你得叫我頭兒。』看守吼道，那天晚上，我餓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又被送回到普利托利亞。監獄部門向新聞界發表聲明說，出於安全的原因我已被轉移出了羅本島。因爲島上的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囚犯想毆打我。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把我帶回普利托利亞是別有用心的，不久這一點就得以證實了。

我被單獨囚禁在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儘管如此，通過消息靈通的囚犯，我還是很快收到秘密的傳單和來自同一獄中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的消息。我曾與亨利·法齊（HENRY FAZZIE）聯繫過一次，他是民族之矛的成員，曾在埃塞俄比亞接受過訓練，在設法返回南非時被捕入獄。他們是自謀陰破壞法案實施以來第一批被捕的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

通過獄中的聯絡綫，我設法爲他們的辯護作準備。建議他們與哈羅德·沃爾普取得聯絡。但不久，我聽說沃爾普也被拘捕了。這終於使我認識到出了重大的問題。一天，當我從放風的庭院中被帶回時，我看到了安德魯·姆蘭格尼（ANDREW MLANGENI）。當他在一九六一年九月離開南非前往國外進行軍事訓練時，曾見過他一面。除沃爾普、姆蘭格尼之外，還有誰也被捕了呢？

一九六一年初，溫妮接到禁令已兩年了。我從另一位囚犯處獲知，溫妮也受到了違犯禁

令的指控。可能因此而被判處了監禁或軟禁。溫妮很固執。禁止她活動只會招致她的憤怒。我相信她一定會置命令於不顧的。我也從來不會勸說她別這樣做。但此事畢竟使我爲她擔心，擔心她會拘捕入獄。

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一天上午，當我沿着小道在獄中散步時，我看到托馬斯·馬西法恩，他曾是百合花農場的工頭。儘管我意識到，這一定是當局故意讓帶他到我散步的小道上，想看我是否認識他，但我還是禁不住和他打了招呼。他的出現只預示着一件事：那就是當局已經發現瑞沃尼亞那裡的據點了。

過了一、二天，我被叫到監獄辦公室。在這裡，我看到許多人：沃爾特，戈萬·姆貝基、艾哈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姆蘭格尼、鮑勃·赫佩爾、雷蒙德·姆漢拉巴（民族之矛最高指揮部成員，剛剛從中國接受訓練回來。）、伊萊亞斯·毛斯索阿來邊（民族之矛成員）、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師，民主主義者大會成員）、拉斯第·伯恩斯坦（建築師，民主主義者大會成員）以及吉米·坎特（律師，哈羅德·沃爾普的姐夫）等。所有這些人都被指控從事破壞活動。將於第二天在法庭上受審。此時，我的五年刑期剛剛過去了九個月。

從零零星星的消息中，我逐漸了解到事情的經過。七月十一日下午，一輛麵包車和乾洗車開進了百合花農場，但沒人事先預訂這些車。這兩輛車被一名非洲人警衛攔着在門口。可

是，從車上跳下了一大批武裝警察，以及幾條警犬，他們制服了警衛。隨即包圍了整個農場，一群人蜂擁而入。不久，他們找到了一群正圍坐在桌旁開會的人們，並找到一批文件。沃爾特想窗而逃，可不幸被警犬咬着了。

警察搜查了整個農場，沒收了許多文件和記錄，但沒發現武器。其中一份重要的文件當時正好擺放在桌上：民族之矛作戰計劃，即一份準備在南非進行游擊戰的計劃。就這樣，警察上舉逮捕了民族之矛的所有高級指揮官。根據新近頒佈的九十天拘捕法，都遭到了拘捕。

喬·斯洛夫和布拉姆·菲希爾幸好當時不在農場，他倆每天都去那兒二、三次。事後我認識到，警察沒有早些發現這一地點眞是有點幸運。當局變得更加殘酷和精細了。二十四小時偸聽電話等已是截取情報的常用手段，這次突擊是當局的一次成功的行動。

走上法庭的第一天，沒有給我們辯論的機會。只是把我們帶到了法官的面前，指控我們犯有陰謀破壞罪。幾天後，允許我們面見布拉姆、弗農·勃蘭格、喬爾·約菲、喬治·比佐斯和亞瑟·查斯卡爾森。所有這幾個人都是替我們辯護的，我還被單獨關押着，因爲我是一個已判刑的罪人。走上法庭是我與我的同事們談話的唯一機會。

布拉姆很嚴肅。他平靜而鎭定地告訴我們說，我們面臨一次很嚴肅的審判，當局已正式告訴他，他們希望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使用最高刑法——死刑。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氣候，布

拉姆認爲這種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自那時起，我們就生活在絞刑的陰影中。起初我們們認爲結果必然是死刑，因爲一些比我們的罪行還輕微的犯人最近都被判爲終生監禁。

獄中官員的提示讓我們一刻也不會忘記絞刑。一天晚上，就在我休息前，一看守敲打着我的房門，『曼德拉，你不用擔心不夠睡，』他說，『你將要永遠、永遠地長眠了。』我停頓了一下說，『我們都要長眠的，你也不例外。』以此求得一點安慰。

五十五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我們被帶上了一輛重兵把守的車上，車中間放一架鐵柵欄，以便把白人和黑人分開。車子前往普利托利亞行駛，目的地是正義殿——最高法院所在地。我們將在那裡接受審判。我們這個案子被稱之爲『國家指控高級指揮官及其同謀犯』。到後來，此案被稱之爲『國家指控納爾遜·曼德拉及其同謀』，並在南非廣爲流傳，還被稱爲『瑞沃尼亞審判』。在法庭附近，聳立着鮑·克魯格（KRUGER）的塑像，鮑是川斯瓦共和國的總統，在十九世紀，他率領人民抗擊英帝國主義。在這位非洲英雄塑像的下方，是他的一句名言：『在全世界面前，我們充滿信心地從事我們的事業，不管成功或是死亡。自由都將在非洲升起，就像太陽終久會穿過雲霧，照亮大地一樣。』

我們的囚車被圍在一群警車的中間。在車隊前方是一排高級警官的轎車。正義殿內到處

是武裝警察。為避開蜂擁而至的我們的支持者，我們一直開到殿後邊才停下來，然後再經由大鐵門走進正義殿。殿的四周到處是荷槍實彈，高度戒備的警察。當我們走下車時，聽見人群中的呼喊聲和歌唱聲。一走進殿內，便把我們關押進法庭後面的牢房中。等待着開始審訊。這一審訊被新聞界稱之為南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審判。

當從牢房中帶出時，每一位被告都由兩名武裝警察押解着。當我們走進宏偉的高大的法庭時，我們都轉向人群，揮動着握緊的拳頭，行了非洲民族議會的禮節。在旁聽席上，我們的支持者們高喊着『曼德拉萬歲』以及『解放非洲』等口號。這眞是令人激動。但也存在風險：警察把走廊上所有人的名字和地址都登記下來了，並在他們離開時拍下了他們的像片。整個法庭裡坐滿了國內外的記者，以及外國政府的衆多的代表。

我們走進法庭後，一群警察形成人牆把我們與聽衆分離開來。我身穿令我討厭的監獄服裝——卡基布襯衫和劣質的便鞋。作為一名已判刑的罪犯，我沒有選擇穿着的自由。許多人過後評論說，我看起來很憔悴，不僅是穿着問題。我已先後禁閉了幾個月的時間，體重下降了二十五磅。當我走向法庭時，我費力地對走廊上的人群報以笑容，並把我的支持者當成我心中最好的良藥來服用。

到處警備森嚴。幾星期之前，阿瑟·戈德里奇和哈羅德·沃爾普對一名看守進行了賄賂，

之後從獄中跑掉了。亞瑟和哈羅德打扮成牧師，逃到史瓦濟蘭，最後又去了坦桑尼亞。他們逃離正值當局對地下工作者大肆迫害之時，在新聞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使當局十分難堪，我們則因此而士氣大振。

在瑞沃尼亞審判過程中，法官名叫夸圖斯·德·韋特（QUARTUS DE WET）。他是川斯瓦的首席法官，身穿平整的紅色法衣。德·韋特是國民黨執政之前由團結黨任命的最後一任法官。人們普遍認爲他不做政府的走狗。他表情嚴肅，一本正經。起訴人則是珀西·尤塔（PERCY YUTAR）博士。他是川斯瓦地區的副檢察總長。他的野心便是晉升爲南非的總檢察長。此人個頭不高，光禿着腦袋。但穿着卻是衣冠楚楚。當他發怒或動感情時，聲音有點刺耳。他的言辭雖然不精練，但卻富有鼓動性強和誇張性。

尤塔起身站立向法庭宣佈：『法官大人，我把此案定義爲國家對高級指揮官及其隨從的案件。』我被稱爲第一被告。尤塔拿起起訴書斷言說，我們應立即被起訴，並一起受審。這是我們第一次拿到起訴書，起訴人一直沒給我們起訴書，但他們卻把起訴書交給了『蘭德每日郵報』當天的報紙中充斥起訴的內容。起訴書指控我們十一名同案犯製造了大約二百起陰謀破壞活動，旨在進行暴力革命和用武力推翻政府。政府認爲，我們是陰謀推翻現政府的實施者。

我們被控犯有陰謀破壞罪和顛覆罪。但沒有指控我們是叛國罪。這是因爲，陰謀破壞及

顛覆罪不需進行預備性審訊，這對於被告是十分有利的；而叛國罪則不然，另外，兩者的最高刑罰是一樣的，都是絞刑。如果是叛國罪，那麼案件不能僅憑合理的懷疑決定，而需要兩個證人去證實每一項指控。根據陰謀破壞法，只有辯護人才能證明被告無罪。

布拉姆·菲希爾站起來，請求法庭還押處理，理由是被告方沒有來得及整理辯詞。他指出，許多被告已被無故禁閉了多日。國家已準備了三個月，而我們到今天才接到控訴書。法官德·韋特準予我們三個星期的時間。十月二十九日再次開庭。

這一天，我發現溫妮第一次沒到法庭來，這使我很不安。她在約翰尼斯堡遭到許多限制，來法庭需經警察當局的批准。她曾申請過，但遭到了拒絕。我還了解到，我家曾遭襲擊，警察拘捕了溫妮的一位年輕的親屬。溫妮並不是遭到襲擾的唯一一位妻子。阿爾貝蒂娜·西蘇魯、以及卡羅琳·莫托索阿來地（CAROLINE MOTSOALEDI）也根據九十天拘捕法案而遭到了拘捕。沃爾特的幼子馬科斯也被捕入獄了。這是當局用來施加壓力的慣用伎倆：關押自由鬥士的妻子及子女，獄中的許多人能承受當局的各種淫威，但一想到自己的家人也遭受劫難，便會痛苦地難以自拔。

溫妮不斷地請示司法部長，終於獲准出席對我們的審判。條件是不能穿傳統的服裝。同樣的一個政府，一方面禁止溫妮穿科薩族服裝出庭，一方面又要求我們繼承我們的傳統文化，這眞是令人啼笑不得。

在這三周時間裡，允許我們白天在一起準備辯詞。現在，我終於與我的同伴們聚到了一起，令我興奮不已。作爲等待開庭審理的囚犯，允許每周有兩個半小時的來訪，每天還可以從外面送來一頓食物，在皮雷夫人的精心照顧下，我不久便恢復了體重。

在我們準備辯詞期間，政府當局卻已在新聞媒體就此案進行辯論了，一般情況下，一個待審案件不能公開評論，也不能訴諸報端。但是，由於在瑞沃尼亞地區逮捕的這些人是依九十天拘捕法案而入獄的，所以，從技術上講並沒有指控爲犯罪，法律原則就無法約束了。在公開場合，我們被司法部門長的下屬認爲是暴力革命分子。報紙的標題新聞經常類似於『武裝革命』的字眼。

十月二十九日，我們又來到了正義殿。又是一大群激動的人群，又是警備森嚴，法庭上又是列席了許多外國使節。與同志們相處三個星期，使我煥發了新的活力，穿着套服也令我更加信心十足。我們的律師反對強令我們穿監獄服裝這一作法，因此，我們獲得了穿自己服裝的權力。我們又一次向走廊揮動着拳頭。這時有人警告我們說，如果再這樣做，我們將被迫穿卡基布監獄服來法庭。爲防止發生騷動，法庭當局故意把囚犯先進法庭這一程序進行了更改。自那天以後，法官們先進法庭，這樣當我們入庭時，法庭便會一切安然就緒。

我們馬上進行了反擊。布拉姆·菲希爾批評政府的控訴是牽強附會。其中有許多荒誕之

處。比如，指控我參與某些破壞活動，而那些日子，我卻在普利托利亞監獄之中。尤塔有點慌亂。德·韋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辯詞，可是他不僅沒有援引起訴書進行答辯，反而開始了被法官譏諷爲『政治演講』的發言。德·韋特對尤塔的宏詞大論很不耐煩。告訴他說：『尤塔先生，根據我的理解，你的論據的中心就是你樂意認定被告是有罪的。』德·韋特宣佈起訴書無效。他敲打木槌，宣佈閉庭。

自那一刻起，我們從法律意義上講是自由了，但法庭上卻一片混亂。還沒等德·韋特法官走出法庭，我們就又重新被捕了。斯萬尼波爾（Swabeoiek）中尉拍着我的肩膀說，『我以陰謀破壞罪拘捕你。』我們又被押入了牢房。儘管如此，此事對政府的打擊很大，他們現在得重新羅織控訴詞了。

國家重新起草了起訴書，到十二月上旬，我們又被傳到法庭上。我們普遍感覺到，在此期間，德·韋特法官對我們的態度更加有敵意了。我猜想，由於上次他獨立行事，使政府很惱火，因此受到了上面的壓力。新的指控是，我們征集人員進行破壞及游擊戰。旨在開展暴力革命。我們陰謀協助外國武裝力量侵略南非共和國。以便聲援共產主義革命，爲此目的，我們請求並得到了外國的資助。尤塔誇張地說，被告定購的武器足以把整個約翰尼斯堡炸掉。

書記員要求我們進行抗辯，我們一致同意不以傳統方式進行抗辯，而是利用這一機會表明我們對這些起訴的不屑一顧。

『第一被告，納爾遜·曼德拉，你申辯有罪或無罪？』

我站起來說，『法官大人，應該站在被告席上的不是我們而是政府本身。我申辯自己無罪。』

『第二被告，沃爾特·西蘇魯，你申辯有罪或是無罪？』

西蘇魯說：『政府本身應對國內發生的一切負責。我申辯無罪。』

德·韋特法官說他對政治演講不感興趣。我們只可申辯有罪或無罪，但我們不理睬他的提示。每個被告都在申明自己無罪的同時指出，政府是罪魁禍首。

爲了使訴訟更富戲劇性，政府安排了尤塔在南非廣播公司進行現場演說，檢查官及法官的桌前都擺放了麥克風。可是，正當尤塔清理嗓門準備演講時，布拉姆·菲希爾站起來，請求撤去這些麥克風，理由是廣播將造成不公正的偏見。與法庭的正義和威嚴不符。儘管尤塔尖叫着請求保留麥克風，可德·沃特法官還是把它們撤了下來。

在講話中，尤塔爭辯說，自從非洲民族議會組織開展地下活動以來，他們便推行暴力政策，從陰謀破壞到游擊戰爭、以至武裝入侵南非等。他宣稱，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布下了上千名的訓練有素的游擊隊成員。這些成員製造暴亂，然後趁暴亂之際，外國勢力便會進行武裝

入侵。『在隨之而來的混亂，騷亂及無序狀態下，』尤塔大聲說，『這些被告將策劃籌建臨時的革命政府，以便接管現政權，從而以達到控制國家之目的。』這一陰謀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便是民族之矛。它受命於非洲民族議會和共產黨，民族之矛的司令部在瑞沃尼亞。

在他的洪亮的講話中，尤塔講述了我們怎樣爲民族之矛招募成員，怎樣籌劃一九六三年的全國暴動（這裡，他把我們與泛非主義者大會混爲一談了。），怎樣在瑞沃尼亞設立一個大功率的電臺，以及怎樣應對二百二十二起破壞活動負責等。他說，伊萊亞斯·莫托索阿來地和安德魯·姆蘭格尼曾負責徵招士兵。丹尼斯·戈德伯格在開普創辦了一所特殊學校，以便召募人員。他詳述了我們生產各種炸藥的情況，以及向國外請求經費支援的情況等。

以後的三個月裡，國家傳喚了一百九十三位證人，提交了大量文件和照片等，其中有馬克思的著作、游擊戰的歷史、地圖、藍圖以及一個名爲大衛·莫薩馬依的護照等。第一證人是攝影警察，他拍下了瑞沃尼亞的片照。第二證人是爲戈德裡奇家幹活的一批國內工人。儘管他們與主人家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毫無牽連，還是被囚禁至今。這些傭人們在我們受審時認出我們中的一大部分。但是，一位叫傑利曼（JELLIMAN）的老先生卻勇敢地試圖幫助我，當要求他指出第一被告時，他假裝沒看見。檢查官說，再瞧瞧，過去仔細看看面孔。『不，我想他不在這兒。』傑利曼平靜地說。

我不知道政府將用什麼證據來證明我有罪。當許多在瑞沃尼亞制訂的計劃付諸實施時，

我或者在國外，或者在獄中，當我在普利托利亞監獄見到沃爾特時，我請他一定把我所有的資料和日記從農場中轉移出去。可是，在審判的第一星期，當拉斯蒂·伯恩斯坦（RUSTY BERNSTEIN）請求保釋時，珀西·尤塔戲劇般地拿出了『堡壘』地區的草圖，以及我被囚禁在那兒時在這張草圖上的注解。尤塔解釋說，這足以證明每位被告都想逃跑。這一跡象表明，我的東西沒能從瑞沃尼亞轉移出去。後後我了解到，瑞沃尼亞地區的朋友們決定保留我計劃越獄的便條，他們認爲，這張便條到了將來會有歷史意義。但如今，正是因爲這張便條，使拉斯蒂·伯恩斯坦的保釋請求遭到拒絕。

政府的證人明星叫布魯諾·姆托洛（BRUNO MTOLO），或稱爲『某某先生』，在法庭上人們是這樣稱呼他的。在介紹『某某先生』時，尤塔告知法庭，訊問需要三天的時間，然後話鋒一轉，用演戲似的腔調說，此證人『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尤塔請求秘密地給出證據。但是，在新聞發布時還是不得不推出這一證人之星。對在納塔爾的民族之矛領導人講過話，他的有關我的證詞最使我擔心。我認識到，政府很可能判我有罪。

他開口便說，他是民族之矛的破壞專家，曾炸過一個市政府的辦公室、一個高架電線塔以及一段電力綫路。他還十分精確地解釋了炸彈的操作、地雷以及手榴彈等的使用等。他還講過了民族之矛進行地下工作的情況。姆托洛說，儘管他從沒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理想失去信心，但他對該組織卻失去了信心。因爲他認爲非洲民族議會與民族之矛一樣只是共產黨的工

具而已。

他的證詞十分清晰，看起來似乎公正。但是，姆托洛走得太遠了，他的證詞進行了修飾。這肯定是警察當局授意的。他告知法庭，在我給納塔爾地區司令部講話時，我說過所有民族之矛幹部應成爲優秀的共產黨員，但不要公開發表他們的觀點。事實上，我從沒說過諸如此類的話，他的證詞使我與民族之矛以及共產黨聯繫到了一起。他的記憶力如此清晰，一般人看來，他對任何往事都記憶如初。其實並非如此。

我爲姆托洛的背叛感到迷惑不解。但我從不排除某些非洲民族議會高級成員在警察折磨下變節的可能。但是，姆托洛從沒受過刑。但他竟把與此案無關的人都牽連了進去。我知道有人會變節，但背叛這麼多人，這麼多無辜的人，實在不可饒恕。

在辯論中，我了解到，姆托洛曾在加入民族之矛之前犯過一些小罪，曾因偷盜而三次入獄。儘管如此，他還是一個貽害無窮的證人，因爲法官認爲他可信可靠，他的證詞把我們都置於有罪的境地。

這一案件的主要證據便是在瑞沃尼亞繳獲的長達六頁的備忘錄。當警察突襲時，最高指揮部的領導人正在桌前研究這份文件。『解放計劃』（OPERATION MAYIBUYE）勾勒了進行游擊戰爭的簡要的藍圖，並講述了掀起大規模武裝起義的計劃。在文件中，展望了在少數幾個地區布署小規模游擊隊並襲擊預定目標的可能性。文件指出，要組建一支七千人的

民族之矛隊伍，以接應一百二十人的在國外受過訓的游擊隊員。

檢查官認爲『解放計劃』已由南非非洲民族議會執委會批准，並已成爲民族之矛的行動計劃。我們堅持認爲，解放計劃還沒有正式實施，還在醞釀階段。就我所知，『解放計劃』是一個草案，不僅沒有通過，而且它的目標和計劃也是完全不現實的。在當前，我認爲游擊戰不是可行的選擇。

這項計劃是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制訂的，因此我了解得很少。即使是在瑞沃尼亞的一些被捕人員當中，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把此計劃作爲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戈萬與喬·斯洛夫一起起草了這份文件。戈萬堅持說，不僅最高指揮部而且非洲民族議會執行委員會都同意這一文件。他認爲我們不應該在法庭上說我們還在討論這個計劃。可是，所有其它被告認爲：儘管這份文件由最高指揮部起草，並經工作委員會審批，但還沒被非洲民族議會執行委員會批准。盧圖利酋長和奧利弗·坦博甚至還沒看到這份文件。

儘管死刑審判十分殘酷，但我們都情緒高昂。幽默時常出現在我們中間。丹尼斯·戈伯格是最年輕的一位被告，他的幽默層出不窮，往往使我們在不該笑的時候哄堂大笑。當一名起訴證人講雷蒙德·姆漢拉巴曾穿一件牧師的外衣掩蓋自己身份時，丹尼斯則稱姆漢拉巴是姆漢拉巴牧師。

除竊聽外，當局還重新分配了房間，安裝了一道隔欄。從而把白人與黑人分開，隔欄形似一個高櫃臺，上有鐵條，四邊各有五個凳子。當我們的律師第一次坐在櫃臺對面見到我們時，我對布拉姆·菲希爾說：『今天又有新花樣了，先生。是香草香精呢，或是巧克力、冰淇淋、蘇打水？』

在樓下我們的商議室裡，我們經常用便條進行交流，然後便燒掉便條。有一位特務機關的官員負責看守我們，他是斯萬尼波爾中尉。他臉膛紅亮，體格健壯。他認爲我們在背地裡幹着一些事情。有一天，當他從門口觀看我們時，戈萬·姆貝基寫了一張便條，並故意以十分詭秘的方式把便條遞給我。我讀後，點了點頭，然後把它遞給凱西。凱西則故意掏出火柴，裝作要把便條燒掉的樣子。這時，斯萬尼波爾中尉破門而入，搶走了便條。並說了一些諸如在室內點火太危險之類的敷衍的話。然後，他離開房間，去閱讀他的戰利品。幾秒鐘後，他闖進門來說，『我將讓你們所有人得到報應！』原來戈萬在便條上用大寫字母寫道：『難道斯萬尼波爾是一個好傢伙嗎？』

我們被關在獄中，接受人生的考驗，而獄外新生活則充滿生機。吉米·坎特的妻子即將分娩。吉米是一名律師，他被捕入獄不爲別的，只因爲他是哈羅德·沃爾普的姐夫。一天上午，當我們在法庭上坐定時，從另一邊傳給我一張便條。

我和巴巴拉詳細談論過教父，我們決定，不管要出生的嬰兒是男是女，只要你願意接受這個職位，我們都將感到十分榮耀。

我送吉米一張便條，作爲回報。

我將十分高興，這種榮耀是屬於我的，而不是屬於嬰兒。現在，他們不敢給我施絞刑了。

五十六

政府的起訴書很長，一九六三年聖誕節期間一直在宣讀，直到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才結束。我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調查取證、準備辯護。我們被指控的罪證並不平均。詹姆斯·坎特沒有罪證。他甚至不是我們組織的成員，根本就不應該受審。對拉斯蒂·伯恩斯坦、雷蒙德·姆漢拉巴以及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來說，他們的罪證很輕微。我們認爲，他們不應該牽連到這一案件中來。對拉斯蒂來說，罪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警察只是發現他在瑞沃尼亞農場，並與其它人待在一起而已。而其餘的六個人則要對一些指控承擔罪名了。

布拉姆十分悲觀。他斷言，即使我們證實游擊戰爭的計劃沒有獲得通過，陰謀破壞的戰略不會犧牲無辜，國家仍會把死刑強加到他們的頭上。被告們在是否作證這一問題上存有分歧。一些人稱，如果作證，將會對我們案件不利。但喬治·比佐斯建議說，我們必須拿出證據，讓法官相信我們沒有決定從事游擊戰爭，否則，我們肯定會被判處極刑。

從一開始，我們就表明了這樣的態度。我們把這次審判作爲一次宣傳我們信仰的講臺，而不是檢驗法律是否公正。例如，我們將承認我們對一些破壞活動負有責任，我們承認我們中有一批人已離開了非暴力原則而轉向暴力活動，我們對是否減刑或釋放等不感興趣。我們關心的只是利用這次機會進一步加強我們爲事業而鬥爭的決心。不管因此會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不在法律意義上進行自我辯護，而是在道德框架內進行辯護。我們把這次審判當成是繼續鬥爭的另一種方式。我們樂意承認當局所了解到的一些眞實情況，但是絕不會洩漏任何會使其它人受牽連的點滴信息。

國家斷言我們從事了游擊活動，對此我們予以抗辯。我們只承認我們曾籌劃過從事游擊戰爭。一旦破壞活動遭受挫折的話，我們才會這樣做。但我們聲明說，破壞活動還沒有失敗。原因是我們還從來沒有全身投入到破壞活動中去。我們對政府所指控的謀殺或傷害無辜等罪行予以否定。這些指控要麼是無根據的，要麼是其它人的所作所爲，我們從沒有謀求外國勢力的入侵。爲了發表以上聲明，我們認爲有必要向法庭說明『解放計劃』的詳細情況。

對我來說，法庭可拿出許多足夠多的證據來證明我的罪行。在我書寫的一些文件中，可以說明我曾非法出國、曾對我們的人員安排過軍事訓練，而且也曾是民族之矛的幕後人物。另外還有一份我親筆書寫的文件。名字叫『怎樣做個好共產黨員』，從這份文件中，當局認爲我是持有黨員證的共產黨員。事實上，這篇文章的題目摘自一位中國理論家劉少奇的文章。我寫下這個題目是向摩西·科坦尼說明我的觀點。我們曾長時期辯論過是否把共產主義引進到南非來。一般人認爲，大多數共產主義文章是生硬的、晦澀的，並帶有歐洲中心論點，應該簡單、明晰地與南非群衆進行教育。科坦尼堅持認爲不可能這樣做。爲了論證我的觀點，我閱覽了劉少奇的著作，並爲非洲讀者進行了改寫。

我是第一證人，可以爲整個辯護定下格調。在南非，來自證人的證據必須是在一問一答中講出。我不想受此限制。我們決定，我將在法庭上宣讀一份聲明，而不去作證，而其它人則作證並接受盤問。

由於證人在法庭上的聲明不受法庭的提問，所以，就失去了其作爲正常證詞的法律作用。人們選擇發表聲明這一方式通常是爲避免盤問過程。我們的法律顧問告訴我，這樣做可能使我的處境更加險惡。我在聲明中所申明的關於我們無辜受到審判的無數的理由，法官們將可能閉口不提。可是，這不是我們的最高目的。我們認爲，在開始辯護前發表聲明，表明

我們的政治態度和理想是很關鍵的。這樣下面的證人們說話時就會心中有數。我很想與珀西·尤塔一起交鋒，但是，利用這一講臺表明我們的不滿更爲重要。

經協商，我們的達成了一致意見，大家均表同意。我們是通過交換條子進行協商的。因爲整個房間都有人在監聽，我們甚至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間諜機構，故意給他們洩漏一些假情報。我每次都故意暗示，我要出庭作證，以便讓他們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準備對我的盤問。在一次故意策劃的談話中，我告訴喬爾·給菲律師說，我需要一些叛國罪審判案例的記錄，以便準備我的證詞。之後，當看到尤塔在翻閱大量的叛國罪案例時，我們會心地笑了。

我用半個月的時間準備發言稿，一般是晚上在牢房中準備。完稿後，我先向我的同志們與及被告們讀了一篇，他們均表贊同。並提出了一些更改的意見。然後，我讓布拉姆·菲希爾讀一讀。布拉姆閱後感到十分擔心。於是他請一個著名的名叫海爾·漢森的律師進行審閱。漢森告訴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中宣讀了這篇聲明，當局肯定會把他逕直帶到法庭後面，把他綁起來。』這更證實了布拉姆的焦慮。於是，第二天，他來找我，要求修改發言稿。我認爲，儘管我們怎樣講，總要被施以絞刑的，所以，我們還是講我們的心裡話爲好。此時此刻，氣氛十分緊張，報紙經常預言說我們將判處死刑。布拉姆央求我不要讀後一段，但我毫無動搖。

四月二十日，星期一，在嚴密的警戒下，我們被帶到了正義殿。開始我們的辯護。溫妮和我媽媽都在那兒，我在走進法庭時，向他們點了點頭。法庭裡依舊是座無虛席。

布拉姆宣佈，被告已經承認了國家的部分證詞。法庭一陣騷動。但是，他接着說，辯護方將否認國家提出的大部分罪證。包括不承認民族之矛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武裝力量等。他說，民族之矛和非洲民族議會領導都『試圖把兩組織完全獨立。他們儘管不總是取得成功，』他說，『但卻爲此作了許多的努力。』他着重否認南非非洲民族議會是聽命於共產黨的。他說辯護方將對此進行辯解。否認戈德伯格、卡特拉達、伯恩斯坦以及姆漢拉巴等被指控爲民族之矛成員。他說，辯護方將表明，民族之矛並沒有採納『解放計劃』。民族之矛組織並沒有從事游擊戰。

『這也否認嗎？』德·韋特法官不相信地說。

『是可否認的。』布拉姆回答。『有證據表明，曾經有過游擊戰的準備工作，但並沒採納任何計劃。大家都希望不採納這一計劃。』

然後，布拉姆平靜地說：『法官大人，辯護方將首先由第一被告在法庭上宣讀一份聲明。此人曾參與民族之矛的創建工作，他將能告訴法庭該組織創始初期的情況。』

聽到這兒，尤塔從凳子上跳了起來，喊到：『法官大人，法官大人！』獲知我不出來作

證後十分懊喪，因爲他已爲盤問我而費盡了心血。『法官大人，』他沮喪地說：『在法庭上發表聲明，正像發誓一樣不能發揮重要作用。』

『我想，尤塔先生，』德·韋特法官生硬地對尤塔說，『辯護方的律師有足夠的經驗去建議他們的主顧。無需你來幫助。』尤塔坐了下來。『我以及我的顧主們都了解民事法的有關條文，』布拉姆說，『我這就傳喚納爾遜·曼德拉。』

我站起來，面對法庭，慢慢地朗讀起我的稿子。

我是第一被告。

我曾獲文學學士學位，與同伴奧利佛·坦博搭擋在約翰尼斯堡從事律師工作多年。我是一名已判刑的囚犯，刑期五年，罪名是私自出國，並煽動人民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進行大罷工。

我毫不掩飾地承認，我是民族之矛組織的創建者之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份爲止，我在這一組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我想說的是，當局所謂南非的鬥爭是在外國或共產黨的操縱下進行的，這一點是完全錯誤的。我的所做所爲，我個人以及我作爲領導人的所作所爲，都起源於我在南非的切身遭遇，起源於我對非洲人歷史的自豪感，而不是由任何所謂的外來影響。

少年時，我在川斯凱曾聆聽過部落的長者向我講述過早時的故事。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故事是有關我們的祖先爲保衛祖國而抗擊入侵者的故事。對整個非洲國家來說，丁加尼和班巴塔、辛沙和瑪卡納、斯昆格西和達拉希爾、莫索伊索和塞克胡克胡尼等名字是整個非洲的光榮和驕傲。我希望我的一生能有機會服務於我的人民，把我微薄的生命貢獻於自由鬥爭。這就是我所作所爲的動機，是導致我被囚禁的原因。

說到這裡，我必須稍費口舌談一下暴力問題。至今爲止，法庭的一些指控是眞實的，但大部分是虛假的。我承認我曾計劃搞破壞活動，但我搞破壞並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因爲我熱衷於暴力，而是對政治形勢進行深思熟慮的評估後才作出的，是歷盡獨裁、剝削的苦難並目睹了白人對我的同胞們的殘酷壓榨後才做出的選擇。

我想給法庭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我並不是不負責任、不加思考地從事暴力的人。我特別強調指出，在暴力活動中不傷害無辜。

我們非洲民族議會組織是非種族歧視的民主的代表。我們盡量避開那些可能更一步加劇種族歧視的行爲。但殘酷的現實是，經達五十年非暴力活動後，南非人民得到的不是任何實惠，而是更加殘酷的法律、越來越少的權力。法庭可能無法理解這一點。但是，事實確實如

此。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着暴力活動，以便與白人鬥爭，贏回他們的國家。我們作爲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經常勸服他們，避免暴力，採用和平方式。儘管有些人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之間商討過進行暴力活動的計劃，但據此就說明我們通過非暴力活動建立非種族政權的努力的結果是一無所獲的，這一點不容否認。同事們已對此政策失去了信心，並產生了進行恐怖活動的念頭。

民族之矛組織成立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當我們做此決定並繼而籌劃我們的計劃時，非洲民族議會的非暴力及種族和睦的傳統政策還深深扎根於我們的心中。我們感到，這個國家正走向內戰，這是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內戰。我們看到這種情形，非常吃驚，內戰意味着非洲民族議會的立場將被推翻。一旦發生內戰，種族和睦將更是無從談起。在南非歷史上的戰爭中，我們已經有過痛苦的先例。南非戰爭的創傷歷時五十年才得以彌合。一旦發生內戰，要想結束戰火又將要歷時多久呢？又將有多少人流血犧牲呢？

我說，破壞活動爲未來的種族關係提供了最好的前景。白人統治者對我們的活動所做出的反應是殘酷的、快速的：搞破壞活動被認爲是犯罪，可判處死罪。我們不想要內戰，但是我們必須爲應付內戰而作好必要的準備。

經驗告訴我們，一旦反抗，政府將會有充足的理由去屠殺我們的人民。但是，準確地說，目前南非的大地上已經到處浸透着無辜非洲人的鮮血了。因此，我們認爲，使用武力進行持久的破壞活動以反抗針對我們的暴政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如果戰爭不可避免，我們寧願在有利於我們的人民的條件下進行戰爭。對我們來說，最有前途的戰鬥是進行游擊戰，最能減少傷亡的也是游擊戰。因此，在決定我們未來的行動方案時，我們準備開展游擊戰爭。

所有白人都有義務接受軍訓。但非洲人卻沒有這種條件。在我們看來，有必要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核心力量，一旦游擊戰爭爆發，他們將能擔負起領導的職務。我們已做好了應付各種形勢的準備，以防到時措手不及。

我解釋說，在討論這一計劃時，我離開了我的祖國去出席東非、中非、南非泛非主義自由運動大會，並接受了軍事訓練。我說，我之所以接受訓練，是因爲一旦開展游擊戰爭，我想與我的人民並肩戰鬥。儘管如此，我認爲破壞活動還是可行的，應充實新的內容。

我告知法庭，民族之矛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是有區別的，我們兩組織盡力設法保持距離。這是我們的方針。但事實也不是如此簡單的，由於當局對人民濫用法律等，人們經常得在兩個組織工作。儘管這樣有時會混淆兩組織的區別，但卻不會排除二者的區別。政府稱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的目標是一致的或相似的，這種指控是沒有根據的。

非洲民族議會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綱領是，並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義的綱領。『把白人趕入海』這一口號不是非洲民族主義者的觀點。非洲民族議會所贊同的非洲民族主義是所有非洲人民在自己家邦中享有自由和充分發揮權力。非洲民族議會採納的一個重要文件就是自由憲章。這決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採取的綱領性文件。非洲民族議會在其發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提倡在國家的經濟結構中進行革命性的變化。就我所知，也從來沒有咒罵過資本主義社會。

和共產黨組織不同，非洲民族議會只把非洲人作為其成員。它的奮鬥總目標過去是，現在也是為非洲人爭取團結和充分的政治權力。共產黨的目標則不然，它的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代之以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共產黨強調階級區別，而非洲民族議會則尋求各階級之間的和睦相處。

無須多言，共產黨和非洲民族議會有過密切的合作。但合作不能證明有共同的目標。即鏟除白人統治並不能表明有完全共同的利益。人類歷史有時會充滿相似之處。也許最能給人深刻印象的莫過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美蘇三國為共同對付希特勒而進行的合作。除了希特勒之外，沒有任何人認為這種合作會使丘吉爾或羅斯福變成共產主義者或共產主義的工具，也不會認為英美兩國正走向共產主義世界。

對南非白人來說，由於其對共產主義的偏見根深蒂固，他們可能很難理解爲什麼資深的非洲政治家們都樂意把共產黨人作爲他們的朋友。但對我們來說，原因顯而易見，在當前反對壓迫的鬥爭中，我們還無暇顧及理論方面的種種區別。不僅如此，幾十年來，共產黨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當正常人看待並他們平等相處的政治團體。他們與我們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共同進步。正因爲如此，直到今天，許多非洲人傾向於把共產主義與自由平等等同起來。

我告知法庭，我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名非洲愛國主義者。我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觀點對我很有吸引力，也承認深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這對許多新近獨立的非洲國家領導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他們接受社會主義的某些形態，以確保他們的人民能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

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及與馬克思主義者交談，我了解到，共產黨人認爲西方社會的議會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動的。恰恰相反，我崇尚這一體制。

英國的《大憲章》、《權利請願書》和《權利法案》等文獻爲世界所有民主政治家所崇拜。我對英國的政治體制、司法體系等很是欣賞。我認爲，英國的體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體

制。它的有關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等永遠令我敬佩。美國的國會、三權分立理論以及司法獨立等，也使我受益良多。

我歷數南非社會中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可怕差別，在教育、保健、收入以及生活的各個方面，黑人處於維持生計的最低水平。而白人則是世界最高水準，而且還想永遠保持下去。白人總是高喊着，南非的非洲人遠比其它非洲人過得富足。我們不滿的不是因爲與非洲其它人相比我們太貧窮，而是與我們國家的白人相比我們太貧窮。我們在法律上被剝奪了與白人平等的權力。

非洲人之所以缺少作人的尊嚴，根源在於白人至上的統治政策。白人至上則意味着黑人處於卑下的地位。法律是用來保證白人至上制度的統治工具。體力勞動毫無例外地由非洲人來完成。當需搬運東西時，或要清理一地方時，不管白人是否雇有非洲人，他總是習慣於使喚一個黑人來做這些事情。

貧窮以及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帶來一系列後果。孩子們在街上四處遊蕩，他們無處上學，或無錢上學，父母們（如果父母雙方都健在的話）天天都得工作，以便維持生計而無暇顧及孩子的學業。這使得道德淪喪，犯罪猖獗，暴力驟增。不僅表現在政治方面，而且表現

在各個方面。

南非非洲人想要擁有正當的權力，他們希望有安全保障。總之，我們需要政治平等。如果沒有政治平等，我們將永遠處於無能的境地。我知道對這個國家的白人來說，這就意味着革命，因爲絕大多數的投票人將會是非洲人。這使白人對民主產生了恐懼感。

這正是非洲民族議會所要爭取的。他們的鬥爭是眞正的爲民族而鬥爭，是南非人民的鬥爭，是對我們的境遇及痛苦生活的抗爭，這是一場爭取生存權的鬥爭。

在我的生命中，我已投身於南非人民的鬥爭之中。我反抗白人統治，也反對黑人專治。我崇尚民主、自由社會的理想。在這一社會中，人人和睦相處，個個機會平等。我希望能生活在這一理想社會中，我希望能實現這一理想。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將爲此而獻身。

我讀完了我的發言稿後，把稿子放在辯護席上。然後，我面向法官，法庭裡寂靜異常。我記得當我講下面幾句話時，我的雙眼一直盯着德·韋特法官。

整個法庭裡鴉雀無聲。我講完後，就坐了下來。我沒把頭轉向走廊，但卻能感到人們都在盯着我。寂靜好像持續了好幾分鐘，而事實上只有大約幾秒鐘。然後，我聽到走廊處發出

一陣陣的驚嘆聲，接着是女人的叫聲。

我讀了四個小時，此時已是下午四點，法庭休庭的時間到了。但是，一俟法庭恢復平靜，德·韋特法官便要傳訊第二位證人，他是以此來消弱一下我發言的影響力。他不願把我的發言作爲那天最後也是唯一的證詞。但是，我發言的影響力是無法掩蓋的，當我講完坐下時，德·韋特官法才終於敢看了我一眼。

這一講演得以廣泛的流傳。當地與國外新聞界都給予刊登。《蘭德每日郵報》一字不差地登了出來，儘管我的話都是當局所不允許發表的。這一演講不僅表明我們辯護的思路，而且削弱了控訴方。他們認爲我會出來做證，否認對陰謀破壞活動負有責任，爲此他們作了徹底的準備工作。但現在清楚地表明，我們不會設法利用法律細節去推卸我們的責任了。

第二被告，沃爾特·西蘇魯走了上來，沃爾特不得不首先面對尤塔衝我而來的盤問。他首先駁斥了一連串刁難性的問題，他避開尤塔的小詭計，清晰簡潔地闡明了我們的政策。他宣稱『解放計劃』和游擊戰政策並沒有被非洲民族議會所採納。沃爾特告訴法庭，實際上他個人也反對實施這一政策，理由是它不成熟。

戈萬緊接着沃爾特在證人席中發言。他自豪地向法庭陳述了他曾長期擔任共產黨的領導職務，並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情況。檢察官問戈萬，他已承認了指控他的若干事實，那麼爲

什麼不服罪呢?戈萬說,『我覺得我應該出來並解釋清楚使我加入這些組織的一些眞正的原因。首先,是道義上的責任促使我這樣做的。其次,據我所知,服罪預示着承認道德犯罪,而我不承認在我的回答中有道德方面的犯罪行爲。』

和戈萬一樣,艾哈邁德·卡特拉達和拉斯蒂·伯恩斯坦也都承認他們旣是共產黨員也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雖然拉斯蒂在警察突襲瑞沃尼亞時被捕,但國家逮捕他的唯一的理由是他幫助在農場中架設了一部電臺。凱西在他機智的證詞中否認自己有陰謀破壞或煽動別人搞破壞活動。但是,他又說,如果人們堅持戰鬥的話,他支持這樣的行動。

第八個被告,吉米·坎特也已被捕並與我們關押在一起,這使我們大家都驚奇不已。哈羅德·沃爾普通過工作之便爲我們辦理了許多事情,但吉米除了是哈羅德的內弟和法律伙伴外,與非洲民族議會和民族之矛之間沒有任何的聯繫。顯然,逮捕坎特是毫無根據的。我想,國家迫害他的唯一原因是想借此嚇唬那些進步的律師。

那一天,德·韋特法官準備裁決吉米的案件了。當時,我們正在法庭下的禁閉室裡等待,我對吉米說:『爲表示吉利,讓我們換一下領帶吧。』但是當他看到我送給他的是條又寬又舊的領帶,而想換他那絲質領帶時,他也許認爲我僅僅是想爲自己的衣着增色而已。吉米穿衣十分的講究,繫着領帶上法庭,但當德·韋特法官駁回對他的指控時,他把領帶遞給我,表示敬意和告別。

雷蒙德·姆漢拉巴是開普東部非洲民族議會和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之一，但是，由於國家沒有足夠的證據控訴他，所以他否認自己是民族之矛的一個成員，說他不知道任何關於故意破壞的事情。我們一致認爲，第九名被告伊萊亞斯·莫托索阿來地和第十名被告安德魯·姆蘭根尼都不應當服罪。因爲他們兩個是民族之矛的下級成員，不可能對已經說過的話再添加任何內容。伊來亞斯不顧獄中遭受的毒打和酷刑，從不屈服。但做爲最後一名被告的安德魯，卻做了一個違背諾言的供詞，說他曾爲民族之矛傳遞過文件和指示。並且他曾化裝成一名牧師以便於工作。另外，他又告訴法庭，他在獄中曾遭受毒打和電擊。安德魯是最後一個證人，說完後，辯護停止。一切等得到最後的評議和判決。

五月二十日，尤塔交給新聞界一套藍色封面的印着他的演說詞的合訂本，並給我們一套。儘管書的包裝很好，但他的演說簡直是對此案的一種歪曲。其中充滿了添油加醋的污辱性的攻擊。例如，他曾在一個地方說：『被告的欺騙行爲是令人吃驚的，雖然他們只代表班圖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們卻膽敢向世界表明，南非的非洲人是受鎮壓、受迫害、受壓抑的。』德·韋特似乎對尤塔的演說很感不解，於是就打斷他說：『尤塔先生，你承認你沒能證實游擊戰政策已經由非洲民族議會所採納，是嗎？』

尤塔聽罷，驚惶失措，他想不到會反問這樣的問題。我們也感到吃驚，因爲法官的問題

給我們帶來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訴法庭，關於游擊戰的準備工作的確做了。

德·韋特不耐煩地回答道：『是的，這些我知道，被告也承認了。但是他們說，在他們被捕前，沒有決定是否從事游擊戰。所以，我認爲你與他們的說法不相矛盾。你說是嗎？』

『隨你怎麼說好了。』尤塔抑鬱不歡地說。

尤塔最後陳述，這一案件不僅是一種嚴重的叛逆罪，而且是嚴重的謀殺和蓄意謀殺罪，而這兩項在控訴書中都沒有提及。他怒氣衝衝地宣佈：『我冒昧地說，起訴書中的每一項都已經得到證明了。』即使他說出了這些話，他自己也知道，指控是顯然經過僞造的。

辯護人亞瑟·查斯卡爾森首先站起來解釋控訴中涉及的一些法律問題，他反對尤塔的觀點，即此案與謀殺有聯繫。並且提醒法庭說，民族之矛的政策是盡力避免流血犧牲。亞瑟解釋說，其它的組織犯有故意破壞罪，而我們卻作爲被告受到了這一指控。這時，德·韋特打斷他說，他已知道這一事實了。這又是一個出乎意料的勝利。

緊接着，布拉姆·菲希爾發言。他準備辯解國家所列出的兩點指控。其一，我們已經開展游擊戰，其二，非洲民族議會與民族之矛是同一個組織。雖然德·韋特已經表示他相信游擊戰沒有開始，我們也沒有放過這一問題。正當布拉姆開始駁斥第一個問題時，德·韋特突然暴躁地搶先說：『我想，我的看法已很清楚了。我認爲，游擊戰的決定和日期都是對不上號的。』

當布拉姆開始辯解第二個問題時，德·韋特再次打斷他說，他已承認兩個組織是各自爲政的。由於布拉姆平常不善於準備問題，所以，他對德·韋特的回答無言以對了。只得坐了下來。事實上，法官早已接受了他的觀點。我們都興高采烈。這是當人們面對死刑時才會有的那種高興勁。後來，法庭休庭三周，德·韋特也開始研究怎麼裁決我們了。

五十七

全世界都一直在關注瑞沃尼亞審判。他們在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爲我舉行了通宵的守夜。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倫敦大學的學生選我當他們的學生聯合會的主席。聯合國的一些專家極力主張在南非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以實現眞正的議會制，並且建議對所有反對種族隔離的人實行大赦。德·韋特法官決定宣佈判決的前兩天，聯合國安理會（其中有四個棄權票，包括英國和美國）敦促南非政府結束審判，並赦免被告。

在我們預期再集合的前幾天，我爲得到法學學士學位參加了倫敦大學的一系列考試。在裁決前幾天我還要參加法律考試，這看起來似乎有點好笑。對於看守來說，這似乎難以理解。他們說我要去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法學學位。但是在審判期間我仍在繼續學習，我還想參加考試。我的主意已定，後來我意識到這是防止我產生消極思想的一個辦法。我知道我不會很快再次實踐法律，但我不想考慮其它的選擇，我通過了考試。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我們又在正義殿集合等待裁決。我們知道對於我們中的至少六個人來說，裁決結果不會是別的，只會是犯罪，問題是刑期的長短。

德·韋特很快就言歸正傳了。他以低沉而又流利的語調說：『我對我所得出的結論的原因已記錄在案，但我不打算宣讀它們。』

『第一被告有四點罪證。第二被告也犯有所有的這四點罪行。第三被告也是如此。』

德·韋特宣佈了每個人被指控的所有主要罪行。凱西被指控有四點罪行，但最後確認只有一項。拉斯蒂·伯恩施坦據查無罪被釋放。

『我不打算解釋今天的宣判結果，』德·韋特說，『政府和被告將有機會提出任何意見，時間是明天上午十點鐘。』於是法庭休庭了。

我們曾希望凱西和姆漢巴拉或許能夠逃脫罪責，但這是另一個跡象，如果有必要的話，政府將採取更嚴厲措施。如果它幾乎不用什麼證據就能證明姆漢巴拉在所有四點上有罪，那麼我們那些有那麼多不利證據的人就難免被判死刑了。

那天夜裡，我們自己人討論完以後，我和沃爾特，戈萬通知律師，不管我們受到什麼樣的判決，即使是死刑，我們也不再上訴。我們的決定使律師非常震驚。我和沃爾特、戈萬相

信上訴將會有損於我們在道義上已經取得的高姿態。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管做什麼，我們都要自豪地去做，一切為了道義。現在我們不準備在上訴中有別的建議。如果死刑判決被通過，我們不想妨礙勢必會蓬勃發展的群衆運動。鑒於我們一直採取的大膽的、對抗措施，上訴將會打擊我們的情緒，甚至會使我們的幻想破滅。我們的信條是，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付出多大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律師對我們的決定不太滿意，想討論一下上訴的問題。但是我和沃爾特，戈萬想討論一下第二天宣判程序的技巧。假如我們被判死刑，那將會怎樣？有人告訴我們，德·韋特宣佈了死刑判決之後，我做為第一被告，他會問我：『你還什麼理由證明你不應被判處死刑嗎？』我告訴布拉姆、喬爾和弗農，如果這樣的話，我將有很多話要說。我會告訴德·韋特，我準備去死，是基於這樣的信條，我的死對於我為之所獻身的事業將是一種激勵。我的死——我們的死——不會是白白犧牲的，如果我們的死亡能為我們的事業做出比我們生來說更大的貢獻，我們就義無反顧地去死。律師說這樣一番講話對上訴沒有用處，我重申我們不會上訴。

如果我們沒有被判處死刑，不上訴也有現實的原因。有一點，我們可能忘了。受理上訴的法院可能認為德·韋特太寬厚了，我們理應受到死刑的懲罰。上訴將會阻礙國際力量對南非政府施加壓力來釋放我們。

對於國家來說，死刑將是最可行的裁決。我們聽說司法部部長約翰·沃斯特曾經對朋友說，斯馬茲總理在二戰期間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把他的叛敵處以絞刑。他說國民黨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爲死刑做好了準備。一旦要作好了應付某事的準備，就必須執着地等待。你不可能一邊作好的應付某事的準備，一方面又暗自希望此事不會發生。我們每個人都作好了準備，這不是因爲我們勇敢而是因爲我們很現實。我想起了莎士比亞的一段話：『把死看得淡一些吧，因爲不管是生和死都是美好的。』

五十八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我們最後一次進入法庭。自從在瑞沃尼亞被逮捕以來已近一年了。安全防衛措施十分嚴密。護衛我們的車隊響着尖嘯的警報聲通過街道。所有通向法院的道路都被斷絕了交通。警察檢查任何一個試圖走近正義殿的人的身份證，他們甚至在當地的公共汽車站和火車站設置了檢查點。約有兩千名群衆不顧恐怖在法庭前集合起來，拿着旗幟和標語，上面寫着：『我們支持我們的領袖。』裡邊的旁聽席位已經滿了，外國記者和當地的新聞界人士只能站着。

我跟溫妮和我母親打了招呼，在那兒看見她們眞讓人振奮。我母親從川斯凱一路長途跋

涉而來。可以想像，到法庭去看自己的兒子是否將被判處死刑，那是怎樣一種痛苦。儘管我懷疑我母親不會理解所發生的一切，但她對我的支持從不動搖。溫妮對我也是同樣的堅定，她給了我力量。

書記員宣佈此案爲：『政府控告曼德拉及其同謀』。在判決之前，有兩個人提出減刑的請求，一個是哈羅德·漢森，另一個是阿倫·佩頓，佩頓是自由黨的全國領袖。漢森慷慨激昂地說，民憤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人民總會想方設法發洩他們的不滿。『犯罪並不是他們的目的，』漢森說，『僅僅是他們求助的一種方式。』他還說，法官將會清晰地回憶起他的人民，南非荷蘭人民，曾經爲爭取自由英勇地鬥爭過。

儘管佩頓自己不支持暴力，但他說被指控的人只有兩種選擇：『或者低頭屈服，或者以武力反抗。』他說被告應該受到寬恕，否則南非前景黯淡。

但是德·韋特似乎沒有聽任何人的講話。他既不抬頭看，又不記任何筆記，他好像在沉思。顯然他已經做出了決定；他只在等待公布他決定的那一刻。

他點點頭示意我們站起來。我試圖捕捉他的目光，但他竟然不往我們這邊看一眼。他的目光聚集在法庭中部的某個地方。他的臉色非常蒼白，呼吸沉重，我們互相對看了一眼，似乎明白了：一定是死刑，否則爲什麼這個一貫很鎮靜的人會如此不安？這時他開始講話了。

我在審理這個案子的過程中聽到大量非歐洲人民的不滿。被告告訴過我，並且他們的律師也告訴過我，被告完全是被一種改良這些不平的願望所驅使的，他們全部是非洲人民的領袖。我根本不相信被告的動機像他們對法庭說的那樣無私。號召革命的人通常會掌握統治權，個人野心作爲動機之一不能被排除在外。

他停頓了一下，好像穩定一下他的情緒。德·韋特的聲音以前是沉默沙啞的，現在聽起來相當宏亮。

法院的功能正像其它任何國家的法院一樣，是用來加強法律和維護秩序的，但它所加強的法律只適用於法院服務的這個國家。被告已查明的那些罪行是重大的罪行，是謀反之罪，其本質是一種高級叛國行爲。政府已經決定不以這種形式來指控這種罪行。鑒於此，經過慎重考慮，我已經決定不把最嚴歷的懲罰強加於被告，而在通常情況下，這種案子是應當受到這種懲罰的，但是出於忠於職守的原因，這已是我所能表現的唯一一點寬厚。這個案子中所有的被告都將被判處終生監禁。

我們相視而笑。當德·韋特宣佈他沒有判處我們死刑時，法庭內一片嘩然。觀衆中有的人極度驚鄂，因爲他們沒有聽見德·韋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伯格的妻子朝他喊到：『丹尼斯，他說什麼！？』

『終生監禁！』他叫嚷着，並咧嘴笑了。『監禁，終生監禁！』

我轉過身，微笑的目光掃過觀衆席，搜尋着溫妮和母親的面孔，但是法庭裡一片混亂。人群呼喊着，警察在推擠着人群。我看不清他們。當旁聽的觀衆簇擁着湧出法庭，告訴外面的群衆最後的裁決時，我亮出了大拇指做了一個非洲民族議會敬禮的手勢。警察開始把我們推出法庭被告席，帶到通往地下室的門。我再次尋找溫妮的臉，但是在我低頭穿過通往地下室的門之前，我還是沒有看到她。

在法庭的地下室裡，我們一直戴着手銬。警察對外面的人群感到非常惱怒。他們讓我們在地下室待了半個多小時，希望外面的人群疏散開。我們來到大樓的後面，鑽進黑色的汽車裡，摩托警衛隊的車快速駛過我們身邊。爲了避開人群，車走了另外的路，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聽到人群在叫喊：『曼德拉』。我們緊握拳頭，伸出車窗欄杆外，期待着人們能看見我們，但他們能不能看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是已被判刑的犯人。丹尼斯·戈德伯格和我們被隔開了，因爲他是

白人。他被帶到了別的地方。我們其餘的人被關進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的一個牢房裡，與其餘的犯人都隔開了。在這裡，我們聽不到喊聲和歌聲，只有獄門和大門的鏗鏘之聲伴隨着我們。

那天夜裡，我躺在地下室裡的草蓆上，心中思考着德·韋特所做的判決的原因。毫無疑問，他考慮到了遍布南非的群衆運動和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國際工會組織曾抗議過審判。世界碼頭工人聯合會曾以不再搬運南非貨物相威脅，前蘇聯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列夫也寫信給維沃爾德博士請求寬大處理。美國國會會員也進行過抗議。英國議會的五十名成員在倫敦舉行了一次遊行。據傳英國外交大臣亞歷克斯·道格拉斯·賀馬也在幕後爲幫助我們的事業而奔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何德萊·史蒂文森曾寫信表示美國政府願爲阻止死刑判決盡一切努力。我想一旦德·韋特接受了我們並沒有發動游擊戰爭的事實，並且承認非洲民族議會和民族之矛是獨立的兩個實體，那麼他們把死刑強加給我們就很困難了；那似乎太過分了。

維沃爾德告訴議會，判決並沒有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表示抗議和請求的電報的影響。他誇說，他已經把所有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報都扔進了廢紙簍裡。

在審判接近尾聲時，德·韋特法官向布拉姆·菲希爾談到到，被告在此案中引起了大量世界規模的廣泛宣傳。這大概是他承認自己受到壓力的方法。他知道如果我們被處死刑的話，

大多數人就會把他當作殺害我們的劊子手。

然而來自本國人民的壓力更大。他是一個非洲白人，一個南非制度和思想的產物。他不想反對塑造了他的信仰的社會體系。他以判處我們終生監禁而屈服於這些壓力，又以沒有判我們死刑來抵制這些壓力。

我對德·韋特強加於卡特拉達、莫托索阿來地和姆蘭格尼的判決感到吃驚和不滿。我原來希望他能釋放凱西，給伊萊亞斯和安德魯輕一點的判決。後兩位是民族之矛組織比較次要的成員，他們三個人合起來所犯的罪過幾乎比不上我們另外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人所犯的罪。但由於不願上訴，我們只好讓凱西、安德魯和伊萊亞斯受些委曲了。如果上訴的話，法庭也許會給他們減刑的。

每天晚上熄燈前，在普利托利亞地方監獄裡都會傳出非洲犯人唱自由歌曲的聲音。我們也加入到這宏亮的合唱中去。但是每天晚上燈即將暗下來之際，好像在服從某種無聲的命令似的，唱歌的聲音都會停止，整個監獄沉寂下來。然後，從監獄的幾個地方會傳出呼喊『曼德拉』的聲音，這時就會有成千上百呼喊『政權屬於我們』的聲音作爲回應。通常都是我們自己這樣一應一答，但那天晚上是其它不知名的犯人先喊的，從整個監獄傳出的聲音似乎不同尋常的強大，好像在激勵我們堅信未來。

第八章　羅本惡魔島：黑暗的歲月

五十九

午夜，我從夢中醒來，凝視着天花板——法庭上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這時，過道上響起了腳步聲。我被關在單人囚房裡，與世隔絕。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從門柵裡我看見奧肯普（Aucamp）上校的臉，『曼德拉，』他用沙啞的聲音低聲地問：『你睡着了嗎？』

我回答說我醒着呢，他說：『你的好運氣來了，我們要帶你到一個自由的地方。在那兒你可以隨便走動，你還可以看見碧海和藍天，不必整天對着灰牆。』

他沒有嘲笑的意思，但我非常清楚他所指地地方絕不會有這些我渴望已久的自由。然後，他神秘地告訴我：『只要你不惹麻煩，要什麼就有什麼。』

接着奧肯普叫醒其他人，他們也是分別關押，奧肯普要他們收拾好東西。十五分鐘後，我們穿過普利托利亞中央監獄的重重關卡，耳畔不斷傳來金屬牢門叮叮噹噹的聲音。

出了監獄，我們七個人——沃爾特、雷蒙德、戈萬、凱西、安德魯、伊萊亞斯，還有我

——被戴上手銬，坐在警車的後面。這時午夜剛過，但我們毫不疲倦，也沒有抑鬱的氣氛。我們坐在滿是塵土的車廂裡，唱着歌，想像着最後審判的情景。看守送來三明治和冷飲，範威克（Van Wyck）中尉也坐在車後面。他是個樂觀的傢伙，唱了一會歌後，毫無顧忌地大談起我們的將來。『喂，』他說：『你們這些傢伙不會在監獄呆太長時間。釋放你們的呼聲太高。一兩年後，你們就能出去，那時你們就是民族英雄了。人們會向你們歡呼，每人都想認識你們，女人會找上門來。哈，你們走運了。』我們只是聽着，沒有插話，但我得承認他的話大大地鼓舞了我。不幸的是，他的預言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時間裡都沒有實現。

在大批警察的押送下，我們悄悄地、秘密地出發了，經過差不多半小時，於午夜時分我們到達了市郊的一個小型軍用機場。我們被塞進一架大型運輸機裡，這種飛機也曾經有過它的全盛時期。飛機裡沒有取暖設備，我們在機艙裡瑟瑟發抖。有些人以前根本沒有坐過飛機，看起來他們對旅途的憂慮更勝於對目的地的憂慮。在一萬五千英尺的高空上下翻騰似乎比被關在高牆裡的單人囚房中更危險。

飛行了大概一個小時以後，下面漸漸露出了曙光。飛機上有艙口，當朦朧中能看見東西時，我的同志們把臉貼在艙口的玻璃上。我們正向東南方向飛，飛機穿過奧蘭治自由邦乾燥、一望無際的平原和開普半島綠色的崇山峻嶺。我也伸長脖子通過艙口眺望下面的景色，

這時我不是一個旅行者，而是一個戰略家，在尋找一支游擊隊能夠隱蔽的地方。

民族之矛成立之後，關於能否在南非鄉村建立一支游擊隊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大多數高層領導人持否定態度。當我們飛過開普省馬圖斯堡（Matroosberg）地區森林茂密的山區時，我大聲向同志們宣布，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進行武裝鬥爭。人們激動不已，急於看個究竟。的確，這個地區繁茂的森林看起來能夠隱蔽一支新生的游擊力量。

幾分鐘後，我們飛過開普敦市郊。不久，我們看到了一座小型拳擊房，市中心微微閃光的塔和桌山平坦的山頂。以後，飛過桌灣，在大西洋的碧波中，我們看見羅本島模糊的輪廓。

我們在島上的軍用機場着陸。這是一個愁雲慘淡的日子，我們走下飛機時，凜冽的寒風抽打着我們單薄的囚衣。沿途是手持自動武器的哨兵，和兩年前我來這個島隆重熱烈的場面相比，氣氛緊張而又沉悶。

我們被拉到島上的舊監獄，這是個孤伶伶的石頭建築，到那後我們被強制脫掉衣服站在外邊。按常規，當犯人從一個監獄轉移到另一個監獄時，他所受到的侮辱之一是首先把原來穿的囚衣脫掉，換上新監獄的囚衣。我們脫掉原來的囚衣後，他們扔給我們幾件羅本島普通的卡其布衣服。

就連囚衣的式樣也反映了種族隔離制度的特點。除凱西之外，所有人都發了短褲、一件單薄的襯衣和一件粗布夾克衫，凱西是我們之中唯一的印度人，他得到了長褲。通常非洲人只能得到用輤車輪胎做成的便鞋，但這次我們都得了普通的鞋子，只有凱西得到了襪子。對非洲人來說，短褲意味着他是『孩子』，而不是成人。那天我穿上了短褲，但我暗暗發誓決不讓它永久陪伴着我。

哨兵用槍指給我們路，他們用簡單的詞語大聲向我們下達命令：『走！』『安靜！』『站住！』他們沒有用我們旅途中碰到的那種恫嚇的語氣威脅我們，而且態度漠然。

這所古老的監獄對我們來說只是臨時性的。當局正在對我們這些政治犯實施一整套隔離性的、最大限度的安全措施。在這裡，他們禁止我們外出或與其他囚犯有任何聯繫。

第四天早晨，我們被戴上手銬，塞進一輛密封的卡車裡，帶進一座獄中之獄。新去處是一座一層高的、長方形的石頭堡壘，堡壘裡有一塊平坦的水泥院落，一百英尺長，三十英尺寬。三面建有囚房，一面是二十英尺高的牆，牆中間是一條狹窄的過道，有牽着德國種狼狗的哨兵在那兒巡邏。

三面的牢房分別叫A區、B區和C區，我們被關在B區，在四邊形的最東面。我們的單人牢房都位於一條長過道的兩邊，其中有一半面對着操場。一共有大約三十間牢房。單人牢

房的犯人總數一般是大約二十四個。囚房裡只有一個窗戶，一英尺見方，嵌着鐵柵欄。牢房有兩道門：裡面是一扇金屬門或鐵柵欄門，外面是一扇厚厚的木製門。白天，只有柵欄門鎖着；晚上，木門也鎖上了。

牢房是倉促建成的，獄牆永遠是潮濕的。有許多時候，過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地下積了薄薄的一層水。我向監獄長提出這個問題，但他說我們的身體可以吸收潮氣。我們每人配了三條毯子，又薄又舊，幾乎是透明的。床上用具只有一條波羅麻或草編的薦子。後來又給了我們一條氈席，我們把氈薦鋪在波羅麻薦上，這樣能顯得軟一點。在那個季節裡，牢房裡寒氣襲人，而毯子禦不了什麼寒，因此我們幾乎總是合衣而眠。

我的牢房在走廊的盡頭。從這裡可以看見操場，牢房裡的小窗子恰好與眼睛在一個水平綫上。我的牢房長三步，躺下時，腳能碰到牆，而頭則緊擦着另一頭的混凝土。寬度六英尺，牆至少有兩英尺厚。每間牢房外面都貼着我們的名字和編號，我的是『納爾遜·曼德拉四六六／六四』，也就是說我是一九六四年抵達此島的第四百六十六名犯人。我此時正值四十六歲，是一個被判終生監禁的政治犯，這裡狹窄的牢房將是我遙遙無期的家。

我們馬上與監獄普通區的許多犯人混熟了，普通區是一幢矮墩墩的磚式建築，離B區不遠。普通監獄稱爲F區和G區，關押着大約一千人，他們中的大部分是違反習慣法的犯人。

其中四分之一是政治犯，他們中的一些人和我們一起被關押在B區。我們與普通犯人隔離，其原因有二：從安全的角度講我們是危險分子；但從政治角度講我們就更加危險了。當局唯恐我們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傳染』給其他犯人。

和我們住在一個區的犯人中有喬治·皮克（George Peake），他是南非有色人大會的創建者之一，一個犯有叛國罪的囚犯，被捕前曾任開普敦市政委員會的成員。丹尼斯·布魯特斯（Dennis Brutus），也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動家，還是詩人和作家，被捕於伊麗莎白港，理由是違反禁令。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還有比利·奈爾，他是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老資格成員，他的罪名是作爲民族之矛的一名成員企圖謀反，這個罪名與我們不相上下。

以後的幾天裡，我們認識了更多的人，包括內維爾·亞歷山大（Neville Alexander），一位著名有色人知識分子，非歐洲聯合運動成員，他在開普敦，建立了一個規模不大的激進主義組織，叫『游擊戰』（Yu Chi Chan）俱樂部，學習游擊戰知識。內維爾獲得過開普敦大學碩士學位和德國蒂賓根大學德國文學博士學位。和內維爾一樣，費克爾·巴姆（Fikile Bam）是開普敦大學法律系畢業生，同時也是游擊戰俱樂部成員。澤弗奈亞·莫托彭（Zephania Mothopeng）是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委會成員，他在奧蘭多當過教師，是班圖教育法堅定的反對者，他是泛非主義者大會最傑出的領導人之一。還有三個來自川斯凱的上了年紀的農民，他們被控企圖謀殺川斯凱『自治』政府首席部長馬坦奇馬。

這些人構成了大約二十名囚犯的核心。其中一些人我認識，還有一些以前聽說過，有些根本不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囚犯們最盼望的時刻是舊友重逢和結識新朋友，但在頭幾個星期裡，氣氛沉悶，我們甚至沒有彼此問候。看守和囚犯的數目一樣多，他們用威脅和恐嚇執行每一項規則。

第一個星期，我們開始勞動，以後幾個月我們都要幹這種活。每天早晨，排球大小的石頭被堆在從出口到操場的地方。我們用手推車把石頭運進操場中央。每人發一只四鎊和一只十四鎊的錘子，十四鎊的是用來敲大一點的石頭。我們的任務是把石塊敲成碎碴。我們被編成四排，一米半遠一排，盤腿坐在地上。我們每人有一個輪胎做的橡膠圈，放石頭用。用橡膠圈是爲了避免石渣飛起傷人，但實際上它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只好戴上簡易的橡膠面具保護眼睛。

看守在人群中間走來走去，喝令大家保護安靜。頭幾個星期，各區的、甚至別的監獄的看守都來到這裡，監視我們幹活，好像我們只是一群關在籠子裡的動物。勞動繁重而又困難，它沒有緊張得足以使我們發汗，但卻因爲強度太大，造成所有人的肌肉都拉傷了。

六、七月份是羅本島最寒冷的時候。冬季的餘威猶存，天空開始下起雨來。怎麼也看不出有華氏四十度。既使站在陽光下，我穿着單薄的卡其布衣服瑟瑟發抖。這時我第一次領略

了俗語裡所謂骨子裡發冷的感覺。中午我們有一點吃飯時間。第一周我們的午飯是湯，味道不堪回味。下午我們獲准在嚴格的監視下有半個小時的活動時間。我們一起圍着操場輕鬆地走走。

在我們開始敲石頭的第一天，一個看守命令凱西把裝滿石碴的手推車推到停在門口的卡車那裡。他身體單薄，幹不了重體力活。凱西推不動手推車。看守嚷嚷道：『快把手推車推走！』凱西推了推，眼看手推車就要翻了，看守們哈哈大笑。我看得出凱西不想成爲他們的笑料。我知道怎麼推手推車，於是跳起來幫助他。在看守還沒有醒過味來時，我教凱西慢慢推動手推車，告訴不要太用力，而要掌握好平衡。他點點頭，然後小心地推着手推車慢慢穿過操場。看守們不再笑了。

第二天早晨，當局在操場上放了一個體積巨大的桶，告訴我們在周末之前要裝滿一半石碴。我們拚命幹，達到了預期的目標。第二周，値勤看守命令我們必須裝滿桶的四分之三。這一次我們又按預定時間幹完了。第三周，他們又要我們把桶裝滿。我們知道不能長此以往地忍受下去了，但沒有作聲。我們一直拚命地幹，但看守的態度激怒了我們。我們悄悄地定下了一個計劃：不完成定額。這一周我們開始在島上實施怠工計劃，爲抗議過份的和不公正的要求，我們按我們以前一半的速度勞動。看守馬上覺察出我們的意圖，並且威脅我們，但我們充而不聞，只要一幹活就怠工。

自從一九六二年我在這兒逗留兩周以後，羅本島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九六二年，島上沒有多少犯人，這裡與其說是一個設備齊全的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個雜亂無章的試驗場。兩年後的今天，毫無疑義，羅本島已經成爲南非冷酷的監獄制度的急先鋒。不管對囚犯還是對監獄管理人員，要求都是苛刻的。原來那些常給囚犯香烟和對他們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看守都離開了。現在的看守一律是白人，操着清一色的南非荷蘭語，他們把自己與囚犯的關係看成是主僕關係，要我們叫他們『老板』，但我們拒絕這樣做。在羅本島上，種族的界綫一目了然：沒有黑人看守，也沒有白人囚犯。

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一般要有一個適應過程。但到羅本島之後感覺像到了另一個國家。它與世隔絕，決不只是一個新的監獄那麼簡單，它是一個獨立王國，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們離開普利托利亞時情緒很好，但這裡惡劣的環境讓我們感到失望。我們不得不面對異常冷酷的現實。在普利托利亞，我們感覺是在支持者和家人身邊；但在這裡，我們與世隔絕。我們彼此安慰，但僅此而已。但是，我的懊喪很快被一種新的認識代替：那就是一場新的、特殊的戰鬥開始了。

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抗議監獄當局強迫我們穿短褲。我要求會見獄長進行申訴。看守對我的抗議嗤之以鼻，但第二周周末，我突然發現有幾件舊卡其布褲子胡亂地堆在牢房的地

上。從沒有什麼衣服像這三件條紋褲子一樣讓我這麼高興。但是在換掉短褲之前，我想弄清楚獄友們是不是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

不出所料，獄友們什麼也沒得到，於是我讓看守把褲子拿回去。我聲明所有的黑人囚犯都應該穿長褲。看守咆哮道：『曼德拉，你說你要長褲，我們給你你又不要了。』看守拒絕碰黑人穿的褲子，最後監獄長本人到我的牢房裡把它們拿走了。『很好，曼德拉，』他說，『你想和別人穿一樣的衣服。』我回答說爲什麼只給我長褲而不給別人呢？他什麼也沒說。

六十

頭兩個星期快結束的時候，我得知我們的律師布拉姆·菲希爾和喬爾·約菲第二天要來島上。他們到來時，我被帶到探監處。他們此行的目的有二：一個是了解我們在島上的情況，另外一個是看我們還想不想上訴。跟他們分手只有幾個星期，可是我覺得像過了好多日子。他們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

屋子裡只有我們幾個人；一個看守在外面監視我們談話。我有一種如見親人的感覺；但是看守的出現使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告訴他們倆我們都很好，說明我們仍堅持以前的理由，反對上訴，理由之一是這樣做有點虎頭蛇尾，而且也會干擾其他非洲民族議會被告的案件。布拉姆和約菲同意我的觀點，但我知道布拉姆內心裡仍然認爲我們應該上訴。

當我們的談話快要結束時，我直接了當地問布拉姆關於他妻子莫莉的近況。一提到莫莉的名字，布拉姆馬上站起來，轉過身去，然後疾步走出屋子。幾分鐘後，他走回來，神態自若，繼續我們的談話，但自始至終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們的談話很快結束了，當我和看守一起回我的囚室的時候，他問我：『曼德拉，你對布拉姆·菲希爾的舉止是不是感到吃驚？』我說的確如此。他告訴我上周莫莉死於交通事故。他說布拉姆開車時爲了躲開路上的一個動物轉動方向盤，結果車掉進水裡，莫莉溺水而死。

聽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莫莉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人，舉止文雅，樂於助人，毫無種族偏見。她默默地給了布拉姆許多支持。她既是妻子，又是同事和戰友。布拉姆一再遭受打擊，他的兒子身患糖尿病，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世。

布拉姆聽到莫莉名字時的反應表現了他的性格特點。他是個淡泊的人，不願讓朋友分擔他的痛苦和困難。作爲一個南非白人，他的良知強迫他放棄自己的傳統，從而不被自己的民族所理解。他表現出了勇氣和犧牲精神。相比之下，我只是反對不公正，而不是反對我自己的人民。

我告訴看守我想給布拉姆寫一封吊唁信，他同意了。政府對囚犯的信件管理很嚴。我們只能給直系親屬寫信，而且每半年只能寫一封，不能超過五百字。對看守的態度我既感到驚

訴又感到興奮。但是他並未履行自己的諾言。我寫了信，把它交給看守，但這封信一直壓在監獄裡。

幾個月後，我們的生活開始規律化。監獄的生活像一部機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因此根本分不清年月。任何離經叛道的行爲都使當局感到緊張，因爲規律化是一所模範監獄的特徵。

規律化也使犯人感到舒適，這樣它就成了一個陷阱。規律化像一個微笑的女侍者，讓人很難拒絕，因爲它可以使時間過得快一點。在羅本島上，鐘錶和日曆嚴禁使用。因此我們從來不知道精確的時間。我們不得不依賴鈴聲和看守的哨聲和叫喊聲。日復一日，我們只能絞盡腦汁地推算日期和月份。每次入獄，我首先做的事情是在牢房的牆上畫一個日曆。失去時間概念很容易讓人失去奮鬥目標，甚至失去判斷力。

監獄的時間過得很慢。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而在監獄裡，時間顯得遙遙無期。時間過得慢通常是與空虛和無所事事聯繫在一起的，但在羅本島是個例外。我們整天忙忙碌碌，勞動，學習，解決分歧。然而，時間的長河還是無情地流淌着。部分原因是因爲在外面過幾小時或幾天，在監獄裡就像過上幾個月或幾年。提出更換牙刷的要求可能要過上一年或半年才能得到滿足。艾哈邁德·卡特拉達曾經說過，在監獄裡一分鐘可以相當於一年，一年也可以

相當於一分鐘。下午在操場裡敲石頭，你會覺得時間靜止了，但是忽然之間一年過去了，而你根本不知道今夕是何年。

對每一個囚犯、特別是政治犯來說，問題是怎樣度過監獄生活，怎樣平安地走出監獄，怎樣維護甚至堅定自己的信仰。完成第一個目標，需要學會怎樣生存。而爲了達到最終的目標，你必須懂得敵人的意圖，這樣你才能採取相應的對策。監獄的用途就是摧毀我們的精神和意志。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利用每一個弱點，破壞每一次越軌行動，摧毀全部個性的特徵——全部的全部就是要撲滅任何尊嚴和人性獨立的火花。

我們的生存取決於對敵人策略的了解，而且需要每一個人都了解。一個人獨自作戰，既便是可能的，那也是相當困難的。我不知道自己一個人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當局最大的錯誤是把我們放在一起，正因爲在一起，我們的決心更加堅定。我們彼此支持，從別人那裡汲取力量。無論哪一個人有什麼發現，有什麼想法，都會變成我們大家共同的想法，正因爲如此，我們的勇氣倍增。當然，並不是說面對困難我們都有同樣的決心。每個人的能力和面對壓力的反應都不同。但是強者提攜弱者，二者都會變得更加強大。結果，我們在監獄裡創造了自己的生活。最後當局也不得不承認，是我們而不是看守在維護監獄的秩序。

一個領導者有時候必須採取一些與衆不同的行動，也許它的結果經過若干年才能實現。有一種勝利，它的偉大之處僅在於勝利者本身懂得它的意義。這一條在監獄裡得到充分的驗

證，在這裡，你必須在忠於自己的信仰中得到慰籍，似乎別人都不懂得你所做的一切。

我現在遠離鬥爭前綫，但我知道我不會放棄戰鬥。這是一個特殊的、狹窄的舞臺，唯一的觀衆是我們自己和監獄當局。我把監獄鬥爭看作全國鬥爭的縮影，我們將像從前一樣堅持戰鬥。種族主義和壓迫無處不在，只是我必須採取不同的鬥爭方式。

監獄和當局企圖剝奪每個人的尊嚴。這本身自然而然地使我相信我能戰勝一切困難，因爲任何人或政府剝奪我尊嚴的企圖都會破滅，我不會放棄任何寶貴的東西或屈從於任何壓力。我從來沒有認爲我會在監獄裡度過餘生，也從不認爲終生監禁就宣判了我的一生，我只能在鐵窗下悄然死去。也許是因爲前景暗淡，我才不願往壞處想。但我一直堅信我會重新獲得自由，重新回到大自然和陽光的懷抱中。

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樂觀主義者。這是因爲天性還是環境使然，我不知道。樂觀使人的思想充滿陽光，使人的腳步永遠向前。在許多惡劣的條件上下，我對人類的信心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我不會也不能感到失望。那樣會意味着失敗和死亡。

六十一

每天早晨五點三十分，巡夜的看守叫醒我們，他一邊弄響走廊裡的銅鈴，一邊嚷嚷：『醒醒！起床！』我一般起得很早，因此這個時間對我來說不是什麼負擔。儘管五點三十分

就起床，但我們要在囚室裡待到六點四十五分，五點三十分開始清理屋子，收拾鋪蓋。牢房裡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只有鐵皮衛生桶。衛生桶直徑十英寸，上面有一瓷蓋可以裝些水。瓷蓋中間凹下去，裡面裝的水供我們洗漱用。

六點四十五分，我們走出囚房，第一件事是清理衛生桶。在過道的盡頭有污水溝，我們在那裡把衛生桶徹底清理一番，否則就會有種難聞的氣味。做這件事的唯一樂趣是我們可以利用早晨這段時間彼此說說悄悄話。看守站得遠遠的，這樣就給我們一個輕聲交談的機會。

頭幾個月，早飯由普通區的犯人送到我們的牢房裡。早飯有玉米粥和玉米、小麥做的食物，送飯人把粥倒進碗裡，然後通過囚房的柵欄把碗遞進去。這一招很聰明，要求送飯的人雙手靈活，不能讓粥濺出來。

幾個月以後，早飯改在操場上，放在一個舊的鐵桶裡。我們自己用鐵碗盛粥。每個人發一杯所謂的『咖啡』，其實是用碾碎的玉米焙到發黑以後，再用熱水調一下做成的。後來，等我們能自己到操場上用早餐時，我就在早飯之前圍着操場到處走走。

與監獄其他方面的事情一樣，飲食也是有區別的。

總之，有色人和印度人吃得比黑人稍好，但區別不大。當局總是說我們的飲食均衡，的確均衡，不過是在難吃和不能吃之間。食物是我們抗議的理由，但起初看守總要說：『嘿，你們這些卡菲爾人在家吃的東西還不如監獄裡呢』

早飯後，看守喊：『集合！集合！』，我們就站在牢門處等待檢查。每個犯人必須把卡其布衣服的三個釦子繫好，看守經過時必須脫帽。如果釦子沒有扣好，沒有脫帽，或者房間沒有打掃乾淨，我們就會被視爲違反監獄條例，要處以禁閉或者飯食減量。

接受檢查之後，我們就到操場裡敲石頭，一直到中午。中間不休息，如果有誰偷懶，看守就會嚷嚷着要你快點幹。中午，鈴聲響了，午飯開始了，又是一桶食物被推進操場裡。黑人的午飯包括煮玉米，也就粗糙的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吃的是玉米飯，是用碾碎的玉米做成湯一樣的混合物。玉米粥裡有時候放點蔬菜，要不就乾巴巴地吃。

午飯時，我們經常能得到一點『強力劑』，這是一種用玉米和一點酵母製成的粉，用時把它放在水或牛奶中攪勻，如果比較稠的話，味道不錯。但是監獄當局每次只給我們一點點，放在水裡都沒有顏色。我常常把幾天的放在一起來喝，但是如果當局發現你私藏食物，這些東西就會被沒收，你還要受到處罰。

午飯後一直勞動到四點鐘，這時看守吹響刺耳的哨子，我們站成幾排，再一次清點人數和接受檢查。然後我們可以有半個小時的洗澡時間。浴室在走廊的盡頭，裡邊有兩個海水淋浴管，一個鹹水龍頭，還有三個電鍍的鐵桶，這就是浴盆。沒有熱水，我們或站或蹲在桶裡，用鹹水擦身，洗掉一天的塵土。在外邊寒風刺骨的時候，用冷水洗澡不是什麼愉快的事，但我們自得其樂。我們有時邊洗邊唱，水也顯得不那麼涼了。在島上的最初日子裡，這

是我們僅有的交談機會之一。

四點三十分整，有人使勁敲走廊頭上的木門，告訴我們晚飯送來了。看守給每人盛飯，然後我們端回牢房去吃。還是玉米粥，有時裡面有點胡蘿蔔、卷心菜或甜菜，不過你得仔細找才能發現。如果吃蔬菜，就一周從開始到結束都吃一種，直到胡蘿蔔和卷心菜變得又老又發霉爲止，我們對此深惡痛絕。每隔一天，玉米粥裡摻一小塊肉，又小又硬。

晚飯時，有色人和印度人囚犯能吃到四分之一塊麵包（這種麵包叫『貓頭』，因爲形狀很像貓頭）和一層人造黃油。根據當局邏輯，黑人不喜歡麵包，因爲它是『歐洲人』的食品。

有時，連規定的食物數量也達不到，原因是食堂裡盛行偸竊。廚子們都是普通犯人，他們把最好的食物留給自己或朋友。他們還經常把最好吃的東西送給看守，從中得到好處或特殊待遇。

晚上八點，巡夜看守把自己鎖在牢房的走廊裡，把鑰匙從門孔裡遞給外面的看守，然後他在走廊裡走來走去，命令我們睡覺。島上從不喊『熄燈』，因爲牢房裡罩網的燈泡不分白天黑夜地點着。後來，那些攻讀學位的人可以一直看書到十點或十一點。

走廊裡的聲音能夠聽得很清楚，入睡前我們總要聊一會。但是如果能清楚地聽到有人小聲說話，那可能是看守的聲音，他會說：『不要說話！』看守不時地走來走去，監視我們是

不是在看書或寫東西。以後，我們在走廊撒上一把沙子，這樣就能聽到看守的腳步聲，以便及時地停止談話或收起某種違禁品。等大家都安靜下來，看守就在他的小辦公室裡邊靠在一把椅子上對付到天亮。

六十二

在我見到布拉姆和喬爾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我們被帶到獄長辦公室。這是一個簡單的石頭結構的房子，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路遠，房子的式樣類似於我們區。到那以後，我們排成一排，錄下指紋，這是監獄的例行程序。但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有一個看守拿着照相機。錄完指紋後，看守長命令我們站好，要給我們拍照。我示意大家不要動，然後對看守說：『請你拿出總監獄長要我們拍照的手諭。』給囚犯拍照必須有這種程序。

我對這一套手續了解得很清楚，而看守們則經常懵懵懂懂，容易被有經驗的我抓住把柄。看守對我的要求感到吃驚，既說不清楚，也拿不出總監獄長的任何東西。他威脅說如果我們拒絕拍照，將受到制裁，但是我告訴他，如果沒有手令，我們不會允許拍照。事情就到此爲止了。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不允許監獄給我們拍照，因爲這樣就自降爲囚犯。但是我的確同意照過一張照片，這也是我在羅本島上同意給我拍的唯一一張照片。

一天早晨，看守長沒給我們佈置敲石頭的活，而是給我們每人一些針綫和一堆破舊的獄服。他要我們縫補這些衣服，但我們發現大部分衣服破舊得沒法再修修補補了。這是一項棘手的工作，我們不知道爲什麼會讓我們幹這種活。上午大約十一點鐘，前門突然打開，監獄長和兩個穿西裝的人走了進來。監獄長宣佈這兩個客人是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和攝影師。他們好像要給我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這兩位國際通訊社的來訪者只是按常規從我們這裡弄點消遣性的報導。

儘管這些人是第一批來自官方的參觀者，我們還是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他們。首先，他們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來到這裡的；其次，我們知道《每日電訊》是一家保守的報紙，不能指望它對我們表示同情。我們心裡很清楚，國外對我們的處境非常關心，政府想證明我們沒有受到虐待。

兩位記者一邊圍着操場慢慢走着，一邊審視着我們。我們低着頭，忙着幹我們的活。轉過一圈以後，一個看守拍拍我的肩膀，說：『曼德拉，過來，你來說說。』剛到羅本島的時候，我經常代表獄友們說話。監獄裡有規定，犯人只能爲自己說話。這樣做是爲破壞我們的組織性和瓦解集體力量。我們反對這項規定，但無濟於事。就連在我們提出意見時，也不許用『我們』這樣的詞。但在頭幾年，當局需要有一個人代表其他人講話，這個人就是我。

我同那個叫紐曼的記者談了大約二十分鐘，坦率地說出了我對監獄和瑞沃尼亞審判的看法。紐曼是個討人喜歡的傢伙，談話結束時，他說想讓攝影師給我拍個照。我猶豫了一下，但最後沒有回絕，因爲我知道這張照片會在刊登在海外的報紙上，如果他的文章哪怕稍微對我們有利的話，也會對我們的事業大有益處。我告訴他如果允許西蘇魯先生和我一起拍照的話，我不反對。照片是我們兩個人在操場上談論某件事，至於什麼事記不得了。此後，我沒看到過那篇文章，也沒聽人提起過。記者還沒走遠，看守就把獄服收拾起來，又讓我們敲石頭。

《每日電訊》記者是最初幾個月的第一批來訪者。人們還沒有忘記瑞沃尼亞審判，政府急於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受到了公正的待遇。報刊上有一些文章報導了島上不人道的狀況，以及我們受到暴力和嚴刑拷打的情況。這些報導令政府大傷腦筋，他們組織了一系列參觀者，通過他們回擊那些批評報導。

來訪者首先是一位英國律師，他曾在國際法庭上爲納米比亞獨立辯護。在此之後我們得知，美國律師協會的代表海寧將來到這裡。那時，在南非，美國人還讓人感到新鮮，我也懷着好奇心理想見見這個著名的法律組織的代表。

海寧先生來的那一天，我們被召集到操場上。陪同美國人的是總監獄長斯蒂恩將軍，他

很少在島上露面。斯蒂恩將軍在監獄部門是個與衆不同的人，幹練而且性格複雜。他的西裝總是很精緻，很時髦。他舉止優雅，稱我們『先生』，還向我們脫帽致意，這是其他監獄管理人員做不到的。然而斯蒂恩將軍的不負責任使我們飽受欺壓。他基本上對島上發生的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經常玩忽職守，從而使更多殘暴的監獄官員變本加厲，隨心所欲地虐待我們。將軍用非常禮貌的態度介紹了客人，然後說：『先生們，請選出你們的代表。』許多人說出了我的名字。

斯蒂恩將軍衝我點了點頭，我站了起來。和斯蒂恩將軍相比，海寧先生身材矮胖，不修邊幅。我首先感謝他的光臨，並說我們對他的到來感到榮幸。然後我簡要地敘述了我們的問題，先撿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說，我說我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政治犯應有政治犯的待遇。我講了食物、生活環境和具體勞動上存在的不公正待遇。但我發言時，海寧先生不斷地插話。當我說到我們長期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時，他聲稱作爲囚犯，我們應該幹活，這樣才不至於懶惰。

當我開始講述牢房的種種問題時，他插話說，在美國，一些落後的監獄比羅本島上的監獄還要糟糕得多，相比之下這裡簡直是天堂。他還說我們受到了公正的判決，沒有被判處死刑是我們的運氣，死刑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公道的。

海寧先生囉嗦了半天，我們中的一些人認爲他不是完全清醒。我覺得他的語氣似乎來自

於美國南方，他談話時含有一種敵視的態度，這是我們以前從沒見過的。

最後，我再也聽不下去了，就打斷了他的話，說：『不，先生，你不理解我的觀點。』海寧反駁說我在頂撞他，這時斯蒂恩將軍在一旁看着聽着，不發表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情緒很難加以控制。人們對海寧的話感到憤怒，並對當局竟然容許這種人來監獄表示憤慨。本來，任何人來訪都使我們興致高昂，但海寧先生例外。也許這是政府所需要的。這樣一個顯赫的法律代表卻如此淺薄，確實使人感到沮喪。海寧最後轉身離開了，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說。對他的離開，我們不感遺憾。

以後幾年我們一直在談論海寧先生，許多人惡作劇地模仿他講話的樣子。我們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他也自然沒有在我們中間爲美國律師協會找到朋友。

六十三

在監獄，當局把所有犯人編成A、B、C、D四個等級。A級最高，享受的待遇也最好，D級最低，受到的待遇最差。所有政治犯，或者按當局的叫法『安全犯』，按規定自動編爲D級。不同的等級在探監、寫信、閱讀和買日常用品等方面受到不同的待遇，而這些是每一個囚犯生存的基礎。一個政治犯要想從D級上升到C級往往需要幾年時間。

我們鄙視等級制度。它是腐敗和墮落的，是壓制犯人特別是政治犯的特殊手法。我們要

求政治犯受到同等的待遇。我們批評它，但不能忽視它，因爲等級制度是監獄生活不可動搖的一個方面。如果你抱怨D級犯人半年只能收到一封信，當局就會說，表現得好點，進入C級，你就會半年收到兩封信。如果你抱怨食物太少，當局就會告誡你，只要進入A級，你就可以接受外邊來的匯款，可以到監獄的小賣部裡多買點吃的。一個自由戰士也需要買日用品和書籍的自由。

在一般情況下，等級是根據入獄年限自動調整的。如果你被判刑八年，通常頭兩年你被編入D級，兩年後C級，然後是B級，最後兩年是A級。但是監獄當局把等級制度當作鎮壓政治犯的手段，爲了控制我們的行動，常常威脅說要降低我們辛辛苦苦熬來的等級。

雖然在來羅本島之前我已服刑差不多兩年，但來到這以後我還是被編入D級。儘管我也需要高一點的等級帶來的便利，但我決不妥協。升級最快的辦法是凡事服從，不爭辯。看守對我說：『嘿，曼德拉，你是搗亂分子，你就在D級待一輩子吧。』

每隔半年，囚犯們被召集到監獄管理委員會面前，進行等級評定。監獄管理委員會應該負責鑒定我們在執行監獄規則方面的表現，但我們發現它更像一個政治法庭。我第一次被叫到監獄管理委員會時，官員們問我關於非洲民族議會和我的信仰的一些問題。儘管這和等級制度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我還是徒勞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還以爲我可以向他們宣傳我的信仰了。這是少有的被看作人的時候，我的表現也要過得去。後來我認識到這只是當局方面收

集情報的一種策略，我上當了。不久，我們彼此達成默契，不和監獄管理委員會討論政治問題。

作爲一個D級囚犯，每半年我只能接受一次探監，寫一次信，收到一次信。我認爲這是監獄制度中最不人道的一個方面。和家人保持聯繫是一種人權，不應該用人爲的等級制度來加以限制。但這是監獄生活中存在的鐵的事實。

探監和往來信件只限於『直系』親屬。這種限制不僅令人厭惡，而且充滿種族主義的味道。非洲人直系親屬的概念與歐洲人或西方人的概念迥然不同。我們的家庭結構規模較大，範圍也更廣泛。來自於同一祖先的人都被看作一個家庭的組成部分。

對於身陷囹圄的犯人來說，聽到來自家裡的壞消息總比根本沒有消息好。與其一個人冥思苦想，倒不如面對無論多麼嚴峻的現實。一封苦澀的信也總比沒有信強。

然而，當局還要使殘酷的限制雪上加霜。人們翹首盼望自己的信件，取信一個月一次，有時半年過去了，你收不到一封信。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本來半年只允許你收一封信，可你連一封信也沒收到。你肯定要想：是不是妻子、孩子、母親或者姐妹發生了什麼事？我收不到信時的感覺就像乾旱的沙漠一樣饑渴不安。當局經常故意刁難，不給你信。看守對我說：『曼德拉，我們收到了你一封信，但不能給你。』沒有說出原因，也不告訴誰寄的信。

此時此地我強壓怒火。以後我通過正常的渠道提出抗議，有時候能拿到信。

我們把家信視若珍寶。一封信就像春雨，能使乾燥的沙漠開出鮮艷的花朵。看守給我信時，我不會衝上前去，一把抓在手裡，而是抑制住內心的衝動，神態自若地接過它。雖然心裡面我想當場把信撕開來讀，但我不能讓當局從我的饑渴中得到滿足感，我會慢慢走回房間，好像有很多事要做，一走回牢房，我就打開家人的來信。

頭幾個月，我收到溫妮的一封信，但它被仔細檢查過，除了問候語，也剩不下幾句話了。島上信件檢查員用墨水把過頭的話塗掉。後來他們發現我們把墨水洗掉後照樣還可以看到被刪掉的話，於是就不用這個辦法了，他們開始用剃刀把整段話都摳掉。因爲有些信是正反兩面寫的，摳掉一面，就把另一面上的話也摳掉了。當局似乎樂於送這些摳得破破爛爛的信。信的檢查使信遲遲到不了收信人手裡，因爲一些檢查員的英語不怎麼好，檢查一封信可能要用一個月。寫出去的信也要受檢。我們發出的信經常和收到的信一樣被剪得亂七八糟。

八月底，我已經來島差不多三個月了。當局通知我第二天有人探監。他們不告訴我探監的人是誰。沃爾特也接到了同樣的通知，我懷疑、希望、渴望也相信來的人是溫妮和阿爾貝蒂娜。

溫妮知道我來島以後，就想上島來看我。她此時受禁令的約束，從法律上講是不允許與

我接觸的，因此必須得到司法部長的特許。

由於當局的干擾，到羅本島探監不是件容易的事。探視時間最多不超過半小時，政治犯不許直接探視，也就是說不允許探視者和犯人在一個屋子裡面。

當局對探視不做事先安排。某一天，他們找到你妻子，說：『明天你可以看你的丈夫。』這樣極不方便，而且常使探視無法成行。如果某人事先做好探監的計劃，當局就故意拖延批准的時間，直到你錯過飛機起飛的時間。由於多數人的家離開普省很遠，而且經濟上不寬裕，其家人常常只能望洋興嘆。一些出身貧窮的人許多年才能見他們妻子一面，或者根本見不到。我就知道有人在島上十來年或更長的時間連一個家人也沒見到。

非接觸的探視室面積狹窄，沒有窗戶。在犯人這邊，有五個並排的隔間，每個隔間有一小塊玻璃，從外面可以看見隔間裡的人。犯人坐在椅子上，從又厚又髒的玻璃上往外看，玻璃上鑽了幾個小孔，以便通話。兩邊的人必須大聲說話才能聽得見。後來當局安了擴音器，效果才好一點。

第二天早晨，我和沃爾特被叫到探視區，坐在屋子後頭的椅子上。我焦急地等待着，突然，溫妮可愛的面龐出現在玻璃的那一邊。探監時溫妮總是精心打扮，衣着入時得體。令人十分沮喪的是，我不能撫摸我的妻子，不能溫柔地向她傾訴，不能單獨地和她待一會。在可惡的敵人的監視下，我們只能把感情埋藏在心底。

一見到溫妮，我就看出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來島上本身就是相當困難的，再加上監獄裡殘酷的制度，看守的侮辱，又不能單獨見面，在這種情況下，她此行一定飽受磨難。

我後來知道，溫妮剛剛收到第二次禁令，而且丟掉了她在兒童福利辦公室的工作。在被解雇前不久，她的辦公室遭到了警察的搜查。當局認爲溫妮和我保持着秘密聯繫。溫妮熱愛社會工作。鬥爭帶來了現實的後果：要把孩子放在親戚家，要千方百計找到工作，要爲沒有醫療保障而苦惱。妻子的處境使我苦惱萬分，我沒法照顧她和孩子，而政府更使她處境艱難。由於我的無能爲力，她飽受痛苦。

開始，我們的談話很不順利，看守的出現使談話更難進行，有兩個看守站在她後面，另外三個站在我身後。他們的任務不僅是監視談話，而且起威懾的作用。規則規定談話只能用英語或南非荷蘭語，不能用非洲語，而且只能涉及家事。任何偏離家事和涉及政治的談話都會導致探視被突然中斷。如果你提到一個看守不熟悉的名字，他們就會打斷你，問這人是幹什麼的，與你什麼關係。由於看守對非洲人名知之不多，也不清楚非洲人名的特點，這種事時有發生。花費探視的寶貴時間向看守說明一個人家族的不同分支，是一件令人苦惱的事。但是他們的愚蠢也使我們有機可乘，我們用代號表示我們要談到的人，假稱這是我們家裡的人。

第一次探視很重要，因爲我知道溫妮關心我的健康狀況，她聽說過關於我們受到肉體折

磨的事。我很快讓她知道我很好，說她應該能看出我身體不錯，就是比以前瘦了一點。實際上她也瘦了，這是我一直不希望的。探視中，溫妮的臉一直拉得很長，顯得很緊張，探視結束時，我勸她讓體重增加點。她一直在節食，我總是勸她不要這樣。我詳細地詢問了孩子們、我鄉親和妹妹、以及溫妮本人的情況。

突然，我聽到身後的看守說：『時間到！時間到！』我轉過身不信任地看着他。半小時不可能就這樣過去了。但實際上，看守沒說錯，探視的時間總是一眨眼就過去了。在監獄裡的這段時間，看守說『時間到！』，我從沒有驚訝過。我和溫妮從椅子上站起來，匆匆告別。溫妮走後，我戀戀不捨，希望保留那種她出現時的感覺，但我不能讓看守看出端倪。回牢房的路上，談話的情景仍然浮現在我腦海裡。無論過了多少日子，我會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當時的情景。我想，至少半年的時間，我將見不到我的妻子。而事實上，有兩年的時間溫妮都不能來看我。

六十四

一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們在勞動前接受例行檢查，這一次我們沒有去操場，而是被帶上一輛有篷的卡車。這是我們第一次離開監獄。事先沒有告訴我們去那裡，但是我已經猜到了。幾分鐘後我們到達目的地——石灰礦，一九六二年我到羅本島時曾來過這裡。

石灰礦位於山腳下，看起來像一個白色的大坑。山頂和山麓都白得刺眼。礦頂上有草和棕櫚樹，礦底下只有幾個舊的鐵棚。

獄長韋賽爾斯上校出現了，他是個態度生硬的傢伙，只對嚴格執行監獄規則感興趣。我們立正站好，他給我們訓話。他說，我們要在這裡幹六個月，然後再給我們派輕一點的活。他的諾言沒有兌現，我們在礦上一待就是十三年。

獄長訓完話，礦上發給我們鑿子、鐵鍬和採礦的基本器械。開採石灰石不是件簡單的勞動。第一天，我們笨手笨腳地使用新工具，活出得很少。石灰石本身是鬆軟的，是海底貝殼和珊瑚的殘渣鈣化以後形成的，但它埋在堅硬的岩層下，你首先必須用鑿子把岩石鑿開，然後用鐵鍬挖石灰層。這比我們在操場幹的活要艱苦得多，幹了幾天以後，我們下午四點三十分吃完晚飯，倒頭便睡，第二天早晨醒來仍然腰酸背痛。

當局沒有告訴過我們更換工作的理由。他們可能只是需要這些的石灰來鋪島上的路。但後來我們議論此事時，推斷這可能是加強管理的另一種手段，目的是提醒我們，你們和那些在礦上勞動的普通犯人沒有什麼區別，我們也同樣要爲我們的罪行付出代價。其意圖是摧毀我們的意志。

但頭幾個星期，我們有了當局意想不到的收獲。儘管雙手起泡，鮮血淋漓，但我們仍然感到青春煥發，充滿活力。我非常喜歡到大自然中去，因爲在那兒草木芬芳，鳥兒從頭上飛

過，海風輕拂面頰。在陽光的照耀下，用自己的雙手勞動是一件很愜意的事。看到我們親手堆起的石頭和石灰石，有一種單純的滿足感。

有幾天，我們沒有坐卡車，而是步行去礦上，這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二十分鐘的旅途中，我們對島上的感覺更深了一步，我們看到牢房周圍繁茂的叢林和高大的樹木，聞到按樹花濃鬱的芳香，偶而還能看小羚羊機警地注視着我們。儘管有些人認爲步行是一件苦事，我卻不這麼想。

我們的勞動本身就告訴我們，我們和其他犯人沒有什麼區別，但當局還是拿我們當麻瘋病人，好像我們能傳染整個島上的人。有時我們會遇到一群在路邊幹活的普通犯人，我們路過時，他們的看守會命令他們到樹叢中去，以免看見我們，似乎我們嘆一聲氣都能影響他們的紀律。有時，通過眼睛的餘光我們能看見一個囚犯舉起拳頭按非洲民族議會的禮節向我們致意。

在礦區附近，土路分成兩叉，右邊是普通犯去採礦的路。叉路口是我們和他們聯繫的重要地點。在叉路口，我們透過叢林可以看見羅伯特·索布克威住的白色的小屋。這個小屋原來是給一個黑人看守蓋的，現在索布克威一個人住在那兒。那兒地方不大，髒兮兮的，雜草叢生，要不是哨兵站在屋前，你也許會認爲那兒根本沒人住。

索布克威的刑期一九六三年就結束了，但是根據一九六三年通過的『普通法修正案』的所謂索布克威條款，司法部長可以未經審判無限期關押政治犯。他們正是這樣對待索布克威的。六年來，索布克威過着半個囚徒的生活，他是被剝奪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時我們看見他站在院子裡，但僅此而己。

早晨到礦區以後，我們拿鑿子、鍬、錘子和手推車，手推車放在礦頂的一個棚子裡，然後我們在地面上排好順序，一般三人或四人一伙。手持自動武器的哨兵站在高臺上監視着我們。不帶槍的看守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敦促我們幹活。他們喊着：『快幹！快幹！』，好像我們是一群牛馬。

十一點，太陽高懸在空中，我們開始感到疲倦。這時，我已經汗流浹背。看守還在不斷催促我們：『快幹！快幹！』一直到臨近中午，我們才能停下來吃飯。我們把石灰石裝在手推車上，推到卡車那兒，然後卡車把它們運走。

中午，哨聲響起，我們走上山頂。我們吃飯的地方是一個簡單的工棚，裡面是一些拼揍的座位，在這裡我們可以暫時躲避陽光。看守們在一個大棚子裡用餐，裡邊桌椅齊全。我們的午飯是一桶煮玉米和一桶水，水桶生滿鐵銹，容量有四加侖。成群的海鷗尖叫着到處掠食，我們吃飯的時候，它們在我們頭上盤旋，有時候海鷗恰好撲到碗上，把碗裡的粥都弄灑

了。

我們一直勞動到四點，最後把石灰石運到卡車上。一天過去了，我們的臉上身上都沾滿了白灰，看起來像白色的幽靈，只有汗水透過的地方才露出身體的本色。回到牢房後，我們用冷水擦身，但身上的灰好像根本洗不掉。

在礦上，比炎熱更難受的是陽光。襯衫遮住了後背，但陽光的光綫通過石灰反射到眼睛上。反射的光綫和揚起的灰塵傷害了我們的眼睛，眼睛撕裂似的疼痛，我們一直要瞇着眼幹活。每天我們都要花很長時間調整眼睛，使它從陽光下恢復過來。

到礦上幾天以後，我們正式要求給我們配備遮陽鏡。當局拒絕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連近視鏡也不許戴。以前我曾經向獄長指出，允許我們讀書卻不許我們戴近視鏡，這樣的規定毫無意義。

以後的幾個月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遮陽鏡。但足足花了三年時間才爭取到，這還是在一個富有同情心的醫師認爲爲了保護我們的眼睛，有必要戴遮陽鏡之後。儘管如此，我們還要自己掏錢買鏡子。

對我們來說，爭取遮陽鏡、長褲、學習權力、同等食物的鬥爭是我們在獄外開展的鬥爭的必然結果。提高獄中生活環境的鬥爭是反對種族隔離鬥爭的一部分。按照這個邏輯，所有

的鬥爭都是相同的。那裡有不公正，我們就要在那裡鬥爭，不管事情是大，是小，我們反對不公正是爲了保護我們的人權。

我們到礦上不久，許多B區的著名政治犯也來到這裡。他們中有幾個人是民族之矛成員，一九六四年七月被捕，爲他們羅列的陰謀破壞罪達五十多條，這次審判被稱作『小瑞沃尼亞審判』。這些人中有：麥克·馬哈拉傑，南非共產黨黨員，在鬥爭中思想最尖銳者之一；拉洛·基巴，印度人大會成員，他是一個堅毅的同志，在獄中具有非凡的判斷力；威爾頓·姆克瓦依，因叛國罪受審，在一九六〇年宣佈緊急狀態的混亂時期曾經被錯誤地釋放了。他曾經秘密離開南非，接受軍事訓練，瑞沃尼亞審判以後成爲民族之矛的主要領導人。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埃迪·丹尼爾斯，一個有色人，自由黨成員，他被控策劃由『非洲抵抗運動』組織的破壞活動，『非洲抵抗運動』是由自由黨成員組織的密謀團體。埃迪後來成爲我在獄中最好的朋友之一。

爲了抵銷這些新的政治盟友的影響，當局又派來一些普通犯到我們區。這些人是作惡多端的罪犯，罪名包括謀殺、強姦、武裝搶劫。他們是島上臭名昭著的黑幫成員，有的是『大五』黨，有的是『二十八』黨，這對其他犯人來說很有威懾力。他們身體強壯，態度蠻橫，臉上都有黑幫成員常有的那種刀疤。他們的作用是作『政府密探』，他們會欺壓我們，搶奪

我們的食物，不許我們講任何政治話題。這些傢伙中有一個人叫寶嘉，他的名字是根據在美國電影中演反面角色的演員名字起的。他的牢房正對着沃爾特，沃爾特經常抱怨這傢伙每天早晨都搶他的早飯，他不敢不給。

黑幫分子在礦上自己幹自己的。一天，他們開始唱類似於勞動號子的歌。實際上，他們唱的一首著名的勞動歌曲，但把歌詞改編了。他們唱：『你在瑞沃尼亞想要什麼？』下一句是：『你是不是以爲你會掌權？』他們唱得很起勁，完全是一種嘲諷的語氣。顯然是看守在煽動他們，這些人希望歌詞能激怒我們。

儘管我們中有人頭腦發熱，想同他們幹一仗，但我們還是決定以牙還牙。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比他們唱得要好，我們聚集在一起，商量回擊的辦法。幾分鐘後，我們一起唱一首叫『斯蒂米拉（Stimela）』的歌曲，這是一首高昂的聖歌，說的是一列火車離開南羅德西亞駛向遠方。這首歌不是政治歌曲，但是從含義上講，它是，因爲它暗示着滿載游擊戰士的火車開過來，與南非軍隊進行戰鬥。

幾個星期來，我們一邊工作一邊歌唱，不斷增加換了歌詞的歌曲。歌曲多了，不久我們開始唱明顯的政治歌曲，比如『Amajoni』，這是一首描寫游擊戰士的歌，歌的題目使用了英語俗語，意思是戰士約翰尼；還有『Tshotsholoza』，一首把戰鬥比作正在開動的火車的歌曲。（如果你一遍一遍重覆歌名，聽起來就像火車的轟鳴聲。）我們唱《自由憲章》，唱

川斯凱，歌詞中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馬坦奇馬的路，一條是曼德拉的路，你走哪一條？』

歌聲使手裡的活也顯得不那麼重了。有幾個人的聲音很好聽，我經常有一種要拋下錘子專心地聽的感覺。黑幫分子不和我們對唱了，不久就聽不見他們的歌聲，而我們的歌聲依然響亮。但有個看守精通科薩語，能聽懂我們歌詞的內容，不久他們命令我們不許再唱（也不許吹哨）。從此我們又默默地勞動了。

我不把黑幫分子看作敵人，而把他們看作可以改造的原始材料。在我們中間有一個非政治犯，渾號叫『我的寶貝』，他後來參加了非洲民族議會，在來往監獄偷運我沒有看見過程，但看見了後果。他的臉上有傷口，而且青一塊紫一塊的，在走廊裡寶嘉走近我，要我幫助他。我馬上答應了。

我們一直在尋求與當局面對面鬥爭的途徑，傷人是我們與獄長辦公室交涉的理由之一。在此前不久，我們聽說一個叫甘耶的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在普通區被看守打傷。我發揮了一個律師的作用，給總監獄長寫了一封信，代表甘耶提出抗議。我被帶到獄長辦公室，面對監獄官員。他們異口同聲地否認發生了這種事，還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我堅決要求把打人的看守調離羅本島。他們拒絕了，說並沒有對他不利的證據。但不久，這個看守離開了島上。

這件事鼓舞了我，所以當寶嘉要我幫助他時，我馬上要求見獄長。第二天，我被叫到獄長辦公室，獄長和氣地告訴我案件已經調查過，而且被撤銷了。『這是違反規定，』我說：『這個案件必須要審理。』

『不，』他說，『我們已經同所謂的申訴人談過，他否認他受過毆打。』

『這不可能，』我說，『今天早晨我還和他說過話呢。』獄長向一個中尉作了個手勢，說：『你親自去看看吧。』少尉把寶嘉帶進屋，他的臉上纏着綳帶。獄長問他是否挨過打。『沒有，老板，』他小聲地說，不敢面對我的目光，『我沒有挨過打。』他隨後走了出去。

『那麼，曼德拉，』獄長說，『此案了結了。』獄長成功地耍弄了我。很明顯，他用額外的食物和烟賄賂了寶嘉，讓他收回他的案子。從此以後，我在接受犯人的案子之前，總要他本人的簽名和書面材料。

六十五

一九六五年夏的一天，早餐時走廊裡擺着亮晶晶的肥肉，晚飯時粥裡也摻了許多鮮肉。第二天有些人得到了新襯衫。礦上的警衛和我們區的看守也客氣多了。我們感到奇怪，在監獄，任何改善都是有原因的。一天後，我們接到通知，第二天國際紅十字會要來這裡。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比以前任何來訪者都重要。紅十字會盡職盡責，而且不依賴於任

何勢力，西方各國和聯合國都對它另眼相看。監獄當局尊敬紅十字會——我這裡說的『尊敬』，實際指的是『害怕』——因爲當局只尊敬那些他們害怕的東西。監獄部門對所有能影響世界輿論的組織都持不信任態度，不僅把它們看作需要認眞對待的法律督察者，而且可能的話還把它們當作需要蒙騙的干預者。避免國際譴責是當局的既定目標。

在我們來到監獄的這段時間裡，紅十字會是唯一聽取我們申訴並作出反應的組織。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爲當局不理睬我們。規則規定當局提供正式程序來處理我們的申訴，他們這樣做了，不過是以一種敷衍了事的態度來做的。一到星期六早晨，看守長就來到我們區，喊：『申訴和要求！申訴和要求！』有申訴和要求的人——幾乎每人都有——排隊見看守長。我們一個接一個地發洩關於食物、衣服和探視方面的不滿。看守長對每個人只是點點頭，說：『好，好，』然後說：『下一個！』我們說的他連記都沒記。如果我們想談點組織的事，看守就會嚷嚷：『這裡沒有非洲民族議會，也沒有泛非主義者大會！明白嗎？』

在紅十字會到來之前不久，我們剛剛把我們的申訴寫成一個正式的單子，交給了總監獄長。這時，我們得到了寫信用的筆和紙。在礦上和洗澡間裡，我們秘密商議，大家湊了一個單子。我們把單子交給看守長，他不願接受，指責我們這樣做違反規定。我們向紅十字會提出的申訴之一就是當局不聽取我們的申訴。

紅十字會到來後的一天，我被叫到獄長辦公室見紅十字會代表。此後幾年裡，紅十字會代表就是森恩（Senn）先生，他是瑞典人，是前瑞典的監獄總監，後來移居羅德西亞。森恩五十多歲，是個文靜的人，有點神經質，看起來他對他所處的環境一點也不感到自在。會面時沒有人監視，這與其他幾乎所有的來訪者都有本質的區別。他要求聽所有的申訴和不滿，他聽得很仔細，記了大量的筆記。他彬彬有禮，感謝我告訴他全部情況。儘管如此，第一次會面非常緊張。我們都還不知道向對方提什麼要求。

我大聲抱怨獄服問題，強調我們不想穿短褲，需要諸如襪子、內衣等合適的衣物，而這些我們都沒有。我重申有關食物、探視、信件、讀書、鍛鍊、勞動強度和看守的行爲等。我還提出了一些不能指望當局滿足的要求，諸如把我們遷移到離家比較近的監獄等等。

談話結束後，森恩去見總監獄長及其部下，我則等在那裡。我想他是要把我們的申訴交給當局，指出他認爲是合理的要求。森恩來過後不久，我們的獄服得到了改善，我們有了長褲。但是不管怎麼說森恩不能算是個開明的人。他在羅得西亞的經歷使他傾向於種族主義。在我回牢房之前，我向他抱怨黑人囚犯吃不到麵包。森恩先生有點不知所措。他看了看獄長，說：『麵包對你的牙有害，我說，曼德拉，玉米更適合你們。它能使你們的牙更堅硬。』

以後幾年，國際紅十字會派來些更開明的人，他們全心全意地爲改善我們的監獄條件而

努力。紅十字會還在另外一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儘管我們不十分了解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但他們確實對我們幫助很大。他們向那些從沒有探視過我們的妻子和親屬提供資金。以後，在過聖誕節的時候，紅十字會提供資助，讓我們給家人買小禮物，這樣我們就能送些糖果和聖誕卡給妻子和孩子們。

國際紅十字會幫助我們買學習資料。我們被移送到羅本島之後，我們的支持者曾擔心當局不讓我們學習。我們到這裡幾個月後，當局宣佈那些願意學習的人可以提出申請。大多數人提出了類似的申請，儘管他們是D級囚犯，當局批准了他們的申請。瑞沃尼亞審判助長了政府的自信，他們認爲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無傷大體。結果他們自食其果。在監獄裡攻讀碩士學位是不允許的，但我是個例外，因爲在普利托利亞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先例。

我們區很少有人有碩士學位，許多人選擇了大學課程。極少數人還沒有高中學歷，所以選修高中課程。有些人已經受過良好的教育，像戈萬·姆貝基和內維爾·亞歷山大，但是其他人都沒有上過中學五年級或六年級。幾個月後，實際上所有人都在學習某項課程。夜裡，牢房就成了自習室，而看不出是監獄。

但是隨之而來是一大堆限制。某些課程，像政治和軍事歷史課都在限制之列。有好幾年時間，我們除家庭匯款之外不能接受任何資助，這樣生活困難的犯人就沒有什麼錢來買書或

交學費。學習的機會就由你有多少錢來決定了。也不允許我們把書借給別的犯人，這樣我們就不能幫助那些貧窮的同志學習了。

我們在是否應該接受政府批准的學習機會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見。一些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認爲，我們是在接受政府的施捨，這樣會損害我們的人格。他們認爲學習不應該是一種有條件的賜與，而是一種天然的權力。我也同意這種觀點，但我認爲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學習。作爲自由戰士和政治犯，我們有責任提高和加強我們的能力，而學習是達到這一目標爲數不多的機會之一。

犯人可以在南非大學註冊，也可以上速成學校，後者是爲那些進修高中學歷的人設的。我在倫敦大學的資助下學習，這個學習機會對我來說喜憂參半。一方面我被指定看各種南非圖書館閱讀書目中沒有的進步書籍；另一方面，當局必然因爲其中的許多書目不合胃口而加以禁止。

借書通常是很困難的。你要借一本關於合同法的書，就要向南非圖書館提出申請。他們履行完手續後把書通過郵局寄來。但是由於郵政系統的偶然事故、到羅本島遙遠的路途，以及看守檢查時的故意拖延，書到你手裡時已過了該還的日期。如果日期已過，看守一般連看都不給你看就把書寄回去了。按照圖書館的規定，你拿不拿到書都得交過期罰款。

除了書，我們還可以訂有關我們課程的刊物。當局對此嚴格限制，能通過檢查的刊物只

有有限的幾種，例如某個學習會計學的犯人只能訂計劃統計科學季刊。但有一天，麥克·馬哈拉傑告訴一個正在學經濟學的同志訂《經濟學人》，我們哄堂大笑，說我們不如訂《時代》周刊，因爲《經濟學人》也是周刊。但麥克只是笑了笑，說當局不知道；他們檢查書時只看書名。一個月後，我們果眞收到了《經濟學人》，讀到了我們渴望已久的新聞。但不久當局發現了他們的疏漏，我們再也收不到這份雜誌了。

在大部分人開始學習之後，我們抱怨連基本的學習設施都沒有，比如桌子、椅子之類的。我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申訴，後來，當局在每間牢房配備了一個站桌，所謂站桌，就是從牆上突出的一塊簡單的木板，高度大概到胸的部位。

這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桌子。在礦上辛苦了一天，你根本不想再站着學習。很多人抱怨這種站桌，其中凱西聲音最響。他對總監獄長說，站着學習不僅是一種負擔，而且站桌的坡度太大，書總往下掉。獄長意想不到地來到凱西的牢房，要過一本書，把它放在桌上，它沒有掉下來。他又向凱西要了一本放在第一本上，也沒有掉下來。最後在放上四本書以後，他對啞口無言的凱西說：『哈，桌子沒有問題，』然後離開了。但大約半年後，當局的態度緩和了，我們得到一只三條腿的凳子，站桌的高度也降低了。

我向紅十字會提出的申訴之一是看守在指控某個犯人時採取專斷的方式。被『指控』是

指看守認爲某個犯人違反了某項規定，這樣有可能罰他禁閉，或者減少供給他食物的數量，或者剝奪他的某些自由。看守一般不能輕率地處理這種事，因爲當一個犯人被指控時，他有權要求舉行法律聽證，如果情節嚴重，還要從開普敦請來一位法官。但監獄當局一直拒絕同意召開聽證會。在我向紅十字會提出申訴時，我自己也遇到過這個痲煩。但情況很快有了改善。

到羅本島後的第一年，周末，我們整天被關在牢房裡，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可以出外活動活動。有一個星期六，從操場活動回來，我看見一個看守把一份報紙丟在過道的長凳上。他對我們很友好，我想，他決不是由於疏忽才把報紙丟在那裡的。

對政治犯來說，報紙比金銀珠寶更珍貴，比食物和烟更管用；它們是羅本島最珍貴的違禁品。監獄根本不允許我們讀報，而我們渴望能看到新聞。沃爾特比我還急，沒有報紙他像掉了魂似的。當局試圖採取全面封鎖，他們不想讓我們讀到任何能提高我們的士氣、使我們相信外面的人們還沒有忘記我們的東西。

我們認爲，跟上這個國家的政治潮流是我們的責任，爲了得到報紙，我們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幾年裡，我們採取了許多辦法，但結果卻是一無所獲。去礦上勞動的好處之一是看守用報紙包三明治，他們經常把報紙扔進垃圾堆裡，這樣我們可以偷偷地把它撿回來。我們分散看守的注意力，然後從垃圾堆裡撿起報紙，把它藏在衣服裡。

最可靠的辦法是賄賂看守，這是我唯一贊同的不道德手段。看守看來總是缺錢花，他們的貧窮就是我們的機會。

拿到報紙後，傳遞報紙要冒更大的風險，私藏報紙要受到嚴厲處罰。我們通常是由一個人先讀，一般是凱西，然後是麥克·馬哈拉傑。凱西負責聯絡，他想出了很聰明的辦法來傳遞信息。凱西先把報紙通讀一遍，然後把有關的報導裁下來，再秘密地交給其他人。我們每個人對傳給自己的新聞進行摘錄，然後再在每個人之間進行傳遞，最後偷送到普通區。如果當局特別警覺，凱西和麥克就對新聞進行摘錄，然後把報紙毀掉，一般是撕成碎片掃進衛生桶裡，看守從來不看這種地方。

當我看到凳子上的報紙時，我馬上離開牢房，走到走廊頭上，朝兩邊看看，然後從凳子上拿起報紙，塞進襯衫裡。按正常情況，我應該把報紙藏在牢房的某個地方，就寢時間過後再拿出來。但我像個在主菜上來之前狼吞虎咽吃甜食的孩子一樣急不可耐，一回到牢房我就打開了報紙。

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長時間，我全神貫注，沒有聽見有腳步聲。突然，一個官員和兩個看守走了進來，我連把報紙塞進床下的時間都沒有。這就叫捉賊捉贓。『曼德拉，』獄官說，『我們指控你藏有違禁品，你要因此受到懲罰。』然後兩個看守開始徹底搜查我的牢

房，看還能不能搜出別的東西。

一兩天後，一位開普敦的法官被邀請到這裡，我被帶到監獄總部，這兒通常作爲本島的法庭。這一次，當局希望有一位外面的法官參與，因爲他們知道這個案子一目了然。我沒有申辯，結果被判處禁閉三天，並減少食物。

儘管有人認爲是那個放報紙的看守出賣了我，我卻不這麼認爲。在聽證會上，當局盤問我報紙的來源，我拒絕回答。如果我眞是中了圈套，當局一定早就知道我是怎麼弄到報紙的了。

禁閉室就在獄中，但在另一面。雖然只是隔着一個操場，他們卻覺得隔着千山萬水。在禁閉過程中，犯人不許見其他人，不許活動，也不給食物，三天裡每天我們只能得到米湯（就是煮米剩下的水）。與這相比，我們平時吃的粥簡直就是美餐。

受禁閉的第一天總是最痛苦的。一個人需要每天按時定量吃飯，身體受不了挨餓的滋味。我覺得第二天或多或少地習慣了這種不吃食物的滋味，第三天過去了，也沒有特別想吃東西的感覺。在非洲人的日常生活中，這種挨餓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我自己早年在約翰尼斯堡就曾有一段缺少食物的生活。

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樣，我認爲禁閉是監獄生活最殘酷的一個方面。沒有白天黑夜，只

有你的腦子在跟你玩花樣。這是夢還是現實？你開始懷疑一切，我的抉擇是不是正確的？我的犧牲值得嗎？這些問題總是在你的腦子裡轉來轉去，從來不肯離去。

但是人的身體具有巨大的潛力，能夠適應各種環境。我發現如果你有堅強的意志，在你的身體接受考驗的時候，你就能忍受難於忍受的東西。堅定的信心是戰勝饑餓的秘密，在胃口空空的時候你也能保持旺盛的精神。

在開始幾年，禁閉成了習慣。我們常常因爲很小的事被指控，而且被判禁閉。一個人可能因爲東張西望而被禁止用飯，也可能因爲在看守進來時沒有站起來而受罰。一些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因爲經常犯這種錯誤，長期被關在禁閉室裡。當局認爲禁閉是對付我們的抵制和反叛的好辦法。

第一次禁閉後不久，我再次受指控，並第二次受禁閉。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們在使當局接受我們的申訴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難。監獄的禁閉制度使當局覺得他們可以不理我們，而沒有什麼關係。他們認爲，如果他們裝聾作啞，我們遭受挫折以後就會喪失信心，外面的世界也會忘掉我們。一天，我們正在石灰礦勞動，獄長前來視察，和他一起來的是位先生，我第一眼沒有認出來。一個同伴小聲告訴我，這個人是普利托利亞的奧肯普准將，是我們上司的上司。（不要把他和普利托利亞中央監獄裡那位在瑞沃尼亞審判後一直照顧我們的奧肯

普中尉弄混了。）兩個人站在遠處，看着我們。

奧肯普是個個子不高，身體肥胖的傢伙，他穿着西裝，而沒有穿軍裝。他一般半年到島上視察一次。每次他來的時候，我們要立正站在牢房的柵欄旁，在他走過時舉起我們的監獄號碼。

我認爲奧肯普的意外出現是向他提出申訴的唯一機會，他有權糾正這些問題。我放下鑿子，開始向他們走去。看守馬上大吃一驚，向我跑來。我知道我違反了規定，但我希望趁看守對我的舉動感到吃驚、來不及阻止我的時候走過去。事實正是這樣。

當我走到兩個人面前時，獄長冷冷地說：『曼德拉，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沒人叫你。』我沒有理他，而是轉向奧肯普，說我之所以採取這種不尋常的作法，是因爲我們的申訴得不到理睬。獄長打斷我的話，說：『曼德拉，我命令你回到你的位置去。』我轉向他，有分寸地說：『我已經來了，不打算回去。』我希望奧肯普同意聽我講，但他冷冷地看着我，然後平靜地對看守說：『起訴他。』

看守拉我走時，我繼續說着。『把他帶回牢房，』獄長說。我被起訴了，這一次我也沒有申辯。被禁閉四天。我的行爲給我一個教訓，這個教訓我早已知道，但由於絕望而忽視了它。沒有人，尤其是監獄官員，喜歡他的權威受到公開挑戰。爲了對我的問題作出反應，奧肯普會訓斥他的部下。監獄官員更願意對私下裡的要求做出答覆。爲了改善我們在羅本島上

的境遇，最好的辦法是私下裡而不是公開地影響官員。同伴們有時指責我對監獄官員太遷就，但爲了改善我們的條件我願意接受批評。

六十六

在犯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人不是司法部長，也不是監獄總監，更不是獄長，而是犯人所在區域的哨兵。如果你覺得有些冷而想再要一條毛毯的話，你當然可以向司法部長提出來，他會說：『對不起，這不符合有關規定。』獄長會說：『如果我給你加一條毛毯，我就必須同樣給每個人增加一條。』但如果你向你的哨兵提出這一要求，而且你和他的關係較好的話，他會直接打開倉庫給你取出一條來。

我總是盡力地對我們區的哨兵友好一些；對哨兵懷有敵意只會是自找麻煩。在哨兵中總樹立一個敵人是十分不必要的。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就是教育全體人民，即使我們的敵人也不排除在外：我們相信包括在監獄中值勤的哨兵在內的人都會發生變化，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感化他們。

一般情況下，我們對待哨兵就像哨兵對待我們一樣。如果他替我們着想，我們也會替他着想。並非所有的哨兵都是魔鬼一樣的人。我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哨兵當中也有許多正直善良的人。但是，對哨兵友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他們普遍認爲對黑人太客氣是一種

丟臉的行爲。由於找到一位對我們友好一些的哨兵有很多的好處，我經常要求同事們主動向哨兵表示友好。但沒有幾個人願意幹這種事。

在礦井裡有一個哨兵監督我們勞動，他好像對我們抱有很深的敵意。這是很糟糕的，因爲我們經常在礦井裡討論問題，一個不許我們講話的哨兵就成了障礙。我找到一位同事讓他去與哨兵交個朋友，以免哨兵干擾我們的討論。這位哨兵十分粗魯，但他很快就對這個犯人表現出了一點好感。一天，哨兵要這位同志脫下他的上衣，他要墊在屁股下坐到草地上。我知道我的這位同事的性格，他認爲這是對他的侮辱，但我還是點頭讓他照辦了。

幾天之後，我們正在工棚裡吃午飯，那位哨兵突然走了進來。哨兵多帶了一塊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扔到我們附近的草地上，說：『吃吧！』這就是他對我們表示友好的方式。

這使我們左右爲難。一方面，他把我們當成動物來對待。我認爲，揀起這塊三明治會有損我們的尊嚴。另一方面，我們十分饑餓，拒絕他的這一姿態將會使他感到羞辱，這不符合我們的與他交朋友的意圖。我可以看得出，那位與哨兵交朋友的同志確實想吃這塊三明治，我點頭示意他去揀了起來。

我們的策略產生了效果，那位哨兵減輕了對我們的敵意，他甚至開始問一些關於非洲民族議會的問題。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一個人在監獄裡工作，他可能已經被政府的宣傳洗了腦子。他可能認爲我們是恐怖主義分子或共產主義分子，認爲我們的目標是把白人趕到大海

裡去。但當我們心平氣和地向他解釋了我們的非種族主義政策、我們要求權力平等、我們打算重新分配財富，他有些迷惑不解地說：『這好像要比國民黨還好！』

哨兵的同情極大地方便了我們在羅本島上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通信。我們認爲我們有責任與F和G區的犯人取得聯繫，這兩個區關押的都是普通犯人。作爲政治家，我們只是打算像原來在獄外一樣在監獄裡加強我們的組織。如果我們打算協調我們的示威和不滿，那麼通信就十分必要了。

由於普通犯人區裡的人經常流動，F和G區的人更希望了解最近發生的事情，他們還希望知道我們的朋友和家庭的情況。

各區之間通信是嚴重違犯規定的。我們針對這一規定找到了許多有效的辦法。負責運送我們的飯桶的是普通區的犯人，在前幾個月裡，我們設法悄悄地與他們進行聯繫，我們向他們傳遞一些簡要消息。我們成立了一個秘密的通信委員會，其成員有凱西、麥克·馬哈拉傑、拉洛·基巴和其它一些人，他們的任務是組織遞信活動。

我們的第一項通信技術是由凱西和麥克提出來的。他們發現，在我們去礦井的路上，哨兵們經常扔一些空的火柴盒。他們開始秘密收集火柴盒，麥克設法在火柴盒底上做了一個夾層，把寫有消息的紙條塞進夾層裡。曾經作過裁縫的拉洛·基巴負責書寫字體很小的紙條，

這些紙條放到火柴盒裡正合適。與我們關押在一起的另一位民族之矛戰士喬·格卡比負責把火柴盒帶到去往礦井的路上，然後放在一個十字路口處，我們知道普通犯人將會從此經過。通過送飯時的悄聲耳語，我們商定了這一計劃。F和G區的指定犯人將在途中把火柴盒揀起來，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獲取信息。這種方式並非完美無缺，甚至下雨這樣的小事也會使我們受到挫折。後來，我們很快找到了更有效的方式。

我們尋找到了哨兵不注意我們的機會。其中一段時間就是吃飯時和飯後。我們各自吃着飯，制訂了一個方案：在廚房工作的來自普通區的犯人把信和紙條用塑膠紙包好後放進飯桶裡。我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反饋信息，把紙條用塑膠布包好後放到一堆髒盤子的底下，隨飯桶一起運回廚房。我們盡量把盤子弄得亂一些，使每個盤子上都沾有飯菜。哨兵甚至抱怨我們搞得太亂，但他們沒有想到搜查。

我們的廁所和浴室與隔離區毗鄰。普通區的犯人受到懲罰後一般被關在這裡，他們將與我們使用同一個廁所，只是時間不同而已。麥克提出了一個辦法：用塑膠布把紙條包好後塞進馬桶裡。我們鼓動普通區裡的政治犯故意犯些錯誤，以便受到指控並被關進隔離區，這樣他們就可以與我們交流信息了。哨兵們從未想過進行搜查。

萬一當局發現了我們的紙條，爲了防止他們讀懂其內容，我們發明了幾種書寫方法，以免被輕易地辯認出來。其中之一是用牛奶書寫。牛奶乾得很快，而紙看起來像是空白的。當

局給我們分發了消毒劑以清掃監房，消毒劑被噴撒到乾後的牛奶上時，字跡就顯示出來了。遺憾的是，我們很少能得到牛奶。只有某人被診斷患了潰瘍之後，我們才能得到一些。

另一個辦法是用小字寫到手紙上。手紙很小，容易掩藏，這個辦法就成爲傳遞消息的常用方法。當局發現了大量的這種手紙之後，他們採取了不同尋常的方法：定量分配手紙。當時戈萬因生病而不能去礦井勞動，當局給他分配的任務是每天爲每名犯人分發八張手紙。

除了這些機智的方法之外，我們還有一個最好、也是最簡單的方法：爭取去監獄醫院。羅本島上只有一所醫院，當我們去醫院時，很難把我們與普通犯人區分開。有時，來自各區的犯人甚至歸一個哨兵看管，來自B區的犯人就和F、G區的人混雜在了一起，然後就可以交流關於政治組織、罷工、怠工以及其它一些問題的信息。

與外界的通信有兩個辦法：一個是通過服刑期滿和將離開羅本島的犯人，另一個是通過與探監者的聯繫。即將離開的犯人將把信偷偷地藏在他們的衣服或行李中。通過探監者，一般來說更具有危險性，因爲探監者本人也要承擔風險。當有律師來看我們時，哨兵們不得留在室內，我們有時可以拿出一封信來讓他帶出去。律師不會受到搜查。在會談中，就像瑞沃尼亞審判期間一樣，我們可以用筆來協助談話。因爲房間裡裝有竊聽器，我們會這樣說：『請告訴……』然後停一下，在紙片上寫出『O·R·』字樣，表示奧利弗·坦博，『……我們同意他們關於縮小……的規模的建議。』再寫出『全國執委會』。

通過藏在飯桶裡的一張用塑膠布包着的紙條，我們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了解到，普通區的犯人們開展了一場絕食鬥爭，以抗議生活條件的惡劣。紙條上寫得不很清楚，我們不能準確地知道絕食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也不知道絕食究竟出於什麼原因。但不論他們出於什麼原因而絕食，我們都是表示支持的。我們傳閱了這一紙條，決定從下頓飯開始進行同情性的絕食鬥爭。

由於通信中耽擱了時間，普通區的犯人可能在一天多之後才知道我們也參加了鬥爭。但我們認爲這一消息將會振奮他們的鬥志。當局可能會勸告他們，我們沒有參加絕食鬥爭，我們正在享受自己的那一份美餐。這是當局的慣用伎倆，每次到危急關頭時，當局必然會傳播誤導性的消息，挑撥各區犯人之間的關係。假如這樣的話，非洲民族議會一致支持這次絕食，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某些普通犯人就不會支持。

在我們絕食的第一天，當局送來了和平常一樣的飯菜，我們沒有吃。第二天，我們注意到飯菜的份量增加了，還有一些蔬菜；第三天，粥裡面有些肉片。到了第四天，粥裡面出現了許多大塊的肥肉，色彩鮮艷的蔬菜也十分誘人。這些美味眞令人唾涎欲滴。當我們從飯菜之前走過去時，哨兵衝我們微笑着。誘惑是巨大的，但我們抵抗住了，儘管我們還要被特意派到礦井去勞動。我們聽到旁邊有人餓倒了，被手推車送到了醫院。

我被召到獄長辦公室裡去與韋賽爾斯上校談判。這種談判是十分棘手的，我的同事都認爲當局企圖利用我來結束這次絕食。韋賽爾斯是一個坦率的人，他想知道我們爲什麼要絕食。我解釋說，作爲一批政治犯，我們認爲要求改善獄中的條件是反種族隔離鬥爭的延續。『但你們並不知道F和G區的犯人是爲什麼而絕食。』他說。我表示這無關緊要，F和G區的犯人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鬥爭是不可分割的。他輕蔑地看了我一眼，把我趕出了他的辦公室。

第二天，我們聽說這次絕食產生了意外的效果：哨兵們也進行了絕食，他們拒絕去吃他們的自助餐。他們絕食並不是爲了支持我們，他們覺得如果我們能辦到的話，他們爲什麼不能呢？他們要求提高伙食標準，要求改善生活條件。這兩場絕食鬥爭加到一起，可眞讓當局吃不消了。他們先與哨兵達成了諒解，過了一、兩天，我們聽說當局派人到了普通區，要求他們派出三名代表進行談判。普通區的犯人隨即宣佈他們取得了勝利，並結束了絕食。一天之後，我們也結束了這場鬥爭。

這是羅本島上的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絕食鬥爭。作爲一種抗議形式，它的成功率並不高，在我看來，其背後的基本原理有些唐吉柯德的色彩。爲了保證絕食鬥爭取得成功，必須讓獄外的人了解它。否則，犯人們會白白挨餓至死而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偷偷送出去

的關於絕食鬥爭的消息將刊登在報紙上，從而使當局受到公眾輿論的壓力。特別是在前幾年裡，當我們在獄中進行絕食鬥爭時，幾乎不可能引起獄外人民的關注，這就是問題所在。

對於我個人來說，絕食鬥爭是十分消極、被動的。參加絕食鬥爭的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會受到威脅。我一直贊成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鬥爭方式，如罷工、怠工或拒絕打掃衛生；這種鬥爭懲罰的是當局而不是我們自己。他們想要礦砂，而我們不生產礦砂。他們想讓監獄的院子裡乾乾淨淨，我們卻不打掃。這種行爲會使他們感到苦惱和羞辱，我覺得，當他們看着我們絕食時也許正在暗中高興。

但一旦形成了決議，我總是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我的同事甚至開玩笑地指責我不想少吃一頓飯。絕食鬥爭的擁護者認爲，這是一種傳統上大家都接受的抗議方式，全世界的一些著名領導人都採用過這種方式，如甘地。不過，一旦形成決議之後，我就與其擁護者一樣全心全意地支持這種鬥爭。事實上，在絕食期間，我經常勸誡某些更加固執己見的同事，他們不願意遵守我們的決議。我記得一個人這樣說：『馬迪巴，我想吃點東西。我不明白我爲什麼不吃也可以對付。我已經從事鬥爭多年了。』

同志們有時會偷偷地吃點東西。我知道這一現象，原因很簡單：絕食到了第二天，人們就不必去廁所了。但一天早晨，我看到一個小伙子去了廁所。我們有自己的情報機構，因爲我們知道某個人在這方面較爲薄弱。

六十七

一九六六年七月的絕食鬥爭期間，溫妮第二次到羅本島來看望我。她第一次探監幾乎是兩年前的事，我已經記不清楚了。自從溫妮於一九六四年探監之後，她一直受到警方的騷擾。她的姐姐和弟弟也受到警方的迫害，當局企圖禁止她家中的任何親屬與她生活在一起。當時我聽到了一些傳聞，但後來我才弄清了全部眞相。我了解到一些卑鄙行爲，因爲當我從礦井裡收工回到監房時，經常發現一些哨兵匿名放到我的床上的有關溫妮的剪報。

用這種卑劣的、惡毒的方式，當局盡最大的努力使溫妮不可能心情舒暢地來探監。在前兩年裡，地方當局禁止她外出旅行，他們反覆向她發出禁止外出的禁令。最近通過我的律師了解到，警方已經通知溫妮：如果她持有通行證的話，就可以去探監。自從五十年代開始，溫妮一直反對政府關於婦女通行證的政策，她理所當然地不會要這種可惡的通行證。當局顯然是借此機會來侮辱我和溫妮。但我認爲，我們的見面比抵制當局的這一卑鄙陰謀更加重要，溫妮同意接受一張通行證。我十分想念溫妮，我需要見她一面，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家事要商量。

限制溫妮外出的規定很多，也十分複雜。她被禁止乘坐火車或汽車，而只能坐飛機，這就使她外出的花費很大。她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從機場直接去卡利登廣場附近的開普敦警察

局。她要辦理各種各樣的手續。當她離開這裡時，也必須到這裡來辦理另外的手續。

我從一張剪貼過的報紙上還了解到，特務機關的人曾破門而入，闖進我們在奧蘭多的家中，而當時溫妮正在穿衣服，她感到十分氣憤，把來人推到臥室門外。而這位官員竟指控溫妮毆打了他，我請我的朋友、同事喬治·比佐斯爲她辯護，喬治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律師。我們從報紙上讀到了這一消息，我的一些難友拿溫妮的好鬥與我開玩笑。他們說：『在家中你並非是唯一的拳擊手，馬迪巴。』

第二次探監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而我們要說的話很多。溫妮因爲在開普敦受到了刁難而有些氣憤不平。實際上，她與往常一樣必須乘坐飛機的貨艙，發動機的油烟令她嘔吐不止。她想盡辦法盡可能地打扮自己，以免我爲她擔心，但她看起來瘦了，也憔悴了。

我們談到了孩子們的學習和我母親的健康狀況以及家庭的收支問題。澤尼和津齊的學習問題是我們主要討論的問題之一。溫妮把孩子們送到了一所有色人種的學校，當局正以此爲借口糾纏不休，他們稱學校接收黑人是違法的。我們作出了一個十分困難的決定：把澤尼和津齊送到史瓦濟蘭的學校去。這對溫妮來說是一個打擊，她把兩個孩子看作是她的精神支柱。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們在那裡將接受較良好的教育，但我又爲溫妮擔憂。她將孤苦伶仃地一個人生活，有人自稱是她的朋友而實際上是要陷害她，溫妮只能受人欺負。如果眞有這樣的事，只能說溫妮太相信那人的動機了。

爲了避開當局禁止我們談論家庭事務以外的問題的限制，我們通常使用一些只有我們兩人明白而哨兵不懂的名字。如果我想知道溫妮正在做些什麼工作，我會說：『最近你聽到恩古太阿納的消息了嗎？她好嗎？』恩古太阿納是溫妮的部族名之一，但當局對此並不清楚。溫妮接着就談起了恩古太阿納如何如何。如果哨兵問起誰是恩古太阿納，我們就說她是我們的親戚。如果我想知道非洲民族議會對外委員會的情況，我會問：『教會怎麼樣？』溫妮就以適當的方式向我介紹『教會』的情況，我再問：『牧師怎麼樣？又有新的佈置嗎？』我們盡可能地通過這種方式來交流大量的信息。

同往常一樣，當哨兵大喊一聲『時間到了』時，我覺得好像只過了幾分鐘。我想吻一下玻璃牆同她告別，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總是寧願讓溫妮先走開，以免她看到我被哨兵押送回監房的情景。我能看得出，當她悄聲向我告別時，她把痛苦埋在了自己的心中而不願暴露在哨兵的眼前。

探監結束後，我在心中默默地回憶了全部過程，溫妮穿的什麼衣服，她說了哪些話，我是如何說的，這一切都歷歷在目。後來，我給她寫了一封信，敘述了我們的談話，告訴她我是多麼地關心她，我們的婚姻是多麼地不可動搖，她是多麼地勇敢。我認爲，我給她的信既是情書，也是給她送去她所需要的感情支持的唯一方式。

探監之後不久，我聽說溫妮再次受到指控，理由是她到開普敦後未向警察機構報告，並

在離開時拒絕向警方提供她的住址。實際上，她一上飛機就報告了自己的住址，當她返回時再次受到查問，她拒絕回答，說她早已報告過了。

溫妮先是被捕，後又被保釋出獄。她受到審訊，並被判處一年監禁，但只執行了四天就中止了。隨後，溫妮因這一事件而失去了作一名社會福利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她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

政府盡最大的努力以各種他們認爲我難以抵抗的方式來折磨我。一九六六年年底，在司法部長的唆使下，川斯瓦法律學會提議要取消我的律師資格，因爲我在瑞沃尼亞審判中被證明犯了罪。上一次，他們曾以我捲入蔑視運動爲理由提議取消我的律師資格，但他們沒能達到目的，他們顯然沒有從中接受教訓。

川斯瓦法律學會剛剛提出這一動議，我就知道了。這是一個極爲保守的組織，他們認爲目前我無力爲自己辯護，他們要趁機懲罰我。對於一個在羅本島上服刑的囚犯來說，到法庭上爲自己辯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正是我打算做的。

我向當局提出，我打算據理力爭，爲自己辯護。我對監獄官員說，爲了做好充分的準備，我需要免除礦井裡的勞動，還需要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盞臺燈，以便準備我的辯護詞。我說，我還需要到普利托利亞去查閱一些法律方面的書籍。

我的策略就是以合法的要求來壓服監獄當局和法庭，我知道他們很難滿足我的要求。當我打算到法庭上去爲自己辯護時，當局總是苦惱不堪，因爲我的公開亮相就表明，我仍在爲原有的價值觀而努力奮鬥。

他們的第一個答覆是：『曼德拉，你爲什麼不找一位律師來爲你辯護呢？他可以很好地處理這件事。你何必勞自己的大駕呢？』我又向前邁了一步，請最高法院的書記員提供我所需要的記錄、文件和書籍。我還要了一些政府方面的證人名單及各自的證明材料。

我收到了一封信，說法庭在滿足我的要求之前，必須弄清楚我辯護的性質。眞是多管閑事，哪有在開庭審判之前先問一位律師的辯護性質的？在正式出庭之前，被告沒有必要公開自己的辯護性質。我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他們，當我提交我的答辯書時，他們會弄明白我的辯護的性質的，但現在還爲時過早。

這是我與書記員以及國家律師協會進行通信的開始，後者代表着川斯瓦法律學會。我決不會撤回我的要求，當局也同樣毫不妥協：我不能免除礦井中的勞動，也不能得到書桌和椅子，我也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去普利托利亞查閱法律圖書。

我繼續以各種要求來折騰川斯瓦法律學會和書記員，他們也總是駁回我的要求。幾個月之後，只給了我一個簡單的通知，他們不聲不響地撤回了他們的起訴。這一案子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像。他們以爲我沒有精力和財力爲自己辯護，但事實證明他們又犯了一個錯誤。

關於我與川斯瓦法律學會打官司一事，我能夠詳細地了解政府方面的反應，因爲我們當時每天都可以看到報紙。報紙好像是被送到監房門口。眞的，事實就是這樣。

夜裡看守我們的哨兵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基督徒，麥克·馬哈拉傑與他關係不錯。一天夜裡，他走到麥克的監房說，他想參加一家報紙舉辦的徵文比賽，只需要寫一篇文章。他問麥克是否願意幫他寫一篇。這個老看守暗示說，如果麥克幫助了他，他決不會虧待麥克。麥克同意了，及時地幫他寫了一篇文章。兩周之後，這個老頭很激動地找到了麥克，說他目前已經進入了決賽圈，麥克能否再幫他寫一篇？老看守答應給麥克一只燒鷄作爲報酬。麥克表示他要考慮一下。

第二天，麥克向我和沃爾特說了這件事。沃爾特鼓勵麥克接受那只燒鷄，我卻對他不願這麼辦表示讚賞，因爲顯然他會受到特殊的優待。夜裡，他告訴那個哨兵說他可以幫他寫文章，但要拿一包香烟來交換。老看守同意了，第二天晚上就給麥克送來了一包新買的香烟。

又過了一天，麥克告訴我們說，現在他可以對那個老看守施加壓力了。我們問他怎麼施加壓力，麥克說：『因爲我這包香烟上有他的手指印，我可以敲詐他。』沃爾特埋怨說，這是不道德的。我沒有批評麥克，而是問他要敲詐出什麼東西。麥克抬了抬眉毛，說：『報紙。』沃爾特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我覺得，沃爾特是羅本島上唯一一位與我一樣渴望看到報

紙的人。麥克已經與通信委員會討論了他的計劃，儘管我們兩人都持保留意見，但並未阻攔他。

一天晚上，麥克對老看守說，他在香烟盒上留下了手指印，如果他不與我們合作的話，麥克就把此事報告給司令官。由於害怕受到訓斥並失去退休金，這個老看守同意按麥克的意見辦。在以後的六個月裡，這個老看守偷偷地把當天的報紙交給麥克，直到他調離羅本島。麥克讀過報紙後，把重大消息分別抄到小紙條上，然後在我們之間傳閱。這個不走運的看守也沒有占到多大便宜。

除了挖石灰和聊天之外，很難說我們在礦井裡還能幹些什麼。到了一九六六年，哨兵們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只要我們勞動着，說多少話都沒有關係。我們分成一些小組，每組大約四、五個人，整天在一起聊天，普天之下的大小事情都要討論。我們每天都在討論着，既討論天下大事，也談論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

監獄實在沒有什麼令人高興的東西——也許有一個例外，人們有時間進行反省。在鬥爭的旋渦裡，我們要不停地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作出反應，幾乎沒有時間認眞地考慮自己的決定和政策的各種後果。監獄則提供了時間——足夠多的時間——讓人考慮已經做過的和尙未做過的事情。

我們一直在進行政治性的討論。有些問題一天之內就得到了解決，而另一些問題卻爭論了好幾年。我一直喜歡進行尖銳激烈的爭論，並積極參加討論。最早討論的也是討論時間最長的一個問題是關於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的。有些人，特別是那些曾到社會主義國家受過訓練的民族之矛的戰士們認爲，非洲民族議會和共產黨完全是一回事。甚至非洲民族議會的一些高級領導人，如戈萬·姆貝基和哈瑞·瓜拉（Harry Gwala）也贊同這一看法。

共產黨在羅本島上並未作爲一個獨立的組織而存在。在監獄中，無法區別非洲民族議會和存在於監獄之外的共產黨。我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群衆性的解放組織，它歡迎所有目標一致的組織。

有一段時間裡，關於非洲民族議會和共產黨的爭論逐漸變得極爲尖銳。許多人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我們向流亡在盧薩卡的非洲民族議會寫信。我們就這一問題寫了一份長達二十二頁的秘密報告，並附上我的一封親筆信，一起送到盧薩卡。起草並送出這樣一份文件是十分冒險的。最後，盧薩卡方面證實了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之間有區別，這一爭論才取終平息下來。

另一個經常討論的政治問題是：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成員是否應嚴格限定於勞動者之中？有些人認爲，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主要由普通勞動者組成的群衆組織，因此，非洲民族

議會的領導人應從這些人中產生。我的看法是，指定從勞動階級中產生領導人與指定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產生領導人是同樣的不民主。如果非洲民族議會堅持這一原則，它的許多領導人，如盧圖利酋長、摩西·科坦尼、達杜博士等人都將是不合格的。每個階級中都會產生革命家。

並非所有的爭論都帶有政治色彩。割禮就是一個曾引起我們多次爭論的問題。有些人認爲，科薩和另外一些部落所實行的割禮不僅造成不必要的肉體殘缺，而且是非洲民族議會正謀求推翻的部落制度的附屬品。這種意見並非一點道理也沒有，但另一種意見似乎更占上風。割禮是一種文化方面的儀式，不僅對人體健康有好處，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心理效果。割禮是增強集體認同感和灌輸積極的價值觀的儀式。我贊成後面這種觀點。

爭論持續了許多年，對割禮持贊同意見的很多人以十分明確的方式表明了態度。在監獄醫院工作的一位犯人從前曾接受了割禮，他在醫院裡設立了一個秘密的割禮手術室，我們區裡的許多年輕人到那裡接受了割禮。割禮之後，我們舉辦一個小型的集會，用茶和餅幹招待他們，在一兩天之內他們將裹着毛毯走路，與獄外的風俗一樣。

我們反覆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非洲有沒有老虎？有些人認爲，儘管人們普遍猜測非洲

有老虎生存，但這是一個神話，老虎生長在亞洲和印度次大陸。非洲有許多豹子，但沒有老虎。另外一些人則認爲，老虎是非洲土生的，只是有些跑到其他地區罷了。有些人聲稱，他們在非洲叢林裡親眼看到過這種力大無窮、外表美麗的動物。

我認爲，儘管目前在非洲沒有發現老虎，但在科薩語中有一個詞專指老虎，它與指豹子的那個詞是不同的。如果科薩語中有這個詞，那麼非洲就肯定曾經有過這種動物。否則，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個詞呢？這種爭論流傳很廣，我記得麥克反駁說，幾百年前，印地語中有個詞指能在空中飛行的航空器，比發明飛機要早得多，但這並不能說明古代印度就有了飛機。

六十八

在礦井裡負責看管我們的是一位仁慈寬厚、說話和氣的哨兵，我們稱他爲『沉默的人』。我們勞動時，他例行公事般地遠遠站在一邊，只要我們不惹事生非，他就不管我們。當他發現我們斜靠在工具上休息或聊天時，從不大聲地訓斥我們。

我們對他也很友好。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他來到我們面前，說：『先生們，大雨衝掉了公路上的白綫，我們今天急需二十公斤石灰。你們能幫幫忙嗎？』儘管當時我們沒有幹多少活，但他對我們仍很客氣，我們決定幫助他。

那年春天，我們感到當局稍稍放鬆了對我們的管制，島上原有的冷酷無情的紀律有所放

鬆。犯人和哨兵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有所緩和。

但這種緩和是極其短暫的，在九月的某一天上午結束了。我們剛剛把手中的工具放到礦井地面上，準備到工棚裡去吃午飯。一名普通犯人推着一桶食品朝我們走來，他悄聲說：『維沃爾德死了。』這一消息很快就在我們中間傳開了。我們以不相信的眼光互相看着，又看了看哨兵，他好像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們不知道這位總理是怎麼死的。後來，我們聽說是一位國會的白人信使刺殺了維沃爾德，我們仍不知道他是出於何種動機。儘管維沃爾德認爲黑人比動物還要低一等，但他的死並不值得我們高興。我本人或非洲民族議會從來沒有支持過政治暗殺。這是對付對手的最原始的手段。

維沃爾德被認爲是種族隔離制度的主要鼓吹者和推行者。他支持成立班圖斯坦，支持推行班圖教育。在他死前不久，他還領導國民黨取得了一九六六年大選的勝利。在這次大選中，國民黨獲得了一百二十六個席位，團結黨獲三十九席，而進步黨只獲得了一個席位。

像羅本島往常一樣，我們還是比哨兵們先了解到重大政治消息。但到了第二天，哨兵們顯然也知道了，他們把胸中的怨氣都發洩到我們身上。幾個月來有所緩和的局勢突然又重新緊張起來。當局開始對政治犯進行打擊，好像是我們持刀行刺維沃爾德似的。

當局總是認為我們與外界的各種勢力有秘密聯繫。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是非洲民族議會的盟友，他們經常成功地以游擊戰的方式襲擊南非警察，這也使當局坐臥不安。當局認為我們的剛剛組建的軍事組織已經強大到可以行刺他們的國家元首，這未免太高估我們了。但他們的懷疑正好反映出這些目光短淺的人們缺乏安全感，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他們自己誤入歧途的政策，而在於他們的虛幻的政治對手，即非洲民族議會。

對我們的懲罰從未作為官方政策而加以宣佈，但我們剛到羅本島時的那種緊張氣氛確實又捲土重來了。『沉默的人』被一位粗野的哨兵所代替，他的名字叫範·倫斯堡（Van Rensburg），他是在暗殺事件發生二十四小時之內被派到羅本島來的。他未到島上來之前我們就久聞大名了，在犯人中間，他的名字是『粗野』的代名詞。

範·倫斯堡是一個高大、笨拙、粗暴的人，他不會說話，只會喊叫。他上任的第一天，我們就注意到他的手腕上刺有一個小型的納粹標記。但他並不需要用這個粗野的標記來證明他的殘酷。他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地讓我們的生活更加悲慘，他是帶着極大的熱情來從事這一工作的。

隨後的幾個月裡，範·倫斯堡每天都要指控我們中間的某個人不服從管理或消極怠工。每天早晨，他和其它哨兵一起討論應在今天下午指控誰。這是一種選擇性的威脅政策，一旦

他們商定要指控誰，不管這位犯人怎麼努力地工作，他也難逃被指控的命運。當我們疲憊不堪地回到監房時，範·倫斯堡將宣讀一份名單，『曼德拉（或西蘇魯，或卡特拉達），我想馬上在司令官面前與你談談。』

羅本島的行政法庭開始加班加點地工作。我們也相應地成立了我們自己的法律委員會，其中包括我、費克爾·巴姆和麥克·馬哈拉傑。麥克曾學習過法律，很善於把當局變成被告。費克爾正在攻讀法律學位，他是一個聰明、機智的小伙子，他是我們區裡的犯人委員會的頭頭。我們的法律委員會的工作是在行政法庭上如何辯護方面向我們的同志提出建議。

範·倫斯堡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在礦井裡他騎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而在法庭上我們則盡情地捉弄他。我們的策略是不與他在現場進行爭辯，而是在法庭上對他進行反訴，這樣就有機會讓稍稍開明一些的官員同情我們。在行政法庭上，通常是由一名負責官員宣讀起訴書。他讀道：『在礦井中消極怠工案』，範·倫斯堡則洋洋得意地坐在那裡。起訴書讀完之後，我總是建議我的同事做同一件事情，實際上，這一件事情就夠了：要求法庭指出『進一步的細節』。這是被告的權利之一，儘管我們反覆提出這一要求，範·倫斯堡總是在這個問題上受到挫折。然後，法庭不得不暫時休庭，由範·倫斯堡去找出『進一步的細節』。

不論事情大小，範·倫斯堡總是懷恨在心，伺機報復。當我們的午飯被送到礦井上時，

我們就坐下來吃飯——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張簡陋的木製飯桌。範·倫斯堡總是選定這一時機在我們的午飯桶旁邊小便。我想，他沒有直接在我們的飯桶上小便就該謝天謝地了，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提出了抗議。

犯人們對哨兵進行報復的辦法之一就是利用幽默，範·倫斯堡成爲許多笑話中的笑料。我們私下裡稱他爲『飯桶』。哨兵的飯盒被稱爲『飯桶』。哨兵通常會指派一名犯人爲自己提着『飯桶』，到吃飯時賞給他半片麵包就可以了。但我們全都拒絕爲範·倫斯堡提『飯桶』，因此，他就得到了這麼個綽號。對於一名哨兵來說，自己提着自己的午飯是件十分丟臉的事。

一天，威爾頓·姆克瓦依當着範·倫斯堡的面不小心提到了『飯桶』。範·倫斯堡吼叫着，『誰是飯桶？』威爾頓停頓了一下，然後脫口而出，『你就是飯桶。』

範·倫斯堡問道：『你們爲什麼叫我飯桶呢？』威爾頓沒有作聲。範·倫斯堡又追問了一遍。威爾頓含糊其辭地回答說：『因爲你總是自己拎着飯桶。一般犯人們都爲哨兵提着他們的飯桶，但我們不幫你提——所以我們稱你爲飯桶。』

範·倫斯堡認眞地考慮了一會兒，他沒有發火，說：『我的名字不叫飯桶，我叫Dik Nek。』短暫的沉默之後，我們忍不住大笑起來。在南非荷蘭語中，Dik Nek是『僵硬的脖子』的意思，是指那些頑固不化、固執己見的人。我想，飯桶也許是太笨了，他還不知道自

己受到了侮辱。

有一天，我們在礦井裡重新討論起了老虎是不是非洲土生的這一問題。在範·倫斯堡任職期間，我們不能像從前一樣自由交談，但不管怎樣，我們可以邊勞動邊交談。

有些人說老虎不是非洲土生的，其中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安德魯·梅森多（Andrew Masondo），他是非洲民族議會開普省的一位領導人，曾在黑爾堡大學任教。梅森多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他堅定地斷言，在非洲沒有發現過老虎。這一爭論十分激烈，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人們都放下手中的工具來參加爭論。這一現像引起了哨兵的注意。他們大聲呵斥着讓我們勞動，但我們太投入這一爭論了，我們沒有理睬哨兵。幾位軍銜較低的哨兵命令我們回去勞動，我們同樣也不理睬他們。最後，『飯桶』走了過來，其實他的英語說得很差，但他用英語訓斥我們：『你們談得太多，但是你們幹得太少！』

人們沒有拿起自己的工具，他們都笑得彎下了腰。『飯桶』的語法錯誤讓每個人都感到極爲滑稽。但『飯桶』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他立即派人去請司令官凱爾曼（Kellerman）少校。

幾分鐘之後，凱爾曼少校就來到了現場，他看到我們仍像原來那樣邊勞動邊說笑。凱爾曼來到羅本島的時間不長，他決心要嚴格執法。有一位哨兵向凱爾曼報告說，我和梅森多沒

有好好幹活，我們被指控爲消極怠工和不服從管理。根據凱爾曼的命令，我們被帶上手銬，關了禁閉。

從那一次起，『飯桶』似乎對我懷有刻骨的敵意。有一天，他正在礦井旁邊監督我們勞動，我挨着費克爾·巴姆勞動。我們兩人離別人較遠，在礦井的另一端。我們幹得很賣勁，但由於當時我們都正在學習法律，所以我們一邊勞動一邊討論昨天晚上讀的書中的內容。勞動結束時，範·倫斯堡站在我們面前，說：『費克爾·巴姆和納爾遜·曼德拉，我想在獄長大人面前與你們談一談。』

我們被帶到中校獄長面前，範·倫斯堡宣佈：『這兩個人今天沒幹什麼活兒。我指控他們不服從命令。』中校問我們有什麼辯解的。我回答說：『中校先生，我們對這一指控不服，我們一直在勞動，實際上，我們有證據表明我們一直在勞動。這一點對我們的辯護是十分必要的。』中校對此不屑一顧地說：『費克爾在離別人較遠的地方勞動，我們可以準確地讓您看到我們幹了多少工作。』『飯桶』居然天眞地證實我們兩人確實沒有與別人一起勞動，中校同意到現場看一看，我們驅車來到了礦井。

一到礦井，我和費克爾就直接走到了我們勞動過的地方。我指着我們兩人挖出來的一大堆石頭和石灰，說：『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勞動成果。』『飯桶』從來不願自找麻煩地去查問

我們幹活的多少，面對這麼一大堆石頭和石灰，他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對中校說，『不，這是他們一周的工作量。』中校有些疑惑地對他說：『好吧，你給我指出曼德拉和巴姆今天究竟幹了多大的一堆。』『飯桶』無言以對，中校當着我們的面訓斥了他的部下：『你在撒謊！』然後當場撤銷了這一指控。我還從未見過任何一位高級官員這麼做。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早上，當時『飯桶』還在羅本島，我們正準備去礦井，『飯桶』突然告訴我們，凱爾曼少校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我們談話。不僅禁止我們在走路的途中談話，而且從此以後在礦井裡也不許交談。他大聲叫喊：『從現在開始，閉上你們的嘴巴！』

這一命令使我們感到沮喪和氣憤。談話和討論問題是唯一可以讓我們在礦井裡輕鬆一下的方式。當然，我們不能在去礦井的途中討論這一問題，因爲他們禁止我們講話，但到了吃午飯的時候，非洲民族議會和其他政治派別的領導人開始秘密磋商對付這一命令的辦法。

正當我們秘密地商量我們的計劃時，凱爾曼少校親自來到了礦井，走進了我們吃飯的工棚。這是極不尋常的，我們從未在這低矮的工棚裡見到過這麼高級的官員。他清了清嗓子，宣佈他的命令是錯誤的，我們可以恢復在礦井裡講話，只是我們要小聲些。然後，他讓我們繼續吃飯，他自己轉身走了出去。我們對他取消自己的命令感到高興，但搞不清楚這是爲什麼。

在以後的幾天裡，我們不再被逼着辛苦地勞動。『飯桶』也盡力地向我們表示友好，說他決定撤銷對我們的指控，以表示他對我們友好的誠意。

一天下午，我發現我的監房被從走廊入口處的四號調到走廊盡頭的十八號。我的所有行李都已經搬到了新的監房。像往常一樣，獄方未作任何解釋。

我們猜測，將有人到監獄來參觀。他們調換我的監房是因爲他們不想讓我第一個與來訪者談話。如果每一位犯人都依次訴說他們的不滿，在來訪者走到十八號監房之前，當局就可以說：『時間到了！』我們決定，爲了團結一致，走廊兩側的每一位犯人都要告訴來訪者，每一位犯人都有各自的不滿，十八號監房的犯人將代表他們發言。

第二天早飯後，『飯桶』告訴我們，今天不必到礦井去了。然後，凱爾曼對我們說，議會中唯一的一位進步黨議員海倫·蘇斯曼（Helen Suzman）女士將馬上到羅本島來參觀，他也是議會中唯一的一個眞正反對國民黨的反對派議員。十五分鐘後，蘇斯曼女士在監獄總監斯蒂恩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監房。她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她向犯人作了自我介紹，然後問犯人們是否有什麼不滿。每個犯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回答她：『我有許多不滿，但我們的代言人是納爾遜·曼德拉先生，他在走廊的盡頭。』令斯蒂恩將軍十分沮喪的是，蘇斯曼女士很快來到了我的監房。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熱誠地做了自我介紹。

法官和地方長官可以自由地到監獄中來，而議員到監獄中參觀則需要經過批准。如果說

不是唯一的一位的話，蘇斯曼女士也是爲數不多的關心政治犯的處境的國會議員之一。外界關於羅本島的傳聞很多，蘇斯曼女士是到這裡親自進行調查的。

這是蘇斯曼女士第一次到羅本島來，我盡力地使她放鬆一些。她極爲自信，對周圍的環境一點也不擔心，她建議我們馬上言歸正傳。斯蒂恩將軍和司令官就站在她身旁，但我說話時並不拐彎抹角。我告訴蘇斯曼女士，我們迫切希望改善伙食，希望有一件好一些的衣服；我們需要一些學習用具，我們要求有閱讀報紙的權利，等等。我告訴她哨兵們十分粗暴，還特別提到了範·倫斯堡。我指出，範·倫斯堡的前臂上刺有納粹標記。海倫像一位律師一樣說道：『曼德拉先生，我們不必扯那麼遠，因爲我們不知道他是何時刺的這一標記。也許是他小時父母給他刺的。』我告訴她，事實並非如此。

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會抱怨某一位哨兵。在獄中的人都知道，與普遍現像作鬥爭比與某一個人作鬥爭要容易得多。不管某位哨兵有多麼殘酷無情，他也只是在執行監獄的政策罷了。但範·倫斯堡是唯一的一個例外。我們相信，如果他突然死去，我們會感到像換了人間一樣。

蘇斯曼女士認眞地聽着，匆匆地把我的話記到一個小筆記本上，她答應把這些問題反映給司法部長。隨後，她參觀了我們的監房，不時地與其它人交談幾句。看到這位勇敢的女士走進我們的監房。在我們的院子裡走過，眞令人高興。她是光臨我們監房的第一位、也是唯

一一位女士。

蘇斯曼女士參觀時，範·倫斯堡感到極不自在。據凱西說，我和蘇斯曼女士談話時，範·倫斯堡對他過去的行爲作了道歉。但他的悔悟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第二天他就告訴我們，他將重新開始對我們的指控。後來，我們才了解到，蘇斯曼女士在國會上提出了我們的問題，她來參觀幾周之後，『飯桶』被調離了羅本島。

六十九

我從來沒有設想過鬥爭將是短暫或輕鬆的。無論是對於我們這些身陷囹圄的人還是對於獄外的非洲民族議會來說，我們剛到羅本島的那幾年是極其困難的時期。瑞沃尼亞審判之後，大多數非洲民族議會的地下組織遭到破壞。我們的機構被查明後徹底摧毀了，那些即使沒有被捕入獄的人也完全暴露在敵人面前。實際上，非洲民族議會的所有高級領導人全部被監禁或流放。

瑞沃尼亞審判之後，非洲民族議會對外委員會（External Mission）成爲了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機構，它從前負責籌集資金、對外交往和制訂軍事訓練計劃。對外委員會不僅必須成立一個流亡組織，更爲艱巨的任務是它必須盡力恢復南非境內的非洲民族議會地下組織。國家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警察機構更加強大有力，他們的方式更加殘酷，裝備

也更加先進。南非國防軍也得到了壯大。國家經濟形勢穩定，白人選民安居樂業。南非政府還與願意維持現狀的英國、美國結成了同盟。

但是，其它地區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仍在繼續進行。六十年代中期，武裝鬥爭開始在南非全面展開。在納米比亞——當時稱爲西南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邊境的卡普里維地帶打響了第一槍，游擊運動迅速蔓延開來。在津巴布威——當時稱爲羅德西亞，也開展了打擊白人少數統治者的鬥爭。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白人政府受到南非國防軍的支持，因此，非洲民族議會認爲津巴布威的鬥爭是南非國內鬥爭的延伸。一九六七年，我們了解到，非洲民族議會與喬舒亞·恩科莫（Joshua Nkomo）創建的津巴布威非洲人民聯盟結成了友好同盟。

這一年，一批曾在坦桑尼亞和尙比亞訓練的『民族之矛』戰士越過贊比西河（Zambezi River）進入了羅德西亞，他們打算由這裡返回國內。第一批民族之矛的戰士被命名爲『盧圖利縱隊』，他們是武裝鬥爭的先鋒隊。八月，『盧圖利縱隊』向南進發，但被羅德西來的軍隊發現了。在以後的幾周裡，雙方進行了激烈、殘酷的戰鬥，均有較大傷亡。最後，我們的軍隊被在數量上占有較大優勢的羅德西來軍隊擊敗了。一些戰士被俘，其它人則退回到貝專納蘭（Bechuanaland）——當時這一地區已成爲獨立的博茲瓦納國。一九六八年初，另一支規模更大的非洲民族議會武裝力量進入了羅德西亞，他們不僅與羅德西亞的軍隊作戰，而

且與部署在羅德西亞的南非軍隊作戰。

幾個月後，我們從謠傳中聽說了這些情況，但直到曾在那裡戰鬥過的戰士被捕並押送到羅本島上之後，我們才了解了全部經過。儘管我們的部隊未能取得勝利，但民族之矛的軍官們已經建立了一支能與敵人作戰的軍隊，我們對此極爲高興。這是我們鬥爭歷史上的里程碑。『盧圖利縱隊』的指揮官之一加斯蒂斯·潘扎（Justice Panza）後來被與我們關在一起。他向我們介紹了這支部隊的軍事訓練、政治教育和戰鬥的情況。作爲民族之矛的前任總司令，我爲我們的戰士感到萬分地自豪。

除了聽說民族之矛在國外進行戰鬥的消息外，我們還了解到盧圖利酋長已死在他的家鄉。事情發生得很奇怪：他是在他的農場附近被火車撞死的，他經常在那裡散步。我得到當局的批准，可以給酋長的遺孀寫一封信。盧圖利的死是對非洲民族議會的沉重打擊。這位酋長還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一位傑出的國際知名人士，他也是一位獲得了黑人和白人同樣尊重的人。鑒於這些原因，他是一位無與倫比的領導人。奧利弗·坦博當時任非洲民族議會代理主席，非洲民族議會認爲奧利弗是接替盧圖利酋長的職務的最佳人選。與盧圖利一樣，奧列弗講話時吐字清晰而不炫耀詞藻，爲人自信而謙遜。他與盧圖利酋長遵循同樣的信條：『用自己的勇氣去征服困難。』

我們在B區爲盧圖利酋長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悼念儀式，爲每個人提供一個說話的機會。這是一個肅靜、尊重的悼念儀式，只有一個人說話走了調。當團結運動的內維爾·亞歷山大（Neville Alexander）站起來講話時，他的目的顯然不在於歌頌盧圖利酋長而在於貶斥他。他甚至沒有對酋長的去世表示出任何悲傷，他譴責盧圖利酋長是白人的走狗，其主要根據是盧圖利酋長接受了諾貝爾和平獎。

內維爾的講話不僅是完全錯誤的，而且與我們正在羅本島上盡力創造的各組織之間的合作氣氛相抵觸。從我來到羅本島開始，我就把在鬥爭中與我的對手達成某種妥協作爲我的使命。我把羅本島作爲彌合非洲民族議會與泛非主義者大會之間長期以來的巨大分歧的一次機會。如果我們能夠在羅本島把這兩個組織團結起來，就會爲在整個自由鬥爭中團結起來樹立一個榜樣。

從一開始，非洲民族議會與泛非主義者大會之間的關係就是競爭而不是合作。一些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先來到羅本島，他們認爲我們的到來是侵入了他們的領地。我聽我的一些同志說，許多泛非主義者大會高級成員爲我們沒有被絞死而感到遺憾。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來到了羅本島，泛非主義者大會當時在數量上比非洲民族議會占有優勢。一九六七年，這一比例顚倒過來了。但這似乎更加堅定了他們的看法。他們泰然自若地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印度人。前幾年，我曾與澤弗·莫托彭（Zeph Mothopeng）談過

話，他曾在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委會中任職。澤弗聲稱，泛非主義者大會比非洲民族議會更富有戰鬥性，因此非洲民族議會應服從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導。泛非主義者大會認爲，與當局進行談判就是背叛，但他們並不拒絕接受通過談判取得的各種權利。一九六七年，我與塞爾比·恩根達內就團結的問題進行了對話。在獄外，恩根達內曾激烈地反對《自由憲章》，但到獄中後，他成熟了起來。最後，我們分別向各自在獄中的組織寫信，建議兩個組織團結起來。非洲民族議會還曾與克拉倫斯·馬奎圖（Clarence Makwetu）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後來他擔任了泛非主義者大會主席。馬奎圖曾加入過非洲民族議會青年聯盟，他在獄中與我們進行了接觸，他是一位穩重、明智的人。關於兩個組織的團結問題，我們進行了多次富有成果的會談，但馬奎圖獲釋出獄後，泛非主義者大會在羅本島的領導權落到了約翰·波凱拉（John Pokela）手中，我們的會談也陷入了僵局。

泛非主義者大會的不安分偶而也會起到十分滑稽的效果。一天，普利托利亞發來一道命令：我應在礦井裡與其它犯人隔絕開。我要單獨勞動，單獨吃飯，單獨配備一名哨兵。我們注意到，這一新的命令在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中引起了某些不安。幾天之後，泛非主義者大會決定把他們的領導人澤弗·莫托彭也隔離起來，他們自己想辦法讓澤弗單獨勞動和吃飯，完全與我享受同樣的『待遇』。

泛非主義者大會經常拒絕參加沒有明確的黨派之分的會議。當我們召集會議討論我們的

不滿時，以及後來討論從報紙上了解到的重大問題時，泛非主義者大會總是抵制這些會議。我認爲這是很令人煩惱的。我們了解到，泛非主義者大會並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組織在獄外已進行了變革。當時，我們說，流亡海外的泛非主義者大會已經打開門戶吸收白人和印度人爲其成員了，但羅本島上的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不相信我們的話。眞是不可思議。我們從報紙上了解到，白人社會活動家帕特裡克·鄧肯（Patrick Duncan）已經成爲了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委會成員之一。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當時認爲這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宣傳罷了。

非洲民族議會在羅本島成立了自己的境內組織，即通常所說的最高指揮部，或者更正式一些，叫作『最高機構』。它包括羅本島上的大多數非洲民族議會高級領導人，他們都曾經是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委會成員：沃爾特·西蘇魯，戈萬·姆貝基，雷蒙德·姆漢拉巴（Raymond Mhlaba）和我本人。我擔任最高機構的首腦。

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最高機構將不去影響獄外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我們沒有可靠的辦法來評估全國的形勢，我們認爲，對我們不太了解的局勢提出指導性意見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我們只是就犯人的不滿、罷工、郵信和伙食等日常生活問題作出決定。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將召開一次全體犯人大會，我們認爲這對我們這個組織的健康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由於這些會議極其危險而且不可能經常舉行，通常由最高機構作出決定，然後傳

達給每一名成員。最高機構還建立了基層組織，每個基層組織包括三名成員。

剛到羅本島的幾年裡，最高機構還在我們區內爲所有的政治犯擔負起了代表委員會的職責。一九六七年，我們組織了一次請願活動，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實際上得到了所有人的簽名支持，其中包括泛非主義者大會、團結運動成員，埃迪·丹尼爾斯也代表自由黨表示了支持。這一要求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內維爾·亞歷山大抱怨說最高機構既不民主，也不具有眞正的代表性，應該建立另外一個組織。

內維爾的建議終於導致了犯人委員會的成立，其中包括所有各政治團體的人。其它組織仍然擔心非洲民族議會會控制這一委員會，委員會的章程規定，該委員會的權力純粹是磋商性的，它的決定不具有約束力。即使這樣，在某些問題上仍很難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建議，由『游擊戰俱樂部』（Yu Chi Chan Club）的成員費克爾·巴姆來擔任會議主席。然後，委員會領導層的組成將定時輪換。最後，該委員會成爲衆所周知的烏倫迪（Ulundi），成爲所有政治犯的紀律委員會。

最高機構因其成員的種族成分而引起了一些麻煩：四名常務成員全部來自科薩族。這是一種巧合而非精心安排，羅本島上非洲民族議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只有我們四個人曾在全國執委會中任職，偏巧我們四人都是科薩族人。僅僅因爲某位同志不是科薩族就把他選進最高機構是不合適的。但最高機構由四名科薩族人領導這一事實也確實令我煩惱，因爲這似乎強

化了人們的錯覺：這是一個科薩人的組織。

我一直認爲這一批評是令人煩惱的，因爲它忽略了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和宗旨。我對這種看法進行了駁斥，指出，祖魯人、莫索托人（Mosothos）、佩迪人和茲瓦納人都曾擔任過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其執委會一直由各宗族的人士共同組成。我回想起這麼一件事，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正在院子裡勞動，一些普通犯人則在屋頂上幹活。他們衝着我喊道：『老頭，你爲什麼只與科薩人談話呢？』這話令我痛苦不已。我抬起頭看了他們一眼，說：『你們怎麼會指責我歧視你們呢？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似乎對這一回答很滿意，但他們對我的指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裡。從此以後，不論什麼時候我從普通犯人面前走過時，我總是盡量找機會與凱西或埃迪·丹尼爾斯交談幾句，他們兩人不在時就隨便找一個不是科薩人的人。

後來，我們決定把最高機構的成員增加到五個，增加的這個人由各宗族人士輪流擔任。但他一般不是科薩人。例如，凱西曾任最高機構的第五位成員達五年之久。拉洛·基巴也曾擔任這一職務。最後，對我們的批評也就慢慢地、悄悄地消失了。

我絕對沒有控制過最高機構，實際上，我強烈支持的許多建議被否決了。事情本來就該如此，但我有時感到十分氣憤。在關於當局的兩個問題上，我未能說服我的同事。監獄制度規定，在高級管理人員的面前，犯人必須站着。我提議，我們應該坐着，因爲否則就表示我

們承認了我們的敵人，而他們卻不承認我們是政治犯。我的同事認爲，這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抵制的消極後果將會損害我們在其它方面的利益。

最高機構以相同的理由否決了我的第二個建議。哨兵總是以綽號或教名稱呼我們。我認爲這是對我們的歧視，我們應該堅持在名字前面加上尊稱『先生』。我提出這一問題已有好幾年了，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後來，它甚至成了一個笑柄，我的同事經常稱我爲曼德拉『先生』。

七十

對於我們這些身陷囹圄的人來說，時間好像是靜止不動的；但對於獄外的人來說，時間卻過得很快。一九六八年春天，我的母親來探監時我意識到了這一點。自從瑞沃尼亞審判之後，我一直沒有見到過我的媽媽。變化是漸漸發生的，當一個人與其家人生活在一起時，他幾乎看不到他們有什麼變化。但一個人多年未能與家人相見時，變化可能是令人吃驚的。我的媽媽好像突然蒼老了許多。

在我的兒子馬克加索、女兒馬卡基韋和我的妹妹梅布爾的陪同下，我的媽媽從川斯凱長途跋涉來看望我。由於我要接待四位探監者，而且他們從非常遙遠的地方趕來，當局把探監時間從半個小時延長到四十五分鐘。

自瑞沃尼亞審判之後，我從未見過我的兒子和女兒，在這期間，沒有我去照顧，他們已經長大成人了。我驚奇而自豪地看看他們。但儘管他們已經長大成人，我恐怕或多或少地還會把他們當成小孩子來對待。他們也許發生了變化，而我卻沒有。

我的媽媽瘦了許多，這令我很擔心。她的面容十分憔悴。只有我的妹妹好像沒有什麼變化。能見到他們並談論一些家事是十分令人高興的，但我對媽媽的健康狀況憂心忡忡。

我對馬克加索和馬卡基韋說，我盼望着他們能在學業上進一步深造，我還與梅布爾談起了川斯凱的親戚。時間過得很快。與許多次探監一樣，最大的歡樂往往在於對探監的回憶，但這一次，我卻一直爲媽媽的健康擔憂。我擔心，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老人家了。

幾周後的一天，我剛剛從礦井裡回來，就被叫到獄長辦公室去取一份電報。電報是馬克加索發來的，電報中說我的媽媽已因心臟病而去世。我馬上求見司令官，要求允許我回川斯凱去參加葬禮，但他拒絕了。他說：『曼德拉，我知道你是一個信守諾言的人，你不會逃跑，但我不能相信你手下的那些人，我們擔心他們會綁架你。』這更加劇了我的痛苦：我不能參加我媽媽的葬禮，作爲他的長子，也是她唯一的兒子，我有責任爲我的媽媽送終。

以後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思念着我的媽媽。她的一生中也遭受了少的苦難。我在當律師時，可以幫助她；但一旦我被關進了監獄，我就再也沒辦法幫助她了。我不是一個孝子。

鄉親的去世會使一個人回顧並評價自己的一生。母親的困難和貧困再次讓我產生了疑問：我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確？這一直是一個十分難於回答的問題：把人民的幸福置於我的家庭的幸福之上，這是否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長期以來，我的媽媽並不理解我爲什麼會參加鬥爭。我的家人沒有問爲什麼，她們自己也不想捲入到鬥爭中，但我的活動還是給他們帶來了麻煩。

但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在南非，一個人很難置人民的需要於不顧，即使要付出全家的代價。我已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最後，她終於對我表示了支持。但這並不能減輕我的痛苦，因爲我沒有能讓她過上更舒服的日子。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的早晨，天剛亮，安全警察就來到奧蘭多我們的家中把溫妮叫醒了，根據一九六七年的《反恐怖法》，在未加指控的情況下她被拘留了。《反恐怖法》給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權力，它可以不經審判就逮捕或拘留某人。我後來才知道，這次搜捕是全國性鎮壓的一部分，有許多人被拘留，其中包括溫妮的姐姐。津齊和澤尼當時扯住溫妮的上衣，警察還是把溫妮帶走了。她在普利托利亞被單獨關押起來，她不能保釋出獄，也不能接待來訪。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她受到了殘酷而野蠻的審訊。

六個月之後，溫妮終於被起訴了，我設法告訴她，她應請喬爾·卡爾森（Joel Carlson）

作爲辯護律師，因爲他長期以來一直是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律師。溫妮和其它二十二人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法》受到指控，說她們企圖重建非洲民族議會。後來，喬治·比佐斯和亞瑟·查斯卡爾森也參加了辯護，他們兩人曾是瑞沃尼亞審判中的辯護人。十月，溫妮被捕十七個月之後，政府未作任何解釋就撤消了此案，溫妮獲得了釋放。但兩周之後，她再次收到了禁令，對她實行軟禁。她立即申請到獄中來看我，但遭到了拒絕。

在獄中，我覺得沒有比想到溫妮也在坐牢這件事更令人傷心的了。我對此裝出一副勇敢頑強的樣子，但內心裡極爲痛苦和擔心。溫妮被單獨關押的那段時間最能考驗我的內心平衡了。儘管我經常告誡其它人：如果你們對某件事無能爲力的話，就不要爲它着急。但我自己也採納不了這一意見。我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當局將對我的太太採取什麼行動？她如何承受這一切？誰來照看我們的女兒？誰來支付她們的生活費？不斷地糾纏於這些問題而且找不到答案，這實在是一種精神折磨。

奧肯普將軍允許我給溫妮寫信，我也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般情況下，等待審訊的犯人是不准與外界通信的，但奧肯普將軍爲表示對我的友好而開恩了。我很感激，但也明白，當局並非出於利他主義而允許的；他們要檢查我們的信件，希望從中找出一些對他們有用的信息，再以此來對付溫妮。

這一段時期，我又遇到了一件令人悲痛欲絕的事情。一九六九年七月一個寒冷的日子裡，三個月前我剛剛得知溫妮受到關押，我被叫到羅本島的獄長辦公室裡去取一份電報。這是我的小兒子馬克加索發來的，電報裡只有一句話。他告訴我，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兒子馬迪巴·滕比在川斯凱的一場車禍中不幸喪生。滕比當時二十五歲，他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面對這樣一樁慘案，我能說什麼呢？我整天爲我的太太牽腸掛肚，媽媽去世給我帶來的悲痛還沒有消失，現在又得到了這樣的消息……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的悲痛。我覺得我的心上被刺穿了一個洞，永遠也無法彌補的洞。

我回到我的監房，呆呆地躺在床上。我不知道躺了多長時間，只知道沒有去吃晚飯。一些同事走進來看望我，我什麼話也沒說。最後，沃爾特走了進來，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電報遞給了他。他一言不發，只是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我待了多長時間。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我們之間不需要說什麼了。「此時無聲勝有聲」。

我請求當局允許我回去參加我兒子的葬禮。作爲父親，我有責任讓我兒子的靈魂得到安息。我告訴他們，他們可以派哨兵跟着我，我也保證會回來的，但他們還是拒絕了。他們只是允許我給滕比的媽媽伊夫琳寫一封信，在信中，我盡最大的努力來安慰她，並告訴她我與她一樣感到痛苦不堪。

我回想起了往事。滕比還很小時候的一天下午，他來到西里爾丁（Cyrildene）的秘密地點來看我，我經常在這裡秘密地從事非洲民族議會的工作。我既要從事地下政治鬥爭，又要處理律師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已經有好些時間沒有看到他了。我很驚奇地在屋子裡見到了他，發現他穿着我的一件舊上衣，幾乎長到他的膝下了。他肯定是從穿爸爸的衣服中找到了某種安慰和自豪，就像我曾穿我父親的衣服一樣。當我與他告別時，他踮着腳尖站起來，好像他已經長大了，對我說：『你不在家時，我會照顧好家裡的。』

第九章　羅本惡魔島：希望初現

七十一

監獄條件的改善並非一路順風。進步是蹣跚的，有時還會出現倒退。取得一些進展可能需要幾年的努力，而倒退回去只需要一天。就好像我們在盡力地把石頭推向山頂，其目的只是爲了讓它滾下來。但條件的確有了改善。我們取得了多次鬥爭的勝利，這才換來了羅本島上今天的氣氛。如果我們不想讓羅本島保持正常的話，沒有我們的配合當局就很難使羅本島保持正常。範·倫斯堡離開羅本島之後，我們的處境更加寬鬆了。

剛來到羅本島的三年中，我們都穿同樣的長褲。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們得到了各自的囚衣，不必每周去領取一套不同的衣服了。實際上，這些囚衣很適合我們穿，我們可以自己洗衣服。在周末，我們被准許一直待在院子裡。儘管我們的食品仍有些不足，但早晨偶爾可以吃到麵包。我們可以分享我們的飯菜，因此也就不存在區別了。我們得到了一些棋牌等娛樂用品，我們經常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時玩。在礦井裡，我們的談話很少被打斷。如果司令官來

了，值勤的哨兵會吹一聲響亮的口哨，告訴我們拿起自己的工具開始勞動。我們對壞的哨兵進行孤立，對通情達理的哨兵則進行團結。當局也認識到這一問題，他們每隔幾個月就把哨兵輪換一次。

實際上，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進行集會。最高機構的會議、一般成員的大會和烏倫迪的會議一般不會被衝散，除非會議本身太張揚了。好像是我們而不是當局在管理這一監獄。

南非白人對他們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誠，毫不動搖。我們每周的日程安排中有一項雷打不動的內容：星期天早晨的宗教活動。當局認爲這是一項強制性的活動。他們似乎認爲，如果他們不讓我們在星期天參加宗教活動的話，他們自己的靈魂就會不得安寧。

每到星期天早晨，一位來自不同派別的牧師將向我們講道。這個星期天可能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的牧師，下次就是荷蘭歸正會的牧師，再下次則是衛理公會的牧師。牧師們是由監獄選聘而來的，他們的唯一一項任務是向我們宣講宗教。哨兵們也參加這些宗教活動，如果某位牧師偏離了宗教的話題，他也就失去了再到監獄來講道的機會。

剛到羅本島的頭兩年裡，當局甚至禁止我們離開監房去參加星期天的宗教活動。牧師只能站着走廊的一端講道。到了第三年，宗教活動改在院子裡進行，我們對此很高興。在當

時，除了半個小時的鍛鍊時間外，這是我們在星期天唯一可以在院子裡活動的時間。我們當中信教的人並不多，沒有人去關心那喋喋不休的佈道，我們只是願意到院子裡活動活動罷了。

一旦宗教活動在院子裡進行時，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參加。有些人只參加他們自己一派的牧師主持的活動。儘管我是一個衛理公會教徒，但我參加每一派的宗教活動。

我們的第一位牧師是英國聖公會的，他的名字叫休斯，這是一個性格豪放、身材魁梧的威爾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一支潛艇部隊裡當過隨軍牧師。他第一次來到監獄時，對在走廊裡講道很生氣，他認爲這是對上帝的祈禱的不恭。他沒有先給我們講道，而是用他那宏亮的男中音背誦了溫斯頓·丘吉爾在戰爭期間的一段廣播演講：『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陸地上戰鬥，我們將在田野裡和街巷中戰鬥，我們將在山地裡戰鬥；我們絕不會投降。』

不久，休斯神父開始在院子裡給我們講道，我們認爲他講得很精彩。他把一些新聞消息分散地穿插到佈道之中，我們對這些新聞很感興趣。例如，他說，像古埃及的法老一樣，南非總理正在擴充軍隊。

佈道結束時，我們總是唱讚美詩，我覺得休斯神父如此頻繁地來佈道就是爲了聽我們

唱。他帶着一架手風琴，爲我們伴唱，他稱讚我們唱得很好，說我們唱的可以與他家鄉威爾士的唱詩班相媲美。

衛理公會的牧師是瓊斯神父，這是一個怯懦、悲觀的人，剛果發生革命時他正好在那裡。似乎正是這段經歷使他患上憂鬱症。他再三地向我們宣講和解的重要性——暗示着我們應與白人和解。

有一個星期天，瓊斯神父正在佈道，我注意到埃迪·丹尼爾斯心神不寧地坐在那裡。最後，埃迪再也忍不住了，大聲說到：『你把宣揚和解的對象搞錯了，七十五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求和解。』這句話對瓊斯神父來說是足夠了，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瓊斯神父並非是埃迪嚇走的唯一一個人。我們還曾接受過一個名叫謝普坦博（Brother September）的有色人的佈道。有一次，一位名叫亨尼·費里斯（Hennie Ferris）的犯人主動提出他願意帶領大家祈禱。謝普坦博對此很高興。亨尼開始輕聲祈禱，過了一會兒，他要求所有的教徒都閉上眼睛祈禱，包括謝普坦博在內的每個人都照辦了。埃迪踮着腳尖輕輕地走到前面，打開謝普坦博的公文包，拿走了當天的《星期天時報》（Sunday Times）。當時沒有任何人發現，但謝普坦博再也沒有來過。

安德烈·謝夫勒（Andre Scheffler）是荷蘭歸正宣教會的一位牧師，該教會是荷蘭歸正

會的姐妹教會，幾乎所有的南非白人都信奉它。荷蘭歸正宣教會只迎合南非白人的要求。謝夫勒牧師是一個頑固、保守的人，他總是爲普通的犯人佈道。有一次，他從我們這個區的前面路過，我們問他爲什麼不爲我們佈道。他蔑視地說：『你們自以爲是什麼自由戰士，你們一定是喝醉了酒或吃了海洛因才被捕的。自由戰士們，滾開吧！』但我們問他敢不敢來向我們佈道，六十年代後期，他終於答應了。

謝夫勒牧師在某一方面並不那麼正統：他以科學的目光去討論宗教。我認爲這是十分吸引人的。許多人利用科學去揭露宗教，而謝夫勒牧師卻依靠科學去支持他的宗教。我回憶起一次佈道時的情景，他談到了東方有三個智慧的人追隨一顆星星一直來到了伯利恆（Bethlehem）。他說：『這並非是迷信或神話。』他引用了天文學家的論斷：歷史上確有一顆慧星沿着《聖經》中指出的軌跡運動。

謝夫勒牧師與我們熟悉起來之後，他更加同情我們了。他很幽默，常拿我們開玩笑。他總是說：『你們都知道，在南非的白人比黑人要承擔更困難的工作。一旦出現了某一問題，我們必須找出解決的辦法。但你們這些黑人一旦遇到了什麼問題，總會找到一個藉口。你們只會簡單地說一句，「英加比侖古（Ingabilungu）」。』我們都大笑起來，不僅是因爲他的發音十分滑稽，而且他的想法也令我們大笑不止。『恩加貝侖古』（Ngabelungu）是科薩語，意思是『這是白人的問題』。謝夫勒說，我們總是把我們的痛苦的根源歸結到白人頭

上。他的本意是我們必須自己找到解決辦法，自己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我從心底裡對此表示贊同。

正如星期天是一周中的休息日一樣，聖誕節就是一年中的休息日。只有在這一天，當局才對我們放鬆了管制。聖誕節這一天裡，我們不必下礦井，被定爲B級以上的人還可以購買一點糖果。我們沒有參加傳統的聖誕節宴會，但晚飯時得到了一杯咖啡。

當局允許我們舉辦音樂會、進行比賽，還可以演戲。音樂會是最引人注目的。我們的首席領唱是塞爾比·恩根達內（Selby Ngendane），他是一位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成員。實際上，在他成爲一名泛非主義者大會成員之前，他是一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他音質優美，欣賞能力很強，是一名天生的演員。

塞爾比負責選定歌曲、安排伴奏、挑選歌手，他還要親自進行表演。音樂會於聖誕節上午在院子裡進行。我們在傳統的英語聖誕歌曲中混進一些非洲歌曲，其中包括幾首抗議性的歌曲。當局好像分不出它們之間的區別。哨兵也是我們的聽衆，他們像我們一樣陶醉在我們的歌聲裡。

在來到監獄之前，恩根達內被認爲是一個在政治上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但來到監獄之後，塞爾比顯示出了他的政治才華。在監獄裡，人們往往喜歡樂觀向上的人，而塞爾比正是

這種人之一。

監獄是檢驗一個人的性格的熔爐。在監禁的壓力下，有的人顯露出他們的才華，而有的人則暴露出他們那平常看不到的弱點。塞爾比屬於第一種人，好像是監獄給了他力量一樣。只有當一個人被關進監獄之後，他才知道怎樣度過這段日子。

除了舉辦音樂會外，我們還進行了國際象棋和西洋跳棋比賽，玩了塡字遊戲和橋牌。每一年我都要參加西洋跳棋比賽，有時還獲得了大獎。獎品通常是一根棒棒糖。我下棋時慢而巧妙，我的策略就是穩健。我認眞地考慮每一種走法的結果，每走一步都要考慮很長時間。我不僅在下棋時喜歡運用這種策略，而且喜歡把它運用到政治鬥爭中。

我的大多數對手喜歡下快棋，他們經常對我下棋的方式失去耐心。唐·戴維斯（Don Davis）經常與我下棋。他是非歐洲人聯合運動的一名成員，出生於金伯利的鑽石礦區。他是一個健壯樸實、無所畏懼的人，但很容易衝動。唐是一名出色的西洋跳棋棋手，但他下棋的方式正與我相反。每下完一盤棋，唐通常是滿臉大汗。下棋時他總是很緊張，有時還發抖。他移動棋子很快，好像會因速度快而得分似的。有好幾次我在每年西洋棋比賽的決賽中遇到了唐。

唐因爲我在下棋時的一句口頭禪而稱我爲『基布』（Qhipu）。我在下棋時要考慮每一

種可能性，當我準備移動棋子時，我總是要喊一聲『基布』，意思是『就這麼走』。唐對此很不以爲然，他稱我爲『基布』是出於氣憤而不是友好。

我和唐進行過很多次比賽，即使他勝了，他也會在幾分鐘後返身要求與我重新開戰。唐總是要下西洋跳棋，如果我不答應，他就會生氣。後來，我在與唐下棋上花費了很多的時間，以致於放棄了其它事情。有一次，我沒有能通過學業考試，一些同伴問我是怎麼搞的。我回答說：『唐·戴維斯！』。

我們的業餘劇團在聖誕節時進行演出。我在黑爾堡大學時曾扮演過約翰·威爾克思·布思（John Wilkes Booth），此後就再沒有參加過演出。這次在羅本島上，我又幹起了老本行。我們的演出對於今天來說可能是不值得一提，沒有舞臺，沒有佈景，也沒有服裝。我們所進行的只是對話。

我只參加過很少幾部戲的演出，但其中的一個角色至今我仍記憶猶新。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戲劇《安提戈涅》（Antigone）中，我扮演了底比斯（Thebes）國王克瑞翁（Creon）。在監獄中，我讀了一些希臘古典劇本，被深深地震動了。我從中領悟到，只有把一個人放到極其困難的環境裡才能看出他的本質。只有那些面對困難昂頭前進的人才是英雄。

當決定演出《安提戈涅》劇時，我志願參加演出。我扮演了克瑞翁，他是爲了自己國家

的王位之爭而發起內戰的老國王。開始時，克瑞翁是一位仁慈的愛國者，在他早期的講話中有不少名言。他說，經驗是領導能力的基礎，對人民的責任高於對某一個人的忠誠。

在一個人對統治人民、制訂法律施展才能之前，你絕對不可能完全徹底地了解他，包括他的性格、天賦和判斷能力。經驗就是試金石。

但是，克瑞翁對待他的敵人十分殘忍。他宣佈，由於安提戈涅的哥哥波雷內西斯（Polynices）背叛了他的國家，因此他的屍體不能入土爲安。安提戈涅是因爲有一種法律高於國家而起義的。克瑞翁聽不進安提戈涅的話。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不相信任何人。對於一個領袖人物來說，他的剛愎自用和魯莽輕率的性格是不合適的。領袖人物必須兼具仁慈和公正兩種品質。安提戈涅正象徵着我們的鬥爭，他是一位自由戰士，因爲他敢於蔑視他認爲不公正的法律。

七十二

一些哨兵開始參加到我們的談話中來。我從不主動與哨兵談話，但如果他們向我提出某個問題，我就盡力回答。當一個人下決心要學習時，敎得也比較容易。這些問題通常都帶有

氣憤的色彩：『曼德拉，你們究竟要幹什麼呢？』或『看，你有房子住又有飯吃，爲什麼還要製造這麼多麻煩呢？』我心平氣和地向這些哨兵講解我們的政策。我要讓他們對非洲民族議會不再感到神秘，消除他們的偏見。

一九六九年，一個年輕的哨兵來到了羅本島，他似乎特別迫切地想與我取得聯繫。我也聽到了一些傳聞：我在獄外的戰友們正準備營救我出獄，他們已經派人以哨兵的身份來到了羅本島，他將幫助我出獄逃跑。後來，這位小伙子告訴我，他正在制訂協助我越獄的計劃。

他零零碎碎地把計劃告訴了我：夜裡，他將把在燈塔上值勤的哨兵灌醉，這樣就可以在海灘上停一只小船。他將給我一把打開監房的鑰匙，然後我就去找那只船。到船上後，我將配帶一套潛水設備，依靠這一套設備就可以遊到開普敦的港口。到開普敦後，將有人把我送到當地機場，然後飛到國外。

我認眞地聽了這一計劃，感到這一計劃不可信，也很勉強，但我沒有對他講。我與沃爾特談起了此事，我們一致認爲這個小伙子不可靠。我沒有告訴他我不想逃跑，但我沒有按他的要求採取任何行動來實施這一計劃。他一定覺察出了我的態度，不久他就從羅本島離開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據後來了解到情況，那個哨兵是南非秘密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的人。他們的陰謀是，一旦我成功地離開羅本島並準備逃到國外時，他們將在

機場安排一場槍戰，乘機在混亂中把我打死。這一計劃完全是由南非國家安全局策劃的，就連傳到我的耳朵中的關於非洲民族議會將營救我出獄的謠言也是他們製造的。他們已經多次策劃殺掉我了，而且這並非最後一次。

司令官的任期通常不超過三年，在一九七〇年之前我們已經換過幾任司令官了。一九七〇年，羅本島的司令官由範奧德（Van Aarde）上校接任。他是一個較爲和善、沒有什麼惡意的人，他允許我們自我管理。但到年底的時候，當局聲稱他們要改變羅本島的管理方式，任命皮特·巴登霍斯特（Piet Badenhorst）爲羅本島的新司令官。

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巴登霍斯特在整個監獄管理界以殘暴、獨斷專行而著稱。他的上任表明：政府認爲我們在羅本島的生活太寬鬆了，必須加強對我們的管制。巴登霍斯特恐怕會使我們回想起從前那段惡夢般的日子。

每當一位新的司令官上任時，我就要求與他會面。目的在於讓他認識到我們的事業的嚴肅性，並了解一下他的性格。我要求會見巴登霍斯特，但他拒絕了。他是第一位拒絕會見我的司令官。

在我們見到他之前，就開始感覺到他的統治手腕了。關於學習和自由活動時間的許多規定立即被廢止了。顯然，他打算收回我們在過去幾年裡通過鬥爭而得到的權利。原來的哨兵

被遣送出羅本島，代之以巴登霍斯特親手選來的哨兵。他們都是一些粗俗的年青人，他們將強制執行每一項規定，他們的任務就是折磨和騷擾我們。在巴登霍斯特上任後的幾天之內，我們的牢房遭到了搜查；書和筆記本被沒收；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被減少了飯食；人們被趕到礦井裡勞動。

巴登霍斯特企圖把羅本島的時鐘倒退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們對我們的每一項要求都給予拒絕。要求會見其律師的犯人被單獨關了禁閉。他們根本不理睬我們的抱怨。探視在不加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就取消了。食物也越來越糟。對我們的看管也更嚴了。

巴登霍斯特上任一周後的一天早上，我們正在礦井裡幹活，他帶着司機突然開車來到了礦井。他從車裡鑽出來，遠遠地審視着我們。我們都停下來看着這位新任司令官。巴登霍斯特瞪了我一眼，並喊道：『曼德拉，你必須老實點！』我對他的這句話並不介意，也沒有仔細地想一想，就朝着他走了過去。他離我比較遠，我還沒有走到他的面前，他就鑽進他的汽車開走了。

巴登霍斯特在汽車裡向他的部下發了一道命令，幾分鐘之內，開來了一輛卡車就把我們運回了監獄。他們要求我們在卡車上保持沉默，來到院子裡之後，他們又命令我們立正站好。巴登霍斯特出現在了我們的面前，他來來回回地踱着步。他好像每說一句話就要帶一個髒字。『你媽媽是一個莫爾（Moer）』，莫爾是指女性身體的某一隱私部位。

他沙啞着嗓子告訴我們，他對他所見到的我們在礦井裡的懶散樣子很不滿意。因此，他將完全取消我們的分級制度。我們自己也對分級制度不滿，但我們大多已經升到了C級以上，這樣我們就獲得了學習的權利。D級的犯人是不能學習的。當局對允許我們學習感到後悔莫及，巴登霍斯特決心修正這一失誤。

後來，我的怒氣平息了，我明白，巴登霍斯特在礦井裡對我們粗魯言辭是蓄謀已久的。他是被派到羅本島來恢復秩序的，他已經找到了他認爲是害群之馬的一個人。就像接管了一個亂班的老師一樣，他想懲罰一下他找到的害群之馬。

七十三

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戰友，它爲了納米比亞的獨立而戰。一九七一年五月，許多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成員被送到了這個孤島上。其中有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創始人安迪姆巴·托伊沃·加·托伊沃（Andimba Toivo ja Toivo），他也是一位難以對付的自由戰士。我們了解到，他們爲抗議被監禁而進行了一次絕食鬥爭，我們立即決定加入到絕食的行列中來。這樣就激怒了巴登霍斯特和有關當局，他們認爲這是不能容忍的。

五月二十八日夜裡，我們被叫喊聲和猛烈的敲門聲驚醒了。哨兵們大聲喊叫，『起來！快起來！』他們命令我們脫去衣服，靠牆站在院子裡。哨兵們顯然是喝醉了，對我們破口大

罵。領頭的是福里（Fourie），他是個虐待狂，我們私下裡稱他爲『惡魔』。

這是一個寒風刺骨的冬夜。我們赤裸裸地站在院子裡，凍得瑟瑟發抖，他們逐一搜查了我們的監房。哨兵們則一直對我們叫罵不止。一個小時後，戈萬（Govan）的胸部劇疼起來，倒在了地下。這好像嚇住了福里，他命令我們回到監房中去。

哨兵們搜查了一遍之後，一無所獲。但這次搜查只是福裡虐待狂發作的一個藉口。直到後來我們才知道，福里是一個全國著名的以折磨犯人爲樂的傢伙。第二天，我們發現哨兵在折磨我們之前已經野蠻地毆打了一些犯人，後來又對托伊沃·加·托伊沃大打出手，因爲他竟然在被打時敢於還手。托伊沃因此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

我們就我們的遭遇提出了控告，但沒人理睬。這件事牢牢地刻在我的腦海裡，但這絕不是唯一的一次，在巴登霍斯特掌權時這是家常便飯。

我們意識到，絕不能讓形勢在巴登霍斯特的手下繼續惡化下去。我們悄悄地把這些信息傳遞給獄外的人民，讓他們來呼籲解除巴登霍斯特的職務。同時，我們決心組織一個自己的代表團去面見巴登霍斯特。我們討論了幾個月之後，終於就代表團的組成達成了協議。我和沃爾特代表非洲民族議會，其它各黨也分別派出兩名代表。

巴登霍斯特同意接見我們。在會談中，我們威脅他說，如果他不改變他的管理方法並恢

復他已經從我們手中剝奪去的權利的話，我們將運用一切手段進行鬥爭，包括停工、怠工和絕食。他只是說他要考慮考慮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爲這次談判是成功的，因爲他對我們很客氣，他也知道我們已經把我們的遭遇告訴了外界的人民。這些做法很快就有了反應。

幾個星期之後，我們得知將有一次重要的來訪，因爲那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們被允許到工棚裡避雨，而不必像往常一樣冒雨幹活。第二天，我們了解到，三位法官將來羅本島檢查工作。當局要求我們推選一名代表來表達我們的意見，我被選中了。

正當我爲會見法官而作準備時，從一可靠渠道了解到，最近有位犯人受到一位哨兵的嚴重毆打。這三位法官是簡·斯蒂恩（Jan Steyn）、M·E·西倫（M·E·Theron）和邁克爾·科比特（Michael Corbett）。其中科比特來自最高法院開普省分院。他們是在監獄部專員斯蒂恩將軍的護送下來的，巴登霍斯特上校接待了他們。那天我是在我們幹活的地方見到他們的。

斯蒂恩將軍把我介紹給了法官，並解釋說我是代表其他犯人來的。法官當即表示，他們理所當然地應同我私下裡談一談。我回答說，我沒有什麼要避諱的，實際上，我希望斯蒂恩將軍和巴登霍斯特上校在場。我能看得出來，他們對我的話吃了一驚。我又說，這樣正好使他們有機會當場答覆我的控訴。法官有些不情願地同意了。

我首先講述了最近發生的毆打犯人的事情。我把我所了解到的細節都告訴了他們，我說

到了被打的嚴重程度和獄方有意掩蓋事實眞相。看到巴登霍斯特那種手足無措的樣子，我感到終於出了一口惡氣。當我描述完這起毆打事件之後，巴登霍斯特氣極敗壞地對我說：『你親眼看到這一事件了嗎？』我心平氣和地回答說，我本人沒有看到，但我相信爲我提供這一情況的人。他氣得直喘粗氣，手指頭幾乎伸到我的臉上。『曼德拉，小心點。如果你再講這些你沒有親眼見到的事情，你會給自己惹痲煩的。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我沒有理睬巴登霍斯特的話，轉向法官說：『先生們，你們親眼看到了我們面對的是一位什麼樣的司令官大人。如果他敢於當着你們的面威脅我，那麼你們可以想像當你們不在的時候他會怎麼對待我。』科比特法官轉身看了其他人一眼，說：『這位犯人說得對！』

我利用剩下的時間講述了我們對飲食、工作和學習的不滿。巴登霍斯特內心裡一定十分氣憤，但從外表上卻看不出多少。會談結束時，法官對我表示感謝，我也向他們道別。

我不知道法官們在會談後是怎麼想和做的，但從下個月開始，巴登霍斯特好像有所收斂，對我們的折磨減少了。法官來訪後不到三個月，我們獲悉巴登霍斯特將被調離羅本島。

在巴登霍斯特離職的幾天前，我被召到司令官辦公室。斯蒂恩將軍正在羅本島檢查工作，他想知道我們是否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在我提出一系列要求時，巴登霍斯特也在場。我講完後，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他將要離開羅本島了，並說：『我只想祝你和你的朋友們

好運！』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些吃驚，但我呆住了。他像一個普通人一樣說出了這些話，這表現出了我們從前沒有見到過的他的人格的另一面。我對他的祝福表示了謝意，並祝他萬事如意。

此後，我對這件事想了好長時間。巴登霍斯特也許是我在羅本島上見到的最冷酷、最野蠻的司令官。但那天在辦公室裡，他也表現出了他的本質的另一面，這一面也許被掩蓋住了，但它確實存在。這件事情提示我們，人人都有一顆正直的心，即使是看起來最冷酷無情的人也不例外。一旦這顆心受到震動，它就可以改變。巴登霍斯特畢竟不是魔鬼，他的冷酷無情是冷酷無情的制度強加給他的，只有他舉止野蠻才能得到賞識，因此他才舉止野蠻。

七十四

威廉斯（Willemse）上校被任命爲接管巴登霍斯特的司令官。我要求會見威廉斯上校，他上任後不久就接見了我。他顯然不是一位進步人士，但他舉止文雅，通情達理，與巴登霍斯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希望，在逐步改善我們的條件的征途中，巴登霍斯特任職期間只是一個小插曲。

粗野的年輕哨兵也隨着巴登霍斯特一起離開了羅本島，我們很快恢復到在礦井裡和監房中的老樣子。威廉斯也許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但當他看到我們在礦井裡把時間更多地用於

聊天而不是幹活時，他震驚了。

他剛剛來到島上沒有幾周的時間，我就被召到他的辦公室進行會談。他坦率地說：『曼德拉，你必須協助我。』我點了點頭，並問怎麼協助他。他說：『你們這些人不是在幹活。他們不服從命令。他們只幹他們想幹的事。這裡是監獄，必須有紀律。這樣不僅對我們沒好處，對你們也一樣，我們必須制訂出一些規章制度，否則，當局將委派一位像我的前任一樣的官員來當司令官。』

威廉斯上校說得有道理。我認眞地聽完後告訴他，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在對此作出答覆之前，我必須徵求每個人的意見。當時，犯人們在一間牢房裡集會是被明文禁止的。我要求他放寬這一規定，允許我們舉行一次集會。他和我都明白這件事事關重大，他需要好好考慮一下。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威廉斯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允許我們召開一次會議。一天下午，所有的犯人在院子裡召開了一次會議，沒有哨兵監視我們。我把威廉斯的話告訴給了大家，並說，目前作出這樣一個妥協，從長遠來看將會改善我們的條件。我們決定，至少要裝出一副幹活的樣子，我們要以一種適合自己的速度幹活。從此，我們就這樣幹着，司令官那裡再也沒有抱怨了。

威廉斯在職的初期，即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有一些被俘的『民族之矛』的戰士被送到監獄裡來。他們都參加過武裝鬥爭，對南非監獄的情況有所了解。我不願意看到非洲民族議會的成員被捕入獄，但他們進來之後我渴望從他們那裡了解情況。我渴望知道奧利佛、訓練營地和『民族之矛』的成敗情況。

這些人十分好鬥，他們還不適應監獄的生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吉米·阿普里爾（Jimmy April），他是一名曾在喬·斯羅夫手下訓練過的民族之矛軍官，曾在羅德西亞同敵人戰鬥過。民族之矛一直在悄悄地用僞造身份證偸渡回國。吉米即是其中之一在南非被逮捕。

吉米給我們講述戰鬥故事，但我把吉米叫到旁邊問了幾個關於民族之矛的問題。由於我是民族之矛的創建者，並擔任過第一任總司令，因此，吉米對我比對其它人更加信任。他向我講述了軍營中的不滿情緒和軍官們濫用職權的事。我要他對此保密，我設法給奧利佛送去一封信，要他必須在軍營中進行一些改革。

一天，我正在司令官辦公室裡會晤威廉斯上校，突然看到吉米站在另一位官員的辦公室外面。他有些衝動地對我說：『他們扣押了我的信件。』

『爲什麼？』我問。

他說：『他們聲稱其中有些我不應看到的東西。』我走進這位官員的辦公室，想與他談

一談，但還沒等我開口講話，吉米就闖了進來，大聲衝着這位官員說：『把信還給我。』吉米把我推到了一邊，來到辦公桌前就要拿信。這時，這位官員拿起信躲到了我的身後，以免被吉米搶走。這可能是電影中的某一個滑稽鏡頭，但此時此地卻惹人心煩。我面對着吉米，和緩而堅定地說：『住手，你先安靜一下。我來負責處理這件事，保證讓你拿到你的信件。請你先離開吧。』

我說的話很有效果，吉米離開了辦公室。我又轉向這位驚呆了的官員。我的立場很奇怪。我不能與當局作對，而要在我的戰友和我長期以來一直在反對的人之間進行調和。新來到島上的這些人都很好鬥，這就更使我不得不這樣了。他們的激進主義精神經常令我們備受鼓舞，但有時也使我們的日常生活難以維持。

一周之內，那位官員把吉米的信交給了我。

七十五

一天上午，我們沒有去礦井，而是被命令上了一輛卡車。卡車開向了另一個方向，五十分鐘後，我們才下了卡車，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大洋和石灘，遠處可以看到開普敦的玻璃塔閃閃發光。儘管這絕對是一種幻覺，但隱隱約約呈現在桌山（Table Mountain）前面的這座城市似乎離我們很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觸摸到似的。

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們，我們是到這裡來拾海草的。我們要把被衝到海灘上的海草收集起來，還要站在水裡收集掛在岩石和珊瑚礁上的海草。海草很長，帶有許多泥巴，呈褐綠色。有時一根海草有六到八英尺長，重約三十磅。從海水裡把海草撈上來之後，我們要把它們放在沙灘上曬乾。等乾了之後，再把它們裝到卡車上。我們聽說這些海草將被運往日本制作調味品或肥料。

那天，我們幹活時並不感到太累，但在以後的幾周和幾個月裡，我們感到太勞累了。但這沒有多大關係，我們陶醉在這樣一幅生機勃勃的畫面裡：我們看到了漁船在捕魚，巨大的油輪慢慢地從我們眼前通過。我們看到了捕魚的海鷗和在波濤中跳躍的海豹（羅本島就是因荷蘭語中的『海豹』一詞而得名的）。我們看到了一列企鵝，像士兵一樣笨拙地移動着。我們還驚奇地看到每天桌山上空的天氣變化，一會雲霧籠罩，一會晴空萬里。

夏天，海水讓人感到愜意；但到了冬天，冰冷的本格拉寒流使站在水中的人們難以忍受。海灘上的石頭崎嶇不平，幹活時經常劃破我們的腿。但我們寧可選擇大海而不願選擇礦井，儘管我們在礦井裡一天幹不了多少活兒。

大洋好像是一個聚寶盆。我發現了許多美麗的珊瑚和精緻的貝殼，有時我把它們帶回到我們牢房裡。有一次，有人在沙灘上挖出了一瓶酒，酒瓶的塞子仍完好無損。有人告訴我說

酒是酸的。泛非主義者大會的傑夫·梅塞莫拉（Jeff Masemola）是一個極有天賦的藝術家和雕塑家，當局允許他收集一些木片，他在這些木片上刻畫各式各樣的人物，哨兵們甚至要出錢買他的這些東西。他爲我做了一個書箱，我使用了好多年。當局卻說這個書箱是它們給我提供的。

海灘上的空氣要比礦井裡新鮮多了。我們喜歡海灘的另一個原因是這裡吃得很好。每天早晨，當我們來到海灘上時，都要帶上一大桶淡水。後來，我們又多帶一桶水，用這桶水來做一種羅本島的濃味炖魚。爲了做出海味飯菜，我們還要捕撈蛤和貽貝。我們也抓龍蝦，它們藏在岩石縫裡。抓龍蝦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必須緊緊地抓住它們頭和尾巴的中間部位，否則它就會跑掉。

我最喜歡吃的是鮑魚。鮑魚是一種緊緊地依附於岩石上的軟體動物，人們必須想辦法使它放鬆身體。這是一種很難對付的動物，烹調時稍一過火候，就會硬得難於吃下去。

我們帶着捕撈工具，把它們放在第二個水桶裡。威爾頓·姆克瓦依（Wilton Mkwayi）是我們當中最出色的廚師，他負責烹調事務。當一切都做好後，哨兵也參加進來，我們都坐在沙灘上吃這種野餐。在一九七三年，我們從一張偷帶進來的報紙上了解到安妮公主和馬克·菲利普斯（Mak Phillips）舉行了婚禮。報紙上還介紹了有很多山珍海味的婚宴，菜單中包括貽貝、龍蝦和鮑魚，這對我們來說是太可笑了。我們每天都在吃這種海味。

一天下午，我們正坐在沙灘上品嘗着我們的海味野餐，突然監獄的一個頭目特布蘭赫（Terblanche）中校來到了這裡。我們馬上裝出正在幹活的樣子，但我們並沒能欺騙了他。他很快就看到了正在火上煮着的那只桶，裡面還有貽貝。他打開桶蓋，向桶裡看了看，然後撈出一條貽貝放進嘴裡，說：『味道好極了！』

七十六

在政治鬥爭方面，羅本島被公認爲是一所大學。這並不是因爲我們從書本上學到了多少知識，或者是因爲我們學習了英語、南非荷蘭語、藝術、地理和數學；或者是因爲許多人取得了雙學位，如比利·奈爾（Billy Nair）、艾哈邁德·卡特拉達、邁克·丁加克（Mike Dingake）和埃迪·丹尼爾斯（Eddie Daniels）。羅本島之所以被認爲是一所大學，主要是因爲我們互相學習了許多東西。我們自己當教員，自己當教授，講授自己的課程。我們與大專院校的學習不同，它們是正規的、政治性的學習，而我們則不是。

根據實際的需要，我們的大學成長起來了。當年輕人來到羅本島時，我們了解到他們對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知之甚少。作爲最有資格的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見證人，沃爾特向他們介紹非洲民族議會的創建和開始時的歷史。他的介紹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正因如此，島上的許多人都叫他『安拉』。這種非正式的歷史課程逐漸成爲一門必修課，成爲著名的教學

大綱A，其中包括兩年來關於非洲民族議會和解放鬥爭的演講。教學大綱A包括由凱西（Kathy）講授的『印度人鬥爭史』。還有一個人講授有色人種的歷史。曾經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進修的麥克（Mac）講授一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課程。

教學條件很不盡人意。學習小組集中在礦井裡上課，他們圍成一圈坐在講課人的周圍。教學方式實際上是蘇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論是通過講課人的提問和回答來闡明的。

羅本島上教學的中心課程是沃爾特的課程。許多被關在羅本島上的年輕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對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了非洲民族議會。沃爾特告訴他們，非洲民族議會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然後一直講述到今天的非洲民族議會。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這是他們所接受的唯一的一種政治教育。

由於這些課程廣泛宣講，我們開始從獄外的人們那裡收到問題。從此以後，這些課程變成了函授課程。老師把講稿偷偷地帶給他們，他們則悄悄地反饋回問題和意見。

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這些人幾乎沒受過正規的教育，但對世界上的各種苦難了解很多。他們更爲關心的是現實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如果有人在講稿中說，社會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可能就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這聽起來很合理，但在實踐中怎麼實行呢？如果我有土地而沒有錢，我的朋友有錢而沒有土地，那麼我們兩人的需要中哪個更重要呢？』這些問題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迫使我們認真考慮每一個人的意見。

多年來，我一直講授一門政治經濟學課程。我力圖講述經濟人物從古代到現代的演化，描述出從遠古社會向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演進過程。我並非是一名學者，也不是一名教師，我通常更願意回答聽衆的問題而不願高談闊論地演講。我的觀點並無多少意識形態的色彩，但它偏向於社會主義，我認爲它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中的最高階段。

除了非正規的學習之外，我還在繼續從事律師工作。有時我甚至想在我的監房的外面掛上一塊牌子，因爲我每周都要花費許多時間用於爲其它入獄者準備上訴材料，儘管根據監獄管理規定這是不允許的。因各種政治原因而入獄的犯人們都要我提供幫助。

南非的法律並不保護被告的法定代表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窮人因沒有法定代表權而入獄。幾乎沒有幾個黑人能承擔得起律師的費用，無論法院如何判決，許多人除了接受判決外沒有任何其它的辦法。許多人因不能得到律師的幫助而被判刑，他們要求我爲他們上訴。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與律師打交道。

一天，我收到了一名犯人偷偷交給我的一張紙條，要我提供幫助。我要求他提供起訴書、控告、物證和證詞的詳細情況。由於這些活動都要偷偷地進行，因此就顯得很慢，也很零散。在原來的曼德拉/坦博事務所進行一次商議至多要半個小時，這裡卻需要一年或更多

的時間。

我建議我的『客戶』給最高法院寫一封信，索要一份原告起訴書。我讓客戶告訴最高法院，他沒有錢，希望能免費得到一份起訴書。有時最高法院是會無償提供的。

一旦得到了原告起訴書，我就會整理一份上訴書，通常是建立在諸如歧視、程序不當、證據不足等理由上的司法不當上。我自己動手起草一封給法官或地方長官的信，然後把信交給當事人。我爲別人處理案件是違反有關規定的，因此，我要求當事人親自用手抄一份上訴書。許多犯人不會寫字，如果這樣的話，我就讓他們找一位會寫字的人代抄一下。

我很願意從事律師工作，在一些案件中，推翻了判決，縮短了刑期。這是令人滿意的勝利；監獄開始讓人們感到缺乏權威性，這是改變這種體制的辦法之一。通常我從不會見我的當事人，有時，在吃午飯時會突然有人在耳邊向我道謝，這時我才知道我曾經替他打過官司。

七十七

我的太太也在繼續遭受折磨。在一九七二年，一幫警察砸破了奧蘭多東區八一一五號的房門。他們還從窗口向屋裡扔磚頭，從前門向屋內開槍。到了一九七四年，溫妮被指控違反了對她的禁令，禁令禁止她接待除她的孩子和醫生以外的任何來訪者。當時她還在一家律師

事務所供職，一位朋友在早飯時帶着澤尼（Zeni）和津齊（Zindzi）來看望她。就因爲這麼一點兒事，溫妮受到起訴，並被判處六個月的監禁。她被送進奧蘭治自由邦的克龍斯塔德監獄，她在那裡的遭遇比上次在普利托利亞要好一些。溫妮寫信告訴我，她這次在監獄裡感到自由一些，這更堅定了她的鬥爭信念。當局允許津齊和澤尼在星期天時去看望她。

當溫妮於一九七五年獲釋出獄時，通過與我們的律師進行信件和電話聯繫，我們制訂了一項讓我和津齊見面的計劃。監獄管理制度規定，兩到十六歲的兒童不得探監。當我來羅本島時，我的幾個孩子都正好在兩到十六歲之間。制定這項制度的本意並不壞：立法者認爲，探監會對兒童的敏感心靈產生消極影響。但這一制度對犯人的影響卻幾乎是致命的。不能見到自己的孩子是最令人傷心的事情。

一九七五年，津齊十五歲了。我們制訂的計劃是讓溫妮改動津齊的出生證明，把這個女孩子的年齡從十五歲改爲十六歲，這樣就可以來看我了。黑人的出生證明並沒有人認眞地負責管理，溫妮發現修改津齊的出生證明並不難。她提出申請後就被批准了。

津齊定於十二月來看我。在此一周前，我按預先的安排見到了溫妮的母親。在探監室裡，我坐在她的對面，說：『媽媽，我眞高興，我就要見到津齊了。』我的岳母曾當過教師，她驚奇地盯着我，有些生氣地對我說：『不，津齊不能來看你，因爲她還不滿十六

歲。」

我馬上意識到還沒有人把我們的計劃告訴她。我們兩人的身後站着一個哨兵，我決定把她講的話蒙混過去，含含糊糊地說：『好，咱們不談這事了。』

但我的岳母是一個十分認眞的人，她不能放過這個話題。『噢，姆康亞尼西，一定是你搞錯了，津齊只有十五歲。』在科薩語中，姆康亞尼西是對女婿的愛稱，她一直這麼稱呼我。

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向她發出警告的信號，她馬上就明白了，她再也沒提津齊的事。

自從津齊三歲之後我就再沒見過她。她是從照片中而不是從記憶裡認識她爸爸的。我換了一件新襯衫，又格外細心地打扮了一下。這是我的虛榮心，我不想讓我的女兒把我看作一個老頭子。

我有一年多沒有見過溫妮了，看到她很健康的樣子，我很高興；但當我見到我的女兒已長成一位美麗的妙齡女郎時，見到我的女兒很像她那漂亮迷人的媽媽時，我更是激動不已。

開始時，津齊有些害羞和矜持。我覺得她最終能來看望她的父親是十分不容易的，這是一個她尚未眞正認識的父親，一個只能在遠處爲她祝福的父親，一個看起來是屬於人民而不屬於她一個人的父親。她的內心深處一定埋藏着對父親的不滿和怨氣，在她童年和少年時

代，她的父親一直不在她的身邊。我很快就認識到，她是一個堅強、熱情的女孩子，正像她的母親年輕時一樣。

我知道她會感到局促不安的，我盡最大的努力讓氣氛活躍起來。她剛一來到我就對她說：『你見到我的衛兵了嗎？』我向她詢問了她的學習、生活情況，還問到了她的朋友們，然後又回憶了她幾乎記不起來的童年時代。我告訴她，我經常回憶起星期日早上在家中的情景：我把她放在大腿上玩耍，她的媽媽在廚房裡準備早飯。我給她講述了她還是嬰兒時在奧蘭多發生的幾件小事，即使她很小的時候也很少哭鬧。透過鏡片，我可以看到她眼眶裡的淚水。

探監時，我從溫妮那裡知道了一個令人悲痛的消息：布拉姆·菲希爾在獲准出獄後不久就因患肝癌而去世了。布拉姆的死令我痛惜不已。儘管布拉姆的屍體上沒有留下政府的手印，但正是政府的殘酷折磨才使他患上了致他於死地的絕症。甚至在他死後政府也沒有放過他——他被火化後，國家沒收了他的骨灰。

布拉姆是一位純粹主義者，在瑞沃尼亞審判之後，他認爲通過進行秘密活動和被監禁能更好地爲政治鬥爭服務。他在法庭上所代表的人被判刑入獄，而他卻自由自在地生活，他認爲這是一種折磨。在審判期間，我建議布拉姆不要採用這種方式，強調他在法庭上能更好地

服務於鬥爭，人們可以從他身上看到，一位首席法官的白人兒子正在爲無權者的權利而鬥爭。但他不願讓別人受苦而自己享福。就像是在前綫與士兵們並肩作戰的將軍一樣，布拉姆不想讓別人去爲他自己不願犧牲的事業而去犧牲。

在保釋期間，布拉姆進行了秘密鬥爭，他於一九六五年被捕，並被以陰謀從事破壞活動的罪名判處終生監禁。我在監獄裡曾想給他寫一封信，但管理規定禁止犯人們互相聯絡。在他被確診爲癌症後，新聞界呼籲基於人道主義原則應把它釋放出獄，政府被迫答應了。獲釋後他住在布隆方丹他哥哥的家裡，僅幾周後他就去世了。

從各個方面來講，布拉姆·菲希爾，這位奧蘭治河殖民地前總理的孫子，都爲我們的事業做出了極大的犧牲。不管我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經歷了多少坎坷，但我是在與我的人民一起戰鬥，是在爲了我的人民戰鬥，我總能從這裡汲取無盡的力量。而布拉姆是一位白人，他是在爲了其它人的自由而與自己的人民作戰。

溫妮來看望我一個月之後，我收到了溫妮的口信：她最近要求來探監，但被當局拒絕了。理由十分荒謬可笑：我不希望見到她。我馬上約見了普林斯（Prins）中校提出抗議，他當時是監獄的獄長。

普林斯並不屬於人們所說的那種老於世故的人。當我走進去見到他時，我心平氣和地向

他講述了所發生的事情，我沒有任何敵意。但我說發生這樣的事情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必須允許我的太太來探監。

普林斯似乎並沒有聽我說的話，當我講完之後，他說：『曼德拉，你的太太只是想追求一種輿論效果。』我告訴他，我對他的話極爲憤慨，我還沒有說完，他就對我的太太說了一些冒犯、貶抑的話，我馬上失去了耐心。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一步一步地向普林斯中校走過去。他開始後退，但我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沒有用拳頭打他，就像平常一樣，我在口頭上回敬了他幾句。我是一個不喜歡罵人的人，但那一天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最後，我告訴他，他是一個沒有廉恥的卑鄙小人，如果他敢再次說出那樣的話，我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控制得住自己了。

說完這番話，我轉身衝出了他的辦公室。在我離開時，我看到了凱西和埃迪·丹尼爾斯站在門外，但我沒有與他們打招呼，就直接回到了我的監房。即使我把普林斯駁得啞口無言，他卻使我沒能控制住自己，我認爲這次是敗在我的對手手下了。

第二天早飯後，兩位哨兵來到我的監房，要我到獄長辦公室裡去一趟。當我來到獄長辦公室，我被六名全副武裝的哨兵圍住了。對面是普林斯中校，哨兵的一個頭目站在屋子中央，他也是監獄的檢察官，氣氛很緊張。

檢察官說：『曼德拉，聽說你昨天在這裡玩得很好，但今天就沒有那麼好玩了。由於你侮辱和威脅獄長，我要起訴你。這個罪名可不輕啊！』他隨後遞給我一張傳票。

他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回答說：『沒有了，你可以去問我的律師。』我要求回到監房去。普林斯一言未發。

我很快就明白了我要做些什麼：準備進行一場反訴，指控從普林斯中校到司法部長在內的所有人濫用職權。我要指控監獄制度是一項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制度，它們企圖使白人至上的制度永遠存在下去。我要使這一案例轟動全國，讓他們爲首先指控我而悔恨。

我請求喬治·比佐斯擔任我的辯護律師，並要求儘快與他會面。在喬治趕到監獄之前，我對當局說我想給他幾點書面意見。他們問我有什麼理由。我坦率地回答說，我覺得會客室裡一定裝有竊聽器。當局拒絕了我的請求。我必須與他面談。我告訴他們，他們無權拒絕我的要求，他們這樣做只能更加證實了我的懷疑。

事實上，當局是害怕喬治把書面的東西交給新聞界。這確實是我們的一個策略。他們還擔心我會利用喬治與在盧薩卡（Lusaka）的奧利佛取得聯繫，他們懷疑書面的東西裡面將含有敏感信息。從前我確實爲此利用過喬治，但信件中並沒有這一類的材料。

羅本島監紀法庭的開庭日期已經確定，來自開普敦的一名法官也已選定。在審訊的前一

天，我才得知我的律師將於明天到來，我可以交給他一份書面材料。上午我在獄長辦公室裡見到了喬治，我們簡單地商量了幾句就被召到法庭上了。但審訊很長時間以後才開始，檢察官宣佈獄方撤銷了此案。法官武斷地宣佈閉庭，然後匆匆離開了法庭。我和喬治驚訝地互相看着，並互相祝賀取得了勝利。我正在整理我的書面材料，突然，另一位哨兵頭目走了過來，用手指着我的稿子，說：『把這些東西交給我。』

我拒絕了，說這是我和我的律師之間的秘密。我對那位檢察官說，『請你告訴這位先生，這些材料是受律師與客戶的特權保護的，我不能把它交給這位先生。』檢察官說，你說的很對，但此案已經結束，法庭已經閉庭，在這裡最有權威的就是這位哨兵的長官。這個官員把材料從桌子上搶走。我沒有任何辦法去阻止他。我認爲，當局之所以撤銷對此案的起訴，就是爲了得到這些材料——事後他們才知道，材料中沒有什麽新鮮東西。

儘管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在羅本島這段時間裡我確實考慮過逃跑的事。麥克·馬哈拉傑（Mac Maharaj）和埃迪·丹尼爾斯是兩個勇敢、機智的人，他們一直在策劃越獄的方案，考慮了各種可能性。大多數方案是極其危險的，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認眞考慮。

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我們的工匠大師傑夫·梅塞莫拉已經設法搞到了一把鑰匙，它可以打開我們周圍的許多門。一天，一位哨兵把他的鑰匙放在了我們附近的一間辦公室

裡。傑夫拿起一塊肥皂，在上面印下了鑰匙的形狀。利用這一輪廓，他把一塊小鐵片磨成了鑰匙。這把鑰匙可以使我們進入監房後面的儲藏室。但我們從未利用這把鑰匙來逃跑。羅本島周圍的大海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一九七四年，麥克想出了一個越過這一障礙的辦法。最近他曾去開普敦看一位牙醫，他發現這位牙醫與一位著名的政治犯有姻親關係。這位牙醫很有同情心，如果不打開麥克的腳鐐，他就拒絕爲他治療。麥克還注意到，牙醫的二樓客廳的窗子離一條偏僻的小巷很近，我們可以從那裡跳窗逃跑。

麥克回來後，他見到了我們幾個人，讓我們也要求去看那位牙醫。我們提出了要求，當局確定了我、麥克、威爾頓·姆克瓦依和另外一位犯人去開普敦的日期。我們三個人願意試一試運氣，但當麥克告訴第四個人時，他拒絕了。我們對這個人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知道了我們的計劃，這很讓我擔心。

我們三個人乘船來到了開普敦，然後在哨兵的押送下來到了牙醫診所。我們三個人都受過軍事訓練，這次可能有機會逃跑。麥克還帶了一把刀以防萬一。在牙醫診所裡，哨兵首先把其它候診者趕走了。我們要求打開腳鐐，在牙醫的支持下，哨兵同意了。

麥克把我們領到窗前，指給我們逃跑的路綫。但他向街上一看，就感到有些奇怪：這裡是開普敦的市中心，時間又正好是中午，但街上空蕩蕩的。他上次來這裡時，街上的行人熙

熙攘攘，擁擠不堪。『敵人已經有所準備了。』麥克輕聲耳語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事情有些不妙，我同意麥克的看法。威爾頓說麥克說的都是廢話。他說：『曼德拉，你的勇敢到那裡去了？』但我同意麥克的看法，我們三人看完牙之後就回去了。牙醫很奇怪我爲什麼要來，因爲我的牙沒有一點兒毛病。

在麥克考慮更加切實可行的越獄方案的同時，埃迪·丹尼爾斯也在構想更爲大膽的方案。前些年，飛機被禁止飛越羅本島上空。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們注意到不僅有飛機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直升飛機也可以飛過。埃迪向我提出了他的計劃，讓非洲民族議會找一架直升機，塗上南非軍隊的顏色，到羅本島上來把我接走，送到開普敦的某一友好國家的大使館，我到那裡去申請避難。這並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計劃，我讓埃迪偷偷地想辦法給在盧薩卡的奧利佛送一封信去。埃迪確實設法把信送到了盧薩卡，但我們沒有收到答覆。

七十八

在羅本島，慶祝生日是十分簡單的事情。我們把飯菜擺在一起就代替了蛋糕，向過生日的人多提供一片麵包或一杯咖啡就代替了禮物。費克爾·巴姆（Fikile Bam）和我都出於七月十八日，我把聖誕節時買的糖留下一點供我們兩人慶祝生日之用。一九六八年時我的五十歲大壽平平淡淡地過去了，但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已五十七歲時，沃爾特和凱西帶着一個長期

計劃來找我，他們打算讓我的六十歲大壽過得令人難忘。

我們一直在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怎樣保持鬥爭的精神。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政府已經關閉了大多數激進的新聞機構，他們禁止出版受到禁令的人的和入獄者的任何言論和照片。哪怕只是出版了我或我的同事的一張快照，那麼這位編輯就會入獄，報紙也會被封閉。

一天，我正在院子裡與凱西、沃爾特談話，他們突然建議說我應該寫一本回憶錄。凱西說，出版這本書的最佳時機是我六十大壽時。沃爾特說，本着眞實和公正的原則，這樣一本書會使人們明白我們曾經爲何奮鬥過，現在又在爲何奮鬥。他說，這本書還可能成爲年輕的自由戰士的精神動力。這一想法啓發了我，後來又作了一次討論之後，我同意了。

當我決定幹什麼事時，我喜歡馬上就幹。我投入了這一新的計劃。我採取了不合常規的工作方式：我主要在夜裡寫作，而在白天睡覺。在頭一、兩周裡，我在晚飯後睡上一覺，在十點鐘起床，然後一直寫到第二天早飯時。在礦井裡勞動完之後，我就一覺睡到吃晚飯，然後開始新一輪的作息。這樣過了幾周後，我告訴獄方，我感到有些不舒服，不想到礦井裡勞動了。他們似乎對此並不太介意，從此以後，我就可以在白天裡多睡一會兒了。

在寫作中我們組成了一條流水綫。我每天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凱西，他負責修改手稿，然後再讀給沃爾特聽一遍。凱西把他們兩人的意見寫在邊上。沃爾特和凱西毫不客氣地批評我，我認眞地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經常是尊重他們的修改意見。這些修改過的手稿再交給拉

洛·基巴（Laloo Chiba），他在夜裡把我的手稿以他那極小的速記符號抄下來，把十頁大稿紙的內容抄到一小張紙片上。麥克的任務是偷偷地把這些材料送到外面去。

哨兵產生了疑心。他們去問麥克：『曼德拉在幹什麼呢？爲什麼夜裡很晚還不睡覺？』麥克只是聳聳肩膀，說他也不明白。我寫得很快，四個月內就完成了初稿。我從不在某個詞或句子裡精雕細刻。我講述的是從出生到瑞沃尼亞審判期間的經歷，最後以羅本島的某些遭遇爲結尾。

當我寫到這些時，我又好像是重新經歷了一番。夜裡，當我在靜靜地寫作時，我能再次感受到年輕時在庫努和姆克凱玆韋尼的所見所聞；去約翰尼斯堡時的激動和擔心；青年聯盟的火熱場面；叛國罪審判的無限期推遲；瑞沃尼亞審判的場面。這就像做夢一樣，我盡量簡明、眞實地把這些記憶寫到紙上。

麥克獨出心裁地把抄好的手稿用他學習時使用過的筆記本的封面裝訂好。通過這種辦法，他能夠避免當局發現全部書稿，並於一九七六年獲釋時把它偷偷地帶出去。按照我們的安排，當書稿被安全地運到國外之後，麥克將悄悄地告訴我們；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銷毀原稿。同時，我們仍必須處理好這五百頁手稿。我們只能這樣辦：把它埋到院子裡的花園裡。哨兵對院子的監視有些漫不經心，他們通常坐在北頭的一間辦公室裡聊天。他們可以從辦公

室裡一眼看到隔離區的南頭，隔離區中有一個小花園。前幾天早晨散步時，我就仔細地考察了這一地區，我決定把手稿埋在這裡。

爲了不必挖一個大坑，我們決定把手稿分開埋在三個坑裡。我們把手稿分成兩小包和一大包，分別用塑膠布包好，放進一個空的壇子裡。這項工作必須很快完成，我讓梅塞莫拉去找幾把挖坑的工具。幾天後，他送來了幾把新的鐵鏟子。

一天早飯後，我和凱西、沃爾特、埃迪·丹尼爾斯溜進了院子南面的花園裡，我們裝作正進行一場政治討論的樣子。我們每人在襯衣裡藏了一些手稿。我一使眼色，我們馬上趴到地上挖起坑來。我在中間挖，旁邊是通向排水管的污水井。當我挖到水管時，我在水管下面掏了一個洞，我把最大的一包手稿放到那裡。其它人爲手稿挖了兩個淺些的洞。

我們很快幹完這件事，走進了奔赴礦井的隊伍。那天早晨，走在隊伍裡我感到很輕鬆，因爲手稿已經安全地埋藏好了。我不用再想它了。

幾周之後，起床號剛剛響過，我就聽到院子裡傳來一種令我不安的聲音，這是鐵鍬挖掘的聲音。當我們被允許走出監房洗漱時，我走到走廊的前端想看看那邊發生了什麼事。在院子的南部，有一群工人。令我吃驚的是，他們正在我們埋手稿的地方挖掘。

當局決定在隔離區的前面建一堵牆，他們發現隔離區的犯人能夠與我們在院子裡進行聯

絡。工人們正在爲牆的水泥地基開挖一道淺溝。

在洗漱時，我設法把這件事告訴了沃爾特和凱西。凱西認爲手稿的主要部分被埋在水管的下面，可能比較安全，但另外兩部分則很容易被發現。當幾桶粥被送到院子裡時，指揮工人幹活的哨兵讓那些人離開了院子。這是爲了防止他們與這些政治犯人進行聯繫。

手裡端着一碗粥，我領着沃爾特和凱西來到院子的南端，好像我要和他們秘密談話一樣。這道溝的一端已經極其危險地接近了我們的兩個小坑。同時，丹尼爾斯也走了過來，他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只有一個辦法：我們四個人必須盡可能不惹人注意地把兩小包手稿挖出來。我們很快就挖出了這兩包手稿，如果要挖出另一包手稿，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我們相信他們不會發現那些手稿的，因爲他們不會爲了修牆而移動水管的。

在回到我們的監房時，我們把手稿藏在了襯衣裡。那天埃迪不去礦井勞動，我們把手稿交給了他，要他盡快地銷毀。冒着極大的風險，埃迪同意了。在搶救出了這兩包手稿並全部銷毀之後，我才鬆了一口氣。

下午從礦井裡回來之後，我沒有像平常一樣去洗漱，而是走到了院子的南端。我盡可能地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但我還是被所見到的景象嚇呆了。犯人們已經在沿着隔離區的

牆挖了一道溝，並真的移動了水管。他們肯定已經發現了那些手稿[9]

我一定是後退了一步，或者作出了明顯的反應。我並不知道，有許多哨兵一直在監視着我，後來他們才告訴我，我們反應證明我知道那裡埋有手稿。我回去洗漱時，告訴沃爾特和凱西談，我懷疑手稿已經被發現了。埃迪已經成功地銷毀了另外兩部分手稿。

第二天早晨，我被召到司令官的辦公室。他旁邊站着一們高級警官，他剛剛從普利托利亞趕來。沒有作任何寒暄，司令官宣佈：『曼德拉，我們發現了你的手稿。』

我沒作回答。司令官從桌上拿起幾頁稿紙。

『這是你的筆跡嗎？』他問道。我仍保持沉默。

『曼德拉，我們知道這是你的筆跡。』司令官有些憤怒地說。

我回答說：『你們一定找到了一些證據。』他們對此不屑一顧，說他們知道旁邊的標記是沃爾特·西蘇魯和艾哈邁德·卡特拉達作的。我再次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打算施加懲罰的話，他們必須拿出證據。

司令官說：『我們不需要證據，我們也有證據。』儘管那天他沒有給予懲罰，但一會兒之後，我和沃爾特、凱西被叫到監獄副總監魯（Rue）將軍的面前，他告訴我們，我們濫用了學習的權利來非法地寫作傳記。因此，我們的學習權利將被無限期地剝奪了。此後，我們失去學習的權利達四年之久。

十二月麥克獲釋後，他把筆記本送到了英國。出國之前他先在南非的家裡待了半年，然後去盧薩卡會見了奧利佛，後來又去了倫敦。他在那裡住了六個月，在一位打字員的幫助下，他重新整理了這份手稿。然後他又回到盧薩卡，交給奧利佛一本複印本。

從此以後，關於它的消息就少了。我沒有從盧薩卡了解到關於這份手稿的消息，至少也不清楚奧利佛是如何處理的。儘管我在獄中時它未能出版，但它構成了這本回憶錄的主體。

七十九

一九七六年，有一位意外的客人來看望了我，即監獄部長吉米·克魯格（Jimmy Kruger）。他是內閣中的一位重要成員。克魯格不僅對監獄政策有着重要影響，而且在政府處理解放鬥爭問題方面也發揮着重要作用。

我有一種預感，知道他爲什麼來找我。當時政府正在大規模地推行其區域發展政策和『準獨立』國家。區域發展的一個範例就是川斯凱，是由我的侄子K·D瑪坦茲瑪領導的，他還曾經是我的恩人。他已經成功地鎮壓了幾乎所有合理反抗。我回想起一件事：司令官最近曾以開玩笑的方式對我說：『曼德拉，你應該退休回到川斯凱去，在那裡安度晚年。』

我想，傑米·克魯格可能也是要向我提出這一建議。他是一個直率而粗魯的人，並不像

我想像中的一位內閣部長那樣圓滑。我把這次會談當作是提出我們的不滿的又一次機會，起初他似乎聽得很滿意。我首先提出，我們曾於一九六九年給他寫過一封信，至今沒有得到答覆。他只是聳聳肩膀。然後我詳細地談到了羅本島的條件很差，並再次重申：我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們希望得到政治犯的待遇。但克魯格對此不屑一顧，他說：『你們是一群極端的共產主義份子！』

隨後，我開始給他講述關於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以及我們爲什麼要採取暴力手段。顯然，他對非洲民族議會幾乎一無所知，他所了解的一些東西都來自於右翼報刊的宣傳。當我告訴他非洲民族議會遠比國民黨歷史悠久時，他呆住了。我說，如果他認爲我們是共產主義份子，他應該重新讀一遍《自由憲章》。他兩眼發呆地看着我。他從未聽說過《自由憲章》。一個內閣部長竟然如此無知，這太令人奇怪了！我還從未這麼驚奇過。國民黨的政治家們例行公事般地對他們一無所知的東西進行批判。

我提出了釋放我們出獄的問題，提醒他回憶一下一九一四年非洲人的叛亂，儘管他們在議會中擁有席位、能夠舉行集會、甚至能參加投票，但他們還是訴諸於武力。即使德·威特將軍和肯普少將率領一支一萬二千人的軍隊占領了城鎮，造成了許多傷亡，但在以嚴重叛國罪判刑之後不久，他們被釋放了。我還提到了羅比·萊布蘭特一案，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了一個秘密組織以反對南非對同盟國的支持，他被判處終生監禁，但不久被釋放出

獄。克魯格似乎並不了解這些發生在他的人民身上的歷史事件，正如他不了解《自由憲章》一樣。與這樣一個人進行溝通是十分困難的。

克魯格對這些不予理睬。他說：『那些已經成爲歷史了。』他是帶着一項特別建議而來的。儘管他以粗魯著稱，但他還是以恭敬的態度提出了他的建議。他坦率地宣佈：如果我承認川斯凱政府的合法性，並願意去那裡定居，對我的宣判可以大大減輕。

我認眞地聽了他的話。我說，首先，我完全拒絕班圖的政策，絕不會支持它；其次，我是從約翰尼斯堡來的，我只能回約翰尼斯堡。克魯格再三勸告我，但未能奏效。一個月之後，他再次來房並提出同樣的建議，我又一次拒絕了。這是只有叛徒才能接受的建議。

八十

儘管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獲取各種新聞消息，但我們對最近發生的事情的了解還是慢了半拍。對於外界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只能先是通過傳聞來了解，然後才可能得到報紙或來訪者的證實。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們開始聽說關於南非發生的一次大規模起義的消息。傳聞是怪誕而不可能的：索韋托的青年人已經打敗了軍隊，士兵們已經棄槍逃跑了。九月，曾參加六月十六日起義的一個青年人被關進了羅本島監獄，直到這時我們才了解到事情的眞相。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一萬五千名學生聚集在索韋托，抗議政府要求半數以上的中學必須以南非荷蘭語進行教學的命令。學生們不願意學，老師們也不願意用壓迫者的語言教學。家長和教師們的抗議和請願無人理睬。政府調動警察部隊來鎮壓這支熱血沸騰的學生大軍，不加任何警告就開槍射擊，打死了年僅十三歲的埃克托爾·彼得森（Hector Pieterson）。學生們用棍棒和石塊還擊，隨之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數百名學生受傷，兩名白人被打死。在沙佩維爾（Sharpeville），警察則沒有向學生們開槍。

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在南非的每一個城鎮都引起了強烈反響。起義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騷亂和暴力。爲在騷亂中的死難者舉行的葬禮又進一步激發起了全國人民的鬥志。南非的青年人突然被抗議和起義的精神震撼了。學生們開始在全國進行罷課。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者也站到學生一邊支持抗議示威。班圖式教育開始報復其始作俑者，因爲這些年輕人正是受到了班圖教育。

九月，隔離區裡來了年輕人，他們都是因參加這次起義而被捕的。通過秘密集會，我們掌握到了關於這次起義的第一手材料。我和同志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整個六十年代中的似乎偃旗息鼓的群衆示威在七十年代又重新振作起來。許多年輕人曾到國外參加了我們的軍事組織，然後又偷偷地回到國內。有幾千人曾在非洲民族議會設在坦桑尼亞、安哥拉和莫桑比

克的軍營中訓練。獄外的人民正在支持我們爲之而入獄的事業，在監獄中沒有比聽到這樣的消息更令人振奮的了。

這些年輕人與我們從前見到過的不同。他們勇敢、頑強而好鬥；他們不會馴服，一有機會就高呼：『曼德拉！』他們的天性就是對抗而不是合作。當局不知道應該怎麼對付他們。在瑞沃尼亞審判期間，我曾對一位警官說過，如果政府不能自我改革，我們之後的自由戰士們終有一天會使當局想起我們的。這一天確實來到了羅本島。

在這些年輕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的革命精神。我曾經得到了預告。幾個月前溫妮來探監時，她通過只有我們兩人能明白的方式告訴我，一代心懷不滿的年輕人正在成長起來，他們是一代好鬥的非洲主義者。她說，這些人正在改變着鬥爭的性質，我應當注意他們。

這些新來的犯人們對他們想像中的羅本島上的惡劣條件極爲反感，說他們不明白我們怎麼能忍受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看看一九六四年的羅本島。但他們幾乎像懷疑當局一樣懷疑我們。我們要求他們遵守紀律，他們卻不加理睬，認爲我們的建議過於軟弱和怯懦。

顯然，他們認爲我們這些瑞沃尼亞的受審者是溫和派。多年來我們一直被認爲是激進的革命派，現在被認爲是溫和派確實有些新鮮，但我們並不高興這樣，我知道，我可以以多種

方式作出反應：我可以厲聲斥責他們的魯莽，或者認眞地聽一聽他們到底是什麼意思。我選擇了後者。

他們中的某幾個人被分配與我們在一起，如南非學生組織的斯特里尼·莫德利（Strini Moodley）和黑人大會的塞思·庫珀（Saths Cooper），我讓他們寫一份關於他們的運動和思想的報告。我想知道是什麼使他們投身於鬥爭，是什麼激發了他們的鬥爭激情，他們對未來的設想是什麼。

他們來到羅本島後不久，司令官讓我對這些年輕人加以規勸。他想讓我告訴他們保持克制，認識到他們是在監獄這一事實，並遵守監獄的各項制度。我告訴他我不想這樣做。如果那樣的話，他們會認爲我是壓迫者的幫凶。

這些年青人拒絕遵守最基本的監獄管理規定。一天，我到司令官的辦公室裡與他交涉一些事情。當我與少校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我們遇上了一位正在受監獄官員批評的年輕犯人。這位年輕人還不滿十八歲在高級管理人員的面前仍戴着帽子，這是違反規定的。當少校走進屋裡時，他沒有立正站好，這也是違反規定的。

少校盯着他看了兩眼，說：『請把你的帽子摘下來。』這位犯人理都沒理。少校生氣了，大聲命令道：『脫帽。』犯人慢慢地轉過身來，斜了少校一眼，問道：『爲什麼？』

我幾乎不能相信剛剛聽到的這句話。這是一個革命性的問題：爲什麼？少校也似乎吃了一驚，但還是勉強回答了一句。『這是規定。』那位年輕的犯人反問道：『你們爲什麼要制訂這樣的規定呢？其目的是什麼？』一位犯人竟然敢這樣對少校講話，這太過份了，少校轉身走出了房間，說：『曼德拉，你和他談談吧。』但我不想代表他介入此事，只是衝着犯人的方向鞠了一躬，讓他知道我是站在哪一方的。

這是我們首次與黑人覺醒運動打交道。由於非洲民族議會、泛非主義者大會和共產黨被宣佈爲非法，黑人覺醒運動填補了年輕人中的眞空。黑人覺醒運動更像一種思想而不像一種運動，他們認爲黑人必須首先把自己從白人三百年的統治下產生的心理上的自卑感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人民才能充滿自信地站起來，眞正地從被壓迫狀態中解放自己。黑人覺醒運動倡導建立一個無種族之分的社會，但在建設這一社會的過程中，他們排斥了白人的作用。

我對這種觀念並不陌生：他們與我在四分之一世紀前非洲民族議會青年聯盟成立時的想法如出一轍。我們也曾是非洲主義者，我們也曾強調民族自豪感和種族自信心，我們也曾拒絕在鬥爭中取得白人的幫助。在很大程度上，黑人覺醒運動代表了我們對同一個問題的同樣的答案。

但正如我們已經超越了青年聯盟的視野一樣，我相信這些年輕人也將超越黑人覺醒運動

的某些局限性。我認爲他們的以黑人爲中心的思想是具有排斥性的，代表着一種沒有完全成熟的中間性觀點。我認爲，作爲一名資深政治家，我有責任幫助他們逐步成熟起來。我還認爲，這些年輕人終究會失敗，因爲黑人大會並沒有提出行動計劃，也沒有提出抗議的方式。

儘管我們認爲黑人大會成員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片沃土，但我們並不企圖去招募他們。我們知道，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疏遠他們及羅本島上的其它黨派。我們的政策是友好相處、尋求共同的利益、祝賀他們所取得的成就，而不是使他們改變自己的信仰。如果他們問我們這樣一個問題，『非洲民族議會對班圖的政策是什麼？』『《自由憲章》是如何評價國有化的？』我們可以答覆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提出過這類問題。

我通過秘密交換紙條的方式與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接觸。我與一些來自川斯凱的人交談，問了一些關於我的家鄉的問題。有些剛剛入獄的人在鬥爭中是十分著名的。對於派崔克·特羅爾·萊科塔（Patrick Terror Lekota）的勇敢更是久聞大名，他是南非學生組織的一位領導人，我對他來羅本島表示了歡迎。

特羅爾的綽號來自於他在英式足球場上的勇猛，但他在辯論中也同樣難於對付。他對他的一些同事的種族排他主義思想持有異議，並逐步向非洲民族議會的思想靠近。有一次，他到羅本島後決心加入非洲民族議會，但我們沒有同意，這並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要他而是因爲我們擔心這樣做會在監獄中引起局勢的緊張。

但特羅爾並沒有因爲我們的拒絕而灰心，他公開地效忠於非洲民族議會。後來不久的一天，他受到了對他心懷不滿的幾個黑人覺醒運動成員的毆打。被打之後，當局決定起訴那幾個鬧事者並給他們加刑。但出於團結的考慮，我們建議特羅爾不要出庭作證。他同意了，拒絕辨認是誰毆打了他。這個案子撤銷了。我認爲，這種審訊只會對當局有利。我們讓這些年輕人認識到，非洲民族議會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觀點和信仰。

自此以後，好像是打開了閘門一樣，許多黑人覺醒運動成員決心加入非洲民族議會，包括那些曾毆打特羅爾的人。特羅爾成爲非洲民族議會在獄中的領導人之一，不久就開始給其他的犯人講解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特羅爾等人的勇氣和遠見告訴我們，我們的觀點仍是有說服力的，仍然代表着團結起來爲解放鬥爭的勝利而奮鬥的最美好的願望。

政治觀點的分歧在犯人中仍然存在。我們了解到，非洲民族議會、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黑人覺醒運動之間仍存在着矛盾。許多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受到了毆打，更多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受到當局的指控，羅本島行政法庭即將開庭審判。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從外界請來一位律師處理此案。儘管我沒有親眼目睹這場毆打，但我被要求作爲一名目擊者來爲他們作證。這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我願意爲我的同志們出庭作證，但我不願做任何使非洲民族議會、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黑人覺醒運動之間的關係更趨緊張的事。

我認爲，我在獄中的角色不僅僅是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而且是一名團結的促進者、一位誠實可靠的中間人、一位調解人，我不想在這場爭執中偏向任何一方，即使其中一方就是我的非洲民族議會戰友們。如果我代表非洲民族議會一方出庭作證，我就會喪失這次在各方之間進行調解的寶貴機會。如果我想促進團結，我就必須像一位團結者一樣辦事，即使受到某些同事的指責也在所不惜。

我決定不出庭作證。這使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但我認爲這是一個重大問題，冒着讓他們不愉快的風險是值得的。更爲重要的是讓年輕的黑人大會成員認識到，我們的鬥爭是互相聯繫的，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八十一

當局急於制服這些年輕的勇士們，它或多或少地允許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我們在礦井裡進行怠工已經是第二年了，我們要求停止所有的體力勞動。我們要求有權在白天幹一些有益的工作，如讀書或學習某種手藝。我們不再需要到礦井裡裝樣子了，我們只是聚在一起聊天。一九七七年初，當局宣佈結束一切體力勞動。我們可以白天待在自己的房間裡。他們給我們在院子裡安排了幾項活動，但這只是他們掩蓋失敗的遮羞布罷了。

這一勝利是我們不斷進行抗議和後勤供應不足的共同結果。一般情況下，當局確定哨兵

與犯人的比例爲一比三。即使在因索韋托事件而入獄的犯人們到來之前，哨兵的數量就有些不足，何況這些不馴服的年輕人更需要嚴厲看管呢？他們很不聽話，似乎每個人都需要一名專職的哨兵。如果我們待在自己的房間裡，需要的哨兵就少了。

體力勞動的結束使我們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現在我可以在白天讀書、寫信、與同志們討論問題，或者熟悉律師業務。自由時間使我在羅本島上形成了兩大愛好：園藝和網球。

爲了在監獄中生存下去，人們必須想辦法從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樂趣。有人可能因把衣服洗得乾乾凈凈而感到充實，有人則以打掃走廊爲樂趣，有人以整理房間爲滿足。獄外的人們因從事重要而艱巨的工作感到自豪，而獄中的人們即使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感到自豪，從本質上講，這二者並無多少區別。

自從我來到羅本島之後，我就要求當局允許我在院子裡種一片小菜園。多年來他們一直拒不答應，也不說明理由。但最終他們還是發了慈悲，我可以在一片狹長的空地上開墾自己的小菜園。

院子裡的地十分乾旱，而且有很多亂石。院子是在一片山坡上修建的，爲了開闢出小菜園，我必須把地裡的石頭清除乾凈才能種植蔬菜。當時，許多同事說我是一名礦工，白天在礦井裡勞動，業餘時間還要在院子裡挖石頭。

當局給我提供了種子。起初我種植了西紅柿、辣椒和葱頭，這都是些容易生長的植物，

不需要肥沃的土壤和精心的照料。剛開始時收獲很少，但後來就好多了。當局沒有因爲允許我種植蔬菜而後悔，因爲一旦我的菜園開始結果時，我經常向哨兵們提供最好的西紅柿和葱頭。

在陶醉於我的菜園的同時，並不是我被關進監獄之後才會照顧我的菜園。我第一次管理菜園是在黑爾堡大學期間，作爲大學體力勞動的一部分，我曾到一位教授的菜園裡參加勞動，我覺得，與土地打交道有一種樂趣，是腦力勞動的休息方式之一。在約翰尼斯堡學習和工作時，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來開墾菜園。

我開始借閱關於園林和園藝方面的書籍。我了解了各種園林技術和肥料類別。我沒有書上講的那麼多的材料，但我通過試驗進行學習，從失敗中學習。有一段時間，我試着種了花生，並試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最後還是放棄了。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失敗。

一片菜園是一個人在監獄中能幹的少數幾件事之一。從種下一粒種子、看着它發芽、長大，到最後收獲，付出的勞動不多而收獲卻很豐富。作爲這片土地的管理人員，我有那麼一點兒自由的感覺。

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個菜園象徵着我的生活某些方面。一個領袖也必須照管他的菜園；他也要播種、照看、管理，然後才能收獲。像園丁一樣，一位領袖也必須對他栽培的東

西負責，他必須記住自己的工作，打擊敵人的破壞，保護應予以保護的，拋棄那些不能繼承的東西。

關於一株特別可愛的西紅柿植物，我曾兩次給溫泥寫信，我把它從一棵幼苗培養成一株茁壯的植物，並結出了碩大鮮紅的果實。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這株植物開始枯萎了，我的一切努力都未能挽救它。它死掉之後，我從土裡挖出了它的根，洗乾凈後埋到了菜園的一角。

我以很長的篇幅敘述了這個小故事。我不知道她對這封信是如何想的，但當我寫信時，我的感情極爲複雜：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像那株植物一樣死掉，但又對維持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關係感到無能爲力。有時，面對某種即將消失的東西，人們無論如何也挽留不住。

在勞動時也沒幹多少活兒，不至於汗流浹背，但來回的走路就可以使我保持苗條了。

我一直認爲，鍛鍊不僅對一個人的身體健康有好處，而且對心情舒暢也有重大作用。從前，我曾多次把自己的憤怒和焦慮發洩到一只吊袋上，而不願找某某同志甚至一個警察來出氣。鍛鍊能消除緊張，而緊張是健康的大敵。我發現，當我身體狀況良好時，我工作起來就感到愉快，思維也很敏捷，因此，鍛鍊就成爲我生活中不變的習慣。在監獄裡，爲自己找到一個發洩渠道是絕對必要的。

即使在來到羅本島後，我也力圖堅持原有的拳擊訓練習慣，從星期一到星期四進行越野長跑訓練和肌肉訓練，另外三天則休息。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我每日早晨在我的監房裡進行四十五分鐘的原地跑步。我還要做一百個指尖着地的俯地挺身，二百個仰卧起坐，五十個曲膝動作以及其它體操等。

在給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總是要求他們進行鍛鍊、從事快速奔跑的體育運動，如籃球、英式足球或網球，以保證自己的心情愉快。孩子們並沒有聽我的話，但我卻成功地影響了我的一些習慣於久坐的同事們。對像我這樣年齡的黑人來說，鍛鍊是與衆不同的。一段時間之後，甚至沃爾特也開始每天早晨在院子周圍散散步。我知道，我的一些年輕同事們在注視着我，並反問自己：『如果一位老人都能做到的話，爲什麼我不能呢？』他們也開始了鍛鍊。

自從第一次與獄外的來訪者和紅十字會會談開始，我就向他們強調擁有一定的時間和器材進行適當的訓練的重要性，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幫助下，我們才得到了一些器材，如排球設備和一張乒乓球臺。

幾乎在我們停止礦井下的勞動的同時，一位哨兵想起了一個主意，即把我們這個院子變成一個網球場。院子的大小正好合適。犯人們把水泥地面塗成綠色，然後又劃上傳統的白色邊綫。幾天後，架起了球網，我們也可以在前院裡進行我們自己的溫布登網球賽了。

在黑爾堡大學時，我曾打過一段時間的網球，但我並不是一位出色的球手。我的正手相對來說較強，而反手很弱。但我從事這項運動是爲了鍛鍊，而不是爲了趕時髦。它的運動量正好相當於到礦井去走一個來回。我是我們這裡面的人中最經常打網球的人之一。我愛在後半場打球，只有當有機會乾脆利落地猛擊時，我才衝到網前。

我們的體力勞動結束後，我有了更多的時間用於讀書，但我原來讀過的書現在都受到禁止。當我們的學習權利被剝奪時，我正在爭取獲得倫敦大學的法學士學位。我是在瑞沃尼亞受審時開始攻讀法學士學位的，後來中斷了四年之久，這無疑使我創造了獲取這一學位年限最長的大學記錄。

但中斷學習權利也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即我開始讀那些否則沒有時間去讀的書籍。我不再鑽研合同法的巨著，而沉迷於小說中。

在羅本島上，我不可能不受限制地任意閱讀。我們閱讀了許多記憶模糊的神話和偵探小說以及毛利的作品，但其它的書很少。政治書籍是完全禁止的。關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任何一本書都看不到。如果想借一本標題上帶有『紅色』字樣的書，只會得到有關人員的拒絕。韋爾斯（H·G·Wells）的《世界大戰》儘管是一部科學幻想小說，但因其書名中有『大戰』字樣而被禁止。

從一開始，我就盡量閱讀關於南非或由南非人寫的書。我讀過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全部未受禁止的小說，對白人的自由觀念有了較多的認識。我讀了許多美國的小說，至今記憶猶新的是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藤》，我從這本書中認識到，書中季節工人的命運與南非工人和農民的命運是相似的。

托爾斯泰的不朽名著《戰爭與和平》我曾借過好多次，儘管書名中有『戰爭』的字樣，但這本書未遭禁止。庫圖佐夫將軍的高大形像深深地打動了我。儘管俄羅斯帝國宮廷中的人都低估了他的能力，但庫圖佐夫擊敗了拿破侖，這主要是由於他不被宮廷的暫時的、表面上的評價所左右，而是靠着對自己的將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而作出自己的決定。這再次啓示我，如果一個人想眞正地領導人民幹一番事業，他必須眞正地了解人民。

八十二

索韋托學生運動之後，我了解到，溫妮與我的朋友、私人醫生恩塔托·莫特拉納一起加入了黑人父母聯合會，這是一個由有關當地的職員和教會領導人組成的組織。當局似乎像擔心年輕的叛亂者一樣擔心這一父母聯合會。八月，學生起義後不到兩個月，溫妮根據《國內安全法》被捕，不加審訊就被關進了約翰尼斯堡的堡壘裡，她在那裡被關了五個月。當時，我可以給她和我的女兒寫信表示支持，我的女兒正在史瓦濟蘭的寄宿學校讀書。儘管溫妮這

次並未受到虐待，從監獄出來之後更加堅定地投身於鬥爭之中，但我還是爲她的被監禁感到痛苦。

儘管受到禁止，溫妮還是從她摔跤的地方爬了起來，她對索韋托的青年激進主義者的影響之大令當局大吃一驚。他們決心削弱她的影響，並採取了厚顏無恥的行動：他們讓她在國內過流放生活。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六日的夜裡，警車和一輛卡車來到了奧蘭多西區的一座房屋的外面，他們把傢俱和衣物裝到卡車上。這次，溫妮沒有被逮捕或軟禁，或審問；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個偏遠小鎮——布蘭德堡（Brandfort）。我從凱西那裡了解到這些情況，凱西則是從一位來訪的印度教僧侶那裡知道的。

布蘭德堡位於約翰尼斯堡西南方向二百五十英里處，正好位於自由邦的布隆方丹的北部。經長途奔波之後，溫妮、津齊帶着她們的財產來到了布蘭德堡黑人居住區的三間鐵皮小屋前，這是一個極爲貧窮和落後的地區，人民生活在當地白人農場主的殘酷壓迫下。溫妮焦慮不安地注視着周圍。當地講的是西蘇托語，溫妮不會說這種語言。

她被流放到外地令我感到悲傷和憤怒。她在索韋托時，我至少可以想像她在廚房裡烹調或在書房裡讀書的情景，我可以想像她在我非常熟悉的屋子裡睡醒的樣子。這對我是一種安慰。在索韋托，即使她受到禁令的限制，但周圍仍有許多朋友和親人。在布蘭德堡，她和津

齊卻舉目無親。

我曾經在去往布隆方丹時從布蘭德堡路過，並注意過它。除了極其貧困和落後外，它沒有給我留下其它什麼印象。我從來沒有想到，布蘭德堡八〇二號這一地址將來會有一天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覺得，我好像與溫妮在同時坐牢。

在布蘭德堡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我從溫妮的信中可以看得出來。她們沒有暖氣、沒有廁所，也沒有自來水。這裡沒有小商店，鎮上的百貨商店非常歧視黑人。大多數白人講南非荷蘭語，他們的政治觀念極其保守。

溫妮和津齊經常受到警察的監視和騷擾。幾個月之內，津齊因受警察的威脅而整天心煩意亂，實際上，她並沒有受到禁令的約束。九月，在溫妮的律師的幫助下，我向當地的布蘭德堡警察機構遞交了一份緊急呼籲書，要求他們停止對我女兒的騷擾。在交給法官的一份起訴書中，我詳細敘述了警察破門而入並對津齊進行恫嚇之事。法官裁定，津齊可以正常地接待來訪者。

溫妮是一位活動能力很強的女性，在一段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她贏得了村民們的信賴，其中包括附近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在一家慈善機構的幫助下，她向村民們提供了食品，為村民的孩子們開辦了一個托兒所或幼兒園，她還籌集資金創辦了一家診所，當地的人們從

前很少有機會去看病。

一九七八年，我與溫妮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澤尼就要結婚了，她的先生是史瓦濟蘭國王索布扎（Sobhuza）的兒子——塔姆布姆基（Thumbumuzi）。澤尼還在學校時他們就認識了。由於身陷囹圄，我無法盡到父親的傳統職責。根據我們的風俗，新娘的父親必須面見未來的女婿一面，並對他作一個鑒定。他還必須確定彩禮，即新娘的身價，由新郎支付給新娘的家庭。在舉行婚禮的當天，父親把自己的女兒送走。儘管我對這位年輕人沒什麼挑剔的，但我還是讓我的朋友、法律顧問喬治·比佐斯代替我進行了一番考察。我讓喬治問一下，這位王子打算如何對待我的女兒。

喬治在他的辦公室裡與王子見了面，然後來到羅本島見我。由於澤尼還不滿二十一歲，我必須從法律上認可她的婚姻。我在會見室裡見到了喬治，他對會見室裡還站着一位哨兵感到奇怪。我對他解釋說，這是符合管理規定的，因爲他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律師的身份來見我的。我開玩笑似地告訴喬治，對於哨兵而言，我沒任何隱私。

喬治告訴我，澤尼她們兩人相愛很深，我的女婿未來的前程十分光明。他的父親索布扎國王是一個十分開明的世襲領導人，也是一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喬治把年輕人的家庭提出的幾點要求告訴了我，同時也十分惋惜地指出，這個年輕人是史瓦濟蘭王子。我讓喬治轉告王

子，他娶的將是一位滕布公主。

澤尼加入史瓦濟王族家庭之後，帶來了一個極大的好處：她馬上享有了外交特權，實際上她可以在任何時候來看我。在她結婚後的那年冬天，她和她的丈夫帶着剛剛出生的小女兒來看我了。由於王子的地位，我們被允許在會客室裡見面，而不是通常在會客區裡，那裡有厚厚的牆或玻璃把犯人和家人們分隔開。我激動不安地等待着她們的到來。

當她們走進會客室時，我眞的激動了。我站了起來，澤尼一看到我，就把孩子交給她的丈夫，跑過來與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自從她大約有她的女兒這樣大起，我從未擁抱過我的慢慢長大了的女兒。突然地擁抱了自己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眞讓我感慨萬千，時間就像在科幻小說中一樣飛逝而去。隨後我又擁抱了我的女婿，他把我的小外孫女遞給了我，我把她一直抱到了會見結束時。用我這雙粗糙的大手抱住如此嬌嫩柔弱的嬰兒，眞是莫大的歡樂，我這雙手長期以來只能觸摸鋤頭和鐵鏟。我認爲，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我那天抱着我的外孫女時激動、高興。

這次來訪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即請我爲孩子取個名字。外祖父取名是一種慣例，我給他取名『扎基韋』（Zaziwe），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希望』。這對我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儘管我已在獄中被關押了多年，但希望一直存在於我的心中——從現在起，它還將永遠存在下

去。我相信，這個孩子屬於南非的新一代，對他們來說，種族隔離制度只是一個遙遠的記憶。這就是我的夢想。

八十三

我不知道這是預示着索韋托起義後又將在獄中發生一場騷亂，還是預示着獄外我的家庭生活將發生分裂，自一九七六年起的一、兩年裡，我一直處於愛空想、愛戀舊的狀態。在監獄裡，一個人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憶過去，記憶既是朋友又是敵人。我的記憶給我帶來的既有莫大的歡樂也有無限的悲傷。我做夢的內容十分豐富，我好像要靠對過去的曲折經歷的回憶來熬過這漫漫長夜。

我有一個反覆出現的惡夢。在夢中，我剛剛被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但並非羅本島，而是在約翰尼斯堡。我走出牢門來到城裡，竟沒有碰到一個人。實際上，城裡什麼都沒有，沒有人，也沒有汽車和出租車。我決定步行回索韋托去。我走了好長時間才來到奧蘭多西區，找到了八一一五號房子。我終於來到了我的家，但家中空空蕩蕩，好像已經被廢棄好久了，所有的門窗都打開着，裡面一個人也沒有。

但並非所有的夢都是如此地可怕。一九七六年，我寫信向溫妮講述了一個令人高興的夢。

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裡，我做夢來到八一一五號房子，看到許多年輕人正在裡面跳着搖擺舞。當我突然走進來時，他們大吃一驚。有些人熱情地向我問候，而有些人則面帶羞愧地走開了。我發現臥室裡也同樣擠滿了親人和朋友。你躺在床上，我的兒子馬克加索看起來仍很年輕，面朝牆壁已經睡着了。

也許是在那場夢中，我回憶起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兩個星期，當時馬克加索只有六歲，我就是在這間屋子裡與馬庫魯（溫妮的媽媽）告別了。當時，馬克加索與他的母親住在奧蘭多東區，但在我回來之前就和馬庫魯住到一起了，他睡在我的床上。他十分想念我，睡在這張床上或許能稍微緩解一些他的思念之情。

在因回憶過去的美妙時光而感到高興的同時，我也因自己經常不在家而給家人帶來的痛苦而悔恨。下面是一九七六年時寫的一封信。

當我在二月二十五日早晨醒來時，我正像往常一樣又思念起了你和孩子們。這些天來，我越來越感到你像是我的姐姐和媽媽，你是我的良師益友。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是多麼地想念你，我經常在心中想像你的體態和風采——你每天對我關懷得無微不至，面對巨大的壓力

卻不畏縮，如果換成另外一個女人，也許早已灰心喪氣了。我甚至回想起，當你懷了津齊之後，身子極爲笨重，但還是費力地剪了自己的指甲。現在想起這些事來我有些愧疚。本來我應該幫助你的。不管我是否意識到了這些，我當時的看法是：我已經盡到了我的責任，第二個孩子就要降生了，作爲一個女人，你現在所面臨的困難只能由你自己去克服。我心中唯一的安慰是當時正在過着一種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的生活。現在我在想，如果我回到家之後，應該做些什麼？……

當我寫這封信時，你那美麗的玉照就掛在我的左肩上方兩英尺的地方。我每天早晨都要仔細地擦去上面的灰塵，因爲這樣做會給我一種我正在像往常一樣愛撫你的感覺。我甚至用我的鼻子去碰你的鼻子，以重新感受過去那種遍佈全身的銷魂奪魄的感覺。諾麗莎（Nolitha）就站在我桌子的對面。在你們兩人脈脈含情的目光的注視之下，我的情緒怎麼會低落呢？

諾麗莎並不是我們家庭中的一員，但我有她的照片。在一九七六年寫給我的女兒津齊的另一封信中，我公開了她的身份。

順便說一句，你媽媽向你講述過諾麗莎的事嗎？她是來自安達曼群島的一位難友。她把

你、澤尼、恩迪恩迪（Ndindi）和南迪（Nandi）、曼德拉、梅基（Maki）和你媽媽都當作是朋友。而你媽媽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卻太淺薄了，簡直令人吃驚。她認爲諾麗莎的美貌對她構成了威脅，甚至還懷疑我爲什麼保存諾麗莎的照片。

我不斷地思考，我什麼時候才能獲得自由？我反覆地設想我應該做些什麼。這是打發日子的一個好辦法。一九七六年，我再次把我的夢想寫到了紙上。

我眞希望我能夠開車帶你去遠遊，就像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那天一樣；不過，這次有點不同，我希望只有我們兩個人。我離開你太久了，我回去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着你離開那空氣污濁的房間，我小心地握着方向盤，你伴在我身旁。你可以盡情地呼吸那清爽的空氣，觀賞南非那迷人的風光，那青草，那綠樹，那五顏六色的野花，那波光粼粼的溪流，還有那在草地上吃草的大小動物。我們還可以與沿途遇到的普通百姓交談。我們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溫妮的母親和父親的墓地，我希望他們在九泉之下能夠相依爲命。接着，我便可以向那些曾爲我獲得今天的幸福與自由而做出過貢獻的先輩們致敬。或許由此開始給你講起那些我多年來很想講給你聽的故事。故事的氣氛緊張，你或許會樹起耳朵屏息聆聽，而我則不得不將話題轉向那些有趣的，能夠給人以啓發並能催人奮進的一面，然後，我們停下來休息一會

兒，接着繼續前進。下一站要到我父母的墓地。那裡的環境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想，至此，我們會神清氣爽，勁頭十足。於是，我們便驅車返回八一一五號我們的家。

七十年代初，當局開始允許我收存近親的照片，於是，溫妮送給我一本相簿。每當我收到溫妮和子孫們的相片後，我都十分仔細將它們擺放到相簿中。我十分珍視這本相簿，因爲每當我思念親人時，這本相簿能給我一點慰藉。

然而，在獄中，任何一項特權的取得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儘管我獲准收存相片，但是，看守們常常搜查我的牢房，並沒收溫妮的相片。不過，後來他們不再搶我的相片了，於是，我的相簿越來越厚，全家人的相片均在其中了。

我已不記得是誰最先向我借相簿去看，但肯定是我們牢房中的一個。我很樂意借給人看，於是便不斷地有人來借。很快，許多人便知道我有一本相簿，以至F區和G區的囚犯也提出要借。

F區和G區的囚犯們很少有人來探視，收到的信也少得可憐。我的相簿可以成爲他們眺望這個世界的窗口，如果拒絕他們的要求，那就顯得太吝嗇了。但是，不久我發現，我的那些珍貴的相片出現了破損和污跡，其中有許多不可多得的相片不翼而飛了。這些囚犯們渴望在自己的牢房中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物品，但他們很難如願。每當發生了這種情況，我都下決

心將我的相簿重新充實起來。

有時人們乾脆跟我要相片而不是借相簿。我記得有一天，一位給我們送飯的普通牢房區的年輕人把我叫到一邊，小聲說：『曼德拉，我想跟你要張相片。』我說：『好，我會給你一張。』他迫不及待地問：『什麼時候？』我回答說本周末就就會給他。他似乎很滿意，轉身便離開，但剛走幾步又突然折回來，說道：『喂，別給我老太太的相片。給我一張年輕姑娘的相片，津齊的或澤尼的都可以。記住：不要老太太的！』

八十四

一九七八年，在我們爭取了獲得新聞的權利近十五年之後，當局採取了一種妥協辦法。他們不是允許我們看報紙、聽收音機，而是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新聞廣播系統，每天通過監獄內部通訊系統廣播新聞摘要。

這種廣播嚴重缺乏客觀性和廣泛性，只是由島上的幾名審查官從收音機每日播送的新聞中摘出幾則短訊加以編輯而成。廣播的內容，有關政府的，都是好消息；有關政府反對派的，都是壞消息。

這一廣播系統播送的第一則消息是羅伯特·索布克威去世。最初播送的其它新聞主要內容是：伊恩·史密斯的部隊在羅得西亞取得勝利，反政府份子在南非被捕。儘管這些新聞具

有明顯的傾向性，但能聽到這些我們就感到很高興了。我們能夠根據明顯的刪略內容作高水平的猜測，能夠從字裡行間讀出言外之意，我們對自己的這種能力頗感自豪。

那一年，我從這個內部通訊系統獲悉，P．W．鮑塔取代約翰．沃斯特（John Vorster）而當選總理。不過，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沃斯特是由於情報局濫用政府資金的醜聞被新聞界曝光而引咎辭職的。對於鮑塔，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他曾是一位富有侵略性的國防部長，他曾於一九七五年支持過一次入侵安哥拉的軍事行動。我根本沒有想到他將會成為一位改革者。

最近我讀到一本經本人認可的《沃斯特傳》（這本書監獄圖書館中有），發現他是一個敢做敢當的人。二戰期間，他曾因支持德國而入獄。對於沃斯特的下臺我們並不感到遺憾，因為是他使對自由的鎮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即使不靠監獄那經過刪節拼補而湊成的廣播新聞，我們最終也能得到當局不想讓我們知道的消息。我們知道，一九七五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解放鬥爭取得勝利，建立了獨立國家，組成了革命政府。歷史的潮流正向我們滾滾湧來。

隨着該島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們現在擁有了我們自己的電影院。在我們的走廊盡頭有一個大房間，在牆上掛一塊被單作銀幕，這便是我們的電影院。我們幾乎每周都到那裡去看電影。後來，我們有了一塊標準的銀幕。看電影是我們的一大消遣，可以使我們暫時忘卻監獄

生活的淒涼。

最初看的都是些好萊塢無聲黑白電影和美國西部片，這些影片古老得超過了我的歲數。我記得最初看的電影中有一部叫《左羅》，是由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主演的，拍攝於一九二〇年。當局似乎偏愛歷史片，特別是那些有某種教育意義的歷史片。稍後，我們看的電影有了色彩，也有了聲音，其中有：由查爾頓希斯頓（Charlton）飾演摩西的《十誡》，由尤伯連納（Yul Brynner）主演的《國王和我》以及由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和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主演的《埃及艷后》。

我們對《國王和我》非常感興趣，因爲在我們看來它描寫的是一種東西方價值觀的衝突，似乎可以看出，西方曾向東方學習了不少東西。影片《埃及艷后》頗引起我們的爭論。我們許多同志對由一個黑髮紫眼的美國女演員飾演埃及王后提出異議，儘管這位演員長得很漂亮。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爲，這部影片是一種典型的西方宣傳，旨在抹殺克婁巴特拉是位非洲女子這一事實。我對他們說，我到埃及時曾看到過一尊精緻的克婁巴特拉雕像，她年輕俊秀，皮膚烏黑。

後來，我們也可以看到由我們早已熟悉的黑人明星主演的南非國產片。晚上放電影的時候，每當銀幕上出現我們的一位老朋友的身影時，我們那間臨時的電影院便會淹沒在一片叫

喊聲、口哨聲和歡呼聲之中。再到後來，我們便獲准選些紀錄片來放。我很喜歡看紀錄片，因此對那些傳統片就不大熱心了。（對於有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參演的影片我是每場必看的。）紀錄片是由國家圖書館撥給的，通常由我們這個牢房的圖書管理員艾哈邁德·卡特拉達挑選放映，其中特別使我感動的一部紀錄片是關於二戰時海戰情況的，其中有一段紀錄了『威爾士王子』號被日軍擊沉時的情況。最令我感動的是這樣幾個鏡頭：溫斯頓·邱吉爾聽到英國這艘艦被擊沉的消息後淚水奪眶而出。這一畫面在我的腦海中久久難以消逝，它使我懂得：一個領袖有時也會在公衆面前顯露悲傷，而這絲毫無損於他在其人民眼中的形象。

我們還看了這樣一部紀錄片，它描寫的是美國一個頗引起爭議的摩托車組織『地獄天使』的情況。影片將『地獄天使』描繪成一股肆意妄爲、野蠻成性的反社會勢力，而把警察描繪成一種大方、正直和令人信賴的形象。看完影片後，我們立即對它進行了討論。幾乎所有的人都對『地獄天使』無法無天的行爲提出了批評。但這時斯特里尼·莫德利（Strini Moodley）突然站起身來。他是一名『黑人覺醒運動』的成員，年輕聰明。他指責『地獄天使』這個組織脫離當今時代，並說這些摩托車手實際上相當於一九七六年奮起反抗當局的索韋托學生。他指責我們是上了年紀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影片中的右翼當局一邊，而不是與摩托車手們站在一起。

斯特里尼的指責引起一場激烈爭論，許多人起來駁斥他，他們認爲『地獄天使』的行爲是不可寬恕的，把這種缺德的反社會組織與我們的鬥爭相比是對我們的侮辱。斯特里尼的話也引起我的思考，儘管我不能苟同，但我還是起來爲他辯護。儘管『地獄天使』冷酷無情，但他們畢竟是對當局的反叛者，只不過他們是些令人討厭的反叛者而已。

我對『地獄天使』並不感興趣，我所關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像斯特里尼所說的那樣思想停滯，不再具有革命性了呢？我們已在監獄度過了十五年以上；我本人已度過了近十八年的牢獄生活。我們入獄時的那個世界早已遠去了。如果我們的思想變得僵化了那將是很危險的。世界是波濤洶湧的汪洋，而監獄則如一潭死水。世界在前進，而居於監獄的人則往往會停滯不前。

我總是力圖隨時接受新思想，從不因其新奇、因其與自己的思想相悖而予以排斥。來到這座小島之後，我一直在對我的信仰和主張進行反覆的推敲。我不斷地在心中對他們進行辯護，提出質疑，然後加以完善。我認爲我們沒有停滯不前，我堅信我們也在前進。

儘管羅本島越來越開放了，但是，迄今並沒有跡象表明政府在改變他們的觀點。儘管如此，我還是堅信，總有一天我會獲得自由。儘管我們身陷囹圄，但我堅信世界正向我們走來，而並沒有離我們而去。那部影片再次提醒我，在我將來走出監獄時，不能讓人覺得我是久遠年代遺留下來的一具僵屍。

一九七九年，當局通過內部通訊系統宣佈，從即日起，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囚犯的伙食待遇統一。我們爲達此目的爭取了十五年之久！但是，恰如廉者不食嗟來之食，這項改革拖得這樣久，施捨得這樣不情願，因此，幾乎不值得我們爲之慶賀。

早上所有囚犯都將得到等量的食糖：一匙半。但是當局不是簡單地增加非洲囚犯的定量，而是在增加非洲囚犯定量的同時，將有色人和印度人囚犯的定量減少了半匙。在此之前，非洲人囚犯早上已能得到麵包，因此在這方面沒有多大區別。我們共享麵包已有幾年的時間了。

兩年前我們的伙食就得到了改善，不過這倒不是當局發慈悲。索韋托起義後，當局便決定將羅本島變成南非『安全囚犯』專有的家。於是，普通囚犯的人數大大減少了。結果，首次開始調用政治犯到廚房做飯。政治犯一進廚房，我們的伙食大大改善。這倒不是因爲他們的手藝高，而是因爲自此以後偷拿食物的畢竟不見了。新廚師們既不自己貪嘴，也不去賄賂看守，他們將撥給我們的食物全部用在我們身上。蔬菜比前多了，湯和菜中也能見到大塊的肉了。這時我們才意識到，這些年來我們應該吃到的恰恰是這種食物啊！

八十五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在院子裡打網球。我的對手猛然打來一個長綫球，我盡力去接，但

就在我向場地另一側跑去時，我感到右腳後跟一陣劇痛，球是打不了了。隨後幾天，我走路只能一瘸一拐的。

島上的醫生爲我作了檢查，他說我應到開普敦去找專家診治。當局對我們的健康開始重視起來，因爲他們擔心如果我們死在獄中，他們將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在正常情況下我和其他人肯定都喜歡到開普敦去，但以囚犯的身分前去情況就迥然不同了。我手戴手銬登上了一艘船，幾個武裝看守將我圍在船上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裡。海面上波濤洶湧。我們的船不停地搖晃。在半途中我便想到我們有葬身大海的危險。我向四周偷偷瞧了瞧，見在兩個看守的身後有一件救生衣，從年齡來看，這兩個看守只夠作我的孫子。我心中暗想：『如果船翻了，我就寧可犯下平生最後一個罪行，跑到那兩個孩子的身後把那件救生衣搶到手。』但是，最終只是虛驚一場。

碼頭還有一些武裝衛兵在迎接我們，另外還有一小群市民。市民們見一個囚犯從他們的身旁走過都露出驚恐和厭惡的神色，對於一名囚犯來說見到這場面眞感到羞辱。我本想低頭躲閃過去，但又覺得那樣做不妥。

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爲我進行診斷，他問我以前我的腳後跟是否受過傷。事實上我在黑爾堡時腳後跟曾受過傷。那是一天下午，我在踢足球。在我試圖搶球的時候感到腳後跟一陣鑽心疼。於是，我被送進本地一家醫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醫院看病。在我小時候生活的

那個地方，沒有黑人醫生，而要去找白人醫生看病則是件聞所未聞的事。

在黑爾堡的那位醫生檢查過我的腳後跟後說，他需要給我動手術。他這一診斷使我吃了一驚，我魯莽地對他說：『你不要碰我！』那時候，我認爲找醫生看病是沒有男子漢氣概的表現，而要動手術就更不必說了。那位醫生說：『隨你的便吧，不過，等你老了這病會來找你的麻煩。』

開普敦的這位外科醫生爲我的腳後跟作了X光透視，結果發現裡面有碎骨，或許自我在黑爾堡時碎骨就在裡面。他說他可以動手術將它們取出，手術在他的診療室就可以進行，只需局部麻醉。我立即表示同意。

手術進展順利。做完手術後，醫生又對我講了一些有關腳後跟的注意事項。爲首的看守突然打斷了他的話，說我必須立即返回羅本島。醫生被他的話激怒了，他十分威嚴地說，曼德拉先生必須在醫院裡住一天，並說無論如何他不能放我走。這名看守被鎮住了，於是默許了。

在這家正規的醫院中我十分愉快地度過了第一個夜晚，護士們對我關懷備至。我睡得很香甜。早上，一群護士走了進來，對我說我可以把發給我的睡衣褲和長袍帶走。我對她們表示感謝，並說這一定會使我那些同志們羨慕不已。

這次開普敦之行使我受益匪淺；在醫院中我真切地感到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在解凍。

醫生和護士們很自然地對待我，就好像他們生來就這樣平等地對待黑人一樣，這是我的一個新發現，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跡象。這再次證明了我長期堅持的一個信念：教育是偏見的剋星！這些男人們和女人們掌握着科學，而科學與種族主義思想是不相容的。

我唯一的遺憾是在去醫院前未能告知溫妮。於是報刊上謠言四起，說我正在死亡綫上掙扎。因此，溫妮寢食不安。我出院後便給她去信，以消除她的憂慮。

一九八〇年，我們獲得了購買報刊的權利。這是我們的一次勝利。但是，事情總是這樣，任何一項新的特權都有其不足之處。這項新規定提出，每一組囚犯每天可購買一種英文報紙和一種南非荷蘭文報紙。但討厭的是其中有這樣一條限制：任何一組的囚犯若被發現與另外一組的囚犯交換各自的報紙看，則他們將失去購報權，我們對這項限制提出抗議，但無濟於事。

我們得到了兩份日報：《開普敦時報》和《公民報》，都是保守派報紙，特別是《公民報》。然而，監獄的審查官們每天都手持剪刀瀏覽那些報紙，發現他們認爲不宜於讓我們讀的文章便剪下。等送到我們手上時，報紙已千瘡百孔了。於是，我們便通過《星報》、《蘭德每日郵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來彌補這一缺憾，不過，以上這些報紙甚至會受到更嚴格的審查。

一九八〇年三月的《約翰尼斯堡星期日郵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爲《釋放曼德拉！》的文章，當然，當時我是無法讀到它的。其中有一份請願書，要求釋放我及與我一同坐牢的政治犯，人們可以在上面簽名。報紙上仍不准登載我的照片、我的講話和我的文章，但是，這家郵報發起的這一運動使得我們的釋放問題成爲公衆談論的話題。

這一想法是由在盧薩卡的奧利佛和非洲民族議會提出的，這一運動是一項新策略的基石，這一策略的目的是使我們的事業在公衆的心目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非洲民族議會決定，將爭取我們獲釋的要求個人化，即將爭取釋放政治犯的運動集中於一個人身上。毫無疑問，千百萬後來成爲這場運動的支持者的人並不十分淸楚納爾遜·曼德拉是何許人。（我聽說在《釋放曼德拉》的招貼出現在倫敦街頭時，大多數年輕人都認爲我的教名叫『釋放』。）島上也有少數人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爲把這場運動個人化有悖於非洲民族議會的集體性原則，但是，大多數人明白那樣做是一種喚起民衆的策略。

在此前一年，我被印度授予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nlal Nehru）人權獎，這也表明了我們所進行的鬥爭再起高潮。我當然無法去參加授獎儀式，溫妮也去不了。於是，由奧利佛代我受獎。我已經感到，非洲民族議會正在重新崛起。『民族之矛』正在加強其破壞活動，這種活動進行得越來越老練。六月，『民族之矛』對約翰尼斯堡南部的薩索爾班

（Sasolbung）大型提煉廠實施了爆炸。『民族之矛』針對一些戰略目標每周實施一起爆炸。先後被炸的目標有川斯瓦東部的發電廠，金米斯敦（Genmiston）、戴維敦（Daveyton）、新布萊敦（New Brighton）等地的警察局，以及普利托利亞附近的伏爾特萊克爾胡特（Voortrekkerhoogte）軍事基地。這些都是戰略要地，對它們的爆炸將會引起公衆的關注，並使政府心神不安。在P．W．鮑塔的支持下，國防部長馬格努斯·馬蘭（Magnus Malan）上將實施了一項所謂的『總體戰略』，即國家軍事化，以鎮壓這場解放鬥爭。

『釋放曼德拉』運動的成果不只這些。一九八一年，我聽說倫敦大學的學生提名我爲『名譽大學校長』這一職位的候選人。這是一項異乎尋常的榮譽，要知道，我的競爭對手不是別人，而是安妮（Anne）公主和演員傑克·瓊斯（Jack Jones）。結果，我獲得七千一百八十八張選票，輸給了安妮公主。我給布蘭德堡的溫妮寫信說，我希望這次投票選舉能使她感到她那低矮的小屋頓時變成了一座城堡，那狹窄的房間頓時變得像我們在溫莎（Windsor）的舞廳那樣寬敞明亮。

這場要求釋放我們的運動重新燃起了我們的希望。我們不能忘記七十年代初期的艱難處境，那時，非洲民族議會似乎消聲匿迹了，我們不得不極力克制自己以免陷入絕望的深淵。無論如何，我們是估計錯了。我們曾認爲，到了七十年代，我們便可以生活在一個民主的，

不分種族的南非之中。儘管如此，跨入七十年代以後，我們對於建立那樣一個新南非的希望之火畢竟又重新燃起了。多少個清晨，我邁步走到院子中間，那裡一派生機，海鷗在歡樂地歌唱，小樹擺動着婀娜的身姿，就連那青草也似乎在向我微笑，陽光融融。在世界上這個狹小封閉的角落裡，只是在這一刻我才感到它的美麗，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和我的同志們會獲得自由！

八十六

我的父親曾舉薦我作滕布國國王的顧問，儘管後來我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但我一直努力以我自己的方式承擔起那份責任，實現我求學時的理想。入獄後，我盡力與國王保持聯繫，並盡力向他進言。隨着年紀的增大，我越來越心馳神往川斯凱那青山綠水，儘管我難以指望政府恩准我重返故里，但是，我渴望有一天我能回到一個自由的川斯凱。但是一九八〇年的一個消息令我十分震驚：薩巴塔·達林德耶博國王，這位滕布的最高酋長，被我的侄子，川斯凱國首相K·D·馬坦奇馬推翻了。

滕布的一些酋長要求馬上見我，當局批准了。當局通常很願意這些部族頭領們來探視我，因爲他們認爲我捲入部族和川斯凱事務越多，對這場鬥爭的參與便會越少。

政府提高了部族頭領們的權力，以與非洲民族議會相抗衡。我的許多同志曾勸我不要管

那些部族頭領們的事，但我覺得還是應該給他們幫助。我認爲作一位部族首領與當一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兩者之間並不矛盾。這一問題在島上引起了持續時間很長而且十分棘手的爭論：非洲民族議會成員是否可以參加由政府發起的組織？我們是參加那些組織而會變得更強大呢？還是抑制那些組織而會變得更強大？對此，我認爲我們參加那些組織，而自己會變得更強大。

在探視處一間大房間內我與酋長們見了面，他們向我解釋了他們的困境。他們內心支持薩巴塔，而又懼怕馬坦奇馬。聽了他們的介紹，我要他們支持薩巴塔，反對馬坦奇馬，因爲他是非法而可恥地篡奪了國王的權力。儘管我同情馬坦奇馬等人的處境，但是我不能寬恕他的行爲。我請酋長們回去後轉達我對薩巴塔的支持以及我對馬坦奇馬不予認可的態度。

馬坦奇馬也提出要探視我，與我商談薩巴塔問題及家庭事務。作爲我的侄子，許多年來實際上他一直在要求探視我。儘管馬坦奇馬宣稱要談家庭事務，這種探視將會產生政治後果。在馬坦奇馬提出探視要求後，我將此事提交『最高機構』及我們牢區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討論。有些人乾脆聳聳肩道：『他是你的侄子，他有探視的權利。』不過，雷蒙德、戈萬和凱西則堅持認爲，儘管這種探視可以拿家庭事務解釋過去，但是，裡裡外外許多人則把它看作是我對馬坦奇馬及其政策的支持。正是由於這一原因馬坦奇馬才要求來探視，也正是由

於這一原因這種探視才是不能接受的。

對他們的意見我理解，並且基本上贊同，但是，我還是想見我的侄子。我一直或許是過份地重視面對面的會談，並力圖在這種會談中去說服對方改變觀點。我也希望能夠說服馬坦奇馬改變其政策。

後來，我們牢房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決定不再反對這一探視。爲了體現民主，我們接着又就此問題去徵求F區和G區同志們的意見，而他們都表示堅決反對。G區的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之一史蒂夫·齊韋特（Steve Tshwete）說，這種探視將會在政治上幫助馬坦奇馬，因此決不能同意。他們中許多人指出，馬坦奇馬任命溫妮的父親哥倫布·馬迪齊載拉（Columbus Madikizela）爲農業部長，這就是在尋求我的支持。如果我拒絕見他，則是給他的當頭一棒。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於是，遺憾地通知當局我不接受我侄子的探視。

一九八二年三月，監獄當局通知我說我妻子因車禍住院了。詳細情況他們不清楚，對於妻子現在的情況我更是一無所知。我指責當局封鎖消息，並且緊急要求我的律師來探視我。當局以消息作武器，效果還眞是靈驗。我寢食不安，整日爲妻子的健康擔憂，直到三月三十一日溫妮的律師和我的朋友杜拉·奧馬爾（Dullah Omer）來看我，情況才有所好轉。

聽了杜拉的話，我對溫妮的擔憂很快消除了。原來，溫妮坐的車翻了，但她安然無恙。

我們談話的時間很短，隨後我被帶回牢房，但心中依舊牽掛着溫妮。她有了困難，我卻愛莫能助，我的心中怎能好受？

我剛到牢房不久，監獄長和其他幾個監獄官員來看我。這是異乎尋常的，監獄長一般是不到牢房看囚犯的。見他們來，我站起身來，這時監獄長已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說：『曼德拉，趕快收拾一下你的行李！』

我問爲什麼？

他乾脆地說：『我們要把你轉移到別處。』

『去那裡？』

『不知道！』

我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只是回答說，他已接到普利托利亞方面的命令，要立即將我從該島轉移。接着，監獄長離開了，他又到了沃爾特、雷蒙德·姆漢拉巴和安德魯·姆蘭根尼的牢房，並向他們下達了同樣的命令。

我感到很不安。這究竟是爲什麼？他們要把我們轉移到那裡？在監獄裡你只可對一項命令提出質問，也可抗拒一時，但最終你必須屈服。我們事先沒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毫無思想準備。我在這個島上已經生活了十八年之久，而離開它卻是如此地突然！

我們每人得到了幾個紙箱來裝行李。這幾個紙箱足夠裝下我積攢了近二十年的家當了。只半個多小時我就打點完了。

我們要走的消息傳開，走廊中一片騷亂，但是我們沒有一點時間來與這些與我們朝夕相處這麼多年的同志們正式地說聲『再見』。監獄中哪有什麼禮節！囚犯們之間的友誼在當局看來一文不值！

幾分鐘後我們便登上了一艘渡船，船向開普敦方向駛去。我回頭凝望小島，燈光漸漸遠去，我不知是否能再回來探望它。一個人可以適應各種環境，我已經適應了羅本島上的生活。我在那裡生活了近二十年。儘管那裡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約翰尼斯堡——但是，我已經習慣了那裡的生活。要改變一種習慣是困難的。羅本島儘管有時也令人討厭，但要我離開它，還眞是難捨難分。我們將奔向何方？我心中感到茫然。

船到碼頭，幾個武裝衛兵圍攏上來，把我們塞進了一輛遮蓋嚴密的卡車。我們四人站在車上，周圍一片漆黑。汽車似乎行駛了很久，大概超過了一個小時。我們穿過了一個個檢查哨，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這裡，後門開着，我們摸黑登上一段水泥臺階，穿過幾道大鐵門，來到另一所安全設施。我設法向一名衛兵打聽這是什麼地方。

『普爾斯莫爾監獄。』他回答道。

第十章　與敵談判

八十七

普爾斯莫爾太平監獄位於開普敦東南幾英里處的托凱，地處市郊邊緣，這一帶是繁華的白人居住區，翠綠的草坪上點綴着整齊的房舍。這座監獄掩映在開普敦醉人的景色之中，它北依康斯坦蒂亞堡山，南望數百英畝葡萄園。但這優美的自然風光卻與我們無緣，普爾斯莫爾監獄高高的水泥圍牆擋住了我們的視綫。奧斯卡·懷爾德描述『藍色帳篷』——囚犯們對天空的稱謂——的詩句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只是到了普爾斯莫爾，我才真正體會到那首詩的意境。

普爾斯莫爾具有一副很富現代氣息的外觀，但其原始的底色卻是掩蓋不住的。那些高樓大廈，特別是監獄管理者們住的那些房舍，窗明几淨，散發着濃鬱的現代氣息；但是，囚犯們住的房子卻陳舊而骯髒。除了我們這些人之外，普爾斯莫爾監獄的其他犯人都是根據不成文法被捕入獄的，他們的待遇惡劣。我們與他們被隔離開，區別對待。

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對周圍的環境有了大致的了解。我們四人實際上被安排在監獄大樓的第三層，也是最高一層，房間很寬敞。這一層只住着我們幾個人。臥室整潔而入時，呈長方形，長約五十英尺，寬約三十英尺。另外還有一個單間，內有一個大便池，一個小便池，兩個洗滌槽和兩個淋浴噴頭。臥室內整齊地擺放着四張床，床單枕巾俱全。對於十八年來大半時間蜷縮在石砌地板上一塊薄蓆上熬過一個個漫長寒夜的人來說，眼前的一切眞是豪華之至。與羅本島相比，這裡簡直是一家五星級賓館！

居室前有一塊『L』形露天陽臺，有半個足球場那麼長，我們白天可以踏入那裡。陽臺四周圍着高約十二英尺的白色水泥牆，我們只能仰望藍天，只是從其一角我們能夠隱約看到康斯坦蒂亞堡山的山脊，看得較分明的便是那所謂的『象鼻』處。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有這些，因此，有時我就想，世界如一座冰山，眼前那山之一隅該如冰山露出海面之巔峰吧。

被莫明其妙地突然帶到這麼個地方，眞是令人暈頭轉向。一個被囚之人必須對任何突然變故有心理準備，但要使他對每次變故都泰然處之卻絕非易事。儘管我們現在來到了大陸，但與世隔絕之感卻加深了。對我們來說，我們原先居住的那座島嶼已成爲鬥爭的中心。我們現在只能相互安慰。最初幾周，我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他們爲什麼要將我們轉移到這裡？我們知道，長久以來，當局對我們對年輕囚犯的影響力既恨又怕。但是，原因似乎並非這樣簡單：我們認爲，當局企圖驅除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以使該組織陷入群龍無首狀態。

在這場鬥爭中，羅本島正在成爲一個驅之不散的神話，當局企圖驅逐我們，以沖淡這座島的象徵意義。沃爾特，雷蒙德和我本人都是『最高機構』的成員，但不和諧的是姆蘭根尼也在此列。安德魯不是『最高機構』的成員，也不是該島領導層中的重要人物，不過，我們認爲當局可能並不了解這一情況。他們搜集的有關該組織的情報常常是荒謬可笑的。

我們其中一個推測在數月後凱西來到我們中間時似乎得到了證實。凱西的確是『最高機構』的成員。更爲重要的是，凱西是我們的通信站長，正是依靠他的工作我們才得以與新來的年輕囚犯們溝通情況。

凱西來過幾周以後，一個陌生人又來到了我們中間，此人叫派崔克·馬克貝拉，他不是從羅本島來的。派崔克·馬克貝拉是一名年輕的律師，是開普敦東部的一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他師從德高望重的格里菲思·姆根格律師。格裡菲思·姆根格律師曾出庭爲許多被捕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辯護，不幸的是一年前他在德班附近被暗殺了。馬克貝拉因謀反罪被判刑二十年，他在約翰尼斯堡的第普克龍符監獄發動組織囚犯，掀起陣陣風潮，於是他被從那裡轉移到普爾斯莫爾來了。

起初，我們對這名新成員存有戒心，懷疑他可能是當局安插進來的奸細。但是，不久我們便發現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派崔克聰明、和善而且勇敢，我們與他相處得很融洽。對於他來說，能夠融入一個朝夕相處二十幾年、形成了一套自己頑固生活習慣的老人群體，眞

是難能可貴。

身在高牆之內，我不由得懷念起羅本島那美麗的風光。不過，我們的新家也不乏慰藉之處。首先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便是普爾斯莫爾監獄的食物，可謂精美可口；多年來，一日三餐粥湯充饑，而普爾斯莫爾監獄的伙食卻不同，葷素搭配合宜，宛若盛宴一般。我們還可以閱讀到多種報刊，能夠看到《時代》周刊、倫敦的《衛報》周刊等以前曾被禁止的報刊。這使我們的視野開闊了。我們還有一臺收音機，但只能收到本地臺，而我真正想聽的是英國廣播公司的世界節目。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是看守門午餐休息時間，除了這段時間之外我們可以隨時到陽臺上去。我們也不再被強迫勞動了。在我們住的大屋旁有一間小屋，這裡當作書房，桌椅書架齊全，白天我們可以在這裡讀書、寫字。

在羅本島的時候我只能在自己那狹窄的牢房內進行鍛鍊，但現在我有一個較爲寬敞的活動腰身的場所。在普爾斯莫爾，我五點起床，隨後在我們的公共牢房內進行一個半小時的體育鍛鍊。我通常的鍛鍊項目是原地跑步，跳繩，仰卧起坐，按壓指尖。我的獄友們不喜歡早起，這樣，我的早起習慣便很快使我成爲牢房內頗不受歡迎的人。

來到普爾斯莫爾後不久溫妮便來探視我。我高興地發現探視地點佈置得舒適而富有現代氣息，遠非羅本島可比。面前有一塊大玻璃屏障，可看到探視人的上半身，室內還裝有先進

的麥克風設備，現在交談不必再豎起耳朵細聽了。這面玻璃窗至少給人一種虛幻的親切感，而在獄中，虛幻的想像是一劑安慰藥。

與羅本島相比，妻子和家人來普爾斯莫爾容易多了，而由此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對探視的監督也多了些人情味。通常，溫妮來探視時都是由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監督，此人曾在羅本島上作審察官。我對他並不十分了解，但他熟悉我們，因爲他負責審查我們來往信件。

到了普爾斯莫爾，我對格雷戈里的了解加深了，發現他與一般的看守不同，他平易近人。他很有教養，說話口氣溫和，對溫妮總是彬彬有禮。他從不吼叫『時間到啦！』，而只是說『曼德拉夫人，你們還可談五分鐘。』

《聖經》上說，園圃先於園丁而存在。但是，在普爾斯莫爾情況卻不同，在那裡我種了一塊園圃，侍弄它是我最大的樂趣之一。這也是我逃避高牆圍困的方式。我先對樓頂所有空地進行了幾周的觀察，摸清了各處的日照情況，於是便決定營造一個園子，監獄長批准了我的請求。我要求獄方給我十六個四十四加侖容量的油桶，我將每個桶一截兩半。獄方派人將每個半截桶中裝滿肥沃的土壤，於是，三十二個大花盆便出現了。

我在裡邊種洋葱，茄子，卷心菜，花椰菜，大豆，菠菜，胡蘿蔔，黃瓜，花莖甘藍，甜

菜，萵苣，西紅柿，胡椒，草莓，等等。最多時，我種了近九百株，簡直像個小農場！遠非我在羅本島上的園子可比。

種子有的是我買的，另有一些，如花莖甘藍和胡蘿蔔，是監獄長芒羅准將給我的。芒羅准將特別喜愛這些植物。看守們也送給我一些他們所喜歡的蔬菜種子。另外，我還得到了一些優質肥料。

每天早上，我頭頂草帽，手戴一副粗製手套，在菜園裡工作兩個小時。到了星期天，我就把蔬菜送給廚房，於是犯人們便可美餐一頓。我還將許多蔬菜送給看守們，他們通常用提包將新鮮蔬菜帶走。

在普爾斯莫爾，我們出現的問題並不像在羅本島上那樣產生很大的影響。芒羅准將為人正派，樂於助人，常常不辭辛勞地滿足我們的需求。然而，一些小問題有時會被誇大得不着邊際。一九八三年，有一次溫妮和津齊來看我。我對妻子提到我的鞋太小，夾腳趾。溫妮對此很關心。不久我便獲悉有報導說我的一個腳趾被截去了。由於通訊困難，從獄中傳出的情況常常被外界言過其實。如果當時我能夠打電話告訴妻子我的腳很正常，那麼混亂就可能不會發生。不久，海倫·蘇斯曼獲准來探視，她問到我腳趾的情況。我感到百聞不如一見，於是，便脫下襪子，將腳舉到玻璃窗口扭動腳趾讓她看。

我們曾抱怨牢房潮濕，害得我們常患感冒。後來，我聽說南非的報紙報導說我們的牢房被水淹了。我們要求與其他囚犯接觸，一般我們會提出同樣的抱怨：我們作爲政治犯的待遇得不到完全保障。在我們的牢房內部，難友們之間也存在着自己的小問題。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獲得了某種安慰，這種安慰似乎衝散了心中的所有的憂愁。當時，按照預先約定，溫妮，澤尼和她的小女兒來看我。格雷戈里中士帶着我走向探視處，他沒把我帶到通常的探視地點，而是領我進了一間單獨的房間，房間內只有一張小桌子，未設任何隔離物。他輕聲對我說，當局的態度改變了。那一天即所謂『接觸』探視的開端。

接着，他走出去見我的妻子和女兒，並要求與溫妮單獨談談。格雷戈里把溫妮帶到一邊，溫妮有些吃驚，擔心我可能是病了。但是，格雷戈里卻把她領進了房門，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和溫妮是在同一個房間裡！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多少年啦，我第一次親吻擁抱自己的妻子！這是我千百次夢寐以求的時刻。我恍若身處夢境！我擁抱着妻子，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我們默默無語，只有心跳聲怦然。我不忍撒手讓她離開，但最終還是不得不鬆開了手，我將女兒擁入懷中，接着又將外孫女抱在膝上。二十一年啦，我終於摸到了妻子的手！

八十八

在普爾斯莫爾，我們與外界的聯繫更加密切。我們知道鬥爭正日益激烈，與此同時敵人的鎮壓也在加強。一九八一年，南非國防軍對在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的非洲民族議會辦事處發動空襲，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民族之矛』對開普敦附近尚未完工的科堡核電廠實施爆炸，並在全國許多軍事和種族隔離目標安放了炸彈。同月，南非軍隊再次進攻非洲民族議會駐賴索托首都馬塞盧的前哨基地，殺死四十二人，其中包括十二名婦女和兒童。

一九八二年八月，流亡到馬普托的活躍分子魯斯·福斯特被郵件炸彈謀殺。魯斯是喬·斯羅夫的妻子，她是一位勇敢的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活躍分子，曾坐過幾個月的牢。她性格堅強，富有魅力。我是在智慧大學讀書時第一次遇到她的。從她的死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國家鎮壓這場鬥爭的殘忍程度。

『民族之矛』首次實施的汽車炸彈爆炸發生於一九八三年五月，攻擊目標是位於普利托利亞市中心的一個空軍和陸軍情報機構。這次行動旨在對陸軍對非洲民族議會在馬塞盧和其它地方的基地無緣無故地發動攻擊實施報復，同時這也表明武裝鬥爭已明顯升級。這次行動中有十九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

無辜平民的死亡是一場悲劇，我對有那麼多人死於非命深感恐懼。儘管我對造成的傷亡忐忑不安，但是我知道，既然做出了進行武裝鬥爭的決定，那麼這種意外悲劇是難免的。戰爭本身就意味着失誤難免，但是，爲此要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正是因爲我們淸楚地知道會發生這類事件，因此，我們對做出進行武裝鬥爭的決定持十分嚴肅的態度，而且是在十分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這一決定的。但是，正如奧利佛在爆炸後所說，武裝鬥爭是種族主義政權用暴力強迫我們使用的

政府和非洲民族議會都在運用兩種手段：軍事手段和政治手段。在政治戰綫，政府推行其不折不扣的『分而治之』戰略，企圖將非洲人與有色人和印度人分離開。在一九八三年舉行的全民公決中，白人選民投票支持鮑塔的所謂『三院議會』方案，即在白人議院之外，另設印度人議院和有色人議院。其目的是引誘印度人和有色人參加到這個體制中去，由此將他們與非洲人分離開。但是，鮑塔的方案只是一種擺設而已，因爲白人對印度人和有色人通過的議案擁有否決權。這種做法也旨在愚弄國際社會，使之覺得南非政府正在改革種族隔離制度。鮑塔的詭計沒有得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印度人和有色人選民抵制了一九八四年新議會選舉。

國內廣泛深入的政治運動正在興起，非洲民族議會與這場運動息息相關。在這場運動中建立的一個主要的組織便是『聯合民主陣綫』，我被指定爲該組織的庇護人。成立聯合民主

陣綫是爲了協調針對一九八三年新的種族隔離憲法以及一九八四年首次三院議會選舉而進行的抗議活動。聯合民主陣綫很快發展壯大起來，以至後來聯合了六百多個反種族隔離組織，其中有工會，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學生協會等。

非洲民族議會正在重新贏得民心。民意調查顯示，非洲民族議會的聲譽遙遙領先於其它政治組織，儘管二十五年來它一直遭到禁止。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引起了世人的關注。一九八四年，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當局拒絕將我的恭賀信發給圖圖大主教）。南非政府受到日益強大的國際壓力，世界各國已開始對普利托利亞政府實行經濟制裁。

幾年來，政府已開始對我進行『試探』，最初派來的是克魯格部長，他試圖說服我到川斯凱去。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談判，而是要將我與我的組織隔離開。後來幾次會晤時，克魯格對我說：『曼德拉，我們可以與你合作，但不能與你的同事合作。希望你能理解。』儘管我對此未作答覆，但是，他們現在是在談話而不是在攻擊，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視之爲眞誠談判的序曲。

政府正在謹愼地試探着水的深淺。從一九八四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初，有兩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先後來到我這裡，一位是英國上院議員兼歐洲議會議員尼古拉斯·貝瑟爾勛爵，另一

位是喬治城大學法律教授、曾經擔任過美國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辯護律師的的塞繆爾·達什教授。這兩次來訪都是由新上任的司法部長科比·庫切批准的，此人似乎屬於新派南非歐洲後裔領導人。

我會晤貝瑟爾勛爵的地點在監獄長的辦公室。室內掛着一張鮑塔總統表情凝重的巨幅照片。貝瑟爾長得很胖，性格活潑。我一見到他就拿他那肥碩的身材打趣，一邊握手我一邊說道：『看樣子你該是溫斯頓·邱吉爾的親戚吧？』他哈哈大笑。

貝瑟爾勛爵想了解我們在普爾斯莫爾的情況，我如實相告。我們還談到了武裝鬥爭問題，我對他說，現在該放棄暴力的不是我們，而是政府。我重申，我們針對的是堅固的軍事目標，而不是人民。『我不會指使我們的人去暗殺，比如說，這裡的這位少校。』我指着身旁的弗里茲·範·西特爾特少校說。範·西特爾特少校心地善良，他說話不多，不過，我的話倒使他吃了一驚。

貝瑟爾勛爵走後不久達什教授便來了。我向他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未來非種族主義南非的大致輪廓：那是一個單一的國家，沒有種族家邦；不分種族地選舉中央議會；一人一票。達什教授問我對於政府表示準備廢除禁止不同種族通婚的法律以及其它一些種族隔離的法規是否感到振奮。我回答道：『這是無關緊要的事。與白人婦女結婚那不是我的追求，我也不想到白人的游泳池去游泳。我要的是政治平等。』我坦率地對達什教授說，目前我們還不能在戰

場上戰勝政府，但是我們可以擾亂他們的統治。

較爲保守的《華盛頓時報》的兩名美國編輯的來訪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他們似乎對我觀點沒有多大採訪的興趣，而是急於證明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他們的所提的問題無不帶有這種傾向。我重申我既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恐怖主義者，他們便說：你也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啊，你看馬丁·路德·金就從來不主張暴力。我就對他們說，馬丁·路德·金的鬥爭環境與我們有天壤之別：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憲法保障進行非暴力抗議的平等權利（儘管對黑人仍存偏見）；而南非則不同，南非是一個警察國家，它有一部憲法，但它保障的是不平等，它有一支軍隊，但它對非暴力的回答是武力鎮壓。我對他們說，我現在是名基督教徒，而且將永遠是名基督教徒。我接着說，甚至連基督本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還是得動用武力將那些放債人驅逐出教堂。基督不是一個主張暴力的人，但他別無選擇，只有以武力來驅逐邪惡。我感到我並沒有說服他們。

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鮑塔提出一項溫和的折衷辦法。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一次議會辯論中，這位國家總統宣佈，如果我『無條件地拒絕以暴力作爲政治手段』，則還我以自由。隨即，所有的政治犯便都知曉了這一建議。之後，鮑塔似乎要把我推出來接受公衆的挑戰，他這樣說：『現在曼德拉自由之路上的障礙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自己。』

當局曾預先對我說，政府將提出一項有關我自由的建議，但是，我沒想到那會是在議會由國家總統提出。我記得，這是十年中政府提出的第六個有條件釋放我的建議。聽到那篇廣播講話後，我便要求監獄長讓我的妻子和我的律師伊斯梅爾·艾博速來探視，我要向他們表明我對總統建議的答覆。溫妮和伊斯梅爾已經一周末能來看我了。我同時還致信外交部長皮克·鮑塔，拒絕接受釋放我的條件。另外我還準備了一份對公衆的答覆。在這份答覆中我有許多話要講，因爲鮑塔的企圖是誘使我接受非洲民族議會所拒絕的政策，以此離間我本人與我的同事們之間的關係。我想向非洲民族議會全體成員，特別是奧利佛表明，我對非洲民族議會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我還希望向政府發出這樣一個信息：儘管我拒絕了這項建議——因爲它附帶着條件，但是，我認爲解決問題的道路是談判，而不是戰爭。

鮑塔想讓我承擔暴力的責任，而我則想向世人再次表明，我們只是在以暴力反抗暴力。我想清楚地表明，如果我走出監獄後所面臨的是與我被捕時同樣的環境，那麼，我將不得不重新從事我被捕時所從事的活動。

見到溫妮和伊斯梅爾是在星期五。星期六『聯合民主陣綫』將在索韋托的賈布拉尼體育場舉行集會，會上將公布我的答覆。探視時有幾個我不熟悉的衛兵在場監視，在我剛開始表明我對總統建議的答覆時，一個年輕的衛兵打斷了我的話，警告我只準談私事。我沒有理他，幾分鐘後他叫來一名年長的看守，我對此人感到很陌生。此人開口道：你們必須停止談

論政治！我對他說，我們正在談論有關國家總統建議的國家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阻止我們的談論，他必須得到國家總統本人的直接命令才行。我冷冷地說：『如果你不想打電話請示總統的話，那麼就請不要再打擾我們啦！』他無言以對。

我把事先準備好的講話稿交給伊斯梅爾和溫妮。除答覆政府之辭以外，我還要向『聯合民主陣綫』爲其出色的工作公開表示謝意，同時向圖圖大主教對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祝賀，我說這項獎屬於全體人民。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星期天），我的女兒津齊向歡呼的人群宣讀了我的答覆，在南非全國各地，人們無法從合法的渠道聽到我的講話已有二十多年了！

津齊像她的母親一樣，講起話來感情激昂。她說，本該由她的父親站在這個體育場內宣讀這篇講話。得知我的講話是由我的女兒宣讀的，我感到十分自豪。

我現在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員。我一直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員。我今後仍將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員，直至我生命的最後一息。奧利佛·坦博與我親如手足。近五十年來，他是我最偉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說你們渴望着我的自由的話，那麼可以說，奧利佛的急切心情決不亞於諸位，我知道，爲了我的自由，他願肝腦塗地……

我對政府強加給我的條件感到驚訝。我不是一名暴力主義者，只是在沒有任何其它抵抗

方式的情況下，我們才轉向武裝鬥爭。請讓鮑塔向我們表明他與馬蘭，斯特里多姆和維沃爾德是不同的吧！讓他放棄暴力吧！讓他說他將拆除種族隔離的藩籬吧！讓他解除對人民的組織『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吧！讓他恢復所有那些因反對種族隔離制度而被監禁、被流放的人的自由吧！讓他保障自由的政治活動以便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吧！

我萬分珍視我本人的自由，但是，我更加關心你們大家的自由。自從我入獄以來，已有太多的人倒下了。已有太多的人因對自由的痴戀而備受折磨。對於因失去親人而悲泣的那些寡婦，那些孤兒，那些母親，那些父親來說，我欠着他們的債啊！我要還他們以自由！在這漫長，孤獨的蹉跎歲月中受苦受難的並非唯我一人！我與大家一樣熱愛生活！但是，我不能爲了獲得自由而捨棄我之天賦人權，也不能爲了獲得自由而捨棄人民之天賦人權……

在人民的這個組織仍受到禁止之時，我能夠得到什麼自由？！在因未帶通行證就會被捕的條件下，我能得到什麼自由？！在愛妻仍被流放布蘭德堡的情況下，我獲釋後仍如鰥夫一般，這叫什麼自由？！在只能獲准才得以住在城區的情況下，我的自由何在？！……在我們南非的公民權尚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我又有什麼自由可言？！

只有自由人才稱得上談判。囚徒談何簽約？在我，你們，以及我們的人民還沒有獲得自由的情況下，我不能，也決不會許下任何諾言！我的自由與你們的自由密不可分。我將還你們以自由！

八十九

一九八五年，在一次由獄醫進行的例行體格檢查中，一位泌尿科醫生對我的診斷是前列腺肥大，並建議我動手術。醫生說這是一種常規療法。我與我的家人商議後決定去動手術。

我在嚴密護衛下被送到了開普敦的沃爾科斯醫院。溫妮乘飛機來了，在我動手術前她見到了我。另一位來看我的人卻是我始料未及的，因此感到有些吃驚，他便是司法部長科比·庫切。不久前我曾致信庫切，要求與他會面，以商討有關在非洲民族議會與政府之間舉行會談事宜。他尚未作答覆。那天早上，他突然來到醫院，就像是來看望一位卧病數日的老朋友一樣。他態度謙和而眞誠，我們主要說了一些打趣的話。雖然我對眼前的一切表現出習以爲常的樣子，但心中的驚訝卻是客觀存在的。政府正在緩慢地認識到，他們不得不與非洲民族議會作出某種和解。庫切的來訪便是他們伸出的一束橄欖枝。

儘管我們沒有談政治，但我卻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即我妻子的地位問題。八月，也就是我入院前不久，溫妮曾去約翰尼斯堡接受治療。只有來看我或看醫生時她才有權獲准離開布蘭德堡。在約翰尼斯堡期間，她在布蘭德堡的房屋及後面的診所被人炸毁。溫妮再無安身之所，於是她決定留在約翰尼斯堡，儘管對於她來說這樣做是違法的。最初幾周一切太

平，但後來警察通知她說她在布蘭德堡的房子已經修好，她必須回去。但是，她拒絕回去。我請求庫切允許溫妮留在約翰尼斯堡，不要強迫她返回布蘭德堡。庫切回答說他還不能做出任何承諾，但他肯定會研究此事。我對他表示感謝。

手術後我又在醫院住了幾天，以利康復。出院時，芒羅准將來接我回去。監獄長一般是不來接囚犯出院的，因此我頓生疑竇。

在回去的路上，芒羅准將以聊天的方式對我說：『曼德拉，我們現在不把你帶回你的朋友們那裡啦。』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說：『從現在起你將獨自生活了。』我問他爲什麼。他搖頭道：『我不知道。這是上邊的指示。』這事同樣來得突然，同時令人莫明其妙。

一回到普爾斯莫爾，我便被帶到監獄大樓底層的一間新牢房中。與原牢房相比，現在是連降三級，而且是在樓的另一側。我分得三個房間，另加一間廁所。其中一間用作臥室，另一間連接過道的房間用作書房，另外一間用作鍛鍊室。就監獄來說，這算得上是高級賓館的客房了，但美中不足之處是房間潮濕發霉，而且幾乎見不到陽光。我沒對芒羅准將說什麼，因爲我知道這不是他的決定。要搞清事情的底細還需要時間。

說它是一種新發現也許有點過份，但是，隨着一天天過去，幾周後，我對我所處的新環境有了新的認識。我覺得，這種變遷並非壞事，而是一種機會。我對離開我的同事們而悶悶

不樂，我很懷念我的菜園以及三層頂樓陽臺上那明媚的陽光。然而，一人獨居一室卻給了我某種自由，我決定利用這一時機做一件縈懷良久的事：開始與政府談判。我斷定已經到了以談判推動鬥爭的最佳時期。如果不馬上開始對話，那麼，我們雙方將很快陷入壓制、暴力與戰爭的深淵。獨居給了我一次機會，我可以借此向談判方向邁出第一步。這裡可以避開某種警覺的眼光，否則這種嘗試性的努力可能毀於一旦。

七十五年來，我們一直進行着反抗少數白人統治的鬥爭。我們的武裝鬥爭已開展了二十餘年。雙方傷亡慘重。我們的敵人強大而頑固。不過，儘管他們擁有飛機坦克，但是，他們肯定已經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人類的歷史背道而馳。我們雖居於正義一方，但缺乏力量。我明白，要取得軍事勝利，即使是可能的，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在一場沒有必要發生的衝突中讓千百萬人去送命，這對於雙方來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現在是談判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極爲敏感的問題。雙方都把對話看作是軟弱與背叛。雙方都想使對方先做出重大讓步然後自己才走向談判桌。政府曾一再揚言我們是共產黨的恐怖組織，他們決不會與恐怖主義份子或共產主義份子談判。這便是國民黨的教條。而非洲民族議會也一再聲言，政府是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政府，在政府解除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無條件地釋放所有政治犯並且從城鎮撤出軍隊之前，絕沒有什麼談判可言。

與政府談判的決定意義重大，本來只應由盧薩卡方面做出。但是，我感到談判需要開始

了，而且我已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與奧利佛充分交換意見。我方需要有人邁出第一步，而我重新開始的獨居生活既爲我提供了採取這一行動的自由，又爲這種行動的保密性提供了保障，至少短期內不會走漏風聲。

我現在過着一種很奇妙的獨居生活。儘管我的同事們與我只有三層樓之隔，但他們似乎遠在約翰尼斯堡一樣。爲了見他們，我必須提出正式探視申請，待普利托利亞方面批准後方能如願。要得到上邊的答覆往往要花幾周的時間。如果申請得到批准，我便可以在一個探視地點與他們相會。這的確是一段很新奇的經歷：我的同志們，我的同牢朋友們，現在卻成了我的正式探視者！多少年來，我們朝夕相處，談古論今，時間是那樣充裕；而現在，我們連見一面都要提出正式申請，待批准後方得一見，而且談話還受到監視。

遷入新居幾天後，我便向監獄長提出要見我的那些同事們。於是他給我們安排了一次會面。我們四個人討論了有關將我轉移出來的問題。沃爾特，凱西和雷對把我們隔離開憤憤不平。他們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讓我們重新團聚。但是，我的回答使他們吃了一驚。我說：『喂，朋友們，我想我們不應反對他們的做法。』我說我的新居相當氣派，這或許會爲所有政治犯樹立一個先例。接着我含蓄地說：『壞事或許會變成好事。我現在所處的環境使政府得以與我們接近。』這一解釋並沒有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我知道他們沒有理解其中的含

義。

對於我要做的事我要對任何人保密，不論是我樓上的同志們還是遠在盧薩卡的朋友們。非洲民族議會是一個集體，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來說，政府的所作所爲已使得無法由集體來決定了。我既沒有安全保障也沒有時間來與我的組織來商討這些問題。我也知道，我樓上的同志們可能會譴責我的建議，並使我的倡議胎死腹中。一個領導人往往要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要見機改變方向，因爲他堅信他正在帶領人們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無論如何，萬一出了什麼差錯，我被隔離起來這一事實會給我的組織提供一個藉口：這個老頭孤苦伶仃，與世完全隔絕，他的行爲是他個人的行爲，並不代表非洲民族議會。

九十

遷到新居幾周後，我致信科比·庫切，提出就會談事宜舉行會談。與以前一樣，宛如石沉大海。我又寫了一封信，還是沒有回音。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蹺，同時也感到有些沮喪，我意識到我尚需等待講話的時機。一九八六年初，機會終於來了。

在一九八五年十月於拿騷英聯邦國家首腦會議上，一些國家沒有就是否參加對南非的國際制裁達成協議。主要原因是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柴契爾夫人堅決反對。爲了打破僵局，這些國家決定派一個『知名人士』代表團出訪南非，並隨後提交一份報告，說明制裁是不是促

進種族隔離制度滅亡的適宜手段。一九八六年初，由奈及利亞前軍方領導人奧盧塞貢·奧巴桑喬將軍和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佛雷塞率領的一個七人『知名人士』代表團到南非進行考察。

二月，奧巴桑喬將軍來看我，我們就該代表團的報告要點進行了討論。奧巴桑喬將軍很想安排一次我與代表團全體成員的會見。政府允許了，會見定在五月。在會見我後代表團還將會見內閣成員，我感到這是一次提出舉行談判問題的極好機會。

政府把我與代表團的會見看作是件異乎尋常的事。在會見前兩天，芒羅准將來看我，他還帶來了一個裁縫。這位監獄長說：『曼德拉，我們希望你與這些人物平起平坐。我們不想讓你穿着這身破舊囚服露面，這位裁縫要爲你量量身材，爲你做身合體的服裝。』這位裁縫的手藝眞是高超，就在第二天我就穿上了一套細條紋西裝，十分合體。他們還給了我一件襯衣，一條領帶，一雙鞋，一雙襪子和一件內衣。監獄長對我的新裝束十分讚賞。他微笑着說：『曼德拉，你現在像是一位總理啦，那裡看得出是個囚犯！』

在我與『知名人士代表團』會見時，在場的還有兩位重要的人物：科比·庫切和監獄總長W·H·威廉斯中將。他們倆像那位裁縫一樣，用炯炯的目光在打量我。但是，奇怪的是，會談剛開始他們就離開了。我要求他們留下，我說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但是他們還是

走開了。然而，在他們走開之前，我對他們說：談判的時機到來了，戰爭該停止了，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是該坐下來談談的時候了。

圍繞着有關暴力，談判，我的獲釋及國際制裁等問題，『知名人士代表團』提出了許多問題。一開始我便講明這次談話的前提。我說：『我不是該運動的領袖。領袖是現在盧薩卡的奧利佛·坦博。你們必須去見他。你們可以把我的看法轉告他，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這些看法甚至不能代表被關在這所監獄中的我的同志們的觀點。總之，我贊成非洲民族議會開始與政府談判。』

代表團中許多成員對我的政治觀念以及在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下南非將是個什麼樣子表示關注。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有各種類型，我堅決主張建立一個不分種族的社會。我還對他們說：我信仰《自由憲章》，《自由憲章》提出了民主與人權的原則，這一憲章並不是未來社會主義的藍圖。我說，在未來新南非中，要使少數白人具有安全感，這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

我對他們說，我認爲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有許多是由於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缺乏溝通引起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對話求得解決。

他們問了我許多有關暴力的問題，對此，儘管我不願意放棄暴力，但是，我還是特別強調指出：暴力決不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最終辦法，不論男人還是女人，就其本性來說，都有某

種通過談判求得理解的需要。我重申這些只是我個人的觀點，並不是非洲民族議會的態度，不過，我向他們暗示，如果政府從城鎮撤出軍隊和警察，那麼，非洲民族議會或許會同意中止武裝鬥爭，以此作爲談判的序曲。我對他們說，單單釋放我本人既不能在這個國家消除暴力，也無助於談判的舉行。

代表團結束與我的會談之後，還將前往盧薩卡會見奧利佛並到普利托利亞與政府官員們見面。在我的談話中，我向這兩方面都發出了信息。我想使政府明白，只要條件成熟我們就同意談判；同時，我也希望奧利佛能夠了解我與他的立場是一致的。

五月，代表團準備與我舉行最後一次會見。對此我很樂觀，因爲他們已經完成了盧薩卡和普利托利亞之行，我希望現在已經播下了談判的種子。但是，就在我們預定舉行會談的前一天，南非政府採取一個步驟，使得由英聯邦來賓所營造的那種友善氣氛消散了。就在『知名人士代表團』預定與內閣部長們會見的當天，南非國防軍奉鮑塔總統之命從空中和地面對非洲民族議會在博茲瓦納、尙比亞和津巴布威的基地進行了突然襲擊。這完全破壞了會談的氣氛，因此，『知名人士代表團』隨即離南非而去，我爲促進談判所作的努力再次受挫。

奧利佛·坦博和非洲民族議會號召南非人民起來反抗政府的統治，於是，人民積極響應。動蕩與政治暴力達到新的高潮。群衆怒不可遏，城鎮動蕩不已。國際壓力日益強大。一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二日，政府宣佈實行緊急狀態，企圖借此撲滅抗議的烈火。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祥之兆籠罩着談判。但事情常常是這樣：最淒慘的時刻恰恰是提出一項新倡議的最佳時刻。目前，人們正在尋求一條能夠走出困境的道路。當月，我給監獄總長威廉斯（Willemse）將軍寫了一封極爲簡短的信。信中我只是說：『爲了一件國家大事，我想見見你。』我把此信交給了芒羅准將，那天是星期三。

周末，監獄長通知我做好會見威廉斯將軍的準備，這位將軍將從普利托利亞趕來。這次會見與往常不同。這位將軍不是在探視處與我會談，而是把我帶到了他在普爾斯莫爾的的官邸。

威廉斯是位直爽的人，我們的談話開門見山。我對他說我想見司法部長科比·庫切。他問我有什麼事。我猶豫了片刻，我不願意與監獄官員談論政治問題。但是，我還是坦率地對他說：『我想會見這位部長，以便提出在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進行談判的問題。』

他沉思片刻，說道：『曼德拉，你知道，我不是政治家。我不能談論這種問題，那超出了我的權限。』他停頓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說：『噢對了，司法部長現在開普敦，或許你能見到他。我去找他一下。』

這位將軍給司法部長打了一個電話，兩人交談了一段時間。放下電話，將軍轉身對我說：『部長說：「帶他來！」』幾分鐘後，我們便離開將軍住所，驅車前往開普敦司法部長

的官邸。護衛人員很少，護衛着將軍轎車的只有一輛車。會見來得這樣一帆風順倒使我覺得這次會晤該是政府事先計劃好的吧。事先計劃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嘗試着向談判方向邁出第一步的一次機會。

庫切在其官邸中熱情款待了我，我們坐在客廳鬆軟的沙發上用茶。他抱歉地說：委屈你了，連囚服都沒來得及讓你換下。我與他交談了三個小時，他那老於世故，樂於傾聽的性格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問了一些很有見地、很中肯的問題。從他所提的問題可以看出，他對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的矛盾糾葛瞭如指掌。他問了我許多關鍵性問題，如：在何種條件下我們同意停止武裝鬥爭；我是否在代表整個非洲民族議會講話；我是否想到在未來新南非中要給少數種族以憲法保障。他所提的問題切中了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的要害。

我的回答大多與對『知名人士代表團』的答覆相同。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我發現庫切似乎還想進一步尋求某種解決辦法。他問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我對他說，我想會見總統及外交部長皮克·鮑塔。庫切拿起筆來在一張小紙片上記下了我的要求，並說他將向有關方面反映我的要求。接着，我們握手告別。我被用車送回了普爾斯莫爾監獄一層那間單人牢房。

我的心情格外振奮。我感到政府正急於使這個國家走出困境，他們現在不得不承認：他們必須放棄原來的立場。朦朧之中，我看到一縷晨曦正從地平綫上射來，那是民族和解之

光！

對於這次會面我對任何人都守口如瓶。我希望這一進程能夠秘密地進行。有時需要待既成事實之後，再提出有關政策。我相信，我在普爾斯莫爾和盧薩卡的同志們一旦認眞地審時度勢之後，他們是會支持我的。儘管曙光初照，但事情毫無進展。幾周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庫切那裡杳無音信。我感到有些沮喪，於是又給他寫了一封信。

九十一

我沒有得到科比·庫切的直接答覆，但是，有跡象表明政府在試圖採取另外一種處理方式，他們準備讓我過一種新的生活。就在聖誕節前一天的早餐過後，普爾斯莫爾監獄副獄長高韋·馬克斯（Gawie Marx）中校漫步走進我的牢房，用很隨便的口吻對我說：『曼德拉，你願意到市裡逛一逛嗎？』我一時琢磨不透他的心思，但我覺得無妨點頭稱是，於是他說：『好吧，跟我來！』從我的牢房到大門口有十五道上了鎖的大鐵門，來到門口我看到中校的車在等着我。

我們沿着海濱公路行駛，我感到心曠神怡。我們沒有目的地，只是隨心所欲地在市內繞來繞去。觀看人們的室外活動眞是人生一大快事：你瞧，老人們在曬太陽，婦女們在上街購物，還有人在遛狗。這完全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這種生活對於一個囚犯來說是何等可

望而不可及啊！我像一個遊客來到一個陌生的勝地一樣對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

大約一小時後，馬克斯中校將車停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他問我：『想喝點冷飲嗎？』我點頭同意，於是他便進了商店。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起初，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隨着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我的內心開始躁動起來。二十二年來，我獨自一人在外面而無人看守這還是第一次。我幻想着自己打開車門跳出去，然後跑啊跑啊，一直跑得無影無蹤。我的內心湧起一種逃跑的衝動、我發現路邊有一個小樹林可以藏身。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動，額頭也沁出了汗珠。但是我竭力控制着自己：這種行動爲是不明智的，不負責任的，更不必說危險了。甚至這一切都可能是一個圈套，在誘使我逃跑，不過我現在並不認爲當時那一切是個圈套。不久，看到中校正拿着兩瓶可口可樂在向車這邊走來，這時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原來，觀光開普敦只是一系列遊覽的開始。幾個月後我和中校又出去遊覽，不僅到了開普敦市，而且還參觀了城市周圍的一些名勝，到美麗的海灘漫步，登上涼爽的山峰散心。不久，又有幾個低級軍官獲准陪我同行。我與這些低級軍官常去的地方人稱『花園』，地處監獄邊緣，有一塊塊的小田地，種植着供監獄食用的莊稼。我喜歡到大自然中去，在那裡我可以極目地平綫，看着太陽一步步地爬上我的肩頭。

一天，我與一名上尉去『花園』，我們先在地裡轉了轉，然後便溜溜達達向馬廄走去。

有兩個身穿工作服的年輕白人正在侍弄馬。我走了過去，對其中的一匹馬誇讚了幾句，並對一位年輕人說：『喂，這匹馬叫什麼名字？』這個年輕人似乎很緊張，眼睛並不看着我。接着，他咕噥着說出馬的名字，但不是在向我說，而是在向那位上尉說。接着我又問另一個年輕人他的馬叫什麼名字，他的反應與前一個一模一樣。

兩個年輕人的舉止令我感到奇怪。在回監獄的路上我談起了我對此事的看法。上尉哈哈大笑道：『曼德拉，你還不知道那兩個傢伙是什麼人吧？』我回答說不知道。他於是說：『他們是白人囚犯。以前有白人軍官在場的情況下還從未有黑人囚犯向他們問話。』

有時一些年輕的看守帶我到很遠的地方去玩，去海邊散步，甚至到咖啡廳去品茶。每當到了這種地方，我都盡力觀察是否有人認識我，但是從來沒有。記得我的相片登報離現在最近的一次是一九六二年。

這些遊覽觀光活動對我頗有教益。我看到在我離開的這段時期內人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我們遊覽的主要是白人區，在那裡我發現白人們格外的富有與安逸。儘管國家在動盪，城鎮處於開戰的邊緣，但是，白人的生活卻依然是那樣平和而安寧。他們猶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有一次，一個性格活潑的年輕看守布蘭德准尉把我帶到了他的家裡，並把我介紹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從那時起，我便每年都給他的孩子們寄聖誕賀卡。

儘管我對這些出遊活動十分喜愛，但是我深知，除了讓我散散心之外，當局還有一個目

的。我感到，他們是想使我適應南非人的生活，或許同時還可使我從小小的自由中體會到一些快樂並由此而神往，甚至爲獲得完全的自由而做出妥協。

九十二

一九八七年，我重新開始了與拉比·庫切的接觸。這一年，政府提出了一項具體的建議。同年晚些時候，我與庫切在其官邸舉行了幾次秘密會談。庫切表示政府想指派一個高級官員委員會與我進行秘密會談。庫切說會談情況將隨時向總統報告。庫切本人將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其成員還有：監獄總長威廉斯將軍，監獄局局長法尼·範·德·默韋（Fance Van der Merwe），還有尼爾·巴納德（Niel Barnard）博士——此人曾是一位教師，當時擔任國家情報局局長。這三個人都與監獄系統有關，因此，一旦會談走漏風聲，我們雙方都可以進行掩蓋，我們可以說我們是在談論監獄的條件，沒談別的問題。

不過，巴納德博士列在其中卻使我感到不安。他是類似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南非國家情報局的局長，搜集軍事情報也在他的工作範圍之內。與其他官員會談我可以向我的組織辯解，但是，與巴納德會談，今後我該如何向組織交待。總之，巴納德擔任委員會成員將給會談帶來更多痲煩，阻礙會談的進展。於是，我對庫切說我想先考慮一下這個建議，明天再給他答覆。

這一夜我思前想後，難以入眠。我知道，P·W·鮑塔已經建立了一個叫做『國家安全理事會』的機構，這是一個由安全專家和情報官員組成的一個頗有些神秘色彩的核心機構。據報導，鮑塔成立這一機構的目的是要限制內閣的權限，以加強自己的權力。巴納德博士是這個理事會的關鍵人物，據說他頗受總統的賞識。我考慮拒絕接受巴納德，以此疏遠鮑塔，但我感到這樣太冒險了。如果沒有總統參與，將一事無成。第二天早上，我向庫切表示接受他的建議。

當時我意識到我有三件要事要做：首先，在我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之前我要試探一下三樓上我的同志們的態度；其次，我要與在盧薩卡的奧利佛取得聯繫，轉告他這裡發生的事；最後，我想向P·W·鮑塔提交一份備忘錄，以向全國人民表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我所持的觀點以及非洲民族議會的立場。這份備忘錄將成爲以後歷次會談的會談要點。

我提出要會見我的同志們，但使我吃驚的是，當局當即予以拒絕。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認爲這反映出當局對於我與政府舉行秘密談判的前景感到十分緊張。於是我向更高級的官員反映我的要求。最後，我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批准，但條件是我只能一個一個地與我的同志相見，而不能集體會面。

我與他們相見是在探視處。我決定向他們透露一些細節。我想把與政府舉行會談的想法告訴他們，以徵求他們的意見，不過我沒提成立委員會的事。第一個與我見面的是沃爾特。

我對他講了我致信監獄總長及與庫切會見的情況。我說我與庫切談了與政府開始會談的想法，政府似乎對此很感興趣。對此他會怎麼想呢？

沃爾特與我是患難之交。他理智而機敏。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最信賴的朋友，我對他的意見格外重視。我說完後，沃爾特陷入沉思。我發現他面無喜色，至少可以看出他並不熱情。他開口道：『原則上我不反對談判，但是，我本來希望政府首先提出要與我們舉行談判，而不是我們首先向政府提出。

我回答說，既然你原則上不反對談判，那麼誰首先提出來又有什麼關係呢？重要的是談判的結果，而不是談判如何開始。我對沃爾特說，我認爲我們應該推動談判，而不必顧慮誰先敲門。沃爾特見我決心已定，便說他不阻攔我，不過他希望我明白我在做什麼。

第二個與我見面的是雷蒙德·姆漢拉巴。像對待沃爾特一樣，我也把總的情況向他作了解釋。雷蒙德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對我的話沉思良久，隨後抬起頭望着我說：『曼德拉，你一直在等什麼呢？我們本來幾年前就應該開始啊！』安德魯·姆蘭根尼的反應實際上與雷蒙德相同。最後一個來見我的是凱西。他持否定態度。我暗示說雷蒙德與安德魯已表示支持，他對此不以爲然。他的態度比沃爾特還要強硬，他認爲我們首先提出談判就表明我們投降了。與沃爾特一樣，他也說他原則上不反對談判，於我把我對沃爾特講過的話又對他講了一遍。但是，凱西很固執。他認爲我正在走向一條錯誤的道路。不過，儘管他心存疑慮，他

還是表示他不會阻攔我。

此後不久，我的一位律師偷偷帶給我一封奧利佛·坦博的信。他已經聽說我在與政府進行秘密會談，他對此很關注。他說他知道一段時間以來我獨居一室，與我的幾個同志分開了。我想，他一定很納悶：曼德拉這是怎麼了?不過，奧利佛的信寫得簡明扼要：他想知道我在與政府談什麼。他不會認爲我在背叛，但他可能認爲我犯了一個判斷錯誤。事實上他的信中含有這種意思。

我給奧利佛寫了封很簡短的回信，告訴他我在與政府談的一個問題——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在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行委員會與南非政府之間舉行會談。我不想詳談細節，因爲我擔心用這種方式通信會洩密。我只是簡單地說舉行談判的時機已到，我不會做任何有損組織的事。

儘管非洲民族議會呼籲與政府舉行談判已有幾十年了，但以前談判只是一個遙遠的夢。以前只是在理論上考慮談判的問題而這與實際進行談判完全是兩碼事。在回信答覆奧利佛之後，我開始起草一份致P·W·鮑塔的備忘錄。我要使奧利佛也能看到這份備忘錄。我相信，一旦奧利佛及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行委員會見到我這份備忘錄，他們對我誤入迷途的擔心是會減輕的。

九十三

秘密工作組第一次正式會議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普爾斯莫爾監獄管區的一座豪華的軍官俱樂部舉行。我對庫切和威廉斯並不陌生，但範·德·默韋和巴納德博士卻是我先前從未見過的。範·德·默韋溫和而持重，沒有重要的事輕易不開口。巴納德博士看樣子只有三十五六歲，機敏過人，他是一個說話很有分寸而對自己要求嚴格的人，我對此油然而生敬意。

首次會議開得很拘謹，但後來的會議上我們講起話來就顯得輕鬆自由得多了，而且也不那麼拐彎抹角了。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與他們幾乎每周一會。後來，會議開始不定期舉行，有時一月無會，有時又突然每周一會。通常會議是由政府安排的，不過有時我也提議開會。

在頭幾次會議上，我發現，我這些新同事，除了巴納德博士之外，對於非洲民族議會知之甚少。他們都是出生於非洲的歐洲人，均老於世故，他們的思想之開放遠勝於他們幾乎所有的同胞。但是，大量的不實宣傳使他們中毒頗深，因此，糾正他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是很必要的。巴納德博士雖然對非洲民族議會有研究，但是，他所得到的情報大多來自警察部門和情報機構的檔案資料，而這些資料基本上是不準確的，而且帶有搜集整理者的偏見。他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偏見的影響。

我首先概述了一下非洲民族議會的歷史，接着又就那些造成非洲民族議會與政府對抗的基本問題闡明了我們的立場。在作了上述說明之後，我們便集中討論如下關鍵問題：武裝鬥爭，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的聯盟，多數統治的目標，以及種族和解的打算。

首先提出的一個問題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最關鍵的，這就是武裝鬥爭問題。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討論這一問題。他們堅持非洲民族議會必須放棄暴力，停止武裝鬥爭，然後政府才會同意進行談判，我也才能夠會見鮑塔總統。他們的論點是暴力無論如何都是一種犯罪行爲，是國家所不能容忍的。

我回答說，應對暴力負責的是政府，對鬥爭的形成起着支配作用的總是壓迫者，而不是被壓迫者。如果壓迫者訴諸暴力，那麼，被壓迫者也只能報之以暴力。對我們來說，暴力是我們進行自衛的合法方式。我大膽地提出，如果政府決定使用和平手段，那麼非洲民族議會也會使用和平手段。我說：『是該你們，而不是我們，放棄暴力的時候了！』

我想我已提高了他們對這一點的認識，但是，問題很快由一個哲學問題轉向一個現實問題。正如庫切部長和巴納德博士所指出的，國民黨曾一再表示它不會與任何提倡暴力的組織談判，因此，它怎麼能突然宣佈與非洲民族議會談判而使自己信譽掃地呢？他們說：『爲了使我們能夠開始談判，非洲民族議會必須作出某種妥協，以不使我們在我們的人民面前丟臉。』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我對此充分理解，但是我不會給他們指出出路。我說：『先生們，使你們擺脫困境不是我的事。』我乾脆對他們說，他們必須對他們的人民說明，如果不坐下來與非洲民族議會談判，那麼南非就沒有和平可言，南非的局勢就不可能得到解決。我說人們對此是會理解的。

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聯盟的問題幾乎與武裝鬥爭問題一樣使他們感到頭疼。國民黨一直墨守五十年代提出的冷戰理論，認爲蘇聯是一個罪惡的帝國，共產主義是一個惡魔。要從他們的頭腦中清除這種錯誤觀念談何容易！他們堅持認爲共產黨在控制着非洲民族議會，爲了能夠開始談判非洲民族議會必須與共產黨脫離關係。

我首先指出，沒有哪一個自尊的爲自由而戰的戰士會聽命於他正與之戰鬥的政府，也決不會爲了取悅他的敵人而拋棄與自己長期患難與共的盟友。接着我詳細解釋道，共產黨與非洲民族議會是兩個彼此獨立，性質截然不同的組織，它們的近期目標是相同的，即消除種族壓迫，建立一個不分種族的新南非。但是它們的遠期目標是不同的。

對上述問題的討論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與大多數在非洲出生的歐洲人一樣，他們認爲，因爲非洲民族議會中的共產黨員多是白人或印度人，因此非洲民族議會中的黑人受到那些共產黨的控制。於是我指出，非洲民族議會與共產黨曾多次出現政策分歧，而最終還是非

洲民族議會的主張占了上風。但我的這一解釋似乎並沒有打動他們。最後，我氣憤地對他們說：『先生們，你們自以爲聰明，好吧，這裡你們是四個人，我這邊只有我一個人，你們能夠控制住我嗎？你們能夠改變我的意志嗎？不能！那麼，你們怎麼會認爲共產黨能爲你們所不能之事呢？

他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國有化問題。他們堅持認爲，非洲民族議會與《自由憲章》主張對南非的經濟實行全面的國有化。我解釋說，我們主張對某些已經受到壟斷的企業的收益進行更加公平的分配，並對其中的部分企業實行國有化。爲此，我請他們讀一讀我在一九五六年寫的一篇有關『解放』的文章。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自由憲章》不是社會主義的藍圖，而是非洲式資本主義的藍圖。我對他們說我迄今初衷未改。

討論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多數統治問題。他們認爲，如果實行多數統治，那麼少數種族的權利將會遭到踐踏。非洲民族議會將如何保障少數白人的權利？他們想問個明白。我對他們說，非洲民族議會致力於將南非各個種族的人民團結在一起，在這方面，南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組織可與非洲民族議會相比。對此，我請他們讀一下《自由憲章》的序言：『南非屬於所有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不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我對他們說，白人也是非洲人，在未來的任何體制中多數都將需要少數。我說：『我們並不想把你們趕進大海。』

九十四

會談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他們告訴我鮑塔總統計劃於八月底之前會見我。國家仍在動盪之中。政府於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先後兩次實行緊急狀態。國際壓力也在日益加大。越來越多的公司離南非而去。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徹底的制裁法案。

一九八七年，非洲民族議會爲慶祝其成立七十五周年而於年底在坦桑尼亞召開了一次會議，有五十多個國家派代表參加。奧利佛宣佈，武裝鬥爭將進一步加強，直至政府準備就廢除種族隔離制度進行談判。兩年前，在非洲民族議會爲紀念《自由憲章》發表三十周年而於尚比亞的卡布韋舉行的會議上，其它種族的成員首次進入全國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曾發誓，除非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全部得到釋放，否則將不與政府舉行任何會談。

暴力活動仍在蔓延，但國民黨並沒有壯大。在一九八七年五月白人舉行的大選中，民族主義者取得壓倒多數。更爲糟糕的是，自由派的進步聯盟黨被保守黨取代，成爲正式的反對黨，而保守黨是民族主義者中的右派，其競選觀點是：在黑人的反抗面前政府表現得太軟弱。

儘管我對秘密會談態度樂觀，但當時處境是艱難的。最近溫妮來看我，我得知我在奧蘭多西區八一一五號的房子被人縱火燒掉了。那是我結婚時住的房子，我把它看作我的家。我

們失去了許多無價之寶——家庭檔案、相片，紀念品，甚至連溫妮留着等我獲釋後分享的一塊結婚蛋糕也已化爲灰燼。我曾常常這樣想：有朝一日我出獄了，看到那些相片和書信，我便可以重溫過去的時光。但現在，它們已化爲烏有。監獄剝奪了我的自由但是沒有剝奪我的記憶，而現在我感到，在這場鬥爭中，某些敵人甚至連我的記憶都要奪去！

我患了嚴重的咳嗽，有時咳得腰都直不起來，我常常感到疲乏無力，體育鍛鍊也不得不停止了。我一直抱怨牢房太潮，但對此無人過問。一天，我的律師伊斯梅爾·艾博來看我。我們在探視處會面。我感到身體不適，噁心想吐。於是，我被帶回牢房，醫生爲我檢查了一下身體，很快我覺得好些了。不過，幾天後，飯後我正待在上了鎖的牢房中，忽然來了好幾個看守和一名醫生。醫生倉卒地爲我檢查了一下身體，接着一個看守讓我穿好衣服。他們說：『我們要帶你到開普敦醫院。』我發現他們的安全措施嚴密。有一隊轎車和軍車護衛着，隨行的看守不下十二人。

我被帶到了提格堡（Tygerberg）醫院。這家醫院在斯泰棱波什（Stellenbosch）大學校園中，此處是開普敦的繁華區，樹木成行，綠草如茵。後來我發現，當局由於擔心我在一家大學醫院看病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同情，因此採取了特殊的措施，幾乎免去了所有的手續。看守們先進醫院，將在門廳的人淸走，然後我被護送到一層樓上，這裡空蕩蕩的。過道

上有十幾名武裝人員一字排開。

我在檢查室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一位態度溫和的年輕醫生爲我看病。他是這所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檢查了一下我的咽喉，敲了敲我的胸部，取了一些培養液，但一直未表態。最後他才笑着說：『你沒有什麼問題，我們明天就可以讓你出院。』我唯恐耽誤了與政府的會談，因此對他的診斷很高興。

檢查完身體後，醫生問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說願意，於是幾分鐘後，一個年輕護士端着一個托盤走了進來，她是個有色人，個頭很高。眼前突然出現的那麼多武裝衛兵和看守使她驚恐異常，手一抖，托盤落到我躺的床上，茶水四濺。

在衛兵的嚴密保護下我在那間空寂的病房住了一夜。次日凌晨，還沒吃早飯，醫院的內科主任便來看我，他是一位老醫生。他說話乾脆利落，全然沒有前一天那位熱情的醫生那種關心體貼的態度。在未作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他用力敲了敲我的胸部，接着生硬地說：『肺部有積液！』我對他說前一位醫生檢查後說沒有毛病。他似乎有些不高興，說道：『曼德拉，你看看你的胸部！』他指出我的胸一側比另一側大，並說可能有積液。

他叫一名護士取來一根注射器，二話沒說就刺進了我的胸膛，取出一些帶褐色的液體。他說：『你吃早飯了嗎？』我回答『沒有』。他說：『很好，我們要馬上送你到手術室！』

他對我說我的肺中有大量積液，他想馬上將它們抽出來。

進入手術室，給我打了痲醉藥，接下來我只記得在一個房間中我睡醒了，身邊站着醫生。我感到有些頭暈眼花、但醫生的話卻聽得眞眞切切，他說他從我的胸腔中抽出了兩升積液，經化驗發現其中含有結核病菌。他說我的病尙處早期，對肺尙未造成任何損害。他說嚴重的肺結核一般要花六個月才能治愈，不過，我只要兩個月就會痊愈。醫生也認爲我患病可能與牢房潮濕有關。

我在提格堡醫院住了六個星期，接受康復治療。十二月，我被轉到了康斯坦蒂亞堡診所，這家診所在普爾斯莫爾監獄附近，這裡設施豪華，以前還從未診治過黑人病人。我第一天上午去那裡的時候，科比·庫切去看了我。陪他前往的是負責照看我的副監獄長馬雷少校。我們彼此剛寒暄幾句護理員就端來了早餐。

由於我最近患病以及我有高血壓病歷，因此，我的飲食要嚴格限制膽固醇含量。診所的廚房顯然沒有得到醫生的有關指示，因爲我看到早餐托盤中有炒鷄蛋、三片火腿肉、還有幾片塗有黃油的烤麵包。我已記不得已有多久吃不到火腿和鷄蛋了，因此，我現在是垂涎欲滴。但是，就在我將餐叉伸向香氣四溢的炒鷄蛋的一剎那，馬雷突然說道：『且慢！曼德拉，這會違反醫生囑咐！』他伸手要來奪托盤。但我緊握不放，我說『少校，很抱歉。如果

這頓早餐會使我送命，那麼現在就讓我去死吧！』

在我安置到康斯坦蒂亞堡診所之後，我與科比·庫切及秘密委員會的會談又開始了。我在診所時庫切曾對我說，他想使我處於一種介乎監禁與自由之間的狀態。儘管他沒有詳談他的打算，但是我已初步領悟到了他此話的含義，於是我便點了點頭。儘管我不會天眞地認爲他會提出給我自由，但是我知道那是向自由邁出的一步。

診所的環境優雅舒適，實際上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療養的待遇，護士要麼是白人，要麼是有色人，就是沒有黑人。她們對我格外關照，分東西的時候總是多給我，光枕頭就給了我好幾個。她們常來看我，甚至下班後也來。

一次，一個護士來對我說：『曼德拉先生，今晚我們將舉行一個舞會，我們希望你能來參加。』我說很榮幸受到邀請，但是毫無疑問，當局會出面干預的。果然，當局拒絕批准我參加。這下可惹惱了護士們，於是她們決定在我的病房舉辦他們的舞會，她們堅持說她們的舞會不能沒有我參加。

當天晚上，十幾位年輕的女士身着禮服、手持餅乾、飲料和各種禮品來到我的房間。衛兵們似乎感到茫然，不過，他們似乎並不認爲這些活潑的年輕女子會帶來什麼危險。其實，有一個衛兵曾試圖阻止護士們進我的房間，於是我對他嘲諷道：『看到一個老頭子吸引來這

麼多年輕漂亮的女士，你眼紅了吧？』

九十五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初，對我的病房採取的安全防範加強了。執勤的軍官們比平常提高了警惕。某種變化就要發生了。十二月九日晚上，馬雷少校來到我的房間，通知我準備離開這裡。我問：『到那裡去？』他沒有回答。我收拾好行裝，環顧四周，哪些忠實的護士們都到那裡去了？沒有能夠向她們表示謝意，也沒有能夠向她道聲『再見』，我感到很失望。

我們匆匆離去，大約一小時後我們進入了一所監獄，我記得它的名字叫『維克多韋斯特』。維克多韋斯特位於美麗而古老的南非城市帕爾（Paarl），在開普敦的東北方四十英里處，這裡是該省釀造葡萄酒的地區。這是一所有名的模範監獄。我們驅車穿過監獄，接着便駛向一條蜿蜒曲折，破舊不堪的路，路旁荒草叢生，林木茂盛，這裡是監獄的後部。我們一直來到路的盡頭。這裡有一座白色平房，孤零零地臥在那裡。一道水泥牆圍在四周，高大的冷杉樹遮天蔽日。

馬雷少校領我走進屋。裡面有一間寬敞的客廳，旁邊還有一間大廚房，再往裡是一間臥室，面積更大。這裡佈置簡單，但令人感到很舒適。我們來之前這裡沒有打掃過，因此成了昆蟲的樂園。臥室、客廳爬滿了各種各樣奇異的昆蟲，有蜈蚣，蜘蛛，還有許多以前我從

未見過的昆蟲。晚上，我將床上和窗臺上的昆蟲淸除乾淨後便睡下了，睡得十分香甜，這裡，將是我的新家。

第二天早上，我對我的新居巡視了一番，發現在後院有一個游泳池，另外還有兩間較小的臥室。我邁出房門，仰望着一棵棵大樹，頗感爽快，是這些樹爲這座房子帶來了陰涼。這裡簡直是世外桃源。唯一殺風景的是圍牆上安着鐵絲網，大門口有哨兵站崗。即使這樣，這裡還是令人感到心曠神怡。這座房子，不恰恰介乎監禁與自由之間嗎？

下午，科比·庫切來看我，隨身還帶來了一箱開普敦產的葡萄酒以慶祝我的喬遷之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看守竟然帶着禮物來看望他的囚犯！他對我十分關心，急於想知道我是否喜歡這個新家，他在房子的四周觀察了一番，只指出了一點需要改進之處：屋外的圍牆需要加高。他說免得外人看到我。他對我說，在維克多韋斯特的這所房子將是我獲得自由前最後的家。他說，這次遷居的目的是使我有一個保密而舒適的地方，以便舉行會談。

這所房子的確給人一種自由的感覺。在這裡，我想睡便睡，想起便起，想游泳便游泳，想吃飯便吃飯——啊，美妙極了！白天我可以隨意來到室外，高興了便四處走走，這眞是我生活中的一段美好時光！窗戶上不再有鐵柵欄，耳邊也聽不到了那嘩啦嘩啦的鑰匙聲，門都不上鎖，自然也不必開鎖。這一切都令人感到愜意。但是，我沒有忘記：這裡只是一座華麗的牢房。

獄方爲我配了一名廚師，斯沃特（Swart）准尉。他高高的個子，態度溫和，是個生於非洲的歐洲人，曾在羅本島上當過看守。我不記得曾見過他，但是他說他那時曾開車拉我們到採石場去，他有意往坑坑窪窪的地方開以使我們東搖西晃。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那是在調弄你們。』我笑了起來。他爲人大方，性情溫和，不存偏見，對我來說他就像個小弟弟一樣。

他早上七點來，下午四點離開，爲我烹製一日三餐。我的醫生爲我大致規定了飲食要求，斯沃特就按照這一要求爲我做飯。他是個很好的廚師，每天他下午四點回家時，都要爲我備好晚飯，讓我用微波爐熱熱再吃。微波爐這東西我以前還從未見過。

斯沃特准尉會烤麵包，做家釀薑汁啤酒以及各種各樣的其它美味。每當來了客人——我來這兒後客人來得越來越多——他都會準備一桌豐盛的菜肴。客人們總是對這一桌美味讚不絕口，我敢說我的客人中沒有一位不羨慕我有一個這樣好的廚師。後來，當局開始准許非洲民族議會中我的一些同志、『聯合民主陣綫』成員以及『群衆民主運動』成員來看我。有時他們來看我，我便挖苦道：『是爲飽口福而來吧？』

一天，吃罷斯沃特先生爲我烹製的佳餚後，我便去廚房洗碗碟。他制止道：『不，那應該是我做的事。你快回客廳吧！』我堅持說：『我得做點事，你做飯，我洗碗，這不很好

嗎？』斯沃特先生表示反對，但最終還是屈服了。他還反對我早上起來整理床鋪，他說那是他的職責。但是，長期以來我一直是自己整理床鋪，因此，痼習難改。

我們還做了一筆交易。像許多講南非荷蘭語的看守一樣，斯沃特也急於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我也一直想提高我講南非荷蘭語的水平。於是我們達成協議：他用英語對我講話，我用南非荷蘭語回答。這樣，我們各自的弱項都可以得到提高。

我有時也點些菜讓他做。有時讓他做玉米粥和菜豆，我會像孩子一樣狼吞虎嚥。一天，我對他說：『喂，我想讓你給我做點糙米吃。』令我吃驚的是，他竟然問：『什麼是糙米？』斯沃特畢竟年輕，我對他說：『糙米就是未精加工的粗米。戰爭期間沒有白米，我們常吃糙米。』我說糙米比白米更有益於健康。斯沃特不以爲然，不過他還是盡力爲我做了一些。我吃得津津有味。但斯沃特先生對這種飯卻吃不消，他揚言：『如果你還想吃，那你就自己去做吧！』

我本人不喜歡飲酒。但爲盡東道之誼，不免要爲客人們備酒。爲了使客人感到滿意，有時我也呷一口，但我只能喝南非產的半甜葡萄酒，其實這酒甜味很濃。

客人來之前，我就讓斯沃特先生去買一種『尼德堡』葡萄酒。這種酒我以前喝過，是一種半甜的酒。一次，我想請我的朋友和律師吃午飯，他們是杜拉·奥馬爾，喬治·比佐斯和伊

斯梅爾·艾博。我請斯沃特先生去買些『尼德堡』葡萄酒來。我發現在我說此話時他做了一個怪相，於是便問出了什麼事。

他回答道：『曼德拉先生，你總讓我為你買那種酒，而那是一種便宜酒，又不是很好喝。』我提醒他說我不喜歡不甜的酒，而且我相信我的客人也不會有異議。斯沃特先生微微一笑，提出了一項折衷辦法：他出去買兩瓶酒，一瓶是白酒，一瓶是我要買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後問問我的客人們喜歡喝哪一瓶。我說：『好吧！不妨照你說的試一試。』

午餐準備就緒，我與三位客人入座，這時斯沃特手拿兩瓶酒走了進來，他向我的客人們問道：『先生們，你們想喝哪一瓶？』顧不上看我一眼，我的三位朋友一齊指向那瓶白酒。斯沃特准尉笑了。

九十六

與委員會的會談繼續舉行，但如下幾個問題再次使會談陷入僵局：武裝鬥爭，共產黨以及多數統治問題。這些問題一直阻礙着會談的進展。我仍在向庫切提出我要會見P·W·鮑塔。這時當局允許我與我在普爾斯莫爾監獄和羅本島的同志以及在盧薩卡的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初步進行聯繫。儘管我想走在我的同志們的前頭，但我並不想走得太快，以至把他們甩下，變成自己孤伶伶的一個人。

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在普爾斯莫爾監獄中的四個同志來看我。我們就我準備發給總統的備忘錄進行討論。備忘錄基本上是重申我在秘密委員會會議上談話的要點，但我想讓總統直接聽到。

我在三月份發給鮑塔先生的備忘錄中寫道：『南非已經分裂成兩大敵對陣營；黑人站在一邊，白人站在另一邊，彼此相互殘殺，我對這種局面深感不安，毫無疑問，其他許多南非人也與我一樣。』爲了結束這種局面，爲談判奠定基礎，我想就政府作爲談判的前提條件向非洲民族議會提出的如下三項要求談一談我的觀點：放棄暴力、斷絕與南非共產黨的關係，放棄實行多數統治的要求。

關於暴力問題我在備忘錄中指出，非洲民族議會拒絕放棄暴力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事實是，政府仍然不願意與黑人分享政治權力。』我解釋了爲什麼我們不願意拋棄南非共產黨，同時重申我們並不受共產黨的控制。我寫道：『如果一個受人尊敬的人將其終身的朋友拋棄掉以討好他們共同的敵人，那麼，這個人能夠維持他在人民中的信譽嗎？』我指出，政府反對多數統治只是一種拙劣的藉口，其眞正的目的是維護自己的權力。我指出他必須面對現實。『多數統治與國內和平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白人統治的南非將不得不承認，除非實行上述原則，否則將國無寧日。』

在備忘錄的末尾，我提出了談判的粗略架構。

『談判必須解決兩個政治問題。首先是在一個單一的國家中實行多數統治的要求。其次是南非白人對這一要求的顧慮，以及白人提出的提供一種體制上的保障，以避免多數統治成爲黑人對少數白人的統治。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所面臨的最關鍵的任務將是對這兩個方面的立場進行調和。』

我提出，爲此可以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舉行會談，爲談判創造適宜的條件。第二階段即實際進行談判。『我必須指出，我所採取的步驟爲你提供了一個打破目前僵局、使國家政局正常化的機會。我希望你能夠毫不遲疑地抓住這一機會。』

但是，事情還是拖延了一月，P·W，鮑塔患了中風。雖未癱瘓，但身體卻虛弱了，據內閣說，他變得更加暴躁。二月，鮑塔出人意料地辭去了國民黨主席的職務，但仍保留總統職位。這在南非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南非的議會體制下，多數黨領袖即爲國家元首。鮑塔現在是國家元首，卻不是自己政黨的領袖。有人認爲這是一種積極的事態發展：鮑塔想凌駕於『政黨政治之上』，以促使南非發生一種眞正的變革。

政治暴力日益加劇，國際壓力不斷增強。全國各地的政治犯成功地舉行了絕食，迫使法

律與秩序部長同意釋放了九百多名被捕者。一九八九年，『聯合民主陣綫』與『南非工會大會』聯合，形成了『群衆民主運動』，隨後便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不服從運動』，進行非暴力反抗，向種族隔離制度提出挑戰。在國際戰綫上，奧利佛與英國和蘇聯政府舉行了會談，並於一九八七年一月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喬治·舒茲。美國人承認，非洲民族議會在南非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對南非的制裁仍將維持，甚至還要加強。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劇性的一面。由於索韋托的暴力事件增多，我的妻子在城裡活動時就讓一些年輕人作她的保鏢。這些年輕人素無訓練，紀律鬆弛，因此幹了一些與解放鬥爭不相宜的事。其中一個保鏢因謀殺了一個年輕同志而受到審判，我的妻子溫妮也因此捲入了這場官司。這一事件使我感到極爲難堪，因爲在這一迫切需要團結的時刻，上述事件只會給這場運動起分化破壞作用。我完全支持我的妻子，我認爲，儘管她的判斷力欠佳，但她是無可厚非的。

七月，我七十一歲生日那天，幾乎全家人都來到我在維克多韋斯特的寓所爲我祝壽。我能與我的妻子和子孫們歡聚一堂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這是一段難得的快樂時光！斯沃特准尉爲準備這桌酒宴眞可謂超水平發揮。在吃主食前，我放縱孩子們去拿甜食吃，即使在這時斯沃特也並不顯得心煩意亂。飯後，大人們到外間客廳聊天，孩子們便到我的臥室看恐怖錄影

帶。對於我來說，能與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宴飲聊天，這是何等暢快之事啊！只是一想到我已與這天倫之樂闊別多年，未免有些心酸。

九十七

七月四日，威廉斯中將來看我，告訴我次日將帶我去見鮑塔總統。他稱這次會見爲『禮節性拜訪』，並告訴我準備於早上五點半動身。我對這位將軍說，儘管我一直在盼望着這次會見，但是我覺得還是穿上西服、繫上領帶去見鮑塔先生比較合適。（會見『知名人士代表團』時穿的那套西裝早已不見踪影了。）將軍同意了。一會兒，來了一名裁縫爲我量身材。下午我便得到了一套新西裝、一條領帶，一件襯衣和一雙鞋。出發前，將軍又問了我的血型，以防次日發生什麼意外事件。

我爲這次會見做了充分的準備。我重新看了一遍那份備忘錄以及有關的詳細注釋。我盡可能地翻閱了大量報刊，以便掌握最新情況。鮑塔總統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後，F·W·戴克拉克接任，有關兩人彼此勾心鬥角的傳聞不絕於耳。有人或許會說，鮑塔要與我會見，是想搶在其對手前頭行事以邀其功，但這與我何干？我預想了總統會怎樣說，我又該如何回答。在每次與對手會談前，你都要確保把你要傳遞給他的信息準確無誤地傳遞給他。

想到要見到鮑塔先生我感到有些緊張。他享有『大鱷魚』的雅號，對其凶殘的性格我多

有耳聞。在我看來，他似乎是一個典型的老式阿非利卡人，倔強而頑固，喜好向黑人領導人發號施令，而不願坐下來與他們討論問題。顯然，最近的中風只能使他的秉性得以強化。我已打定主意：如果他指着我的鼻子講話，我就會向他指出這種行爲是不可接受的，接着我便起身中止會談。

早上五點半整，維克多韋斯特監獄長官馬雷少校來到我的寓所。他走進客廳，我站在他的面前讓他看我的一身新裝。他繞我一周，搖頭道：『咳！曼德拉，你的領帶怎麼搞的？』坐牢是很少繫領帶的，我記得那天早上我繫領帶時竟然忘了繫法。我盡可能好地打了一個結，僥倖希望別人不會看出破綻。結果還是被馬雷少校識破了。他解開我的領釦，取下領帶，站到我背後，將領帶打了一個蝴蝶結。然後走到我的面前，頗爲得意地欣賞他的傑作，開口道：『好多了！』

我們從維克多韋斯特驅車前往普爾斯莫爾，到了威廉斯上將的家，上將的妻子爲我們準備了早餐。早餐過後，在一小隊護衛的保護下我們驅車前往總統府。我們將車停在一個地下停車場，免得被人看到。總統府古樸而典雅，是十九世紀的南非風格建築。不過，那天我無暇多看它一眼。實際上我是被偷偷帶進總統府的。

我們乘電梯來到一層，到了總統辦公室前的一個門廳，這裡四周鑲着木板，十分寬敞。

我們在這裡見到了科比·庫切和尼爾·巴納德，還有一些監獄官員。關於這次會見我已與科比·庫切和巴納德博士談了許多，他們一再告誡我避免與總統談那些易引起爭論的問題。我們在等待會見時，巴納德博士一低頭發現我的鞋帶沒有繫好，便迅速蹲下爲我繫好。我感到他們的確很緊張，我也不免受到他們的感染。門開了，我走了進去，心中做好了最壞的準備。

P·W·鮑塔從他那寬敞的辦公室的裡面向我走來。他的步伐似乎是經過精確測量一般，因爲我們恰好相會在中央。他伸出手，笑聲爽朗，剎那間，我的戒備渙然冰釋。他始終是那樣謙恭有禮，和藹可親。

我們兩人很快擺好了握手的姿勢，照了一張相，接着與科比·庫切，威廉斯上將和巴納德博士一起圍着一張長桌坐下。茶水端上，會談開始。我們似乎不是在進行一場緊張的政治辯論，而像是在參加一個生動有趣的研討會。我們沒有討論實質性問題，只是談了歷史與南非的文化。我說，我最近在一家阿非利卡文雜誌上讀到一篇有關一九一四年阿非利卡人起義的文章，並且講了他們是如何攻占『自由國』的城鎮的。我說，我認爲我們的鬥爭與那場著名的起義相似。於是，我們圍繞這段歷史插曲談論好長時間。當然，南非的歷史，在黑人的眼裡與在白人的眼裡是迥然不同的。他們認爲，那場起義只是一場兄弟之爭，而我們所進行的鬥爭是一場革命。我說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兄弟之爭，只是膚色不同罷了。

會談持續了不足半小時，但自始至終氣氛友好融洽。就在會談臨結束時，我提出了一個

嚴肅的問題。我請求鮑塔先生無條件釋放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政治犯。只是在這時，會談才顯得有些緊張。鮑塔先生回答說恐怕他不能夠那樣做。

接着我們又簡短地討論了一下如果這次會見的消息洩漏我們該如何應付。我們很快起草了一項溫和的聲明，說我們爲推進國家的和平舉行了一次茶話會。我們對達成一致後，鮑塔先生站起身，與我握手，並說他感到十分愉快。的確，這是一次愉快的會面。我向他表示感謝，接着便順原路返回。

就談判來說，這次會面並不是一次突破，但是，從另外一種意義來說，這的確是一次突破。長期以來，鮑塔先生總在說需要破釜沉舟，採取斷然行動，但這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直到那一天早上在總統府會晤爲止。現在，我覺得這種趨勢已不可逆轉了。

一個多月後，一九八九年八月，P·W·鮑塔在電視中宣佈辭去總統職務。在一篇非常散漫的告別演說中，他指責內閣成員們背信棄義，將他撇在一邊，而去爲非洲民族議會效勞。次日，F·W·戴克拉克宣誓就任總統，並保證要進行改革。

對我們來說，戴克拉克先生曾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他當上國民黨主席時，看起來就是個典型的國民黨黨員，僅此而已。從他的過去看不出一點改革的精神。作爲教育部長，他曾試圖阻止黑人學生進入白人大學。但是，自從他當上國民黨主席以後，我便開始密切注視

他的言行。我讀了他的每一篇講演，聽了他的講話，我開始發現他與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不是一個空想家，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爲變革是必需的，是不可避免的。就在他宣誓就任總統的當天，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要求舉行一次會談。

在就職演說中，戴克拉克表示，他的政府將致力於和平，並且願意與其它任何願意爲和平而努力的組織舉行談判。他就職後，開普敦人民計劃舉行一次遊行，以抗議警察的暴行，只是到了這時，戴克拉克對於建立一種新秩序的承諾才得到證明。這次遊行的領導人是圖圖大主教和阿倫·伯薩克（A llan Boesak）先生。若是鮑塔當政，這次遊行將會遭到禁止，而遊行者將會違抗禁令，因而將會發生暴力事件。然而，新任總統實踐了他的諾言，放寬對政治性集會的限制，允許舉行此次遊行，只是要求遊行者要保持和平。的確，掌舵人換了。

九十八

戴克拉克擔任總統以後，我與秘密談判委員會的會談繼續舉行。憲法發展部長赫里特·維容（Gerrit Viljoen）加入了我們的會談。此人是個古典文學博士，才華橫溢，他的作用就是將會談引向憲法框架方面。我要求政府表現出它的善意，釋放我在普爾斯莫爾監獄和羅本島的政治犯同事以表明其誠意。我在向該委員會提出必須無條件地釋放我的同事們的同時，還保證說，政府可以放心，我的同事們獲釋後是會遵紀守法的。對此，戈萬·姆貝基於

一九八七年底無條件獲釋後的所做所爲便是很好的證明。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戴克拉克總統宣佈，將無條件釋放沃爾特·西蘇魯及我在羅本島的七位同事，他們是：雷蒙德·姆漢拉巴，艾哈邁德·卡特拉達，安德魯·姆蘭根尼，伊萊亞斯·莫特蘇利迪（Elias Motsoaledi），傑夫·梅塞莫拉，威爾頓·姆克瓦依和奧斯卡·姆皮塔。那一天早上，仍在普爾斯莫爾監獄的沃爾特，凱西·雷和安德重來看我，我對他們說『再見！』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知道我的獲釋也爲期不遠了。五天以後，他們被從約翰尼斯堡監獄釋放。這一舉動立即受到國內外輿論的讚賞，我也向戴克拉克先生表示謝意。

我一方面是感激，但更重要的是喜悅，一種發自內心的無與倫比的喜悅——沃爾特他們終於獲得自由了！爲了這一天，多少年來我們朝思暮想，我們奮力抗爭！戴克拉克終於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我的同事們無條件獲釋了。他們能夠代表非洲民族議會講話了。很清楚，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實際上已經失效，這是我們長期鬥爭的結果，這是我們堅持原則的勝利！

戴克拉克正開始有計劃地拆除種族隔離制度這一建築群中的許多設施。他將南非海灘向各種膚色的人開放，並宣佈即將廢止《不同禮節保留法》。自一九五三年起，根據這一法律實行了著名的『小種族隔離制度』，即按種族化分公園、劇院、餐館、公共汽車、圖書館、

廁所和其它公共設施。十一月戴克拉克宣佈解散『國家安全管理系統』。這是一個在鮑塔當政時成立的秘密組織，其任務是鎮壓那些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勢力。

十二月初，我被告知，我與戴克拉克的會談定於本月十二日舉行。這時我已經能夠與我的新老同事們進行磋商了，於是，我便在我的寓所會見我的老同事，會見『群衆民主運動』以及『聯合民主陣綫』的領導人。我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以及來自『聯合民主陣綫』和『南非工會大會』的代表。其中的一位年輕人就是『全國礦工聯盟』的總書記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他是最有才能的新一代領導人之一。另外，我在羅本島上的同事，如特勒爾·萊科塔和托克約·塞克斯威爾（Tokyo Sexwale）也來看我，並與我共進午餐。這二位的胃口頗大，後來我只聽到斯沃特准尉抱怨道：『這些人非把咱們吃窮了不可！』

在許多同事的建議下，我起草了一封致戴克拉克的信，此信與致P·W·鮑塔的信沒有什麼不同。信的主題是要求在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之間舉行談判。我對戴克拉克總統說，目前的衝突使南非流血不止，而談判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指出，非洲民族議會決不接受爲談判設置的任何先決條件，特別是政府提出的如下先決條件：停止武裝鬥爭。政府要求我們做出『對和平的眞誠承諾』，我在此要指出，我們表示願意談判，這便正是我們『對和平的眞誠承諾』。

我對戴克拉克說，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了進行和解的重要性，我對此深受感動。他的講話使億萬南非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感到振奮，人們正期待着一個新南非的誕生。我指出，在和解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就是要徹底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以及一切推行種族隔離的措施。然而，我指出，迄今爲止那篇演說的精神並未得到廣泛的體現。許多人都感到政府的政策是以其它方式繼續其種族隔離制度。我還指出，政府已經花了太多的時間與黑人家邦的領導人以及被該體制吸納的其他人進行談判；然而，我敢斷言，這些人只代表着人壓迫人的過去，而他們是爲廣大南非黑人所不齒的。

我重申了我的建議，即談判分兩步走。我對戴克拉克說，我完全支持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八九年《哈拉雷宣言》中所確立的方針。《哈拉雷宣言》指出，政府有責任消除由自己設置的談判障礙。非洲民族議會提出的要求包括：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對受到限制的組織和個人的一切禁令，中止緊急狀態，從城鎮中撤出一切軍隊。我強調指出，第一步應達成協議，實現停火，消除敵意，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在會見的前一天我將此信寄給了戴克拉克。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我再次被帶到總統府．我與戴克拉克會見的那個房間正是我與其前任飲茶聊天的那間。陪同戴克拉克先生的還有科比·庫切，威廉斯上將，巴納德博士及其同

事邁克·勞（Mike Louw）。我首先對戴克拉克先生當選總統表示祝賀，同時表示希望我們彼此能夠合作。他十分熱情，也向我說了一些祝賀的話。

從一開始我就發現，戴克拉克願意聽我堅持要講的話。這是不尋常的。國民黨的領導人在與黑人領袖們會談時一般只想聽他們想聽的話，而戴克拉克卻不同，他似乎是想認眞地聽，細心地領會。

我那天所強調的問題之一便是國民黨最近通過的一個『五年計劃』，該計劃中提出了『群體權力』的概念。『群體權力』的含義，是任何一個種族群體都不能凌駕於其它種族群體之上。儘管他們把『群體權力』定義爲一種在新南非中保護少數群體自由的一種方式，但事實上，他們的建議旨在維持白人統治。我告訴戴克拉克，這對於非洲民族議會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我進一步對戴克拉克說，保留『群體權力』的概念對他無益，因爲這給人一種印象：他是要使種族隔離制度現代化，而並不是要放棄這一制度。這樣，在南非以及世界各地一切進步力量的面前，戴克拉克及國民黨的形象就要受到損害。我指出對一種壓迫制度，不能只是修修改改，而只能將它徹底拋棄。我還提到了最近在開普敦國民黨機關報《公民報》上讀到的一篇社論，社論指出，提出『群體權力』的概念，旨在試圖以隱蔽的方式挽救種族隔離制度。我對戴克拉克說，連他自己黨的報紙都這樣看『群體權力』概念，那麼，他認爲我們會

怎麼看這一概念呢？我補充說，非洲民族議會進行了七十五年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鬥爭，豈能只滿足於贏得一種經過僞裝了的種族隔離制度？如果戴克拉克的眞正意圖是要通過『群體權力』這一特洛伊木馬來維持種族隔離制度的話，那就證明他並非眞想結束種族隔離制度。

我那天發現，戴克拉克先生一般不對事物做出迅速的反應。他的特點是，他會認眞地去聽我要講的話，而不與我爭論。他對我說：『你知道，我們的目標與你是一致的。你在給鮑塔的備忘錄中說，非洲民族議會與政府應該攜手合作，以解決白人對黑人統治的恐懼問題。而『群體權力』的思想正是爲解決這一問題而提出的。』他的回答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指出，『群體權力』思想給黑人帶來的擔憂遠甚於給白人帶來的撫慰。戴克拉克接着說：『這麼說我們得改變它了。』

接着我提出了我的自由問題。我說，如果他認爲我只是爲了獲釋而出去，那他就大錯而特錯了。我重申，如果我獲釋後周圍的條件與我被捕時相同，那麼，我就會去做那些當初使我被捕入獄的事。我向他建議，目前應該邁出的最佳一步就是，取消對非洲民族議會和其它所有政治組織的禁令，取消緊急狀態，釋放政治犯，允許流亡者回國。如果我釋放了而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仍未解除，那麼，我只好爲一個非法組織工作了。我說：『如果是那樣的話，你也只好在我走出這一道大門後再次將我逮捕了。』

他仍是那樣認眞地聽着我要說的話，當然，我的話並不使他感到驚奇。他說他將認眞考

慮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不過，他目前不會做出任何承諾。這是一次探索性的會談，我明白那一天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這次會談是極爲有益的，因爲我由此看出了戴克拉克是個什麼樣的人，就像我到羅本島後對那些新的監獄負責官員的認識一樣，我可以寫信向我在盧薩卡的朋友們說，戴克拉克似乎代表着一股新派勢力，他與國民黨過去的政客們截然不同。對於戴克拉克先生，我可以借用柴契爾夫人評論戈巴契夫時說的一句話：此人，可與之共事。

九十九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戴克拉克在議會發表演說，在此，他做了一件歷屆南非國家元首均未能做到的事：他眞地開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了，這將爲一個民主的南非的建立奠定基礎。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戴克拉克先生宣佈，取消對非洲民族議會、泛非大、南非共產黨和三十一個其它原非法組織的禁令；釋放因非暴力行爲而被監禁的政治犯；廢除死刑；取消在緊急狀態下實行的各種限制措施。他說：『談判的時刻到來了！』

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時刻！經過這次徹底的行動，他實際上已使南非的局勢正常化。一夜之間，我們的世界變了。四十年來，非洲民族議會受盡迫害，顛沛流離，現在，它終於贏得了合法地位！我和我的同志們，再也不會因是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因舉着非洲民族議會的綠、黃、黑三色旗、因呼喊非洲民族議會的名字，而被捕入獄了！近三十年來第一次，我的

照片、我的言詞、以及我那些也受到監禁限制的同志們的照片和他們的言詞，可以出現在南非的報刊上了！國際社會也爲戴克拉克的大膽舉措而歡呼。儘管喜訊頻傳，但是非洲民族議會仍有不滿之處：戴克拉克沒有徹底取消緊急狀態，沒有命令軍隊撤出城鎮。

二月九日，也就是戴克拉克先生在議會發表演說的第八天，我被告知我將再次前往總統府。我於晚上六點到達那裡。戴克拉克先生在其辦公室中迎候，笑容可掬。我們握手時，他對我說他準備於次日釋放我。儘管南非與世界傳媒幾周來一直在推測說我即將獲釋，但是，戴克拉克先生的上述宣佈還是令我吃了一驚。事前沒有人告訴我戴克拉克先生要見我是想向我宣佈即將還我自由。

我內心感到很矛盾。從感情上講，我恨不得馬上就出獄，但理智告訴我，一接到通知第二天便出獄是不明智的。於是我對戴克拉克先生表示感謝後說，我並非不領情，但我想請你給我一周的時間，以便讓我的家人和我的組織能對我的獲釋有所準備。我說，明天就匆匆出獄，會引起混亂。我請求戴克拉克一周後釋放我。二十七年都熬過來了，再等七天又何妨？

戴克拉克對我的回答顯得有些驚訝。他沒有理會我的話，而是繼續對我談釋放我的計劃。他說，政府將用飛機把我送到約翰尼斯堡，並在那裡正式釋放我。我打斷他的話說，我堅決反對那樣做。我打算從維克多韋斯特監獄的大門走出去，並且向那些照顧過我的人表示謝意，同時向開普敦人民致意。儘管我來自約翰尼斯堡，但是，近三十年來，開普敦一直是

我的家。儘管我想回約翰尼斯堡，但是，什麼時候回是我的事，由不得政府。我說：『一旦我獲得自由，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戴克拉克仍有些猶疑。不過，這回他對我的反對意見作出了反應。他先向我表示歉意，接着便離開辦公室與其他人磋商去了。十分鐘後他回來了，面無喜色，他說：『曼德拉，太晚了，現在計劃不能更改了。』我回答說，這項計劃是不可接受的，我要求在一周後獲釋，而且是在維克多韋斯特，而不是約翰尼斯堡。這時氣氛有些緊張，但當時我們都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諷刺意味：獄方要釋放囚犯，而囚犯卻表示反對。

戴克拉克再次向我表示歉意，然後起身離開了。十分鐘後他回來了，帶來了一個折衷方案：我可以在維克多韋斯特獲釋，但獲釋日期不能推遲。政府已經通知國外傳媒，說將於明天釋放我，他們不能食言。我感到我不能再爭了。最終我們達成了妥協。戴克拉克先生爲我們每人斟了一杯威士忌酒，以示慶賀。我端起酒杯祝酒，但只是作喝酒狀，因爲這種酒度數太高，我消受不了。

臨近午夜我才回到我的寓所。我一回來就把我明天要獲釋的消息通知了我在開普敦的同事們。我設法捎信給溫妮，並給在約翰尼斯堡的沃爾特去了電話。他們將於次日乘飛機前來。當夜，許多非洲民族議會『全國歡迎委員會』成員來到我的寓所，共同起草了一份我將於次日發表的聲明。他們離開時已經是後半夜，儘管我很興奮，但還是慢慢進入了夢鄉。

第十一章 走向自由

一〇〇

二月十一日是我獲得釋放的日子，四點半我就醒來了。當時正值開普敦的夏末秋初，天氣很好。我像往常一樣跑步、洗漱、吃早飯，然後給在開普敦的非洲民族議會和聯合民主陣綫成員打了電話，請他們到我的住處來共同慶祝我獲得了自由。監獄的醫生簡單地爲我檢查了身體。我對獲釋後的前景並沒有太多的考慮，更多地想起了往事。就像生活中經常發生的那樣，某一件事的重要性往往淹沒在許多小事之中。

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有許多東西要討論、決定。慶祝委員會中的許多同志——包括西里爾·拉馬福薩和特雷弗·曼努埃爾（Trevor Manuel）——都早早地來到了，大家都十分高興。原來我打算向帕爾（Paarl）的居民發表演講，在我被關押的這些年裡，他們一直對我不錯，但慶祝委員會卻認爲這樣不太妥當，如果我首先向這些白人講話，別人會感到迷惑的。他們建議我首先向開普敦的居民發表演講。

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將在那裡度過獲釋後的第一夜。我打算在開普敦的黑人和有色人種混居區開普弗雷茲（Cape Flats）過夜，以表明我堅定地與人民站在一起。但我的朋友說，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我應該住到圖圖主教那裡去，那裡是白人區。在我入獄之前，我是不能住在那裡的，我認爲，獲釋後的第一夜就住到高級白人區會給別人一種錯覺。但慶祝委員會的同志們說，經過圖圖主教的努力，他的教堂已是多種族的教堂了，象徵着開放的多種族主義。

監獄向我提供了幾只箱子來裝行李。在我入獄的頭二十年中，我沒有積攢下什麼財產，但最近幾年裡，我的財產——主要是書和筆記——大大增加了。我一共裝滿了六個箱子。

我正式獲釋的時間定於下午三時，但溫妮、沃爾特和其他人從約翰尼斯堡包租的飛機兩點多了還沒到。屋子裡已經來了許多人，整個場面好像是要慶祝一番似的。斯沃特准尉爲我們所有人準備了最後一頓飯，我對他表示感謝，不僅爲過去兩年裡他一直給我做飯，而且爲我們的友誼。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也在屋子裡，我熱烈地擁抱了他。從普爾斯莫爾到維克多韋斯特，這些年裡他一直在照料着我。我們從未討論過政治，但我們彼此心照不宣，他的在場令我感到安慰，可是現在就要離開他了。斯沃特、格雷戈里和布蘭德准尉使我更加相信了人性的重要。我相信：即使是把我關在牢裡達二十七年半之久的人也有人

性。

已沒有時間作冗長的告別了。我們的計劃是溫妮和我坐車到監獄的前門。我曾告訴有關部門，說我想與曾經照顧過我的衛兵和看守道聲再見，我請他們及其家屬在前門等我，在那裡我可以分別向他們致謝。

三點過了幾分鐘，南非廣播公司一位著名的播音員給我打電話，他請求我在大門前幾百英尺下車，這樣他們可以拍下我走向自由的鏡頭。這個要求似乎合情合理，我也就同意了。我頭一次隱隱約約地覺得，事情可能不像設想得那麼順利。

三點三十分，我感到有些坐臥不寧，因爲已經預定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對慶祝委員會的成員說，我的人民已經等了我二十七年，我不想讓他們再等了。四點剛過，我們分乘幾輛車離開了這座別墅。在大門前大約四分之一英里處，汽車徐徐停下，溫妮和我下車，步行向監獄門口走去。

起初，我確實沒弄明白眼前正發生什麼事，但走到一百五十英尺左右時，看到了一種可怕的喧鬧和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幾百名攝影記者、電視記者和其它新聞工作者以及幾千名來表示良好祝福的人。我大吃一驚，也略微有些慌恐，眞沒料到會有這樣的場面；我猜想最多有幾十個人，主要是看守和他們的家屬。但事實證明這只是開端；我認識到我們對將要發生的事情完全沒有準備。

離大門二十英尺左右時，照相機開始咔嚓咔嚓響了起來，聲音好像一大群金屬小動物身上發出來似的。記者開始大聲喊着提問題；電視工作者開始往裡邊擠；非洲民族議會的支持者喊叫着、歡呼着。這是一種幸福的——可以說多少有些讓人眩暈的——嘈雜。當一家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把一件長長的、黑黑的、毛絨絨的東西對着我時，我往後退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住監獄時又發明了什麼新式武器，溫妮告訴我說那不過是個麥克風。

當我站在人群中舉起右拳時，人群中發出一陣咆哮。我已有二十七年不能這麼做了，我一下子感到一種力量和快感在心中洶湧澎湃。我們在人群中只待了幾分鐘，就上了開往開普敦的車。雖然受到如此的接待我很高興，但又對沒機會向監獄工作人員說再見而感到深深苦惱。當最終通過大門走向一輛停在另一側的小車時，我感到——即使我已七十一歲——我的生命又重新開始了。一萬個日日夜夜的監獄生活終於結束了。

開普敦在西南方向，離這兒三十五英里。但由於在大門口時出乎意料地遇到這麼多人，司機選擇走另一條路。我們繞到監獄後面，引導車專揀小路往城裡開去。汽車開過美麗的綠色葡萄園和整齊的農場，我貪婪地領略着周圍的風景。

鄉村的田野鬱鬱葱葱、整齊漂亮，但讓我吃驚的是，許多白人家庭站在路旁等候一睹我們的車隊。他們從收音機裡聽到我們走了另一條道。一些人，大約有十幾個吧，甚至舉起他

們握緊的右拳，舉右拳現在已成了非洲民族議會的敬禮方式。這使我大吃一驚；這些來自保守的農業區的勇敢的人以此來表示他們與我們團結在一起，這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在一個地方，我停下車，走出來與他們打招呼，感謝這些白人家庭，告訴他們，他們的支持使我極受鼓舞。這使我想到，我正返回的南非與我離開時的南非已大不相同。

我們到達市郊時，可以看到人們正湧向一個中心。慶祝委員會在開普敦的大廣場（Grand Parade）組織一個集會，大廣場是原來市政大廳（City Hall）前面的一個露天大廣場。我將站在市政大廳的陽臺上（從這兒可以俯瞰整個廣場）向群衆講話。我們聽到粗略的匯報說，人海般的人群從早上就一直等在那裡了。我們的計劃是，爲了讓車隊避開人群，汽車轉到市政大廳的後面，這樣我可以靜悄悄地進去。車開到開普敦花了四十五分鐘，我們快到廣場時看見人山人海的群衆。司機本來打算向右拐，擦着人群的邊兒過去，但他不知怎麼卻把車開進了人群裡。人群馬上湧過來圍住了汽車，一兩分鐘才能往前挪一步，然後由於人們身體的擠壓又被迫停下來。人們開始敲窗戶，接着敲行李箱和車罩。裡面發出大冰雹似的聲音。一些人激動地開始往車上爬。另一些人開始搖晃汽車，此時我眞有些擔心。我感到似乎人群可以用他們的愛把我們殺死。

司機甚至比我和溫妮更擔心，他喊叫着要跳下車。我讓他鎮靜地待在裡面，我們後面其它車上的人會幫我們解圍的。阿倫·伯薩克（Allan Boesak）和其他人試圖爲我們的車清出

一條道，推着人們離開車，但卻沒能成功。我們在車子裡坐了一個多小時，甚至試圖打開車門都是徒勞的，就這麼被成千上萬名自己的支持者監禁着。按計劃，演說開始的時間早已過去了。

最後，幾十名警察過來救急，慢慢地清理出了一個出口。當我們最終自由了時，司機飛速地朝與市政大廳相反的方向開去。『小伙子，你往哪兒開？』我有些惱怒地問道。『我不知道！』他說，聲音裡帶着一種緊張不安。『我以前從沒經歷過這樣的事兒。』他說，然後就漫無目的地開起來了。

他鎮靜下來以後，我指示他開往我朋友杜拉·奧馬爾律師家，他住在本市的印度人區。我說，我們可以去那兒放鬆幾分鐘。這正合他心意。幸好杜拉和他家人都在家，但他們見到我們時都大吃一驚。二十七年來我第一次成爲自由人，但他們沒有問候我，卻關切地說道，『你不是在廣場嗎？』

我們打算在杜拉家喝幾口冷飲，但剛坐下幾分鐘，圖圖主教就打來了電話。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這兒我不得而知。他十分沮喪地說道，『納爾遜，你必須馬上回廣場。人們越來越煩燥了。如果你不馬上回來，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兒。說不定會發生暴動！』我說我立刻回來。

問題在司機，他極不情願返回廣場。在我的勸說下，不久我們就上了返回市政大廳的路

了。大樓周圍都擠滿了人，但後面的人要少一些，司機想辦法把車開到了後門。我被領上這座宏偉建築的最高一層時，天幾乎黑了。這些大廳過去都是白人工作人員走來走去。我走到陽臺上，看到像無根的大海一樣的人群，他們歡呼着，舉着旗幟，拍着手，笑着。

我向人群揮了下拳頭，人群裡報以熱烈的歡呼。這些歡呼聲重新點燃了我的鬥爭熱情。『曼德拉！』我喊道。『Ngawethu！』他們回答。『非洲！』我又喊道；『Mayibuye！』他們應道。最後，人群安靜些之後，我拿出講稿，去上衣口袋掏眼鏡。眼鏡不在，我忘在維克多韋斯特了。我知道溫妮的眼鏡與我的差不多，就借了她的用。

朋友們，同志們和南非同胞們。我以所有人的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義問候大家。我不是作爲一個先知，而是作爲你們——人民——的謙卑的奴僕站在這兒的。你們不知疲倦的和英勇的犧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這兒。因此我將把餘生交給你們。

我的演說完全發自內心。首先，我想告訴人民，我不是什麼救世主，而是一個普通的人，只是由於特殊的環境才成爲一名領導者。我想立即感謝全世界爲我的獲釋而鬥爭過的人們。我感謝開普敦的人們，我向奧利佛·坦博和非洲民族議會、民族之矛、南非共產黨、團結民主陣綫、南非青年大會、南非工會大會、群衆民主運動、南非學生全國聯盟致敬。我也

公開對我的妻子和家庭表示感謝，說，『我相信他們承受的痛苦遠遠多於我所承受的。』

我肯定地告訴大家，種族隔離在南非已是兔子的尾巴，我們不能放棄群衆鬥爭。『地平綫上升起的自由曙光鼓勵我們應加倍努力。』我感到公開解釋一下我與政府的對話很重要。我說，『今天，我想向你們匯報，我與政府的對話目的是使國家的政治局勢正常化。我想強調的是，我自己沒有時間就國家的前途進行談判，除了堅持一點，即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進行會晤。』

我說我希望取得一種有助於通過談判解決的氣氛，從而結束武裝鬥爭的需要。我說，取得這種氣氛的步驟，已在非洲民族議會一九八九年的《哈拉雷宣言》中概括地論述過。我說，作爲眞正談判的一個條件，政府必須立即結束緊急狀態並釋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訴人們，戴克拉克在使局勢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它國民黨領導人走得都遠，我用常常縈繞在耳邊的一句話，稱戴克拉克先生爲『一個正直的人』。有許多次戴克拉克先生似乎配不上這句話時，我就想起了我說過的這句話。

重要的是向人民和政府表明我是堅貞不屈的，沒被征服。對我來說。鬥爭不是結束了，而是以不同的形式重新開始了。我確認我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名忠實的和守紀律的成員。』我鼓勵人們打消顧慮，加強鬥爭，我們將共同走完最後一段路。

演說結束時已是晚上了，我們被推進汽車，去主教大院。我們進入古樸的大院時，看見幾百名黑人在等着歡迎我。他們一看見我就唱了起來。我熱情地擁抱着圖圖主教，正是這個人曾經用他的聲音和勇氣鼓勵建立一個完整的國家，曾經在最黑暗的年代重新喚起了人民的希望。我們被領進屋裡，在那兒見到了更多的家人和朋友，但對我來說，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當我被告知有一個從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時。我立即知道了是誰打來的。奧利佛的聲音是虛弱的，但卻聽得很清楚，經過這麼多年後再聽到他的聲音使我心裡充滿了快樂。他一九八九年八月得了一次中風，這使他很衰弱，目前正在瑞典康復。我們說定盡快見面。

我夢想着出監獄後開着車悠閑地去一次川斯凱，去看看我的出生地，看看我孩提時在那裡玩耍的山川和小溪，還有我從沒見過的母親的墓地。但我的夢想不得不延後，因爲我很快就知道非洲民族議會爲我制訂了龐大的計劃，其中沒有一件涉及到川斯凱的休閒之旅。

一〇一

按計劃我獲釋後的下午要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午我會見了許多同事，討論我們的計劃安排和策略。我收到了像小山一樣的賀電和賀信，我盡可能多看一些，這些電報來自世界各地，有總統的、有總理的，但我尤其記得，一位開普敦家庭主婦的信使我感到很有意思。這封電報說：『我非常高興你自由了，你又回到了你的朋友和家庭中間，但你昨天的演說乏

味極了。」

我去監獄之前從未舉行過像那天那樣的記者招待會。那時候沒有攝影機，非洲民族議會的許多記者招待會都是秘密舉行的。那天下午，來了那麼多的記者，他們來自那麼多不同的國家，使我不知道該與誰說話。我很高興看到在這些人中黑人記者佔很高的比例。記者招待會上，我又一次急於重申一系列主題：首先，我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一名忠實和守紀律的成員。我注意到非洲民族議會的大多高級人物將在國外觀看我獲釋的情況，試圖從遠處估價我的忠誠程度。我知道他們聽到一些謠言，說我偏離了該組織，我妥協了，因此我試圖抓住每一次機會讓他們放心。當問到我將在該組織發揮什麼作用時，我對記者們說，我將發揮非洲民族議會命令我發揮的任何作用。

我對記者們說，在繼續支持武裝鬥爭和我所提倡的談判之間沒有衝突。正是現實和武裝鬥爭的威脅把政府帶到了談判桌旁。我還補充說，政府停止對非洲民族議會施以暴力的時候，非洲民族議會將以和平相回報。當問到制裁時，我說非洲民族議會還不能呼籲放鬆制裁，因爲第一項導致制裁的情況——黑人沒有政治權利——依然維持原狀。我說，我可能已出了監獄，但我還沒有獲得自由。

記者還問我有關白人的擔憂。我知道人們估計我對白人充滿憤怒。但我沒有。在監獄中，我對白人的仇恨減少了，但對制度的仇恨卻增加了。我想讓南非看到，我甚至愛我的敵

人，而我恨的是這個讓我們相互敵對的制度。

我想讓記者們知道在任何新制度下白人的重要作用。這些我從沒忽略。我們不想在解放這個國家之前先毀掉它，而把白人趕走將會毀滅這個國家。我說，在白人的擔憂和黑人的希望之間有一條中間道路，而我們非洲民族議會將找到它。我說，『白人是南非同胞，而我們想讓他們感到安全，並且知道我們感謝他們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所做的貢獻。』所有放棄種族隔離的男人或女人都是我們在為民主、無種族歧視的南非的鬥爭中團結的對象；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勸說我們的白人愛國者，一個新的無種族歧視的南非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更美麗的好樂園。

從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注意到，記者們像渴望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樣想知道我的個人感情和家庭關係。這對我來說還是件新鮮事，我進監獄時，記者從不想問有關一個人的妻子和家庭、他的感情和他最秘密的時刻。新聞媒介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可以理解，不過我發現他們的好奇心實在難以滿足。我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很容易在公開場合談自己感情的人。常有記者問我獲得自由後感覺如何，我盡力描述這種難以訴說的感受，結果常常不成功。

記者招待會之後，圖圖主教的夫人從約翰尼斯堡打來電話，說我們必須直接飛往那兒。溫妮和我曾希望留在開普敦放鬆幾天，但我們得到的消息是，約翰尼斯堡的人越來越煩燥，如果我不直接返回那兒，可能會發生騷亂。當天晚上我們飛往約翰尼斯堡，但我被告知，在

我原來的家奧蘭多西區八一一五號圍了成千上萬的人，我去那兒是不明智的。我不情願地同意了；我多麼渴望第二個自由的夜晚在自己的家中渡過。事實上，溫妮和我在北郊一位非洲民族議會支持者的家中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們乘飛機去索韋托的第一國民銀行體育場。我們得以飛過索韋托上空，參觀了這座到處是火柴盒似的房子、白鐵皮棚屋和骯髒的馬路的城市，這座南非黑人城市之母，進監獄之前這是我唯一的家。索韋托已擴大了，有些地方也繁榮了，而壓倒多數的人還生活在一種可怕的貧窮之中，他們沒有電，沒有自來水，辛辛苦苦地維持生活，這對於一個像南非這麼富裕的國家是可恥的。在許多地方，貧困程度比我進監獄時更糟。

我們在體育場上空盤旋着，然後在中心降下來。體育場此時已爆滿，有十二萬人，它是如此擁擠，以至於每一寸地方都有人坐着或站着，似乎要被撐破似的。我表示很高興回來與他們在一起，但隨後就叱責了那些使城市黑人生活癱瘓的人。我說，學生們，必須返回學校。犯罪必須得到控制。我對他們說，我聽說一些罪犯僞裝成自由戰士，騷擾無辜的人，放火燒汽車；這些歹徒在鬥爭中是沒有位置的。不講文明的自由，不能和平地生活的自由，完全不是眞正的自由。

今天，回到索韋托使我十分高興。同時，我也是帶着深深的悲傷回來的。我悲傷地了解到，你們還在一種非人的制度下受苦。住房擁擠，學校危機，失業率和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作爲索韋托社會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的同時，我對從報紙上讀到的犯罪統計深感不安。雖然我了解我們的人民被剝奪了種種權利，但我必須說明，本市的犯罪水平是不健康的，當務之急是必須將其降下來。

結束時，我向所有抱着美好心願和良好動機的人張開雙臂，說道『任何放棄種族隔離的男人和女人都不會被排除在朝向建立一個無種族歧視、團結和民主的南非的運動之外，這樣的國家的基礎是按普選名單一人一票。』這是非洲民族議會的使命，是我這麼多年監獄生活中一直抱定的目標，也是我有生之年將爲之終身奮鬥的目標。當我四十四歲進監獄時這是我做的美夢，但現在我不年輕了，我已七十一歲，不能再浪費一點時間了。

那天晚上，我與溫妮一起回到了奧蘭多西區八一一五號，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已離開了監獄。對我來說，八一一五號是我的世界中心，是我腦海的地圖中重重地描了一筆的地方。當看見這個有四個房間的屋子時，我很驚奇它比我記憶中的房子多麼窄小和簡陋。與我在維克多韋斯特的房子相比，八一一五號只能算是房後僕人住的宿舍。但任何房子，只要

裡面的人是自由的，即使與最豪華的監獄相比都是一座城堡。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是如此幸福，我有一種感覺，我最需要、最盼望的是否定自己。我渴望恢復一種正常和普通的生活，撿起年輕時的一些生活樂趣，能夠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能夠出去買些牙膏之類的，晚上去探望老朋友。這些平常的事情是在監獄裡最懷念的、夢想自由之後要做的事情。但我很快就認識到做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那天晚上，以及隨後幾周和幾個月的晚上，房外邊都圍着幾百名來祝福的人。他們唱啊，跳啊，叫啊，而他們的快樂是有感染性的。這些是我的人民，我沒有權力、也不願對他們否定自己。可是把自己獻給人民我就再次脫離了家庭。

那天夜裡外邊的歌聲一直持續到凌晨，護衛房子的非洲民族議會和團結民主陣綫（UDF）的成員請求人們安靜讓我們睡覺，而我們並沒睡多長時間。非洲民族議會的許多人建議我搬到離這兒有幾條街遠的家，是我在監獄時溫妮建的。按索韋托的標準是一個不小的地方，不過這座房子對於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而且，這座房子的大小和豪華程度似乎都有些不適合一個人民的領導人住。我盡可能地反對這個建議。不僅想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且想像他們那樣生活。

我第一項任務是向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匯報。二月二十七日，我出獄二周之後，飛往盧薩卡會晤非洲民族議會全國執委會委員們。與闊別幾十年的老同志重聚眞是太棒了。幾個非洲國家元首也在場，我與津巴布威的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尚比亞的肯尼思·卡翁達（Kenneth Kaunda）、博茲瓦納的凱特·馬西里（Quett Masire）、莫桑比克的希薩諾（Chissano）和烏干達的尤韋里·穆薩維尼（Yoweri Musaveni）進行了簡短的談話。

執委會委員們在爲我獲釋而高興的同時，也迫切想評價這個剛被釋放的人。我看到了他們眼中的疑問。曼德拉是不是二十七年前進監獄的那個人，還是已變成不同的曼德拉，一個改革的曼德拉？他是忍受過來了還是被挫敗了？他們聽到過關於我與政府的對話，他們的關注是正確的，我不僅早已脫離實際情況，而且自從一九八四年起在獄中就不能與我的同事聯繫了。

我認眞而嚴肅地解釋了與政府對話的性質，描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已取得的進展。他們已看見我寫給鮑塔和戴克拉克的備忘錄，知道備忘錄符合非洲民族議會的政策。我知道幾年前被釋放出來的一些人跑到盧薩卡，悄悄地說，『馬迪巴軟弱了。他被政府部門收買了。他

穿三件套西服、喝葡萄酒，吃好飯。』我知道有人這麼嘀嘀咕咕，因此想反駁。我知道反駁的最佳途徑是把我做的一切事都直率、坦誠地公諸於衆。

在這屆全國執委會會議上，我被選爲該組織的副主席，而該組織秘書長艾爾弗雷德·恩佐（Alfred Nzo）被任命爲代理主席，奧利佛還在療養。會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被問及尙比亞總統卡翁達博士——非洲民族議會一位長期支持者——提出的建議，即現在我被釋放了，非洲民族議會應在南非範圍內停止武裝行動。我回答說，我們珍視卡翁達先生的智慧和支持，但現在停止武裝鬥爭太早了，我們還沒有達到爲之拿起武裝的目標；我說，幫助戴克拉克先生安慰他的右翼，不是非洲民族議會的工作。

從盧薩卡起，我開始了在非洲的旅行，包括津巴布威、坦桑尼亞、桑吉巴、衣索比亞、阿爾及利亞和埃及。獲釋後的前六個月內，我在國外花的時間比在國內還多。幾乎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非常熱情的群衆，因此，即使感到累，也有人民在鼓勵着我。在達累斯薩拉姆，有大約五十萬群衆迎接我。

我非常喜歡這次旅行。我想看看新的——和老的——情況、品嘗不同食物、與各種各樣的人講話。我必須很快使自己適應與我離開時大大不同的世界。隨着交通、通訊和大衆媒體的變化，世界在飛速發展，現在事情發生得這麼快，有時好像難以跟上其發展。溫妮試圖讓我慢下來，但事情太多了，簡直做不完；組織想讓我們好好享受一下我獲釋而帶來的天倫之

樂。

在開羅，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舉行過私人會晤後的第二天，我被安排在當地一個會議廳向一個大型聚會發表講話。當我到達時，人多得似乎要漫出來似的，一點兒安全感都沒有。我對一位警察說，我認爲需要加強警力，他只是聳了聳肩。溫妮和我在會議廳後邊的房間等着，約定時間到後，一個警察擺手讓我進去。我讓他先把代表團其它人護送進去，因爲我擔心我進去後會發生混亂，他們會被與我分開。但警察想讓我先進，正如所料，我一進大廳，人群就開始向前湧，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綫。在他們的熱情中，我被撞着、搖着。大混亂中我在一個地方掉了一只鞋。靜下來幾分鐘後，我發現我的鞋子和我的妻子全找不着了！最後，過了將近半小時，溫妮才被帶到臺上，她剛才被擠丟了。我甚至沒能向人群發表講話，因爲他們叫着『曼德拉！曼德拉！』聲音喧鬧得沒人能聽清我的聲音。最後，我離開了，留下了鞋子，帶着總是沉默寡言的妻子。

在開羅時，我還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我說非洲民族議會『準備考慮停止敵對行動。』這是給政府發出的信號。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都在爲爭取談判成功創造氣氛。非洲民族議會要求政府使國家局勢正常化，即結束緊急狀態、釋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廢除種族隔離法律。與此同時，政府打算首先勸說非洲民族議會停止武裝鬥爭。而我們在還不打算宣佈放棄的同時，想鼓勵戴克拉克先生繼續推行改革戰略。我們知道，我們最終將停止武裝鬥爭，一

方面是更有利於進行更認眞的談判，另一方面是讓他對自己的選民即南非的白人選民說，『看，這是我的政策的結果。』

結束了非洲的最後一站，我飛往斯德哥爾摩去看奧利佛。看見我的老友和法律伙伴是我最盼望的團聚。奧利佛身體不好，但我們見面時像草原上兩個小伙子相見時那樣熱烈，我們從相互的愛中吸取力量。我們開始時回憶了過去的時光，但就剩我們兩個人時，他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組織的領導權問題。他說，『納爾遜，你現在必須當非洲民族議會的主席。我待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給你留的。』我拒絕了，說他流亡國外領導這個組織遠比我能夠做到的好。這樣轉移權力既不公平也不民主。我說，『你是被組織選舉當主席的，讓我們等下一次選舉吧，那時組織會作出決定的。』奧利佛反對，但我沒有妥協。他想指定我當主席表示了他的謙虛和無私，但這不符合非洲民族議會的原則。

一〇三

我從監獄裡出來時，印卡塔自由黨首領、夸祖魯首席部長·布特萊齊（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長是南非政治舞臺上重要活動家之一。但在非洲民族議會內，他遠非一個受歡迎的人。布特萊齊是大祖魯國王塞茲瓦約（Cetshwayo）的後裔，塞茲瓦約曾在一八七九年的一場戰鬥中打敗英國人。布特萊齊年輕時上過黑爾堡大學，當時加入了非洲民族議會青

年聯盟。我把他看成是運動未來的一位青年領袖。他在非洲民族議會的巧妙支持下當了夸祖魯的首席部長，甚至建立印卡塔作爲祖魯族的文化組織時，非洲民族議會也未反對。但在過去這些年中，布特萊齊酋長與非洲民族議會分道揚鑣了。雖然堅決反對種族隔離，拒絕夸祖魯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樣成爲『獨立的』家邦，但他對民主運動憂慮不安。他反對武裝鬥爭，批評一九七六年的索韋托起義。他反對國際制裁，懷疑南非作爲一個統一國家的概念。然而，布特萊齊酋長一直呼籲釋放我，並在我和其他政治領導人獲釋之前拒絕與政府談判。

布特萊齊酋長是我獲釋後首先打電話的人之一，以感謝他長期的支持。我願意盡早與他會晤以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我第一次訪問盧薩卡時曾提出舉行這種會晤的想法，但卻遭到了執委會的否決。當我在維克多韋斯特（Victor Verster）時，夸祖魯國王曾邀請沃爾特去夸祖魯首府烏倫迪訪問，我敦促他接受邀請。我認爲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以影響這個國家最受尊重、最有權勢的皇室的家長。全國執委會暫時同意了這次訪問，不過建議沃爾特去農戈馬（Nongoma）的王宮：認爲去烏倫迪意味着承認這個家邦的權力。

從盧薩卡返回後我就給布特萊齊酋長和國王打電話，解釋說沃爾特將去見國王，但不是在烏倫迪而是在農戈馬。國王說除了首府，他不打算讓沃爾特到其他任何地方去見他。他說，『我是國王，我邀他來烏倫迪見我，他無權讓我在別的地方見他。』我說，『陛下，我們面對的是來自成員內部的一片反對聲，他們根本不想讓西蘇魯先生去夸祖魯。我們想辦法

爭取到了這種讓步，相信你也能妥協一下。』可是他不能，他拒絕見沃爾特。

此後關係惡化了，五月份，我說服非洲民族議會我有必要去拜訪一下國王和布特萊齊。國王同意了，但訪問前一周左右，我接到了茲韋利提尼（Zwelithini）國王的一封信，說我必須一個人去。這終於使人不能忍受了，執委會不向這樣的要求讓步。我告訴國王說，除非由同事陪着，否則我不能來；國王認爲這是又一次輕蔑，因而取消了這次訪問。

我的目的是單獨培養與國王的關係，把它與布特萊齊酋長的關係分開。國王是祖魯族眞正的世襲領導人，祖魯族人熱愛他、尊重他。在夸祖魯，對國王忠誠遠比與印卡塔結盟影響面廣。

與此同時，納塔爾成了殺人基地。裝備良好的印卡塔支持者事實上已在整個納塔爾中部地區和彼得馬里茲堡周圍向非洲民族議會的根據地宣戰。一個個村莊硝烟彌漫、幾十個人被殺死、幾百個人受傷、成千上萬人成了難民。僅一九九○年三月，就有一百三十個人在這種自相殘殺中死於非命。在納塔爾，祖魯族在殺祖魯族人，因爲這裡的印卡塔成員和非洲民族議會成員都是祖魯族人。二月份，我獲釋後剛剛兩周，就去了德班，在國王公園（King's Park）向十萬多人發表講話，他們幾乎全是祖魯族人。我請求他們放下武器，在和平中相互拉起手：『拿起你們的槍、刀和矛，把它們扔到海裡去吧！停止自相殘殺，現在就結束戰爭！』但我的呼籲對他們像刮耳邊風似的，戰鬥和死亡仍在繼續。

我十分關切，願做任何事情以會晤布特萊齊酋長。三月份，在爆發一次特別令人恐怖的暴力之後，我單獨宣佈我將在彼得馬里茲堡郊外的一個小山村會晤布特萊齊酋長。從個人方面講，我與布特萊齊酋長的關係是密切和相互尊重的，而我希望以此作爲資本。但我發現非洲民族議會在納塔爾的領導人討厭這樣的會晤，他們認爲危險，因而否決了這次會晤。我確實去了彼得馬里茲堡，在那裡看到了非洲民族議會支持者被燒焦的屍體，我盡力安慰悲痛欲絕的家屬，可是沒見到布特萊齊酋長。

一〇四

三月份，經各自黨內多次協商之後，我們定下了與戴克拉克和政府第一次面對面會晤的日期。這是『關於對話的對話』，會晤定於四月初。但三月二十六日，在約翰尼斯堡以南大約三十英里處的塞布肯（Sebokeng）鎮，警察沒有警告就向一群非洲民族議會示威者開槍，打死十二人，打傷幾百人，多數是在他們跑時打在後背上的。警察在對付示威者時使用了裝有炸藥的實彈，這是不能忍受的。警察稱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但許多示威者是被擊中背部的，而且沒有武器，你不會受到一個正在逃跑而且沒拿武器的人的威脅。政府不願給我們爲支持我們的正義要求而進行集會和示威的權利。這種行動深深激怒了我，我告訴新聞界說，南非的每一個白人警察都把每一個黑人看成是軍事目標。與執委會商量之後，我宣佈停

止對話，告誡戴克拉克說，他不能『一面說着談判一面殺害我們的人民。』

但儘管停止了正式對話，在領導層同意下，我還是在開普敦會晤了戴克拉克先生，以維持談判備忘錄。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確定一個新的日期，我們同意定在五月初。我提出了在塞布肯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事情以及警察對黑人和白人的不平等待遇；警察用眞槍實彈對付黑人示威者，卻從沒有對白人右翼抗議者開過槍。

政府並不急於開始談判，他們盤算着等我獲釋帶來的歡樂逐漸降下來之後再說。他們想讓時間使我認輸，說明被當作救世主歡呼的前囚犯是一個很容易犯錯誤的人，他對目前的局勢毫不關心。

戴克拉克儘管似乎有進步的行動，但他決不是偉大的解放者。他是個漸進主義者，一個謹愼的實用主義者，而不是一個革命者。他不進行放棄權力的任何改革。改革明確地是爲了相反的目的：確保新制度下南非白人的權利。他並不準備就結束白人的統治進行談判。

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基於集團權力的權力分享制度，這將在南非保留改進了的少數人的權力。他明確反對多數人統治、或『簡單多數主義』，他有時就這麼宣稱，因爲這樣一來就會結束白人統治。我們很早就知道，政府強烈反對一種勝者決定一切的英國國會制的議會制度，代之以宣揚一種按比例代表權制度，從而爲白人少數提供制度保證。雖然他準備允許黑人多數投票和立法，卻還想保留少數人否決權。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這個計劃。我對戴克拉

克說這是僞裝的種族隔離，一種『敗者決定一切』制度。

國民黨削弱我們力量的長期策略是與印卡塔自由黨建立一個反非洲民族議會同盟，並勸誘開普說布爾語的混血種選民參加國民黨。從我被釋放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引誘布特萊齊和開普的混血種選民。政府極力嚇唬混血種人，讓他們以爲非洲民族議會是反對混血種人的。他們向布特萊齊宣揚集團權力和聯邦主義的學說，支持他在新南非保留祖魯人權力和同一性。

與政府的第一輪對話是在五月初的三天內進行的。我們的代表團包括沃爾特·西蘇魯、喬·斯羅夫、艾爾弗雷德·恩佐、薩博·姆貝基、艾哈邁德·卡特拉達、喬·莫迪塞（Joe Modise）、魯思·莫帕蒂（Ruth Moupati）、阿奇·古梅德（Archie Gumede）、拜爾斯·諾德神父（Beyers Naude）、謝里爾·卡羅勒斯（Cheryl Carolus）和我本人。地點在格魯特舒爾（Groote Schuur），這是一座開普—荷蘭式建築，曾是南非第一批殖民者總督的住所，他們中間有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代表團的一些成員開玩笑說，我們被領進敵人的伏擊地帶了。

但與預料的相反，對話進行得認真、幽默。曾相互戰鬥了三個世紀的宿敵見面了、握手了。許多人奇怪爲什麼這種協商沒有在很久以前就開始。政府爲共產黨總書記喬·斯羅夫和

民族之矛的司令官喬·莫迪塞提供臨時保護，看到這兩個人與幾十年來把他們當成魔鬼不是頭上長角的怪物。

對話本身就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有意義的里程碑，如我指出的那樣，會晤不僅代表了非洲民族議會多年尋求的東西，而且代表了南非黑人、白人之間主僕關係的結束。我們不是作為祈求者來參加會晤的，而是作為在談判桌旁享有平等地位的南非人來的。

第一天或多或少是一次歷史課。我向對手解釋說，非洲民族議會從一九一二年建立時起就一直尋求與掌權的政府進行談判。戴克拉克先生則站在他這一方說，分離發展的制度是作為一種仁慈的辦法想出來的，但是在實際中沒有奏效。因此，他說，他感到抱歉，並希望談判將對此加以修正。這不是道歉，不過，比任何其它國民黨領導人走得要深遠。

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的定義。政府主張狹義的概念，想限制我們有權享受保護的人數。我們則主張最廣義的概念，說任何由於政治動機被判決犯罪的人都應有權享受保護。我們未能就『由於政治動機的』犯罪的定義達成相互滿意的一致，而這將成為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折磨我們的一個問題。

在三天會晤結束時，我們達成了後來著名的《格魯特舒爾備忘錄》，該備忘錄保證雙方進行和平談判，政府承擔了取消緊急狀態的義務。政府不久就在納塔爾之外的所有地方這麼做了。我們同意建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以解決我們前進道路上仍然存在着的許多障礙。

關於憲法問題，我們告訴政府，我們要求一個選舉的制憲會議制定一部新憲法；我們相信制定憲法的這些男人和女人應由人民自己來選擇。但選舉制憲會議之前，有必要建立一個臨時政府，由它來監督過渡期，直到選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現在這樣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多黨協商會議以建立臨時政府並就制憲會議發揮的作用制定指導原則。

一○五

雖然我曾想在獲釋後立即去庫奴，但直到四月份才成行。我不能想走時收拾一下就走，安全問題必須安排，還有對地方組織的講話稿必須準備。四月份之前，非洲民族議會和川斯凱的軍事領導人、非洲民族議會的一位忠實信徒班圖·霍洛米薩（Bantu Holomisa）將軍爲我安排了一次訪問。但我心中最重要的是去爲我母親掃墓。

我先去了庫奴我母親的墓地。她的墳墓簡單樸素，上面只蓋着幾塊石頭和磚頭；與庫奴別的墳墓沒什麼不同。很難描述我此時的感受；我爲母親去世時沒能與她在一起而遺憾，爲她在世時沒能好好照顧她而悔恨，想像着如果選擇另外的生活道路事情會怎樣。

闊別這麼多年後又回到故里，我被它的變化和未變化的地方深深打動了。我年輕時，庫奴人一點兒也不關心政治；他們不知道爲非洲人的權利而進行的鬥爭。但回來後我聽到庫奴

學校裡的孩子們唱着有關奧利佛·坦博和民族之矛的歌曲，我驚奇於有關鬥爭的意識已如此深入地滲透到非洲人社會的各個角落。

不變的是人們的熱情和質樸，這又把我帶回了孩提時代。但使我不安的是，村民似乎貧困如舊，如果不比那時更貧困的話，但絕大多數人仍住在簡陋的棚屋裡，地板骯髒，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我年輕時，村子整潔，河水純淨，碧綠、乾淨的草地一望無際。街道有人打掃，土壤肥沃，一塊塊田地整齊、平整。但現在村子無人打掃了，河水污染了，到處飄着塑膠袋和包裝紙。我小時還不知塑膠爲何物，雖然它肯定以某種方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對於我來說，它在庫奴的存在似乎是一種禍害。人們的自豪感似乎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那個月，我還回了另一個家：回羅本島，目的是勸說二十五名民族之矛政治犯接受政府提出的赦免條件離開這個島。雖然我在八個月前就離開了這個島，但對監獄的記憶依然清晰。多少年來一直是別人來探訪我，而作爲一個探訪者來到羅本島，感覺眞是奇妙極了。

那天，我卻無暇觀光。因爲我馬上去見了這些反對政府赦免的人。他們堅持只有在戰場上而不是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後才離開，強烈反對這種特別解決方案，因爲在接受赦免之前必須承認犯罪。他們指責非洲民族議會從《哈拉雷宣言》中退卻了，因爲該《宣言》要求無條件、全部大赦政治犯和流亡者。有個人說，『馬迪巴，我終生在與政府戰鬥，而現在我得

向他們請求赦免。』

我可以同情他們的觀點，但他們太不現實了。每一名戰士都想在戰場上打敗他的敵人，但此時，這樣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現在的鬥爭是在談判桌上。我說，他們留在監獄不是在促進鬥爭，在外邊比在裡邊更有助於我們的事業。最後，他們同意接受政府的條件。

六月初，我按計劃到歐洲和北美進行爲期六周的旅行。行前，我與戴克拉克先生進行了私人會晤，他想討論制裁問題。基於他在南非進行的變革，他請我在國際上不再呼籲繼續制裁南非。我們在注意到戴克拉克先生所做的一切的同時，認爲制裁仍然是迫使他做得更好的最佳槓桿。我知道，歐共體和美國根據戴克拉克先生的改革傾向於放鬆制裁。我向戴克拉克先生解釋說，在他徹底消除種族隔離和建立過渡政府之前，我不想請我們的支持者放鬆制裁。他對我的反應很失望，不過並不吃驚。

第一站我和溫妮去了巴黎。在那兒，我們受到了弗朗西斯·密特朗和他那位美麗迷人的夫人、一位非洲民族議會的長期支持者丹尼爾的熱情歡迎。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歐洲大陸，我被這個古老世界的美麗深深陶醉了。我不願辜負了這座城市的迷人風光，但我在法國時發生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政府宣布結束緊急狀態。我很高興，但我清楚他們趁我在歐洲時採取此行動是爲了消弱我呼籲制裁的聲音。

在瑞士、意大利和荷蘭逗留之後，我來到了英國。我在那兒花了兩天時間拜訪奧利佛和阿德萊德（Adelaide）。下一站是美國，但返回南非時我還要經過英國，因爲按計劃我要在那時會見柴契爾夫人。然而，出於禮貌，我離開前給她打了個電話，柴契爾夫人像在對我發表一個嚴肅而好意的演說，她說她一直在關注我的旅行，注意到我每天出席多少活動，她說，『曼德拉先生，在我們討論任何問題之前，我必須警告你，你的日程太滿了。你必須砍掉一半。即使比你年輕一半的人達到現在對你的要求也會有問題的。如果繼續下去，你不會活着走出美國的。這就是我對你的忠告。』

青年時代我從書本上知道了紐約市，然而，最終看見它時，那玻璃和水泥組成的大峽谷似的樓群，還有成百上千隨風飄揚的彩帶，眞是一種讓人吃驚得透不過氣來的體驗。據報導，有多達一百萬人自發地觀看我們通過本市，看到他們給予反種族隔離鬥爭的支持和熱情使人眞正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我總是從書上讀到紐約是個硬心腸的地方，但我在這個城市緊張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它恰恰相反的一面。

第二天我去了哈林區（Harlem），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看到索韋托的年輕人模仿哈林區花花公子的時裝起，這個地區就在我心中占據着神奇的位置。正如我妻子所說，哈林區是美國的索韋托。我在揚基（Yankee）體育場向群衆講話，告訴他們說，一種不可分割的紐

帶把南非黑人和美國黑人聯繫在一起，因爲我們都是非洲的孩子。我說，兩者有親戚關係，我曾受到過偉大的美國人的鼓舞，如杜波依斯（W·E·B·DuBois）、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和馬丁·路德·金。我年輕時崇拜布朗·邦博（Brown Bomber）、喬·路易斯（Joe Louis），他們不僅與黨派內的對手較量，而且與黨派外的種族主義者較量。在獄中，我關注着美國黑人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和經濟不平等的鬥爭。對於我們來說，哈林區象徵着反抗的力量和黑色的美麗。幾天前我看到一個青年，他T恤衫上的字使我深有同感，上面寫着：『天然是黑色，驕傲靠自己。』我說，我們被天然地聯繫在一起，我們相互感到驕傲。

去過孟菲斯和波士頓之後，我到華盛頓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並與布希總統舉行私人會晤。我感謝美國國會的反種族隔離立法，並說新南非希望實現產生我面前兩議院的價值。我說：『作爲自由戰士，我們不能只知道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以及托馬斯·傑佛遜這些人，而不像他們那樣行動。』我還就制裁發表了長篇講話，因爲我知道布希政府認爲該放鬆制裁了。我敦促國會不要這麼做。

甚至在會見布希先生之前，我對他已有了積極的印象，因爲我出獄後他是第一位給我打電話祝賀的世界領導人。從那時起，他就把我列入了通報重要情況的少數世界領導人名單中。就個人而言，他是個熱情而有思想的人，雖然我們在武裝鬥爭和制裁問題上存在着明顯

的分歧。他是那種你可以有不同意見而與之握手的人。

我從美國又到了加拿大，在那兒會晤了穆隆尼總理，也向他們的議會發表了講話。我們打算下一站去愛爾蘭，在飛過大西洋之前，我們乘坐的小型噴氣式飛機停在北極圈上一個稱作古斯灣的偏僻地方加油。我感到想在清新的空氣中散散步。在柏油路上溜達時，注意到有一些人站在機場柵欄外。我問一位加拿大官員他們是誰。他說，這是愛斯基摩人。

在七十二年的生涯中我從沒見過愛斯基摩人，也從沒想到能見到他們。我走到柵欄旁發現十幾個年輕人，都是十幾歲。他們聽說我們的飛機將在這兒停留就趕到機場來了。小時我曾在書上讀到過愛斯基摩人的情況，我從殖民主義者的課本上得到的印象是，他們文化非常落後。

但從與這些聰明的年輕人的談話中，我得知他們從電視上看到了我的獲釋，對南非的事情很熟悉。『非洲民族議會萬歲！』其中一人說。愛斯基摩人是土著人，歷史上受到過白人殖民者的虐待。南非黑人和愛斯基摩人之間有相似的悲慘命運。使我深有感觸的是，在我被捕入獄的幾十年中，這個星球變得多麼小了；一個生活在世界最北端的十幾歲的愛斯基摩人能看到非洲最南端一位政治犯的獲釋，這使我大吃一驚。電視使世界變小了，並成爲根除愚昧和促進民主的有力武器。

去過都柏林之後，我又去了倫敦，在那兒與柴契爾夫人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晤。那天站在外邊與年輕的愛斯基摩人談話使我着了涼。去見柴契爾夫人那天，天冷颼颼的，下着雨。我們去時，溫妮告訴我必須穿件雨衣。我們已到了飯店的大廳，而回去取雨衣就會遲到。我對守時非常固執，這不僅是表示尊重你要會見的人，而且是向西方人關於非洲人非常拖拉的成見挑戰。我告訴溫妮說沒有時間了，卻站在雨中為一些孩子們簽名。我到柴契爾夫人那兒時感覺很不好，後來被診斷得了嚴重的肺炎。

但這並未影響我們的會晤，除了她像女教師一樣責備我沒聽從她的忠告而砍掉一些日程安排之外。柴契爾夫人在許多問題上都站在非洲民族議會的對立面，如制裁問題，不過，她一直是位直率和熱心的女士。即便如此，在那天的會晤中，在制裁問題上我沒取得絲毫的進展。

我繼續訪問了烏干達、肯亞和莫三比克。七月份回到南非以後，我要求與戴克拉克先生進行一次會晤。暴力行為正在升級；一九九〇年死亡人數已超過一千五百人，超過前幾年所有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數。我與同事協商之後，感到有必要加快正常化進程。我們的國家在流血、在死亡，我們必須更快些前進。

六月初，戴克拉克先生解除納塔爾以外地區的緊急狀態。這似乎是爲恢復對話搭起了舞臺，但七月份，政府安全部隊逮捕了大約四十名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包括麥克·馬哈拉傑、普拉文·戈爾丹（Pravin Gordhan）、西菲維·尼安達（Siphiwe Nyanda）和比利·奈爾，指控他們參與了一個稱爲『烏拉（Vula）行動』的共產黨陰謀以推翻政府。戴克拉克緊急約見我，把據他說是突襲查抄到的文件讀給我聽。我給搞暈了，因爲我對此一無所知。

這次會晤後我想得到解釋，於是給喬·斯羅夫打了個電話。喬解釋說，戴克拉克先生讀的段落脫離了上下文，烏拉是一次過期的行動。但政府想利用這次突擊搜查，試圖讓非洲民族議會脫離南非共產黨，並把喬·斯羅夫排除在談判之外。我又回到戴克拉克先生那兒，告訴他，他被自己的警察誤導了，我們不打算與南非共產黨分裂，或讓喬·斯羅夫離開我們的談判小組。

七月中旬，全國執委會議召開前不久，喬·斯羅夫帶着一個建議私下來找我。他建議我們自願停止武裝鬥爭，從而爲推進談判進程創造適當的氣候。他說，戴克拉克先生需要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的政策已給國家帶來好處。我的第一反應是否定的；我認爲時機尚未成熟。

但我越想越認識到，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而這是最好的途徑。我也認識到，喬作爲一個沒有爭議的激進主義者，正是提出這個建議的最恰當的人選。他不會被指責爲政府的盲從者

或者軟骨頭。第二天我告訴喬，如果他把這個意見帶到執委會，我就支持他。

第二天，喬在全國執委會議上提出了這個意見，有幾個人堅決反對，說我們在給戴克拉克的支持者回報，卻沒有給自己的人民回報。但我極力為這個建議辯護，說武裝鬥爭的目的一直是把政府帶到談判桌旁，我們現在已經在這麼做了。我們爭論說，停止武裝鬥爭的建議隨時可以撤消，但有必要表明我們的信譽。幾個小時之後，我們的觀點占了上風。

在非洲民族議會內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行動。即使民族之矛沒有積極活動，武裝鬥爭的氣氛對許多人來說有重大意義。即使僅作為一種語言工具引用一下，武裝鬥爭也標誌着我們在積極地與敵人進行戰鬥。結果，停止武裝鬥爭比在戰場取得的勝利更受歡迎。

八月六日，在普利托利亞，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簽署了稱為《普利托利亞備忘錄》的協議，《備忘錄》中，我們同意停止武裝鬥爭。如同我一遍又一遍向我們的追隨者說的那樣，我們停止武裝行動，但我們並未終止武裝鬥爭。協議還規定了釋放政治犯、給予某種保護的日程表。保護進程定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前完成。政府還同意審議《國內安全法》。

在阻礙和平進程的所有問題中，沒有什麼比全國的暴力升級更具毀滅性和破壞性的了。我們都希望，暴力會隨着談判的進展而減少。但事實卻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隊很少逮捕人。城鎮的人指責他們支持和煽動暴力。我越來越清楚，安全部隊在縱容暴力。許多事件表明，

警察沒有平息暴力，相反卻在挑起暴力。

後來的幾個月裡，我去了約翰尼斯堡南部被暴力摧毀的整個瓦爾河三角洲的城鎮，安慰受傷的人和他們的家屬。一次又一次，我都聽到了相同的故事：警察和軍隊在破壞這個地區的穩定。我被告知，警察今天在這個地區收繳武器，明天印卡塔部隊就用那些偷來的槍進攻我們的人。我們聽說，警察護送印卡塔成員開會或向我們的人進攻。

九月份，我在一次講話中說，在暴力後面有一只隱藏着的手，並猜測有一支神秘的『第三勢力』，這『第三勢力』包括一些試圖中斷談判的安全部隊的叛徒。我說不出『第三勢力』中究竟有哪些人，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肯定他們存在着，而且對非洲民族議會和解放鬥爭非常殘忍。

我是在個人經歷了兩件特殊事情之後才得出這個結論的。一九九〇年七月，非洲民族議會得到情報，說住在旅館中的印卡塔自由黨人計劃於七月二十二日對瓦爾河三角洲塞布肯鎮的非洲民族議會成員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通過我們的律師，我們通知了法律和秩序部長、警察局長和地區專員，告訴他們印卡塔人要發動進攻，並敦促他們採取適當的行動。我們要求警察阻止武裝的印卡塔人進入該鎮參加一次印卡塔集會。

七月二十二日，在警車護送下，幾卡車武裝的印卡塔成員在光天化日之下開進了塞布肯。倒是舉行了一次集會，但集會之後武裝人員瘋狂了，在一次可怕的進攻中殺害了大約三

十人。第二天我去了現場，看到了我從未看見過而且再也不想看見的場面。停屍室躺着人們的屍體，他們是被砍死的；其中一個婦女，兩只乳房都被大砍刀削去了。不管這些殺人者到底是誰，他們都是畜牲。

第二天我要求會晤戴克拉克先生。見到他時，我憤怒地要求給予解釋。我說，「已提前警告過你，而你什麼也沒做，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沒有逮捕人？爲什麼警察袖手旁觀？」然後告訴他，在任何其它國家，如果發生這麼大的悲劇，即超過三十個人被殺害時，國家元首就會發表聲明表示哀悼，然而他卻未吭一聲。他無言以對。我要求戴克拉克作出解釋，但他一直沒有。

第二件事發生在十一月份。幾個印卡塔成員進入約翰尼斯堡東部哲米斯頓城外一個稱爲鐘基茲韋（Zonkizizwe）（祖魯語，意爲『歡迎所有民族的地方』）的居住地區，趕出非洲民族議會成員，在此過程中殺死了幾個人。然後印卡塔成員占領了棄置的棚屋並沒收了所有財產。該地區的居民說，印卡塔成員有警察陪伴着。警察和政府又一次對此悲劇無動於衷。南非黑人的生命還從來沒有如此不值錢。我又一次會晤了戴克拉克先生以及法律和秩序部長阿德里安·弗洛克（Adriaan Vlok）。我再次質問戴克拉克先生，爲什麼在這些犯罪之後警察未採取任何行動？我說，那些人很容易找到，因爲他們現在佔着他們殺害了的人的棚屋。

戴克拉克先生讓弗洛克先生解釋，而弗洛克以相當粗暴的語氣，問我這些棚屋在誰的地盤上，言下之意是這些人是占住者，因而沒有權力。事實上，我告訴他，是當地政府讓他們利用這片地的。他的態度像許多在南非長大的白人一樣，簡單地認爲黑人部落自古以來一直在相互殘殺。戴克拉克先生又一次告訴我，他會在調查之後答覆我，但他一直沒有。

此時，政府又採取了一個火上澆油的行動。它規定允許納塔爾和其它地方的祖魯族人攜帶所謂的『傳統武器』參加政治集會和會議。這些武器有標槍、圓頭棍，正是印卡塔成員殺害非洲民族議會成員的武器。這使我對戴克拉克先生的和平意願產生了嚴重的疑問。

那些反對談判的人從暴力中受益，因爲暴力似乎總在政府和非洲民族議會即將達成一項協議時爆發。這些力量試圖在非洲民族議會和印卡塔之間點燃一場戰爭，我相信許多印卡塔成員也會暗中支持這一看法的。政府的許多人，包括戴克拉克先生，寧肯不這麼看或忽略他們知道正在眼皮底下發生的事情。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爲，政府最高層的人和安全部隊在幫助『第三勢力』。後來的新聞報導透露，南非警察在秘密贊助印卡塔，這使我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

隨着戰爭繼續升級，我又重新思考起了停止武裝鬥爭一事。非洲民族議會的許多人都躍躍欲試，九月份，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說持續不斷的暴力有可能迫使我們再次拿起武

器。局勢看來非常殘酷，而與政府達成的任何諒解似乎都失去了意義。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奧利佛離開祖國流亡三十年後又回到了南非。有他在身邊真是好極了，我一直跟着他，因爲他身體不好。他回來是參加非洲民族議會協商會議的，這次會議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由來自國內外四十五個地區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參加。

會上，我向奧利佛表示敬意，他在最黑暗時期領導着非洲民族議會，從未讓鬥爭的火種熄滅。現在，他又把我們引向充滿光明和希望的未來之門。在我被監禁的二十七年中，是奧利佛拯救了非洲民族議會，然後把它建成一個有力量和影響的世界性組織。在大多數領導人被監禁或被流放時，他領導着非洲民族議會。他是一名戰士，一個外交官，一位政治家。

雖然我批評政府進行有組織的反革命行動，奧利佛的講話則掀起了一場風暴。他的開幕辭引起很大爭議，他呼籲重估我們的[redacted]。他說，除非非洲民族議會採取主動逐步放鬆制裁，否則它面臨着『國際孤立』的危險性。歐共體和美國已經開始放鬆制裁。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想回報戴克拉克先生的改革，認爲這將鼓勵他再前進一步。我們認爲這是個錯誤的策略，但我們必須認清國際現實。雖然執委會討論並通過了奧利佛的發言，但他的建議激怒了非洲民族議會軍事領導人，他們堅持制裁必須維持不變。會議決定繼續維持原

來的制裁政策。

我本人成了人們抱怨的目標，他們責備談判者脫離了基層，我們與國民黨領導人在一起的時間比與自己人在一起的時間還多。會上還有人批評我開展『個人外交』，而不向非洲民族議會的普通人通報情況。作爲一名群衆組織的領導人，必須聽取人民的意見。我同意我們疏忽了，沒有把談判進程通報整個組織。但我也知道我們與政府對話的微妙性；我們達成的任何協議都部分依靠保密。雖然我接受了批評，但我相信我們別無選擇，只有還像以前那樣進行。我也知道我必須把範圍擴大些，向更多的人通報進展情況，以後我就記住了這點。

每一天，每個周末，報紙上都充滿了我們的村落和城鎮又爆發新的血腥暴力的新聞。很明顯，暴力已成了這個國家的頭號問題。在納塔爾和約翰尼斯堡周圍的許多村鎮，犯罪、政治鬥爭、警察暴行和陰影般的死亡行動隊混合在一起，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要暴力問題不解決，建立新制度的進程就永遠是不平坦和不確定的。

爲了制止暴力升級，我與布特萊齊酋長聯繫安排一次會晤。我們於一月份在德班的皇家飯店見面了。布特萊齊酋長首先對各代表團和新聞界講話，他沒有醫治創傷，相反，卻在揭開以前的傷疤。他列舉了非洲民族議會對他的口頭指責，並批評非洲民族議會的談判要求。輪到我講話時，我故意不回答他的話，而是感謝多年來他爲我獲釋所做的努力。我列舉了我

們的長期友誼，強調了把兩個組織團結起來而非分裂開來的許多事情。

在私人會晤時取得了進展。我和布特萊齊酋長簽了一個協議，其中包括規範兩個組織的行動的行爲規則。這是個公平的協議，我估計如果付諸實施的話，會確實有助於制止流血。然而，就我所知，印卡塔從未做出任何努力來實施該協議，而我們一方也時有違犯。

兩個組織之間的暴力在繼續着。每個月都有幾百個人死於非命。三月份，印卡塔成員在約翰尼斯堡南部的亞歷山德拉鎮發動了一次進攻，在持續三天的戰鬥中有四十五人被殺。這一次，又沒有逮捕一個人。

暴力在繼續，我不能袖手旁觀，因此尋求第二次會晤布特萊齊酋長。四月份我又去了德班，我們又發表了強硬的聲明，並且又簽了另一個協議。但是，又一次，協議墨跡未乾就已被血浸透了。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政府在支持大部分暴力，而且暴力在阻礙着談判。戴克拉克對暴力無動於衷使我們的關係陷於危險之中。

四月份，在一次爲期兩天的全國執委會會議上，我談了對戴克拉克先生的懷疑。執委會相信政府在支持暴力，而暴力正在破壞談判的氣氛。在一封給政府的公開信中，我們呼籲將國防部長馬格努斯·馬蘭（Magnus Malan）和法律和秩序部長阿德里安·弗洛克撤職、禁止在公衆場所攜帶傳統武器；逐步撤出約翰尼斯堡周圍城鎮移民工人旅館居住的許多印卡塔成員；解散政府秘密的反暴動部門；任命獨立的委員會就安全部隊胡作非爲進行調查。

我們要求政府五月份之前滿足我們的要示。戴克拉克先生答覆說在五月份就暴力問題召開一次多黨會議，但我回答說這毫無意義，因爲政府淸楚地知道如何做才能結束暴力。五月份，我們宣佈中止與政府的對話。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年來非洲民族議會首次在南非境內召開年會。會議由二千二百四十四名投票代表參加，它們是非洲民族議會在國內外的支部經過民主選舉出來的。會上我全票當選爲非洲民族議會主席。西里爾·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當選爲秘書長，這是老一代領導人將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的象徵。我出獄後才見到西里爾，對許多非洲民族議會的著名領導人來說，他是一位很好的繼承人。他大概是非洲民族議會內最有才能的談判者，這是他當全國礦工聯盟秘書長時鍛鍊出來的。

我在講話中對於給予我的巨大榮譽表示感謝，並說要跟上我的前任奧利佛·坦博邁出的大步是多麼困難。我說，雖然我們當時與政府不和，但談判本身就代表着勝利。政府來到談判桌前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他們已沒有力量來保持種族隔離。我強調進程不會順利，『因爲我們是在與一群不想經過談判使自己失去權利的人打交道』、『我們必須淸楚這一點，即鬥爭不是結束了，談判本身就是鬥爭的一個場所，像其它任何鬥爭形式一樣也有前進和反覆。』

但談判不能等待了。以任何理由延長種族隔離的痛苦從來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說，有必要盡快建立一個過渡政府。

會議強調了擺在非洲民族議會面前的一項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務：從一個非法的地下解放運動過渡到一個合法的群衆政黨。過去三十年中，非洲民族議會在南非都是秘密活動的，那些習慣和技術已根深蒂固。我們必須重建整個組織，從最小的地方支部到全國執行委員會。我們必須在幾個月的特別過渡期內完成這項任務。

非洲民族議會和共產黨的大部分領導人都流亡在外。許多人七月份回來參加會議。他們已不熟悉目前的南非；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塊新發現的土地，對我也是這樣。然而，有相當一批團結民主陣綫和南非工會大會的年輕領導人留在國內，他們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了解政治形勢，八十年代這些組織某種程度上在非洲代替了非洲民族議會。非洲民族議會必須把這些人吸收進組織。

我們不僅面臨着後勤上的問題，而且還有心理問題。與一個共同的敵人戰鬥時，保持運動的團結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但打敗敵人之後確立一項政策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兒。在新的非洲民族議會，我們不僅要吸收許多不同的團體，而且要吸收許多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去結合有共同談判理念的組織。

非洲民族議會在合法活動的前十七個月中，共吸收了七十萬成員。這是個可觀的數字，但沒有什麼可自傲的。這些成員中來自農村地區的人比例相當低，非洲民族議會歷史上在這些地區就相當薄弱。同時，國民黨也在向非白人打開大門，他們忙於吸收不滿的混血種人和印度人。

自我獲釋後，國家仍繼續損害我妻子的信譽。我家周圍的四個青年被綁架，其中一個死了之後，先是有人嘀嘀咕咕誣陷溫妮，接着她被指控綁架四人毆打一人。對她進行的持續不斷的中傷使溫妮和我都想讓她早日出庭，以證明她的無辜。

對我妻子的正式審判於二月份在約翰尼斯堡的蘭德高等法院開始。我出席了第一天的審判，非洲民族議會的許多資深人士也參加了，後來我繼續盡可能地參加。我這麼做既是爲了支持我妻子，也是表明我相信她是無辜的。我的朋友和法律顧問喬治·比佐斯爲她進行了有力的辯護，他試圖證明溫妮既沒參與綁架也沒參與毆打。

三個半月之後，法庭發現她犯有綁架罪並充當了毆打的從犯。然而，法官承認她本人沒有參與毆打。她被判處監禁六年，但在她上訴前就被保釋了。至於我，不論裁決與否，溫妮的無辜是毋庸置疑的。

一〇八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超過一年半的一次又一次對話之後，眞正的對話開始了。民主南非大會代表了政府和其它各黨派之間第一次正式談判論壇。這些對話是在約翰尼斯堡簡·斯馬茲機場附近的一座現代化展覽中心——世界貿易中心進行的，以前的所有雙邊討論爲這次對話奠定了基礎。民主南非大會由十八個代表團組成，這十八個代表團包括了南非政治的各個方面，加上來自聯合國、英聯邦、歐洲共同體和非洲統一組織的觀察員。這是有史以來南非最廣泛的政治團體相聚在一個地方。

開始這些對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肯定是自一九〇九年以來最重要的制憲代表會議。當時前英國殖民地開普和納塔爾、川斯瓦的布爾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同意成立一個單一的聯盟。當然，那次會議不是贊揚民主而是背叛它，因爲那時代表中沒有一個是黑人。而一九九一年，大多數代表是黑人。

我們的籌備代表團由西里爾·拉馬福薩率領，包括喬·斯羅夫和瓦利·穆薩（Valli Moosa），他們已經與政府就選擧、憲法、制憲會議和過渡政府的問題進行了爲期一周的討論。二十個不同方面的代表團（包括黑人家邦政府）已經同意了會議規則。

開始對話的樂觀情緒甚至受到幾個搗亂者的影響。泛非主義者大會決定抵制對話，他們

指責非洲民族議會和國民黨在建立一個多種族政府方面搞陰謀詭計。儘管一個月前非洲民族議會、泛非主義者大會和阿扎尼亞人民組織以一個共同目標的聲明爲基礎形成了聯盟——愛國者陣綫，這件事還是發生了。泛非主義者大會害怕民主選舉，因爲他們知道投票會暴露出支持他們的人有多麼少。布特萊齊酋長也抵制對話，理由是沒允許他派三個代表團：即印卡塔的、夸祖魯政府的和茲韋利提尼國王的。我們說國王應該超越政治，如果他被包括進去，那麼南非的每個部落都能送他們的最高首領來。

在世界貿易中心不僅有一種歷史感，而且有一種自力更生的感覺。不像津巴布威和安哥拉等非洲國家那樣，邁向新制度的談判需要外部調停，我們南非人自己解決分歧。戴克拉克先生談到需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過渡的『權力分享』政府。國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達維·德·維利爾斯（Dawie de Villers）甚至主動爲種族隔離道歉。

我在開幕辭中說，伴隨着民主南非大會的產生，南非的進步終於不可逆轉了。我說，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來自被管理者的滿意，而我們聚在一起就是爲了建立一個這樣的合法權威。我說，民主南非大會標誌着民選制憲會議的開端，他們將制定一部新的憲法，我沒有看到任何不在一九九二年選舉這樣一個制憲會議的理由，我呼籲政府同意建立一個全國團結臨時政府來監督這樣的選舉、控制國家的媒體、軍隊，並總體監督過渡到一個新的、非種族歧視的、民主的南非。

會議第一天，絕大部分與會黨派，包括國民黨和非洲民族議會，都在《意向聲明》上簽了字。該聲明使所有各方承諾支持一個不可分裂的南非，其最高法律爲憲法，憲法由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來保障。國家的司法制度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將制訂一個權利法案保護公民自由。簡而言之，將有一個以按普通選舉人名單普選爲基礎的多黨民主。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建立一個新南非可以接受的憲法上的最低限度。印卡塔拒絕在上面簽字，理由是『不可分割的』南非一句話隱含着聯邦制度就成了禁區。

會議產生了五個工作組。五個工作組將在一九九二年初開會，爲定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召開的第二輪民主南非大會作準備。它們將探討以下問題：創造一種自由的政治氣氛、黑人家邦的未來、改組南非廣播公司、檢討憲法的各原則如聯邦主義和臨時政府的創建和運轉。各方同意將在『足夠一致』的基礎上做出決定，雖然從未就此下過定義，但實際中指政府和非洲民族議會以及其它各方多數之間達成一致。

民主南非大會第一天平淡無奇，一直到結束時才發生了點事。會議前一天晚上我與戴克拉克先生在電話上一直討價還價到八點鐘。其中一件事是戴克拉克先生問我是否允許他第二天作最後發言。我原計劃致閉幕辭，我告訴他將與全國執委會討論這件事。當天晚上與他們討論這件事時，他們都有些擔憂，但我還是說服他們允許戴克拉克先生最後發言。我不是沒看到這件事的重要性，而是打算給戴克拉克先生一個機會。

會議結束時，一切看來都順利，我談了對話的重要性，接着戴克拉克先生講話。他強調了這件事的歷史意義，並談了克服相互間的不信任。然而接着戴克拉克先生做了件奇怪的事兒。他開始攻擊非洲民族議會沒有遵守與政府達成的協議。開始像小學校長警告一個調皮的孩子那樣對我們講話。他斥責非洲民族議會沒有開放武器貯存地點，然後責備我們保留「私人軍隊」——民族之矛，從而違犯了一九九一年九月的《全國和平協議》。他用十分惡劣的語言懷疑非洲民族議會是否能守信用並遵守它簽署的協議。

這是我不能忍受的，如果我讓戴克拉克先生最後的講話爲這次會議劃上句號的話，我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他講完話後，會議本來打算結束了。但房間裡變得十分肅靜。我沒讓會議結束，而是走向講臺。我不能不回擊他的話。我的聲音表明了我的憤怒。

> 我對戴克拉克先生今天的表現表示嚴重的關切。他猛烈攻擊非洲民族議會，而且爲了這麼做一點兒也不坦率。即使非法的、不守信用的政權，如他的政權那樣，其首腦也有一些道德標準要遵守。他不可原諒正因爲他是不遵守道德標準的不守信用政權的首腦……如果一個人能來參加這種性質的會議卻像他那樣玩弄政治手腕——那麼很少有人樂意與這樣的人打交道。

政府的成員勸我們允許他們最後發言。他們非常迫切希望最後發言。現在清楚了他們爲

什麼這麼做。他濫用這個位置，因爲他希望我不還擊。他完全錯了。我現在還擊了。

我說戴克拉克先生用這種語氣對我們說話是不可接受的。我強調，是非洲民族議會，而不是政府開始了和談的第一步，是政府，而不是非洲民族議會，一次又一次違背協議。我以前告訴戴克拉克先生，公開攻擊非洲民族議會沒有用，但他繼續這麼做。我強調我們停止武裝鬥爭以表明對和平的承諾，但政府仍在與那些進行戰爭的人勾結。我們已告訴他，只有在我們成爲收繳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時才交出武器。

我補充說，很明顯政府有一個雙重日程表。他們利用談判不是爲了和平，而是爲了自己在政治上得分。即使在談判時，他們仍在暗中資助對我們實施暴力的偷偷摸摸的組織。我提到最近揭露出來的醜聞，即向印卡塔提供上百萬資金，而戴克拉克先生稱他不了解此事。我說如果一個在他位置上的人『不知道這些事兒，那麼他就不適合當政府首腦。』

我知道我很嚴厲，但不想讓整個和談之船傾覆；我以更加和解的口氣結束了講話。

我請他把牌放在桌面上。讓我們一起開誠佈公地工作。別再有秘密的日程表。讓他不要因爲想濫用權力和攻擊我們，並希望我們不回擊而說服我們讓他最後發言。儘管他有這些錯誤，我還是打算與他一起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會又開始了它最後一天對話，戴克拉克先生和我都強忍痛苦，表明沒有進行過無可挽回的傷害。對話開始時，他和我公開握手，說我們將一起工作。但已失去許多信任，談判現在處於混亂中。

民主南非大會第一屆會議召開六周後，國民黨在該黨傳統的據點、川斯瓦保守的大學城波切夫斯特魯姆參加一次重要的補缺選舉的競爭。大爲吃驚的是，國民黨候選人被右翼保守黨候選人擊敗了。保守黨堅決反對政府與非洲民族議會談判的政策，該黨主要由布爾人組成，他們認爲戴克拉克先生讓步太多了。選舉結果似乎給戴克拉克先生的改革和談判政策打上了疑問。國民黨震驚了；在自己的心臟地區，自己的投票人在反對他們的政策！

戴克拉克先生決定孤注一擲。他宣佈，作爲波切夫斯特魯姆的補缺選舉的結果，他號召三月十七日全國所有白人進行一次公決，以讓南非人民就他的改革政策和與非洲民族議會的談判進行投票。他聲稱，如果在全民公決中遭到失敗，那麼他就辭職。公決向所有年滿十八歲的白人投票者問一個坦率而直接的問題：『你是否支持國家總統於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開始的正在通過談判產生一部新憲法的改革進程？』

非洲民族議會反對這次公決，因爲這是一次把所有非白人排除在外的投票。同時，我們

又是現實的：我們當然不想讓白人投票者阻礙戴克拉克先生促進談判的努力。雖然原則上藐視這次投票，我們還是希望白人投票贊成談判。我們將贊成票看成是支持談判的信號，而不一定表示支持戴克拉克。

我們懷着興趣和驚恐關注着戴克拉克先生的下場。他和國民黨進行了一次複雜的、耗資巨大的、美國式的政治選舉。報紙上、電視上、汽車上，廣告狂轟爛炸，集會上彩旗飄揚。我們將這次公決選舉看成是戴克拉克先生將針對我們的選舉的一次彩排。

結果，百分之六十九的白人選民支持談判，戴克拉克取得了很大勝利。他感到這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我認為勝利甚至使他頭腦有點膨脹。他的手更有力了，其結果，國民黨人的談判立場變強硬了。這可是個危險的策略。

一〇九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兩位最老的朋友和同志——沃爾特和奧利佛——的陪伴下，我宣布與妻子分手。情況已變得非常困難，我認為只有分手才最符合所有有關方面的利益，非洲民族議會、家庭和溫妮。雖然與非洲民族議會商量過此事，但分手完全是出於個人原因。

我讀了以下聲明。

我與我妻子溫妮·曼德拉同志的關係，已成了許多媒介閒談的話題。特發表此聲明，以正視聽，並希望這將終止人們進一步的猜測。

我和溫妮同志在我們國家爲解放而鬥爭的一個關鍵時刻締結了婚約，由於我們共同投身於非洲民族議會和結束種族隔離的鬥爭而帶來的壓力，我們沒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儘管有這些壓力，我們相互間的愛和對婚姻的專注更強烈了……

在我在羅本島度過的二十年歲月中，個人方面她是支持和安慰我的不可缺少的支柱。……溫妮同志自己承擔了養育孩子的繁重任務……她以驚人的毅力忍受着政府加在她身上的無數次迫害，從來沒有動搖過對自由鬥爭的承諾。她的頑強精神使我本人更加尊重她、愛她和喜歡她。這也贏得了世界大多數人對她的尊重。我對她的愛仍沒有減少。

然而，由於幾個月來在許多問題上的分歧，我們之間出現了緊張狀況。考慮到這些，我們一致認爲分手對我們兩人都是最好的辦法。我的行動不是由目前媒介對她的指控促成的……在她生活的這段困難時期內，溫妮同志可以繼續依靠我給予慷慨的支持。

我個人永不後悔溫妮同志和我試圖共享的生活。然而，我們無法控制的環境決定我們選擇其它的道路。我與她分手時毫無怨言，我以自從第一次見到她後在監獄內外從她那裡獲得的愛和溫情擁抱她。女士們，先生們，希望你們理解我經歷的痛苦。

也許是我對一些事情視而不見，因爲我感到了沒能對妻子盡丈夫的義務和對孩子盡父親的義務的痛苦。但正如我確信的那樣，我在獄中時妻子的生活比我的生活要壞得多，在許多方面，我回家對她來說比對我還困難。她與一個人結了婚，那個人不久就離開了她；那個人成了一個神話；然後那個神話回家了，證明他畢竟還是一個人。

正如後來在我女兒津齊的婚禮上我說過的那樣，好像過不穩定的個人生活是自由戰士的命運。如果你的生活就是鬥爭，像我的生活那樣，那麼就不會給家庭生活留下多少餘地。這一直是我最大的遺憾，我做選擇時最困難的方面。

『我們看着孩子不在我們的監護下長大，』我在那次婚禮上說，『我們眞的出獄後，孩子對我說，「我們以爲有個爸爸，他有一天會回來的。可讓我們沮喪的是，爸爸回來了，又獨自離開我們，因爲他現在成了國家的爸爸」』當一個國家的父親是莫大的榮幸，但當一個家庭的父親是更大的快樂。但後一種快樂我享受得太少了。

一一〇

一九九二年五月，經過四個月的中斷後，多黨會議在世界貿易中心召開第二次全會。這次會議稱爲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爲準備這次對話，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的談判者之間曾進

行過秘密會晤，非洲民族議會和其他政黨之間也進行過對話。這些會晤中最高級一次是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開幕前一天在我本人和戴克拉克先生之間進行的。這是自從第一次民主南非大會以來我們雙方的第一次私下會晤。

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開始前幾天，政府受到兩樁醜聞的打擊。第一樁醜聞是揭露出發展援助部的大規模腐敗和受賄，這個部是負責改善黑人家邦的黑人生活的，第二樁是高級政府安全官員被牽涉到一九八五年謀殺四名團結民主陣綫成員的案子裡，四個人中最有名的馬修·戈尼維（Mathew Goniwe）。揭露出來的醜聞爲以下嫌疑增加了最新證據，即警察插手了納塔爾的暗殺，以及軍事情報局在暗中進行反對非洲民族議會的行動。這兩樁醜聞降低了政府的可信性並且加強了我們的力量。

前幾個月內，政府曾提出無數個建議，都被棄置一旁。大多數建議，如輪流當總統的想法，都是想極力保留其權力。但經過過去幾個月的談判，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代表團一起提出一個暫時協議，該協議涉及分兩階段過渡期，過渡到一個完全民主的南非。第一階段，是從民主南非大會各代表團中指定一個多黨『過渡執行理事會』發揮臨時政府的作用，以爲各黨『平整比賽場地』和制訂一部臨時憲法。第二階段，是爲制憲會議和立法機構舉行大選，所有獲得百分之五選票或以上的政黨將參加內閣。制憲會議成員一半在全國基礎上選舉，一半在地區基礎上選舉，制憲會議將被授權既制定一部新憲法又通過立法。將由一個獨立的委

員會管理大選，以保證其自由和公平性。

然而，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還有許多問題不能達成協議，如制憲會議決定憲法問題和通過一部權利法案投票所必需的百分比。僅在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前幾天，政府提出建立第二個機構，即參議院，由地區代表組成，作爲一種確保少數否決權的途徑。他們還建議，在所有這些之前，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首先就一部臨時憲法達成一致，而起草臨時憲法需要幾個月。

所有這些討價還價都是在幕後進行的，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開幕之前，達成協議的前景看起來很暗淡。戴克拉克先生和我在多數懸而未決的問題上沒能達成一致。政府似乎準備無限期地等下去；他們的想法是，等的時間越長，我們失去的支持就越多。

會議在當天結束時陷入了僵局。此時，主持對話的兩位法官命令戴克拉克先生和我當天晚上舉行會晤，盡力找到讓步點。我們當晚確實喝着咖啡進行了會晤，雖然沒有找到打破僵局的辦法，但我們都同意談判不能失敗。『整個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我告訴他，『讓我們救救和平進程。讓我們達成某種協議。至少讓我們定下下一輪對話的日期。』我們決定第二天都以建設性的合作精神講話。

第二天下午，我們按照與第一次民主南非大會會議上同意的相反順序講話：戴克拉克先

生第一個，我最後一個。在講話中，戴克拉克先生堅持國民黨不尋求『少數否決權』，而是想要一種『檢查和平衡』制度，以使多數不能『濫用它的權力。』雖然這話對我來說當然是與多數人統治的思想完全對立的，但我在戴克拉克先生之後講話時，只是說我們需要以建設性態度工作，需要消除談判的緊張氣氛。

儘管我們努力以積極的態度對待談判，但第二天會議還是在僵局中結束了。在我看來，僵局是由於國民黨繼續不願讓他們的命運服從多數人的意願引起的。他們只是不能邁過這個門檻。

最後，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會議在四個主要問題上失敗了：政府堅持其代表在制憲會議中占不可接受的高比率，以通過憲法（實質上是後門否決權）；固守地區權力，這將對未來憲法有約束力；一個不民主的未經選舉的參議院，將對國會的立法有否決權；以及決心使由會議協商出的一部臨時憲法成爲永遠憲法。

這些都是困難的問題，但並不是不可解決的問題，我決心不讓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上的僵局破壞談判進程。政府和非洲民族議會同意繼續進行雙邊對話，以尋找解決方案。但是，就在此時，突然發生了其它事情，致使這件事變得不可能了。

隨着談判被拖延，非洲民族議會及其聯盟同意實行一種『此起彼伏的群衆行動』政策。

92.6.17

這將向政府顯示全國支持我們的程度，表明南非人民不準備爲他們的自由永遠等下去。群衆行動包括罷工、遊行示威和聯合抵制。開始群衆行動的日期被選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這天是一九七六年索韋托起義紀念日，該戰役的高潮原計劃爲八月三日和四日舉行爲期兩天的全國大罷工。

但在此之前，發生了另一件事，使得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之間的距離更遠了。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夜晚，全副武裝的印卡塔部隊秘密襲擊了博依帕通（Boipatong）的瓦爾鎭，殺死了四十六人。大部份死者爲婦女和兒童。這是那周第四次大規模殺害非洲民族議會的人。全國人民對這一暴力事件深爲震驚，指責政府是共犯。警察沒做任何事情來阻止罪犯和查找罪犯；沒有逮捕人，也沒進行調查。戴克拉克先生一言不發。我發現這成了終於不能忍受的最後一擊，我的耐心超過了極限。政府一邊在阻礙談判，一邊在偷偷摸摸地對我們的人進行戰爭。那麼爲什麼還要繼續與他們對話？

暗殺事件四天之後，我向兩萬名憤怒的非洲民族議會支持者發表講話。我告訴他們，我已命令非洲民族議會秘書長西里爾·拉馬福薩暫停與政府直接打交道。我還宣佈召開全國執委會緊急會議，重新審查我們的選擇。好像我們又回到了沙佩維爾（Sharpeville）的黑暗歲月。我把國民黨的表現比作德國的納粹，並公開警告戴克拉克，如果他尋求採取新的措施限制示威遊行或自由表達思想，非洲民族議會將發動一次全國範圍的反抗戰役，而我自己將成

為第一個自願參加的人。

在集會上，我看到標語上寫着，『曼德拉，給我們槍吧！』和『通過戰鬥而不是對話爭取勝利。』我理解他們的情緒，人民被激怒了。他們看到談判沒有取得積極結果。他們在開始想，推翻種族隔離的唯一途徑是用槍。博依帕通事件之後，全國執委會上有些人說，『我們為什麼放棄武裝鬥爭？我們應該放棄的是談判；他們永遠不會讓我們達到目標的。』起初我也是強硬路綫者之一，但漸漸認識到，捨此別無選擇。這是我多年渴望的事情，我不會放棄談判的。但現在該把事情冷卻下來。在此情況下，群衆行動是武裝鬥爭和談判之間的一條中間道路。人民必須發洩一下他們的憤怒和挫折，而群衆行動是發洩這些情感的合適方式。

我們通知政府中止對話時，曾送給戴克拉克先生一份備忘錄，列舉了我們退出談判的理由。除了解決民主南非大會上的憲法僵局外，我們要求將對暴力負責的人查找出來繩之以法，並找到一些方法將這麼多暴力的溫床包圍起來以維持秩序。戴克拉克先生又回送我們一份備忘錄，要求與我進行面對面會晤，遭到了我們的拒絕。我覺得這樣一次會晤會讓人認為我們有什麼好談似的，但當時我們沒有。

群衆行動戰役在八月三日和四日的總罷工中達到高潮，以支持非洲民族議會的四百多萬工人待在家中，罷工的中心是十萬人向南非政府所在地普利托利亞雄偉的聯邦大廈進軍，我

們在大廈前的大草坪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露天集會。我對群衆說，有一天我們將作爲南非第一屆民主選舉政府駐進這些大廈。

面對群衆行動，戴克拉克先生說，如果非洲民族議會使國家無法控制的話，政府可能被迫進行一些令人不快的選擇。我警告戴克拉克先生說，任何反民主的行動將產生嚴重的影響。我說，正是由於這種威脅，建立一個過[redacted]十分關鍵。

受這次群衆行動戰役成功的鼓舞，非洲民族議會內的一些人決定向東開普的西斯凱黑人家邦的首府比索（Bisho）進軍，西斯凱是一個由烏帕·戈庫佐（Oupa Gqozo）准將領導的班圖斯坦，歷史上鎭壓過非洲民族議會，一九九一年，戈庫佐准將宣布在西斯凱實行緊急狀態以減少他所稱的非洲民族議會組織的恐怖主義。一九九二年九月七日，七萬名抗議者開始了向比索主體育場的進軍。當一組進軍者試圖衝過一個柵欄的開口處走另一條路進城時，訓練得糟糕的軍隊向進軍者開了槍，殺死二十九人，殺傷二百多人。現在與博依帕通一樣，比索也成了暴行的同義詞。

正如老話所說，黎明之前最黑暗。比索悲劇導致了重新開始談判。我會晤了戴克拉克先生以找到共同點，以及避免類似比索悲劇的重演。我們各自的談判者開始了定期會晤。雙方都在努力使談判重新回到軌道上來，九月十六日，戴克拉克先生與我進行了一次正式最高級

會晤。

那天，戴克拉克先生和我簽署了《諒解協議》，該協議爲以後的所有談判確定了模式。協議決定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審查警察的行動，建立一種限制危害公共危險的制度，以及禁止在集會中攜帶「傳統武器」。但《諒解協議》的眞正重要性在於它打破了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的憲法僵局。政府最終同意，接受一個單一的、選舉產生的制憲會議，它將通過一部新憲法，並作爲新政府的過渡立法機構。所有剩下需要談判的是選舉制憲會議的日期，以及它做出決定所必需的多數百分比。現在我們在將給國家帶來一個民主未來的基本框架上成了同盟者。

《諒解協議》促使印卡塔宣佈退出涉及政府和非洲民族議會的所有談判。這個協議激怒了布特萊齊酋長，他斷絕了與國民黨的關係，與一幫沒有信譽的家邦領導人和只關心得到一個布爾人家邦的白人右翼政黨結成了同盟。布特萊齊酋長呼籲取消《諒解協議》，結束民主南非大會和解散民族之矛。

正如喬·斯羅夫提出停止武裝鬥爭的倡議那樣，他又一次帶頭提出一個有爭議的建議：一個民族團結政府。十月份，喬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與政府的談判不是我們可以向戰敗的敵人提出條件的休戰談判。非洲民族議會操縱政府的槓桿也許需要幾年時間，甚至在進行一次選舉之後。而一個非洲民族議會政府仍將需要目前的許多公務員來管理國家。喬提

出一個『日落條款』的建議，提出成立一個民族團結政府，包括在固定期限內與國民黨分享權力，赦免安全官員，與公務員簽合同。在非洲民族議會內，『分享權力』是一個貶義詞，認爲這是政府尋求少數否決權的代名詞。但這種情況下它僅僅意味着，國民黨將成爲任何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的一部份，只要它得到足夠的票數。

經過多次討論之後，我支持喬的建議，十一月十八日該建議又得到了全國執委會的批准。全國執委會同意支持權力分享，條件是少數新黨沒有否決權。十二月份，我們與政府又開始了新一輪秘密雙邊會談。這次會談是在叢林中的一個獵人旅館中舉行的，共用了五天時間。後來證明這次會談對於鞏固《諒解協議》確立的基礎是重要的。在此次叢林會晤中，我們原則同意建立一個爲期五年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大選中獲得百分之五以上選票的所有政黨都按比例在內閣中有代表。五年以後，民族團結政府將成爲一個簡單的多數統治政府。二月份，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宣佈原則同意爲期五年的民族團結政府、一個多黨內閣和建立一個過渡行政委員會。選舉將盡早在一九九三年年底舉行。

一一一

我一直認爲，一個人應該在他的出生地附近有一個家。從獄中獲釋之後，我就計劃在庫奴爲自己建一座鄉村別墅。一九九三年秋，別墅竣工了。這是根據我在維克多韋斯特住的房

子建的。人們常常談論這件事，但答案是簡單的：維克多韋斯特的房子是我曾住過的第一個寬敞和舒適的家，我非常喜歡他。我已習慣了它的面積，這樣在庫奴時我就不必在晚上來回跑着找廚房住了。

四月份我在川斯凱的家中短期度假。四月十日早上，我剛出去見川斯凱警察橄欖球隊的幾個隊員，管家匆匆跑出來，告訴我有個緊急電話。她一邊說着一邊哭泣。我從幾個年輕人那兒脫身，從一位同事那兒知道，南非共產黨總書記、前民族之矛總參謀長、非洲民族議會最受歡迎的人之一克理斯·哈尼（Chris Hani）在約翰尼斯堡的博克斯堡的家前被近距離平射身亡，博克斯堡住的大多是克理斯一直想團結的白人勞動階級。

克理斯的死對我本人和非洲民族議會都是一個打擊。他是一名戰士和一個愛國者，對於他來說任務沒有大小之分。他在南非青年中是一位偉大的英雄；一個替他們說話而他們又願意聽的人。如果說在談判解決之後有誰能調動任性的青年的話，那就是克理斯。南非現在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兒子，他在使這個國家轉變爲一個新國家方面曾起過無可估量的作用。

國家還很脆弱。有人擔心哈尼的死可能觸發一場種族戰爭，因爲青年認爲他們的英雄成爲一名烈士，他們願爲他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先乘直升飛機去了薩巴勒勒（Sabalele），向克理斯的八十二歲的老父親表示哀悼，這是川斯凱的一個骯髒的小村莊，我對川斯凱很熟悉，因爲這是馬坦奇馬家族的地盤。當我到了這個沒有自來水和電的村莊時，我驚奇於這麼

小而窮的村莊怎麼能夠產生像克理斯·哈尼這樣的人。他對農村窮人的關心來自他在薩巴勒勒的童年，因爲他的根已深深地扎了下來，他永遠不會失去它們。克理斯的父親慷慨激昂地訴說了失去兒子的痛苦，但對他死在鬥爭中表示滿意。

返回約翰尼斯堡時，我聽說警察逮捕了一名好戰的右翼白人組織的成員，他是一名從波蘭來到南非的移民，在一位勇敢的白人婦女打電話向警察報告凶手的汽車牌照號碼後，他就被抓獲了。這次暗殺是一次瘋狂的孤注一擲的行動，企圖使談判出軌。我被要求當天晚上在南非廣播公司向全國發表講話。在此情況下，是非洲民族議會，而不是政府，力求讓全國冷靜下來。

我說，和平與談判進程不能停止。我以我所具有的全部權威，說道：『我請求我們所有的人保持冷靜，通過爲和平保留一支守紀律的部隊來紀念克理斯·哈尼。

今天晚上，我發自內心深處向每一位南非人，不論黑人還是白人，發表講話。一個白人，帶着滿腔偏見和仇恨，來到我們國家，幹了一件卑鄙的事，從而使我們國家陷入災難的邊緣。一名荷蘭後裔的白人婦女，冒着生命危險，從而使人們知道凶手並將他繩之以法……現在時候到了，所有南非人都應站在一起，反對來自任何角落、妄圖毀掉克理斯·哈尼爲之犧牲的我們的自由的人。

暗殺克理斯是白人優越論者企圖阻止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們寧肯讓國家陷入內戰也不願通過和平辦法實行多數人統治。

我們採取了一種策略，先安撫非洲民族議會內我們自己的選民。爲了阻止報復性暴力的爆發，我們在全國安排了爲期一周的系列集會和遊行。這將給人們提供一種表達憤怒的途徑而不訴諸武力。戴克拉克先生和我私下談過話，同意我們將不讓哈尼的死導致談判出軌。

幾天內我們獲悉，一名保守黨黨員克萊夫·德比路易斯（Clive Derby－Lewis）因與此暗殺案有關而遭逮捕。這又一次證實了第三勢力的存在。克理斯本人曾批評最近有人從一個空軍基地偷竊武器；警察的初步報告指出，殺死他用的槍來自那個倉庫。

正好兩周以後，又有一名重要人物去世。這不像克理斯的死那樣震撼全國，但震撼了我。奧利佛身體不好已好長時間，但這次致命的發作來得如此突然，一點兒警告都沒有。他妻子一大早給我打電話，我急忙衝到奧利佛的床邊。我連與他好好說聲再見都沒來得及，因爲他已經走了。

哲學家柏拉圖在有關金屬的比喻中，把人分爲金、銀、鉛三類。奧利佛是純金的，金子存在於他閃光的智慧中，存在於他的熱情和仁愛中，存在於他的容忍和慷慨中，存在於他可

靠的忠誠和自我犧牲精神中。正如他作爲一個領導人受到我的尊敬那樣，他作爲一個男人也受到我深深的愛戴。

雖然我在獄中的那麼多年時間裡一直沒與他在一起，奧利佛從未遠離過我的思想。即使我們被分開了，我一生中都在以許多方式在心裡與他進行談話。這也許是他死後我感到失去這麼多的原因。正如我告訴一位同事的那樣，我感到成了世界上最孤獨的人。好像正是因爲我們重逢了才將他從我身邊奪走。當我看到他躺在棺材裡時，好像我自己的一部分死去了一樣。

我們雖然沒有掌權，但我想爲奧利佛舉行國葬，而這是非洲民族議會給予他的。在索韋托一個體育場舉行的群衆集會上，幾百名來自外國政府的貴賓聚在一起向奧利佛致意，正是他在非洲民族議會被放逐的歲月中使它保存了下來。民族之矛部隊爲他送葬，並在他墓旁鳴炮二十一響致哀。奧利佛活着時看到了囚犯獲釋、流放犯回國，但他沒能活着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南非投上一票。這樣的任務尚有待去完成。

一一二

雖然很少人將記住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但它是南非歷史上一個里程碑。經過在世界貿易中心的數日談判之後，這一天是多黨論壇投票選舉的日期：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黑

人多數將走向投票站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這在南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協議規定，投票人選舉出四百名制憲會議的代表，制憲會議不僅制定一部新憲法，而且發揮議會的作用。制憲會議召開之後，第一件事是選出一位總統。

對話於四月份重新開始。這一次，二十六個政黨包括印卡塔、泛非主義者大會和保守黨。我們幾個月來一直敦促政府確定一個日期，而他們一直在拖延。但現在日期已白紙黑字寫了出來。

一個月後的七月份，多黨論壇就臨時憲法第一稿達成一致。它規定了兩院制議會，一個是有四百名議員的國民議會，從全國和地方政黨的名單中選舉產生，按比例分配席位；另一個是參議院，由地區立法機構間接選舉。地區立法機構的選舉與全國選舉同時進行，而且地區立法機構可以制定他們自己的與全國憲法一致的憲法。

布特萊齊酋長想在選舉之前就制定出憲法，他站出來反對在最後制定憲法之前確定選舉日期。八月份臨時憲法第二稿給了地區更大的權力，但這並未安撫布特萊齊酋長和保守黨。保守黨說這些決定敵視白人的利益。由南非國防軍一位前領導人康斯坦德·維容（Constand Viljoen）將軍領導的、稱爲白人人民陣綫（Afrikaner Volksfront）的一個集團形成了，目的是把保守的白人組織團結在白人家邦的思想周圍。

十一月十八日午夜剛過，一部臨時憲法在一次多黨會議全體會議上獲得通過。政府和非

洲民族議會已清除了最後的障礙。新內閣將由贏得百分之五以上選票的人組成，經過一致同意作出決定，而不是政府提出的三分之二多數；全國選舉一九九九年前不舉行，以使民族團結政府任滿五年；我們堅持選舉用單一選票，而不是全國和地方立法機關用單獨的選票，最後，政府作出了讓步。對於我來說，兩張選票將把多數投票者搞糊塗，大多數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投票。在選舉前的這段時期，由來自各政黨成員組成的『過渡行政委員會』將爲選舉確保合適的氣氛。事實上，『過渡行政委員會』將成爲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七日選舉之間的政府。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獨立的選舉委員會將負責管理選舉。我們已眞正站在了新紀元的門檻上。

我從沒怎麼關心過個人的獎勵。如果就希望獲獎，一個人是不會成爲自由戰士的，但當我被通知說我與戴克拉克先生一起獲得一九九三年諾貝爾和平獎時，我被深深觸動了。諾貝爾和平獎對我來說具有特殊意義，因爲它與南非歷史有關。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被諾貝爾獎委員會授予此榮譽的第三位南非人。阿爾伯特·盧圖利一九六〇年榮獲此獎。第二個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他在種族隔離最恐怖的日子裡無私地與種族主義的邪惡作鬥爭。

該獎是給予所有南非人的、特別是那些在鬥爭中戰鬥過的人；我將代表他們接受此獎。

但諾貝爾獎是我從來沒想過的。即使在羅本島的最暗淡的日子裡，國際特赦組織也不贊成我們，理由是我們主張武裝鬥爭，而他們的組織不代表任何喜歡暴力的人。正因爲此原因，我估計諾貝爾委員會永遠不會考慮將和平獎授予創立了民族之矛的人。

我對挪威懷着極大的崇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當我們去西方國家尋求他們贊助非洲民族議會時，都遭到了拒絕。但在挪威，他們張開雙臂歡迎我們，爲我們的合法自衛提供幫助、獎學金和金錢，並給政治犯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我利用在挪威的發言不僅感謝諾貝爾獎委員會，並勾勒出一個公正和公平的未來南非的面貌，而且向我的獲獎伙伴戴克拉克先生致意。

> 他有勇氣承認，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是對我們國家和人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他有遠見理解和接受，所有南非人民必須通過談判並作爲該進程的平等參與者，共同決定和創造他們所希望的未來。

常有人問，我怎麼能在這麼嚴重地批評過戴克拉克先生之後與他共同接受此獎。雖然我不打算收回我的批評，但我可以說他對和平進程作出了眞誠的和不可或缺的貢獻。我從不尋求貶低戴克拉克先生，這是因爲他越軟弱，交涉的過程亦越脆弱。與一個敵人講和必須與那

個敵人一起工作，然後那個敵人成爲你的伙伴。

雖然國民議會的正式競選按計劃到一九九四年二月才開始，但我們在新憲法被批准後就認眞地開始競選了。他們沒有讓我們搶先；國民黨在把我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那天就開始競選了。

雖然民意調查表明非洲民族議會遙遙領先，我們從不想當然地認爲會勝利。我告誡每個人都不要過於樂觀。我們都知道，許多政黨正爭取第二大黨。我們面對着一個經驗豐富、組織完善的和資金充足的對手。

我們的競爭是在波波·莫利夫（Popo Molefe）、特羅爾·萊卡塔和凱索·戈爾丹（Ketso Gordhan）的有力領導下進行的，他們都是擅長動員群衆的老資格的團結民主陣綫活動家。這是件難應付的工作。我們估計有超過兩千萬人去投票站，他們多數是第一次投票。我們的多數投票者都是文盲，他們有可能僅僅被投票的想法嚇住。據獨立選舉委員會的人說，將在全國設一萬個投票站。我們尋求訓練十萬人幫助教育投票人。

我們競選努力的第一階段是人們所知道的人民論壇。非洲民族議會候選人到全國旅行，在城鎮、村莊召集會議，以聽取人民的希望和擔憂、意見和抱怨。人民論壇類似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競選總統時在美國召集的城鎮會議。論壇是人民的議會，而不像我小時在大王

宮看到的酋長會議。

我極喜歡這種人民論壇。我十一月份從納塔爾開始，然後去了北川斯瓦和奧蘭治自由邦等地。我一天參加多到三、四個座談會。人民自己也非常喜歡這種方式。還沒有人就應該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怎麼做徵求過他們的意見。

在吸收了來自人民論壇的建議之後，我們到全國向人民發表競選演說。非洲民族議會的一些人僅僅想使競選成爲一次解放選舉，告訴人民，我們解放了你們，投我們的票吧。相反，我們決定向他們展示我們想建立的南非的前景。我們想讓人們投非洲民族議會的票，不僅因爲我們與種族隔離戰鬥了八十年，而且因爲我們最有資格爲他們帶來他們想生活在其中的那種南非。我覺得，我們的競選應描繪未來而非多談過去。

非洲民族議會起草了一份一百五十頁的文件，稱爲《重建和發展計劃》，其中概括地闡述了我們的計劃：通過公用工程產生工作機會；建築一百萬供電、帶抽水馬桶的新房；把基本醫療保健和十年免費教育擴大到所有南非人；通過土地賠償法院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基本食物的增值稅。我們還承諾在私營和公營領域採取廣泛而斷然的行動。這個文件被簡化成了一句宣言，叫作『爲了讓所有人過得更好』。後來它成了非洲民族議會的競選宣言。

正如我們告訴人民我們將做什麼，我覺得我們還必須告訴他們我們不能做什麼。許多人以爲經過一次自由和民主選舉，生活會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但情況遠非如此。我常對人們

說，『不要期望選舉後會開賓士轎車或在自己家後院的游泳池裡游泳。生活不會突然發生變化，除了你會增強自尊、成爲自己國家的一名公民之外。你必須有耐心。你可能得等五年才會看到結果。』

我教人民去迎接挑戰而非照顧救濟他們。『如果想繼續生活在沒有衣服和食物的貧窮中，』我告訴他們，『那就去酒館喝酒吧。但如果想生活得好些，就必須努力工作。我們不能爲你們做所有的事兒；你們必須自己去做。』

我告訴白人聽衆，我們需要他們，不想讓他們離開這個國家。他們像我們一樣也是南非人，這也是他們的國家。我不會就種族隔離帶來的恐怖呑呑吐吐，但我一遍又一遍地說，我們將忘掉過去，集中精力爲所有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每一次集會還旨在教會人們如何投票。選票本身是一張長窄條紙，各黨按逆序列在左邊，然後右邊是該黨的象徵和領導人的照片。投票人將在他們所選政黨旁邊的方框內畫一個『X』。我告訴聽衆，『選舉日那天，看一下選票，看到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時，就畫個X。』

一一三

通向自由的道路遠非平坦。雖然過渡行政委員會在新的一年裡開始發揮作用，但一些政

黨退了出來。印卡塔拒絕參加競選，實行政治抵制。茲韋利提尼國王在布特萊齊會長的支持下，呼籲成立一個自治和擁有主權的夸祖魯，勸阻本省的每一個人不要參加投票。白人右翼稱選舉是一次背叛，叫囂成立一個人民陣綫，然而他們還沒有提出這個人民陣綫應建在哪兒以及它如何運作。在整個南非，沒有一個行政區的白人占當地居民的多數。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二日是所有政黨登記的截止日期，那天，印卡塔、保守黨、白人人民陣綫沒有註冊登記。博普塔茲瓦納家邦政府繼續拒絕參加一個統一的南非。我對這些重要的國民集團選擇不參加感到不安。我們提出一些重要的讓步：我們同意省級和全國立法機構的選舉用兩張選票；保證省一級享有更大的權力；將納塔爾重新命名爲夸祖魯/納塔爾；肯定擁有共同文化和語言遺產的集團『內部』自決的原則將包括到憲法中去。

我安排三月一日在德班會晤布特萊齊會長。『我將跪下來求那些想把我們的國家拖入血腥廝殺中的人，』這次會晤前我在一次集會上說。我承諾將我們在憲法上的分歧提交國際調停，作爲交換，布特萊齊會長同意登記參加省級選舉。我愉快地同意了。在最後登記截止期前，維容將軍也在一個自由陣綫的新黨名義下登了記。

雖然博普塔茲瓦納總統盧卡斯·曼戈普（Lucas Mangope）選擇不讓他的黑人家邦參加選舉，但不久，歷史潮流改變了局勢。我在許多場合下都敦促他讓人民自己決定，但他聽不進去。那些想參加的人發動了群衆示威和罷工，這迅速蔓延到了博普塔茲瓦納全體公務員。

廣播和電視網癱瘓了。在大街上，警察與罷工的工人和學生之間爆發了戰鬥。曼戈普請求他的白人右翼同盟者給予軍事援助。不久，他自己的部隊拋棄了他，他在三月初的一次軍事政變中被驅逐了出去。幾周之後，西斯凱的戈庫佐准將投降，請南非把他的家邦收回去。

納塔爾的暴力在惡化。印卡塔支持者阻礙納塔爾競選的努力。十五名非洲民族議會競選工作人員在張貼非洲民族議會的海報後被槍擊刀砍至死。三月份，約翰·克里格爾（Johann Kriegler）法官向我和戴克拉克先生匯報說，由於局勢不穩定以及夸祖魯政府不合作，不進行直接的政治干預就不能在那兒進行自由選舉。爲了在納塔爾顯示我們的力量，非洲民族議會舉行了通過德班中心的群衆遊行。然後印卡塔也想在約翰尼斯堡組織類似的事情，但產生了可怕的後果。

三月二十八日，數千名印卡塔成員，揮舞着長矛和圓頭棍，向約翰尼斯堡市中心進軍參加一個集會。同時，一幫印卡塔武裝人員試圖進入非洲民族議會總部，但被武裝衛兵拒絕了。身份不明的人還在市中心掃射，總共有五十三人喪生。這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似乎南非已處於內戰的邊緣。印卡塔妄圖拖延選舉，但戴克拉克先生和我都毫不動搖。

我曾同意國際調停，四月十三日，一個代表團來了。代表團由前英國外交秘書卡林頓勛爵、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率領。但當印卡塔被告知說選舉日期不在調停範圍之內時，他們拒絕會見調停者。調停者沒有與任何人談話就離開了。現在布特萊齊曾長知道選舉無論

如何是要進行的。四月十九日，選舉幾天前，布特萊齊酋長接受承認祖魯君主政體的憲法地位的建議，同意參加選舉。

投票十天前，戴克拉克先生和我按計劃舉行一次電視辯論。在黑爾堡時我曾是一名不錯的辯論者，剛參加非洲民族議會的幾年裡也在講臺上多次參加激烈的辯論。在羅本島時，我們還口含石子兒鍛鍊辯論能力。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感到自信。但那天前，我們舉行了一次模擬辯論，記者阿里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成功地扮演戴克拉克先生。據我的競選顧問說，他扮演得太成功了，他們說我說話太慢、進攻性還不夠。

然而，眞正辯論的時間到來時，我十分堅定地向國民黨發動了進攻。我指責國民黨在開普的混血種人和非洲人之間煽動種族仇恨，它散發一種具有煽動性的連環畫書，上面說非洲民族議會的口號是『殺死混血種人，殺死農場主。』我宣稱，『這個國家沒有一個組織像新的國民黨一樣想引起分裂，』當戴克拉克先生批評非洲民族議會把幾十億美元花在住房和社會計劃上時，我指責說，他被我們把這麼多資源用於黑人身上嚇壞了。

但隨着辯論接近尾聲，我感到對這個將在民族團結政府內成爲我的伙伴的人太嚴厲了。在總結時，我說，『戴克拉克先生和我之間交換意見不應妨礙一個重要的事實。我認爲，我們對全世界都是一個閃光的榜樣，我們來自不同的種族集團，但對共同的國家有共同的忠誠

和共同的愛……儘管我對戴克拉克先生進行了批評，』然後看着他說，『先生，你是我信賴的人之一。我們將共同面對這個國家的問題。』說到這裡，我伸出手去握他的手，並說道『我對握着你的手與你共同前進感到自豪。』戴克拉克先生顯得有些吃驚，但很高興。

一一四

我是四月二十七日投的票，這是四個投票日的第二天，我選擇在納塔爾投票，以向那個被分裂的省的人民表明，去投票站沒有危險。我在德班北部一座綠色的山城曼達鎭的一所中學裡投了票，因爲非洲民族議會第一任主席約翰·迪布（John Dube）就埋葬在那裡。這位非洲愛國主義者在一九一二年幫助建立了該組織，而在他墓邊投票正好使歷史完成了圓滿的一圈，因爲他八十二年前開始的使命將要完成了。

當我站在校園內他墓地旁邊時，我想的不是現在而是過去。我走向投票站時，我想到了那些英雄，正是因爲他們倒下了，我今天才能站在那兒；想到了那些爲了事業作出了最終貢獻的男人和女人，這個事業終於成功了。我想到奧利佛·坦博、克理斯·哈尼、盧圖利酋長和布拉姆·菲希爾。我想到了偉大的非洲英雄，他們的犧牲換來了數百萬人能在那天投票；我想到了約翰·迪布、喬塞亞·古梅德（Josiah Gumede）、G·M·奈克爾、海倫·約瑟夫（Helen Joseph）、優素福·達杜、摩西·科坦尼。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不是獨自去投票站

的；我是與他們一起投票的。

進入投票站之前，一個新聞工作者衝我喊道：『曼德拉先生，你投誰的票？』我笑了，我說：『你知道，我整個早上都在為選擇而煩惱。』我在ANC（非洲民族議會）字母旁邊的方框內畫了個╳，然後把折疊的選票投進了一個簡單的木箱子裡；我投了一生中第一張票。

那天，南非人走向投票站的形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大隊大隊耐心的人彎彎曲曲地排在鄉鎮和城市骯髒的馬路和街道上；為投這第一張票已等了半個世紀的老婦人說，她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像人一樣；白膚色男人和女人說，他們為終於生活在一個自由國家裡感到驕傲。投票的那些天裡，整個國家都沉浸在歡樂之中。暴力和爆炸停止了，好像我們是一個新生的國家似的。即使投票有後勤保障困難、放錯了選票、投票站被偷、以及在某些地方作弊的傳言，都不能抹殺民主和正義壓倒性的勝利。

統計選票結果用了幾天時間。我們得到了全國百分之六十二的選票，略低於我們希望不用別的政黨支持就能通過最終憲法的三分之二。這個得票率使我們在國民議會的四百席位中占二百五十二席、非洲民族議會完全支配了川斯瓦北部和東部、開普西北部和東部以及自由邦，而在國民黨取得勝利的西開普，我們贏得了百分之三十三的選票。他們在混血種人選民

中幹得很漂亮。我們在夸祖魯/納塔爾贏得了百分之三十二的選票，印卡塔在那兒取得了勝利。在納塔爾，由於擔心暴力和恐嚇，我們的許多投票者待在家中。也有人說，投票中有作弊現象。但最終，這都沒關係。我們低估了印卡塔在夸祖魯的力量，而他們在選舉中則顯示了這種力量。

非洲民族議會內一些人對我們沒邁過三分二這個門檻感到失望，但我並不這麼認爲。事實上我感到輕鬆；如果我們贏得了三分之二，能夠不受別人意見的約束就制定一部憲法，人們會說我們制定了一部非洲民族議會憲法，而不是南非憲法。我想要一個眞正的民族團結政府。

五月二日傍晚，戴克拉克先生作了一個莊重的卸職演說。經過三百多年的統治之後，白人少數被迫承認失敗，並把權力交給黑人多數。那天晚上，非洲民族議會打算在約翰尼斯堡鬧市區的卡爾頓飯店的舞廳舉行勝利慶祝大會。我正患着嚴重的流行性感冒，醫生讓我待在家裡，但什麼病也不能阻止我去參加那個晚會。我在大約九點鐘趕到了會場，面前是一群興奮、微笑和歡呼的人。

我向人們解釋，我的聲音因感冒而嘶啞，醫生建議我不要參加。我對他們說：『我希望你們不要告訴他我違犯了他的命令。』我對戴克拉克先生的堅強表現表示祝賀。我感謝非洲

民族議會和在這個民主運動中長期努力工作的所有人。偉大的自由戰士馬丁·路德·金的妻子科雷特·斯科特·金也坐在牆邊的椅子上。我引用他丈夫不朽的名言時看了看她。

這是我們國家生活中一個最重要的時刻。我站在你們面前，心裡充滿着無比的驕傲——爲這個國家普通而謙遜的人民而驕傲。爲把這個國家重新收歸己有，你們表現出了冷靜而有耐心的決心。現在我們可以站在屋頂，大聲地宣告我們的快樂——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我站在你們面前，爲你們的勇氣所折服，內心對你們大家充滿愛意。我把在我們歷史中的這一時刻領導非洲民族議會看作是最高榮譽。我是你們的僕人……起作用的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現在是醫治舊創傷和建立新南非的時刻了。

選舉結果出來後，很明顯非洲民族議會將組成政府，從那一時刻起，我就把我的使命看作是宣傳和解、包紮國家的傷口以及培養信任和信心。我知道許多人，尤其是少數人，白人、混血種人和印度人，對未來有種憂慮感，而我想使他們感到安全。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人們，解放鬥爭不是針對任何團體或任何人種的戰鬥，而是反對高壓制度的戰鬥。一有機會我就說，所有南非人現在必須團結起來，攜起手來，說我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共同走向未來。

一一五

五月十日一大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在過去幾天裡，我一直愉快地被到來的貴賓和世界領導人包圍着，他們是在大典之前來表示祝賀的。大典將是南非領土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世界領袖的聚會。

典禮在普利托利亞聯邦大廈內的沙石結構圓形劇場舉行。幾十年來，這裡一直是白人最高層的座位，現在這兒成了美妙聚會的場地，不同膚色和國家的人爲南非第一個民主、非種族歧視政府的建立聚集在了這裡。

那天秋高氣爽，由女兒陪伴着我。主席臺上，戴克拉克先生第一個宣誓就任第二副總統。然後，薩博·姆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總統。輪到我時，我發誓遵守和擁護憲法，致力於這個共和國及其人民的福利。面對到來的客人和正在觀注着這裡的全世界，我說：

今天，我們大家聚集在這裡……表達我們對剛剛誕生的自由的讚美和憧憬之情。在經歷了非常的、持久的人類災難之後，必將誕生一個全人類都爲之驕傲的社會。……我們，不久之前還是強盜，今天被給予在我們自己領土上當家作主的寶貴權力。我們向所有尊貴的國際來賓表示感謝，感謝他們來這裡與我們的人民一起，接受正義、和平、人類尊嚴的共同勝利。

我們終於取得了政治解放。我們發誓把我們所有人民從貧困、權力被剝奪、苦難、災禍和其它歧視中解放出來。

不要，不要，再也不要讓這片美麗的土地經歷一些人壓迫另一些人的事……面對這麼光輝的人類成就，太陽是永遠不會降落的。

讓自由光照千秋。上帝保佑非洲！

過了一會兒，我們都敬畏地望着天空：只見南非噴氣式飛機、直升機和運輸機排着整齊的方陣在聯邦大廈上空咆哮着，景象蔚爲壯觀。這不僅是展現其高度精確性和軍事力量，而且是表示軍隊對民主、對自由、對公平選舉出來的新政府的忠誠。就在前不久，南非國防軍和警察的最高將軍，胸前掛滿了舊時代的綬帶和勛章，來向我致意和表示效忠。我對這樣的事實不是不在意：僅僅幾年前，他們不是向我致意而是逮捕了我。最後，『黑斑羚』噴氣式飛機留下了一片黑、紅、綠、藍和一排波浪形金黃色相間的新南非國旗狀烟霧離去。

對於我來說，那天具有象徵意義的是奏兩個國歌，白人唱了一首，黑人則唱了另一首。那一天，雖然沒有誰知道他們曾唾棄的國歌的歌詞，但不久他們就會牢記心中的。

就職典禮那天，我心中充滿了歷史感。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即在痛苦的盎格魯——布

爾人戰爭幾年之後、我出生之前，南非的白人匆匆解決了他們的分歧，建立了一個反對在自己土地上的黑人的種族統治制度。他們建立的制度形成了這個世界迄今所知道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社會的基礎。現在，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即我的第八個十年中，該制度被永遠推翻了，代之以一個不管膚色如何承認所有人的權力和自由的制度。

這一天的到來是靠千百萬人難以想像的犧牲換來的，他們受的苦難和他們的勇氣難以訴說或報答。那天，如同其它許多時候一樣，我感到我只是在我之前犧牲的所有南非愛國人士。和那排長長的、尊貴的隊伍結束了，現在又從我這兒開始了。我爲不能夠向他們表示感謝以及他們不能夠親眼看到他們用生命換來的結果而感到痛苦。

種族隔離政策在我們國家和人民身上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創傷。我們將要花許多年，如果不是許多代的話，才能從這種深深的傷害中恢復過來。但幾十年的壓迫和暴行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是它產生了我們時代許多奧利佛·坦博、沃爾特·西蘇魯、盧圖利酋長、優素福·達杜、布拉姆·菲希爾、羅伯特·索布克威——這些人有過人的勇氣、才智和度量以後，可能再也不會有他們這樣的人了。也許是這麼深重的壓迫才能產生這麼卓越的性格。我們國家地下有豐富的礦產和寶石，但我一直認爲，它最大的財富是它的人民，比最純的鑽石更純潔、更眞誠。

我正是從這些同志的鬥爭中知道了勇敢的意義。一次又一次，我看到男人們和女人們爲

着一個理想去冒生命危險。我見到過人們面對着攻擊和折磨而面不改色心不跳，表現了難以想像的力量和忍耐力。我知道，勇氣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戰勝它。我記不清有多少次感到過害怕，但我把它藏在了勇敢的後面。勇敢的人不是不感到恐懼的人，而是能戰勝恐懼的人。

我對將出現這個偉大的變革從沒有失去過希望。不僅是由於我前面所列舉的偉大英雄們，而且是由於我們國家普通人的勇氣。我一直認爲，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仁慈之心和慷慨之心。沒有人由於他的膚色、他的背景或他的宗教生來就恨另一個人。人們的恨一定是學來的。而如果他們能學會恨，那麼一定能教會他們愛，因爲人心裡與生俱來的更多的是愛而不是恨。即使我在獄中最殘酷的年月裡，當同志們和我陷入山窮水盡時，我在一個衛兵身上發現人性的閃光，也許只有那麼一刹那，但這足以使我恢復信心，繼續前進。人的善良是一團你可以把它藏起來、但不能將它撲滅的火焰。

當我們睁大雙眼開始鬥爭時，從來沒有幻想道路是平坦的。當我年輕輕加入非洲民族議會時，就看到了同志們爲信仰付出的代價，代價是高昂的。對於我自己來說，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投身於鬥爭中，我一直準備着面對降臨到我個人頭上的苦難。但我的家庭爲我投身於革命而付出了痛苦的代價，也許是非常昂貴的代價。

在生活中，每一個男人都有兩個義務——一個是對家庭的義務，對父母、妻子和孩子的

義務；另一個就是對他的人民、社會、國家的義務。在一個文明的、人道的國家裡，每一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能力完成這些義務。但在像南非這樣的國家，像我這種出身和膚色的人幾乎不可能盡兩種義務。在南非，一個只想像人一樣生活的有色人將受到懲罰和孤立。在南非，一個想對人民盡義務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被迫脫離家庭，被迫過一種與衆不同的、不斷地隱蔽與反抗的生活。我開始並沒有選擇把人民放在家庭之上，但在試圖服務於人民時，我發現我已不能去完成作爲一個兒子、一個兄長、一個父親和一個丈夫的義務。

這樣，我對人民、對千百萬我也許從不認識或沒見過面的南非人的承諾，是以我最了解和最愛的人的代價換來的。這道理既簡單、又不好理解，正如一個小孩子問他父親，『爲什麼你不與我們在一起？』而他父親必須說一些可怕的大話：『有其它像你這樣的孩子，好多好多……』，然後不吱聲了。

我並不是生來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時是自由的——以我所知道的所有方式來說是自由的。自由地在我母親住的小房旁邊的田野裡跑來跑去，自由地在穿過我們村裡的清澈的小溪裡游泳，自由地在日光下烤玉米和騎在慢悠悠的公牛的寬背上。只要我聽父親的話，遵守部族的習慣，上帝也好，人間的法律也好，都不會來找我麻煩的。

只有在我懂得少年時的自由只是一種幻覺，青年時發現我的自由已經被奪走了的時候，

我才開始渴望自由了。起初，當學生時，我只想要自己的自由，即能晚上待在外邊、喜歡讀什麼就讀什麼、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暫時自由，但到了青年時，我來到了約翰尼斯堡，我渴望基本的和高尚的自由，即發揮我的潛能、能夠維持生計、結婚和有一個家——合法生活中的不受妨礙的自由。

但那時我逐漸看到，不僅我不自由，我的兄弟、姐妹都不自由。我看到不僅我的自由被剝奪了，而且像我這樣的每一個人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正是在這時我加入了非洲民族議會，正是在這時我對自己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自己人民自由的更大渴望。正是這種願望，即人民能夠有尊嚴和自尊地生活的願望，使我的生命充滿了活力，把一個害怕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勇敢的人，把一個遵紀守法的律師變成了罪犯，把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迫使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像苦行僧那樣生活。我並不比旁人更善良或富於自我犧牲精神，但我發現，當我知道我的人民作爲一個整體還不自由時，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許享受的可憐而有限的自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的人民任何人身上的枷鎖就是所有人身上的枷鎖，而所有人身上的枷鎖就是我身上的枷鎖。

正是那些漫長而孤獨的年月，使我對自己人民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所有人自由的渴望，包括白人和黑人。我像知道其它任何事情一樣知道，壓迫者也需要解放，正像被壓迫者需要解放一樣。拿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令人憎恨的囚犯，他被鎖在偏見和心胸狹隘的牢籠裡。如果

我拿走別人的自由，我不會眞正自由的，正像別人拿走我的自由時我不自由一樣。被壓迫者和壓迫者同樣是被剝奪了人性。

當我邁出監獄時，旣解放被壓迫者又解放壓迫者成了我的使命。一些人說這已經達到了。但我知道情況並非如此。事實是我們還不自由；我們只是得到了自由自在的自由、不受壓迫的權力。我們還沒有完成旅途的最後一步，只是在一條更長更難走的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因爲自由並不僅僅是去掉身上的鎖鏈，而是生活在尊重和提高別人自由的社會裡。對我們投身於自由的眞正考驗才剛剛開始。

我已踏上了這漫長的自由之路。我曾盡力不摔倒；在此路上我也失過足。但我發現一個秘密，那就是，攀登過一座大山之後，只會發現還有更多的山要攀登。我借此機會休息一下，領略一下周圍的大好風光，回頭看一下走過的距離。但只能休息一會兒，因爲與自由俱來的是責任，我不敢逗留，因爲漫長的旅途尙未結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下册）
作者＝ＮＥＬＳＯＮ ＲＯＬＩＨＬＡＨＬＡ ＭＡＮＤＥＬＡ 何戟及奕丞小组译
页数＝８０５
ＳＳ号＝１０５１６２４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５．０１
出版社＝天坤出版社
ＩＳＢＮ号＝９５７－８８６７－０４－２